

我的奋斗战俘营版：

唯一完整且官方授权的英语迄今已发布的译本阿道夫·希特勒奥斯塔拉出版社我的奋斗战俘营版本：迄今为止唯一完整且官方授权的英文译本阿道夫·希特勒翻译者：未知的 NSDAP 成员。

首次发行为我的奋斗阿道夫·希特勒 NSDAP 中央出版社，Franz Eher Nachf. GMBH 1937–1944。

本期奥斯塔拉出版社 <http://ostarapublications.com> 《我的奋斗》唯一官方英译本的原始标题页，并附有战俘营 357 号印章。

357 号战俘营位于波兰哥白尼，直到 1944 年 9 月，它才被转移到旧前 Stalag XI-D 遗址，位于下萨克森州法灵博斯特镇附近，位于西北部德国。

被拘留者包括英国机组人员，以及后来在阿纳姆战役中俘虏的英国士兵。

作者序言

第一卷 清算

第一章 我的家

第二章 在维也纳的学习和苦难

第三章 维也纳的日子——总体反思

第四章 慕尼黑

第五章 世界大战

第六章 战争宣传

第七章 1918 年革命

第八章 我的政治活动的开始

第九章 德国工党

第十章 第二帝国的崩溃

第十一章 国家与种族

第十二章 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德国工党

第二卷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章 世界观与政党

第二章 国家

第三章 公民和国家臣民

第四章 个性与民族国家理想

第五章 世界观和组织

第六章 我们斗争的第一阶段——口语

第七章 同红色势力的斗争

第八章 没有盟友，强者更强大

第九章 冲锋队的性质和组织

第十章 联邦主义的面具

第十一章 宣传和组织

第十二章 工会问题

第十三章 德国的同盟政策

第十四章 东方偏见或东方政策

第十五章 自卫权利

结语

## 作者序言

莱希河畔兰茨贝格要塞服刑。

根据慕尼黑人民法院当天的判决。

经过多年不间断的劳动，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一项工作了，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而我自己也认为这对运动是有益的。因此我决定用两卷书来描述我们运动的目标，以及它的发展。与任何纯粹教条的论文相比，从中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这也给了我机会描述我自己的发展，因为这样的描述对于理解第一个以及第二卷，并驳斥犹太媒体对我散布的毫无根据的谣言。

在这项工作中，我不是向陌生人求助，而是向那些心系运动的追随者求助。

并希望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知道，被文字打动的人比被口头表达的人要少，而且每一个伟大的地球上的运动的发展归功于伟大的演说家而不是伟大的作家。

然而，为了在捍卫任何理论时实现更多的平等和统一，其必须致力于写作的基本原则。因此，愿这两本书成为我为共同的任务贡献的基石。

莱希河畔兰茨贝格堡垒。

1923年11月9日下午12点半，以下人员倒下在慕尼黑统帅厅前和前陆军部前院，作为忠诚的相信其人民复活的信徒：Alfarth, Felix, 商人，7月5日出生，Bauriedl, Andreas, Hatter, 5月4日出生，Casella, Theodor, 银行官员，8月8日出生，埃利希，威廉，银行官员，8月19日出生，浮士德，马丁，银行官员，1月27日出生，Hechenberger, Ant., 机械师，9月28日出生，Koerner, Oskar, 商人，1月4日出生，Kuhn, Karl, 领班，7月26日出生，Laforce, Karl, 学生工程师，10月28日出生，Neubauer, Kurt, 男仆，3月27日出生，Pape, Claus von, Merchant, 出生于8月16日，Pfordten, Theodor von der, 最高省议员 Court, 5月14日出生，Rickmers, 约翰，退役骑兵上尉，5月7日出生，Scheubner-Richter, Max Erwin von, 工程博士，出生于1月9日；Stransky, Lorenz, Ritter von, 工程师，出生于1月9日3月14日，沃尔夫·威廉·商人，10月19日出生，所谓的国家当局拒绝让死去的英雄们有一个共同的坟墓。因此，我把这本书的

第一卷献给他们，作为一个共同的纪念，以便他们作为事业的烈士，能够永远激励我们运动的追随者。

堡垒，莱希河畔兰茨贝格，1924年10月16日。

## 第一卷 清算

### 第一章 我的家

今天，我认为命运指定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座小镇位于德国和德国联邦的边境，至少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这是我们应该献身于一生的任务，而且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

德意志奥地利必须恢复到伟大的德意志祖国，而且这不是基于经济原因。

即使联盟与经济无关，即使它对经济不利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仍然应该发生。同血缘的人应该在一起同一个帝国。

德国人民没有权利实行殖民政策，除非他们已经把他们所有的孩子们在一个国家里。当帝国的领土包括所有德国人并证明无法保证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道德权利才能产生，从需要人民，获得外国领土。犁就是剑，战争的眼泪将产生为子孙后代提供日常食粮。

因此，在我看来，这个边境小镇是一项伟大任务的象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尊重它教会我们一个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教训。一百多年前，这个与世隔绝的现场是一场影响整个德国民族的悲惨灾难的发生地，它将至少在德国历史上，它将被永远铭记。

在我们祖国遭受最深重屈辱的时候，纽伦堡书商约翰内斯·帕尔姆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者和法国人的敌人，在这里被处死，因为他爱德国即使在她遭遇不幸时也是如此。他固执地拒绝透露他的同伙的名字，或者而是对此事负有主要责任的负责人，就像 Leo Schlageter 一样。

前者与后者一样，都是被一名政府官员、一名警察局长向法国人举报的。

来自奥格斯堡的他在那次事件中赢得了不光彩的名声，并树立了榜样，后来，在赫尔·塞韦林 (Herr Severing) 政权统治下，德国官员也抄袭了这一做法。

这座因河畔的小镇，因纪念一位德国烈士而神圣，是一座巴伐利亚小镇我的父母是奥地利人，但在奥地利的统治下，他们定居于上个世纪，我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尽职尽责。

我的母亲负责家务，并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孩子。

我没有保留多少记忆，因为几年后我父亲不得不离开那个我深深爱上的这个边境小镇，在因河谷更远处开始了一个新工作，因此，帕绍实际上位于德国境内。

在那个年代，奥地利公务员通常会定期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

到帕绍后不久，我父亲就被调往林茨，在那里，他退休了，靠养老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老先生现在可以休息了。

劳动。

他是一个穷苦村民的儿子，小时候就变得焦躁不安，于是离家出走了。

刚满十三岁的他就背上书包，离开了家乡的乡村教区。

尽管有“亲身经历”的村民劝阻，他还是去了维也纳学习在那里进行交易。

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

这是一个痛苦的考验，决定离开家，面对未知，手里只有三个荷兰盾但当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已经十七岁了，并且已经完成了学徒期作为一名工匠，他并不满足。相反，持续的经济衰退那段时期的贫困和痛苦坚定了他放弃在贸易并争取“更高的东西”。

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觉得，家乡的教区牧师的地位是人类成就的最高水平，但现在大城市扩大了他的视野，年轻人一个人把国家官员的尊严视为最高尚的。他坚韧不拔，当他才度过青春的一半时，苦难和烦恼就已经使他老了，17 岁那年，他执着地开始了他的新计划，并坚持下去，直到成功。

他成为了一名公务员。我想，他大约 23 岁时就成功了使自己成为他决心成为的人。这样，

他就能履行他作为可怜的孩子，直到他成为“名人”后才可以回到他的家乡。他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村子里没有人记得他还是个小男孩，村子本身也对他来说变得陌生。

终于，在他五十六岁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他无法忍受闲着一天。在上奥地利州兰巴赫小集镇的郊区，他买了一个农场，自己耕种。就这样，在结束了漫长而辛勤的职业生涯后，他回到了他父亲所过的生活。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自己的理想。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空旷的地方、在放学的长路上奔跑，和一些最粗鲁的人混在一起孩子们，这让我妈妈很焦虑。所有这些都让我变得有点这与呆在家里完全相反。

我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选择职业的问题，但我确实我对父亲从事的职业完全没有同情心。我认为天生的演讲的才能现在开始在或多或少激烈的争论中发展和形成我以前和战友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成了一个少年领袖，在学校里学习很好，很容易，但很难管理。闲暇时，我在兰巴赫修道院教堂唱诗班练习唱歌，因此，我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可以再次受到情感上的震撼并再次受到教会仪式的宏伟壮丽。

对我来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是将修道院院长视为人类最高权力的代表。

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就像我父亲眼中卑微的乡村牧师的地位一样在他自己的童年时代？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是这样想的，但我和父亲之间的幼稚争执并没有让他欣赏儿子的演讲天赋，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职业，所以他自然无法理解我当时脑子里那些孩子气的想法。我性格中的矛盾令他感到有些焦虑。

事实上，对这种职业的短暂渴望很快就被希望所取代更适合我的性格。在父亲的书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些涉及军事主题的出版物。其中一本是一本通俗的历史 1870 年至 1871 年的法德战争。

它由两卷当时出版的艺术插图期刊组成。这些成了我的我最喜欢的读物。不久，那场伟大而英勇的斗争开始占据我的心头，从那时起，我对任何事物都越来越热情与战争或者军事事务有关的。

法德战争的故事对我来说也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第一次，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以一种相当模糊的方式，问题开始出现：是否存在如果有话，那是什么呢？参加那场战争的德国人与其他德国人？为什么奥地利没有参加呢？为什么我的父亲和其他人没有参加呢？斗争？难道我们和其他德国人不一样吗？难道我们不都属于同一族群吗？正是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开始困扰着我的小脑袋，从回复中回答我试探性地提出的问题时，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尽管暗自羡慕，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有幸成为俾斯麦帝国的一员。这是这是我所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决定要学习。考虑到我的性格，尤其是我的性格，我父亲认为在文理中学学习的古典科目不适合由于我的天赋，我认为实科中学更适合我。

我明显的绘画天赋证实了他的这种观点，因为在他看来，绘画是一门学科，在奥地利中学被忽视了太多。也许还有他那条艰难的道路的记忆。

他自己也曾游历过，这使他觉得古典研究不切实际，因此不重视它们。

他心里有个想法，他的儿子也应该成为一名政府官员。的确他为我决定从事这一职业。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面临的困难自己的职业生涯使他高估了自己的成就，因为这完全是他自己不知疲倦的勤奋和精力。

白手起家的骄傲性格使他怀有这样的想法：他的儿子应该遵循同样的职业，如果可能的话升到更高的职位。此外，这个想法考虑到自己一生的勤奋工作使他处于一个以便他的儿子能够在同一职业中取得进步。

他根本无法想象我可能会拒绝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父亲的决定简单、明确、清晰，在他眼里，这是值得相信的的确。

这样一个通过自己艰苦奋斗而成为独裁者的人，无法想象允许“缺乏经验”不负责任的年轻人选择自己的职业。

对他自己儿子的未来来说，这样做将是一件严重而在行使父母权威和责任时，存在应受谴责的弱点，这是完全这与他一贯的责任感不相符。’然而，他还是没有得逞。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当时我十一岁）感到自己被迫公开反对。不无论我父亲多么努力和坚定地将自己的计划和意见付诸实施结果，他的儿子也同样顽固地拒绝接受他不重视或不重视的思想。我不会成为公务员。

无论多少劝说和“严厉”警告都无法击垮这种反对派。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政府官员。

我父亲为了激发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或好感而做了一切努力，为我描绘他的职业生涯，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想到有一天我可能会被束缚在办公室的凳子上，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而被迫我一生都在填写表格。

可以想象，这样的前景会在一个被绝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好孩子”。我学到的课程使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户外而不是在家里。

今天，当我的政治对手窥探我的生活时，可以追溯到我童年的时候，勤奋的审查，以便最终能够证明这个希特勒的伎俩是多么的卑鄙，习惯于在他年轻的时候玩耍，我感谢上天让我可以回顾那些快乐的日子，找到记忆它们很有帮助。

当时，田野和树林是解决所有争端的战场。甚至参加 *Realschule* 并不能改变我利用时间的方式。但现在我有了另一个战斗去战斗。

只要父亲让我当公务员的计划与我的意愿相矛盾，抽象的，冲突很容易忍受。我可以谨慎地表达我个人的观点从而避免不断发生纠纷。

我自己不做政府官员的决心，暂时足以让我心彻底平静了。我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这个决心。但当我有了自己的积极计划并可以向我父亲给了我一个反建议。这件事发生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不太清楚，但有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想成为一名画家——我的意思是艺术家。

我有绘画天赋，这是公认的事实。这甚至是我父亲送我去读实科中学，但他从未想过要培养我的这种才能，我可以把绘画当成职业。恰恰相反。

当我再次拒绝遵从他最喜欢的计划时，父亲要求我我第一次真正希望成为的人，我已经下定决心表达几乎是自动进行的。

父亲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画家？艺术家？”他惊喊道。

他怀疑我是否精神正常。他想他可能没有发现我的我说的话是否正确，或者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但当我向他解释了我的想法后他看到我多么认真地对待这些建议，他以他特有的活力反对这些建议。他的决定非常简单，不会因为考虑我的自己的自然资格确实如此。

“艺术家！只要我还活着，就永远不会。”由于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一些固执，除了其他优点外，他的回答也同样有力，但当然，与他的回答相反，因此事情就是这样。我父亲不会放弃他的“永不”，而我变得更加坚定地我的‘尽管如此。’当然，结果并不令人愉快。老先生很痛苦，确实如此是我，尽管我真的很爱他。我父亲禁止我抱有任何从事绘画的希望作为一种职业。我更进一步，宣布我不会学习其他任何东西。

声明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所以这位老先生决定坚持他的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父母的权威。

这让我选择保持沉默，但我还是将我的威胁付诸实践。我认为，一旦向我父亲明确表示我在 *Realschule* 学校没有取得任何进步，他将被迫让我能够从事我梦想的职业。

我不知道我的计算是否正确。当然，我没有取得进展，在学校里很明显。我只学习那些吸引我的科目，尤其是那些我思想可能对我以后成为一名画家有帮助。似乎没有任何从这个角度

来看，重要性或对我没有吸引力的东西，我完全忽略了。

我当时的成绩报告总是要么好要么坏，根据科目以及它对我产生的兴趣。在一栏中，评论是“非常好”或“优秀，另一个“平均”甚至“低于平均水平”。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科目是地理和历史通识。这是我最喜欢的两门科目，我在这两门科目中名列前茅。

当我回顾这么多年并试图判断这段经历的结果时，我发现了两个非常一些重要的事实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首先，我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我学会认识和掌握历史的真正含义。

旧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至少在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总而言之，无法理解这一事实对个人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国家内。

在法德战争中胜利军队进行了辉煌的凯举行军之后纳粹德国境内的德国人与纳粹德国以外的德国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

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屑于欣赏其他德国人的真正价值或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考虑奥地利时，他们很容易混淆腐朽的王朝和本质上十分健全的人民。

德国人没有意识到，如果奥地利的德国人不是最好的他们永远不可能给一个拥有五十二个种族的帝国留下自己的印记。

数以百万计，如此明确，以至于在德国本身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想法——尽管这是完全错误的——即奥地利是一个德国国家。

这是一个错误，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但同样，这也是东马克一千万德国人的性格。在帝国内部，只有极少数德国人知道东德人民为了争取保护他们的德语、德国学校和德国特色。

直到今天，当悲惨的命运将我们的数百万同胞从帝国夺走，并且强迫他们生活在陌生人的统治下，梦想着共同的祖国，他们所有的渴望和奋斗都是为了维护至少使用母亲的神圣权利直到现在，德国广大民众才意识到必须为自己种族的传统而战。

所以最后，也许到处都有人能够评价德国精神的伟大这使得古老的奥斯特马克充满活力，并使那些完全依赖自己劳动力的人们能够资源，在几个世纪内保卫德国免受东方势力的侵扰，并随后通过游击消耗战，德国语言的边界被打破，当时当时，德意志帝国正努力培养对殖民地的兴趣，而不是对自己的血肉之躯的兴趣。

它的门槛。

在各种斗争中，随时随地发生的事，也发生在语言中在旧奥地利进行的战斗。

有三类人：战士、冷淡者和叛徒。

这种筛选过程甚至在学校里就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斗争这场战争最激烈的形式可能是在学校周围发生的，因为这是托儿所，必须精心照料种子，让它们发芽并形成未来的一代。

这场斗争的战术目标是赢得孩子的心，而孩子才是第一句口号是“德国小伙子，别忘了你是德国人”。

“记住，小姑娘，有一天你一定要成为一名德国妈妈。”那些了解少年精神的人能够理解，年轻人总是会随时准备年轻人在很多方面都领导着这场斗争，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战斗。

并携带武器。他们拒绝唱非德国歌曲。

争取他们脱离德国效忠的努力越大，他们就越崇高他们的德国英雄的光荣。他们节俭地购买糖果，以便他们能够捐出自己的每一分钱来帮助他们的长辈筹集战争资金。

他们非常敏感，能够听懂非德语老师说的话，而且他们齐声反对。他们穿着自己国家的禁忌徽章，当惩罚，甚至体罚。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忠实地模仿长辈，他们的态度往往更加友善和真诚。

因此，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各民族的斗争。

在旧奥地利互相争斗。

当为青少年马克德国联赛和学校联赛制作系列时，我们穿着矢车菊和黑红金三色来表达我们的忠诚。我们用万岁来互相问候！尽管遭到警告，但我们没有唱奥地利国歌，而是唱起了我们自己的《德意志高于一切》。

刑罚。

因此，在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公民大多数人除了语言之外，对自己的国籍知之甚少。

当然，我并不属于冷淡的那一类。没过多久，我就变成了一个热情的人。

“德国国民”，其含义与该名称所赋予的党派意义不同。

今天的任期。

我在民族主义方向上发展得非常迅速，到我十五岁时，我已经理解王朝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我的即使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也完全同情后者。

对于那些从未费心去了解的人来说，这种偏好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奥地利的内部状况。

在奥地利，学校里教授的世界史播下了这种发展的种子，因为奥地利历史本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个国家的命运与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将历史划分为德国历史和奥地利历史实际上是难以想象。事实上，只有当德国人民分裂为两个指出这次分裂开始创造德国历史。

维也纳至今仍保留着前帝国主权的徽章，似乎起到了永久结合的神奇保证。

当哈布斯堡王朝于 1918 年分崩离析时，奥地利德国人本能地提出了呼唤与德国祖国统一。

这是德国人民一致渴望的声音。

全国人民的心中都渴望回到他们祖先无法忘记的家园。

但这种普遍的渴望，只有通过历史训练才能解释，通过历史训练，个别奥地利德国人已经过去了。

这是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尤其是在心烦意乱、健忘的时候，它那安静的声音是对过去的提醒，呼吁人们不要只顾眼前的幸福，一个新的未来。

在所谓的高等学校里，世界历史的教学仍然非常不令人满意。

很少有教师意识到，教授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记住一些日期和事实上，一个男孩是否知道一场战争的确切日期或某个人的生日并不重要元帅或其他，当他父亲的王冠被放在某个无足轻重的人头上时，君主。那并不重要。

研究历史意味着寻找和发现导致某些结果的力量，这些结果以历史事件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阅读和学习的艺术在于记忆重要的事情，而忘记了不重要的事情。

也许我的整个未来生活都取决于我有一位历史老师，他理解如何在教学和实践使这一观点盛行，而很少有人理解这一点。

考试。这位老师是林茨实科学学校的利奥波德·波茨博士。他是理想的将我上面提到的历史教师必备素质拟人化。

他是一位举止果断但心地善良的老绅士，他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演讲者，能够用他的热情激励我们。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不激动地回忆起那位令人尊敬的人物，他的热情阐述历史的进程常常使我们完全忘记现在，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魔法回到过去。

他穿透了数千年的朦胧迷雾，把对逝去的过去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当我们听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热情高涨，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更为幸运的是，这位大师不仅能够用来自但他同时也能从过去吸取教训，为现在提供借鉴。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当时困扰我们心灵的日常问题。

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到的民族热情被他利用作为我们教育，因为他经常呼吁我们的民族荣誉感，因为这样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轻松地维持秩序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就是说。正是

因为我有这样的老师，历史才成为我最喜欢的科目。作为自然结果，但没有老师的刻意纵容，我当时就成了一个年轻的反叛。

但是，谁能跟随这样的老师学习德国历史而不成为德国历史的敌人呢？其统治者对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产生了如此灾难性的影响的国家？最后，一个人如何能继续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忠实臣民呢？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和目前的行为证明它随时准备背叛德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微不足道的利益？我们这些年轻人难道没有充分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对我们德国人没有任何爱意，也不可能有任何爱意？历史告诉我们哈布斯堡王朝所采取的政策得到了我们的证实自己的日常经历。在北方和南方，外来种族的毒害正在侵蚀着我们人民的主体，甚至维也纳也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德国城市。

“皇室”尽可能地偏袒捷克人。

事实上，正是永恒正义和无情惩罚的女神之手导致了奥地利德意志主义的最大敌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他亲自参与铸造的子弹。他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这项工作始于执政时期把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

德国人民肩负的负担是巨大的，金钱的牺牲他们必须制造的血液非常重。然而，任何还没有完全失明的人都必须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最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意识到整个体系在道德上受到与德国结盟的认可，从而缓慢地消灭了旧奥地利君主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德国本身的支持。

哈布斯堡王朝的虚伪，表面上试图让人们相信奥地利仍然仍然是德国的一个国家，增加了对皇室的仇恨情绪，同时时间激起了反叛和蔑视的精神。

只有在德意志帝国本身，当时的统治者才不明白这一切就像被打瞎了一样，他们站在尸体旁边，在腐烂的迹象中，他们相信他们认识到了恢复活力的迹象。在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和虚幻的奥地利国家是世界大战的根源，也是最终的崩溃。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根源。

我只想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得出了一些结论，从未放弃，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它们的看法越来越深刻。

第一，奥地利帝国的解体是建立维护德国民族和文化；而且，这种民族情感绝不是完全相同的王朝爱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哈布斯堡王朝注定会带来不幸德意志民族。这些信念的必然结果就是，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感觉我对我德奥家乡怀有强烈的热爱，但对奥地利国家却怀有深深的仇恨。

我在学校学习历史时形成的看待历史的方式从那时起，世界历史就越来越成为我取之不尽的源泉。

了解当代历史事件，也就是政治。因此，我不会“学习”历史，但让历史来教我。

我在政治上是个早熟的革命者，在艺术上也同样是个早熟的革命者。那时，上奥地利州的省会会有一个剧院，相对来说还不错。

一切都是在那里生产的。

我十二岁的时候在那里观看了威廉·泰尔的表演。

那是我第一次看戏剧。几个月后，我去看了一场《罗恩格林》是我听的第一部歌剧。我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我对拜罗伊特大师的青春热情永无止境。我一次又一次被吸引到听他的歌剧；今天我认为，这些在一个小省城为我铺平了道路，让我有机会欣赏更好的作品稍后。

这一切加深了我对父亲为我选择的职业的厌恶，这种厌恶在年轻人粗鲁的一面被磨平后变得尤为强烈，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充满了很大的痛苦。

我越来越确信，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我永远不会快乐，现在实科中学认可了我的绘画天赋



我的决心变得更加强大。

诅咒和威胁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我想成为一名画家，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强迫我成为一名公务员。这种情况的唯一特殊之处是随着我长大，我对建筑越来越感兴趣。

我认为这是我的绘画天赋的自然补充，我内心很高兴我的艺术兴趣范围因此扩大了。我没想到有一天它必须否则。

我的职业生涯问题比我预想的要早得多。当我十三岁那年，我父亲突然离开了我们。当时他身体还很健康，突然中风了。

中风无痛地结束了他在世间的旅程，并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了深深的悲痛。

他最热切的愿望是能够帮助儿子在事业上取得进步，从而让他免于他自己也曾经历过严酷的考验，但当时看来，这种渴望似乎徒劳无功。然而，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经播下了未来的种子，我们当时都没有预见到。

起初，表面上什么也没有改变。我母亲认为她有责任继续教育我按照我父亲的意愿，这意味着她会让我学习民事服务。就我而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决心，绝不要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才会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高年级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与我的理想变得非常冷漠。疾病突然帮助了我。在短短几年内几周后，它决定了我的未来，并结束了长期的家庭冲突。

我的肺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医生强烈建议我母亲不要让我从事需要在办公室工作的职业。他命令我至少一年内放弃上实科中学。

我暗暗渴望了很久、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东西，现在突然不用我付出任何努力，母亲就同意我离开实科中学并进入学院学习。

那些日子很幸福，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梦，而且注定会一直这样下去。

只是一个梦。两年后，我母亲的去世让我所有的美好计划都化为泡影。她死于一场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从一开始，这种疾病就让人几乎看不到希望恢复。

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爱我的母亲。

贫困和严酷的现实迫使我迅速做出决定。家里的微薄收入让我母亲病得很重，几乎全部用完了。作为孤儿的生活费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不管怎样，我得自己挣钱。我的衣服和床单都装在手提箱里我怀着坚定的决心，前往维也纳。我希望能够阻止命运的安排，因为我的父亲在五十年前就做到了这一点，我决心成为“某个人”，但绝不是公务员。

## 第二章：学习和受苦维也纳

然而，我有一个疑虑。我觉得我更适合画画，而不是绘画，尤其是建筑绘画的各个分支。同时我对建筑学一直在进步，之后我在这个方向上进步得更快了。

我第一次访问维也纳，持续了两个星期。

那时我还不到十六岁。我去霍夫博物馆研究美术馆里的画作那里；但建筑本身几乎吸引了我所有的兴趣。从清晨到深夜，我我花了很多时间参观各种公共建筑，而建筑本身才是对我来说始终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站在歌剧院和国会大厦前惊叹不已。

整个环城大道给我一种神奇的感觉，仿佛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场景。

现在，我已经第二次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入学考试，但我自豪地相信我已经通过了。我非常确信我的当我得知我未能通过考试的消息时，我如遭晴天霹雳。

蓝色。但事实是我失败了。

我去见了校长，请他解释为什么他们拒绝接受我作为他是学院下属的综合绘画学院的学生。他说，这些素描我随身携带的东西毫无疑问地表明绘画并不适合我，但是同样的草图清楚地表明了我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天赋。

因此，我考虑的不是绘画流派，而是建筑学也是学院的一部分。

他们很难相信我从未上过建筑学校，也从未接受过任何有关建筑设计的指导。

当我离开席勒广场那座宏伟的汉森大楼时，我感到很沮丧。我感觉在我年轻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因为我听说我现在的能力在我看来就像一道闪电，清楚地揭示了我一直以来所处的二元论。

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迄今为止我都无法解释。几天之内，我我自己也知道我应该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当然这条路很艰难。

我现在不得不痛苦地后悔我以前的行为，忽视和蔑视某些科目。

实科中学。在进入学院建筑学院学习之前，必须进入技术学院，但进入这所学院的必要资格是我没有高年级的入学证书。至于我可以预见，追求艺术使命的梦想似乎超出了可能性的极限。

母亲去世后，我第三次去了维也纳。这次旅行注定要持续几年了。因为我以前去过那里，所以我恢复了往日的冷静和坚定。我的以前的自信又回来了，我的眼睛坚定地盯着目标。我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建筑师。

总会遇到各种障碍，不是要我们克服，而是要我们克服。

我下定决心克服这些障碍，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我的父亲虽然是村里鞋匠的穷儿子。我的起步更好，获胜的可能性很大。

更大。

那时，我的生活似乎很艰难；但今天，我在其中看到了智慧的运作。

上帝保佑。逆境常常威胁着要击垮我，但我的意志却越来越坚强。

尽管障碍越来越多，但意志最终取得了胜利。

我很感谢生命中的那段时期，因为它让我变得坚强，让我变得坚强，而且我更让我感恩的是，我因此而从空虚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母亲的宝贝被从舒适的环境中带走，交给对于一位新妈妈来说，这是一种逆境。

尽管我当时反抗过这种太残酷的命运，但我很感激我被抛弃了，尽管我不愿意，进入一个充满苦难和贫穷的世界，从而认识了后来我所服务的人。

斗争。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了两种我几乎不知道名字的危险迄今为止，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对于德国的存在有着多么可怕的意义。

人民。这两个危险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犹太教。

对于很多人来说，维也纳这个名字象征着纯真的欢乐，是快乐凡人的节日场所。

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时期的鲜活记忆。直到今天，一提到那座城市只会在我心中激起阴郁的想法。

这座菲埃阿基亚城镇的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五年的贫困——在这五年里，首先是作为后来我成了一名临时工，后来又成了一名穷画家，我只能靠自己挣取微薄的收入。

这甚至不足以消除我不断感受到的饥饿感。

那种渴望是我忠实的伙伴，它从未离开过我，并参与我所做的一切。

我买的每本书都意味着新的饥饿，我每次去歌剧院都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直与我的我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朋友，然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的东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除了建筑研究和偶尔去歌剧院（为此我不得不节制饮食）之外，除了读书，我的生活没有任何乐趣。

那时我读了很多书，并且对所读的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我下班后的空闲时间都是专心致志于学习。

因此，在短短几年内，我就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它们很有用。

但除此之外，那些年里，我心中形成了对生活的印象和世界观。这些成为我行为的坚实基础。我只需要对我所写的然后我学习并创造了我自己的，而且我不需要改变任何东西。

相反，我今天坚信，一般来说，男人在青年时期奠定了他们的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基础，无论这种创造性思维存在于何处。

我区分了年龄的智慧——它只能来自更深刻的和基于长期生活经验的远见以及年轻人的创造天赋，它在思想和观念中以无穷无尽的生产力绽放，却无法消化由于数量过多，这些木材可以立即被回收。

这些为未来提供了建筑材料和计划，年龄正是从它们中汲取力量的。

石头和建筑大厦，除非所谓的岁月智慧已经扼杀了创造力青春天才。

我以前在家里和父母一起过的生活与许多人的生活略有不同。我毫无忧虑地展望明天，不存在社会问题我要面对的。我年轻时接触过的人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因此，这个世界与真正的体力劳动者的世界几乎没有联系，因为，虽然乍一看这似乎令人惊讶，但这个阶级之间的鸿沟，绝不是经济富裕，来自体力劳动阶层的程度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深。

这种分裂，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敌意，其原因在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

刚刚超过体力劳动者的水平的群体——担心它会倒退恢复到原来状态，或者至少被归为劳动者一类。

此外，回忆下层阶级的文化贫乏，也有些令人厌恶，他们彼此之间态度粗鲁；因此，那些只处于社会第一梯队的人阶梯无法忍受被迫与文化水平和标准有任何接触超越了他们所过的生活。因此，那些属于能够真正被称为上层阶级的人比暴发户更容易堕落，与处于社会最低层次的同胞混合在一起，因为，用暴发户这个词来说。

我的意思是，每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提升到比这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以前属于这个阶级。对于这样的人，他所经历的艰苦奋斗死亡常常会摧毁他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他自己为生存而奋斗，扼杀了他同情心的敏感性。

那些被遗弃的人的痛苦。

从这个角度来看，命运对我还是很仁慈的。环境迫使我回到那个世界我父亲早年就是在这种贫困和经济不安全中长大的，因此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教育的眼罩从我的眼睛里被撕掉了。现

在我第一次学会了认识男人，学会了区分外表的优雅或粗俗举止和人们真正的内在本性。在本世纪初，维也纳已经跻身于社会条件是邪恶的。耀眼的财富和令人厌恶的贫困并存。在市中心和内城，人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帝国的脉搏，这个帝国的人口为五千两百万，充满着多民族国家所特有的危险魅力。

宫廷的辉煌灿烂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智慧。

帝国的吸引力，而哈布斯堡的中央集权政策则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吸引力君主制本身。

为了将各种各样不同的国籍，但结果是高级官员异常集中在这个城市，它既是首都，又是皇帝的住所。

维也纳不仅是多瑙河君主国的政治和思想中心，也是工业中心。与大量高级国家官员的军官相比，艺术家和科学家，还有更庞大的工人大军。赤贫与贵族和商人阶级的财富。

数以千计的失业者在环城大街的宫殿前和下面的维亚特街上闲逛。

旧奥地利的凯旋，无家可归的人们挤在阴暗污秽的运河里。

几乎没有其他德国城市能比这里更好地研究社会问题维也纳。但在这里我必须警告大家，不要幻想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从更高的社会层面。

从未落入那条喷涌的毒蛇魔爪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它的毒性是什么样的。

试图以任何其他方式研究它只会导致肤浅的谈话和多愁善感的妄想。

两者都是有害的：第一，因为它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第二，因为它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哪一个更邪恶——忽视社会困境，大多数受到命运眷顾和社会地位上升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规模，或者同样傲慢，常常不圆滑，但总是彬彬有礼，那些热衷于慈善并自诩为高人一等的人所表现出的傲慢同情人民。

当然，这些人由于缺乏本能的理解力，会犯下一定程度的罪孽，无法意识到，因此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引以为豪的社会良知自己永远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常常导致他们的好意遭到怨恨，然后他们谈论人们的忘恩负义。

这些人很难理解社交活动是一回事，他们无法理解社交活动的重要性。

期待感激，因为他们不是在分发恩惠，而是在建立权利。我受到了保护抵制以上述方式研究社会问题的诱惑，原因很简单我自己也被迫承受这些痛苦。

因此，这不是一个客观研究问题的问题，而是一个测试其对我的影响。虽然兔子经历了实验的磨难，但这一定不是被当作无害的证据。当我今天试图回忆起那一连串的印象时我发现，在那段时间收到的信息只能做到大致完整。

在这里，我只想描述一些比较重要的印象，以及那些对我产生影响和常常让我震惊，我将提到我从这次经历中学到的一些教训。当时下找工作都不是太难，因为我不需要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工匠，但作为所谓的额外帮手，必须准备好接受任何偶然出现的工作，只是为了谋生。

因此，我采取了与所有那些抖落欧洲尘土的移民相同的态度，坚定决心为新世界的新生活奠定基础，为自己购置一个新家。

他们摆脱了阶级、职业、环境和传统的偏见，进入任何对他们开放的服务，接受任何他们遇到的工作，填补越来越多的认为诚实的工作不会让任何人蒙羞，无论它是什么类型的工作。所以我决心进入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世界并开辟自己的道路。

我很快就发现，总有工作可做，但我也知道，很容易就会失去。能否很快获得正常的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在我看来，这是我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中最阴暗的部分。

尽管技术工人不像非技术工人那样经常被闲置，但前者绝不会免于同样的命运；因为尽管他可能不必像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足、工厂停工和罢工而导致的失业剥夺了技术工人谋生的机会。收入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一个人每日的面包会在整个社会产生深远而严重的影响经济结构。

移居到大城市的农村小伙子被所谓的轻松工作所吸引（实际上可能如此）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尤其是大公司的魔力城市。他习惯了在农村挣稳定的工资，所以他被教导不要辞去原来的工作直到至少出现一个新的。

由于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农村地区出现长期失业的可能性乡村生活非常贫乏。认为离开乡村去城里生活的年轻人是不像那些留在家耕种土地的人那样由坚实的材料制成。

相反，经验表明，越健康、越有活力的人越会移民，而不是相反。我指的这些移民不仅包括移民到美国的人，还包括决定离开家乡去大城市的农场工人，在那里他将成为一名陌生人。他准备冒着命运未卜的风险。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来到城里时口袋里只有一点钱，而且头几天他并不如他没有幸运地找到工作，他会感到沮丧，但如果他找到工作然后又失去了它不久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找新的工作，尤其是在冬天，通常很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最初几周的生活还可以忍受。他从工会领取失业救济金并因此得以继续经营下去。但当他的最后一笔钱花光，他的工会也终止时长期失业导致无法偿还贷款，然后才是真正的困境。他现在四处游荡，饥饿的。

他经常典当或卖掉他最后的财产。他的衣服开始变得破旧，而且他的外表越来越破旧，他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低，此外身体上的痛苦，现在与一群人混在一起，他的思想通过他们变得中毒了。

当他没有地方睡觉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冬天，这种情况很常见，他就会处于可怕的痛苦。最后他找到了工作，但同样的故事又重复了第二次、第三次，现在情况可能更糟了。渐渐地，他对这种永恒的不安全感变得漠不关心了。

最后他逐渐习惯了这种重复。

因此，即使是一个通常勤奋的人，也会对整个事情的态度变得漫不经心。

逐渐成为无良之人手中的工具，利用他来为了他们自己卑鄙的目的。

他经常无缘无故地被解雇，现在他越来越不管他参加的罢工是否是为了确保他的经济权利或者旨在破坏国家、整个社会秩序，甚至文明本身。

尽管他可能并不喜欢罢工的想法，但他还是出于纯粹的冷漠加入了罢工。

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成千上万个案例，我观察的时间越长，我越来越讨厌这座贪婪地吸引男人进入其怀抱的庞大城市，最终无情地摧毁它们。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仍然觉得自己与他们自己的人民还在国内；如果他们留下来，这种关系就被打破了。

我被大都市的生活所震撼，以至于我自己也体验到了这种很多事情，并感受到了它对我灵魂的影响。还有一件事让我明白了。突然的变化从工作到闲散，反之亦然，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和收入之间的不断波动。

支出最终摧毁了许多人的节俭意识，也摧毁了调节的习惯以智能的方式支出。

身体似乎已经习惯了变迁，在好的时候大吃大喝，饥饿在坏的时候。事实上，饥饿会破坏所有在好的时候控制支出的计划，当又找到了工作。

这样做的原因是，失业工人所遭受的剥夺必须是心理上的补偿是，他不断出现想象自己在吃东西的幻觉再次热切地，这个梦想发展成一种渴望，变成了一种病态的冲动当工作和工资再次增加时，摆脱一切自我克制。

因此，一旦找到新工作，他就会忘记控制收入的支出，把钱花光，不考虑明天。这导致即使是小事也会混乱。

每周的家务预算，因为没有仔细计划支出。起初，收入可能会持续五天而不是七天；随后它们只会持续三天；随着习惯的养成，收入几乎维持不了一天，最终会在一天之内消失。

夜晚。

家里通常有妻子和孩子，而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会被感染这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如果丈夫对她们好，用他自己的方式爱她们，根据他自己的意愿。然后一周的收入在两周或两周内在家里共同花掉。

三天。

只要钱够用，一家人就会一起吃喝，周末他们就会饿然后妻子偷偷地在附近闲逛，借了一点钱，跑上来向店主借小额债务，以度过年底的艰难时期。

他们一起吃午饭，桌上的食物很少，甚至经常没什么可吃的。

他们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发薪日，谈论着它并制定计划；而当他们如此饥饿时他们梦想着即将到来的富足，所以小孩子们在他们的早年。

当丈夫一意孤行时，邪恶就达到了顶峰一开始，妻子是反对的，只是出于对孩子的爱。

然后，争吵和不和开始酗酒，丈夫变得越来越与妻子疏远。他现在每个星期六都会喝醉。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妻子必须尾随他从工厂到酒馆的路上。

以便在发薪日从他那里得到几先令。

然后，当他终于回家时，也许是在星期天或星期一，与他最后的便士，可怕的场景发生了。我已经在数百起案件中亲身经历过这一切。起初我感到厌恶和愤慨，但后来我意识到他们的不幸是一场悲剧并理解其深刻原因。他们是邪恶环境的不幸受害者。

当时的住房条件非常差。在维也纳，体力劳动者生活在令人震惊的悲惨。直到今天，当我想到人们居住的悲惨洞穴时，我仍不寒而栗，夜宿场所和贫民窟，以及所有阴暗的污秽景象令人厌恶的肮脏和邪恶。有一天，当大批被解放的奴隶从这些苦难的巢穴突然袭击那些没有思想的同伴？因为他们确实不加思索。他们不加思索地让事情继续下去，小，他们麻木不仁地梦想着清算的日子必然到来，除非命运及时平息。

今天，我感谢上帝把我送到了这样一所学校。在那里，我无法拒绝接受对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感兴趣。这所学校很快就给我上了深刻的教训。

为了不完全对我当时生活其中的人感到绝望，我必须区分一方面是他们的外表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他们另一方面，发展。

然后我就可以毫无气馁地忍受一切，对于那些从这一切中走出来的人不幸和痛苦，从这种肮脏和外在此的堕落，不是人类本身，而是更确切地说，是可悲的法律带来的可悲结果。在我的生活中，类似的困难使我看到这些最终被贬低的产品，人们不禁会产生一种怜悯的情感。压力之下才会产生这种情绪。感情用事的态度是错误的采用。

早在那些日子里，我就已经看到，只有通过双重方法，才能有可能改善这些状况，即唤醒人们深刻的社会责任，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并毫不留情的决心，要剪除一切无法根除的枝节。

正如大自然的注意力不在于保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在于为了延续物种，选择性繁殖后代因此在人类生活中，这也不是那么重要人工改进现有一代（由于人类的特性，这是不可能的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但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确保一条更好的道路未来发展。

我在维也纳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我很清楚地感觉到，一切社会活动的目的绝不能仅仅是慈善救济，这是荒谬和无用的，而必须成为一种手段找到消除我们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根本缺陷的方法，这些缺陷必然导致个人的堕落，或至少导致他走向这种退化。

很难采取任何手段，即使是最激烈的手段，来消除对某些犯罪阶层普遍存在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这一当代现象的内在动机和原因。

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允许这场悲剧发生感到愧疚。

退化。这种感觉使每一个严肃而坚定的决心都陷入瘫痪，因此导致了已经实施的措施，也是优柔寡断，因此也是软弱无力的。

对于自我保护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当一个时代不再背负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意识时，那时也只有那么，它是否具有必要的内在平静和外在力量，能够彻底切断毫不留情地消灭寄生虫，铲除杂草。因为奥地利政府几乎没有意识无论是社会权利还是社会立法，都无法废除这些邪恶的产物。

我不知道当时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当时我的那些人的经济困境同伴、粗鲁的风俗和道德、或低下的文化水平。

我们的资产阶级常常因为听到某些人说可怜的流浪汉，不管他是不是德国人，对他来说都一样，他会觉得回家，只要他能得到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身体和灵魂。他们哀叹缺乏他们对这种情绪感到恐惧。但有多少人真正问过为什么自己的情绪会比较好呢？他们中有多少人明白，作为如此受青睐的国家的一员，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自豪源于他们所遇到的无数次事例，这些事例让他们想起在艺术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之处在哪里？有多少他们意识到，对国家的自豪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伟大认识球体？我们的资产阶级圈子有没有想过，人民在其中所占的份额是多么微不足道？知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感到自豪的必要前提吗？这里不能反对的是，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仍然爱国。即使如此，我们可以原谅我们疏忽的态度，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谓的沙文主义教育——在例如，法国人民只是过分夸大了法国在各个方面的伟大。

文化领域，或者如法国人所说，文明。

法国男孩所受的教育并不是纯粹客观的。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涉及到国家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他都是以最主观的方式进行教学。教育应该始终以广泛的、一般的路线进行。

这些应该深深地刻在记忆里，必要时不断重复，人民的感情。然而，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我们不仅犯了疏忽大意的罪过，而且犯了积极地扭曲一些人在学校里幸运学到的一点知识。

毒害我们的政治体，侵蚀广大群众的心灵和记忆，甚至一点点痛苦和不幸都已离去。

让读者试着想象一下以下内容：地下室里有一间住所，这间住所由两间潮湿的房间组成。在这些房间里，一名工人他的家人一共住着 7 个人。我们假设其中一个孩子是 3 岁的男孩。是儿童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所接受的印象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天赋异禀的人在早年所获得的印象的痕迹仍留在记忆中直至高龄。

现在，这些居住空间狭窄、拥挤，不利于建立愉快的关系于是争吵和互相愤怒就产生了。

这些人很难说是生活在一起，而是互相叠在一起。

在一个有足够空间容纳人们的家里，误解就会自然消失暂时远离彼此，就成了长期争吵的根源。至于孩子们担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情况是可以忍受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经常争吵，但争吵很快就会结束。

很容易被遗忘，但当父母彼此吵架时，日常的争吵往往会发展成粗鲁；这是无法充分想象的。这种经历的结果必须成为以后在孩子们身上就明显了。

一个人必须有这样的环境的实际经验，才能想象出事态这种相互指责导致父亲殴打母亲，虐待她醉酒后的愤怒。

六岁时，这个不幸的孩子开始意识到成年人会发现的肮脏事实感染了道德毒素的叛乱，身体营养不良，可怜的小脑袋里却充满了害虫，年轻的“公民”上小学。他费了好大劲才勉强学会读书和写作。在家里不可能学到任何课程。

相反，父亲和母亲自己在孩子面前说着最轻蔑的话他们更倾向于侮辱老师，而不是把他们的后代放在他们的膝上，并给他灌输理智。

小家伙在家里听到的东西并不会增加他对周围人类环境的尊重。

这里没有对整个类本性和每个机构，从学校到政府，受到唾弃。无论主体是什么，宗教或道德，国家或社会秩序，他们痛骂所有人，并将他们打入冷宫。

当这个孩子十四岁离开学校时，很难说他最他的性格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真正的知识方面，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或者愤世嫉俗的厚颜无耻与道德态度相结合，这在一个如此年轻的。

如果一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如果他从未接触过任何高贵的东西，相反，他却亲密地了解人类最低级的存在吗？这个三岁的孩子到十五岁时就养成了辱骂一切权威的习惯。他只知道道德上的污秽和卑鄙，排除一切可能刺激他的向更高层次的事物思考。现在，这个年轻的人类个体进入了生活的学校。

他过着和他父亲童年时代一样的生活。他在街上闲逛，随时回家。他甚至辱骂那个伤心的人是他生下了他。

他诅咒上帝和世界，最后被关进了少年管教所。

获得了最后的润色，他的资产阶级同代人惊讶于他缺乏“爱国这位年轻的‘公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

资产阶级世界每天都看到毒药通过各种媒介在人民中间传播戏剧、电影、下流新闻和淫秽书籍，但他们却对可悲的“道德标准”群众“缺乏民族情感”——就好像电影中过度的伤感垃圾论文之类的东西可以为一个人的伟大奠定基础国家，与个人早年所受的教育完全无关。然后我迅速而彻底地理解了我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事情，即“民族化”的问题首先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为个人的教育提供必要的基础，因为当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在一个人的心灵中灌输了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经济，尤其是政治伟大——只有到那时，他才有可能为自己是该国公民而感到自豪。

我只能为自己所爱的东西而战。我只能爱我所尊重的东西，为了尊重我至少必须对它有一些了解。

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一旦被唤醒，我就开始深入研究它们。

一个新的、迄今未知的世界就这样展现在我面前。

在 1909 至 1910 年间，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不再需要自己谋生。

作为一名体力劳动者。现在我以小规模独立工作，成为一名水彩画家。

就收入而言，这个职业确实很差，因为这些仅够支付生活必需品，但考虑到我的职业，我对它很感兴趣渴望。

此外，当我晚上回到家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疲惫不堪，以前我一打开一本书就会立刻睡着。

因此，我现在的职业与我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是一致的。此外，我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可以比以前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我画画为了谋生，我学习是因为我喜欢。

因此，我能够获得必要的社会问题理论知识。

通过实际经验来补充我所学的知识。我学习了所有我能读到的书我发现有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对所读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思考。我认为当时和我一起生活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古怪的人。

除了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之外，我自然也热衷于研究建筑。我认为建筑与音乐并列为艺术之王。学习建筑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工作，而不是乐趣。我可以读书或画画到凌晨，而不必担心疲惫不堪，我越来越有信心，我的美好未来一定会实现，尽管我必须等待多年才能实现它。我坚信有一天我会我应该作为一名建筑师出名。

事实上，除了专业学习之外，我对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在我看来并不重要。相反，我把这种对政治的实际兴趣仅仅看作是父母应尽的基本义务的一部分。

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那些不了解周围政治世界的人，批评或抱怨的权利。

因此，在政治问题上，我仍然继续阅读和研究，但“阅读”已经对我来说，可能和我们所



谓的“知识分子”。

我知道有些人会无休止地读书，一本接一页，一页接一页，但我不应该称他们为他们“博览群书”。当然，他们“知道”很多东西，但他们的大脑似乎无法对他们从书中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分类和整理。

他们没有能力区分书中哪些内容有价值，哪些内容没有价值，以便他们能够记住前者，如果可能的话，跳过后者，阅读，或者，如果不可能的话，一旦阅读就将其扔到船外作为无用的压舱物。

阅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阅读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填补空白由每个人所拥有的天赋和能力所构成的框架。

这样，每个人都为自己获取完成自己使命所需的工具和材料。

人生的使命，无论这是谋生的基本任务，还是一份职业响应更高级别的号召。

这是阅读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让我们对所读之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生活的世界。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通过阅读获得的材料不能储存在与连续章节相对应的计划中书本，但由此获得的每一点知识都必须像对待一块小石头一样对待。

插入马赛克，以便它在所有其他碎片和颗粒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帮助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总体的世界图景。

否则，所有的阅读都只能产生混乱的概念，而这种混乱是它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还会使不幸的拥有者变得自负，因为他认真地自认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生活有所了解。

他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知识，而事实是，这种知识的每一次增加“知识”使他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直到他最终陷入某种疗养院，或者从政，成为议会议员。

这样的人永远无法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把他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时刻到来了，因为他的心理装备不是按照人类的广泛路线排列的。

存在，而是按照他阅读书籍的顺序，其内容存储在他的头脑。

如果命运有一天召唤他用书本上的知识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人生的目的，命运必须给这本书命名，并给出页码，对于穷人来说 noodle 自己永远也找不到他收集到现在被称为因为；但由于没有提到页面，关键时刻聪明的傻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状态极度尴尬。

他非常激动，不断寻找类似的案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最终会开错了药方。

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我们那些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除非我们假设他们是出于恶意和欺诈，而不是病理性虚弱。

另一方面，一个培养了阅读技巧的人会立即在书中辨别出日记或小册子，应该记住什么，因为它满足了他的个人需要或价值作为常识。

他这样学到的东西融入到他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或事物的心理概念中，进一步纠正心理图像或将其扩大，使其变得更加准确和精确。如果一些实际问题突然需要检查或解决，记忆会立即选择通过多年的阅读，从大众中获取必要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服务于一个人的判断力，以便 he 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和更清晰的看问题，甚至解决它。

这样，阅读才有意义，有价值。

例如，演讲者如果没有现成的信息来源，无法正确处理他的主题，无法在对手面前捍卫他的观点，甚至尽管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和正确的。

在每次讨论中，他的记忆都会让他陷入可耻的困境。

他无法提出论据来支持他的言论或反驳他的对手。只要发言人只需以个人名义为自己辩护，情况并不严重，但当命运将这样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放在公共事务的首位时，邪恶就出现了，而事实上，一无所知。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努力用正确的方式读书，而且我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和智慧帮助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在维也纳的逗留特别有用且有益。我在那里的日常经历不断

刺激我去研究最多样化的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

因为我有能力用理论来检验现实，用现实来检验理论，所以我一方面，我避免了迷失在理论的迷雾中，另一方面，我避免了另一方面，它又很肤浅。

当时的日常生活经历让我下定决心进行基础理论研究除了社会问题之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不可能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特点，如果不是因为事实上，我随后就真的一头扎进了这个问题中。

我年轻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大部分都是错了。它领导了争取普选权和秘密投票的斗争，这一事实让我内心满足，因为我当时的理智告诉我，这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权，而我非常厌恶。

我确信，除非牺牲德国因素，多瑙河国家可以不会继续存在。即使奥地利德国人长期而持续地被奴役，也不会构成了帝国持久的保证，因为帝国是否以及如何持久存在都是值得怀疑的。

到目前为止，斯莱特人已经拥有了维护国家所需的能力。

因此，我欢迎一切可能导致这一不可能的国家，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在十年内消灭德国特征百万人。

这种语言混乱越是在议会中造成不和与混乱，巴比伦帝国解体的时刻即将到来。这意味着解放我的德奥人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重新团聚祖国。

因此，我对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没有反感。

公开宣称的目的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水平（当时我无知地愚蠢地相信）是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反对它的又一个观点，）但导致我疏远社会民主运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它的敌对在奥地利维护德意志主义的斗争及其不体面的追求的态度斯拉夫“同志们”对这些方法持积极态度，只要有任何实际的优势即将到来，但除此之外，她保持着傲慢的矜持，从而给了追求者回答他们的行为应得的。

因此，在十七岁的时候，我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知之甚少，当我看《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作为同义词。这只是命运之手突然打击的结果我彻底认清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欺骗公众的体系的本质。

到目前为止，我对社会民主党的了解还只是旁观者。

一些群众集会。我对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但现在突然面对的是其教学成果以及所谓的世界观。这样，几个月的时间足以让我学到一些东西，在其他情况下，我可能需要多年的学习，即在社会美德和对邻居的爱的掩护下真正的瘟疫正在国外蔓延，如果这场瘟疫没有被消灭，拖延下去，它最终可能会成功灭绝人类。

我第一次接触社会民主党是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时候。从我开始工作的那一刻，情况对我来说就不太愉快了。我的衣服仍然相当得体，我说话谨慎，举止矜持。

我太专注于考虑自己的现状和未来前景，以至于没有花太多时间对我周围的环境感兴趣。我找工作是为了不挨饿，同时时间，以便在学业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尽管这种进展可能很慢。

如果不是在第三或第四次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迫使我采取明确的立场。我被要求加入工会。

那时我对工会一无所知。我还没有机会对工会形成看法。

它们是否有用，视情况而定，但当我被告知必须加入工会时，我拒绝了。

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无论如何，我不会让自己被强迫做任何事情。也许前一个原因救了我以免被立即扔掉。

他们可能以为几天之内我就会转变态度或者变得更加温顺，但如果他们这么想，但这是大错特错的。

两周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不可能迈出这一步，即使我愿意先拿去吧。

在这十四天里，我更加了解我的同事，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我加入一个其代表同时表现出在我看来，他们自己处在一种非常不利的境地。

起初，我感到很不满。中午时分，我的一些同事常常去其他人则留在建筑内吃午餐，在大多数情况下，收入非常少。这些是已婚男子，他们的妻子给他们带来他们在破旧的容器里喝午间汤。到了周末，留在大楼里吃午餐的人的数量。我明白后来他们才知道原因。现在他们谈论政治。

我喝了一瓶牛奶，吃了一口面包，和其他人分开吃，而我仔细研究我的环境，或者开始沉思我自己的悲惨命运。然而我听到绰绰有余，我常常想，他们说的很多话都是说给我听的，希望让我采取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我听到的一切都激起了我内心最强烈的敌意。

国家贬低一切，因为它被认为是“资本家”的发明阶级（我不得不经常听到这句话！）；祖国，因为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手中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法律，因为那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手段；学校制度，因为那是不仅训练奴隶，还训练奴隶主；宗教是麻醉人民的手段，以便事后利用他们；道德，作为愚蠢和胆怯顺从的标志。没有什么他们没有陷入泥潭。

一开始我保持沉默，但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然后我开始参与讨论并回应他们的陈述。然而，我必须承认，这必然是完全毫无结果，只要我没有至少一定数量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明确信息进行了讨论。

因此，我决定查阅他们声称的所谓智慧，为了这个目的，我读了一本又一本书、一本又一本的小册子。

与此同时，我们在建筑工地上互相争论。我一天天好起来了在他们声称了解的那些话题上，我比我的同伴们了解得更多。

后来有一天，我的对手中更可怕的人，使用了最有效的武器他们不得不用威吓和武力来代替理性的力量。一些领导人我的对手命令我离开大楼，否则我就被扔下楼。

脚手架。

由于我独自一人，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所以我选择了第一个选择，但他还是离开了因为他学到了一个教训。

我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但同时又深受感动，以至于我不可能不再去想这件事，不再去想它。当我的愤怒开始平息时下来，顽固的精神占了上风，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回到再次从事建筑行业。

几周后，当我那点微薄的积蓄全部用完时，这个决定变得更加坚定饥饿再次无情地抓住了我。我别无选择。我又找到了工作，因与以前相同的原因而不得不离开。

我一直在自问：“这些人是否有资格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员？”这个问题令人深感不安，因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捍卫如果它代表了这样一群乌合之众。

另一方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国家在人力资源方面就很贫乏。

在这样的冥想和内省中度过的日子里，我感到沮丧，在我的脑海里看到了不断增加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这些人不再被视为他们的自己的国家。

几天后，当我看到维也纳人排成的长队时，心情发生了变化。

工人四排并排游行，进行大规模示威。我呆呆地站了将近两个小时，看着那条巨大的人龙在我面前慢慢地展开。当我终于当我离开广场，漫步走向住处时，我感到沮丧和压抑。

在路上，我注意到一家烟草店里有一份《工人日报》。这是旧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新闻机构。在一家廉价咖啡馆里，人们经常聚会，我经常去那里看报纸，《Arbeiterzeitung》也是显示。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能让自己多看一眼这对可怜的夫妇几分钟，因为它的整个基调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讽刺。在令人沮丧的影响下我目睹了示威游行，内心有个声音催促我去买

烟草店的报纸并通读一遍。

于是我把它带回家，花了一晚上的时间读完，尽管心里的怒火不断高涨被这种无休止的谎言所激怒。

我现在发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日报上，我可以研究这个运动比他们所有的理论文献都要好得多。

两者之间，在处理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关于自由、人类尊严和美的华丽辞藻，深邃智慧的气息、令人厌恶的道德姿态和厚颜无耻的预言保证——精心编织的文字光辉，一方面使读者眼花缭乱，误导读者，另一方面，每日媒体都以最卑鄙的方式传播这种新的人类救赎教义！只要能用于诽谤，任何手段都是卑鄙的。这些记者是扭曲事实并以欺骗性形式呈现的真正大师。理论文献是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报纸的宣传是针对大众的。

这种对书籍和报纸的探究以及对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研究重新唤醒了我对我自己人民的爱因此最初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变成了感情更加亲密的时刻。

一旦理解了庞大系统的运作毒害大众的思想，只有傻瓜才会责怪受害者。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变得更加独立，也因此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民主福音所取得的成功。

我现在意识到了那些禁止阅读所有非“红色”的书籍和报纸，同时要求只有“红色”会议应该参加。在现实的光明中，我能够看到什么一定是这种不宽容教学的必然后果。

广大群众的心态只有坚强和不妥协才能接受。

女人的内心感受不受抽象推理的影响，而总是受受到一种模糊的情感渴望的影响，渴望力量来完善她的存在，宁愿向强者低头，也不愿支配弱者——同样，人们更喜欢统治者，而不是乞求者，并且受到统治者的领导，心理安全感更强。

不容任何竞争对手的教学，而不是向他们提供自由的教学。

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自由，因此他们很容易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们很少为在思想上受到恐吓而感到羞耻，他们也很少意识到他们作为人的自由被肆无忌惮地滥用，他们也没有丝毫怀疑整个学说的内在谬误。他们只看到残酷的力量和其坚决言论的残酷性，他们始终屈服于它。

如果社会民主主义遭到更真实的学说的反对，那么，尽管斗争是最痛苦的一种，这一真理教义最终将盛行，只要它得到平等的执行冷酷无情。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对社会民主主义、它的教学和它的武器。

我认识到该运动进行精神攻击的手段是可耻的针对资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在道德和精神上都没有能力抵抗这种攻击。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是，在给定信号下，发动真正的猛烈攻击。

他们所认为的最可怕的人的谎言和诽谤对手，直到资产阶级的神经崩溃，他们牺牲了那个袭击，只是为了能够和平地生活。

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总是落空，因为他们从未得到过安宁。同样的策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对这些残忍的狂热分子的恐惧，在纯粹的力量下暗示，对受害者产生麻痹作用。社会民主主义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了力量的价值，因此它主要攻击那些它感觉到有真正勇气的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罕见的财产。

另一方面，它赞扬对手中的每一个弱者，或多或少谨慎地根据他的智力品质，无论是已知的还是假定的。他们不太惧怕天才缺乏意志力的人，比智力平庸、同时又精力充沛的人更他们高度赞扬那些缺乏智慧和意志力的人。

社会民主党知道如何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是唯一的和平捍卫者。

就这样，他们小心谨慎，但始终不忘最终目标，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一次又一次地，有时用悄悄的威胁手段，有时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在公众注意力集中的时候采用后一种策略其

他不希望被转移的事项，或公众认为某事件过于制造丑闻并从而激起恶意对手的愤怒。这些策略基于对人类弱点的准确评估，必将取得成功，几乎是数学上的确定性，除非对方也学会了如何以毒攻毒气体。必须告诉较弱的分子，这里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我也开始明白，身体威胁对于群众和个人都有其意义。

个人。这里再次，心理效果被计算得非常精确。恐吓在车间和工厂，在会议厅和群众示威活动中，总是会遇到只要不遭遇更强势的同类威胁，中国就能够取得成功。

那么，社会民主党当然会发出惊恐的抗议，并向当局上诉国家刚刚否定了这一点，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将在普遍的混乱，即发现一些牛生物掌握着重要的政府位置，为了在未来遇到麻烦时讨好可怕对手，他徒劳无功地准备消灭那些敢于反对这个世界敌人的人。这种成功的策略给广大群众留下的印象，无论他们是否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只有了解大众思想的人才能判断，而不是从书籍，而是来自实践生活，因为这样获得的成功被追随者所接受。

社会民主党是他们自己事业的正义的胜利；另一方面，被打败的对手常常对进一步抵抗的有效性失去信心。

我越了解他们所采用的身体威胁手段，就越同情他们我为众多死于此病的人感到难过。现在我感谢我必须经历的磨难那时，它让我重新对自己的人民怀有善意，因为这段经历让我能够区分虚假的领导和受害者被误导了，因为那些被这样误导的人只能被描述为受害者。如果我试图忠实地描绘社会阶梯最底层的人们，我的描绘如果我不补充一点，即使在社会深处，我仍然能找到一种光，那就是不完整的。

罕见的自我牺牲和忠诚的友谊精神、知足和谦虚的矜持。

这对老一代工人来说尤其如此。尽管这些品质在年轻一代中，这种观念越来越消失，因为大城市里，但在年轻一代中，也有很多身体健康的人，能够在肮脏的环境中保持自己不受污染日常生活。

如果这些人在许多情况下是出于好意，而且正直，就其政治活动而言，他们自己属于不共戴天的敌人。

因为我们的人民，作为体面的劳动者，他们没有、也不能完全理解社会主义煽动者所宣扬的教义的恶名。

此外，由于社会上没有其他人关心工人阶级和社会条件最终被证明比任何可能导致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总有一天，需求会占据上风并促使他们加入社会民主党。

资产阶级无数次地对最合法的工人阶级的人类要求。这种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不道德，但资产阶级却没有从中获益。结果是，即使是诚实的人工人放弃了工会组织的原始概念，被拖入政治。

有数百万工人一开始对社会民主党怀有敌意，但是他们的防御工事不断被攻破，最后他们不得不投降。然而，这次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愚蠢，他们反对工人阶级提出的每一项社会要求。

工人阶级。目光短浅地拒绝支持改善劳动条件的努力，拒绝采取措施防止工厂发生事故、拒绝禁止童工劳工，拒绝考虑对女工，特别是孕妇的保护措施——这一切都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有所帮助，他们感谢每一个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群众纳入他们的网络。

我们的资产阶级政党永远无法弥补当时所犯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因为当他们反对一切社会改革努力时，他们就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从而反对一切至少从表面上看，我们人民的死敌所提出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保护它。

这样，它就为工会的实际存在提供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即，从一开始，它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治招募基地。

在维也纳的那些年里，无论我是否愿意，我都被迫决定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采取工会。因为

我认为工会与社会民主党密不可分。

党，我的决定是仓促和错误的。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但在这一点上，一个根本问题，命运介入并给了我一个教训，结果我改变了我最初形成的观点。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学会了区分工会作为一种维护员工的社会权利，为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会是党在阶级斗争中运用的政治工具。

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工会运动的巨大重要性，为他们找到了一种武器，并成功地运用了它，而资产阶级政党则通过他们的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就会失去政治威望。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傲慢“否决”将阻碍运动，但他们实际上做的是产生不合逻辑的发展。这是荒谬的，也是说工会运动本身对国家怀有敌意是不正确的。

相反的说法更为正确。如果工会的活动是针对致力于改善这个阶级的状况，这个阶级是国家的支柱，并且成功地做到了因此，这些活动不是针对祖国或国家的，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单词，国家的。

这样，工会组织就有助于创造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在全国普遍的教育体系中。

社会疾病的心理和生理病菌时，它值得高度认可从而有助于国家的普遍福利。因此，没有必要问工会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有雇主缺乏社会理解和有错误的正义和公平观念，这不仅是员工的权利，也是员工的义务（毕竟，他们是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护公共利益不受贪婪和个人的不理性。

维护人民的忠诚和信任，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也符合维护公众健康。两者都受到不诚实雇主的严重威胁，这些雇主并不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社会成员的责任。

他们个人的贪婪或冷酷无情为未来的麻烦埋下了祸根。

消除这种发展的原因是值得赞赏的行动国家，而不是相反。

没有必要争论个体工人随时可以逃避后果他实际上遭受了雇主的不公正对待，或者认为自己遭受了雇主的不公正对待——换句话说，他可以离开。这个论点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问题注意力的诡计。

问题。

消除社会动乱的根源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如果符合，那么必须用唯一能保证成功使用的武器来进行战斗。

单个工人永远没有能力对抗大雇主的权力，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关于权利的胜利，因为如果权利被承认为指导原则，冲突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这里的问题是谁更强大。如果不是这样，正义感本身就会导致争端得到体面解决，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样的争端根本不会发生。

如果对男性不合群和不光彩的对待激起反抗，那么更强大的一方将获胜直到宪法立法机关通过冲突消除邪恶立法。

因此，很明显，只有个别工人联合起来反对个别雇主作为代表事业集中力量的代表，他们能指望不注定失败吗？从一开始。

因此，工会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帮助灌输和加强社会责任感并开辟出实际成果的道路。这样做，他们往往会消除那些导致摩擦的原因，是持续引起不满和抱怨的根源。

工会未能履行这一备受期待的职能，其责任应归咎于那些阻挡立法社会改革道路或使这种改革无效的人的大门通过他们的政治影响来破坏它。由于政治资产阶级未能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想理解工会运动、社会民主党利用这一错误政策带来的优势，将工会置于他们的独家保护，而另一方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这样，他们就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可以安全地撤退每当斗争进入关键阶段时。

因此，运动的真正目的逐渐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丝毫维护原有目标的意图。

工会运动成立的目的。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会运动在社会民主，从一个原本为捍卫人权而制定的工具成为破坏国家经济结构的工具。

工人阶级的利益一刻也不能妨碍这一目标，因为，在政治领域，施加经济压力总能使敲诈勒索成功，如果一方足够肆无忌惮，另一方足够懒惰和温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这些条件都已得到满足。

到本世纪初，工会运动已经不再服务于建立它的目的。年复一年，它越来越受到政治社会民主党的控制，直到它最终被用作阶级斗争的攻城槌。

斗争。

该计划是通过不断重复的打击来摧毁大楼上的经济大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旦达到这一目标，摧毁国家将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国家已经被剥夺了其经济基础。

这越来越不再是一个保护工人真正利益的问题，直到政治智慧不再认为满足广大群众的社会文化需求是明智之举，因为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如果这些群众一旦感到满足，他们就可能不再被雇佣为政治斗争中仅仅是被动的物质基础。

这种发展前景引起了班里领袖们的焦虑。

战争，他们最终拒绝并反对每一项真正有益的社会改革，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些领导人没有必要费心去证明这种不合逻辑的政策合理性。

随着群众被教导不断增加和提高他们的要求，满足这些要求的可能性逐渐减少，无论采取什么改善措施，似乎都越来越不重要，因此总是能够说服群众，这种最神圣的工人阶级的要求得到满足，代表着一个削弱他们战斗力，如果可能的话，瘫痪它。鉴于广大人民的思维能力有限，群众，所取得的成功是不足为奇的。

在资产阶级阵营中，社会民主党的不诚实行为引起了极大的愤慨。

但他们甚至没有采取任何尝试性的步骤来制定自己的指导原则。

鉴于此，我们应采取适当的行为准则。

社会民主党拒绝改善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阶级，本应促使资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作出最有力的努力。

指挥并从阶级斗争领袖手中夺取他们最宝贵的武器；但是但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资产阶级不去攻击对手的阵地，而是让自己受到压迫和匆忙。最后，它采取的手段太过迟缓和无足轻重，以至于没有效果并遭到拒绝。因此，整个局势仍然和资产阶级干预，只是不满情绪有所增加。

就像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自由工会”笼罩在政治地平线上，笼罩着每个人的生活，这是最可怕的恐怖工具之一威胁国家经济结构的安全和独立、国家的稳定以及个人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自由工会”把民主变成了一个可笑的词，侮辱了自由的理想，嘲笑博爱的理想，口号是“如果你不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会打破你的头骨。”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人类的朋友。在随后的几年里，我的知识不断扩大和加深，但我从未感到有必要改变我原来的看法。

熟悉社会民主主义的外部形式，我越来越渴望了解其教义的内在本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的官方文献没有什么用处。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它的陈述是错误的，它的证据也不可靠。在对待政治目标时，它的态度是不真诚。

此外，其在论证过程中所采用的现代诡辩方法也令我厌恶。它的华丽句子，它的晦涩难懂的短语，假装包含着伟大的思想，但却缺乏意义。

在我们的现代城市里，要想有家的感觉，就必须是一个颓废的波西米亚人，在那无稽之谈的迷宫中，或者在这恶臭的烟雾中享受“亲密的体验”文学达达主义。这些作家显然指望着某个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他们相信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必定非常聪明。

通过将该学说的理论虚假性和荒谬性与其外部现实进行比较，在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我黑暗的预感，害怕一些邪恶的东西。我面前有一个由自我主义和仇恨，旨在赢得胜利，而胜利将是对人类的致命打击。

与此同时，我发现了这种破坏性教导与一个民族的特殊性格，在此之前我对这个民族几乎一无所知。

了解犹太人是真正理解内在本质的唯一钥匙，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真正目标。

认识了这个种族的人已经成功地从他的眼睛上揭开了面纱，他错误地理解了这个政党的目的和意义；然后，从黑暗和迷雾中社会主义言论使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浮现出来。

今天，我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说出“犹太人”这个词何时开始出现。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我不记得在我小时候在家里听过这个词父亲的一生。如果这个词被用在特定的语调中，我想这位老先生会认为那些以这种方式使用它的人是“落后于时代”的。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尽管他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他越来越缺乏国际化，这对我也有影响。在学校里，我也发现改变我在家里形成的印象的理由。

我在 Realschule 认识一个犹太男孩。我们与他交往时都很谨慎，但只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和某些行为警告我们要谨慎。除此之外，我的同伴和我自己都对他没有特别看法。

直到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才经常碰到“犹太人”这个词。

部分与政治争议有关。

这些话让我心里有点反感，我禁不住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每当我不得不听宗教争论时，我总是会想到这一点。但那时我并没有看到从任何其他角度来看犹太人问题。

林茨的犹太人很少。几个世纪以来，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已经变成了他们外表欧化，文明程度很高，我甚至把他们看作德国人。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种幻想的荒谬性，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奇怪的宗教习俗。我认为他们因信仰而受到迫害，我对听到针对他们的言论的厌恶与日俱增几乎陷入一种恐惧之中。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系统性的反犹太主义。

这是我去维也纳时持有的观点。

我对周围的建筑环境所留下的大量印象感到困惑，感到沮丧由于我自己的麻烦，我起初没有区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这座庞大城市的人口组成。

尽管当时维也纳的人口为两百万，其中犹太人约有二十万，没有注意到他们。

在我逗留的最初几周里，我的眼睛和大脑无法应对新的理念和价值观。

直到我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那混乱的景象才开始显现出来。

变得更加清晰，我对我的新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随之而来的是犹太人问题。

我不会说我第一次认识它的方式特别令人愉快。

犹太人，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因此，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宽容，我反对因为他有不同的信仰而攻击他的想法。

因此，我认为维也纳反犹太媒体的语气是不值得的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中世纪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记忆我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岁月，我感到自己不想再看到它们重复发生。

一般而言，这些反犹太报纸不属于第一流（但我当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所以我把它们视为嫉妒的产物和嫉妒，而不是真诚但错误的感情的表达。

我的观点得到了我认为的真正重要的报纸以更加庄重的方式回应这些攻击，或者只是忽略了他们，对我来说后者是更好的方法。

我认真阅读了一般被称为世界报刊的《新自由报》、《维也纳日报》等等——我很惊讶这些书给读者提供了如此丰富的信息，而且公正无私。

他们提出具体问题的方式。



我欣赏他们庄重的语气，尽管有时华丽的风格令人难以信服，我不喜欢它。然而，这一切可能归因于都会。

因为当时我认为维也纳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这构成了足够的理由请原谅媒体的这些缺点，但我经常对媒体卑躬屈膝的态度感到厌恶。

维也纳媒体扮演了宫廷的走狗。霍夫堡宫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动静这本书并没有以华丽的色彩呈现给读者。当时引起了如此大的骚动，尤其是当它是关于“有史以来最明智的君主”的问题，这让人想起了山公鸡在交配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人为的，在我看来，不值得自由民主。我认为这种向宫廷献媚的卑鄙手段贬低了国家的尊严，那是我第一次对伟大的维也纳媒体产生认识上的阴影。

在维也纳期间，我继续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德国，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我有一种自豪感和当我将年轻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与奥地利的衰落进行比较时，我感到钦佩状态。但是，尽管从整体上看，德国的外交政策确实令人欣喜，但其内部政治事件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满意。我当时并不赞同这项运动，当时，战争是针对威廉二世进行的。

我不仅把他视为德国皇帝，而且最重要的是，把他视为德国的缔造者。

海军。国会禁止皇帝发表政治演讲，这让我很生气，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禁令毫无道理这样做，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这些议会公鹅的咯咯笑声比整个王朝的皇帝，甚至最弱小的皇帝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让我恼火的是，在一个任何傻瓜都可以声称自己有权批评，甚至可能作为“立法者”对人民发号施令。

国会大厦，佩戴皇冠的人可能会受到“谴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群流氓的聚会。

我更反感的是维也纳媒体如此卑躬屈膝地向我表示在哈布斯堡皇室马厩里最卑微的骏马面前，陷入了狂野的狂喜之中如果马儿摇着尾巴回应，她就会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这些报纸对涉及德国皇帝试图通过表现出的严肃担忧来掩盖他们的敌意。

当然，他们抗议说，他们无意干涉德国内政——但愿不会发生！他们假装以友好的方式触碰敏感部位是在履行职责，但由于两国之间的相互联盟而落在他们身上，同时履行新闻真实性的义务。

他们这样解释，是为了避免温柔地触碰疼痛的地方，然后探查伤口无情地。

这种事让我怒不可遏，现在我开始越来越警惕阅读维也纳的伟大报刊。

然而，我必须承认，在这些问题上，反犹太主义报纸之一——《德意志报》*Volksblatt*——表现得更有尊严。更让我恼火的是令人厌恶的方式各大报纸借此培养了人们对法国的钦佩之情。当人们面对这些优美的赞美诗时，人们真的会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羞耻。

赞美“伟大的文明国家”。这种可恶的加洛马尼亚热不止一次让我扔掉其中一份属于‘世界报刊’的报纸。

我现在经常阅读《人民报》，它的规模小得多，但却讨论此类问题。

更体面的是，我并不赞同其尖锐的反犹太主义语调，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它的论点引起了我的认真思考。

无论如何，正是通过这样的阅读，我才认识了这个人在这场运动，然后决定了维也纳的命运。他们是博士。

卡尔·鲁格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我去维也纳的时候，我对两者都持反对态度。我认为这个人在这场运动都是反动的。

但即使是最基本的正义感也迫使我在有机会的时候改变我的看法了解这个人他的作品；当我有更好的理由来做出判断。今天，和当时一样，我尊重卡尔·鲁格博士作为最杰出的德国市长。

有多少偏见通过我的这种改变而被克服了？对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我对反犹太主

义的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这是我我发现这非常困难。这让我内心与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直到几个月后理性与情感的斗争，最终理性取得了胜利。

两年后，情感转向了理性，成为了忠实的守护者和顾问。

当我内心在冷静的理智与我所处的情绪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时，长大之后，我在维也纳街头学到的教训对我帮助很大。

有一天，我不再像以前在早期，但现在我睁开眼睛，不仅为了研究建筑，也为了研究人类存在。

有一次，当我经过这座城市最古老的部分时，我突然遇到了一个长着长穿着长袍，留着黑色鬓发。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犹太人吗？在林茨，他们肯定没有这种样子。我偷偷地、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这个人，但我越是凝视着那张陌生的脸，越是仔细地观察它的各个特征，我越是觉得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问题：“那么，这是德国人吗？”像我遇到此类情况时总是习惯的那样，我向书籍寻求帮助，以消除我的疑虑。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花几便士买了一些反犹太主义的小册子，但是不幸的是，它们都假设读者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有关犹太人问题的信息，甚至熟悉犹太人问题。

此外，这些小册子的大多数语气让我再次产生了怀疑，因为所作的陈述部分是肤浅的，证据也极其难以信服。数周以来，确实，几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原来的思维方式。

这个话题看起来太过庞大，指控又如此深远，我害怕不公平，所以我再次变得焦虑和不确定。

当然，我不再怀疑，这不是德国人的问题，他们恰好是不同的宗教，而是完全不同的人的问题，因为一旦我开始调查此事并观察犹太人后，维也纳在我看来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犹太人，而且我见到的犹太人越多，就越明显、越清晰地与其他公民相比显得很与众不同。

尤其是老城区和多瑙河运河以北地区，人潮涌动甚至从外表来看，他们与德国人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可能仍然对此感到犹豫不决，但最终因为犹太人中的某一部分。

一场名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其目的是维护犹太教的民族特性，在维也纳有很强的代表性。

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一群犹太人支持这一运动，而大多数人不赞成，甚至否定，但对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表明，由于被称为“自由派”的那部分犹太人并没有否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好像他们不是自己种族的成员，而是公开宣称信仰的犹太兄弟。

尽管这种方式不切实际，甚至是危险的，但他们的内部团结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裂痕。

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自由派”犹太人之间虚构的冲突很快就让我感到厌恶，因为它彻头彻尾的虚假，因此直接违背了道德尊严和纯洁正是这一性格，让这个种族一直引以为傲。

清洁，无论是道德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对这些人来说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它们怕水，这一点从它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不幸的是，即使没有看着他们。那些穿着长袍的人身上的气味常常让我感到不舒服。除此之外还有蓬头垢面的衣服和卑鄙的外表。所有这些细节当然不是有吸引力，但令人厌恶的是，在它们肮脏的外表下，人们突然意识到上帝选择的种族的道德败坏。

很快，我开始认真思考，因为我逐渐了解到犹太人在某些领域的活动。

是否存在任何不正当的行为、任何形式的肮脏行为，特别是在文化生活中，至少一个犹太人没有参加？在探究这种令人憎恶的本质时，人们会发现，就像腐烂尸体中的蛆虫一样，小小的犹太人，在日光下很容易失明。

在我看来，当我发现犹太教的范围时，对犹太教的指控就变得很严重了。

犹太人在报刊、艺术、文学和戏剧领域的活动。

现在，所有虚伪的抗议都或多或少徒劳无功。人们只需要看看海报，研究在广告中上演的令人震惊的作品的作者姓名电影院和剧院，以便对犹太人变得更加冷酷无情。

这是一场瘟疫，一场道德瘟疫，正在感染公众。更糟糕的是比很久以前的黑死病还要严重。这种毒药的制造和分发剂量是多少呢？当然，这种“艺术”产品的作者的道德和智力水平越低，更加取之不尽的繁殖力，有时甚至看起来这些生物竟然把他们的东西像机器一样扔向公众。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记住，没有限制此类作家的数量。

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一个歌德来说，大自然可以创造出一万个这样的涂鸦者是毒害人类灵魂的最坏的细菌携带者。这是一场可怕的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多数犹太人似乎大自然注定要扮演这个可耻的角色。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被称为上帝选民？于是我开始仔细研究这些不洁产品的制造者的名字在文化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公众生活。那次调查的结果对我的态度更加不利。迄今为止一直对犹太人持有这种观点。

尽管我的感情可能会反抗千百遍，但理智现在必须得出自己的结论。

事实上，所有“淫秽”文学、艺术“废话”和戏剧庸俗中，有十分之九是必须由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民来承担责任，不容否认。它就在那里，必须被承认。

然后我开始研究我最喜欢的“世界媒体”，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事实。

我越深入探究，我以前所崇拜的事物就越失去光彩。它的风格变得更令人厌恶的是，我不得不拒绝它的主题，因为它完全是肤浅的。它的在我看来，在陈述事实和观点时不偏不倚的态度包含的虚假成分比真相。作者是犹太人。

以前我很少注意到的数千个细节现在对我来说似乎值得关注。我开始理解和领悟那些以前让我困惑的事情。我看到了那个另一种角度来看，它在回应对手的攻击和死者的攻击时，语气是庄严的。

在其他情况下的沉默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清楚成为一种狡猾和卑鄙的欺骗方式的一部分读者。它的精彩戏剧评论总是赞扬犹太作家，而它的负面批评仅供德国人保留。

对威廉二世的轻微挑衅表明了其政策的持久性，就像其系统地赞扬法国文化和文明。该系列的主题是琐碎且常常不雅。

整个媒体的语言带有外国口音。总体来说，语气非常公开贬低德国人，这肯定是故意的。

这是谁的利益所在？还是只是偶然？在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时这些问题渐渐让我变得越来越怀疑。

我对案件的另一个方面有了些了解，因此这个过程加快了，即普遍的礼仪和道德观念，被广大民众公开拥护和实践。

犹太人的一部分。在这里，我在街上观察到的生活再次给我以活生生的例子教育我。

犹太人在卖淫罪案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白人奴隶贩卖罪案中交通状况，在这里可以比任何其他西欧城市更好地进行研究，并且可能法国南部的某些港口除外。

夜晚沿着利奥波德城的街道行走，几乎在每个转弯处，无论你是否愿意不，人们目睹了大多数德国人在战争之前一无所知的某些事件这使得士兵们在东线看到这样的景象成为可能而且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当我第一次确定这是冷血无耻的犹太人在底层民众中，展现出他高超的肮脏和替代性交易技巧。

大城市。然后我心中充满了愤怒。

我现在不再犹豫，要详细调查犹太人问题。从此以后，我决心这样做，但当我学会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寻找犹太人时，和艺术生活，在这种生活无处不在的各种表现中，我突然遇到了他我最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发现他。

我现在意识到犹太人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面对这一事实，我的眼睛不再有阴影了。我内心

的长期斗争结束了。

在与同事交往中，我常常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有时在几天之内就改变，有时甚至在几个小时之内。

我发现很难理解为什么当我跟男人说话时，他们总是有合理的想法个体在受到大众影响的那一刻，就突然失去了这种理性。

我常常处于绝望的边缘。

和他们聊了几个小时后，我确信我终于打破了僵局，或者让他们看到他们思维方式的错误并由衷高兴，我经常会厌恶地发现第二天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钟摆般的规律他们又回到原来的观点。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并诅咒命运这对她们打击很大。她们憎恨自己的雇主，认为他们无情无义。

他们的残酷命运的代理人。

他们经常用辱骂性的语言攻击政府官员，指责他们没有同情劳动人民的处境。他们举行公开示威，反对并走上街头游行，捍卫自己的主张。

至少这一切都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对自己同胞表达的无限仇恨，他们如何贬低自己的国家，嘲笑它的伟大，辱骂它的历史，抹黑它最杰出的人的名字在阴沟里。这种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的故土和家园的敌意，既不合理，又是不可理解的。这是违反自然的。

可以暂时治愈这种疾病，但只能维持几天，最多几个星期，但当你遇见那些你认为已经皈依的人时，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恢复了他们的旧的思维方式，并再次成为错误观点的牺牲品。我逐渐发现，社会民主党的媒体主要被犹太人控制，但我没有对此情况应特别重视，因为其他报纸也是如此。

然而，在这方面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一个与犹太人有关的报纸可以说是“国家”报纸，因为我凭借自己的教育和信念使用了这个词。

为了克服自己天生的不情愿，我尝试阅读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媒体。然而，随着我的厌恶情绪增加了十倍，我开始了解一些写作并出版了这些恶作剧的东西——从出版商到下属，全都是犹太人！我找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民主党小册子，并查找了作者的名字——全是犹太人！我记下了几乎所有领导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被选中的种族，无论他们是帝国议会成员、工会秘书、各组织或街头煽动者。

到处都呈现出同样险恶的景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张名单——奥斯特利茨、大卫、阿德勒、埃伦伯根等。

对我来说，有一个事实变得非常明显，那就是这个外星种族掌握着过去几个月里，我与社会民主党的少数代表一直存在争论。

我终于高兴地确定了这个犹太人不是德国人。

这样，我才彻底了解了那些把我们的人民引入歧途的人。在维也纳的一年足以让我相信，没有一个工人会如此根深蒂固地固守自己的先入之见，以至于他不会在更好、更清晰的论据和解释面前放弃它们。

渐渐地，我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并利用这些知识作为工具来强化我坚定的信念。我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取得了成功。

大多数人是可以被拯救的，但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耐心这样的工作。而犹太人则永远无法摆脱他的固定观念。

那时我头脑简单，试图向他们表明他们的教学是荒谬的。在我的小我和他们说话，直到我的喉咙疼痛，我的声音变得嘶哑。我相信我终于可以让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胡言乱语所固有的危险。

但我得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果。在我看来，对灾难性后果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加强他们的反对力量。

我和他们辩论得越多，就越熟悉他们的辩论策略。一开始他们指望对手愚蠢，但当他们陷入困境时，他们找不到出路，他们就耍了装傻的伎俩。

如果他们失败了，尽管他们运用了逻辑技巧，但他们表现得好像无法理解反对意见，感觉自己被逼到了墙角，匆忙把讨论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他们说出了真理和陈词滥调；如果你接受了这些，就认为这种接受适用于与原主题有本质区别的其他问题和事项。

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逼他们，他们就会再次逃跑，你无法强迫他们做出任何精确的陈述。

每当有人试图抓住这些使徒中的任何一个时，他的手就只能抓住黏糊糊的果冻从指间滑落但片刻之后又凝固了。

如果你的论据如此有力，以至于你的对手因为这些理由而被迫屈服如果你听完后觉得你终于取得了进展，那么接下来的惊喜就在等着你第二天。

犹太人完全忘记了前一天发生的事，一旦再次重复他以前的荒唐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果你愤慨地提醒他昨天的失败，他会假装惊讶，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前一天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陈述是正确的。

有时我会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更惊讶——他们反应敏捷他们对谎言的巧妙应对和掩饰，让我渐渐地讨厌他们。

但这一切也有好的一面，因为我对真正的领导者，或者至少是我越是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者，我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就越是增加。

考虑到这些邪恶顾问所展现的撒旦技巧，谁能责怪他们的不幸的受害者？事实上，我发现很难证明自己是辩证背信弃义的对手那场比赛。

试图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是多么徒劳，因为他们扭曲了事实，否认了事实。

他们刚刚说过的话，并在几分钟后再次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争论！我越了解犹太人，就越容易原谅这些工人们。

我认为，最应受谴责的不是工人，而是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费心去同情这些人，并且根据正义的铁律，把人民辛勤劳动的儿子应得的东西归还给他，同时是时候处决诱惑者和腐蚀者了。

受自己日常经历的启发，我开始更彻底地调查马克思主义教学本身。我对它的影响非常了解，只需要一点点想象力以便能够预测不可避免的后果。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建国者们是否预见到了他们的工作将以这样的形式产生影响？最终是假设，还是创始人自己就是错误的受害者？’在我看来，还有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

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就是每个有思想的人的责任一个人挤到这个邪恶运动的最前线，以阻止它产生最糟糕的结果。

但如果这是第一个必须给予肯定回答的问题，那么就必须承认感染了各国的这种邪恶的最初作者是魔鬼的化身，因为只有一个怪物的大脑，而不是人类的大脑，能够策划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的活动最终必须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让这个世界变成一片沙漠荒芜。

既然如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战斗，并在战斗中使用所有武器人类的精神、人类的智慧和人类的意志可以提供这些，让命运来决定天平应该向有利于谁的方向倾斜。

我开始收集关于这个教导的作者的信息，以便研究运动的原则。事实上，我比我预期的更早地实现了我的目标，这得益于我最近对犹太人问题的深入了解，尽管这很微不足道。

仅凭这些新获得的知识，我就能够对现实进行实际比较以及社会民主党创始人的理论演讲因为我现在理解了这些语言犹太人。

我意识到犹太人使用语言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思想，或者至少是掩饰因此，他的真实目的无

法从他的言语中发现，而只能通过字里行间才能发现。

这是我的观点发生最大转变的时刻，也是我迄今为止经历；我从一个心地善良的世界主义者变成了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

只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屈服于压抑的思想，让我深感焦虑。当我批判性地回顾犹太人的活动时，我很困惑，问自己，对于那些超出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所能理解的深奥原因，命运也许不会已经不可逆转地注定了最后的胜利将属于这些弱小的民族吗？难道这个只为尘世之物而活的民族，没有被许诺过尘世之物吗？作为奖励？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是否有权为自我保护而战，或者说，这是主观？命运回答了我的问题，因为它引导我进行了一次客观而详尽的调查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犹太人民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关的活动。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否定了自然的贵族原则，代之以永恒的权力和力量的权利，纯粹数量的沉重负担。因此它否定了个人的价值。

人的个性，质疑国籍和种族具有首要意义的教导，这样一来，人类就失去了生存和文明的基础。

如果马克思主义学说被接受为宇宙生命的基础，那么它将导致人类思想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秩序都消失了，因此采取了这种一项法律将引发我们所知最伟大有机体结构的混乱，其结果是这颗地球上的居民最终将会消失。

如果犹太人凭借马克思主义信条战胜了世界各国人民，他的王冠将成为人类的葬礼和花圈而这颗行星将再次沿着以太轨道运行，就像数百万年前一样，这里没有人类生命。

永恒的自然会对那些违抗其法则的人施以无情的报复。因此，我相信——我的行为符合全能造物主的旨意。我抵制犹太人捍卫主的杰作。

### 第三章：维也纳的日子——总体反思

今天，我认为，一般来说，一个人不应该公开参与政治在他年满三十岁之前，当然，以下情况必须例外：那些天生就具有非凡政治能力的人。

原因是，在达到这个年龄之前，大多数男人都在努力获得某种通过一般哲学，他们能够审视各种政治问题他们的一天，并对每个人采取明确的态度。

只有当他获得了基本的世界观并由此获得了稳定之后他对当今具体问题所形成的判断，是一个人，现在已经达到成熟，至少在心智，具备参与社区治理的资格。

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发现，他必须改变迄今为止的态度。

可能在基本问题上被采纳，或者尽管他有卓越的知识和洞察力，必须忠于他的理智和信念现在已经使他拒绝的观点。

如果他采取前一种行动，他就会发现自己处境艰难，因为放弃到目前为止，他所坚持的立场将显得前后矛盾，他也没有权利期待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忠诚度与以前一样。

领导者态度的转变意味着他的追随者们会受到怀疑和对他们以前的对手来说，他们常常会感到尴尬。尽管他自己不再梦想坚持他的政治宣言直到最后——因为没有人会为捍卫他不相信的东西而死——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提出越来越无耻的要求追随者。

最后，他抛弃了真正的领导力，成为一名“政客”。这意味着他成为了那些唯一始终如一的人之一，他们的不一致之处就在于伴随着傲慢专横，而且常常是狡猾的谎言，发展到无耻的高学历。

如果这样一个人，不幸地让所有正派人，成功地成为议会，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对他来说政治活动的本质在于他英勇地奋斗以保住这份闲职，作为他自己和家人的生计来源。

他的妻子和孩子越依赖他，他就会越顽固地争取为自己争取议会选区的代表权。

因此，任何表现出政治能力的人都是他的敌人。

每一个新的运动，他都会担心自己垮台的可能开始，而每个人一个比他在威胁面前表现出来的更好的人。我随后将处理更充分地了解这种议会害虫所引起的问题。

一个人到了三十岁，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从今以后，他学习将有助于填补他已经形成的那个基本世界观的框架拥有。

他重新学到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放弃已经持有的原则，而是一种更深刻的了解这些原则，这样他的同事们就不会有这种不安的感觉迄今为止他一直误导他们。

相反，当他们意识到领导者的素质时，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强不断发展，因为他新获得的知识丰富了他们所依据的理论。

他们自己相信。在他们眼中，每一个这样的发展都是对他们迄今为止所持有的观点。

一个领导者必须放弃他的普遍的世界观，因为他认识到它的基础是错误，只有当他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并准备承担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避免公开参与任何进一步的政治活动。

他在根本问题上一旦误入歧途，就可能再次误入歧途，但无论如何，他无权期望或要求他的同胞继续给予他他们的支持。

如今，我们的公共领导人很少会赞扬这种光荣的行为，这一点已被目前普遍存在于乌合之众之中的腐败现象所证明。

被要求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被选中扮演这个角色任务。

如果他选择第二种选择，结果将是今天并不罕见的。同样，当领导者不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时，他捍卫自己事业的决心就会一方面，他会变得肤浅和没有信念，但另一方面，他会屈尊使用卑鄙的武器。

虽然在那些日子里，我比大多数人花了更多的时间考虑政治问题，但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参与政治。我只在小圈子里谈论那些令我心烦意乱或让我持续忧心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群体内讨论问题的习惯本身就有很多好处。

比起学习演讲，我学会了了解人们和他们通常非常原始的观点和抗议。与此同时，我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去扩展我自己的教育，并且在那些几天来，德国没有哪个城市能比维也纳给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在旧多瑙河君主国，政治利益更多是比当时的德国更加全面和开阔，除了某些部分普鲁士、汉堡和北海沿岸地区。

我在这里所说的奥地利，是指伟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由于它的德国人口，不仅为这个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基础，而且其几个世纪以来，人口一直是其力量的唯一来源，并赋予其政治人为构造其内部的文化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地利国家的稳定和其继续存在的保障越来越依赖于哈布斯堡帝国这个生殖细胞的保存。正如世袭的帝国行省构成了帝国的核心，正如这个核心一样不断为整个政治和文化体系输送生命之血，因此维也纳是它的大脑和意志。

那时的维也纳给人一种登基女王的感觉其权威统治统一了生活在其统治下的异族人民哈布斯堡皇室的权杖首都的绚丽美景让人忘记了国家衰老的悲惨症状。

作为一个整体被背叛了。尽管帝国内部因为暴力冲突而摇摇欲坠，在不同民族之间，外界（尤其是德国）只看到这座城市的美丽照片。

这种错觉之所以更加强烈，是因为当时维也纳似乎已经进入了最后这是她辉煌时期最辉煌的阶段。在一位真正具有天才印记的市长的领导下，古老帝国统治者的居住城市似乎重新焕发了它的辉煌青年。

最后一位伟大的德国人，出身于东方殖民者队伍，是不是官方意义上的“政治家”。然而，卢格博士作为帝国理工学院的市长，首都和居住城市，在市政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整个帝国的核心都焕发出新的活力，因此，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比当时所谓的“外交官”更伟大的政治家。

奥地利这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政治集团最终解体，并不意味着这充分表明了旧奥斯特马克地区德国人缺乏政治能力。

崩溃是不可能局面的必然结果。一千万人无法永久地维持一个由五千万不同且相互冲突的人组成的国家国籍，除非在为时已晚之前满足某些特定的条件。

这位德裔奥地利人拥有远见卓识。他习惯于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帝国，因此他敏锐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他是奥地利国家的唯一成员他们的目光越过了王室的狭长土地的边界，越过了帝国。

事实上，当命运将他与共同的祖国割裂开来时，他试图掌握巨大的他面临的任务是为德奥人民保留这些遗产，通过他们的祖先经过无数次斗争才从东方夺得了今天的土地。

必须记住，德奥两国无法将他们的全部力量投入到这一因为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总是转向他们非常爱祖国的亲人，所以家乡只占据了他们一部分的感情。

德裔奥地利人的心智视野比较开阔。

他的商业利益几乎遍布帝国的各个角落。

几乎所有重要事业都在他的手中。

主要工程师和官员大部分都是德国人。

德国在该国的对外贸易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活动范围不受犹太人控制。他是国家政治的



粘合剂一起。

他的军事职责使他远远超出了祖国的狭窄边界。虽然新兵可能会加入德国军团，该军团可能驻扎在黑塞哥维那，就像驻扎在维也纳或加利西亚。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中的军官仍然是德国人，公务员系统的高级部门艺术和科学都掌握在德国人手中。除了新的艺术垃圾，这些垃圾很容易是由黑人部落制作的，所有真正的艺术灵感都来自德国部分人口。

在音乐、建筑、雕塑和绘画方面，维也纳是整个双重君主制，而且这个源泉似乎从未出现枯竭的迹象。

最后，德国因素决定了外交政策的实施，尽管影响很小。

一些匈牙利人也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然而，所有拯救国家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因为缺少必要的先决条件。只有一个控制和抑制不同离心力的可能方法奥地利国家内的各个民族。它要么有一个中央政府，同时，内部组织起来，否则它将不复存在。

时不时地，在最高层会出现清醒的时刻，人们认识到了这个真理，但是它很快又被遗忘了或者被故意忽略了，因为在付诸实践。

任何旨在使帝国更加联邦化的计划都注定是无效的因为不存在一个以主导国家形式存在的中心核心。

在这方面，必须记住，奥地利的内部条件与这些都表明德意志帝国是由俾斯麦创立的。

德国只面临一个困难，那就是改变纯粹的政治传统，因为在整个俾斯麦的德国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基础。

德意志帝国只包含同一个种族或民族血统的成员，少数外国少数民族除外。

奥地利的情况则截然相反。除匈牙利外，没有一个省份拥有过去伟大的政治传统，或者即使有，也被抹杀或掩盖了。

时间的流逝。

而且，这是民族主义原则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现象唤醒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各个国家的民族本能权杖。

这些刚刚觉醒的民族力量的行动很难控制，因为毗邻在二元君主制的边界上，新的民族国家正在兴起，其人民属于与构成哈布斯堡帝国的各个民族具有相同或亲属的种族血统。

这些新国家能够发挥比德国更强大的吸引力。

即使是维也纳也无法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当布达佩斯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时，竞争对手已经长大，其使命不是帮助将各个不同的部分团结在一起帝国，而是要加强其中的一部分。

布拉格很快效仿了布达佩斯，后来又有伦贝格、莱巴赫等等。事实上，这些地方以前是省会城市，现在变成了国家首都，并为文化生活提供中心，而文化生活正逐渐变得越来越独立。这样，民族政治本能就获得了精神基础，并深度。

各个国家的特殊利益必然会成为比共同的帝国利益更强大。

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奥地利的厄运就已注定。这一发展的进程约瑟夫二世去世后，这种趋势变得明显起来。其发展速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是有些起源于君主制本身，而另一些则源于帝国在对外政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不可能做出任何成功的努力来永久巩固除非实施无情而持久的中央集权政策，否则奥地利国家将无法生存。首先，原则上采用一种语言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应该强调后者纯粹形式上的统一，这样行政部门就会掌握了技术手段，没有它，国家就不能作为政治统一。

只有这样，学校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才能被用来灌输一种共同公民意识。

这一目标不可能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实现，但必须付出努力设想几个世纪以来，正如在所有殖民问题中，坚定的毅力是远远比短时间内集中努力更重要的因素。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由严格遵守统一性原则。

对我来说，发现为什么这没有发生，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没有发生，是很有启发的。

那些犯有疏忽的人必须对分裂负责哈布斯堡帝国。

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旧奥地利更依赖强大而能干的政府。

哈布斯堡帝国缺乏民族统一性，而民族统一性是国家的基本基础。

国家，并将维护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即使统治权力被严重削弱效率低下。

当一个国家由同质人口组成时，后者的自然惯性和这种惯性产生的抵抗力量将使它在令人吃惊的是，政府管理不善、管理失当。人们常常认为，已经从这样的政治体中消亡了；但有一天，表面上的尸体会站起来，世界其他地区令人惊叹的证明了其坚不可摧的生命力。

在一个人口结构不均一的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武力统治。如果统治者表现出国家软弱，其结果不会导致国家进入休眠状态，而是唤醒不同种族群体的个人主义本能。这些本能并不会使只要这些团体受到强大的中央统治意志的支配，他们自己就会感受到。

这些沉睡的分离主义本能中存在的危险，可以或多或少地只有通过数百年的共同教育、共同传统和共同利益才会变得无害。

这些国家越年轻，它们的生存就越依赖于政府的能力和力量。

中央政府。如果它们的基础仅仅归功于一个强大的人物或一个领导者的工作，是天才，在很多情况下，创始人消失后，这些公司就会解散；因为，尽管伟大，他孤身一人，但即使过了几个世纪，这些分离主义本能所固有的危险性我说到，并不总是能够完全克服。

它们可能只是处于休眠状态，当中央政府表现出软弱时，它们可能会突然醒来共同教育的力量和共同传统的尊严无法抵御分裂民族的活力，朝着塑造自己的方向前进个体的存在。

未能看清这一切的真相，构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悲剧性罪行。

统治者。只有一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也是最后一次，命运之手握在手中高举着照亮祖国未来的火炬，但此后火炬就永远熄灭了。

统治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二世，内心充满了日益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家族已被推到帝国的边疆时，他感到焦虑而它很快就会被颠覆，卷入漩涡民族的混乱造成的，除非在最后一刻采取措施克服由于其祖先的疏忽而导致的严重后果。

这位“人类之友”以超人的能量尽一切努力来抵消他的前任们的粗心和轻率造成了这种影响。在十年内，他努力修复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损坏。

如果命运只给他四十年的劳作，如果只有两代人在他开始的工作上，奇迹本可以实现。但当他死时，经过十年的统治，他的身心都已消逝，他的工作也随他一起被埋葬，安息了和他一起在卡普辛教堂的地下室里，长眠于永恒之中，没有复活的希望。

他的继任者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力去完成他们所面临的任務。

当欧洲出现新的革命时代的最初迹象时，感染逐渐蔓延奥地利，当战争之火最终爆发时，它并不是由社会不满情绪所引发的。

或政治条件，而是由源自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渴望的力量所决定的。

组。

1848年的欧洲革命运动主要表现为阶级冲突，几乎在其他所有国家，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但在奥地利，它表现为一场新的种族斗争。

就当时的德裔奥地利人而言，他们忘记了这场运动的起源，或者也许没有一开始就认出了他们，并因此参加了革命起义，他们封印了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帮助唤醒了西方民主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也粉碎了他们自身生存的基础。

建立一个代表议会机构，无需此前已经规定应该有一种官方语言，而且没有坚定地确立了这种语言的使用，是对德语主导地位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二元君主制中的要素。

从那一刻起，这个国家也注定要崩溃。接下来的事情而是一个帝国的历史清算。观察这一逐渐瓦解的过程是一种这是一个悲剧，但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经历。

历史的法令以千万种方式执行。

事实上，许多人在明显的解散迹象中蒙着眼睛四处走动只能证明诸神注定了奥地利的毁灭。我不想详细阐述这些细节，因为这些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想只详细论述导致国家衰落的典型事件和国家，因此对我们当今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它们还帮助提供了我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基础。

在最明显地表现出衰败迹象的机构中，甚至在所有国家机构中，最牢固的应该是建立，即议会，或奥地利所称的帝国议会。

这个法人团体的模式显然是英国的模式，英国是古典民主。这一仁慈制度的宪法被采纳，一丝不苟，以尽可能少的改动，转移到维也纳。

作为英国两院制的对应，奥地利的两院制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

在维也纳成立。两大“家族”它们本身被视为建筑物，外观上有些不同。

当巴里在泰晤士河畔建造富丽堂皇的国会大厦时，他可以眺望大英帝国的历史为其创作提供了灵感。

在那段历史中，他找到了足够的材料来填充和装饰一千二百个壁龛、支架、以及他那宏伟建筑的柱子。他为上议院和下议院的神殿致力于纪念国家的荣耀。

维也纳正是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个困难。丹麦建筑师汉森完成了大理石宫殿的最后一面山墙，人民新代表机构就在这里为了安置房子，他必须向古代古典世界寻找装饰的主题。

这座“西方民主”的戏剧圣地装饰着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仿佛是为了充当一个讽刺的象征，横跨两院的四马车正在向四方拉开距离世界上各个角落。没有比在同一栋建筑的墙壁。

“民族主义者”反对在装饰中以任何形式美化奥地利历史并坚称这种行为构成了侮辱和挑衅。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才开始有人认为，国会大厦（由瓦洛特建造）的碑文是献给德国的人，终于被铭刻。

我第一次走进弗朗岑斯林的那栋漂亮建筑观看时，还不到二十岁。

听听下议院的一次会议。我心里充满了矛盾的情绪。我一直讨厌议会，但并不讨厌议会本身。相反，我是一个珍视理想的人。

政治自由，我甚至无法想象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

鉴于我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我应该认为这是一种罪行违背自由与理性，认为任何形式的独裁都是可能的政府形式。

我对英国议会的某种钦佩促成了这个我几乎不自觉地被那种钦佩之情所感染，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通过大量阅读报纸获得了这种能力。

我无法一下子抛开这份钦佩。英国王室以庄严的方式 Commons 履行其职能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地利媒体报道了其所作所为。

我常常自问，还有比人民自治更崇高的形式吗？这些考虑构成了我对奥地利议会的敌意的根本动机。

这里所代表的议会政府似乎不配其伟大的原型。

下列考虑也影响了我的态度：德国元素在奥地利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其在国会的地位。直到普选权被引入秘密投票后，德国代表在议会中占多数，尽管多数并不十分可观。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因为社会在民族问题攸关的时候，民主派是靠不住的。

在对德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总是反对德国的立场，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其他国家的追随者团体。即使在那时，社会民主党也不再被视为德国的派对。

普选权的引入甚至终结了民主党在数量上的优势。

德国因素。奥地利国家进一步“去德国化”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出于民族自保的本能，我无法欢迎一位代表在这个体系中，德国因素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现但却总是被背叛。

然而，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缺陷，都不能归咎于议会体系本身，而是奥地利国家本身。我仍然相信，如果德国在代表机构中恢复多数，那么只要旧奥地利国家继续存在，就没有理由反对这种制度。

这就是我第一次踏入这些神圣而充满争议的殿堂时的态度。

在我看来，它们之所以神圣，只是因为那座宏伟建筑的光辉美丽——希腊奇迹德国的土地。但我很快就被眼前的丑恶景象激怒了。

数百名代表齐聚一堂，讨论一个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问题。

那一天的经历足以让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深思。

辩论的智力水平令人沮丧。有时辩论者没有表现出自己听不懂。在场的几个人不会说德语，只会说斯拉夫方言或甚至方言。

这样我就有机会亲耳聆听我迄今所了解的事情只有通过阅读报纸——一群骚乱的人，都在打手势、大喊大叫一位可怜的老人摇响铃铛，疯狂地试图让众议院用友好的呼吁、劝告和严肃的警告来表达对教会尊严的感受。我忍不住笑。

几周后，我第二次访问了众议院。这一次，众议院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

以至于人们几乎认不出这是同一个地方。

大厅里几乎空无一人。气氛很沉闷，只有少数成员地方，互相打着哈欠。一个人在讲话。副议长坐在椅子上。当他环顾四周，显然他感到无聊。

然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整件事。只要有事，我就会去议会。

时间充裕，我默默地但专注地观看了这场盛会。我听着辩论，它们是可以理解的，我研究了这些“被选中的人”或多或少的智慧特征组成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的各个民族的代表。

渐渐地，我对所见之物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年的静默观察足以改变或彻底摧毁我对这个议会的性质的看法机构。

我不再仅仅反对议会代表制原则的扭曲形式我已经无法接受这个制度本身了。

直到那时，我一直认为奥地利议会的灾难性缺陷是由于缺乏德国多数，但现在我认识到该机构本身就存在错误，本质和特征。

我脑子里浮现出许多问题。我更深入地研究了民主多数票决定原则，我同样仔细地审查了知识和作为“国家选定的代表”，绅士们的道德价值被赋予其任务是使该机构正常运转。

因此，我同时认识了这个机构本身，以及那些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就这样，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形成了清晰的生动地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崇拜的现象——议员。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它，至少就基本功能而言。

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实例教训再一次拯救了我，让我避免陷入乍一看，这个理论对很多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尽管这个理论本身是人性的颓废。

当今西欧实行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前身。事实上，后者如果没有前者，这是不可想象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害虫的细菌得以生长和传播。通过引入议会制，民主产生了“污秽和火”，然而，火似乎已经熄灭了。

我非常感谢命运，当我还在维也纳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如果如果我当时在德国，我可能很容易找到一个肤浅的解决方案。如果我在柏林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机构是多么荒谬，我们称之为议会，我可能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相信（正如许多人相信的那样，显然并非毫无道理）人民和帝国的救赎才能得到保障只有重新加强皇权原则。

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没有辨别出他们时代的趋势，也没有看到人民的愿望。

在奥地利，人们不会那么容易被误导。在那里，不可能从一个错误变成另一个错误。

另一个。如果议会毫无价值，那么哈布斯堡王朝更糟糕，或者至少一点也不糟糕程度更好。拒绝议会制并没有解决问题。

问题立即出现了：那该怎么办？否定和废除帝国议会就意味着导致所有权力都落入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对我来说，这个想法尤其不可能的。

由于这个问题对于奥地利来说尤其困难，我更深入地研究了整个问题在我这么小的年纪，我本应该做更彻底的事情。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并让我认真思考的是代表机构明显缺乏个人责任。

议会通过一些法案或法令，这些法案或法令可能具有最大的灾难性的后果，却无人承担责任。

没有人可以被要求解释，因为肯定不能说内阁履行了其职责造成灾难后就辞去责任。

或者我们可以说，当新联盟或议会成立时，责任就完全履行了解散了吗？一个摇摆不定的多数派能对任何事情负责吗？责任除了指特定人的责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含义吗？是否有可能要求任何政府领导人对任何行动、准备和执行这些决定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倾向？难道不认为政治家的任务不是发展建设性的想法和计划，而是让一群笨蛋理解他的计划，以便他们同意他的计划慷慨的同意？政治家是否应该具备与其能力相称的说服天赋？具有政治家制定深远政策和作出重大决策的能力？如果一个政治家在选举中没有获得多数票，这真的能证明他不称职吗？在一个议会中支持一个明确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一个或多或少诚实的选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集会，包含着一个伟大的政治阴谋？在该计划付诸实践并且其伟大之处通过其成功得到公开展示之前？在这个世界上，天才的创造行为不总是对大众的惰性的抗议吗？如果政治家不能成功说服议会中的民众给予其权利，他该怎么办？同意他的政策吗？他是否应该购买该同意书？或者，当他面对同胞的顽固愚蠢时，他是否应该克制自己推进那些他认为对国家生活至关重要的措施？他应该辞职还是继续掌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品格的人会发现他面对着他自己的政治洞察力与另一个是他的正派感，或者更好的是，他的诚实感？我们如何才能在公众的责任和个人荣誉赋予一个人的义务？难道不是每一个真正的领导者都放弃难道他要贬低自己为一个政治代理人吗？另一方面，难道不是每一个经纪人都渴望“玩弄政治”，因为最终责任永远不会落在他个人身上，而是落在一个永远无法确定的匿名群众身上。

是否应该被要求对其行为负责？我们的议会制政府是否应该由数字多数必然要破坏领导原则吗？有谁会真正相信人类进步源自大多数人的复合大脑？而不是在个人的大脑中？或者假设未来人类文明将能否放弃这个作为其存在的条件？个人的创造性大脑在今天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或缺吗？立法权属于多数决定的议会原则拒绝了个人的权威，并取代多数的力量。这样做，这与贵族原则相矛盾，贵族原则是自然的基本法则，但当然，我们必须请记住，贵族原则不需要由当今的上层一万人来体现。

这种现代民主议会制度的破坏性影响可能不容易被那些阅读犹太报刊的人都知道，除非读者已经学会了如何思考并亲自审查事实。

这个机构是导致二流人物涌入政界的主要原因。

面对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将会倾向于不参与政治生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一个具有建设性政治才能的人，而需要一个有能力通过讨价还价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种活动更能吸引小心灵，并因此吸引他们。

精神面貌，能力越微不足道，估计越准确，例如政治家越是缺乏自卑感，他就越倾向于欣赏这样一种制度，不需要有创造性的天才，甚至不需要高级的才能，而是需要有狡猾的智慧这使得一个高效的镇书记员，甚至更喜欢这种小狡猾而不是政治伯里克利这样的天才。

这样的平庸之辈甚至不必担心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责任。他不需要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无

论他的决定结果如何，“政治家”的结局已经注定了——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离开，为具有相似心智水平的其他人留出空间。

这是我们颓废的另一个标志，随着个人被评判的标准就会降低，个人被评判的标准也会降低。

政治家必须依靠议会的多数票。

一个真正具有政治才能的人，不会甘愿成为一群无能的傀儡的奴才，而这些傀儡，轮到他们了，他们是多数派的代表——多数派指的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大众——没有什么比优越的大脑更让人讨厌的了。

对于来自哥谭市的市议员来说，由这样的人领导总是一种安慰，智力地位与他们处于同一水平。

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这样的同行辩论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升到最高层。如果彼得今天是老板，那么保罗为什么不是呢？明天？民主的发明与一个特殊现象密切相关，这种现象最近蔓延到有害的程度，即我们大部分所谓的政治领袖。每当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他们总是幸运地能够隐藏在所谓的多数的背后。

观察这些政治操纵者，你会发现他们如何哄骗大多数人，以便无论他采取什么行动，都会得到他们的批准。他必须有同伙才能转移只要他认为合适，他就会把责任转嫁到别人的肩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政治活动为有品格的人所厌恶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吸引劣势的人，因为一个不愿意接受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总是寻求掩饰，不应该被归类为懦夫帮助流氓。如果国家的领导人如此卑鄙，那么邪恶的后果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没有人有勇气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们将遭受辱骂和诽谤而不是鼓起勇气采取明确的立场，因此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必要时，还要做出无情的决定。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一个事实是，多数永远无法取代个人。

大多数人不仅代表无知，而且代表懦弱，就像一百个傻瓜不会相当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一百个懦夫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政治行动这需要道德的力量和毅力。

每位领导者承担的责任越轻，那些尽管平庸之辈，却仍会感受到将自己不朽的才华奉献于以下领域的人们：国家处置。他们如此期待，以至于他们发现很难等待轮到他们了。

他们排成一长队，痛苦而悲伤地数着前面的人数，计算着时间，他们终于可以上前了。每次他们心中的职位发生了变化，他们感激每一次丑闻导致排队中排在他们前面的一位候选人被淘汰。

如果有人办公室的凳子上坐得太久，他们会认为这几乎违反了神圣的他们彼此团结，相互理解。他们变得愤怒，直到那一刻才罢休。

不体谅他人的人最终会被赶出去，并被迫交出他舒适的床铺。之后，他将获得另一次机会的可能性很小。

通常这些被迫放弃职位的安置人员会再次进入排队等候，除非被其他申请者抗议而赶走。

所有这些的结果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公共职位的快速变化和公职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容易酿成灾难。

受这些情况影响的不仅仅是无知和无能的人，真正的领导者会受到更大程度的影响，如果命运真的成功地把这样的人进入那个位置。

一旦认识到这种领导人的优秀品质，结果将是建立联合阵线将会组织起来反对他，特别是如果那个领导人，虽然不是来自他们的队伍，却敢于挤进选民的圈子。

他们只想拥有自己的公司，并会迅速对任何一个可能明显地表现得比他们高明的人。他们的本能是如此盲目，其他方向，在这一点上非常敏锐。

其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的智力水平不断下降。人们很容易预测国家和政府将因这种状况遭受多大的损失，前提是没有人属于同一阶层的‘领导者’。

旧奥地利的议会制正是这种制度的原型。

描述了这一点。尽管奥地利总理是由国王任命的，但这一行为任命只是实际落实了议会的意愿。

每一件事情上的讨价还价和部长职位是西方民主的典型。随后的结果与所应用的原则。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替换的间隔逐渐变短，最后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接力赛。随着每次改变，该政治家的素质不断下降，最后只剩下小规模议员。

在这些人身上，政治家的品质是根据其机敏程度来衡量和评价的他们用这些手段拼凑起一个又一个的联盟，换句话说，他们的狡猾之处在于操纵最微不足道的政治交易，这是唯一一种通过这些人可以证明自己是人民的合适代表。在这个领域维也纳学派提供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范例。

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特点是才华横溢和一方面，这些人民代表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的任务。

不管愿不愿意，人们都忍不住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些被选中的人狭隘的知识观点。

各组成民族的代表，人们不禁会思考我们公众生活中这些杰出人物的首次发现就是通过这些方法。

值得深入研究和考察的是，这些先生们致力于为国家服务；换句话说，为了彻底分析他们的活动常规。

议会生活的整个场面变得越来越深入其内部结构，越能研究其人物和原则，本着无情的客观精神来管理这个系统。

事实上，在研究其赞助者谈论的机构时，严格保持客观是非常必要的每隔一句话就提到“客观性”，作为审查和判断的唯一公平依据。如果一个人研究这些绅士及其艰苦生存的规律，结果令人惊讶。

没有任何其他原则被证明像议会制原则一样不合理，如果我们客观地审视它。

在我们的审查中，我们可能会忽略选举的方法。

代表们的发生，以及让他们上任并授予新头衔的诡计很明显，公众的愿望或公众的需求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选举的方式，对于每个正确估计政治群众的智慧，很容易看出，这还不够发达，不足以使他们形成自己做出一般的政治判断，或者选出能够胜任的人来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践。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舆论”，它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源于个人经历或个人见解。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向公众呈现公共事务的方式人们通过令人印象深刻且持久的“启蒙”体系。

在宗教领域，对某一教派信仰的宣扬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结果，而宗教的渴望本身却沉睡在灵魂中；同样，群众的政治观点是系统地影响人类情感和智力的最终结果这种方法有时应用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彻底，毅力。

政治教育中最有效的部分，在这方面，最能体现的是“宣传”这个词是媒体所玩弄的。

报刊是政治“启蒙”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手段。它代表着成人学校。然而，这种教育活动并不由国家掌控，而是由部分权力的魔爪，其性质十分低劣。

当我还是维也纳的年轻人时，我有很好的机会认识那些拥有这台用于大众教学的机器，以及那些为它提供思想的人传播。当我意识到这个需要的时间如此之少时，一开始我很惊讶国家内部危险的“大国”在公众中产生某种信念——甚至公众的真正意愿和信念被彻底误解。媒体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一些荒谬的琐事变成了国家重要性，而重大问题则被完全忽视或搁置和隐藏起来公众的关注。

媒体成功地施展了魔法，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凭空捏造出几个名字。

几周后，人们发现，这些名字寄托着人民的希望，使他们的持有者比许多真正有能力的人

更受欢迎一生；同时，政治和其他公共生活领域的资深人物也迅速从公众的记忆中淡出，被遗忘，仿佛已经死去，尽管仍然充分享受着他们的健康。

然而，就在一个月前，这些名字还是不为人知的。有时这些人受到了如此卑鄙的虐待，以至于他们的名字似乎很快就会成为永久的最卑鄙的象征。

为了正确评估新闻界所能发挥的真正有害影响，人们只能研究这种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正派正派的人被玷污了泥泞和污秽，以低级辱骂和诽谤的形式，同时来自数百个方面，仿佛以响应某些神奇的公式。

这些知识分子扒手会抓住一切可能为他们邪恶目的服务的东西。他们会他们窥探最私密的家庭事务，直到他们发现为止不会休息一些小事情可能会被用来毁掉不幸受害者的名誉。

但如果所有这些打探的结果是，在私人或私人场合没有发现任何贬义的东西，公众，受害者的生命，他们诉诸诽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一些批评即便被驳斥一千次，也会坚持下去。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最终无法继续辩护，因为原告与众多同伙串通一气，以致他的诽谤被无休止地传播。

但这些诽谤者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影响人类的普遍性，或者可以理解的。哦，不！诽谤他的恶棍以这种邪恶的方式，同时代的人会给自己戴上英雄正直的光环，这种光环是由油腔滑调的措辞和关于他“作为一名记者的职责”的废话，以及其他的谎言那样。

当这些诽谤者聚集在会议和大会上时，他们会说了很多关于一种特殊荣誉的卑鄙话，他们称之为“职业荣誉”’记者。”然后聚集在一起的物种会互相鞠躬致敬。

正是这种人捏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所谓舆论，议会的阿芙罗狄蒂最终从泡沫中诞生。

如果要充分说明整个过程，则需要几卷书并充分描述其所有空洞的谬论，但如果我们忽略细节，看看产品本身及其活动，我认为这本身就足以让最无辜的人睁开眼睛，轻信的人；这样他才能通过观察这个制度认识到它的荒谬性客观地。

为了认识到这种人类畸变的危害性和荒谬性，最好和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民主议会制与真正的日耳曼民主进行比较。

议会制民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五百人，其中，最近，妇女也被选入议会，被赋予对任何事物作出最终判决的权力。

实际上，他们才是管理机构；因为，尽管他们可以任命内阁，但表面上看来，这个内阁似乎在指导国家事务，但这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所谓的政府不能违背议会的同意做任何事情。它永远不能被要求承担责任因为决定权不属于内阁，而是属于议会多数。

内阁永远只是多数意志的执行者。其政治能力，可以只能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适应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说服大多数人同意其提议，但这意味着它必须从真正的统治权力，就如同乞丐必须乞求大多数人的青睐一样。

事实上，内阁的主要任务必须是确保自己个别措施，多数人的赞成，或者建立一个新的更有利的处置。如果它能成功实现其中任何一项努力，它可能会继续“统治”一段时间，如果它失败了，它就必须统治。

其政策本身是否正确，根本不重要。

责任实际上被废除了。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后果从以下简单的观察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

这五百名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政治能力，结果整个组合脱节，有时呈现出相当可悲的画面。当然没有人相信这些被选中的人国家的代表都是精英或者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我希望没有人会愚蠢到假装报纸上可以出现数百位政治家被毫无智慧的选民放入投票箱。荒谬的想法是，天才诞生于普选权，这一点不能被过分否定。一个国家产生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多年才会出现一次，但百年来却从未出现过。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对每一个杰出的天才都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看到骆驼穿过针眼的几率比看到一只真正伟大的男子“发现”通过选举。

纵观世界历史，那些高于平均水平的人通常都会他们自愿走到前面，但这里有五百人，他们只有谦虚的智力品质对影响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作出判断。

他们组建政府，而政府的每项事务又必须获得著名议会的同意。

可能采取的立法步骤，这意味着要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是政策五百人中，一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忽略这些代表的智力素质，并问一问，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如果我们考虑到必须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属于最多样化和多样化的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意识到治理是多么低效制度必须将决策权委托给群众大会，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处理必须处理的问题得到解决。

最重要的经济措施提交给一个法庭，其中不超过十分之一的成员都学习过经济学基础知识。这意味着最终决定权归属于那些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准备训练的人，无法做出决定关于所讨论的问题。

所有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大多数都是无知和无能的人决定每项措施的人，因为机构的组成没有变化，而要处理的问题涉及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需要由不断变化的代表机构来权衡和解决。

认为交通问题由同一批人来决定，和比如说，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除非他们每个人都是全能天才，但一个世纪内几乎只会出现一位天才。

不幸的是，在这里，很少是一个即使是普通大脑的问题，而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问题，他们心胸狭隘，自负傲慢，是最糟糕的半受过教育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在讨论和决定时表现出如此惊人的轻率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需要极其艰苦的思考。

对国家未来生存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在这种氛围更适合在牌桌上玩。

事实上，后者对这些绅士来说意味着一份比决定更合适的工作一个民族的命运。

当然，假设这样的议会中的每个成员最初都拥有责任感如此薄弱。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个系统通过强迫个人通过对他没有能力决定的问题进行判断会逐渐降低他的道德品质。

没有人有勇气说：“先生们，恐怕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谈论。我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如果发表这样的声明，事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如此直言不讳诚实不会被理解不应该让这样一个光荣的傻瓜破坏游戏。了解人性的人都知道，没有人喜欢被认为是傻瓜他的同事们不相信，在某些圈子里，诚实被视为愚蠢的标志。

因此，一个生性正直的人，一旦当选议员，可能最终被环境的力量所诱导，默许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即其本身就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

如果一个人不参与某个决定，他的态度就会丝毫不能改变现状，摧毁了偶尔刺痛的每一种真正的诚实本能。

一个人或另一个人的良心。

最后，这位原本正直的代表会成功说服自己，他绝不是最糟糕的情况，通过参与某项行动他可以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发生。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反驳。有人可能会说，当然，个别成员也许他不具备处理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所必需的知识，但他的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是，以他所在政党的建议为指导；还可以说，党设立了专门的专家委员会，他们拥有更多的而不是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所需的知识。

乍一看，这个论点似乎有道理。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即为什么五个选举出百人，如果只有少数人拥有处理更多问题所需的智慧重要问题？这正是关键所在。

我们现代民主议会制度的目的不是召集一群聪明且见多识广的代表。完全不是。其目的是聚集一群那些依赖他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更容易被他人引导的人，个人精神面貌就越狭隘。这是唯一可以按照今天邪恶的含义来实施党的政策的方式。

使之生效，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真正掌握控制权的幕后操纵者才有可能继续蒙在鼓里，这样他本人就永远无法为他的行为负责。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做出的决定结果多么糟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可以归咎于一个人，众所周知，他是邪恶的天才对整个事件负责，所有责任都转移到派系的肩上（党团会议）。

实际上，没有实际责任，因为责任只源于个人职责，而不是摆脱由空谈者组成的议会所承担的义务。

议会制度吸引的是獾型的人，他们避开光明。任何正直的人，任何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的人都会鄙视这样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民主已经成为这个种族手中的工具，因为它的秘密目的，它必须避开光明，因为它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只有犹太人可以赞扬一个和他本人一样腐败、虚假的机构。

与这种民主相对照的是日耳曼民主民主，这是真正的民主，因为这里的领导人是自由选择的，而且必须接受对他的一切行为和疏忽负全部责任。

要处理的问题不是由多数人投票决定，而是由个人，作为他决定的真诚性的保证，他承诺他世界上的一切，甚至他的生命。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男人谁会愿意献身于如此艰巨的任务呢。对此异议的回答如下：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德国人的内在精神民主本身会阻止机会主义的野心家，这些人可能智力上毫无价值，而且道德扭曲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可以统治同胞的地位公民。

在日耳曼民主制度下，承担如此深远责任的恐惧会吓跑无知和弱者。如果这样的人试图偷偷潜入，那将很容易就能认出他，并毫不留情地称呼他，就像这样，“滚开，你恶棍。不要用你的脚弄脏这些台阶；因为这些是通往历史万神殿，它们不是为潜行者准备的，而是为英雄准备的。”这是我参加维也纳议会会议两年后形成的观点。

后来我就不再去了那里了。

议会制是哈布斯堡王朝实力不断衰落的原因之一。国家在其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德国元素的优势越大，通过议会程序逐渐削弱，更加明显的是游戏系统各个组成民族之间互相对抗。

在帝国议会中，德国元素总是受到该体系的影响，这意味着其结果对整个帝国是有害的，因为在世纪末，甚至连最头脑简单的人都能认识到，二元君主制内部的凝聚力并不存在已不足以平衡省内民族的分裂主义倾向。

相反，随着国家为自身保护而采取的措施变得越来越无能，对国家的普遍蔑视也随之增加。不仅匈牙利，而且斯拉夫各省逐渐不再认同君主制，拥抱了他们所有人，因此，他们并不觉得它的弱点会损害他们自己。

他们反而欢迎这些衰老的表现。他们期待着最后国家解体，而不是国家复兴。

在议会中，彻底崩溃被推迟了以牺牲德国元素；而在全各地，它被各种民族之间互相对抗。

这一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针对德国人的。

尤其是由于王位继承权赋予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爵在一定影响下，捷克化政策正在系统地推行。

这位二元君主制的继承人利用一切手段亲自推进了这一政策：旨在消除德国因素的影响，或者至少他赞同这一政策。

利用国家官员，纯德国地区逐渐但明确地被纳入混合语言的危险地带。

即使在下奥地利州，这一进程也开始取得进展速度不断加快，维也纳被许多捷克人视为他们最大的城市。

在这个新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家庭圈子里，捷克语很受欢迎。

大公爵以前是捷克的一位伯爵夫人，后来嫁给了王子，嫁给了一位贵妇婚姻。她来自一个对德国人怀有传统敌意的环境。

大公心中的主要想法是在中欧建立一个斯拉夫国家，是基于纯粹的天主教基础而建造的，作为对抗东正教俄罗斯的堡垒。

正如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宗教因此被利用来服务于纯粹的政治这项政策至少对德国的利益而言，是一项致命的政策。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令人悲哀的。

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会都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奖励预料之中。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了王位，教会也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国家。通过利用宗教动机为了服务政治，一种精神被激发了，而这种精神是这项政策的煽动者从未想象过的梦见了。

针对企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消灭旧君主制中的德意志主义的回应是奥地利的泛德意志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其基本思想是犹太式的，在二元君主制中其影响力已经达到顶峰，或者已经过了那个点。

所引发的反应并非源自社会倾向，而是源自民族主义倾向，一如既往。

就像在旧奥地利的情况一样。自我保护的本能驱使德国元素捍卫本身就充满活力。

经济因素只是慢慢地才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是次要的关注。在普遍的政治混乱中，出现了两个政党组织。

一个更具有民族特征，另一个更具有社会特征，但两者都具有高度很有趣，并且对未来有启发。

1866 年战争结束后，奥地利战败，哈布斯堡王朝考虑在战场上报仇。只有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悲惨结局墨西哥阻止了与法国进一步加强的合作。

马克西米利安灾难性的远征的主要责任被归咎于拿破仑三世，而事实是法国人抛弃了他，这引起了普遍的愤慨。然而哈布斯堡王朝仍在等待机会。如果 1870-71 年的战争不是如此独特胜利之后，维也纳宫廷也许会冒着流血的风险来为萨多瓦进行报复。

但当从法德战场传来第一份报告时，虽然这是真的，似乎是奇迹，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所有“最聪明”的君主都承认时机不合时宜，并试图尽可能优雅地接受不利的情况可能的。

这两年（1870-71 年）的英勇斗争创造了更大的奇迹，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转变从来不是来自内心的渴望，而只是来自压力的情况。

然而，奥斯特马克的德国人民却被新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看到父辈的梦想，深受感动从而光荣地实现了。

让我们不要误会，真正的德国奥地利人从此时起就意识到，柯尼格拉茨是重建帝国的悲剧性先决条件，尽管这是必要的，但不应再不再背负旧联盟的麻痹，而旧联盟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这场病态的衰变。

最重要的是，这位德裔奥地利人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新的帝国必须做出选择只有具有英雄气质的皇帝才有资格戴上“莱茵河。”命运应该受到赞扬，因为它选择了这个家族的后代，在动荡的腓特烈大帝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为此国家树立了一个永世流芳的光辉榜样。

1870-71 年大战后，哈布斯堡王朝决心彻底消灭缓慢而谨慎地（因为这必然是斯拉夫主义政策的结果）危险的德国元素，其内心的感受和态度是毋庸置疑的。

随后，叛乱之火在人民中间燃起，灭绝令已经下达——这是现代德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火灾。

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第一次变成了反叛者，而不是反抗国家的叛乱者或国家本身，但他们反对一种他们确信会必然会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灭亡。

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传统的王朝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民族热爱并且人们发生了公开冲突。

这是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奥地利泛德意志运动的功劳。

世纪，它明确无误地指出，一个国家有权要求尊重和保护其权力，只有当这种权力按照利益来行使时或者至少不能以有损国家利益的方式行事。

国家权力本身永远不能成为目的；因为，如果是这样，任何形式的暴政都会不可侵犯，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一个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工具来达到目的带领一个民族走向毁灭，那么反抗不仅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公民。

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何时会出现，无法用理论来回答。

论文，但只能靠纯粹的力量和成功。

每一个政府，即使它可能是最糟糕的政府，即使它背叛了国家以千百种方式信任的政府将声称其职责是维护状态。

为民族自保而战的对手必须使用与美国相同的武器。

如果他们要战胜这种规则，并确保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因此，只要权力被推翻的政权使用它们；但如果压迫者自己也使用它们。

一般而言，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不是保全一个国家或政府，而是保全一个种族。

如果一个种族面临被压迫甚至灭绝的危险，合法性问题就只是次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既定权力只能使用那些被视为“合法”，然而，被压迫者的自我保护本能永远是正当的，程度使用所有可用的武器。

只有通过承认这一原则，地球上某些民族才能在历史上，他们能够在反抗外国压迫者的斗争中树立如此光辉的榜样，家庭暴政。

人权高于国家的权利。但如果一个民族在争取其人权，这意味着它在命运的天平上太轻了，不值得在地球上继续存在的好运。

对于那些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为生存而战的人来说，他们的命运是注定的永远公正的天意。这个世界不适合胆小的人。

奥地利是一个非常明显和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暴政是多么容易在所谓‘合法性’的外衣。哈布斯堡王朝的合法权力行使是基于议会中非德国人占多数，而王朝议会也对德国抱有敌意。

德国元素。

国家的全部权威都体现在这两个因素中。

试图通过这两个因素来改变德国元素的命运，将是毫无意义。那些主张“合法”道路是唯一可能的道路，并且服从国家当局无法抵抗；因为抵抗政策不可能实施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落实。

听从法律家顾问的建议，将意味着德国的必然毁灭君主制内部的元素，这场灾难很快就会到来。德国实际上，只有通过国家本身的崩溃，这个因素才得以拯救。

这位戴眼镜的理论家宁愿为他的学说献出生命，也不愿为他的人民献出生命。因为人制定了法律，他随后就会认为他是为了这些法律而存在的。一个伟大的当时泛德运动的贡献就是废除了所有这些废话，尽管教条理论家和其他偶像崇拜者都感到震惊。

当哈布斯堡王朝试图与德国军队近距离接触时，泛德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攻击手段，对这个‘辉煌的’王朝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这个党是第一个调查和揭露国家腐败状况的党，并且通过这样做让成千上万的人睁开了眼

睛。解放了爱自己爱他人的崇高理想。

把国家从这个可悲的王朝的怀抱中拯救出来，是泛德运动。该运动首次出现时就获得了大批追随者。

事实上，这场运动几乎要变成一场雪崩，但最初的成功并没有维护。

当我去维也纳的时候，泛德党已经被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所取代。

党此时已经上台执政。

事实上，泛德党已经沦落到几乎完全无足轻重的地步。

泛德运动的兴起和衰落，一方面，另一方面，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因此他们发挥了对我形成自己的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我去维也纳的时候，我所有的同情都集中在泛德运动身上。我我为他们有勇气高呼“霍亨索伦万岁”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他们决心将自己视为德意志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暂时分开。

他们从不错过在公众场合解释自己态度的机会，这激起了我的热情和信心。在涉及德国主义的每一个问题上公开宣扬自己的原则，并且永不妥协，在我看来这是拯救我们人民的唯一方法。

我无法理解的是，在经历了如此辉煌的变革之后，这场运动怎么会这么快就瓦解了？开始同样难以理解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应该获得如此巨大的同一时间内的功率。

他们刚刚达到人气的顶峰。当我开始比较这两个人时运动，命运为我提供了理解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命运的行动因我自己的困境而加速。

我将从两位必须被视为创始人和两个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是 Georg von Schönerer 和 Karl Lueger 博士。

就人格而言，两人都远远超出了普通议员的水平。他们在全面政治腐败的泥沼中，他们过着纯洁、无可指责的正直生活。

我个人一开始喜欢的是泛德代表舍纳勒，后来才渐渐地，我开始对这位基督教社会主义领袖产生了同样的好感。

当我比较他们各自的能力时，在我看来，Schönerer 是一个更好、更深刻的人。

思想家。他预见到了奥地利国家不可避免的衰落。

比任何人都清楚、准确。

如果德国听取了有关哈布斯堡帝国的这一警告，那么灾难性的世界德国与整个欧洲的战争本不会发生。但尽管舍纳勒成功地洞察了问题的本质，但他往往他对人的判断是错误的。

鲁格博士的特殊才能就在于此。他拥有洞察人性的罕见天赋，而且他非常小心，不要把男人看得比现实中更好。他的计划基于人类生活为他提供的实际可能性，而舍纳勒却几乎没有理解这个。

这位泛德主义主角的所有想法在抽象上都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说服力或理解力是将他的思想传达给广大群众所必需的。他无法把它们表述得易于被大众掌握，因为大众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将永远如此。

因此，Schönerer 的所有知识都只是先知的智慧，他从未成功付诸实践。缺乏对人性的洞察力导致他对某些运动和旧机构。

舍纳勒确实意识到，他必须处理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观，但他没有理解，只有一个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做出这样的几乎具有宗教性质的信仰盛行。

不幸的是，他只是非常不完全地理解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这种弱点是由于他们的商业利益，个人太害怕风险，因此阻止他们采取行动。

一般说来，世界观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广大群众宣布自己已准备好成为它的捍卫者，为它无论在何处、为何种目的而战在必要的范围内。

由于未能理解底层民众的重要性，导致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不足。

在所有这些方面，卢格医生与舍纳勒截然相反。他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使他能够正确估计各种社会力量，避免低估现有制度的力量，也许正是这种品质使他能够利用这些机构作为实现其政策目的的手段。

他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层阶级的政治战斗力相当他们是微不足道的，根本没有能力为伟大的新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因此，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政治活动都投入到了争取那些生存受到威胁的人口，这一事实往往会促进而不是瘫痪，他们身上的战斗精神。

他还迅速采取一切可用手段来赢得长期存在的机构，以便能够从这些机构中获得对他的运动的最大利益旧的权力来源。因此，他首先选择新政党的社会基础是面临灭绝威胁的中产阶级。

这样，他获得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他们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并且战斗耐力。

他对天主教会极其明智的态度迅速赢得了年轻神职人员的支持。

大量的旧教士党派被迫退出行动领域，否则，更明智的做法是加入新政党，希望逐步赢回一个又一个的位置其他。

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他的本质特征，那对他来说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因为他不仅拥有一位能干的战术家的素质，而且拥有一位伟大改革家的真正天赋尽管这受限于他对眼前可能性的准确认知，也受限于他自己的能力。

这位杰出人物决定追求的目标是非常务实。他希望征服维也纳，君主制的核心。正是从维也纳开始，生命的最后一丝脉搏在衰败帝国病态而疲惫的躯体中跳动。如果心脏能够变得更健康，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必然会恢复活力。

这个想法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它在实践中应用的时间却严格限制，而这正是卢格的弱点。他作为维也纳是永垂不朽的，从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来说，但这一切都无法拯救君主制。它来了为时已晚。

他的对手 Schönerer 对此看得更清楚。Lueger 博士承诺付诸实践，结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他预期的结果并没有来。

舍纳勒没有实现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但他的担忧却变成了现实，不幸的是，可怕的时尚。因此，这两个人都未能实现他们的进一步目标。卢格无法挽救奥地利和舍纳勒未能阻止德国人民的垮台。

研究这两个政党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教训。

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这对我的朋友特别有用，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今天的生活与那个时代相似。

因此，这样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犯下导致运动的终结，并使得其他运动毫无成果。在我看来，泛德国在奥地利的动向应该归因于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领导人没有明确认识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一个本质上具有革命性质的新运动来说。

舍纳勒和他的追随者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资产阶级身上。为此他们的运动注定会变得平庸而乏味。德国资产阶级，尤其是在其上层，尽管个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仍然是和平主义者。

完全自我克制的点，无论国家或国家的内部事务担心的。

在好时代，也就是政府好的时候，这种态度使得这种社会对国家来说，这种品质极其宝贵但当政府不善时，这种品质就会破坏性作用。

为了确保能够进行真正艰苦的斗争，泛德运动本应致力于赢得群众的支持。

未能做到这一点导致运动从一开始就缺乏基本的动力如果这股浪潮不想在短时间内消退，就需要这样做。

在运动一开始就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原则的真理性，新政党没有将其付诸实践，犯了一个最初的错误，这个错误很可能后来得到了纠正，因为许多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允许进入运动日益决定了其内部方向，从而摧毁了获得任何进一步前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样的运动不可能超越单纯的讨论和批评。信仰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牺牲精神在这场运动中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积极”合作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承认现状，逐步缓和争端的激烈程度，并最终达成不光彩的和平。

这就是泛德运动的命运，因为一开始，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他们应该从广大民众中招募追随者人民群众。因此，只有在适度。

其迅速衰落的第二个原因，也是由于这个错误。

当泛德意志主义兴起时，德国人在奥地利的处境已经十分危急。

今年议会越来越多地被用作逐步消灭德裔奥地利人口。

最后一刻挽救它的唯一希望是推翻议会制度，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泛德运动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推翻议会，泛德主义者进入议会是为了“从根本上破坏它”。

就像现在的说法那样，他们应该攻击这个制度本身吗？外部？他们进入了议会，结果却失败了，但他们不得不进入议会，因为为了要对这种外部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需要不屈不挠的勇气和随时准备必须有牺牲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抓住公牛的角。猛烈的攻击可能会使攻击者陷入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但如果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就会站起来，即使有些骨头可能破碎，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他才能取得胜利。

新的拥护者被一项事业的巨大牺牲所吸引，直到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赢得了成功。

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来自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只有他们才有必要的决心和毅力，将这场血腥的斗争进行到底最终。泛德运动没有这些广大群众作为其拥护者，因此唯一的当然，左边的开放是进入议会。

如果认为这一决定是经过长期内部犹豫的结果，那就错了。

道德，或者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任何其他解决方案。

那些参与这一失误的人，都是出于一般的考虑和模糊的概念，参加他们所参加的那个机构的意义和效果是什么？受到原则谴责。

总的来说，他们希望这样就能有办法向广大民众阐述他们的事业人民群众，因为他们可以在“全民论坛”上发言。

也有理由相信，通过从根源上打击邪恶，他们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不是从外部发起攻击。他们认为，如果受到议会豁免权的保护，各个主角的地位将会得到加强，从而他们的攻击力量会得到增强。但事实上，一切都不是这样。

泛德代表们发言的论坛并没有扩大，但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每个人只对那些愿意听他讲话或能读懂的人讲话报纸上报道他的演讲。最大的直接听众论坛不是议会礼堂；这是大型公众会议，因为仅在这里就会有数千人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听取发言人的讲话，而在议会会议上，只有那里有几百人，其中大多数人只是为了争取每日的津贴。

参加，而不是被某个“代表”的智慧所启发。

人们。'最重要的考虑是，同样的公众始终存在，并且这些公众确实不想学习任何新东西，因为，撇开它的智力问题不谈，它甚至缺乏努力学习所必需的适度意志力。

没有一个人民代表会尊敬更高的真理，并献身于它的服务。

这些绅士中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除非他有理由希望，通过这样的面纱，他也许能够在来

届选举中保住其选区的代表权。

因此，只有当很明显老党派在选举中可能遭遇不利局面时，即将到来的选举——只有那时那些男子汉气概的典范才会开始寻找新的政党或一项可能有更好的选举前景的新政策，但当然这种转变将是伴随着大量的道德动机来为它辩护，因此总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一个现有政党受到公众普遍反对，并面临被面临惨败的可能性，一场大迁徙就开始了。

议会老鼠离开了党派之船。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案件中的个人对相关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决定采取相应行动；这些阵线的变化只是一种洞察力的体现，它警告议会跳蚤正确的时刻，让他跳进另一张温暖的派对床。

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就好比在某些动物面前抛珍珠。事实上，它并不能补偿所付出的辛苦采取，因为结果必须始终为负。这就是本案的情况。

代表们或许已经声嘶力竭地讲话，但却毫无效果。

媒体要么完全忽视他们，要么曲解他们的言论，以至于逻辑上的争论被破坏或被扭曲，以至于公众只能得到非常错误的理解对新运动目标的印象。

个别成员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读了什么他们认为这些话是出自他们。这些话只是从原文中抽出来的摘录。

演讲，给人一种语无伦次、胡言乱语的印象，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因此，他们真正发言的受众仅仅是五百名议员这意义重大。

最糟糕的是，泛德运动只有在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里的问题不是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仅此一点就能激发出进行如此巨大斗争所必需的内在道德力量，并且在这场斗争中，领导者必须具有一流的头脑和坚定的勇气。

如果为世界观而斗争的不是那些准备牺牲一切，很快你就找不到真正的战斗追随者了他们准备为这个事业献出生命。

一个只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人，对为社区。

为了确保成功所需的条件，必须让所有相关人员要明白，新运动展望未来是为了荣誉和辉煌，但它没有为其成员提供的当代奖励。

如果一个运动应该提供大量容易获得的职位和办公室，那么不合格的候选人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并且最终有一天，政治奸商将大量出现在成功一方的成员资格，即在早期战斗中首当其冲的战斗人员运动的各个阶段现在几乎都不能承认自己的政党，而且可能会被抛弃后来者会成为不必要的累赘。这样，运动就不再有使命可完成了。

一旦泛德党决定与议会合作，他们就不再是领导者，人民运动中的战士，而仅仅是议员。因此，运动沦落到当时的普通政党水平，不再有能力面对敌对的命运并竞选殉难的危险泛德联盟的领导人没有进行斗争，而是习惯于进行对话和谈判。

议员们很快发现，这是一种更令人满意、风险更小的履行职责的方式。

如果他们要用“知识分子”的武器来捍卫新的世界观，议会言论，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结果不确定的斗争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个人利益。

当他们在议会就座时，他们的追随者们在外边希望并等待着奇迹发生。当然，这样的奇迹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

随后，运动的追随者们很快就不耐烦了，因为他们读到的报道他们自己的代表根本没有达到他们投票时的预期选举中也出现了同样的代表。原因不难发现。

这是因为不友好的媒体没有真实报道泛民主派的所作所为。

德国人民代表实际上正在这么做。

随着新代表们开始喜欢议会和议会中这种温和的“革命”斗争形式，省议会，他们逐渐不愿意恢复更危险的工作，阐述把运动的原则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



公开的群众集会变得越来越少，尽管这是行使权力的唯一手段。

对人们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来自于直接的个人这样，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当演讲者们站在大啤酒馆的桌子上向集会发表演讲时数千人被抛弃，前往议会讲坛，演讲也不再被提及泛德运动失败了，它不是直接向人民，而是向所谓的“选定”的代表它的流行性质，并在一段时间内退化到一个或多或少严肃的俱乐部的水平，在那里学术上讨论了当今的问题。

媒体所造成的错误印象已不再能通过与当事人的个人接触来纠正。

公众会议上，个别代表可能真实地陈述了他们的活动。

这种忽视的最终结果是，“泛德意志”一词听起来不愉快在大众的耳中。当今的文坛名流和文坛势利眼们应该意识到世界上发生过的所有伟大改革都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笔的任务永远是提出理论概念，激发这样的变化。这种力量总是推动宗教和宗教信仰的巨大历史雪崩。

政治运动的魔力就在于言语的魔力。

广大民众更容易受到修辞的吸引力，而不是其他任何力量。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的运动。它们是人类激情和情感的火山喷发，被无情的逆境女神，或通过将言语的火炬投射到人们中间。

在任何情况下，美学文学家和客厅里的英雄。一个国家的厄运只能通过炽热激情的风暴来避免；但是只有自己充满激情的人才能激起别人的激情。

只有通过充满激情的情感，被选中的领导人才能发挥权力这句话就像锤子的敲击，将打开人心之门。

不具备激情感受和言语能力的人永远不会被上帝选择为预示它的意志。

因此，一个作家应该专心致志地思考理论问题，如果他所需的能力和知识。他不是天生的或被选择成为领导者。

一个有着伟大目标的运动必须再次小心谨慎地警惕失去联系的危险人民群众。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首先，所做的决定必须始终符合这一原则。

运动必须避免一切可能削弱或削弱其影响力的事情。

群众，不是出于煽动的动机，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无论它无论它有多么崇高和高尚，都不需要巨大的力量就能实现人民。

只有严酷的现实才能指引我们走向目标。在这个世界上，往往不愿意走艰难的路意味着彻底放弃我们的目标和宗旨，无论放弃无论是否有意识地愿意。

泛德领导人凭借其对议会制原则的接受，把活动中心从人民转移到议会，他们牺牲了为了一时的廉价成功而放弃未来。他们在斗争中选择了更容易的道路，这样做会使他们不配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在维也纳时，曾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我发现泛德运动的失败在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赞赏。

在我看来，这场运动当时似乎被选中接管德国的领导权奥地利的元素。导致泛德意志运动失败的前两个错误彼此之间联系非常紧密。

未能认识到带来巨大变化的内在动力，导致认识到广大群众在实现这些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太少，而运动的尝试而要俘获下层阶级的思想，力量太弱了。

如果我们正确认识到，革命运动中的群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会有所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宣传方面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然后，运动不会转移到议会，而是会留在车间和街道上。

第三个错误，也源于未能理解广大群众。群众首先由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引导，朝着一定的方

向运动起来；但这些物体一旦运动起来，就像一个飞轮，因为它们维持着动量并保持进攻的稳定平衡。

泛德意志领袖们决定对反对天主教会这种现象只能归因于对人民的精神品质。

新政党对罗马发动暴力运动的原因如下：哈布斯堡王朝决定把奥地利变成一个斯拉夫国家后，各种采取了一系列看来适合该目的的措施。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毫无顾忌地利用了宗教机构。

这一新的‘国家理念’的服务。

所采用的许多方法之一是利用捷克教区及其神职人员作为奥地利的斯拉夫化，其实施方式如下。捷克的教区牧师国籍被指定到纯德国地区。逐渐稳步地推动捷克人民先于教会，教区牧师成为这一过程中的生殖细胞去德国化。

不幸的是，德奥教士们完全没能阻止这一程序。不仅他们没有能力在德国方面采取类似的主动行动，但他们表现出无法对捷克的进攻进行足够的抵抗。

因此，德国元素被缓慢但稳步地推向后方，通过扭曲一方面，宗教信仰被滥用于政治目的另一方面，缺乏适当的抵抗。

这些是处理小问题时使用的策略，但处理主要问题并无太大差别。

哈布斯堡王朝所追求的反德目标，特别是通过更高层次的教士们，没有遇到任何强烈的抵抗，而德国的教士代表利益彻底撤退到后方。

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就是，天主教神职人员本身极其忽视德国人民的权利。

因此，天主教会似乎并不同情德国人民，但它不公正地支持了他们的对手。

整个罪恶的根源，尤其是在舍纳勒看来，在于天主教会的权威并不在德国，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成为教会对我们人民的要求采取敌对态度。

所谓的文化问题几乎完全退居幕后，就像当时整个奥地利都是如此。

泛德联盟领导人对天主教会采取敌对态度，是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教会对科学等问题的态度并不是主要原因，而主要是因为教会没有像它应该做的那样捍卫德国人的权利，而是一直支持那些侵犯了这些权利的人，尤其是斯拉夫人。

乔治·舍纳勒不是那种做事半途而废的人。他与教会展开斗争因为他坚信这是拯救德国人民的唯一途径。

Los-von-Rom（“远离罗马”）运动似乎是最强大的，但同时最困难的时候，攻击和摧毁敌人堡垒的方法。Schönerer 认为如果这一运动能够成功进行，那么两大德国的宗教派别将被消灭，德国的宗教内部力量将被摧毁。

这样的胜利将极大地增强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实力。

但在这种情况下，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在一切与德意志主义有关的事物中，民族抵抗力量因此，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抵抗力比非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要弱得多。

同事们，特别是捷克人，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不知道德国神职人员几乎从未想过要为德国人采取攻势兴趣。

与此同时，每一个没有忽视事实的人都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因于我们德国人注定要遭受这种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我们对待自己民族的客观态度，就如同对待其他事物一样。

虽然捷克牧师对自己的人民采取了主观态度，只对对教会的态度，这位德国教区牧师表现出对他的教会的主观忠诚并对自己的国家保持客观。

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成千上万个其他领域。这绝不是天主教的特殊遗产，但它是在我们身上，这种现象很快就会破坏几乎所有的制度，尤其是状态和具有理想目标的状态。

以我们的公务员对实现民族复兴，并将这种态度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公务员的立场进行比较

国家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或者，有谁能相信任何国家的军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把“国家权威”置于人民的切身需要之上。

就像过去五年来他们在我们国家理所当然地做的那样，甚至认为他们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吗？或者，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关于犹太人问题，两个基督教徒当今各教派所持的立场不符合国家需要，或者甚至宗教的利益？考虑一下犹太拉比对任何问题的态度，即使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关于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并将他的态度与我们大多数神职人员的态度进行比较，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无论何时，只要是为了捍卫某种抽象观念，我们都会观察到同样的现象。

“国家权威”、“民主”、“和平主义”“国际团结”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在我们这里都变成了僵化的、教条的概念，所以国家总体的生存需要纯粹是根据这些观念来判断的。

这种从先入为主的角度看待所有国家要求的不良习惯观念使我们无法看到事物的主观方面因为客观上与事物相矛盾我们自己的学说。

最终导致手段和目的关系的彻底颠倒。

任何民族复兴的尝试都会遭到反对，如果这种复兴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推翻一个邪恶的政权，因为这样的行动将被视为违反“国家权威”。

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国家权威”并不是存在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于客观性的教条信徒来说，它本身就是目的，这足以说明他悲惨生存的全部目的。

如果有人试图建立独裁政权，这些人就会发出强烈抗议。

尽管这位独裁者是腓特烈大帝，而当时的政客们，构成议会多数派的人都是心胸狭窄、无能的人，因为对于坚持抽象原则的人来说，民主的法律比国家的福祉更神圣。

根据他的原则，这些绅士中的一位会捍卫最恶劣的暴政，尽管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民族走向毁灭，因为它是“权威”的短暂体现。

另一个国家会拒绝即使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政府，如果它不在一个符合他的‘民主’观念。

同样，当国家在战争中痛苦呻吟时，我们德国的和平主义者将保持沉默，嗜血的军事力量所实施的压迫，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只有通过积极抵抗和使用武力才能改变，这违背了和平主义协会的精神。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被抢劫和掠夺以“团结”的名义，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同志们发出呼吁，但他却回应以兄弟般的仁慈对待他人，从不想过要报复，甚至从不想过要为自己辩护。

为什么？因为他是德国人。

思考这样的事实可能令人不快，但如果要克隆某些东西，我们必须首先诊断疾病。

我刚才描述的现象也解释了德国人一部分神职人员促进和维护他们的利益。

这种行为不是恶意的表现，也不是命令的结果。

就像我们说的，‘上面’，但这种民族勇气和决心的缺乏是由于我们的一方面，教育体系未能让年轻人对自己的我们一方面要忠诚于德意志民族，另一方面要服从于已经成为我们偶像的理想。

教育使人们成为“民主”等抽象概念的信徒，“国际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等等，都是如此坚定、如此排他，并且从内而外，如此纯粹主观，以至于在形成他们对外部生活的总体印象时总体来说，它们从根本上受到这些先验观念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们对待自己的德国国籍的态度自青年向上。和平主义者——如果他是德国人——他主观上、身体上和灵魂，按照他的教条原则，总是首先考虑客观的正确与否无论危险有多么严重和不该有，只要他的人民受到威胁，他就会从不站在自己人民的立场上，从不出于本能地为他们而战自我保护。

另一个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同的宗教派别。

就其起源和传统而言，新教捍卫了德国理想更好，但一旦被要求捍卫属于某个领域的国家

利益，它就会失败那些不符合其理想和传统发展的东西，或者由于某种原因而被其拒绝的东西。

因此，新教将始终致力于促进德国理想，道德诚信或国民教育，当德国的基本性格、德语或德国的自由是应该捍卫的，因为这些代表了新教的原则本身是接地的。

但同样的新教却强烈反对一切试图将国家从它的死敌，因为新教徒对犹太人的态度或多或少是僵硬的，教条地固定下来。然而，这是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除非所有试图实现德国复兴的愿望注定是荒谬而不可能的。

在维也纳逗留期间，我有充足的空闲时间和机会研究这个问题，而不用允许任何偏见介入并在我与人们的日常交往中，我能够以一种我所形成的观点千百种正确性。

在这里，在众多民族的会聚之处，显然德国人总是和平主义者试图客观地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你永远找不到一个犹太人对自己的种族采取了类似的态度。

此外，我发现只有德国社会党人是“国际化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义务以任何其他方式为他的人民寻求正义，除了抱怨和向他的国际同志们哀号。

没有人会指责捷克人、波兰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有这样的行为。简而言之，即使在那时，我认识到，这种邪恶只是社会主义教义所导致的部分结果，和平主义等，但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体系完全不完善，这是我们对自身民族缺乏忠诚的根源。

因此，泛德联盟领导人提出的第一个理论论点，是为了支持他们的对天主教的进攻是相当站不住脚的。

解决我所说的弊端的唯一方法是从小训练德国人绝对承认本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毒害他们的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心智就被这种可恶的“客观性”病毒感染，甚至在关系到我们自身生存的存亡。

其结果是，德国的天主教徒，就像爱尔兰、波兰或法国的天主教徒一样，将首先是一个德国人，但这的前提是建立一个激进的国家政府。

支持我的论点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我们的人民最后一次被传唤到历史法庭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以一种有生之年殊死搏斗。

只要上层领导不缺人，人民就尽职尽责，无论是新教牧师还是天主教神父，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义务。

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的抵抗力量坚持下去，不仅在战壕里，而且，在家里，程度甚至更高。在那些年里，特别是在第一次热情爆发的时候，宗教营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神圣的德意志帝国，它的保存和未来的存在，他们向天堂祈祷。

奥地利的泛德意志运动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保留德国元素在奥地利是可能的，只要该元素仍然在天主教会的信仰？如果是这样，那么政党就不应该干涉宗教事务。

和教派问题，但如果没有，那么应该开始宗教改革，不是政党运动。

任何相信宗教改革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的人组织表明他不知道宗教观念和教义的发展信仰以及教会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没有人可以侍奉两个主人，我认为建立或推翻一个宗教比其后果比建立一个国家，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政党或者推翻一个国家还要严重。

相反，毫无争议的是，这些袭击只是针对袭击的防御措施从另一边。

毫无疑问，总有一些不择手段的流氓，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宗教作为政治交往中的工具，通常是这些人的唯一目标，但在另一方面，认为宗教本身或某个宗教派别应该对一些流氓利用教会来谋取自己的卑鄙利益，就像他们利用他们参与的任何其他事情。

对这些议会懒汉和骗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至少在事后能够为自己的政治欺诈行为找到替罪羊。

当宗教或宗教派别受到攻击并被要求对他的个人邪恶的行为，这个精明的家伙会立即发出

抗议，并让全世界见证这种行为是多么正当。

他的行为就像他所做的那样，宣称他和他的雄辩拯救了宗教和教会。

公众大多愚昧，记忆力很差，无法认识到而这场动乱中真正的争吵的始作俑者。

它常常不记得战斗的开始，所以盗贼得到了他的结局。一个狡猾的这种人很清楚，他的罪行与宗教无关，所以他当他诚实却天真的对手输掉比赛时，他会更加开怀大笑并且有一天对人性失去了信心，退出了公众生活。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宗教或教会本身视为对个人的违法行为负责。

如果我们把组织的规模与平均规模进行比较，这是众所周知的。

人性的弱点，我们必须承认，善恶的比例更大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利。

当然，在牧师中，可能有些人利用他们的神圣使命来推进他们的政治野心。不幸的是，有些神职人员忘记了，在政治混战中，他们应该是崇高真理的捍卫者，而不是谎言和诽谤的教唆者，而是每一个这样的我们可以找到一千多个不配的本，他们作为值得信赖的灵魂守护者，他们高高耸立于我们这个腐败时代的水平之上，就像一座座小岛在宇宙沼泽之上。

我不能也不会谴责教会本身，如果一些穿着牧师长袍的堕落之人违反了道德准则；我也不应该责怪教会如果其无数成员中的一个背叛和玷污他的同胞，特别是在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行为十分常见。

我们决不能忘记，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个这样的埃菲亚特人而言，有一千个埃菲亚特人在我们这一年里，人们的心为他们的人民而流血；不幸的，以及他们一起我们怀着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向往幸运之神再次向我们微笑的那一刻。

如果有人反对说，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而是主要用基本真理和教条问题来回答这一反对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问这个问题：‘你是否觉得上天最不希望你对世人宣扬真理？世界？’如果是的话，那就去做吧，但你应该有勇气直接去做，而不是用一些政治手段党作为你的喉舌，因为这也是错误的。代替现在存在的东西，不好，就放一些其他更好的、能持续到未来的东西。

如果你缺乏必要的勇气，或者你自己也不清楚你的更好的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不要管它，但不要试图绕弯子达到目标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摘下面罩进行战斗，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政党的成员。

政党无权干涉宗教问题，除非这些问题与某些事情有关这与国家格格不入，旨在破坏种族习俗和道德。

同样，宗教也不能与政党政治混为一谈。如果一些教会要员滥用宗教机构或宗教教义来伤害自己的同胞、反对者永远不应该走同样的道路、用同样的武器与他们作战。

对于政治领袖来说，他的人民的宗教教义和制度应该是神圣的，不可侵犯；否则，如果他具备必要的素质，他就不应该成为政治家，而应该成为改革者完成这样的使命。

任何其他行为方式都会导致灾难，尤其是在德国。在研究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运动及其与罗马的冲突，我当时，尤其是在后来的几年里，坚信由于未能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泛德意志主义者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是这一运动不可缺少的战斗人员。

通过进入议会，泛德意志联盟的领导人放弃了自己的宗族，同时议会制度的所有缺陷都使他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他们反对天主教会让他们无法在下层和中层社会中立足阶级，同时又夺走了他们无数的上流社会元素，其中一些是最好的这个国家确实拥有。

奥地利文化竞赛的实际结果是负面的。

尽管他们成功地从教会夺取了十万名成员，但这并不对后者造成很大伤害。

教会没有必要为这些迷失的羊流泪，因为它失去的只是那些长期在他们内心深处，时间不再属于它。

这次新改革与大改革的区别在于，当时，一些最好的成员因为宗教信仰而离开了教会，而

在这个新的改革只剩下那些以前漠不关心、现在受到政治考虑。

仅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结果既可笑又令人痛惜。

又一次，一场为德国民族带来巨大希望的政治运动失败了，因为它不是以坚定不移地坚持赤裸裸的现实的的精神进行的，而是迷失于它必然会被瓦解。

如果泛德运动正确理解了广大群众的心理。如果领导人知道，仅仅出于心理原因，在群众面前摆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手是有利的——因为这会导致一场彻底的分散他们的战斗力——他们将集中全部和不分散的力量针对单个对手的攻击。

政党的政策中，没有什么比允许其决定被导演是那些虽然不懂烹饪却想参与所有事情的人最简单的菜。

尽管有很多东西可以反对各种宗教派别，但政治领导人不能忘记，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个纯粹的政治党派在类似情况下曾经成功实现宗教改革。

学习历史不是为了事后忘记它的教训。

去应用它们，或者想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事情会有所不同，这样永恒的真理历史不再适用。学习历史是为了能够将其教训运用到现在，而谁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不能假装是一位政治领袖。

事实上，他是一个相当肤浅的人，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自负的傻瓜，他的好意图不能弥补他的无能。

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人民领袖所展现的领导艺术包括集中人民的注意力去对付一个敌人，并且注意不发生任何将会分散这种注意力。

人民的斗争能量越是集中于一个目标，其磁力和它的打击力。天才的领导者必须有能力做出不同的对手似乎都属于同一类，因为在领导者的追随者很容易开始怀疑他们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如果他们面对多个敌人。

一旦动摇的群众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由不同派别组成的反对派，敌人团体，他们的客观意识就会被激发，他们会问，为什么所有的其他人可能犯错，但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运动是正确的。

这种感觉将是麻痹他们战斗力的第一步。

各种敌人被分成不同的小组，需要一起阻挡他们形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便大多数民众运动的追随者只看到一个他们必须对抗共同的敌人。

这种一致性增强了他们对自己事业正义性的信念，并增强了他们的感觉对对手抱有敌意。

泛德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领导人没有认识到那个道理，他们看清了目标，意图也正确，但是却走错了路。

他们的行为可以比作阿尔卑斯山登山者，他从不忘记自己要攀登的山峰。

想要达到目标，已经以最大的决心和精力出发，却没有注意到脚下的路。

他的眼睛总是盯着目标，他没有检查或注意上升的性质，最后他失败了。

泛德党的劲敌为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方式相当不同。它所采取的方式是明智和精明的，但它没有清晰地认识到目标。在泛德运动几乎失败的所有方面，基督教的政策社会主义党是正确的、系统的。

他们正确评价广大群众的重要性，强调从一开始就强调了运动的社会性质。通过特别向下层中产阶级和工匠，他们获得了忠诚、坚韧和自立的追随者。

牺牲。

基督教社会主义领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宗教机构发生任何争议，因此他们获得了天主教会这个强大组织的支持。领导人承认他们在大规模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培养精神其广大信徒的本能。

这个党未能实现拯救奥地利免于解体的梦想，必须归因于他们所采用的手段的两个主要缺

陷，以及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反犹太主义是基于宗教原则，而非种族原则。

这个错误的原因也导致了第二个错误。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认为，他们不能将自己的如果他们想拯救奥地利，他们就必须对种族原则采取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普遍的采取这样的政策可能很快会导致国家解体。

党的领导人认为，维也纳的局势要求所有可能影响应小心避免民族间相互疏远，所有导致要强调团结。

那时的维也纳充满了外国元素，尤其是捷克人，如果要将这些元素融入其中，就需要最大程度的宽容加入任何原则上不反德的政党的行列。

如果要拯救奥地利，这些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人们试图赢得支持小商人，其中大部分是捷克人，反对自由主义曼彻斯特学派。

领导人认为，通过采取这种态度，他们找到了一个反对犹太人的口号，由于其宗教含义，它将团结构成旧奥地利的人口。

然而，很明显，这种反犹太主义并没有给犹太人带来多大的困扰。如果最糟糕的情况是，几滴洗礼水就可以解决问题，于是犹太人仍然可以安全地继续他的生意，同时保留他的犹太实体。

基于这些肤浅的理由，不可能认真、全面地处理整个问题。

理性的方式。结果就是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种反犹太主义因此拒绝参加。

因此，这个想法的吸引力仅限于狭隘的圈子，因为领导者未能超越单纯的情感诉求，也没有将自己的立场建立在真正的合理的基础。

知识分子在原则上反对这种政策。看起来，整个运动是向犹太人传教的新尝试，或者，另一方面，好像它只是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与其他当代运动竞争。

因此，这场斗争失去了所有为精神和崇高使命而组织的痕迹。事实上，在一些人看来——这些人绝不是毫无价值的因素——是不道德的，应受谴责。这场运动未能唤醒人们的信念，即这里存在着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整个非犹太人的命运。

世界依赖。

通过这种犹豫不决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基督教的反犹太主义社会主义者被证明是相当无效的。它只是表面上反犹太的，比它根本没有反犹太主义的借口更糟糕，因为这种借口导致了虚假的那些相信敌人已被击退的人们的安全感，但作为事实上，这些人自己也被牵着鼻子走了。

犹太人很容易适应这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并发现它的持续存在更加对他来说，这比废除它更有利可图。

这种态度导致人们为了这个由许多异族人，但必须做出更大的牺牲德国元素的代表。

由于担心失去在维也纳获得的立足点，不可能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哈布斯堡王朝可能通过默默逃避民族主义的斗争而得到拯救。

问题，但正是这项政策导致该州走向毁灭。

同样的政策也导致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崩溃，因为该运动因此被剥夺了这是一个政党能够获得其内在动力的唯一能量源泉。

那些年我密切关注着这两个运动，观察它们是如何发展的，一个是因为我的心与它同在，另一个是因为我我对这位杰出人物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当时在我看来是整个德国的象征。

奥地利的人口。

当逝世市长的送葬队伍从市政厅蜿蜒而来时向环城大道走去，我站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观看庄严的游行队伍经过。

我站在那里，心里深受感动，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徒劳无功，因为险恶的命运正无情地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灭亡。

如果卡尔·鲁格博士生活在德国，他将被列为我们伟大领袖之一人民。他不得不生活在这种不可能的状态中，这对他自己和他的工作来说都是一种不幸。

当他去世时，火已经在巴尔干半岛燃起，并且逐月蔓延。

命运是仁慈的，没有让他看到他直到最后都希望避免看到的事情。

我努力分析导致这些行动徒劳无功，破坏了另一方的进步。这次调查的结果是深信，除了巩固其地位本身的不可能性之外，在旧奥地利状态下，双方都犯了如下致命错误。

泛德党关于民主共和体制目标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运动，这将带来德国的复兴，但不幸的是，它选择了方法。

它是民族主义的，但不幸的是，它太少关注社会问题，因此它没能赢得群众的支持。

然而，它的反犹政策是建立在对种族意义的正确认识之上的。

问题，而不是宗教原则，但这是一个错误，从战术角度来看是错误的对一个宗教派别发动战争。

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德国复兴的概念还很模糊，认为这是其但它作为一个政党，在选择执行其政策的手段时，是明智和幸运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理解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采取了错误的他们与犹太人的斗争中缺乏原则，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国家理念。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除了对广大群众的价值有敏锐的估计外，也正确地评估了种族问题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得到了泛民主派的正确理解）。

如果这个政党真的是民族主义者，或者泛德意志领袖们另一方面，除了正确处理犹太人问题和民族观念外，采取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实践立场，特别是他们的态度走向社会主义——那么一场运动将会发展起来，在我看来，这场运动甚至可能当时成功地改变了德国历史的进程。

如果事情没有如此发展，那么大部分错误都在于奥地利国家的性格。

我发现当时没有任何政党支持我的信念，因此我无法我自己也会加入任何现有的组织，成为其中的一员，甚至为他们的斗争提供援助。

即使在那时，所有这些组织在我看来都已经精疲力竭，因此无法带来真正深刻的、而非表面的民族复兴。

德国人民。

我内心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厌恶与日俱增。我越是特别关注外交政策问题，我越发确信，这个幻影国家将必将给德国人带来不幸。

我越来越意识到，德意志民族的命运无法被决定性地影响从这里开始，但仅限于德意志帝国内部。

这不仅适用于一般的政治问题，而且也同样适用于涉及整个文化生活领域。

在这里，在所有影响民族文化和艺术的问题上，奥地利国家也表现出衰老，或者至少对德国民族来说，它已经不再有任何影响，因为这些问题均值得关注。

尤其是建筑方面。现代建筑无法产生任何伟大的效果。

在奥地利，因为自从环城大街修建以来，建筑活动在维也纳至少与正在规划的进步计划相比，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德国。

我越来越过着所谓的双重生活。

理智和现实迫使我继续忍受在奥地利的艰苦但有益的经历，但我的心却在别处。



一种不满的感觉在我心中滋长，我越意识到内心就越沮丧。

这个国家的空虚和挽救它免于崩溃的不可能性。与此同时，我感到完全可以肯定它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各种不幸。

我确信哈布斯堡王朝会阻碍和阻挠每一个可能表现出真正伟大的标志，同时它会帮助和教唆每一项非德国的活动。

异族混杂的景象，是狄尔君主国的首都介绍，这个由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鲁塞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等组成的杂牌军人，总是那个杆菌是人类社会的溶剂，犹太人，到处都是——整个景象让我感到厌恶。这座巨大的城市似乎是种族的化身掺假。

我从小就说德语，这是下巴伐利亚。我永远忘不了那种特殊的说话方式，也永远学不会维也纳方言。

我在那座城市住得越久，我对那些外国混血儿的憎恨就越强烈。

那些已经开始在德国文化的古老苗圃中茁壮成长的民族。

国家能够长期维持存在是相当荒谬的。

那时的奥地利就像一幅古老的马赛克，其中的黏合剂已经干涸变老了。

易碎。只要这样的艺术品保持原样，它就可以保持完整并继续存在，但一击落下，便碎成了千万个碎片。

因此，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打击何时到来。

因为我的心始终与德意志帝国同在，而不是与奥地利君主制同在，奥地利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在我看来只是解放德意志民族。

所有这些考虑都更加强了，我渴望离开家乡，去往我心心念念的那个国家。

我从小就暗暗渴望。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实现我的作为一名建筑师，我可以把我的才能奉献给我的国家，或者规模很小，按照命运的意愿。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渴望成为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应该发起运动，其目的是实现我内心的我一直渴望，那就是我出生的国家和我们共同的祖国，德意志帝国。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种渴望为何如此强烈，但我呼吁尤其是对两类人。第一类人包括那些被剥夺了我所拥有的幸福的人第二个拥抱的是那些曾经享受过幸福，但后来却被剥夺了幸福的人。

他们的命运很悲惨。

我向所有被迫离开祖国、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人们致以敬意。

保护他们最神圣的遗产，他们的母语，他们受到迫害，因为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悲伤地渴望着有一天他们能被允许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向这些人讲这些话，我知道他们会理解的。只有那些有自己体验了身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却又被剥夺了属于他自己的权利祖国，才能体会到那场强制流放所引起的深深的怀念之情。

这是一种永久的心痛，直到家门前，没有欢乐和满足的地方他的祖先的尸体被剖开，所有那些血管里流着亲人血液的人都将找到安宁并在他们共同的帝国内安息。

维也纳对我来说是一所艰苦的学校，但它教会了我一生中最深刻的教训。我当我去那里生活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已经长成了一个严肃而沉思的性格。

在维也纳，我获得了普遍的世界观的基础，并培养了详细分析政治问题。当时形成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从未被废弃，尽管后来被扩建。直到现在我才能够充分欣赏那些年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珍贵。

我详细描述了这段时期，因为在维也纳，严酷的现实教会了我一个真理：现在已经形成了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五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成为从不起眼的起点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我不知道我对犹太人、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体上如果我没有在这样一个时代获得个人信仰，那么社会问题等等，今天就会变成这样。

自幼勤奋学习，并受命运的摆布。

虽然祖国的不幸也许激发了成千上万的人去思考崩溃的内在原因，无法导致如此彻底的知识 and 深刻的洞察力一个人必须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才能成长，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自己的命运。

#### 第四章：慕尼黑

1912 年春天，我终于去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很熟悉，仿佛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建筑界工作。这是因为我的建筑研究一直在不断地转变。

我对德国艺术之都的关注。

想要了解德国就必须了解慕尼黑，不去慕尼黑就不可能了解德国艺术。

总而言之，这场战前的旅行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光。

生活。我的收入微薄，但毕竟，我并不是为了绘画而活着。我画画以便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继续我的学业。

我坚信我最终能够实现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仅凭这个信念，我就足以承受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艰辛而不用太担心他们。

此外，几乎从我到那里的第一刻起，我就比以前更爱这座城市了。

我知道的任何其他地方。

“德国城市，”我对自己说。“和维也纳多么不同啊！”我有一种令我厌恶的是，我的想象力又回到了那个种族大杂烩。

这里的另一个令人愉快的特点是人们讲德语，这更接近我的比维也纳的习语更有自己的说话方式。慕尼黑的习语让我回想起我的青春岁月，尤其是当我与那些从下巴伐利亚来到慕尼黑的人交谈时。

我本能地喜欢上的东西，或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喜欢上的东西，有一千多种。

在我逗留期间，最吸引我的是当地民间能量与这座城市的优美艺术精神、宫廷啤酒屋和音乐厅之间独特的和谐、十月节、绘画陈列馆等我的心弦之所以缠绕着这座城市，而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地方世界可能是因为慕尼黑与发展密不可分，并将继续如此。

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事实上，从我待在这里的一开始，我就感到内心的快乐和满足是归因于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奇妙首都的魅力对于任何人来说，除了具有冷静计算的天赋之外，还具有对美的感觉。

除了我的专业工作之外，我最感兴趣的是研究当前的政治事件，特别是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内容。

我通过德国的联盟政策来处理这些问题，自从我在奥地利的时候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但在维也纳，我还没有完全看清德意志帝国在自我欺骗中不断进步。在维也纳，我倾向于假设，或者可能我说服自己这样做，以便原谅德国的错误在于，柏林当局可能知道他们的盟友是多么的软弱和不可靠事实证明，当面对现实时，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或多或少是神秘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愿公开发表对这一点的看法。

他们的想法是，他们应该支持俾斯麦发起的联盟政策，突然停止可能是不受欢迎的，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也可能引起那些等待机会的外国，或者可能惊动非利士人家。

我与这些人的接触很快让我惊恐地发现，我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消息灵通的圈子里，也没有人对暗示哈布斯堡王朝的真实特征。

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普遍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奥地利盟友是这种力量必须受到认真对待并在需要的时候“尽自己的一份力”。

大多数人仍然把二元君主制视为“德国”国家，相信它是可以信赖的。他们认为它的强度可以通过数百万国民，就像德国的情况一样。

首先，他们没有意识到奥地利已不再是德国的一个国家；其次，奥地利帝国的现状正将其推向灾难。

当时我比专业人士更了解奥地利国家的情况外交官们。这些外交官们几乎总是蒙着眼睛，跌跌撞撞地走向灾难。

民众中流行的观点只是从而这些上级在“盟友”面前卑躬屈膝，就像古人向他们鞠躬一样。金牛犊前。

他们可能认为，通过礼貌和友善，他们可以弥补诚实的缺失。

另一方，同时，他们也对每一项声明都深信不疑。

即使在维也纳，我也曾一次又一次地被演讲之间的差异所困扰官方政治家和维也纳媒体的内容，但维也纳仍然是德国的这座城市，至少从外观上看是如此。

但离开维也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奥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并进入斯拉夫省。只需浏览布拉格报纸看看三国同盟的整个崇高骗局在那里是如何受到审判的。

在布拉格，人们对这位政治家的杰作只有嘲笑和冷笑。即使在和平的时代，两位皇帝互相亲吻额头以示友谊，这些文件没有掩饰他们的信念，即联盟将在第一次试图把它从尼伯龙根理想的闪亮高度拉低到根源现实。

几年后，当联盟首次面临实际考验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

意大利不仅退出了三国同盟，还让其他两个成员国各自独立但她甚至加入了他们的敌人。

任何人都应该相信，哪怕是一瞬间，意大利这样的奇迹也可能发生与奥地利并肩作战，对于任何没有遭受过这种痛苦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官方外交的盲目性。

在奥地利，只有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奥王朝支持该联盟。哈布斯堡王朝所以这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精明计算以及必要性。

德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善意和政治上的无知。他们出于善意行事，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建立三国同盟，他们为德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帮助加强帝国并巩固其防御。

然而，他们持有这样的想法，却显示出了政治上的无知，因为他们不但不能帮助德意志帝国，他们实际上把它拴在一个垂死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可能会把它的同伙拖入坟墓本身。

最重要的是，通过支持这一联盟，他们越来越成为哈布斯堡王朝解散政策的牺牲品。

德国化，因为这一联盟让哈布斯堡王朝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赖希不会干涉他们的内政，

因此他们能够从而更加轻松、风险更小地实施逐步消除德国的国内政策元素。

不仅可以指望德国政府的“客观性”，因此也不需要不必担心来自那个方面的抗议，但人们总是可以提醒德裔奥地利人联盟，从而让那些肯定会反对的人闭嘴，如果斯拉夫化进程变得过于激烈。当德意志帝国本身已经公开宣布信任和有信心哈布斯堡王朝？如果他们反抗，从而在帝国的同胞面前被公开打上叛徒的烙印，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几十年来为了德国传统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一旦德国人在奥地利的影响力被消除，那么联盟？如果三国同盟对德国有利，那么它不是必要的吗？条件是保持德国元素在奥地利的优势？或者有人真的相信德国可以继续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盟友吗？屠杀者的霸权？德国外交官以及公众对内部影响奥地利各民族的问题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疯狂的。

他们以同盟为坚实基础，为未来生存奠定了基础。

七千万，同时，他们允许他们的伙伴继续他的政策年复一年，有条不紊地、坚决地破坏这一联盟的唯一基础。

终有一天，一切将只剩下与维也纳外交官的正式合同。

联盟本身作为一种有效的支持，将会失去对德国的支持。就意大利而言，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德国人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历史和民族心理，就不会他们中有人甚至会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相信奎里纳尔宫和维也纳霍夫堡宫能够永远在共同的战线上并肩作战。

如果意大利政府胆敢派遣一名意大利人前往，意大利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意大利人如此狂热地憎恨哈布斯堡王朝，以至于他们不可能在战场上相遇，除非作为敌人。

我在维也纳不止一次目睹了对西方的蔑视和深切仇恨的爆发。

这使得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结盟”。

哈布斯堡王朝对意大利自由和独立犯下的罪行几个世纪以来所犯下的罪行太过严重，即使怀有善意，也无法原谅，但是无论是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政府中，这种善意都不存在。

因此，意大利与奥地利的共存只有两种方式：结盟或战争。选择完成了第一项后，我们就可以从容地准备第二项了。

尤其是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关系越来越倾向于仲裁战争中，德国的联盟政策既愚蠢又危险。这是典型的缺乏广泛或逻辑思维的例子。

建立联盟？这不可能不是出于确保帝国未来的愿望。

比单纯依赖自身资源所能达到的效果要好。

但帝国的未来只能意味着确保德国人民的生存手段。因此，必须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问题。

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内，国家的生活将呈现什么样的形式？我们能预测吗？而这种发展的必要基础和保障又如何能实现呢？在欧洲权力普遍分配的框架内得到保障国家？对德国国家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原则的清晰分析应该得出以下结论：德国人口每年的增长几乎有九十万灵魂。为这支新军队提供食物的困难公民必须逐年增长，最终导致灾难，除非有方法和手段可以预防苦难和饥饿的危险。

有四种方法可以预防这种可怕的灾难：（1）可以采取步骤和人为地限制出生数量，从而避免人口过剩。

在某些情况下，在困难时期或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或者土壤屈服回报太少，大自然本身往往会抑制一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在某些种族中，她会用一种既残酷又明智的方法。她不会阻止生殖能力本身；但通过将其置于这样的除了最强壮和最健康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被迫退回到未知。

凡是能熬过这些艰难困苦的东西，都经过了考验和尝试千倍地，硬化和渲染，适合继续生殖过程，以便相同的选择过程将重新开始。

通过这样残酷地对待这个人，并在他表明自己是不适合生活的考验，大自然保存了这个种族和物种，并把它提升到最高效率程度。

因此，人数的减少意味着个人力量的增强而这最终意味着物种的振兴。

当人类自己开始进行数量限制时，情况就不同了。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界一样，他是“人”。他比无情的智慧女王更懂得很多；他并不妨碍个体的生存，但却阻碍了繁衍本身。对于总是只看到自己而不看到种族的人来说，这种行动方式似乎更这样做是出于人道和正义，但不幸的是，其后果也恰恰相反。

通过放任生育过程不受控制，并让个人承受最艰难的生命预备测试，大自然从丰富的单一元素和印记中挑选出最好的使它们适合生存并继续进行该物种的保护。

人类限制生殖能力，并顽固地努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命。

一旦诞生。

他认为，这种对神意的修正是明智和人道的，他很高兴至少在一场比赛中胜过了大自然的牌，从而证明她并不完全可靠。

这个由全能者创造的小“杰作”不喜欢别人告诉他，尽管他已经成功地限制了数量，但他的体系却导致个人素质的下降，因为，一旦生育能力受到阻碍，生育数量减少，自然生存斗争，只有健康强壮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被一种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虚弱甚至患病的生物。

这样，人类后代的种子就被种下了，而这些种子将变得越来越虚弱。

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只要自然的意志被蔑视。如果这项政策得以实施，最终的结果永远是这样的民族最终会在这个地球上终结自己的存在；因为，尽管人类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违背永恒的生育法则，但报复迟早会随之而来之后。

更强大的种族将取代那些已经变得虚弱的种族，因为生命力的终极形式将打破一切荒谬的锁链，即所谓的对个人和意志的人道主义关怀用自然的人性来代替它，它消灭弱者，为强者腾出空间。

强的。

任何旨在通过限制生育率来确保德意志民族生存的政策剥夺了它的未来。

（2）第二种解决方案是内部殖民。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听到它受到很多赞扬。

这是一个善意的建议，但却被大多数人误解，因此它成为了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土壤生产力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但只能在明确的限制，而不是无限期的。

通过提高土壤的生产能力，可以平衡过剩的影响在德国，出生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而不会引发饥荒。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总体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甚至比出生率的增长速度还要快。

我们对食物和衣服的需求逐年增长，而且远远超出了与我们一百年前的祖先一样。

因此，认为土壤生产力的每一次提高为人口增长提供必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至少土壤增加的产量的一部分将被消耗用于供应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需求增加。

但即使这些要求被限制到尽可能小的限度，同时那时，我们用尽一切力量进行精耕细作，我们就能达到明确的限度，是由土壤本身的固有性质决定的。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工作，我们无法增加农业生产超出这个限度。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推迟苦恼持续一段时间，最终总会到来。

第一个现象是饥荒会时不时地重复发生，在收成不好之后，等等。随着人口的增加，饥荒的间隔将越来越短。

饥荒时期只会在那些罕见的丰收年才会消失，那时粮仓满盈。

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即使在那些富裕的年份，也没有足够的食物饥饿将伴随国家的脚步。大自然现在必须再次介入，选择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否则人类将通过人为地阻止自己的后代来帮助自己。

增加，给种族和物种带来所有致命的后果，这些后果已经提及。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无论以何种形式，这种未来都是全人类的，而且个别国家或种族无法逃脱普遍的命运。乍一看，这种反对意见似乎合乎逻辑足够了；但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点。有一天肯定会有整个人类将被迫抑制人类物种的扩增，因为没有进一步有可能调节土壤的生产力以适应人口的不断增长。

那么，就必须让大自然使用她自己的方法，否则人类可能会把监管任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通过采用比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更好的手段。

到那时，这将成为全人类的问题，而现在只有那些种族必须遭受贫困，不再有力量和勇气获得足够的土地来提供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地球上仍有大片土地未开垦。

地球。

那些空间只等待着犁头的耕耘，大自然肯定没有设定这些领土作为任何一个国家或种族的专属财产，保留给未来。这样的土地等待着那些有能力获得它并勤奋耕种的人它。

大自然不分政治边界。她首先在这个地球上建立生命，然后观察力量的自由发挥。那些表现出最大勇气和勤奋的人是离她最近的孩子心，他们将被赋予生存的主权。

如果一个国家只局限于“内部殖民”，而其他种族却在不断增加其领土遍布全球，该国将被迫限制其人口数量在其他国家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印度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

这种情况最终必定会出现，而且很快就会出现，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的领土处理量很小。现在不幸的是，最好的国家——或者说，更确切地说，唯一真正有文化的民族，同时也是人类进步——在盲目的和平主义中，决定不去获得新的领土并满足于“内部殖民化”。

与此同时，素质较差的国家也成功地占领了大片土地，并开始殖民。

在全球范围内。

这种状况的最终结果是，文化优越但智力较差的种族无情的将被迫限制其增长，因为没有足够的领土来支持人口，而文明程度较低的种族由于其领土辽阔，人口可以无限增长。

处理。

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世界终有一天会被这种人类中有些部分在文化上比较低下，但是却更加活跃、更有活力。

将来，虽然还很遥远，但终有一天，我们只能选择两种方式——要么世界将按照我们现代的民主观念来统治，然后每一个决定都将支持人数较多的种族；否则世界将受自然法则的支配。

权力的分配，然后那些意志更残暴的国家将获得胜利，他们不会是那些实行自我否定的国家。

没有人会怀疑，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成为可怕的生存斗争的舞台。

人类的一部分。最终，只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才能取得胜利；在它吞噬人类之前点燃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它只意味着愚蠢的胆怯和自我自负，也会像雪一样在三月的阳光下融化。

人类通过不断的奋斗而变得伟大。在永久的和平中，人类的伟大必将衰落。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内部殖民”的口号是致命的，因为它鼓励人们相信我们发现了一种符合我们与生俱来的和平主义的方法，它将使我们过着昏昏欲睡的生活来维持生计。

一旦这种教义被我们的人民认真对待，就意味着一切努力的终结为自己赢得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如果普通德国人曾经相信，通过这项措施，他有机会确保他的生计，保证他的未来，任何试图采取积极的、因而有利可图的为维护国家切身利益而做出的努力将是不可能的。

如果国家同意这种态度，那么任何真正有用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被视为葬于我们心中，与德国人民未来的一切希望同在。

一旦我们知道这种“内部殖民化”的后果理论是，我们不能再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的事实

在那些向我们的人民灌输这种有害的理论，犹太人总是排在第一位。

他太了解他的观众了，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成为每一次感恩的受害者。

骗子承诺以一项发现的形式给他们一笔财富，使他们能够战胜自然，从而使艰苦和无情的生存斗争变得多余，最终他们可能成为地球的主人，一部分是靠纯粹的懒惰，一部分是通过劳动，正如事实一样。

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德国“内部首先，殖民化必须被认为只适合于缓解社会不满，并且在特别是将土地从投机者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但这样的制度永远不可能足以保证国家的未来无需获取新的领土。

如果我们采取不同的计划，我们很快就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我们的土地资源将无法不再被剥削，同时我们将达到一个点，超过这个点，我们的人力将无法发展。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两个因素，即限制在绝对小的区域内部殖民化和生育限制是必然的这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对一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国家领土范围是国家外部安全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民族所拥有的领土越大，其国防就越强人们。

军事胜利更加迅速、更加容易、更加彻底、更加有效针对占领面积有限的国家领土的人民，而不是针对拥有广阔的领土。

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土大小本身就是一种保证，可以确保一个外部大国不会贸然冒险入侵因为那样的话，斗争将是一场长期的在取得胜利之前，我们必须精疲力竭。

风险如此之大，如此激进的行动必定有特殊原因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土大小为国家行为提供了基础。

自由和独立可以相对容易地维持；相反，一个国家如果领土狭小对入侵者来说有着天然的诱惑。

事实上，德意志帝国的所谓民族圈子拒绝了前两种可能性在人口不断增长和国家稳定之间建立平衡领土没有按比例扩大。

但拒绝的理由与我刚才阐述的理由不同。

主要是基于某些道德上的反对，限制生育率才受到谴责。

内部殖民的提议被愤怒地拒绝了，因为人们怀疑这样的这项政策可能意味着对大地主的攻击，而这种攻击可能是一场对整个私有财产原则的普遍攻击。

后一种解决方案——内部殖民化——被推荐的形式证明了这些疑虑。一般来说，拒绝这项提议的方式不善于处理对大多数人的影响，而且无论如何，它并没有到达根本就没有问题的根源。

只剩下两条路可以保证不断增长的人口有工作有面包吃。

人口。

（3）有可能考虑获取新的领土，其中一部分日益增长的每年都可以稳定人口，从而使国家保持自给自足的地位支持。

（4）我们的工商业本来可以这样组织起来，确保从而能够通过增加出口来支持我们的人民在国外市场所获得的利润。

因此，问题是：领土扩张政策还是殖民和商业政策？这两项政策都曾被各界考虑、审查、推荐，但均被拒绝。

最终，第二种方案被采纳。更为合理的方案是但毫无疑问是第一个。

获取新领土，以便安置过剩人口的原则有很多推荐它有其优势，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未来而不是现在。

首先，不能过分重视采取一项政策的必要性这将使我们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农民阶级作为国家的基础社区。我们目前的许多弊端完全源于城市和农村人口。

坚实的小农户基础从来都是一个国家可以对抗当今流行的社会疾病。而且，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它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框架内保证一个国家每日的食粮。

一旦保证了这一点，工业和商业就会退出不健康的他们今天所处的重要地位，将在国民经济的总体布局，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

这样，工业和商业就不再是国家生存的基础，而是将成为辅助机构。通过履行其应有的职能，即调节平衡在国家生产和国家消费之间，它们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国家生存不受外国的束缚从而保证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特别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然而，这种领土政策无法在喀麦隆实施，而是几乎完全在欧洲，我们必须冷静而坦然地面对这一事实：它当然不能成为上帝赐予我们国家 50 倍的土地，这个世界比另一个世界更糟糕。

在考虑当今的状况时，我们不能让现有的政治边界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根据永恒正义的原则这些边界应该存在。

如果地球上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供所有人使用，那么我们就应该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土壤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当然没有人会准备这样做。

此时，自我保护权开始生效，当试图解决困难时以友好的方式被拒绝，握紧拳头必须用武力夺取被拒绝的东西张开友谊之手。

如果我们的祖先在过去也像我们一样，基于和平主义的胡言乱语做出政治决定，按照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解，我们不应该占有超过我们国家领土的三分之一。

或许，德意志民族就不再需要担心其在欧洲的未来了。

帝国东部两个省份的归属，归功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的祖先在为生存而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决心，因此，政策，我们拥有基于政治和种族程度的内在力量领土，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得以生存至今。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解决方案是正确的。许多当代欧洲国家都金字塔矗立在它们的顶端。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欧洲领土是荒谬的与它们的殖民地、对外贸易等巨大的负担相比，这些负担微不足道。

可以说，他们在欧洲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在世界各地处于金字塔的底部。

与美国不同，美国以美洲大陆为基地，只能通过其顶点才能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无与伦比的内在力量才得以诞生而相反的情况则是造成大多数欧洲殖民国家衰弱的原因。

不能拿英国来反驳这一论断，因为面对英国帝国，人们倾向于忽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本身的存在。

英国的地位无法与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因为美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语言和文化共同体。因此，德国实施健全的领土政策的唯一可能性是扩张的目的在于获得欧洲本土的新领土。殖民地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只要它们不适合欧洲人大规模定居。

在十九世纪，已经不可能再通过和平手段获得这样的殖民地。

因此，任何此类殖民扩张的尝试都意味着庞大的军事因此，更为实际的做法是进行军事斗争，以争取新的在欧洲的领土，而不是为了获取海外财产而发动战争。

这样的决定自然需要国家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

这种政策需要所有人竭尽全力才能实现不能半途而废、犹豫不决地去实施。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活动应该完全针对这一点目标。不应出于与目标无关的任何其他考虑而采取任何政治步骤。

这项任务以及完成这项任务的方法。

德国应该意识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战争的前景也应该以冷静和坚定的决心去面对。整个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设想和评价联盟体系。

如果要在欧洲获取新的领土，那么主要代价可能是俄罗斯的损失，新的德意志帝国本应再



次独自踏上与过去相同的道路以前条顿骑士团曾践踏过这些土地，以便用这种方法获得德国犁的土壤。

德国剑，从而为国家提供日常食粮。

然而，对于这样的政策，欧洲只有一个可能的盟友，那就是英国。

只有与英国结盟，才有可能保卫新德国的后方十字军东征。进行这样一场战役的理由并不亚于我们的先辈踏上征程的理由。

我们的和平主义者没有一个人拒绝吃用东部省份种植的谷物制成的面包，然而，那里的第一次耕作是用剑进行的。不应该考虑牺牲如果这是赢得英国友谊的必要手段，那就太好了。殖民和海军野心本应被放弃，不应做出这样的尝试与英国工业竞争。只有明确而明确的政策才能实现这样的成就。

这样的政策将要求放弃世界贸易、殖民意图和海军权力。国家掌握的所有权力手段都应该集中在陆上军事力量。这项政策将涉及一段暂时的自我克制，因为为了伟大而强大的未来。

有一段时间，英国可能基于以下理由与我们进行谈判：提议，因为英国应该很清楚，由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增加迫使德国要么在英国的帮助下在欧洲寻找解决方案或者，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在世界其他地方。

这种观点可能是英国试图与德国走得更近的主要原因。

世纪末。德国首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态度，后来以一种最悲惨的方式展现出来。

人们表达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们可能不得不这样做英国的肮脏勾当，仿佛联盟可以建立在除了相互给予和索取之外的任何其他基础上！英国外交官们仍然足够聪明，知道在对所提供的任何服务给予回报。

假设 1904 年，我们的德国外交政策管理得足够精明，使我们能够发挥日本所发挥的作用。很难衡量可能产生的成果有多大德国正是通过这样的政策才取得了成功。

就不会有世界大战。

1904 年流失的冰量还不到 1918 年流失冰量的十分之一，而且德国将在当今世界占据一席之地！无论如何，与奥地利的联盟将荒谬的是，这个木乃伊般的国家没有依附于德国，目的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维持一种永久的和平状态，这本来是目的是缓慢但持续地消灭双重军事力量中的德国因素君主制。

无法形成这一联盟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人能指望这个国家积极参与捍卫德国国家利益，只要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结束超出其自身范围的去德国化政策边界。

如果德国没有被足够强大的民族情绪所推动，也没有被足够残忍地剥夺了哈布斯堡王朝决定数百万人命运的权利和德国人属于同一国籍的居民，肯定是出于没有人会指望她能从事任何有远见和勇气的事业。

旧帝国对奥地利问题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其为整个民族的命运而斗争的毅力。

无论如何，奥地利对德国人民的压迫政策不应该允许继续下去，并逐年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奥地利作为盟友的价值完全依赖于该国德国元素的保留。

但这一方针并没有被采纳。人们最担心的就是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但最终，在最不利的时刻，冲突不得不面对。德国认为她挣脱了命运的绳索，但命运却牢牢地抓住了她。她梦想着维持一个世界和平，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世界大战之中。

和平的梦想是上述第三种选择最重要的原因。

德国未来的发展甚至没有被考虑。人们认识到新的领土只能在欧洲东部获得，但这意味着会发生战斗而德国则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

德国外交政策的口号已经从“保卫德意志民族”变为成本”变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世界和平”。

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

我以后会继续详细讨论这一点。还有另一种选择，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个，即工业和世界贸易、海军力量和殖民地。

这种发展当然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实现。

领土扩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常要延续几个世纪。然而，这一事实是其内部力量；因为它不是通过突然爆发的热情才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一个与工业进步截然不同的渐进而持久的增长过程，可以几年内就会人为地加速。

然而，这样取得的结果并不是持久的，而是像肥皂泡一样脆弱的东西。它快速建造一支舰队比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容易得多，即用农民和建立农庄，但前者也比后者更快地被摧毁。在采取这样的方针时，德国一定知道，如果继续这样做，必然意味着战争迟早会到来。只有孩子们才会相信友谊和坚持不懈的和平意愿可以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成功“国家之间的友好竞争”，无需为之而战。

一旦我们走上这条道路，英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必定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当然，与我们天真的假设完全吻合，但对以下事实感到愤慨却是荒谬的：有一天，英国人竟然用残暴的手段来反对我们的和平渗透暴力利己主义者。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

如果欧洲针对俄罗斯的领土扩张政策只有在如果我们英国作为我们的盟友，那么殖民和世界贸易政策可能会这项计划仅在违背英国利益和俄罗斯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实施。

但当时应该充分意识到这项政策的所有后果。

最重要的是，应该尽快抛弃奥地利。

到本世纪末，与奥地利的联盟从各方面来看都已成为一种荒谬之举观点，但没有人想到与俄罗斯结盟对抗英国，就像没有人想到与俄罗斯结盟对抗英国一样考虑让英国成为对抗俄罗斯的盟友，因为无论哪种情况，最终结果都将不可避免地一直存在战争，而避免战争正是制定商业和工业政策的原因。

已决定。

人们认为，通过商业手段和平征服世界提供了一种方法这将永久取代武力政策。

然而，偶尔也会有人对这一原则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尤其是当一些英国时不时发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警告。这就是为什么舰队的建造并不是为了攻击或消灭英国，而只是为了捍卫上述世界和平的理念，也捍卫征服的原则用‘和平’的方式对待世界。

因此，这支舰队被限制在比英国舰队弱的范围内，不仅因为不仅要考虑舰船的数量和吨位还要考虑其装备，其目的是提供和平意图的新证据。

关于通过商业手段和平征服世界的讨论可能是这些完全无意义的东西从来没有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当英国被指出是典型例子时，这种胡说八道就变得更加愚蠢了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对历史的智识态度和我们的教授观念这一领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并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证据，证明了人们如何“学习”历史却不理解其中任何一点。

事实上，英国应该被视为反对和平征服世界的理论。没有一个国家为其比英国更残酷地用武力进行商业征服，没有其他国家像英国一样更加无情地捍卫这些征服成果。

知道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来获得经济优势，反过来，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政治权力？相信英国没有勇气摆脱自己的为了经济扩张而流血！英国没有国家军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重要的不是当时的实际军事结构，而是我们有意愿和决心使用一切可用的军事力量。

英国一直拥有她所需要的武器。她一直用这些武器战斗这些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她派遣雇佣兵参战，只要雇佣兵足够了，但她从不犹豫地从整个国家最优秀的血液中汲取力量只有通过这样的牺牲才能取得胜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战斗精神都是顽强的决心和使用残酷手段进行军事行动一直是相同的。

但在德国，通过学校、报刊和漫画报纸等媒介，逐渐形成了英国人的概念，在更大程度上，

形成了他的帝国的概念，这种概念必然最终导致最糟糕的自我欺骗。

这种荒谬的言论缓慢而持续地蔓延到德国民族的每一个角落。结果我们不得不为这种低估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种错觉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这位英国人被视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但同时，又是一个身体上的懦夫。

不幸的是，我们睿智的历史老师们没有意识到，建立这样的像大英帝国这样强大的组织，仅仅靠欺骗和欺诈就无法实现。少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对此事实的回应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噤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当他们第一次在佛兰德斯与英国士兵面对面时，他们感到自己是同志。

经过几天的战斗，我们的士兵慢慢意识到，那些苏格兰人不像我们在漫画报纸上看到描述和讽刺的，也不像在公报。

正是在那时，我首次对各种宣传形式的有效性形成了想法。

然而，这种捏造却满足了那些对此负责的人的目的。这幅漫画英国人的说法虽然是错误的，但可以用来证明征服世界的可能性，通过商业手段和平解决。

英国人成功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成功。我们更诚实，我们的摆脱英国特有的“背信弃义”将是我们的优势。因此希望小国的同情和大国的信任能够更容易获得。

因为我们自己相信它，所以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诚实是一个深刻的对象厌恶他人。世界上其他人把我们的行为视为一种狡猾的欺骗，直到革命来临，他们才惊讶于更深层次的它让他们洞察我们的心态，这种洞察甚至超越了愚蠢的限度。

一旦我们理解了和平征服世界的荒谬观念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另一个荒谬的现象——三国同盟——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可以与哪个国家结盟呢？与奥地利结盟后，我们无法用军事手段获取新的领土，即使是在欧洲，而且这一事实正是三国同盟内部软弱的真正原因。俾斯麦可以允许自己这样临时凑合，但他那些笨手笨脚的继任者肯定不会允许，尤其是当他们建立三国同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在俾斯麦时代，奥地利仍然可以被视为德国的一个国家，但逐渐普选权的引入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议会巴别塔，德语声音几乎听不见。

从种族政策的角度来看，与奥地利的联盟简直是灾难性的。一个新的斯拉夫大国被允许在接近德意志帝国边境的地方发展壮大。

后来这个大国必然会对德国采取与俄罗斯不同的态度，例如。因此，联盟必然会变得更加空洞和虚弱，因为其唯一的支持者正在失去影响力，并被系统地排挤出更重要的公职。

大约在 1900 年，与奥地利的联盟已经进入了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结盟。

在这里，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站在哈布斯堡王朝一边，要么抗议德国人在奥地利的压迫。但一般来说，当采取这种做法时，最终必然会导致公开冲突。

从心理角度来看，三国同盟的价值也很小，因为如果同盟的目的仅限于保卫现状。

另一方面，联盟的各方希望越多，联盟的力量就越强大将其作为实现某些实际扩张目标的手段。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力量不在于防守，而在于进攻。

这一事实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但不幸的是，那些被要求统治世界的人却不认可。

早在 1912 年，当时还是上校、隶属于总参谋部的鲁登道夫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了联盟的这些弱点，但当然“政治家”不重视或不重视该文件。

总的来说，常识似乎是一种只存在于普通人，但当我们谈到那个被称为被称为“外交官”。1914 年战争的爆发直接原因是奥地利，这对德国来说是幸运的，因为这样哈布斯堡王朝被迫参与。如果情况逆转，德国将会依靠自己的力量。

哈布斯堡王朝永远不会准备好或愿意参加战争，因为德国对此负有责任。

后来在意大利引起如此多谩骂的事情，如果早些时候，就奥地利的情况而言。

换句话说，如果德国因为自身原因而被迫参战，奥地利将保持“中立”，以保护国家免遭可能发生的革命。

战争开始后立即开始。

斯拉夫分子宁愿在 1914 年摧毁二元君主制，也不愿允许它向德国提供援助，但当时只有少数人明白与多瑙河王国结盟所导致的危险和困难。

首先，奥地利有太多的敌人，他们热切地希望获得继承了那个衰败国家的遗产，并逐渐对德国产生了某种敌意，因为德国阻碍了他们的愿望，因为她阻止了二元君主制维也纳分崩离析，各方都希望看到这一幕。人们坚信维也纳只能经由柏林到达。

其次，通过采取这一政策，德国失去了实现其他联盟。现在人们发现，与这些可能性相比，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与俄罗斯，甚至意大利，尽管罗马的总体态度是对德国有利，对奥地利不利——这种敌意潜伏在个人意大利语，有时还会剧烈爆发。

由于已经采取了商业和工业政策，因此不再有发动战争的动机反对俄罗斯。只有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敌人才能在这些情况下，对这样的战争有积极的兴趣。事实上，只有犹太人和试图挑起两国间仇恨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该联盟对德国安全构成了永久威胁，因为任何大国对俾斯麦帝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可以动员许多其他国家参与战争通过牺牲奥地利盟友的利益，向德国许诺诱人的战利品。

这有可能激起整个东欧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反抗。

在爱德华国王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世界联盟永远不可能如果德国的盟友奥地利没有提供如此诱人的战利品前景，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成为现实。

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得如此多不同国家能够联合起来不同的利益汇聚成一个共同的攻击阵线。每个成员都希望自己致富如果他加入对德国的总攻，那么奥地利将蒙受损失。

土耳其也是与奥地利不幸结盟的默许一方，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的危险达到了极大程度。

犹太国际金融需要奥地利传统的诱饵来实现其计划摧毁德国，因为德国还没有屈服于他们的普遍和国际控制。

贸易和金融领域。

这样就有可能巩固这个联盟，使它足够强大和勇敢，通过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与“有角的”齐格飞展开冲突。

我在奥地利时就厌恶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结盟，而这种结盟是这让我深感忧虑，并促使我如此坚持地思考这个问题，以至于我坚定地我以前形成的观点。

在当时与我交往的少数人中，我并不掩饰我的信念，即与一个注定要崩溃的国家达成的邪恶协议也会给德国带来灾难，如果她没有及时挣脱。

即使在世界大战的风暴中，我也没有一刻动摇过这一坚定的信念似乎已经摧毁了推理能力本身，并把盲目的热情投入到推理能力中。

即使在那些最冷静、最客观的思考本应占据的圈子里，摇摆。

在战壕里，每当遇到这些问题时，我都会表达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我认为放弃哈布斯堡王朝不会带来任何牺牲，如果德国从而减少自己的敌人数量，因为数百万德国人已经钢盔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维护腐败的王朝，而是为了为了拯救德国人民。

战前，有几次人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德国人公众对与奥地利结盟的政治智慧有些疑虑。从时间德国保守派圈子时不时发出警告，不要对那个联盟；但是，就像当时提出的所有其他明智的建议一样，它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人们普遍认为，已经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来“征服”世界，这些措施将带来巨大的成功，而

牺牲却微不足道。

再次，‘未入门’的门外汉只能旁观，而‘选民’则前往引诱他们所爱的人跟随他们，就像老鼠跟随花衣魔笛手一样哈默林。

如果我们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人们会把这种荒谬的通过商业渗透来和平征服世界的想法，并问它是如何实现的有可能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一个国家目标，我们会发现这些其根源在于德国政治思想的普遍病态。

德国技术科学的胜利进步和德国的工业和商业让我们忘记了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成功的先决条件。

相反，某些圈子甚至宣扬国家应有其这些现象的存在；它首先是一个经济机构，应该按照经济利益构成。

因此，有人认为，国家依赖于经济结构。这种情况被视为最健全、最正常的，并受到推崇。现在，事实是，国家本身与一定的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概念或明确的经济。它不是来自双方之间达成的契约。

缔约方在一定划定的领土内，为实现经济目的而进行的贸易。

国家是由具有相似的物质和精神性质的生物组成的共同体，组织起来以确保其同类的保护并实现上帝已将之分配给那个特定的种族或种族分支。

国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也唯有在此。

经济活动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许多辅助手段之一目标。但经济活动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起源或目的，除非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虚假和非自然的基础之上的。

仅此一点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某个划定的领土作为其基础的条件。这一条件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成为必要先决条件：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和保障亲属生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准备通过自己的劳动，继续进行生存的斗争。

像寄生虫一样潜入其他国家怀抱，让其他国家以各种借口为他们工作，可以建立一个国家而不需要拥有任何明确的界限。

领土。

这主要适用于寄生种族，特别是目前，它们捕食人类中诚实的一部分；我指的是犹太人。

犹太国家从未在空间上被划定过。它遍布世界各地，没有任何边界，并且始终由一个种族的成员组成。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总是在国中建立国家。最巧妙的伎俩之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计划就是让犹太国家之船在宗教旗帜下航行，从而确保雅利安人始终愿意给予不同宗教信仰的宽容。

摩西律法其实就是保护犹太民族，因此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科学，与所要探讨的主要目的有关。

保护自己物种的本能是导致人类社会的形成。因此，国家是一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经济组织。

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我们当代所谓的“政治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相信国家可以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事实是它始终源于那些品质的发挥，这些品质是维护该物种结束了这场竞赛。

这些品质始终存在，并通过英雄美德发挥作用，与商业利己主义，因为物种的保护总是以个体为前提准备牺牲自己。

诗人这句诗的寓意如下：并且生活不再存在，生活也不再存在。（如果你不下注你的生命你永远无法为自己赢得生命。）牺牲个人的存在是必要的以确保种族的保存。因此，这是建立和维护一个国家是一种团结的感觉，这种感觉植根于国家认同。

性格和种族，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们。

对于生活在自己领土上的人们来说，这将导致英雄美德的发展；对于寄生的民族来说，它

会发展成为虚伪和背信弃义的残忍，除非我们承认这些特征是天生的，寄生种族通过各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先天特质的外在表现。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形成只能是英雄主义的表现我提到的品质，以及在生存斗争中失败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成为附庸，并因此注定迟早会完全消失的人，是那些没有在斗争中表现出英雄美德的人，或者那些成为背信弃义的牺牲品的人寄生虫。

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失败的原因也不在于缺乏智力，而在于缺乏勇气和决心，试图伪装成人道情感。

为建立和维护一个国家而采用的品质，相应地与贸易和工业几乎没有关系，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内在实力很少与所谓的经济扩张相一致。

相反，有许多例子表明，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意味着一个国家即将衰落。如果正确地将人类的基础归因于社区向经济力量转变，那么国家权力本身就会达到最高点在经济繁荣时期情况并非如此。

尤其难以理解的是，国家是如何产生和保存下来的依靠经济力量，在一个在各个方面都给出相反证据的国家，其历史的一个阶段。

普鲁士的历史特别清楚和明确地表明，这是道德的结果，一个国家能否成立取决于人民的美德，而不是经济状况。只有在保护这些美德，经济活动才能发展，经济活动才能继续繁荣昌盛，直到政治创造能力衰退为止。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结构也会崩溃，这种现象现在正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人类的物质利益只能在阴影中繁荣发展。

英雄美德；一旦它们成为生活的首要考虑，它们就摧毁了他们自己的存在。

每当德国的政治力量特别强大时，经济形势也会改善，但每当经济利益单独占据了人们生活的首要位置时人民，将理想置于次要地位，国家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创造和创造事物所必需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维护一个国家，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国家的能力和准备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些特质与经济毫无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简单的公式来证明：人不会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换句话说，他会为理想而死，但对于企业来说却并非如此。

英国人拥有的非凡的公众心理学天赋，在以下方面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们在世界大战中陈述观点的方式。我们为面包而战；但英国人宣称他们是为了“自由”而战，甚至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但是为了小国的自由。

德国人嘲笑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并为此感到愤怒，但他们这样做表明在我们所谓的驻德国外交官中，政治思想已经衰落，甚至在战争。这些外交家们对这种力量毫无概念，这种力量使人们面对自愿并决定的死亡。

只要德国人民继续相信他们在二战中是为了理想而战 1914 年，他们坚定不移。当他们被告知，他们只是为了日常面包而战时他们开始放弃挣扎。

我们聪明的“政治家”对这种情绪的转变大为惊讶。

他们从来不明白，一旦人们被要求为纯粹的物质原因而斗争，他会尽量避免死亡，因为死亡和享受胜利的物质果实是非常不相容的概念。

当自己的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最脆弱的女人也会成为英雄，只有意志拯救他们的种族和祖国，或者保护他们种族的国家，古往今来，这种冲动一直促使着人们直面敌人的武器。

下列说法可以被视为永远适用的真理：一个国家从来没有从出于和平目的的商业目的。国家总是出于维护种族群体的本能，这种本能是否体现在英雄领域或在狡猾和欺骗的领域。

首先，我们有雅利安国家，它们基于劳动和文化原则。

发展；第二，我们有犹太人的寄生殖民地。一旦经济利益开始支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种族和文化本能，这些经济利益成为导致奴役和压迫的分裂原因。

战前德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信念是，世界可以开放，甚至德国通过和平商业渗透和殖民政策征服了是国家建立的真正品质衰落的典型症状并保存了洞察力、意志力和实际决心，同时也表明了这种洞察力、意志力和实际决心的衰落与这些品质相符。

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是这种衰落的自然结果。

对于那些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德国人民的这种态度——相当普遍——一定看起来像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谜。毕竟，德国本身就是一个这是一个纯粹依靠强权政策建立起来的帝国的辉煌典范。

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的起源，是由英勇的行为，而不是通过金融或商业契约，而帝国本身只是宏伟的这是对以权力和军事勇气为主导的政策的领导的回报。

那么，为什么德国人民的政治本能会变得如此堕落？这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指向这种颓废，而且是病态的症状数量惊人，现已遍布整个政体，或正在侵蚀民族的躯体，就如同坏疽性的溃疡。

仿佛某种无处不在的有毒液体被一只神秘的手注入了曾经英勇的躯体血液流动，带来一种影响理智的缓慢麻痹以及自我保护的基本本能。

在 1912 至 1914 年间，我经常思考与三国同盟的政策和当时德意志帝国奉行的经济政策。我再次得出结论，这个谜团的唯一解释在于我在维也纳就已经熟悉了这种力量，尽管角度不同。

我所指的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世界观及其有组织的行动全国各地。

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深入研究这种破坏性的教义。这一次，然而，我并没有因为日常所见所闻而去研究这个问题。

环境，而是由对政治生活中普遍现象的观察所引导的。

德国。

再次深入研究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并努力获得清晰的视野考虑到其教学可能产生的后果，我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与它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中的活动所引起的现象和事件球体。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把注意力转向为制服这种普遍的祸害。我研究了俾斯麦的特殊立法，包括它的最初概念、它的运作及其结果。

渐渐地，我形成了自己观点的基础，这些观点坚如磐石，因此，从此我不得不改变对普遍问题的态度。

我还对马克思主义与犹太主义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更深入的分析。

我在维也纳逗留期间，曾把德国视为冷静的巨人，但现在严重的怀疑和疑虑经常袭击我。在我自己的心里我在与小圈子里的熟人交谈时，常常批评德国的外交政策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极其肤浅的方式尽管这当时是德国最重要的问题。

我无法理解德国怎么会蒙着眼睛跌入这种危险之中，其后果如果马克思主义公开宣布的目标能够付诸实践，那么这将是意义重大的。

早在那时我就警告过我周围的人，就像我现在警告更广泛的受众一样，反对所有懒惰和懦弱之人的安慰口号：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类似的精神传染病已经摧毁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德国能逃脱吗？所有其他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守的法律的执行情况？1913 年和 1914 年，我第一次在各种圈子里表达了我的观点，其中一些现在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德意志民族能否保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否被消灭的问题。

我认为德国灾难性的联盟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瓦解效应，因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学说正在无形中腐蚀着健康政治和经济前景的基础。那些曾经他们自己经常受到污染，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和行动源于此世界观，否则他们就会公开否认它。

早在那之前，德国人民的精神和道德就已经衰落了，尽管那些受到这种病态颓废影响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正在摧毁他们的生存。有时他们试图通过“治疗”症状来治愈疾病，这被认为是但由于没有人认识到或愿意认识到这种疾病的真正原因，这种打击马克思主义就如同使用庸医的药膏一样无效。

## 第五章：世界大战

在我青春的喧闹岁月里，没有什么能比思考更能抑制我狂野的情绪了我出生的时候，世界显然已经决定不再建造任何名声，除非是为了商人和政府官员的荣誉。

历史成就的风暴似乎永远平息了，以至于未来似乎不可逆转地被交付给所谓的国家。这仅仅意味着一种通过欺诈手段相互剥削的制度，使用武力自卫被正式排除。

各个国家越来越呈现出商业企业的面貌，抢占以各种借口互相争夺领土、客户和让步，而这一切都在响亮但无害的叫喊声中完成。

这种趋势似乎注定会稳步发展，永久的。在公众的认可下，它似乎最终注定要改变把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在这个商场的门厅里，会有一排排纪念性的半身像将使那些证明了自己是奸商的人获得永生那些在行业中最精明的人和那些表现得最无害的。

销售人员可以由英国人代表，行政人员可以由德国人；而犹太人必须牺牲自己，满足于无利可图的因为他们一直宣称自己没有盈利，而且总是被要求“支付”。

此外，他们还具有精通外语的优势。

我曾经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不能生在一百年前？解放战争时期，即使一个人没有“事业”他仍然有一定价值？因此，我曾经认为，自己来得太晚，是自己不该遭受的厄运。

地球，我为我的生活将不得不平静而又安详地度过而感到懊恼。

整齐的队伍。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根本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有试图让我成为和平主义者的尝试都徒劳无功。

后来布尔战争爆发了，就像一道闪电划过遥远的地平线。日复一日，我常常凝视着我全神贯



注地看报纸，几乎把电报和公报都“吞噬”了，欣喜地我认为尽管距离很远，我仍能亲眼目睹那场英勇的斗争。

日俄战争爆发时，我长大了，能够更好地做出判断。对于民族当时我在讨论中站在日本一边，我看着中国失败俄罗斯人认为这是对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的打击。

从那时到我到达慕尼黑已经过去了很久。现在我意识到我以前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颓废，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在我维也纳期间几天前，巴尔干半岛已经陷入了预示着暴风雨来临的闷热停顿之中。

那里偶尔会出现一道闪电，但很快就消失在阴森的黑暗中。

随后巴尔干战争爆发，随之而来的是龙卷风的第一阵风席卷了高度紧张的欧洲。在随后的平静中，人们感到气氛压抑，令人不安，以至于灾难即将来临的感觉变成了一种不耐烦的期待。

他们希望上天能放任命运的摆布，因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无法控制了。

第一道巨大的闪电击中了地球。

暴风雨来了，天上的雷声和大炮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

世界大战。

当慕尼黑传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谋杀的消息时，我一整天都待在家里，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起初，我担心这些枪击已经被一些德奥学生激怒而开除哈布斯堡皇位继承人坚持不懈的亲斯拉夫活动，因此希望将德国人民从内部敌人的手中解放出来。

很容易想象，这样的错误会带来什么后果。

引发了新一轮迫害，其动机在全世界，但不久之后，我听到了疑似刺客的名字，也了解到据说他们是塞尔维亚人。

面对命运无情的报复，我感到有些目瞪口呆。

斯拉夫人最伟大的朋友成为了斯拉夫爱国者的子弹的牺牲品。

任何能够仔细观察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在战争期间的反应的人，那些后来的人肯定已经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开始，不可能再发生了。

不再受到制止。现在把当时奥地利政府的形式问题归咎于它，是不公平的。

当时提出的最后通牒的基调。在类似的立场和类似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大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

奥地利在其南部边境有一个不屈不挠的死敌，他总是挑衅反对二元君主制的斗争越来越频繁。

直到合适的时机到来之前，坚持的行为路线不会放松。

帝国的毁灭。

在奥地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最迟这一时刻会随着老皇帝。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君主制很可能不会能够做出任何严肃的抵抗。过去几年里，国家已经完全被认同弗朗茨·约瑟夫的个性，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这个失去帝国尊贵的化身就等于失去了帝国本身的统治。事实上，这是斯拉夫政策的巧妙手段之一，目的在于使人们认为奥地利国家它的存在完全归功于那位君主非凡而罕见的才能。这种在霍夫堡，奉承尤其受欢迎，因为它与对皇帝实际做出的贡献。

没有人试图去寻找隐藏在其中的精心准备的毒刺。

赞美。一个事实完全被忽视了，也许是故意的，那就是越帝国仍然依赖于“最明智的君主”的所谓行政才能更灾难性的情况是当死神来敲门时，要求其进贡。

奥地利帝国如果没有其尊贵的统治者，还能想象吗？玛丽亚·特蕾西亚身上的悲剧会再次重演吗？指责维也纳政府挑起战争是不公平的，因为战争本可以避免。战争注定要爆发。也许可以推迟一段时间最多一两年，但这一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不幸外交官们表示，他们试图

推迟不可避免的清算日，结果，他们最终被迫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发动打击。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另一次维护和平的尝试只会将战争推迟到更加不利的时刻。

那些不希望这场战争的人应该有勇气承担战争的后果拒绝接受。这些后果必然意味着奥地利的牺牲，即使那样，战争也不会是所有国家联合起来的战争而是以肢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形式来反对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应该向哈布斯堡王朝提供援助或者袖手旁观，听天由命。那些今天咒骂得最厉害的人，以及那些在审判中大肆炫耀智慧的人，战争的起因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而他们的活动正是导致我们陷入战争的最致命因素。

战争。

此前几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在暗中活动，而德国中央党，出于宗教目的，致力于使奥地利成为德国政策的中心和转折点。

这次愚蠢行为的后果现在必须承担。该来的终究会来，无论如何本来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德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只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他们继续错过有利于行动，为了维护和平而结成联盟因此最终成为反对德国争取维护和平，并决心引发世界大战。

如果当时奥地利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不那么激烈，那么根本没有改变情况，除非他们自己成为公众愤慨的受害者，因为在广大群众眼中，最后通牒是温和的当然，这不是过度或残酷的。今天否认这一点的人要么是傻瓜，记忆力差或是故意散布谎言。

1914年的战争当然不是强加于群众的，甚至是全民所希望的。

人们希望一劳永逸地结束普遍的不确定感。

只有基于这一事实，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两百多万德国男子和青年们自愿加入军队，准备为这个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对我来说，那几个小时让我从过去我的青春岁月。

我今天毫不羞愧地承认，我当时被当时的热情冲昏了头脑。

我跪下来，衷心感谢上天赐予我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莫大的荣幸。

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地爆发了。

命运掌握了权力的那一刻，人民群众中逐渐有了这样的信念：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决定奥地利或塞尔维亚的命运，而是德意志民族本身也处于危险之中。

在多年的盲目中，人们终于看清了未来。因此，这场巨大的斗争刚刚开始，过度的热情就被一种更真诚、更恰当的基调，因为民众精神的提升不仅仅是逝去的狂热。

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是十分必要的。当时，一般而言，对于战争将持续多久，没有丝毫的预感或概念。

人们梦想着士兵们在圣诞节前回家，然后他们就可以恢复日常生活安心工作。

人类所渴望的，就是人类所希望和相信的。绝大多数人们早已厌倦了公共生活总体状况的长期不安全感因此，没有人相信奥塞冲突能够搁置。

因此，他们期待着彻底解决账目。我也属于数百万萨拉热窝暴行的消息传到慕尼黑的那一刻，两个想法浮出水面我的想法是：首先，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其次，哈布斯堡王朝现在被迫履行与联盟的协议，因为我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德国本身，或许是联盟的结果，将卷入一场直接的冲突其原因不是奥地利。

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奥地利政府出于国内政治原因，会发现无法做出有利于其盟友的决定。国内的亲斯拉夫多数派将立即着手摧毁任何这样的意图，宁愿让整个国家去摧毁和毁掉自己的盟友，而不是向其提供必要的援助。

但现在这个危险已经消除。旧国家被迫战斗，不管它是否愿意或不。

我对这场冲突的态度也同样简单明了。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奥地利是为了从塞尔维亚获得满足而战，而德国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存在——德意志民族为了它自己的‘生存’或‘不

存在’，为了它的自由，为了它的未来。

俾斯麦的工作现在必须继续下去。年轻的德国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我们的先辈在从魏森堡到色当和巴黎的众多英雄战场上浴血奋战，如果这场斗争给我们带来胜利，我们的人民将再次跻身伟大国家。

只有这样，德意志帝国才能宣称自己是和平的强大捍卫者，而不需要为了维护和平，有必要限制儿童的日常饮食。

当我还是个孩子和青年时，我常常渴望有机会证明我的民族热情并非只是虚幻。有时，我感觉欢呼是一种罪过，因为我还没有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这样做的权利，因为毕竟，谁有权利高呼胜利如果他没有赢得那项权利，那项权利是没有演戏的，那项权利是女神之手的命运对国家和人类的真理和真诚进行无情的考验？和数百万其他人一样，我为被允许通过这项测试而感到自豪和快乐。我经常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并经常高呼“万岁”，以至于我现在认为这是一种追溯恩典，我被赋予权利出现在永恒正义的法庭上证明这些情感的真实性。

我从一开始就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一旦发生战争，现在似乎不可避免的是，我的书必须立即被扔到一边。我也意识到我的位置一定是我内心良知的声音在召唤我去的地方。

我离开奥地利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因此，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既然战争已经开始，我就应该把我的政治观点付诸实践。我并不想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事业，但我随时准备为我的亲人和帝国而死。

他们真正属于那里。

1914年8月3日，我向国王路德维希三世递交了一份紧急请愿书，请求被允许在巴伐利亚军团服役。当时总理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当第二天我收到我的请求的答复时，我感到更加高兴。

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了文件，现在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当我读到我被指示去巴伐利亚军团报到时，我感到很满意。几天后我穿着那套制服，将近六年都没有脱下来。

对我来说，就像对每一个德国人一样，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期现在开始了。

那场艰苦的斗争，过去的一切都化为乌有。我怀着一种渴望的骄傲回顾那些天来，特别是因为我们即将迎来这一令人难忘的事件的十周年纪念日。

我记得战争刚开始的几周，幸运之神让我有机会参加那场英勇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当这一幕在我脑海中展开时，仿佛就在昨天。我看到我和我的年轻战友们一起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阅兵演习，等等，直到最后这一天到来我们要出发前往前线。和其他人一样，那几天我也有一个担忧。

这是因为我们担心我们可能来不及赶上前线的战斗。一次又一次，这种想法让我不安，每一次宣布胜利的订婚都让我担心我们可能会太晚些时候，随着进一步胜利的消息传来，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

终于有一天，我们离开慕尼黑，开始服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莱茵河，我们向西航行，守卫这条历史悠久的德国河流，防止其传统而贪婪的敌人。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向我们展现尼德瓦尔德雕像，整个部队齐声唱起《守卫者》莱茵。我当时感觉心脏都要炸裂了。

接下来是弗兰德斯潮湿寒冷的夜晚。我们整晚默默地行军，早晨的阳光穿过薄雾，一道铁一般的问候突然在我们头顶上爆发。弹片在我们中间爆炸，在潮湿的地面上劈啪作响，但在爆炸的烟雾散去之前消失了，两百多人齐声高呼“乌拉”，首先死亡的问候。

接着，子弹呼啸、大炮轰鸣，炮弹轰鸣、嗡嗡作响。

我们眼睛紧张地向前走，越来越快，直到最后到达近距离战斗，在甜菜地和草地之外。

不久，远处传来了歌声。歌声越来越近，从一群人传到另一群人，来了，当死亡开始在我们

的队伍中肆虐时，我们把这首歌传递给了我们身边的人：德国，德国高于一切，世界高于一切！在战壕里待了四天后，我们回来了。我们连脚步都不像以前那样了。

十七岁了，看上去就像成年男子了。

利斯特团的士兵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他们知道如何像老兵一样死去。

这就是开始，我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一种恐惧感取代了浪漫的战斗精神。热情逐渐冷却，兴高采烈的精神被压抑了对无处不在的死亡的恐惧。

每个人内心都会出现自我保护的冲动和自我救赎的冲动之间的冲突。

和责任的召唤，我也必须经历那种冲突。当死亡到处寻找猎物时而一个无名的东西在虚弱的身体里无情地反抗，试图将自己展现出来以常识的名义；但实际上这是恐惧，它披上了这件外衣，以便强加于个人。

然后，一种难以抵挡的内心劝说和警告开始了，而且往往只有良心的最后一丝闪现赢得了胜利。但劝告谨慎的声音其努力越加强，其号召力越明确、越有说服力，阻力就越大，直到最后内乱结束，使命的召唤胜利了。

早在1915—16年冬天，我就经历过这场内心的挣扎。

意志已确立了其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

以前，我打仗时总是欢呼雀跃，笑声不断，但现在我习惯性地保持冷静坚定不移，这种心态一直持续下去。命运现在可能会让我接受最后的考验，而我神经和理智都崩溃了。年轻的志愿者已经变成了老兵。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整个军队。

连绵不断的战斗使它衰老、坚韧、坚强，而那些无法承受的，不得不让步。

现在才有可能对这支军队做出判断。经过两三年的连续战斗，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顽强抵抗人数优势，优越的武器装备，忍受饥饿和贫困，到了可以评估那股独特战斗力的价值。

一千年后，没有人敢在不回忆德国人的情况下谈论英雄主义军队的世界大战，然后从昏暗的过去将浮现出那些坚实的不朽的愿景一排排钢盔从不退缩，从不摇晃，只要德国人还活着，他们就会自豪地记住这些人都是他们祖先的儿子。

我当时是一名士兵，不想干涉政治，尤其是因为当时不合时宜。我仍然相信，当时最卑微的马夫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比我们所说的最好的‘议员’还要优秀。

我对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的仇恨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因为所有正派的人任何话都直截了当地对敌人说，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闭上嘴巴，在其他地方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我鄙视那些政治人物，如果我有办法，我会把他们组建成工党营，并给他们机会在他们心中尽情地闲聊，不会冒犯或伤害正派人士。

那时我根本不关心政治，但我还是忍不住对某些事情发表看法。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整个国家，也特别影响了我们士兵。

当时有两件事让我非常焦虑，我后来认为损害我们的利益。

在我们取得第一轮胜利后不久，部分媒体就开始冷嘲热讽一点一滴地浇灌公众的热情。起初，很多人并不明显。

是在善意和焦虑关怀的面具下进行的。公众被告知，大庆祝胜利有些不合时宜，不符合伟大国家。德国士兵的坚韧和勇敢是公认的事实，而这并不一定呼吁欢呼雀跃。

此外，还有人问，外国舆论对这些表现有何看法？难道外国舆论不会对安静、严肃的庆祝形式比大家欢呼雀跃吗？媒体宣称，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德国人记住，这场战争不是因此，我们不必羞于宣布我们愿意尽自己的努力。

共同努力，达成各国之间的谅解。

因此，用不适当的言辞玷污我军的光辉事迹是不明智的。

欢欣鼓舞，因为世界其他地方不会理解这一点。

此外，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英雄默默地、毫不掩饰地继续下去，然后忘记。这就是他们警告的要点。

不是抓住这些家伙的长耳朵，而是把它们拖到沟里，用绳子绑起来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样民族的胜利热情就不会再冒犯他们审美情趣，一场普遍的新闻宣传运动现在被允许继续反对所谓的“不合适”和“有失尊严”的胜利庆祝形式。

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一旦公众热情消退，就没有什么可以当需要时，再把它点燃。这种热情是一种陶醉，必须保持下去。

那种形式。

如果没有这种热情精神的支持，怎么可能在斗争中坚持下去呢？按照人类的标准，对民族的精神耐力提出了超乎寻常的要求？我太了解广大群众的心理了，我当然知道，在这样的在某些情况下，宽宏大量的“唯美主义”无法煽动保持铁热所需的火焰。

在我看来，没有努力进一步激发公众的热情甚至是一个错误。

因此，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采取相反的政策，也就是说，政策挫伤公众精神。

另一件让我恼火的事情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接受方式。他们认为一切都证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瘟疫的了解是多么的少。所有人都相信严肃地说，战争期间党派差别的废除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温和而适度的事情。

这里不存在党派问题，而是一个为表达导致人类走向毁灭的目的。这一教义的目的没有被理解，因为在我们犹太人占主导地位的大学里，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些傲慢的官僚官员认为，不值得阅读这样一个主题：没有被规定在他们的大学课程中。

这一强大的革命潮流被那些那些“知识分子”根本不屑于关注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国有企业几乎总是落后于私营企业。

对于这些绅士，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座右铭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会困扰我们。

1914年8月，每个德国工人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那个决定性的日子到来时，德国工人摆脱了那场瘟疫的魔爪；否则他就不会那么愿意并准备战斗。然而人们却愚蠢到想象一下，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的”，另一个恰当的例证是，那些权威从来没有费心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要旨。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就不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所有非犹太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继续如此。

1914年7月的那些日子里，各个民族国家都见证了德国工人阶级被诱捕的人们，被民族精神所激发，迅速站到了祖国。

几天之内，这场臭名昭著的背叛民族行为的欺骗性烟幕就消失了，空气稀薄，犹太老板们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被抛弃了。这仿佛不是一个德国人民群众的愚蠢和疯狂仍然残留着接种已有六十年了。

那一天对德国工党的叛徒来说确实是不幸的一天。然而，领导人意识到了威胁他们的危险，他们把欺骗的魔帽戴在了耳朵上并且在没有透露身份的情况下假装参加了民族觉醒。

似乎是时候对整个犹太公众害虫团伙采取行动了。然后无论随之而来的是怎样的抱怨或抗议，都应该采取行动。

1914年8月，一切关于国际团结的空谈一下子就被从德国工人阶级的头脑中打掉了。

几个星期后，他们耳边不再响起这些愚蠢的谈话，而是听到了美国制造的弹片在行进队伍的头顶上爆炸，象征着国际友谊。

现在，德国工人已经重新找到了回到祖国的道路，这应该是任何关心人民福祉的政府都有责任抓住这个机会无情地铲除一切违背民族精神的东西。

当这个国家的男子气概之花在前线凋零时，那些在国内的人至少可以消灭了这些害虫。但德

皇陛下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向这些从而保证他们的安全，让他们恢复精神镇静。这样，毒蛇又可以开始工作了。这一次，当然比以前更加小心，但所有的更具破坏性。当诚实的人梦想和解时，这些伪证罪犯却为革命做准备。

当然，我对当时采取的折中措施感到苦恼，但我从未想过最终的后果可能非常灾难性。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把主谋关进监狱并接受审判，这样把他们从这个国家赶走。应该采取毫不妥协的军事手段来铲除邪恶。各方应该已被废除，如果有必要的话，国会就会用刺刀的刺杀来纠正。

如果国会立即解散，情况会更好。如果共和国——一天可以随意解散政党，在那个时候，适用鉴于国家的生存正受到威胁，因此采取这样的措施。

当然，这个建议会引起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可能通过武力来消除思想？武器？世界观能被武力攻击吗？当时，我在脑子里反复思考这些问题。通过研究类似的案例，历史上有过类似的例子，特别是那些源于宗教环境的例子，我基本结论如下。理想和意识形态，以及基于确定的精神基础，无论真假，都不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暴力之后被摧毁。

除非有一个条件，即这种武力的使用是为了燃烧着新的火焰的新理想或世界观。

仅靠武力，没有基于精神理念的道德支持，永远无法带来摧毁一个理想，或者阻止它的传播，除非一个人准备好并且能够无情地消灭那个理想的最后拥护者，并消灭它所蕴含的任何传统。

可能会留下。

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将一个国家排除在外，要么暂时或永远地脱离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圈，但经验表明还表明，这种血腥的灭绝方法影响了人口中较好的阶层在迫害之下。

事实上，任何没有精神动机支持的迫害都是道德上不公正的并引起了民众中优秀分子的反对，以至于这些人被驱使使越来越多地捍卫那些受到不公正迫害的思想。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源于他们反对一切压制企图的精神用蛮力夺取精神上的东西。

这样，随着迫害不断加剧。

因此，要彻底摧毁一种新的学说，只有通过一项宏大的计划，灭绝；但这最终意味着一个国家或民族中一些最优秀的血液的流失。

国家，而血仇随后得到报应，因为这种内部的、彻底的清理带来了国家力量的崩溃。这样的程序总是徒劳无功的一开始，如果所攻击的学说恰巧传播到了小范围之外。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所有其他生长物一样，该学说只有在其早期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抵抗力不断增强，直到年龄接近时，它向更年轻的元素迈进，但采用另一种形式并出于其他动机。

事实上，几乎所有试图消灭一种教义的行动，如果没有某种精神上的攻击它的基础，并消灭它所建立的所有组织，导致了许多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原因如下。

当使用武力来打击一种理论的传播时，必须使用这种武力系统地、持续地进行。这意味着成功镇压教义的真正意义只在于坚持不懈地、统一地应用所选的方法。

一旦出现犹豫，容忍与使用武力交替出现，这些措施所针对的理论不仅会恢复力量，而且每一个连续的迫害将带来新的追随者，他们被所采用的压迫手段。

旧信徒会变得更加怨恨，他们的忠诚也会因此而得到加强。

因此，在使用武力时，成功取决于使用武力的一致方式用过的。

然而，这种坚持无非是明确的精神信念的产物。每一个没有精神后盾的武力永远是优柔寡断、不确定的。

这种力量缺乏只有在拥有忠诚冠军的世界观。这种力量是能量和暂时掌权的个人的无情决定，因此，它取决于改变谁来使用它，以及他们的性格和能力。但还有话要说。每一种世界观，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有时很难说一个在哪里结束，另一个在哪里开始）并不是为了负面而战摧毁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为积极目标。

因此，它的斗争在于进攻而不是防守。它的优势在于它知道自己在哪里目标就是谎言，因为这个目标代表了自己理想的实现。相反，很难比如，当达到并确保了摧毁敌对理论的消极目标时。

正因为如此，具有进取精神的世界观才会有更明确的计划比仅仅采取防御性行动的世界观更有力、更果断。

态度。

如果使用武力对抗精神力量，那么这种武力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一种防御手段：它的持有者并不是新的精神教义的拥护者和使徒。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任何试图用以下手段对抗世界观的尝试，如果斗争不能采取进攻的形式，那么武力最终将是徒劳的建立一个全新的精神秩序。

只有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物质力量才能持续不断地残酷地实施，最终将扭转局势。正是在这一点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迄今已经失败。

这也是俾斯麦的社会主义立法失败的原因，并且注定会在长远来看，尽管如此。它缺乏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而这种新世界观的发展并扩大斗争范围。

说散布所谓“国家权力”或“法律和秩序”的胡言乱语是生死搏斗中精神驱动力的充分基础，才是希望听到身居高位的智者们的言论。

正是因为这次进攻背后没有足够的精神动机，俾斯麦才被迫将他的社会主义立法措施的执行权移交给审判和那些圈子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学的产物的认可。

因此，当铁血宰相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交给善意资产阶级民主的，他让山羊去照看花园。但这只是未能找到一种全新的、截然相反的世界观的必然结果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受到一种要横扫一切的强烈决心的鼓舞。因此，俾斯麦战役令人大失所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战争初期的情况是否有所不同？不幸的是，他们没有。

我越是思考行政政府态度转变的必要性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我越发意识到缺乏这一学说的实用替代品。

假如社会民主党被推翻，我们能为群众提供什么呢？唯一的一个能够成功吸引大量工人的运动，现在或多或少会失去领导者，并对这些工人施以魔力。

想象一个刚刚与一个国家断绝关系的国际狂热分子会阶级政党将立即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或者换句话说，加入另一个阶级组织，因为，无论这些组织看起来多么不令人满意，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政客把阶级差别看作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前提是，这不会对他们在政治上不利。如果他们否认这一事实，他们就会表明他们自己不仅厚颜无耻，而且撒谎。

一般而言，人们应该警惕，认为广大群众比他们自己更愚蠢。

确实如此。在政治问题上，感觉往往比理智更能做出判断。

认为群众的愚蠢国际态度证明了这种感觉，可以立即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所驳斥：和平主义民主是尽管它的支持者几乎全部来自资产阶级圈子，但它同样愚蠢。

只要数百万公民每天吞下社会民主党媒体告诉他们，这些先生们拿“同志们”，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都吞下了同样的食物，尽管它是用不同的香料。在这两种情况下，厨师都是同一个人——犹太人。

我们应该小心不要与既定事实相矛盾。不可否认的是，阶级这个问题与理想的问题无关，尽管这种麻醉剂是在选举的时候。我们人民中很大一部分人有阶级傲慢，而且有一种普遍的倾向看不起体力劳动者，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不是某些白日梦想家的幻想。

然而，这只能说明我们所谓的知识界的心态，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情况无法阻

止这种瘟疫的增长，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能恢复已经失去的东西。

“资产阶级”政党（他们选择这样称呼自己）再也无法赢得并把无产阶级群众带到他们的队伍中。这是因为两个世界是互相对立的这里，部分是自然划分的，部分是人为划分的。这两个阵营之间只有一种关系是可能的，那就是公开的敌对。但在这样的斗争中年轻人会胜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1914 年，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确实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缺乏任何实际的替代品使人们怀疑这场战斗能持续多久。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空白。

早在战争之前，我就有同样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决定加入当时存在的任何政党。

在世界大战期间，我的信念进一步被以下事实所证实：彻底地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为了这个目的，应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议会’政党的运动，而且没有这样的。

我经常和亲密的同志们讨论这个愿望，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想到了后来从事政治工作的想法。正如我经常向我的朋友保证的那样，正是这一点促使我在战后除了从事专业工作外，还积极成为一名公众演说家，我确信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

## 第六章 战争宣传

在观察政治事件的进程时，我总是对宣传的积极作用感到震惊。

我看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知道如何在他们身上运用这种工具。

熟练地运用方法并很好地运用。

因此，我很快就意识到，正确使用宣传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而且这种艺术我们的资产阶级政党几乎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特别是在 Lueger 时代，在使用这种乐器时表现出一定的效率，并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此。

然而，正是在战争期间，我们才有最好的机会估计到战争带来的巨大后果这可以通过正确实施的宣传系统来实现。

不幸的是，这里的一切都被留给了另一方，我们这边所做的工作比微不足道更糟糕的是，这是整个德国信息系统的彻底失败——失败对每个士兵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促使我考虑全方位、多维度开展宣传。

我有充足的机会在这件事上学到实践教训，但不幸的是，敌人很好地教导了我们。我们这边的不足被敌人利用，以如此有效的人们可以说，它是真正的天才作品。

在敌人的宣传中，我找到了值得学习的宝贵资源。



不幸的是，从中学到的东西对我们这边的天才们没有吸引力。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太聪明了，无法接受任何教导，而且无论如何，他们没有诚实地想要学习任何东西。

我们做过任何宣传吗？唉，我只能否定地回答。在这次战争中所做的一切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不充分和错误，以至于它不仅证明是无用的，但有时是有害的。从实质上讲，这是不够的。从心理上讲，这完全是错误的。

任何仔细调查过德国宣传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我们的当局似乎甚至没有明确表态，即宣传是否是手段还是目的。

宣传是一种手段，因此，必须根据其目的来判断。它必须以能够实现其目标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且，很明显目标的重要性可能因一般必要性、必要性、宣传的内在特征也必须相应变化。

我们在战争期间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人类所能追求的最崇高、最崇高的事业。

我们为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战，为未来的安全而战国家的福祉和荣誉。

尽管有很多相反的观点，但这一荣誉确实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应该存在，因为没有荣誉的民族迟早会失去自由和独立。这是符合接受更高正义的裁决，因为一代懦夫没有资格获得自由。

懦弱的奴隶是不会获得荣誉的，因为这种荣誉很快就会成为普遍的蔑视。

德国是为了生存而发动战争。其战争宣传的目的应该是增强了那场斗争的斗志，帮助她取得胜利。

但当各国为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而战时，当“生存”或“生存”的问题如果要回答“不应该”，那么所有人性和审美的考虑都必须放在一边，因为这些理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人类创造性的产物想象，并将随着他从地球表面消失而消失。

大自然对它们一无所知。

此外，它们只是少数民族或种族的特征，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后者的种族情感。人道和当那些种族消失时，审美理想也将从地球上消失。

他们的创造者和拥护者。

当一个国家为生存而挣扎时，所有这些理想都只是次要的。它们必须阻止他们参与斗争，因为他们威胁到削弱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始终是他们在战争中的地位所产生的唯一可见的影响。斗争都要受到审判。

关于人道主义的作用，毛奇说，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尽快做出决定，最残酷的战斗方法也是时间，最人性化。

当人们试图通过关于美学等的夸夸其谈来回答这一推理时，只有一个可以给出的答案是，一个民族争取其独立性的斗争中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存在不应服从于任何美学考量。奴隶制的枷锁是，永远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最不美的体验。施瓦宾颓废派把今天的德国的命运看作是“美学的”吗？当然，我们不会讨论这样的犹太人的问题，因为他们是这种文化香水的现代发明者。他们的存在是对上帝创造的形象之美的根本否定。

由于这些关于美丽和人道的观念在战争中没有地位，因此它们不应被用作战争宣传的标准。在战争期间，宣传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目的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斗争。

因此，我们应该从其效用角度来看待宣传。

只要有助于迅速作出决定，最残酷的武器也是最人道的；只有那些有助于确保尊严和民族的自由。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中，这是对待战争宣传唯一可能的态度。

如果那些处于所谓权威地位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不确定战争宣传作为武器的形式和使用方式，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武器，而且在那些知道如何使用它的人手中，它确实是最可怕的武器。

第二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宣传应该针对谁？是面向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是

面向未受过教育的大众？宣传必须始终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不是为了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要求科学启示。

宣传与科学的关系并不大，就如同广告海报与艺术的关系一样。

涉及其呈现信息的形式。

广告海报的艺术在于设计师吸引观众注意力的能力通过他选择的形式和颜色来吸引人群。

艺术展览的广告海报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公众对展览的重要性的认识。展览做得越好，海报艺术就越好。

这样的。

尽管海报的目的是向公众强调展览的重要性，但它可以永远无法取代展厅里展示的艺术品。

它们是一种完全不同。

因此，想要研究艺术的人必须研究一些与海报截然不同的东西；事实上，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在展览馆里闲逛。

艺术系的学生必须仔细、透彻地研究每一个展览，才能慢慢形成一个明智的对此的意见。

就我们理解的“宣传”一词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的。宣传的目的宣传的目的不是对个人进行科学指导，而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某些事实、事件、紧急需要等等，这些的重要性可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群众在这里，宣传的艺术在于把问题如此清楚、有力地呈现在人们的头脑中让人们对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某一事物的必要性形成普遍的信念。

事物以及某些重要事物的必要性。

由于这种艺术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且它的目的必须正是广告的目的海报，以吸引群众的注意，而不是以任何方式传达个人指示对于那些已经对事物有深刻见解的人，或者希望形成这种见解的人客观研究的依据（因为这不是宣传的目的），它必须诉诸公众的感受，而不是他们的推理能力。

一切宣传都必须以通俗的形式呈现，必须固定其思想水平，以免那些最没有知识的人，他们也不明白。因此，它的诉求指向何方，它的纯粹智力水平就必须越低。

当问题涉及到将整个民族纳入其影响范围时，就像在在战争宣传的情况下，那么就不能过多地关注避免高水平，这意味着公众的智力水平相对较高。

这种宣传的科学水平越低，越是专门针对公众情绪越高，其成功就越具有决定性，这是对一件作品价值的最好考验。

宣传，而不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的认可。

宣传的艺术恰恰在于能够唤醒公众的想象力通过诉诸情感，找到适当的心理形式来阻止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共鸣。

我们当中那些被认为智力敏锐的人却不明白这一点最高音调，只是他们的虚荣心或精神惰性的又一证明。

一旦我们理解了集中精力宣传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说服力，我们可以认同这一理论试图使宣传具有科学教学的多面性是错误的。

群众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理解能力也很薄弱。

另一方面，他们很快就会忘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有效的宣传都必须限于一些基本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必须尽可能地用刻板的公式来表达。这些口号应该不断重复，直到最后一个人明白这一点已经提出了。如果忘记了这一原则，如果试图抽象和总的来说，宣传将变得无效，因为公众将无法消化或保留以这种方式向他们提供什么。

因此，需要呈现的信息的范围越大，越有必要宣传来选择心理上最有效的行动计划。

例如，嘲笑敌人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和德国喜剧演员各报刊在宣传中都特意这么做。

这里的原则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当 they 与敌人面对面时，我们的士兵们的印象却截然不

同。

因此，这个错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一旦德国士兵意识到敌人有多强硬他必须抗争，他觉得自己被制造这些信息的人欺骗了。

因此，这不但没有加强和刺激他的战斗精神，反而信息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最终他失去了信心。

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宣传在心理上是有效的。通过把德国人描绘成野蛮人和匈奴人，他们帮助士兵做好面对战争恐怖的准备并防止他们受到欺骗。

那些士兵在战场上遇到的最可怕的武器只是证实了他们已经收到的信息，以及他们对其所作断言的真实性的信念各国政府的愤怒和仇恨因此而得到加强。因此，他们对臭名昭著的敌人增加了。

德国战争武器造成的可怕破坏只是匈奴人的残暴，而协约国方面，却没有时间士兵们思考他们自己的武器能够造成什么样的破坏。

因此，英国士兵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在家里收到的信息是不真实的。

不幸的是，德国人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最终拒绝了家里的一切都是纯粹的骗局和欺骗。

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认为在国内，宣传工作可以委托给第一个遇到的驴子，或者甚至是一个在其他方面相当聪明的人，他们没有想到宣传需要最熟练的头脑。

因此，德国的战争宣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例子，展示了不应该进行“启蒙”，以及这种例子是如何完全失败的结果考虑一切心理因素。

然而，那些保持警惕的人可以从敌人那里获得大量宝贵的知识眼睛睁开，感知能力还未衰退，在四个半多年来，我们不得不经受敌人宣传的持续洪流。

最糟糕的是，我们的人民没有理解必须满足的第一个条件在所有类型的宣传中都体现了这种态度，即对每一个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在这方面，甚至从战争一开始就犯了如此多的错误，以至于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么多的愚蠢行为是否完全可以归咎于人们的愚蠢。

较高的宿舍。

例如，对于一张宣传某个新品牌肥皂的海报，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坚持竞争品牌的优秀品质我们自然应该动摇我们的政治广告亦然如此。

宣传的目的不是试图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做出判断，给予每一项权利应有的地位，而是仅仅是为了强调我们所主张的权利。

宣传不得客观调查真相，只要它有利于另一方一方面，按照正义的理论规则来呈现它，但它必须只呈现正义的这一方面。

对自己有利的真理。

讨论谁应该为战争的爆发负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战争，并宣布不能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德国。唯一的责任应该落在敌人的肩上，即使这没有严格确实如此。

这些半途而废的措施造成了什么后果？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外交官或公共法学教授，而不仅仅是能够形成在特定情况下做出理性判断，但他们是一群优柔寡断的人类孩子，不断地在一个想法和另一个想法之间摇摆不定。

一旦我们的宣传暗示敌人有一定程度的正义在他那边，然后我们奠定了我们自己事业正义的基础。

质疑。

群众不能辨别哪里是敌人的错误，哪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变得犹豫和不信任，尤其是当敌人没有做出同样的错误，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对手身上。

还有什么比这个事实更清楚的证据吗：我们自己的人民终于相信了敌人的宣传是统一而一致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当然，由于我们的人民对客观性的狂热，这种怀疑进一步加深了。

每个人都开始小心谨慎，避免对敌人做出不公正的行为，即使要付出严重代价伤害甚至毁灭自己的人民和国家。

当然，群众没有意识到当权者没有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在性格和观点上都是女性化的，因此其思想和行为受情绪而非冷静推理的支配。

但这种情绪并不复杂，而是简单而一致的。它没有高度分化，但只有爱与恨、是与非、真理与谎言等消极与积极的概念。

它的概念从来不是部分这样、部分那样的。

那些负责英语宣传的人尤其理解这一点，并且把他们所理解的东西付诸实践。他们不允许半途而废，否则可能会怀疑。

证明他们非常聪明地理解了群众的感情是一种原始的东西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发表恐怖和暴行的故事，这些故事与真正的恐怖相符从而巧妙而无情地为前线的道义团结奠定了基础，即使在遭遇重大失败的时候。

此外，他们指责德国敌人对这场战争负有全部责任——这是一个残酷而绝对的谎言——他们宣布他有罪的方式非常出色精心策划，力图接触群众，意识到群众的情绪总是极端的。因此人们竟然真的相信了这个弥天大谎。

这种宣传的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经过四年半多年来，敌人不仅还在进行宣传工作，而且已经削弱了国内人民的毅力。我们的宣传没有取得类似的效果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含有低效率的根源，因为它含糊不清，并且由于其内容的性质，人们不能指望它做出必要的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

只有我们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才会想到，点燃那种引导人们为国捐躯的精神，可以通过和平主义的“泔水”来滋养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不但毫无价值，而且有害。

无论宣传组织雇用多少人才，它都不会如果不充分考虑一个基本原则，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宣传必须限于几个简单的主题，并且必须反复呈现这些主题。

在这里，就像在无数其他情况下一样，坚持不懈是成功的首要条件。

成功。特别是在宣传领域，平静的唯美主义者和冷漠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应该被允许带头。前者很容易改变真正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格宣传变成只适合文学茶会的东西。

对于第二类人，必须时刻警惕这种害虫；因为他们他们对正常的印象不敏感，不断寻求新的刺激。

这样的人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他们总是渴望改变，而且总是无法设身处地去想象那些不那么冷酷无情的同胞的需要——周围的生物，更不用说试图理解它们了。

那些麻木不仁的知识分子总是第一个批评宣传，或者更确切地说，批评宣传的信息，因为这在他们看来，这已经过时而且微不足道了。

他们总是在寻找新的东西，总是渴望改变，因此他们成为了一切试图有效影响群众的努力的死敌。

宣传运动的组织和信息开始定位的那一刻根据他们的口味，它变得不连贯和分散。

宣传的目的不是提供一系列刺激来取悦那些厌倦了的人绅士。它的主要功能是说服群众，因为群众的理解迟缓，需要给予他们时间来吸收信息；只有不断的重复才能最终成功地将一个想法印刻在人群的记忆中。

任何变化都不能改变宣传的主旨，但必须始终强调同一当然，这个口号必须用多种方式和

多种角度来阐述，但最终必须始终强调口号本身。只有这样，宣传才能始终如一并且其效果具有动态性。

只有遵循这些总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才能统一、简明、强调，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然后我们将得到令人惊讶的几乎这种坚持不懈的政策确保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任何广告的成功，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都取决于其坚持不懈和持之以恒。

受雇。

在这方面，我们的敌人组织的宣传也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它限制了它将自己定位为几个主题，这些主题专门用于大众消费，并且它重复了这些坚持不懈地坚持主题。

一旦这些基本主题以及将它们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方式被认可为有效，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坚持这些原则，没有丝毫改变。

首先，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愚蠢的，厚颜无耻。

后来，人们认为这令人不安，但最终人们相信了。

四年半后，一场革命爆发了，其口号借鉴了敌人的战时口号宣传在德国爆发。

在英国，他们开始理解另一件事，即成功使用的可能性这种精神武器的威力在于它的大规模使用，当以这种方式使用时，它为所花费的巨额开支带来了全部的回报。

在英国，宣传被视为第一种武器，而在我们这里，它代表着失业的政客们最后的谋生希望和逃避现实的卑微者们的一份舒适的工作英雄类型。

总而言之，其结果是负面的。

## 第七章 革命

敌人开始在我们的士兵中进行宣传。从那时起，宣传逐渐变得更加洪水非常猛烈，1918年初已经发展成为一场暴风雨洪水。现在人们可以判断这场传教运动的效果正在一步步显现。渐渐地，我们的士兵开始按照敌人希望他们思考的方式思考。

德国方面没有进行反宣传。

当时，军队当局在我们干练果断的指挥官的领导下，愿意并准备好在宣传领域也进行斗争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必要实现该意图的手段。

此外，军事当局还会对他们承担这项心理训练任务时犯了一个错误。

为了有效，它必须从家庭出发，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在男性中取得成功近四年来，他一直在做出不朽的英雄事迹，并经历了一切为了那个家，承受了各种各样的困苦。

但国内的人在做什么呢？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仅仅是因为缺乏智慧吗？还是恶意的？1918年夏天，马恩河南岸撤离后，德国媒体采取了一项非常糟糕的政策不合时宜，甚至是犯罪的愚蠢，我每天都带着越来越强烈的愤怒问自己问题是，‘我们真的没有人敢终止这种精神我们的英雄部队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破坏行为？’1914年，当我们的军队入侵法国时，法国

发生了什么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当意大利军队在伊松佐河前线溃败时，意大利发生了什么？1918年春，德国师再次进攻法国，占领了法国主要阵地暴风雨和重型远程炮火轰炸巴黎？敌人的宣传如何激起正在撤退的部队的士气和激发了他们心中的民族热情他们的宣传和运用大众影响力的非凡才能如何唤醒了在那条破碎的战线上，战斗精神在士兵的头脑中打下了坚定的信念，最终胜利！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民在这个领域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甚至比什么都没做还要糟糕。

一次又一次。当我读到最新的报纸，意识到事情的本质时，我常常感到愤怒和愤慨。他们通过影响人民的思想和士兵。

我不止一次地被这样的想法所折磨：如果上帝让德国人的行为宣传到我手中，而不是到那些无能甚至犯罪的人手中如果一个人是无知和弱者，斗争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那几个月里，我第一次感到命运在对我不利，让我在战斗前线，任何黑人的步枪子弹都可能击中我本来可以在其他领域为祖国做出真正的贡献，因为那时我自以为能够成功管理宣传商业。

但我是个无名小卒，是八百万人中的一个。因此，我最好闭嘴。

并尽我所能，在所担负的岗位上做好我的职责。

1915年夏天，第一批敌人传单被扔到我们的战壕里。这些传单都说了或多或少故事大体相同，只是形式上有些变化。

故事是这样的：-德国的困境日益加剧；战争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我们胜利的希望一天天渺茫；国内人民渴望和平，但“军国主义”和德皇不允许；-世界并不是在向德国人民发动战争，而只是在向那个德皇负全部责任；-除非世界和平的敌人被消灭，否则冲突就不可能结束；-但是，战争结束后，自由民主国家将把德国人视为世界和平联盟的合作者。

这将在‘普鲁士军国主义’最终被摧毁的那一刻完成。

为了说明和证实所有这些说法，传单中经常包含“来自家”中的内容似乎证实了敌人的宣传信息。

总的来说，我们对这些努力只是一笑置之。传单被阅读，并被发送到基地总部，然后被遗忘，直到一阵顺风再次把新的货物吹进战壕里的炸弹。这些炸弹大多是从专门用于此目的的飞机上投下的。

这种宣传的一个特点非常引人注目，即在巴伐利亚军队驻扎的地区，驻扎后，敌方宣传人员竭尽全力煽动反对普鲁士人向士兵们保证，普鲁士，而且只有普鲁士，才是罪魁祸首，为发动和继续战争负责，并且不存在任何敌对行为对巴伐利亚人来说，但只要他们继续为普鲁士军国主义服务，帮助把“普鲁士栗子从火。”这种持续不断的宣传在1915年开始对我们的士兵产生真正的影响。

普鲁士在巴伐利亚军队中变得相当引人注目，但当权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抵消它。

这不仅仅是一种疏忽之罪，因为迟早，不仅普鲁士人必然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整个德意志民族，以及因此巴伐利亚人自己也是如此。在这个方向上，敌人的宣传开始取得毫无疑问的成果从1916年开始，这一趋势一直很成功。同样，从家里直接寄来的信件早已成为发挥其作用。现在敌人不再需要广播这样的信件了。

传单形式。

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抵消来自国内的影响，只是发布了几项极其愚蠢的“警告”。整个前线都浸透了这种毒药，而当时没有思想的女人回家，没有一刻怀疑敌人的最后胜利的机会就这样被加强，或者前线士兵的苦难因此被延长，变得更加严重。

这些德国女人写的愚蠢信件最终夺走了数十万条生命我们的人。

因此，1916年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痛苦的现象。整个战线抱怨和牢骚，对很多事情感到不满，而且往往是合理的。虽然他们饥饿却又忍耐，他们的亲戚在家乡处于困境之中，在其他

地方宴会和狂欢。即使在前线，一切都不像它应该的那样。

尊重。

即使在战争初期，士兵们有时也容易抱怨，但这种批评是家庭性质的。那个男人一会儿抱怨和发牢骚，一会儿又停止了抱怨。

过了一会儿，他默默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刚才还表现出不满情绪的公司现在却坚守着自己的战壕，拼命保卫它，好像德国的命运取决于那几百码的泥土，炮弹坑。光荣的老军队仍然坚守岗位。

我命运的突然转变让我很快有了亲身经历这支老军队和本土军队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16年9月底，我的师被派往索姆河战役。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系列激烈交战中的第一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场真正的地狱之战，而不是战争。经过数周的炮火轰炸，我们坚守阵地，有时甚至让出一点点地，然后再次占领，并且永不放弃。

10月7日，我受伤了，但幸运的是能够回到我们的阵线，然后命令通过救护列车送往德国。我离开家已经两年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段时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很难想象德国人除了穿制服外是什么样子。在赫尔米斯的清理医院里，我突然听到一个扮演护士姐姐的德国女人的声音，吓了一跳和躺在我旁边的一名伤员交谈。这是我第一次在两天内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的救护列车越接近德国边境，我们每个人就越焦躁不安成为。在途中，我们认出了两年前经过的所有这些地方，布鲁塞尔、鲁汶、列日的年轻志愿者们，最后我们终于认出了第一个德国家园，有着熟悉的高山墙和风景如画的百叶窗。

家！1914年10月，当我们跨越这条边界时，我们的内心充满着狂热的热情。现在寂静与深沉的情感弥漫在空气中。

每个人都很高兴地认为命运让他再次看到了这笔借来的他曾献出生命来保护他们，他们几乎都羞于让对方保护他们。

看看他的眼睛。

在我出发前往前线两周年之际，我住进了贝利茨附近的医院。

柏林。

多么大的变化啊！从索姆战场的泥泞到这间美妙的建筑！一开始，人们在进入之前会犹豫。只有慢慢地才能成长重新适应这个新世界，但不幸的是，在其他一些方面这个新世界是不同的。

前线军队的精神似乎在这里格格不入。我第一次遇到当时在前线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那就是夸耀自己的懦弱，虽然我们确实听到了前线的抱怨和牢骚，但这绝不是任何煽动不服从的行为，当然也不是为了美化自己的恐惧。

在前线，懦夫就是懦夫，他的软弱招致的蔑视其他人也普遍被激起这种情绪，就像真正的英雄受到所有人的崇拜一样。但在医院里，精神在某些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大嘴巴的煽动者们忙着在这里大肆嘲讽这位好士兵，并把软弱的懦夫穿着华丽的色彩。一对可怜的人类标本是这次诽谤行动中的主谋。

其中一人夸口说，他故意在铁丝网上弄伤自己的手，以便被送往医院。虽然他的伤势很轻，但看起来他已经来过这里很长一段时间，并设法无限期地留在这里，就像他设法被送往这里的救护车是通过诈骗获得的。

这个瘟疫样本竟然厚颜无耻地炫耀他的恶行，称其为这种勇气比英勇牺牲的士兵的勇气还要高尚。

许多人都沉默地听着这些话，但也有人表示同意那家伙说了什么。

我个人对这种煽动叛乱的人被允许留在这样的机构。

该怎么办？这里的医院当局肯定知道他是谁，是什么人，事实上他们知道，但他们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当我能够再次行走时，我便获得了前往柏林的许可。

到处都是赤贫的迹象。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正在遭受避免饥饿。

不满情绪四起。在各地休息场所和救济院里，人们都在议论士兵们经常去的地方和我们医院的差不多。得到的印象是这些人故意挑选这样的地方是为了传播他们的观点。

慕尼黑的情况更糟。出院后，我被送往预备队营里。我感觉好像身处某个陌生的城镇。

愤怒、不满、抱怨随处可见。

预备营本身就糟糕得难以形容。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士兵们极其笨拙的行动方式造成的。

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受到了从未参加过一天现役的教官们的热情接待因此，他们无法对旧的士兵。

当然，这些老兵表现出了从经验；在战壕里。

预备役部队的军官们无法理解这些特殊情况，而家乡的军官至少现役军人能够自己理解这些。

因此，他比总部的军官更受士兵的尊敬。但是，从这一切来看，总体精神是令人悲哀的。

逃避责任的艺术几乎被视为高智商和忠于职守的证明被认为是软弱或愚蠢的表现。

行政办公室里都是犹太人。几乎每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个犹太人都是书记员。我对这群属于被选中的种族的“战士”感到惊讶，他们可以不禁要将其与战斗线上的稀少人数进行比较。

在商业世界里，情况更糟。在这里，犹太人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或缺”。他们就像水蛭一样，慢慢地吸干了国家毛孔里的血液。

身体。

通过新组建的战争连队，发现所有国家贸易都受到阻碍，以致任何商业活动都无法自由开展。

特别强调了不受阻碍的集中化。因此，早在 1916-17 年，几乎所有生产都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

金融。

但人民的愤怒是针对谁的呢？那时，我已经看到了那决定性的一天除非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否则灾难终将来临。

当犹太人忙于掠夺国家、巩固专制统治的时候，煽动人民反对普鲁士人的行为愈演愈烈，就像在前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样制止这种恶毒的宣传，因此在国内没有采取任何官方措施。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普鲁士的崩溃永远不会带来崛起相反，一方的垮台必然会拖累另一方的垮台。

这种行为对我影响很大。我只能从中看出犹太人巧妙的伎俩，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他人身上。

当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争吵不休时，犹太人夺走了双方的生计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当普鲁士人在巴伐利亚遭受虐待时，犹太人组织了革命一举摧毁了普鲁士和巴伐利亚。

我无法容忍同属德国血统的人之间发生这种可恶的争吵，我更喜欢再次奔赴前线。因此，我一到慕尼黑就报到服役 1917 年 3 月初，我重新加入了前线的老部队。

1917 年年底，我们似乎已经度过了道德低迷的最严重阶段。

前线。在俄罗斯崩溃后，整个军队恢复了勇气和希望，所有人都逐渐越来越相信这场斗争最终会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再次歌唱。乌鸦不再叫了。对祖国未来的信心曾经更加占优势。1917 年秋天意大利的崩溃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因为这个胜利证明，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有可能突破另一条战线。

这一鼓舞人心的思想现在占据了前线数百万人的头脑，并鼓励让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 1918



年春天的到来。很明显，敌人处于抑郁状态。

这个冬天，前线比往常要安静一些，但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就在准备发动最后攻势，将这个看似永无休止的斗争结束了，而无尽的运输队伍把士兵和弹药运送到前线，当士兵们正在接受最后的冲击训练时，这是最伟大的整个战争期间的叛国行为都是在德国完成的。

德国绝不能赢得战争。就在胜利似乎即将降临到德国头上的时候标准，一场阴谋被安排出来，目的是打击德国之春的核心只能从背后一击而中，无法取胜。

军工厂组织了一次总罢工。如果这个阴谋达到了目的，德国战线将会崩溃，而《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喉舌报）的愿望将会落空。

民主党）认为，这一次胜利不应该落在德国旗帜的手中，已实现。

由于缺乏弹药，前线将在几周内被突破，进攻将会被有效阻止，协约国得以获救。然后国际金融将会承担对德国的控制和马克思主义者背叛民族的内部目标是实现。

这一目标是摧毁国家经济体系，建立代替国际资本主义统治。这一目标已经真正实现，这要归功于一方是愚昧轻信，另一方是不可言喻的懦弱。

然而，这次弹药袭击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最终成功，即前线弹药短缺。持续时间太短，弹药短缺不足以带来正如最初计划的那样，这对陆军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士气上的损害更加可怕。

首先，如果国内人民不希望军队战斗，那么军队为什么而战？胜利？那么，这些巨大的牺牲和艰辛是为了谁而做出和忍受的呢？当大后方发起攻击时，士兵们是否必须为胜利而战？第二，这一举动对敌人有什么影响？1917-18年冬天，黑暗乌云笼罩着协约国的天空。近四年来，一场又一场的攻击已经对德国巨人发起了进攻，但未能将他击倒。他必须保留它们一只手臂握着防御盾牌，因为他的另一只手臂可以自由地挥舞用剑对付他的敌人，现在在东方，现在在南方。但最后这些敌人战胜了敌人，他的后方现在可以自由地参与西方的战争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人们流血流成河；但现在剑可以自由地与西线的盾牌部队联合作战，由于敌人迄今为止未能打破德军的防御，德军现在必须自己发动进攻。敌人害怕这次袭击，并为他的胜利而颤抖。

在巴黎和伦敦，会议接连不断。甚至敌人宣传遇到了困难。要证明一个德军胜利已无望。前线一片沉默，甚至连德军的士兵中也协约。他们的主人的傲慢突然平息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开始显现他们对德国士兵的看法已经改变。

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把他描绘成一个傻瓜，他的结局就是毁灭，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面对面的的是战胜了俄罗斯盟友的士兵。

限制德国军队向东进攻的政策当局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采取的这一举措，现在在协约国看来似乎是一个天才的战术举措。

三年来，这些德国人一直在俄罗斯前线猛攻，没有任何明显的一开始，人们并不认为这些努力会取得成功。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几乎被人们嘲笑，因为人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巨人将凭借绝对的人数优势取得胜利。德国将被击败流了那么多血，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这一希望。

自1914年9月以来，俄国军队第一次战俘大量涌入德国，坦能堡战役后，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但是一旦一支军队被击败和击溃，另一支军队就会取而代之。

庞大的帝国提供给沙皇的士兵数量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战争的大屠杀总是有新的受害者。德国还能坚持多久在这场比赛里你能坚持下去吗？难道这一天最终不会到来吗？在德国人取得最后的胜利之后，实现这一目标后，俄罗斯还会有预备军可以集结进行最后的战斗吗？然后呢？按照人类的标准，俄罗斯对德国的胜利可能会被推迟，但它将会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希望已经破灭。

在共同利益的祭坛上牺牲了最多的鲜血，他的资源已经耗尽并匍匐在无情的敌人面前。恐惧和沮丧的感觉笼罩着协约国士兵，他们此前一直受到盲目的信仰。他们害怕即将到来的春天，因为他们看到他们迄今为止未能打破当德国人只能集中部分战斗力在西线时，他们怎么能指望现在就能取得胜利呢？因为那片神奇的英雄国度里，似乎正在向西方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南蒂罗尔发生的事件的阴影和将军的幽灵卡多尔纳军队的溃败，反映在佛兰德斯协约国军队阴沉的脸上。

对胜利的信心让位于对失败的恐惧。然后，在那些寒冷的夜晚，当一个人几乎听到德国军队向大进攻推进的脚步声，决定恐惧和颤抖中等待着，突然一道可怕的光芒在德国闪耀，并将它的光芒射入敌人前线的最后一个炮弹坑。

就在德国各师接到最后命令执行伟大攻势爆发，德国爆发总罢工。

起初，世界震惊了。然后，敌人的宣传又开始活动，在最后一刻抓住了这个主题。突然间，一种手段出现了，可以用来恢复协约国士兵日益低迷的信心。

胜利的可能性现在可以确定了，而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现在可以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保证感。那些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德军进攻中首当其冲的部队现在可能坚信这场战争的最终决定不会由德军的进攻，而是靠防守方的忍耐力。

让德国人现在拥有他们想要的任何胜利，革命而不是胜利的军队受到祖国的欢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报纸开始在读者中传播这种信念，而非常出色的宣传大大鼓舞了前线部队的士气。

“德国面临革命！盟军必胜！”这是最好的药，可以波伊鲁和汤米再次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我们的步枪和机关枪现在可以再次开火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地撤退时，他们遭遇了充满信心的坚决抵抗。

这是军工厂罢工的结果。敌国各地对胜利因此而复活并得到加强，而此前一直存在的那种令人麻木的绝望感在盟军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部队被驱逐出境。因此，这次袭击造成数千人丧生德国士兵，但这次卑鄙袭击的卑鄙煽动者是革命时期德国的最高公职。

起初，似乎有可能克服这些事件对德国的影响士兵，但在敌人方面，他们有持久的影响。在这里，抵抗力量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支为绝望的事业而战的军队的性格。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有一种坚定的决心继续努力争取胜利，因为据我们预见，胜利现在就可以确保，如果西线战场甚至可以抵挡德军几个月的进攻。

盟军议会认识到了更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并投票决定投入巨额资金继续进行宣传，目的是破坏内部德国的统一。

我有幸参加了前两次进攻和最后一次进攻。这些进攻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惊人的印象——惊人，因为现在，最后一次，这场斗争失去了防御性质，而具有进攻性质，正如1914年一样。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德国战壕和掩体中终于传来了一声松了一口气的声音。

在那场地狱般的忍耐中，清算的日子已经到来。再一次，精力充沛的胜利的军队欢呼雀跃，他们把不朽的桂冠挂在他们为胜利而奉献的标准。

爱国歌曲的旋律再次在无尽队伍之上高唱。

行军的部队，上帝最后一次对他忘恩负义的孩子微笑。

1918年夏天，一阵闷热的压抑感笼罩着前线。

他们在家里吵架。为什么吵架？我们听说前线各部队都在吵架。

战争现在已经毫无希望，只有鲁莽之人才能想着胜利。

有兴趣继续下去的不是人民，而是资本家和君主制。

这些想法来自国内，并在前线进行了讨论。

起初，这引起了很小的反应。普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这我们四年来一直在为什么而

战？这是一次卑鄙的抢劫，因此从我们英雄的坟墓中偷走他们为之牺牲的理想，这并不是为了口号，“普选万岁”，我们的军队在佛兰德斯一度面临死亡，但是听到以下呼喊：“德国超越世界”！——虽然很小，但绝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差异。

大多数高声呼吁争取这一选举权的人，在为之奋斗时却缺席了。

所有这些政治乌合之众对于我们这些前线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在那些日子里，只有一小部分政治乌合之众议会贵族们在诚实的德国人聚集的地方随处可见。

曾在前线作战的苏联红军并不赞同艾伯特、谢德曼、巴特等人提出的新战争目标。

李卜克内西等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逃避责任的人就应该夺取一切他们将行政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完全不考虑军队。

从一开始，我就有自己明确的个人观点。我非常讨厌整个那些背叛人民的可怜的政党政客。我早就意识到，国家在这群声名狼藉的船员中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而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是能够填满他们自己空虚的口袋。

我的看法是，这些人完全应该被绞死，因为他们准备牺牲和平，如果有必要，甚至允许德国被打败，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考虑他们的意愿就意味着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换取一群盗贼。满足他们的愿望就意味着同意牺牲德国。

这也是军队中大多数人仍然持有的观点，但是增援部队他们的到来让他们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我们的战斗力量的弱点而不是优势。

尤其是年轻的新兵，大部分都是没用的。

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儿子，这个国家把年轻人送上了在伊普尔周围进行的战役。

八月和九月，道德崩坏的症状愈演愈烈，虽然敌人的进攻根本不像我们前线的进攻那样可怕，防御战。

与这次攻势相比，索姆河和佛兰德斯的战斗仍然在我们的记忆是所有恐怖中最可怕的。

九月底，我的师第三次占领了我们曾经作为年轻的志愿者，我们深受感动。多么美好的回忆啊！1914年10月和11月，我们在这里接受了严峻的考验。怀着对心中有祖国，嘴里有歌，我们年轻的军团投入战斗，就像去跳舞。最珍贵的血在这里被自由地牺牲，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为了保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

1917年7月，我们第二次踏上我们视为神圣的土地。如果我们没有尽全力战友在这里安息，其中一些人还只是孩子——这些士兵为了为了祖国，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热情？我们当中年纪较大的人从一开始就在团里，他们深受感动，因为我们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宣誓‘忠诚和责任至死’。三年前该团已强行占领了这一阵地；现在它被要求以艰苦的方式保卫它斗争。通过持续三周的炮击，英国人为他们的伟大佛兰德斯的攻势。在那里，死者的灵魂似乎又复活了。

该团深陷泥潭，紧紧抓住弹坑和弹坑，既不退缩，也不动摇，但数量却一天天减少。

英国最终于1917年7月31日发动了进攻。

八月初我们松了一口气。该团已缩减到几个连，他们踉踉跄跄地往后退，浑身沾满泥巴，更像是幽灵而不是人类。此外还有几百数码长的炮弹坑，英国人得到的只是死亡。

现在，在1918年的秋天，我们第三次站在了1914年攻占的土地上。

科米纳斯村，以前是我们基地的地方，现在位于战斗区域内。

虽然周边地区没有什么变化，但男人们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谈论政治。和其他地方一样，来自家乡的毒药正在蔓延。

它也在这里产生了效果。新鲜的空气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它们是直接从家里吹来的。

10月13日至14日夜间，英国人对南部战线发动了毒气攻击。

伊普尔。他们使用了芥子气，其效果我们至少从个人经验来看是未知的。我注定要在那天晚上经历这一切。十月的晚上，在韦尔维克南部的一座小山上 13 日，我们遭受了几个小时的毒气弹猛烈轰炸，持续了数小时。

整个晚上，强度大致均匀。

午夜时分，我们中的一些人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有些人甚至永远失去了行动能力。

到了早上，我也开始感到疼痛。每隔一刻钟，疼痛就会加剧，大约七点钟，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踉踉跄跄地走回去，递交了最后一封信。

注定要参与这场战争。

几个小时后，我的眼睛就像烧红的煤炭一样，一切都黑暗笼罩着我。我被送往波美拉尼亚的帕塞瓦尔克医院，在那里，我听说革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空气中都弥漫着某种东西难以定义，令人压抑。人们说，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几个星期，尽管我无法想象这意味着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次类似于春天发生的罢工。

海军方面不断传来不利的谣言，据说海军正处于发酵，但这似乎是某些人提出的疯狂想法而不是某种东西令许多人担忧。

确实，医院里大家都在谈论战争的结束，希望这是时间不远了，但没人认为这个决定会立即到来。我没能读到报纸。

十一月，紧张局势加剧。然后有一天，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毫无预警地，水手们开着卡车过来，号召我们起来反抗。少数犹太人是为我们国家生存的‘自由、美丽和尊严’而战的‘领导者’。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在前线服役过。这些三个东方人已经回到家里了。现在他们正在这里挥舞着他们的红布。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开始感觉好一些了。眼窝里的灼痛已经不那么严重了。渐渐地，我能够分辨出我眼前的周围环境，我可以希望至少我的视力能够恢复到足以以后能够从事某种职业。我能够再次画画或设计是自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当我正在康复的时候，可怕的时刻来临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叛国罪的爆发只是地方性事件。我试图在同志们中传播这种信念。

尤其是我的巴伐利亚医院同事，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他们的倾向根本不具有革命性。我无法想象这种疯狂会爆发在慕尼黑，因为在我看来，对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忠诚毕竟比对少数犹太人的意愿，所以我只能相信，这仅仅是海军的一次叛乱，并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内予以镇压。

接下来的几天，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谣言越来越多坚持不懈。有人告诉我，我所认为的局部事件实际上是一场普遍的革命。

除此之外，前线还传来了可耻的消息，说他们想投降！什么！是这种事可能吗？11月10日，当地牧师来到医院发表简短讲话，我们就是这样知道了整个故事的。

我听着演讲，兴奋不已。这位可敬的老先生似乎当他告诉我们霍亨索伦家族不再应该佩戴帝国王冠，祖国已成为一个“共和国”，我们应该向全能者祈祷，不要不让祂赐福于新事物不让祂抛弃我们的人民，来。

在传达这一信息时，他只能简短地表达对皇家的赞赏众议院，它为波美拉尼亚、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祖国提供服务，这一点他打破了。会议中的人们感到深深的沮丧，我也一样我想没有一只眼睛没有被泪水打湿。至于我自己，我彻底崩溃了当那位老先生试图继续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必须结束这段漫长的战争，因为战争已经失败，他说，我们只能听从胜利者的摆布。

祖国将来要承担沉重的负担。我们不得不接受停战并相信我们前敌人的宽宏大量。

我不可能再继续呆着听下去了。黑暗包围了我，我踉踉跄跄地走着。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病房，把疼痛的头埋在毯子和枕头之间。

自从站在母亲坟前的那一天起，我就再没有哭过。

每当我年轻时命运残酷地对待我时，我内心的决心就会增强越来越强。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死亡夺走了我们许多真正的朋友和同志的生命。

在我看来，说一句抱怨的话都是有罪的。他们不是为德国？最后，就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毒气笼罩着我，开始穿透我的眼睛，想到永久失明，我感到不安我但良心的声音立刻喊道——“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你会开始当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命运比你糟糕一百倍时，你却嚎叫？”于是我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不幸，意识到这是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且个人的苦难与国家不幸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一切都是徒劳。所有的牺牲和困苦，对无尽的饥饿和渴望，都白费了。

几个月来，尽管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我们的灵魂，我们坚守岗位的那些时间却白白浪费了，两百万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士兵却白白牺牲了。

想想那些成千上万怀着对祖国的信仰出发的人，永远不回来；他们的坟墓不应该被打开，这样那些英雄的灵魂就会被溅满泥土和鲜血可能会回到家里，对那些如此卑鄙地背叛一个人能为国家做出的最大牺牲是什么？1914年8月和9月，士兵们就是因为这个而牺牲的志愿者们团在同年秋天跟随他们的老战友一起参军？难道这些十七岁的男孩就是为了这个才混入佛兰德斯大地的吗？这就是德国母亲为祖国做出牺牲的原因吗？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儿子们告别，而他们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染指祖国？那么，这就是德国士兵在酷暑和刺眼的阳光下奋斗所得到的吗？暴风雪、忍受饥渴和寒冷、因不眠之夜和无休止的行军而疲惫不堪？难道是为了这个，他才在炮火的地狱中活了下来，喘息着，窒息着在遭受毒气袭击时，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动摇，只记得他的职责是保卫祖国对抗敌人？当然，这些英雄也应该有这样的墓志铭：“旅行者，当你来到德国时，告诉我们在这里安息，忠于祖国，至死不渝。”在家里呢？但是——这是我们唯一要考虑的牺牲吗？过去的德国难道是一个不值钱的国家吗？它难道不对自己的祖国负有一定的责任吗？历史？我们还有资格分享过去的荣耀吗？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一行为是正当的呢？子孙后代？真是一群卑鄙无耻的罪犯！我越是想了解发生的可怕事件让我更加愤怒和羞愧。

与这场悲剧相比，我眼睛所承受的所有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接下来的日子真是难以忍受夜晚更糟糕。我意识到一切都完了。

依靠敌人的仁慈是只有傻瓜或犯罪骗子才能做到的戒律推荐。

在那些夜晚，我的仇恨与日俱增——我对这起卑鄙罪行的始作俑者的仇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不得不嘲笑我想到了我的个人前途，迄今为止这一直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

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任何东西，难道不是很荒谬吗？最后，它也变成了我很清楚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我长期以来所担心的事情当时我虽然真的不忍心相信这一点。

威廉二世皇帝是第一位向马克思主义者伸出友谊之手的德国皇帝领导者，没有怀疑他们是毫无荣誉感的恶棍。

当他们其中一人握住皇帝的手时，另一人已经开始摸索匕首了。

和犹太人达成谅解是不存在的。必须有一个坚定的“要么”或者。就我而言，我当时决定从事政治工作。

## 第八章 我的开始政治活动

十一月底，我回到了慕尼黑。我去了我团的仓库，那里现在已掌握在士兵委员会手中。

由于整个事情让我厌恶，我决定尽快离开。

忠诚的战友施密特·恩斯特，我去了特劳恩施泰因，一直呆在那里，直到营地被分手了。

1919年3月，我们又回到了慕尼黑。那里的情况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

不可抗拒地推动了革命的进一步扩大。

艾斯纳的死只是加速了这一发展，并最终导致了议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犹太人的霸权事实证明这是暂时的，但这正是革命策动者的初衷。

那时，无数的计划在我脑中形成。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思考可以做什么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每个项目都必须在现实面前让步我当时还很默默无闻，因此甚至没有资格有效行动。稍后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决定加入任何政党那么就存在。

随着新革命的开始，我的活动招致了中央委员会。1919年4月27日凌晨，我本应被捕，但

三个那些来抓我的家伙没有勇气面对我的步枪，空手而归。

慕尼黑解放后几天，我被命令出席调查委员会这是第二步兵团为调查革命活动。那是我第一次涉足或多或少的政治领域。

几周后，我接到命令去参加一个为会员举办的讲座课程陆军。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传播士兵的某些基本原则可以作为他政治思想的基础。

对我来说，这个组织的好处是它让我有机会结识战友他们有同样的想法，我可以和他们讨论实际情况。

我们或多或少都坚信德国无法避免即将来临的灾难那些参与了十一月犯罪的人——也就是中央和社会民主党，以及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集团无法弥补损失即使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这些事情还是发生了。

成功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需的某些条件尚未得到满足。

随后的岁月证明了我们当时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我们讨论了组建新党的计划。我们当时讨论的主要思想是提议的内容与后来实施的内容相同，当时德国工党成立了。

即将成立的新运动的名称应当具有这样的意义：呼吁人民群众，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徒劳无功。

缺乏。这就是我们选择‘社会革命党’这个名字的原因。

特别是因为我们新组织的社会原则确实具有革命性。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我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我早年的研究或多或少局限于直接来自社会的考虑。

问题。

后来，我开始研究德国的联盟政策，视野也开阔了起来。

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形势的错误评估，以及关于德国人民未来生存的基础的混乱观念保证。所有这些思想都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资本完全是劳动的产物，正如劳动一样，它受到所有可能阻碍或促进人类活动的因素的影响。

因此，从国家的角度看，资本的意义取决于伟大、自由和国家权力，也就是民族的权力，正是这种依赖性，才导致资本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自身的发展。

因此，资本对独立和自由邦的依赖将迫使它保卫国家的自由、力量、实力等。

根据这些原则，国家对资本的责任将相对简单，并且明确。其唯一目的是确保资本仍然服从于国家，而不是赋予自己主导国家利益的权利。

因此，国家可以将其活动限制在以下两个限度内：一方面，确保维护国民经济的独立和生机，维护人民的社会权利。

工人。

以前，我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资本和资本之间的区别纯粹是创造性劳动的产物，资本的存在和性质完全是金融投机的结果。

此时我需要一个刺激来让我的思维朝这个方向思考，但迄今为止我一直缺乏这种刺激。

现在，必要的刺激来自于我所上课的一位授课人。

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是戈特弗里德·费德尔。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有关股票交易原则的讨论资本和用于贷款活动的资本。听完第一堂课后，Feder，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想法，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建立建立新政党的最重要前提条件。

在我看来，费德的优点在于他以冷酷而尖锐的方式描述了证券交易和贷款所用资本的投机性和政治经济性质交易，揭示了这一资本始终依赖于利息的支付这一事实。

在基本问题上，他的言论充满常识，甚至那些批评他的人他并不否认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他们怀疑是否有可能付诸实践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对我来说，这似乎是 Feder 教学中最强的一点，尽管其他人认为这是一个弱点。

制定理论纲领来解释各种方式并不是他的职责。

可以付诸实践。他的任务就是处理这个问题本身；他已经因此，要看结果，而不是手段。

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想法从根本上来说是是否正确。

至于在实践中是否难以实施，则是另一个问题。

事情。

当一个负责制定计划或政策原则的人开始忙于是否合适、是否实用，而不是局限于绝对真理的陈述，他的作品将不再是那些正在寻找的人的指路明灯，光明和指导，并将成为日常生活的处方。

制定运动纲领的人必须只考虑目标。

政治领袖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前者的思想因此，将由那些永恒的真理决定，而后者的活动必须始终以实际考虑这些真理在何种情况下得以体现为指导。

得以实施。

一个人的伟大程度，取决于他抽象的思想的绝对真理性；而另一个人则取决于他是否正确地判断了既定的现实，如何在前者所确立的真理的指导下运用它们。

衡量政治领袖是否伟大的标准，是看他的计划和事业是否成功。

这意味着他有能力达到他所设定的目标；而最终目标由政治哲学家永远无法触及，因为人类的思想可以把握真理，设想结局它看得非常清楚，尽管这样的目的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人类大自然是脆弱的、不完美的。

一个想法在抽象上越正确，因而越全面，其影响就越小。

将其付诸实践的可能性，至少就这取决于人类而言。

政治哲学家的意义并不取决于他所制定的计划的实际成功而是它们的绝对真理性及其对人类进步的影响。

如果不是这样，宗教的创始人就不能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人，他们因为他们的道德目标永远不会完全或甚至大致实现实践。

即使是那个被称为兄弟之爱的宗教，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微弱的反射其崇高创始人的意志但其意义在于它努力的方向为人类文明和人类美德道德作出贡献。

政治职能之间的巨大差异哲学家和务实的政治领袖，这就是为什么两者所需的资格很少能发现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具备多种功能。

这尤其适用于所谓的成功但不太成功的政治家，他们的活动事实上，这几乎就是实践实现可能之事的艺术，正如俾斯麦谦虚地对政治艺术进行了总体定义。

如果这样的政治家坚决避免伟大的思想，他的成功将会更容易实现；实现得更快，而且往往更加切实。正因为如此，然而，这样的成功注定是徒劳的，有时甚至在其创始人去世后也无法继续存在。

作者。

一般而言，这些政客的工作对下一代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暂时的成功是建立在避免一切真正伟大的决定性这些问题和想法同样也对后代有益。

追求对未来仍有价值和意义的理想，通常不是一件很有利可图的事业，而走这条路的人很少得到群众的理解的人认为啤酒和牛奶的价格比对未来的远见卓识的计划，这些计划只能在以后实现，其优势只有后人才能享受。

由于某种虚荣心，而虚荣心始终是愚昧无知者的血缘关系之一，一般历届政客总是会回避那些很难实现的未来计划付诸实践；他们会避免这样做，以免失去暴民。



这些政治家的重要性和成功完全属于现在，不会对未来产生任何影响。

未来的影响，但这并不会让那些心胸狭窄的人担心，他们很满足于暂时的结果。

建设性政治哲学家的立场则截然不同。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他工作的重要性总是被掩盖起来；而他经常用 *Weltfremder*（即梦想家）这个词来描述。

政治家的能力在于掌握可能性的艺术，而一个政党的创始人政治制度属于那些据说只是为了取悦神灵的人，因为他们希望并且要求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总是必须放弃当代的名声，但如果他们的想法他们将永垂不朽，后世将永远铭记他们。

在人类漫长的进步历程中，有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务实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是一体的。这种联盟越紧密，阻碍就越大。

政治家的活动必然会遭遇。

这样的人，不是为了满足人人都明白的要求而努力的。

庸俗，但他追求的目标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他的生活被撕裂仇恨和爱将他分开。他的同时代人不理解他，因此提出抗议。

与后人的认可相冲突，他也为后人努力工作。

一个人为未来所做的工作越大，他的未来所得到的赞赏就越少。

同时代人。因此，他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他的成功也更加罕见。当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人出现了，并获得了成功，然后，在他生命的尽头几天后，他或许已经隐约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名声。

这样的伟人只是历史上的马拉松选手；当代的荣誉桂冠只是为垂死英雄的额头。

伟大的主角是那些为自己的思想和理想而奋斗的人，尽管他们他们的一生都不会被同时代人所认可。他们的一生将会被铭记永远铭刻在后世子孙的心中。

似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对错误做出事后赎罪伟人在他们的同时代人手中遭受了苦难。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然后带着感动和感激的钦佩之情进行学习。

尤其是在黑暗的苦难日子里，这样的人有能力治愈破碎的心灵，并人民的绝望精神。这一群体不仅包括真正伟大的政治家，而且包括所有伟大的改革者。除了腓特烈大帝，我们还有马丁·路德和理查德·瓦格纳。

当我听到戈特弗里德·费德的第一次演讲《废除利息的奴役》时，我立刻明白了，这是一个对未来具有超越重要性的真理。

德国人。

证券交易资本与国家经济生活的绝对分离将使其可以反对德国企业的国际化，同时又不攻击资本本身，这将危及我们国家独立的基础。

我清楚地看到了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当时意识到，我们将会进行的最激烈的斗争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是对抗外敌，而是对抗国际资本。在费德的演讲中我为我们即将进行的斗争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口号。

后来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印象是多么正确。我们中间的傻瓜资产阶级政客不再嘲笑我们这一点，因为甚至那些政客现在也看到，他们会说实话，国际证券资本不仅是主要的煽动者引发战争的因素，但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它却使和平变成了地狱。

反对国际金融资本和借贷资本的斗争已成为纲领中的重要观点是德国民族为争取经济自由和独立。

对于所谓务实人士提出的反对意见，下面的回答应该足够了。所有担心废除该法将带来可怕的经济后果利息资本所导致的奴役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首先，经济原则迄今为止采取的措施已被证明对德国人民的利益是致命的。

当维护我们民族生存的问题出现时所采取的态度，生动地让人回想起巴伐利亚医学院等专

家也曾就这个问题给出过类似的建议引入铁路。

这群权威专家所表达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

那些乘坐新“蒸汽马”车厢的人不会患上眩晕症。那些旁观的人并没有生病，而原本用来遮盖新发明，从未被提出过。

只有眼罩遮住了那些所谓的“专家”的视线一直如此，并且将永远如此。

其次，必须牢记以下几点。任何想法如果被视为目的本身，而实际上它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对我和所有人来说，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只有一个口号：人民和祖国。

我们要争取的，是我们民族生存和繁衍的必要保障，人民，我们孩子的生存，以及我们种族血统的纯洁，自由和祖国的独立，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完成所赋予的使命造物主赋予它。

一切思想和理想、一切教学和一切知识，都必须服务于这些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必须经过检验并转化为实际用途，否则就必须被丢弃。

因此，理论绝不会成为死的教条，因为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保证我们的存在。

戈特弗里德·费德得出的结论决定我对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很熟悉。

我又开始学习，就这样我第一次完全理解了什么是实质以及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毕生事业的目的。

我第一次读懂了他的《资本论》，现在我清楚地理解了社会民主党反对国民经济的斗争，为争夺真正的国际资本和证券资本的霸权。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门课程也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一天，我的名字是希望参与讨论。另一位参与者认为他会为犹太人折断长矛，并为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保卫战。

这引起了我的反对。绝大多数参加讲座的人支持我的观点。结果就是，几天后，我被分配到一个随后该团驻扎在慕尼黑，并在那里担任“指导官”。

当时，部队纪律性比较薄弱，部队还处于士兵委员会掌权时期的后遗症。只有逐渐地、能否引入新的军事纪律和服从精神来取代“自愿服从”，这一术语曾被用来表达军事纪律的理想在库尔特·艾斯纳 (Kurt Eisner) 杂乱无章的政权统治下。

必须教会士兵以民族和爱国的方式思考和感受。在这两个方向上规划我未来的行动路线。

我以最大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在相当多的听众面前演讲。我现在能够证实我迄今为止只是感觉到的，也就是说，我有演讲的天赋。

我的声音已经好多了，至少在小声的地方大家都能听懂我的声音。

士兵们聚集的大厅。没有比这个任务更让我高兴的了；因为现在，在退役之前，我能够为一个机构提供有用的服务，这个机构在我心中变得无比珍贵的，就是军队。

我可以说我的演讲是成功的。在我的演讲过程中，我引导大家回顾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同胞，向他们的人民和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

将这些军队“国有化”，通过这样做，我帮助恢复了整体纪律。

在这里我又认识了几位和我想法相似的同志。

这些人后来成为新运动发展起来的第一批成员。

## 第九章：德国工党

有一天，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我调查一个协会的性质，该协会显然是政治性的。它自称为“德国工党”，并很快举行了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将在会上发表讲话。

我被命令参加这次会议，并报告协会的性质。好奇心精神其中，军队当局当时对政党的态度是可以很好理解的。

革命赋予了士兵积极参与政治的权利，特别是那些经验最少的人，他们利用了这一特权，但没有直到中央政府和社会民主党被迫承认士兵们的同情心已经从革命党派转向民族运动和民族觉醒，他们是否觉得有义务从军队撤出权利投票，并禁止士兵进行一切政治活动。中央和马克思主义采取这一政策这一事实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从而削弱了“公民的权利”——正如他们在战后描述士兵的政治权利一样。

革命——1918 年 11 月成立的政府将是几年之内就被推翻，国家的耻辱和耻辱就不会进一

步延长。

当时，士兵们正准备把这个国家的吸血鬼和谄媚者清除出去，在国内为协约国的事业服务但事实上所谓的“民族”政党热情地投票支持组织 1918 年 11 月的革命也使得军队不再成为民族复兴，从而再次表明了纯粹抽象的这些最容易受骗的人所吸收的观念。

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思想已经僵化到他们真诚地相信军队可以再次成为它以前的样子，即德国英勇的壁垒，而中央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只想拔掉民族主义的毒牙，没有它，军队永远只能是一支彬彬有礼的部队，而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支具有抗击外敌能力的军事组织。

后来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或者我们的“国家”政客们认为，毕竟，我们军队的发展可能不是全国性的？这种信念可能是可能的这可能是因为，在战争期间，他们并不是士兵，而只是说话的人。

换句话说，他们是议员，因此，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记得自己过去的伟大事迹的人，也记得他们曾经是世界上第一批士兵。

我决定参加这个我以前完全不了解的团体的会议。当我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了前 **Sterneckerbräu** 酒店的客房——这里现在已经成为对我们来说具有历史意义——我发现大约有二十到二十五个人在场，其中大多数属于下层阶级。

费德演讲的主题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因为我在我已经讲过了。因此，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本身上。

它给我的印象不好也不坏。我觉得这只是当时正在形成的许多新社团。在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感到被召唤每当他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满，并且失去了对所有各方都已存在信心。

因此，新的协会在各地涌现，又很快消失，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或留下任何印象。一般来说，此类组织的创始人协会根本不了解将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意味着什么一个政党或一个运动的基础。

因此，这些协会因缺乏足够的掌握情况的要领。

听完他们的演讲后，我对“德国工党”的看法并没有太大改变大约两个小时。我很高兴费德终于结束了。我观察到够了，正要离开时，有人宣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讨论。

于是我决定留下来，但讨论似乎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进行。

正当人们提到重要性时，突然一位“教授”开始讲话。

他开始对费德所说的话的准确性表示怀疑，然后，在费德说回答得非常有效，教授突然采取了他所谓的“基础”立场。

事实，但在此之前，他建议年轻的政党最迫切地引入脱离巴伐利亚脱离普鲁士作为其纲领中的主要观点之一。

这个人以最自信的方式坚持认为德奥将加入巴伐利亚，并且和平将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他还发表过其他类似的夸张言论。

此时此刻，我感到必须请求允许我发言，并告诉这位博学的先生，我的想。结果是最后发言的那位可敬的先生悄悄地走出了房间，像一条被鞭打的野狗，一声不吭。

当我讲话的时候，听众们都带着惊讶的表情听着。当我正当我准备向集会者道晚安并离开时，一个男人迅速追上了我，自我介绍。我没能听清楚他的名字，但他把一本小书放在我手里，显然是一本政治小册子，并非常诚恳地要求我阅读。

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协会，而不用参加令人厌烦的会议。此外，这个看起来像工人的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说罢，我就离开了大厅。

当时我住在第二步兵团的一个营房里。我有一间小房间它仍然带有明显的革命痕迹。

白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在第 41 轻步兵团的营地，或者参加在其他单位宿舍举行的会议或讲座。我只在宿舍过夜。

我住宿的营房。

由于我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所以我养成了自娱自乐的习惯看着在我的小房间里乱窜的小老鼠。

我过去常常把几片硬面包或面包皮放在地板上，观察这些有趣的小动物玩得开心，享受这些美味佳肴。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匮乏我一生中都很清楚饥饿是什么，也能够清楚地想象这些小动物们正在经历。

在我提到的那次会议后的第二天早上，大约五点钟，我完全躺下在床上醒来，看着老鼠们玩耍和争抢。由于我无法入睡我突然想起了在会议上一个工人给我的小册子。

是一本小册子，作者就是这位工人。

在他的小书中，他描述了他的思想如何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和工会的措辞，以及他如何回到民族主义理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这本小书命名为《我的政治觉醒》。

这本小册子一打开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它。

这里描述的过程与我十二年前经历的过程类似。

之前。

不知不觉中，我的脑海里又开始浮现出自己的经历。

那一天，我多次回想起我读过的内容，但我最终决定放弃此事没有进一步关注。

然而，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让我惊讶的是，它告诉我，我已被德国工党接纳。我被要求回复此函件，并打算下周三召开一次党委会会议。

这种招募会员的方式让我很惊讶，我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笑我无意加入任何已经存在的政党，而只是想成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政党。

我现在收到这样的邀请，我认为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正当我准备写一封书面答复时，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决定参加在指定的日期聚会，以便我可以亲自向这些先生阐述我的原则。

星期三到了。会议将在位于 **Hermstrasse**，似乎只有偶尔的客人会光顾。

这在 1919 年并不奇怪，当时即使是大型餐厅的菜单也是非常朴素和简朴，因此对客户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我以前从未听说过餐厅。

我走进灯光昏暗、看不到一个客人的酒吧间，寻找通向侧房的门，我在那里找到了“会议”。在一盏肮脏的煤气灯发出的昏暗灯光下，我看到四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其中一位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他热情地迎接了我，并欢迎我成为新德国工党党员。

我有点吃惊。当我得知，实际上，党的“帝国主席”还没到来，我决定暂时不作解释。

最后主席出现了。他就是那次会议的主席。

当 **Feder** 讲话的时候，**Sterneckerbrau**。

我的好奇心又被激发起来，我坐在那里等着会发生什么。现在我至少得到了甚至不知道在场的先生们的名字。协会的帝国主席是一位代表该区的主席是哈勒先生 (**Herr Harrer**)，而代表慕尼黑区的主席是安东·德莱克斯勒 (**Anton Drexler**)。

宣读了上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并对秘书进行了信任投票通过了。然后是财务主管的报告。该协会共有七马克的资金，五十芬尼，于是财务主管确信他得到了成员的信任。这现已被插入会议记录中。然后由主席起草的回复信被阅读：首先是一封来自基尔的信，然后是一封来自杜塞尔多夫的信，最后是一封来自柏林的信。

三个答复都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赞同。

然后他们读了收到的信件——一封来自柏林，一封来自杜塞尔多夫和基尔各有一封信。收到这些信似乎让人非常满意。

信件数量的增加被认为是德国工党的重要性。

然后呢？接下来是一场漫长的讨论，讨论如何回答这些新问题。

收到信件，一切都非常糟糕。这是最糟糕的教区泵俱乐部主义。我成为这样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吗？接下来讨论的是新成员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陷阱。我现在开始问问题。但我发现，除了一些一般原则之外，还有什么都没有——没有纲领、没有小册子、没有任何印刷品、没有会员卡、甚至没有党印，只不过是明显的善意和良好意图。

我再也不想笑了；因为这一切不过是对所有其他政党及其纲领、观点和活动？促使这几个年轻人加入到这个看似荒谬的行动中的情绪事业不过是内心的召唤，它告诉他们——尽管比有意识地——迄今为止存在的整个政党体系并不是那种可以恢复德意志民族或修复对德国人民造成的损害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控制着国家内政的人我快速地读完了党制定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是在打字的纸张。在这里我再次发现了渴望和探索精神的证据，但没有迹象无论对必须进行的冲突有怎样的了解。

我自己也经历过激励这些人的感受。这是对一场运动的渴望按照该词迄今被接受的含义，它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政党。

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军营的房间时，我已经对这件事有了明确的看法而我正面临着一生中最困难的问题，我应该加入这个党还是拒绝？从常识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应该拒绝，但我的感情却让我很困扰。

我越是试图向自己证明这个俱乐部总体上是多么的无意义，我的感觉就越使我倾向于支持它。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焦躁不安。我开始考虑所有的利弊。我很久以来决定积极参与政治。事实上，我只能通过一个新的我对这一动向十分清楚，但迄今为止我仍缺乏采取具体行动的动力。

我不是那种今天开始做某事，第二天就放弃的人。

为了新事物。这也是我难以决定加入的主要原因某种新创立的东西；因为这必须成为我所梦想的一切的真正实现，否则它最好根本不要开始。

我知道这样的决定会永远束缚我，而且不可能再回头了。对我来说不能闲着没事干，而只能热心地为之奋斗。我已经本能地反对那些什么都做，但从不把任何事情坚持到底的人。

结尾。

我厌恶这些万事通，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比他们将保持完全安静。

命运似乎亲自伸出手指，指引我前行的方向。我本不该进入一个我将在后面解释我这样做的原因。

这个荒谬的小团体，成员寥寥无几，似乎拥有独特的优势，尚未固化为一个“组织”，仍然提供了进行真正个人活动的机会就个人而言。

在这里，也许还能做一些有效的工作，而且，由于运动规模还很小，就能更容易地赋予它所需的形状。

在这里，仍然有可能确定运动的性质、要实现的目标和走这条路，对于任何一个大党来说，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存的。

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久，我越相信，这样一个小动作最适合作为民族复兴的准备工具，但这可能那些过于固守陈旧思想的议会政党永远不会这样做或有兴趣支持新政权。

这里需要宣扬的是新的世界观，而不是新的竞选口号。

然而，决定如何将意图付诸实践却极其困难。

我具备什么资格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在我看来，贫穷和无力这一事实是最容易让人忍受的但是我完全不为人知的事实带来了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我只是数百万个机会允许存在或停止存在，甚至他们的隔壁邻居也不会同意知道。

另一个困难是因为我还没有完成正规的学校课程。

所谓的“知识分子”仍然以无限的傲慢俯视那些没有被通过指定的学校并允许他们向他灌输必要的知识。

从来没有人问过“一个人能做什么？”，而是问他学到了什么？“受过教育”人们认为任何拿着一堆学术证书的傻子都是比那些缺乏这些珍贵文件的最能干的年轻人还要优秀。

因此，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个“受过教育”的世界会如何对待我，但我错了只是因为我当时相信，男人大部分都比他们在寒冷中表现得更好现实之光。

正因为如此，少数例外才显得格外突出。我学会了越来越多地区分那些一直在学校的人和那些有一天会知道一些事情。

经过两天的仔细思考和反思，我确信我必须深思熟虑的一步。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没有退路。

因此，我宣布我愿意接受德国工党授予我的党员资格，并且获得了编号为 7 的临时会员证书。

## 第十章 第二帝国

跌落的深度总是通过原始位置的水平差来衡量尸体从那里掉下来，现在就在那里。

这对于民族和国家也同样适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原始水平，或者更确切地说，下降开始前达到的最大高度。

因此，原有的地位至关重要，只有原有地位的倒下或崩溃能够超越一般的水平，给观看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那些能够深思的人来说，第二帝国的崩溃更加令人困惑并在他们的心中感受到它的影响，因为，帝国已经从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高度跌落。

在这些充满痛苦和屈辱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想象到。

第二帝国是在如此耀眼的整个民族都为之着迷和崇敬。

在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胜利之后，这个帝国被移交给了不朽的向英雄的子孙后代传播英雄主义。

无论他们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都无关紧要，德国人认为这个帝国，它的存在并非归功于议会派系的阴谋，它优于大多数国家都因为其建立。

当它奠基时，伴随的音乐并不是议会的闲聊辩论，而是围绕巴黎的战场上的雷声和战争的冲突。

就这样，德国人、诸侯以及人民，建立了未来的帝国，恢复了帝国皇冠的象征。俾斯麦的国家不是建立在逃兵和逃避兵的叛国和暗杀之上，而是建立在军团之上曾在前线战斗过。

这种独特的诞生和战火的洗礼足以让第二帝国被一种很少有古老州能像它一样拥有辉煌的历史光环。

多么繁荣的时期开始了！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地位保障了国内的生活来源。国家人口和财富都增加了。

国家荣誉以及全体人民的荣誉得到保障和保护一支军队，最能证明这个新帝国和旧帝国之间的区别德意志邦联。

第二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衰落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每个人似乎惊呆了，无法感受到这种垮台的重要性，或者反思它。

人们似乎完全无法在脑海中想象出帝国的高度以前没有达到过，那时的伟大和辉煌是如此虚幻和不真实。

与现在的痛苦形成鲜明对比。

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在试图看的时候会变得如此茫然回到辉煌的过去他们忘记寻找大崩溃的征兆，而大崩溃必然肯定以某种形式存在。

当然，这只适用于那些认为德国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地和一个生计来源。只有这些人才能感受到目前的状况真的是灾难性的，而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条件是他们所期望的实现。

一直期盼并默默祝愿。

未来崩溃的征兆在早期就已明显可见，尽管很少有人试图从它们的意义中得出实际的教训但现在这是一个更大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因为就像身体疾病只有在其根源被治愈时才能被治愈一样，政治病也一样，只有确诊了才能治疗。

当然，很明显，任何疾病的外部症状都比身体本身更容易被发现。

其内部原因，因为这些症状更容易被眼睛看到。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只认识到外部效应，并误以为它们原因。事实上，他们有时会试图否认这些原因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在当前的经济困境中才认识到德国的崩溃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几乎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这一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关注经济灾难是造成目前这种悲惨状况的原因。

广大人民群众很少看到这一现象的文化、政治和道德背景崩溃。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缺乏必要的感觉和理解能力。

人民群众如此评价德国衰落的原因，是相当这可以理解，但社会上聪明的部分人认为德国的崩溃主要被视为一场经济灾难，因此认为可以找到一种治疗方法经济解决方案，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带来任何改善的原因关于。

除非人们认识到经济只起着次要作用，否则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作用，而政治、道德、种族因素起着主要作用。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有可能理解当前邪恶的根源，从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德国为何真正崩溃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旨在克服这场灾难的政治运动来说。



为了找出德国分裂的原因，我们必须回顾过去要小心，以免我们被那些很容易引起注意的外部结果所打动，从而忽略这些结果不太明显的原因。

最简单的，因此也是最普遍接受的解释当前不幸，就是说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的结果，这是目前局势的真正原因。

苦恼。

可能有很多人真的相信这个荒谬的解释，但更多的人却在故意、有意识地撒谎。

这适用于所有现在在政府食槽里吃饭的人，因为先知们革命一次又一次地向人民宣告，战争的结果对广大人民群众。

相反，他们郑重地向公众保证，主要由高级金融部门对这场民族间巨大斗争的胜利结果感兴趣，但德国人民和德国工人对此毫无兴趣。

事实上，世界和解的倡导者们习惯性地声称，德国绝不会垮台，相反的事情必然会发生——那就是德国人民的复兴——一旦“军国主义”已被粉碎。

这些圈子不是也歌颂协约国吗？他们不是也把整个该把血腥斗争归咎于德国吗？如果他们提出军事失败的理论，他们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吗？不会对德国人民产生任何政治影响吗？整个革命不是都用漂亮的话来说，因为它会阻止德国旗帜的胜利前进，德国人民是否能由此确保其在国内外的自由？是不是这样呢，你们这些可怜的、撒谎的恶棍？犹太人典型的厚颜无耻是宣告失败所必需的。

军队是德国崩溃的原因，事实上，柏林《前进报》是该报的机关报，煽动叛乱的喉舌，在这次会议上写道，德国民族不应该被允许胜利地把旗帜带回家。然而我们的崩溃却归咎于军事上的失败。

当然，与这些否认这一点的骗子进行争论是不可能的。

此刻他们说了什么。如果不是因为事实上，有很多没有思想的人，鹦鹉学舌地重复这些事情，而没有必然受到任何邪恶动机的激发。

但我在这里提出的观察也是为了我们的战斗追随者，因为如今，人们说过的话常常会被遗忘，其含义也会被扭曲。

关于战争失败是德国崩溃的原因的说法，最好的回答是如下：不可否认的是，战争的失败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具有悲剧性的意义，但这种损失本身并不是原因，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结果。

这场生死战的灾难性结局必定会引发一系列灾难每一个有洞察力、能够直截了当地思考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不幸的是，有些人的理解能力似乎在那时失败了关键时刻。

还有一些人起初质疑这一事实，后来完全否认，是那些在秘密愿望实现之后，突然面临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合作的结果。

这些人应该为崩溃负责，而不是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尽管他们现在想把责任归咎于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事实上，战争的失败是他们的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这正是糟糕领导的结果，他们现在想维持这种局面。

我们的敌人不是懦夫。他们也知道如何去死。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他们数量超过德国军队，全世界的军火库和军工厂都他们对军事装备的补充。

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德国在四年间稳步取得的胜利多年来与全世界的战争，当然，除了士兵的英勇行为，这个宏伟的组织完全归功于德国军事领导。

德国军队的组织和领导是最强大的从未见过。任何明显的缺点都是人为不可避免的。军队不是我们现在的困境的原因。它本身是以太故障的结果，但是这个其后果反过来又导致了进一步的崩溃，这是更加明显的。

事实确实如此，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证明：军事失败是否必然导致如此彻底地颠覆国家和民族？这是否是一场不幸的、失败的战争的结果？事实上，一个国家是否真的会因为一场失败

的战争而毁灭？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军事失败是内心腐烂、懦弱、品格缺陷的结果，是对这些事情的报应。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军事失败将导致民族复兴，并带来全国上下要更加努力。

军事上的失败并不是国家生命的墓碑。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证实该陈述的真实性。

不幸的是，德国军事垮台并不是一场不应有的灾难，而是一个应得的惩罚，其性质为永恒的报应。

这次失败是我们应得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系列内部现象的分解，虽然它们是可见的，但大多数人都承认，他们采取鸵鸟策略，只看到他们自己想看的。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德国人民在德国所表现出的症状接受了这个失败。难道不是在几个圈子里，祖国的不幸甚至以最可耻的方式受到热烈欢迎？谁能做出这样的行为而不因他的态度而受到报复呢？难道没有有些人甚至更进一步，夸口说他们已经削弱了阵线并导致倒塌？因此给我们带来这一耻辱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的同胞。

如果他们后来因此遭受不幸，那这种不幸是否不应得？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例，一个民族宣布自己发动战争，甚至反对它的良心和更好的判断力？不，再一次不。从德国民族对失败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崩溃的真正原因必须从别处寻找，而不是纯粹的少数军事损失阵地或进攻失败，因为如果前线本身已经让步，从而导致一场国家灾难，那么德意志民族就会以完全不同的精神接受失败。

它会咬紧牙关承受随后的不幸，或者悲痛欲绝。

对敌人的遗憾和愤怒，胜利是偶然事件或命运的旨意将会充满人民的心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会遵循罗马元老院的例子，将会面对返回的失败军团，并表达感谢他们做出的牺牲并敦促他们不要失去对帝国。

即使是投降书，也会在冷静的理智支配下签署，而内心却已经击败，希望即将到来的复仇。这就是对军事失败的接受，而失败只能归咎于命运之神注定要惩罚他们。他们既不会欢乐，也不会跳舞。

懦弱是不会得到夸耀的，失败也不会得到光荣。

从前线归来的部队不会被嘲笑，旗帜也不会被拖入尘土，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可耻的事态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使得英国军官雷平顿上校轻蔑地宣称：“三分之一的德国人都是叛徒。”不，在这种情况下，这场瘟疫绝不会像一场真正的洪水那样严重，在过去五年里，德国民族在外界对它的尊重已经荡然无存。

世界。

这清楚地表明，说战争失败是德国分裂。军事失败本身只是一系列病态症状的结果以及战争爆发前德国民族中已经活跃起来的事业。

这次崩溃是传统和民族士气受到毒害，自我保护的本能退化。这些都是这些基本原因多年来一直在破坏国家的基础，德国。

犹太人和他们的战斗同志们，都具有无可挑剔的谎言能力，马克思主义者，把垮台的责任归咎于唯一一个表现出他用超人的意志力和精力，努力阻止他所预见的灾难并使国家免于遭受彻底的毁灭和耻辱。

他们将世界大战失败的责任推到鲁登道夫的肩上，把道德权利的武器从唯一一个足够危险、可能成功的手手中夺走将背叛祖国的人绳之以法。

所有这些都是受到一个本身非常正确的原则的启发——在弥天大谎中总有一个一定的可信度；因为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总是更容易被腐蚀在他们的情感本质的更深层次上，比有意识或自愿地更深层次地，因此在他们头脑简单，更容易成为大谎言的受害者，而不是小谎言，因为他们自己经常在小事上撒谎，但又羞于诉诸大谎。

规模虚假。

他们绝不会想捏造巨大的谎言，他们也不会相信其他人竟敢如此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即使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仍然会怀疑和动摇，并将继续认为可能还有其他解释，因为这个极其无耻的谎言总会留下痕迹，即使谎言已经被揭穿——这是所有撒谎高手都知道的事实。

这个世界和所有合谋撒谎的人都非常清楚并利用最卑鄙的方式。

然而，自古以来，犹太人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谎言和诽谤可以被利用。

他们的存在难道不是建立在一个弥天大谎之上吗？那就是他们是一个宗教团体。

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种族？多么伟大的民族啊！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把犹太人称为这句话深刻而真实。他称犹太人为“伟大的谎言”。

那些不了解这句话的真实性或不愿相信这句话的人，永远无法帮助真理得以传播。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大幸事，因为它在痛苦突然减少，并演变成如此可怕的灾难，因为如果事情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将会更加缓慢但更加肯定地走向毁灭。这种疾病可能会变成慢性病；而在灾难的急性形式中，它至少表现出在相当多的观察者眼中，这一点本身就很明显。

人类战胜黑死病比战胜其他疾病更容易，这并非偶然。

结核病。第一个出现在震惊全人类的死亡浪潮中的是另一些则阴险地推进；前者引发恐惧，后者则逐渐让人冷漠。

但结果是，人们用尽了他们所能的全部精力来反对前者，而他们却试图用微弱的手段来抑制结核病。因此，人类已经控制了黑死病，而肺结核仍然在折磨着他。

这同样适用于国家疾病。只要这些疾病不是灾难性的，人们将慢慢地适应这些措施并最终屈服。

当命运决定干预这个缓慢的过程时，这便是一种幸运——尽管是一种苦涩的幸运。

腐烂，并突然让受害者面临疾病的最后阶段。更常见的是灾难的结果就是立即采取治疗措施，并严格执行决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先决条件始终是承认导致该疾病的内部原因。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将根本原因与情况区分开来发育成新个体。病菌在体内停留的时间越长，发育就变得越困难。

他们被允许成为该机构组成部分的时间越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识别某些明确的剧毒，以至于它们被接受为属于民族存在，或者它们仅仅是被容忍为必要之恶，因此寻找这些外来细菌的激烈尝试并不被认为是必要的。

在上一次战争之前的长期和平时期，某些邪恶现象随处可见尽管，除了一两个例外，很少有人努力去发现它们的起源。

同样，这些例外主要是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对个人来说，这比许多人身上存在的邪恶状况更为明显其他领域。

有许多腐朽的迹象，应该认真考虑。至于就经济而言，可以说，德国人口在 18 世纪前惊人的增长战争使得提供日常面包的问题在所有方面都变得越来越突出。

政治和经济思想与行动领域。

不幸的是，负责人无法下定决心找到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并倾向于通过更便宜的方法达到目的。

拒绝获取新领土的想法，代之以对商业征服世界最终必然导致无限的和有害的工业化。

这种方式带来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后果是农业阶级的衰落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增加成正比直到最终平衡被彻底打破。

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现在变得显而易见。奢侈和贫穷如此接近后果必定是悲惨的。贫困和频

繁的失业开始对人民造成严重破坏，并留下了不满和怨恨。

此举意在将民众划分为不同的政治阶层。

尽管商业繁荣，但不满情绪却日益高涨。事情最终到了这样的地步：带来了“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的普遍信念，尽管没有人似乎能够想象到真正要发生的事。

这些都是普遍不满情绪达到极点的典型和明显迹象。

然而，比这些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的工业化。

随着商业对国家进行明确控制的程度越来越高，货币变得越来越而更像是一位人人都必须侍奉、人人都必须鞠躬下拜的神。

天神变得越来越过时，被放在角落里，崇拜玛门的空间。

由此开始了一段彻底堕落的时期，这段时期变得尤其有害，因为它始于当时，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崇高的理想，因为关键时刻威胁。

德国本应准备好用剑来捍卫自己为赢得日常面包所做的努力以和平的方式。

不幸的是，金钱的主导地位得到了支持和认可，而应该反对它。

德皇陛下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新金融世界的代表提升到贵族阶层。

诚然，这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即俾斯麦甚至没有意识到威胁的危险在这方面。然而在实践中，所有理想的美德都成为次要的考虑因素，而钱，因为很明显，一旦走上这条路，真正的旧贵族很快就会其地位仅次于贵族金融家。

金融行动比战争行动更容易成功。因此，金融行动不再是任何重大的对于一位真正的英雄甚至一位政治家来说，与某位犹太银行家建立联系是一种吸引力。

真正有功之人对接受廉价的勋章不感兴趣，因此谢绝了。

但从良好教养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是令人深感遗憾的。

贵族阶级开始越来越丧失其种族特质，而种族特质正是贵族阶级的本质特征。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平民”一词可能更合适的。

由于缓慢消除，导致严重的经济混乱。

个人对既得利益的控制以及整个经济结构的逐步转变股份公司手中。这样，劳动力就沦为投机的对象落入无良剥削者的手中。财产所有权的非人格化日益加剧规模巨大。金融交易圈开始取得胜利，并在承担掌控整个国家生活。

战前，德国经济结构的国际化已经开始。

绕道发行股票。确实，一部分德国工业家下定决心试图避免危险，但最终在金钱的联合攻击下还是屈服了。

夺取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其忠实的追随者的协助。

针对德国“重工业”的持续战争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德国经济生活的国际化。

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才能使这一切圆满结束。

能在革命中有所收获。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对德国国家铁路的总攻正在取得成功。

现在要交给国际资本家。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再一次实现了其主要目标之一。

德意志民族的“商业化”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的最好证据是，这一点可以从战争结束后德国陆军的一位主要上尉工业和商业认为，商业本身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重新站起来。

这种胡言乱语是在法国重建公共教育的时候说出来的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从而消除了国家生活依赖商业的观念而不是理想价值观。

斯廷内斯当时向全世界发表的声明引起了难以置信的混乱。

立即被接受，并成为所有那些骗子和喋喋不休的人的主要座右铭——革命后，命运之神赋予了德国“政治家”的称号。

战前德国颓废主义最严重的表现之一，就是做事半途而废。这是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感的后

果之一，这也归因于某种原因导致的某种胆怯。后者教育制度使得这种疾病更加严重。战前的德国教育有很多薄弱之处。它简单而仅仅局限于纯知识的生产，很少关注发展的实践能力。

对个人性格的发展给予的关注更少，因为这是几乎没人关注培养责任感，加强意志和决策力。这种方法的结果并不是坚强的人，而是充满知识的温顺生物，并产生博学的人他热衷于了解一切事物。

战前，我们德国人被接受并被相应地评价。

德国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他能得到应有的利用；但他却不被人尊重就个人而言，是由于他的性格弱点。

对于那些能够正确理解其意义的人来说，以下事实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所有德国人是第一个放弃其国籍的人，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在异国他乡，当时有一句话意义非凡盛行，手上可以走遍整个国家。

这种社交礼仪规定了必须遵守的排他性形式，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应在陛下面前遵守。这些表格坚持认为不应存在合同任何虚构的事物，国王所喜欢的一切事物都应受到赞扬。

正是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坦率地表达男人的尊严，而不是屈从因为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注定会因为这种屈从而垮台，因为曾是。

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也许对职业走狗来说已经足够了，占位猎人，事实上，对于那些在靠近的地方感到更自在的颓废的人来说，王位比诚实的公民更糟糕。

这些极其“卑微”的生物，尽管在他们的主人和面包面前卑躬屈膝，给予者，总是对其他凡人表现出无限的傲慢态度，这是当他们自称是唯一有权被称为“君主主义者”。

这是一件极其无礼的事，只有新近被授予贵族头衔或尚未被授予贵族头衔的人都有能力。这些人一直都是为君主制的垮台做准备的人和君主制原则。

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当一个人准备为某个事业挺身而出时，无论发生什么，他决不向其代表卑躬屈膝。

一个认真对待机构维护和福利的人会竭尽全力坚持下去如果该机构出现某些错误和缺陷，他当然不会像某些假民主‘朋友’那样到处散布谣言君主制已经完成了；但他将接近佩戴王冠的陛下，警告他事态的严重性并说服君主采取行动。

此外，他不会采取这样的观点，即必须由国王陛下来充当后者认为合适的，即使他所采取的做法显然会导致灾难。

我想到的这个人会认为他的职责是保护君主制免受君主本人的侵害，无论这样做会冒什么样的个人风险。如果君主制度的价值依赖于君主本人，那么这将是可想象的最糟糕的制度；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国王才会被视为智慧、理解和正直的典范。

性格，尽管我们可能不这么认为。

这一事实对那些职业流氓和走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所有正直的人，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驳斥“君主都是明智的”这种荒谬的虚构，等等。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历史就是历史，真理就是真理，即使涉及到君主。

一个国家有幸拥有一位伟大的国王，同时也是一位伟人，如果邪恶的命运没有给它安排更加可怕的命运，它就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

显然，君主制原则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取决于除非上天注定要把王冠戴在像腓特烈大帝，或者像威廉一世那样的睿智之人。

这种情况可能几百年才会发生一次，但几乎不会再频繁发生。

君主制的理想优先于君主本人，因为制度的意义必须在于制度本身。

因此，君主可以算作那些有责任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也不过是他是机器中的一个轮子，因此

他有义务对它尽职尽责。他必须适应实现崇高的目标，而你真正的“君主主义者”并不是允许佩戴者王权可以以王权的名义犯下罪行，但他可以阻止这一切。

因此，如果这个想法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而一切仅仅集中在围绕“神圣”的人，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废黜一个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傻瓜。

现在必须抵制这个真理，因为最近那些现象对君主制的垮台负有很大责任的现象再次出现。这些人又一次天真无耻地谈论“他们的国王”——就是说几年前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可耻地抛弃的那个人。

那些不参与这种谎言合唱的人被概括为“坏人德国人。”提出这些指控的人，和 1918 年一上台就逃跑的人，是同一类的放弃者。

看到红色臂章，他们就把凯撒丢在一边，匆忙把步枪换成手杖，拿起戴中性色领带，并以爱好和平的形象淡出人们的视线公民。

突然间，这些皇室拥护者都不见了。谨慎地说，这些王室的“仆人和顾问”一个接一个地再次出现，继续他们的口头服务直到其他人承受了反保皇党的攻击并镇压了对他们来说，这是革命。

他们又一次聚集在那里，渴望地注视着埃及的肉锅，几乎要爆裂了对皇家事业的忠诚。

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红色徽章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然后整个旧君主制的摇摇欲坠的走狗队伍将会像老鼠躲避猫一样再次逃走。

如果君主本身对这些事情不负责任，人们就不得不同情但他们必须意识到：有了这样的勇士，王位可能会丢失，但永远不会获得。

所有这些虔诚都是错误的，是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结果，案件带来了特别严重的报应。

各宫廷中都存在着这种可悲的虚伪行为，君主制逐渐变得被破坏。当整个结构最终开始摇摇欲坠时，他们就从凡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卑鄙无耻的人永远不会愿意为他们的主人而死。君主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却很少真正费心去学习它，这一直是他们的失败之处。

错误的教育制度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害怕承担责任，其结果就是在处理显而易见的、至关重要的生存问题时显得软弱。

然而，这场流行病的起点是在我们的议会制度中，在那里，推卸责任责任感得到了特别的培养。

不幸的是，这种疾病慢慢蔓延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影响了公共事务领域。

到处都在推卸责任，导致措施不足或不彻底采取行动时，每个行动的个人责任被降至最低。如果我们考虑各国政府对一系列真正有害的公共生活中的现象，我们就会立即认识到这种半途而废政策的可怕意义。

措施不力，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

我将从我所知的大量事例中挑选出几个。

在新闻界，人们习惯将新闻界称为“大国”。

国家。事实上，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

我们不能高估它，因为媒体甚至在成年人的生活中也继续发挥教育作用。

一般而言，报刊的读者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相信读过的所有书；第二类是那些不再相信任何事物的人；第三类是那些批判性地检查他们所读的内容并据此形成判断。

从数量上看，第一类群体是最大的，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成。

从智力上来说，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单纯的群体。

它不能按照职业进行分类，只能按照智力等级进行分类。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类人包括所有那些没有生来独立思考或没有学会做事的人所以，有些人，部分是由于无能，部分是由于无知，相信一切既定的事实以印刷版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我们还必须加上那种懒惰的人，他们虽然能够独立思考，但懒惰的人们感激地吸收了水獭所想出的一切，谦虚地认为这是已经彻底完成了。

报刊对构成一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所有这些人的影响是因此非常巨大。

但不知何故，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亲自筛选所提供的内容对他们来说，他们对日常问题的整个态度几乎完全是外在因素的结果。

影响。

当公众启蒙具有严肃性和真实性时，所有这些都是有益的，但是一旦恶棍和骗子参与这项工作，就会造成巨大危害。

第二组人数较少，部分成员来自以前第一组，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失望之后，现在准备不再相信他们在印刷品中看到。

他们讨厌所有的报纸。他们要么根本不看报纸，要么变得异常恼火他们认为其内容不过是谎言和虚假陈述的集合。

这些人很难对付，因为他们总是对真理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对于任何形式的积极工作都是无用的。

第三组无疑是最小的，由真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天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事物试图形成自己的判断，同时仔细筛选所读内容。

他们不会阅读任何报纸，除非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与作家，这自然不会让作家轻松完成任务。记者很欣赏这种类型的读者仅需一定数量的预订。

因此，报纸所能提供的垃圾信息并没有什么危险——更不用说对于第三组读者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读者已经学会将每个记者视为流氓有时他会说实话。

最不幸的是，这些读者的价值在于他们的智慧，而不是他们的数字在智慧毫无意义、多数人都一切。

如今，当群众的选票成为决定因素时，决定权就掌握在人数最强大的群体手中；也就是说第一组，一群傻瓜和轻信的人。

防止这些人落入虚假、无知甚至邪恶的教师之手。因此，国家有责任监督他们的教育并防止任何形式的犯罪行为。

应该特别关注媒体；因为它对这些人的影响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最深刻的是，它的影响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的。它的巨大意义在于其教学的统一和持续的重复。

不管在哪里，国家都不应该忘记，一切手段都应该集中于同一个目标结束。它不能被意志所误导——所谓的“新闻自由”，或者被说动忽视其职责，并扣留从国家中找出善良和行善之事。

国家必须以坚定的决心控制这一大众教育工具，使其服务于国家和民族。

但德国媒体为读者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呢？战前的日子？这难道不是最毒的毒药吗？和平主义难道不是最糟糕的形式吗？当其他人正慢慢但坚定地准备攻击我们时，我们却被接种到了我们的人民身上。

德国？难道我们的媒体在和平时期没有给公众灌输对国家本身的主权权利，从而已经妨碍了国家选择其治理手段。

防御？难道不是德国媒体懂得如何制造关于“西方民主”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直到热情的公众最终准备将其权力委托给联盟的未来如何？这些媒体难道没有导致我们人民的道德沦丧吗？道德和公共礼仪岂不是显得可笑，被归为过时和平庸？直到最后我们的人民也变得‘现代’了？新闻界不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攻击，不断破坏国家权威吗？直到一次打击就足以让这个机构摇摇欲坠吗？难道媒体没有竭尽全力反对把属于人民的财产交给国家吗？国家，并成为不断批评的手段，损害军队的声誉，破坏将军征兵和要求拒绝军事

信贷等——直到这场运动的成功有把握吗？所谓的自由派媒体的作用是为德国人民挖掘坟墓，赖希：没有必要提及那些撒谎的马克思主义报刊。

对它来说，传播谎言就像狩猎对猫一样必不可少。它唯一的任务就是打断人民的脊梁，使人民成为奴隶。

国际金融及其主人——犹太人。

国家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抵消这种对公众思想的全面毒害？绝对没有。通过了几项微不足道的法令，对几起案件进行了惩罚，臭名昭著的罪行，事情到此结束。

通过这一政策，人们希望通过奉承来赢得这个害虫的青睐，通过承认新闻的“价值”是“重要性”，是“教育使命”，以及类似的废话。犹太人带着会心的微笑承认了这一切并表示感谢。

国家这一可耻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拒绝认识到危险在于采取完全懦弱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情况，采取错误的和措施无效。没有人有勇气采取任何有力和激进的手段。

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拖延时间，不但不能击中它的核心，反而激怒了毒蛇结果是不仅一切保持原样，而且这种力量本来应该予以打击的制度却一年比一年壮大。

当时政府针对主要由犹太人控制的媒体所提出的辩护是慢慢地腐蚀国家，没有明确的行动路线，没有坚定的决心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固定的目标。

这就是官方对情况的理解完全失败的地方，不仅在估计斗争的重要性不在于斗争的方法，而在于选择斗争的手段和确定斗争的计划。

它们只是对问题进行了小修小补。偶尔被咬的时候，它们会囚禁其中一只或另一只新闻毒蛇几周或几个月，但整个毒害群体被允许继续存在和平地。

必须承认，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方面是犹太人，另一方面是明显的官员愚蠢或天真。

犹太人太聪明了，他们不会允许他们的整个媒体同时受到攻击。

部分充当了另一部分的掩护。而马克思主义报纸，在最卑鄙的以最可能的方式，辱骂一切神圣的东西，愤怒地攻击国家和政府，煽动社会上某些阶级互相反对的资产阶级民主报纸，也犹太人的手，成功地伪装成客观性的典范。他们刻意避免使用粗鲁的语言，因为他们深知，笨蛋只能通过外表，永远无法洞察事物的真正深度和意义。它们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不是看其内容，而是看其外表。这种人性的弱点并得到媒体的认真研究和解读。

这类傻瓜会认为《法兰克福报》是尊重。它总是小心地避免直言不讳。

它反对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并不断呼吁贵族用‘智力’武器进行战斗。

奇怪的是，这种战斗方式最受智力最低的阶层的欢迎。

是我们教育缺陷的结果之一，它剥夺了年轻人的自然本能，向他们灌输一定量的知识，但不能给予他们真正的洞察力，因为这不仅需要勤奋和善意，还需要天生的理解力。

人类必须追求的最终洞见是理解本能和基本的。

让我解释一下：人不能陷入这样的错误想法：他注定要成为主宰和大自然的主人。

不平衡的教育助长了这种错觉。人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法则必然性统治着整个自然界，他的存在也服从于法律永恒的斗争和冲突。

他会觉得，在一个由行星和太阳沿着轨道运行，卫星和行星沿着它们注定的路径运行，强者永远是弱者的主人，弱者必须服从，否则就会被毁灭。

人类也必须服从这种最高智慧的永恒原则。

他可以尝试去理解他们，但却永远无法摆脱他们的影响。

犹太人正是为我们这个知识界的半社会才写这些论文，并称其为自己的“知识分子”媒体。法兰克福报和柏林日报就是为他们写的，基调适合他们，并且这些论文对这些人产生了影响。

虽然刻意避免使用任何可能让读者觉得粗鲁的表达形式，但这种毒药从其他小瓶注入顾客



的心脏。

活泼的语调和优美的措辞让读者相信，对知识和更多的原则是决定此类论文政策的唯一驱动力，而实际上，这些特征代表了一种消除任何可能被针对新闻界。

有些人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愚蠢的公众就更愿意相信他们因为其他人只是适度胡言乱语永远不会滥用“言论自由”。

新闻界”（这种向公众灌输谎言、毒害公众思想的系统被称为“新闻界”）。

因此，当局对这些记者盗贼采取的措施确实非常缓慢，因为他们担心立刻疏远所谓受人尊敬的媒体的同情，担心这太好目前，任何针对小报记者的起诉都是其他国家立即向它提供援助，实际上并不是支持它的政策，而只是为了捍卫新闻自由和舆论自由的原则。

这种呼声将成功地吓倒最坚定的人，因为它来自被称为正派新闻。

这样，毒药就进入了国家血液，感染了公众生活，而没有政府是否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控制疾病的进程。

所采取的荒谬的折中措施本身就表明了瓦解已经威胁到帝国的分裂，对于一个实际上当它不再决心用它所有的武器来保卫自己时，它就放弃了自己的存在命令。

任何半途而废都是内部衰败过程的外在表现，必然导致外部崩溃是迟早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正确引导，我们这一代人将很容易克服这一危险，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某些事情，这些事情一定增强了那些没有被他们破坏了。

将来，一旦有人动手，犹太人肯定会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在他们最喜欢的巢穴里，一旦采取行动结束这场丑闻，一旦这塑造公众舆论的工具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不再留在外星人和人民的敌人之手。

我确信，这对我们来说会比我们的父辈更容易。十二英寸的尖叫声炮弹比一千条犹太报纸毒蛇的嘶嘶声更具穿透力。因此，让他们走吧继续发出嘶嘶声。

另一个例子是，在处理重大的国家问题时，战前德国的情况如下。与感染政治和道德进程密切相关的是一个同样严重的感染过程多年来一直在攻击着人们的健康。

国家。

特别是在大城市，梅毒发病率稳步上升，结核病也随之蔓延。

几乎全国各地都充满了死亡。

尽管这两起事件对国家的影响都令人担忧，但似乎没有人采取任何果断措施打击这些祸害。尤其是在梅毒问题上，国家和公共当局的态度是绝对投降。为了对抗这种状况，采取比实际措施更为彻底的措施已经通过的决议应当得到执行。

发现一种有疑问的治疗方法，并且以极好的方式投放到市场上的农产品对防治这种祸害几乎没有帮助。在这里，唯一的办法采取的措施是针对疾病的病因而不是症状，但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原因在于爱情被滥用的方式。

尽管这并没有直接导致可怕的疾病本身，但国家仍然必须遭受苦难由此造成的严重损害，因为这种卖淫所造成的道德破坏足以慢慢地但肯定地导致国家毁灭。

这种对我们精神生活的犹太化和对我们生育本能的崇拜将迟早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灾难。

我们不会看到强壮、健康、自然情感的产物，而是看到可怜的样本人类的进步源于经济计算，因为经济考量变得越来越也是爱情寻找出口时婚姻的基础和唯一前提条件别处。

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违抗自然，但迟早自然会夺走她的报复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个真理时，往往为时已晚。

我们自己的高尚品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表明持续的拒绝承认正常婚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生育的结果，一方面，它取决于一方面是社会压力，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

一个导致遗传性衰弱，另一个导致血液污染；对于所有犹太人来说百货商店老板的女儿被视为有资格合作的配偶繁衍他的领主的血统，而血统看起来确实如此。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绝对的退化。

现在我们的资产阶级也在努力走这条道路。

他们的命运也将会相似。

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被匆匆而漠然地抛在一边，仿佛这样一来，事务也可以被废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大城镇和城市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卖淫来满足其爱情本能并因此越来越受到性病祸害的污染。

一方面，这种大规模感染的明显影响可以在我们的精神病院中观察到另一方面，唉！孩子们也一样。这些都是悲哀而悲剧性的产物。

日益严重的祸害正在毒害我们的性生活。他们的痛苦是父母的恶习。

有很多方法可以接受这个令人不快又可怕的事实。很多人什么都看不见，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都不想看。这是迄今为止最简单的也是最廉价的态度。

其他人则用假正经的神圣外衣来掩饰自己，这既荒谬又虚假。他们描述整个事态都是罪恶的，当面对受害者。

他们虔诚地恐惧，对这种邪恶的灾难闭上眼睛，向全能者祈祷——如果他们死后也可能遭受这样的对待——可能会降下火与硫磺，就像在所多玛和蛾摩拉那样。

再一次将人类中这一群无耻之徒绳之以法。

最后，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这种祸害必然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但他们只是耸耸肩，完全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承担采取一切措施来抵御这种危险。

因此，事情就顺其自然吧。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非常方便和简单，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便捷的处理方式可能会给我们的国家生活带来致命的后果。

其他国家的情况没有好转的借口并不能改变我们自身恶化的事实，只是对其他受灾国家的同情之情使我们自己的苦难更容易承受。

但这里出现的重要问题是，哪些国家将率先采取主动掌握这一祸害，哪些国家将屈服于它这将是整个局势。这将是种族价值观的一次严峻考验。

未能通过考验的种族将会灭绝，取而代之的是更健康更强的种族，将能忍受更大的艰辛。

由于这个问题主要关系到后代，因此它属于可怕的是，父辈的罪孽会传给后代，直到十代。这是违反血统和种族法律的后果。罪反对血统和种族是这个世界的世袭罪恶，它给每一个国家带来灾难。

提交它。

战前德国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态度令人遗憾。

是否采取措施来遏制大城市青少年的感染？我们做了什么来杜绝性生活的污染和乳化？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梅毒在全国范围内蔓延？通过展示应该做什么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局不应该草率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应该意识到子孙后代的幸福或不幸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整个国家的未来可能、或许必须取决于此。

如果承认这一点，就需要采取无情的积极措施。

首要条件是整个国家的开明关注应该集中精力应对这一可怕的危险，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战斗的重要性反对它。

强加一些明确的义务是徒劳的，因为这些义务往往难以承受，而且除非公众充分了解这些措施，否则很难指望它们普遍有效。

施加和接受此类义务的必要性。

这需要一种广泛而系统的启蒙方法，以及所有其他日常问题可能会分散公众对这一重大核心问题的注意力，应该归于背景。

每当有紧急情况或看似不可能成功处理的任务时，舆论必须集中于一个问题，坚信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公众的兴趣，促使人们联合起来，做出了巨大自愿努力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这一基本真理也适用于个人，只要他渴望实现一些伟大的他必须始终将自己的努力集中在他进步的一个明确有限的阶段上，这个阶段已经在尝试下一步之前完成。

那些不一步步努力实现目标，不集中精力的人把精力集中在各个阶段上，永远无法达到最终的目标。

在某个阶段，他们会动摇并失败。这种系统化的方法是一种艺术本身，总是需要消耗每一分精力才能征服舞步一步步走过的路。

因此，进攻如此艰难的阶段，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人道之路是当局应该成功说服群众，立即目前正在争取的目标是唯一值得考虑的目标，也是唯一一切都取决于此。

广大群众永远看不清自己面前的整条道路，而不会感到疲倦，从而对完成任务的能力失去信心。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记住目标，但他们只能审视整体道路分成几个小阶段，就像旅行者知道他的旅程将在何处结束，但那些通过分阶段进攻才能更好地掌握无尽延伸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跟上他的决心并达到最终目标。

正是这样，在各种宣传的帮助下，斗争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性病应该被摆到公众面前——这不是国家的任务，而是主要的任务。

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祸害的真相。

直到整个国家都确信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问题：即健康的未来还是国家衰落。

只有在采取了这些准备措施之后——如果有必要，可以持续很多年——公众的注意力和公众的决心才能被充分激发，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严肃和采取明确的措施，而不会有不被充分理解的风险，也不会有当局突然面临民意涣散的局面。

必须让所有人明白，认真打击这一祸害需要巨大的牺牲和巨大的工作量。

向梅毒宣战，就是要向卖淫、向偏见、向旧观念宣战。

既定习俗，违背当前时尚，违背公众舆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再次是错误的某些圈子里的假正经。

在国家可以宣称拥有反抗的道德权利之前，必须满足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所有这些事情，是应该为年轻一代提供早期签约的便利婚姻。

晚婚是一种习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而且将一直是仍然是人类的耻辱，这种制度不适合一个习惯于认为自己仿佛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

卖淫是人类的耻辱，不能仅靠学术或慈善来消除方法。对它的限制和最终消灭，意味着要消除一系列附带情况。

第一个补救办法必须是建立使早婚成为可能的条件，尤其是对年轻男性来说——对女性来说，毕竟只是被动因素。

如今人们在妄想中挣扎的程度，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很少听到所谓“更好”的圈子中的母亲公开表达她们对她们为女儿找的丈夫，是一个已经放荡不羁的男人，等等。

由于这种类型的男人通常很少短缺，这个可怜的女孩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这样的配偶，而这段婚姻所生的孩子显然是这种所谓的明智的结合。

除此之外，当我们意识到，还有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碍生育，大自然被故意剥夺了她的权利，实际上只剩下一个问题：婚姻这样的制度为什么仍然存在？它的功能是什么？这真的

和卖淫没什么两样吗？我们对后代的责任不再起作用了吗？或者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给自己和后代造成的诅咒的性质难道这是对自然界基本法则之一的愚蠢犯罪忽视？文明国家就是这样堕落并逐渐灭亡的。

婚姻本身不是目的，而必须服务于更大的目的，即增加和维持人类物种和种族。这是它唯一的意义和目的。

既然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很明显，婚姻制度必须根据从而完成了其既定的功能。

因此，早婚应该成为规则，因为这样年轻夫妇仍然会有这种原始力量是后代健康、具有不可削弱的抵抗力的源泉。

当然，早婚不可能成为常态，除非首先采取一系列社会措施如果没有这种制度，早婚根本就无法想象。

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很小，但却无法得到解决。

而不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去改变社会背景。

应该研究和适当评估这些措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所谓的“社会”共和国已经证明自己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并且导致无数情侣无法结婚。这种政策为以进一步促进卖淫活动。

早婚不可能实现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荒谬的调节尺度的方法工资，而对家庭支持问题关注太少。

因此，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改革，才能真正严肃地解决卖淫问题，早婚比以往更容易了。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这个问题。

其次，必须从我们的培养和教育体系中根除一系列错误的观念。

教育孩子，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担心过这件事。

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中，首先必须建立一种平衡，即心理指导和身体训练。

如今所谓的文理中学是对希腊制度的侮辱。我们的教育体系教育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从长远来看，健康的心智只能存在于健康的身体。这句话几乎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广大人民群众。

国家。

在战前的德国，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费心去思考这个道理。

身体训练被严重忽视，而单方面的心智训练则被视为为民族的强盛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这个错误注定会比预期的更早显现其影响。这不是纯粹的偶然布尔什维克主义学说在那些人口堕落的地区盛行处于饥饿的边缘，例如德国中部、萨克森州和鲁尔。

在所有这些地区，显然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抵抗，甚至所谓的知识阶层，抵抗这种犹太传染病，原因很简单，知识阶层他们自身的身体退化，不是由于贫困，而是由于教育。

我们上层阶级所流行的教育的排他性知识主义使他们不适合在一个以体力而非智力为主导因素的时代，为生命的奋斗。

因此，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在生活中谋生。

在任何情况下，身体残疾都是个人懦弱的先兆。

过分强调纯智力教育，结果忽视了体育锻炼必然会导致青少年时期性观念的产生。

那些通过运动和体操锻炼身体的男孩比那些只被精神所喂养的居家人士更容易放纵性欲食物。

然而，良好的教育方法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健康的年轻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与一个弱者对女人的要求是不同的。

已被过早损坏。

因此，在我们教育的每一个分支学科中，每天的课程安排都必须男孩的空闲时间用于有益地发展他的体能。他没有权利在那些年里四处游荡，在公共街道和电影院里造成滋扰；但当

他一天的工作完成后他应该锻炼他年轻的身体，这样他才不会在必要时缺乏力量。  
出现。

为此做好准备并付诸实施应该是我们教育系统的职能，而不是专门用来向他灌输知识。  
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必须摆脱这样的观念：身体训练是一项应该由留给个人自己去决定。没有  
对后代犯下罪孽的自由，因此反对种族。

对抗心灵污染的斗争必须与身体的训练同时进行。

今天，我们整个的公共生活可能被比作一个温室，用来强制培养性想法和兴奋。

看看我们的电影院、剧院和剧场提供的收银台，就足以证明这不是正确的食物，特别是对我  
们的年轻人来说。广告牌和广告亭以最粗俗的方式吸引公众。

任何还没有完全脱离青春期渴望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切都必须后果非常严重。这种诱人的、  
感官的氛围让我们年轻人的观念，在他们这个年纪，应该还不了解。

不幸的是，这种教育的结果在我们当代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过早长大，因  
此未老先衰。

法庭不时地对我们十四五岁的精神生活投以令人痛苦的光芒。

十五岁的孩子。

因此，谁会惊讶地得知，在这个年龄，性病已成为受害者？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身体虚弱、智  
力受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丑闻，谁曾被大城市的妓女告知婚姻的奥秘？那些真正想要打  
击卖淫的人必须首先帮助消除精神繁荣发展的条件。他们必须清除我们城市“文化”的道德  
污染毫无畏惧，也不顾及随之而来的抗议。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年轻人从目前的困境中拯救出来那些不想看到这些事情的人故意鼓励  
他们，并犯有将卖淫的影响传播到未来的罪行，因为未来属于我们的年轻一代。

这一净化文化的过程必须应用于几乎所有领域。舞台、艺术、文学、电影、报刊、广告，都必定  
有污染的污点并被用于服务于民族和文化理想。

人民的生活必须摆脱现代色情的令人窒息的香气，并且远离各种不男子气概和假正经的虚  
伪行为。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目标和方法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确定。

维护我们国民的身心健康。

人身自由的权利比维护种族的责任更重要。

只有采取这些措施后，才能开展针对这一祸害的医疗运动一开始要抱有成功的希望。但在  
这种情况下，半途而废的做法也是毫无意义的。

必须做出影响深远的重要决定。如果无法治愈的病毒就有机会感染一个又一个健康人。

这将是实践那种人道主义，让数百人丧命，以便避免一个人遭受痛苦。

要求让有缺陷的人无法继续传播有缺陷的后代是一个基于最合理理由的要求，其适当满足  
是最人类面临的人道主义任务。

数百万不幸和不应有的痛苦将得到预防，结果是国民健康水平将逐步提高。

果断采取这样的行动，同时也会阻碍性病的进一步蔓延。

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就会无情地隔离所有无法治愈的人——也许是一种野蛮的对于那  
些不幸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惩罚——但对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来说，却是一种福气。

本世纪所经历的暂时痛苦能够也将会拯救未来成千上万的人使几代人免受苦难。

与梅毒以及其发病原因——卖淫活动作斗争是人类的艰巨任务之一；巨大，因为这不仅仅  
是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要消除整个一系列弊端都是造成这一祸害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疾病仅仅是道德、社会和精神疾病状态的结果。

种族本能。

如果由于懒惰或懦弱，这场斗争没有打完，我们可以想象情况将和五个世纪以后一样。人类

本性中将很少留下上帝的形象，除非嘲讽造物主。

德国为应对这一祸害做了什么？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会感到痛心。

确实，在政府圈子里，这种疾病的可怕和有害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官方采取的反制措施无效，毫无希望失败。

他们想方设法治疗症状，而完全不考虑疾病的病因。妓女尽可能进行医学检查和控制，当出现感染迹象时显然他们被送往医院。

当表面上治愈后，它们又被释放到人类身上。的确，“保护性立法”出台，规定所有未成年者发生性行为均应受到惩罚。

彻底治愈，或患有性病的人。

这项立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完全失败了。首先，大多数情况下，女性会拒绝出庭作证，指控男性抢劫他们的健康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刻薄言论的影响，而且想象一下，如果她们被自己的丈夫感染，她们的处境会怎样。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应该提出指控吗？或者她们应该做什么？对于男人来说，另外，他经常不幸地遇到这种危险，因为他在酒精的影响下。

他的状况使他无法评估他的“多情美貌”的品质，事实上每一个患病的妓女都知道这一点并因此在这种“理想”中挑选出男人偏好条件。

结果是，这个不幸的人后来不记得他的同情心女施主是，这在柏林和慕尼黑这样的城市并不奇怪。

许多这样的案例都是来自外省的游客，他们无助地被魔法迷住了城市生活的魅力，很容易成为妓女的猎物。

最后，谁能说他是否被感染了？不是有无数的病例吗？是否有记录显示一个明显已经治愈的患者病情复发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了难以言喻的伤害？因此，在实践中，这些立法措施的效果是负面的。

控制卖淫，最后甚至是医疗治疗和治愈，今天仍然是不安全的，疑。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尽管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但疫情蔓延得越来越广措施，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并证实这些措施的无效性。

所采取的其他一切措施都是徒劳无功，荒谬至极。精神卖淫没有人被逮捕，也没有采取任何相关行动。

然而，那些不认为这是一个严肃问题的人，最好研究一下这种疾病传播的统计数据，研究其在上世纪的发展，并思考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普通观察者，除非他特别愚蠢，会感到一阵寒颤，如果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不是没有不仅仅是艺术，甚至是近乎徒劳的精神退化。

在这里，在文化领域，即将到来的政治崩溃的迹象首先显现出来。

艺术的布尔什维克化是生活的唯一文化形式，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

任何人如果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只要看看这些幸运的州已经变成布尔什维克了，令他恐惧的是，他会在那里认出那些病态的疯狂和堕落的人所制造的怪物。

自本世纪初以来，所有这些艺术上的异常都被归类为以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名义出现的艺术表现形式，已经正式成为得到国家本身的承认。

这种现象甚至在苏联短暂的时期也出现过。

巴伐利亚。当时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所有的官方海报、宣传图片、报纸等不仅显示出政治颓废的迹象，而且显示出文化颓废的迹象。

大约六十年前，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政治崩溃，就像立体派和未来派绘画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衰落是难以想象的。

自 1900 年以来。

六十年前，一场所谓的达达主义“体验”展览绝对会是一场荒谬的想法。这样的展览的组织者将被证明适合精神病院，而今天他们却被任命为艺术协会的会长。

那时，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流行病蔓延。

舆论不会容忍，政府也不会保持沉默，因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拯救人民，避免他们陷入这种思想疯狂。

接受这一事实之后的发展必将导致知识分子的疯狂这种艺术。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变化之一，因为它意味着人类大脑开始出现退化过程，其最后阶段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研究过去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进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请注意我们在这个倒退的过程中已经走了多远。

我们发现到处都有这些细菌的存在，它们会产生必须迟早会毁灭我们的文化。在这里，我们无疑发现了缓慢发展的迹象。

腐败，那些再也无法阻止这一病态进程的国家将会遭受不幸！几乎在德国艺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观察到这些病态现象。

在这里，一切似乎都已经达到了巅峰，进入了曲线急速下降。

在本世纪初，剧院似乎已经堕落，不再是文化除了宫廷剧院之外，其他因素都反对卖淫民族艺术。

除了这些和其他一些值得称赞的例外，舞台上上演的戏剧都是这种自然景观如果人们根本不去参观的话，对它们也是有好处的。

内部衰败的一个可悲症状表现在，不可能允许青少年经常光顾这些所谓的“艺术中心”，这是厚颜无耻的承认，入口处张贴的告示：仅限成人。

请记住，这些预防措施必须针对那些主要目的应该是促进青年教育，而不仅仅是提供为成熟的成年人提供娱乐。

其他时代的伟大剧作家会如何评价这些措施，尤其是是什么条件使得这些措施成为必要？

席勒会多么恼怒，歌德肯定会厌恶地转身离去！但是，当席勒、歌德和莎士比亚面对我们现代的英雄时，他们又会怎样呢？德国文学？古老、乏味、过时、完蛋了，因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是，不仅是它自己的产品不好，而是它诋毁过去所有真正伟大的产品。

这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男人越卑鄙、越悲惨，一个时代的理想和产物，他们就越会仇恨和贬低前一个时代的理想成就。

代。

这些人最想做的就是彻底摧毁过去的一切痕迹，以便消除那个阻止他们自己的涂抹被看作唯一的比较标准视为艺术。

因此，每个新时代的产物越是悲惨、越是可悲，它就越是要抹去过去的一切纪念。任何真正造福人类的创新都可能总是要与之前最好的事物进行比较，甚至常常能揭示后者的真正价值。

不必担心现代的真正有价值的产品与过去的纪念碑。对人类文化宝库的贡献往往满足了为了保持对旧成就的记忆，这是必要的部分，因为这种记忆这是我们自己的作品得到正确评价的唯一标准。

只有那些对世界没有任何价值的人，却假装自己有很多东西可以给赋予，将反对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并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摧毁。这成立不仅对文化领域的新现象有好处，而且对政治也有好处。

革命运动越是激进，他们就越是要贬低旧的形式。

再次，他们想把劣质产品伪装成伟大和原创的成就，这导致他们盲目地憎恨一切属于过去、优于自己的事物工作。

例如，只要腓特烈大帝的历史记忆仍然存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就可以只会引起一种有问题的钦佩。无忧宫的英雄与前酒馆老板的关系不来梅的太阳之于月亮，月亮只有在太阳落山之后才能发光。

直射太阳光线已离开地球。

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新月都憎恨恒星。在政治领域，如果命运暂时将统治权置于在这些无足轻重之人的手中，他们不仅热衷于玷污和辱骂过去，而且同时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来逃避对自己行为的批评。

新德意志国家颁布的《共和国保卫法》可以看作是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任何新思想、任何学说、任何哲学、任何政治或经济运动，试图否定过去产生的一切，或将其视为低劣且毫无价值的。

这种反感通常是出于自卑感或恶意。任何新的真正有利于人类进步的运动总是要从建设性的角度开始在建筑物的最后一块石头已经铺好的水平上进行工作。

对于所有人类文化来说，利用那些已经确立的真理是毫无羞耻的，因为以及人类本身，都只是一条漫长发展路线的结果，每一代人都为整个建筑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革命的意义和目的不是推倒整座建筑，而是带走哪些地方没有很好地融入其中或不合适，并填补由此造成的空白，之后该大楼的主体工程将进行。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谈论人类进步，否则世界就永远不会自由混乱，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权拒绝过去，并摧毁过去的一切工作。

过去，这是任何新作品的必要前提。

战前我们整个文明所处的状况中最悲哀的是事实上，它不仅缺乏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的创造力，而且但它憎恨、玷污并试图抹去文明中产生的优秀作品的记忆。

过去。大约在上个世纪末，人们对创作新的、有意义的作品兴趣不大。

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在戏剧艺术和文学领域——而不是诽谤过去最好的作品，并将它们呈现为低劣和过时的作品。

仿佛这段可耻的颓废时期能够成就任何事情！所做的努力向现在的人隐瞒过去，提供了这些使徒们未来的行为是出于邪恶的意图。

这些症状应该向所有人表明，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虽然是错误的，文化理念，而是一个正在破坏文明基础的过程。

它使原本理智的艺术感觉陷入了混乱，从而在精神上为政治布尔什维主义铺平道路。如果伯里克利时代的创造精神体现在帕台农神庙，然后布尔什维克时代通过立体派面具表现出来。在这方面，必须再次注意一个人缺乏勇气那些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地位，应该觉得自己有义务坚决反对这种对我们文化的暴行，但他们他们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而是向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投降了。

然而，他们之所以不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艺术的倡导者们会骚乱；因为那些使徒总是猛烈攻击那些不准备承认他们的人作为艺术创作的精选精神，他们试图扼杀所有反对者，说这是这是庸俗和落后思想的产物。

人们害怕得发抖，唯恐被这些流氓和骗子指责缺乏艺术欣赏，好像不能理解和欣赏是一种耻辱那些精神堕落者或狡猾流氓的流露。

然而，这些文化弟子却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将自己的情感表达以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最高品质。

他们向惊讶的同时代人提供了难以理解和明显疯狂的作品，他们称之为‘内心的体验’。

因此，他们以很小的代价阻止了所有负面批评。当然，没有人怀疑可能有这样的内在体验；但应该有人怀疑是否有理由表现出这些精神病患者的幻觉，或者罪犯对人类社会理智的一部分。



莫里茨·冯·施温德或博克林创作的作品也是内心的产物经验，但这些是天才艺术家的经验，而不是小丑的经验。这种情况为研究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逃避了对声音污染进行严肃抵抗的责任我们人民的本能。

他们让人民自己来制定对这种无耻胡言乱语的态度。

为了避免被认为不懂艺术，他们接受了每一种艺术讽刺画，直到最后，他们失去了判断真正好坏的能力。

总而言之，有过多的症状表明一个病态时代已经开始。

还有一个关键症状需要考虑。在十九世纪，我们的城镇城市开始越来越失去其作为文明中心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更多的居住中心。

在我们现代化的大城市里，无产阶级对于自己居住的地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依恋。

这种感觉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住所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住所，并且部分原因是由于社会条件迫使他们频繁更换居住地。

他们没有时间培养对所居住城镇的感情。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现代城市的文化贫瘠和肤浅中。

在 18 世纪德国战争期间，解放时，我们德国的城镇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很小。

真正能称为大城的少数城市，大多是王公贵族的宅邸，因此它们几乎总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一定的文化方面。

那些人口超过五万的少数城镇，与现代相比，同等规模的城市，拥有丰富的科学和艺术宝藏。慕尼黑当时人口不超过六万，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艺术的第一批中心。

如今，几乎每个工业城镇都至少拥有如此多的人口，而无需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不能称之为自己的。它们是公寓楼和拥挤的住宅，仅此而已。

如果有人对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产生感情，那将是一个奇迹。

没有人会对一个地方产生依恋，这个地方提供的服务与其他地方一样多，或者一样少。

会提供，它没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显然已经尽力避免一切与艺术外观有相似之处的事物。

但这还不是全部。即使是大城市，随着人们越来越远离艺术作品，真正的艺术品也变得越来越少。

人口增加。它们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中性的气氛，并呈现出同样的尽管规模较大，但其外观与那些可怜的小工厂城镇无异。

现代社会对我们伟大城市的文化方面所做出的一切贡献绝对是不足。我们所有的城镇都生活在过去的辉煌和财富中。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慕尼黑除去路德维希一世统治下创造的一切，我们应该令人震惊的是，自那时以来，重要的艺术创作产出如此之少。

人们也许会对柏林和我们的大多数其他大城市说同样的话。

以下是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我们的大型现代化城市没有突出的纪念碑主宰着城市的总体面貌，可以作为城市的象征。

整个时代，但几乎每个古镇都有一座纪念碑来纪念它的辉煌。

古代城市的特色艺术并不在私人住宅中展现，而是在公共纪念碑不是为了引起短暂的兴趣而是为了持久的兴趣。

因为它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公民的财富，而是伟大和社区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种启发下，这些纪念碑应运而生，将每个居民都团结在一起他们以一种我们今天几乎无法理解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城镇。

吸引市民眼球的并不是一些平庸的私人建筑，而是属于整个社区的宏伟建筑。

与这些相比，私人住宅实际上只是次要的。

当我们比较古代公共建筑与私人住宅的大小时属于同一时代，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些反映和影响社区生活的作品应该采取的原则优先于其他一切。

在残破的拱门和覆盖着古代世界废墟的广阔空间中至今仍让我们惊叹的巨大纪念碑并不是商业时代留给我们的当时的宫殿，而是来自诸神的庙宇和属于状态。

社区本身就是这些伟大建筑的所有者。即使在罗马盛行的时期，颓废占据最突出位置的不是市民的别墅和宫殿，而是而是寺庙、浴场、体育场、竞技场、渡槽、大教堂等，属于国家，因而也属于全体人民。

在中世纪的德国，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尽管艺术观念相当不同。在古代，雅典卫城和万神殿所表达的主题是现在以哥特式大教堂的形式出现。

在中世纪的城市里，这些纪念性建筑高耸于众多较小的建筑物的框架墙由木头和砖块组成它们仍然是这些城市甚至到今天仍然可见，尽管它们越来越被公寓楼。

它们决定了当地的特色和面貌。大教堂、市政厅、谷物交易所、堡垒，是这一理念的外在表达，这一理念只有在古代世界才有对应。

我们今天的公共建筑的规模和质量与建筑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代表私人利益。

如果柏林遭遇罗马那样的命运，那么子孙后代可能会看到一些犹太百货商店或股份制酒店并认为这些是特色我们时代文化的表达。

在柏林本身，比较一下属于帝国的建筑物之间的可耻的不平衡以及为贸易和金融目的而建造的。

投票用于公共建筑的资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足的，而且非常荒谬。他们建造这些建筑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持久，而是为了满足此刻。

没有比这更高的理念能影响那些委托建造此类建筑的人。

柏林城堡建成时，其意义与新建成的图书馆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因为一艘战舰本身就意味着大约六十百万马克，而用于建造国会大厦的资金还不到这笔资金的一半这是为帝国建造的宏伟建筑，本应能够长久使用。

然而，在决定室内装饰问题时，庄严的众议院投票反对使用石材并命令用灰泥覆盖墙壁。

然而，这一次，议员们做出了一个适当的决定，即木制头颅在石墙之间显得格格不入。

社区本身并不是我们当代城市的主导特征，因此它如果社区没有找到建筑代表，这并不奇怪。因此我们最终必将到达真正的公民沙漠，最终将反映在总公民个体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冷漠。

这也是我们文化衰败和全面破裂的标志。

我们的时代完全被琐碎的物质考虑所占据，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专注于金钱问题。

因此，如果崇拜这样的偶像，英雄主义精神就会消失，这是不足为奇的。

完全消失，但现在却只能收获过去所播种的恶果。

所有这些在第二帝国最终崩溃之前的症状都必须归因于缺乏明确和统一接受的世界观，以及普遍的观点不确定性由于这种缺乏。

这种不确定性在当时的重大问题必须一个接一个地考虑时就表现出来了对他们采取的另一项决定性政策。

这种缺乏也是造成做事半途而废的习惯的原因，首先是教育制度、犹豫不决、不愿承担责任，以及对邪恶的懦弱容忍，甚至承认其具有破坏性。

富有远见的人道主义成为一种时尚。通过软弱地屈服于这些异常现象和不顾个人的感情，却牺牲了数百万人的未来。

对战前宗教状况的考察表明，混乱的一般过程也扩展到这个领域。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很久以前，已经停止了在思想人生观上具有统一、务实的信念。

在这件事上，最重要的一点绝不是放弃的人数他们的教会成员身份，而是普遍的冷漠。

虽然两个基督教派别在亚洲和非洲都有传教活动，但其目的是在争取新的信徒的同时，这些教派也失去了数以百万计的他们在欧洲的追随者。

这些前信徒要么完全放弃宗教作为他们生活的指导力量，要么采用他们自己的解释。

这一现象的影响特别体现在国家的道德生活中。

指出，传教团在传播基督教信仰方面取得的进展非常与伊斯兰教的传播相比，这一进程显得微不足道。

还必须指出的是，对教会教义背后的教条原则的攻击暴力不断增加，然而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实际存在。

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并不是由哲学家组成的。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尤其是，信仰绝对是道德世界观的唯一基础。

已经提供没有显示任何结果可能让我们认为他们可能有效地取代现有的教派，但如果要宗教教义和宗教信仰被广大群众接受为生活中的积极力量，那么，信仰的教义必须是一切现实的基础。

也许有几十万个优秀的人能够明智而聪明地生活不依赖于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标准而是依赖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不能这样做。

现在，一般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与一般法律在宗教中的国家和教条。

纯粹的精神观念本身是可变的，可能会受到无休止的解释。只有通过教条，它才能被赋予一个精确而具体的形式，没有它，它无法成为活生生的信仰。

否则，精神理念就永远不会成为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哲学观点。

因此，对教条的攻击相当于对国家所依据的一般法律的攻击。

是成立的，因此这次袭击如果成功，最终将导致彻底的政治无政府状态，正如对宗教的攻击会导致毫无价值的宗教虚无主义。

政治领袖不应该通过宗教的一些缺点来评估宗教的价值而应该问问自己，是否有任何明显可行的替代品更好。除非有这样的替代品，否则只有傻瓜和罪犯才会想到废除现有的宗教。毫无疑问，目前宗教状况不佳，责任不可推卸。

归因于那些用纯粹物质的附属品来束缚宗教理想的人，从而引发了宗教与科学之间毫无意义的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胜利几乎总是属于科学一方，尽管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宗教在那些无法看透表面的人眼中将遭受严重损失学习。

最大的危害来自于滥用宗教信仰来进一步的政治目的。应该对这些可怜的骗子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他们认为宗教只是一种可以用来实现政治利益的手段，或者更确切地说商业目的。

那些厚颜无耻、大声说谎的人，在全体人民面前宣告自己的信仰。

用洪亮的声音向世界宣告，让所有可怜的凡人都能听到——即使他们愿意为此而死，这不是必要的，而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

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信仰，换取任何政治交换条件。为了十个议会席位，他们会与马克思主义者结盟，他们是所有宗教的死敌，并争取在内阁他们会和魔鬼结婚，如果后者没有仍然保留一些任何一点体面都会让他拒绝。如果战前德国的宗教生活许多人嘴里都有一种不愉快的味道，这是因为基督教已经被降低到那些自称是基督教徒的政党使用卑鄙手段，并且因为他们试图将天主教信仰与政党联系起来。

这种替换是致命的。它为该党赢得了一些毫无价值的议会授权。

问题，但教会却因此遭受损害。

这种情况的后果必须由整个国家承担，因为松懈导致了宗教生活开始于一切都开始失去稳定性和动摇的时刻，传统的风俗和道德基础正濒临崩溃。

然而，如果没有严重的负担已经加在它身上；但当国家内部团结被破坏时，这些负担就变成了灾难性的是抵御大事件风浪最重要的因素。

在政治领域，细心的人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帝国的某些缺陷，这些缺陷预示着除非及时采取一些改变和纠正，否则灾难就会发生。

德国国内和国外政策缺乏方向性，这是每个人都清楚的。

并不是故意失明。

关于制作的实践，最好的事情可以说妥协的原因是，它表面上似乎与俾斯麦所说的政治是实现可能目标的艺术，但俾斯麦与总理们略有不同谁跟随他。

这种差异使得前者能够将这一公式运用到其政策的本质中，而在其他人的口中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俾斯麦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达到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应该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或者至少应该调查所有的可能性，但他的继任者认为这句话只是庄严的宣言，表明一个人不一定必须政治原则或任何明确的政治目标。

当时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并无远见卓识的政策。

这里又缺乏必要的基础，即明确的世界观，而那些领导人还缺乏对政治演变规律的清晰洞察力，而这是必备素质在政治领导方面。

当时许多持悲观态度的人谴责缺乏思想和缺乏指导帝国政策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承认内部这种政策的软弱和无效性，但这样的人在政治上只起着次要的作用。

那些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人同样对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等思想家以及我们的政治领袖所奠定的公民智慧这些人太愚蠢，无法独立思考，他们太自负，无法接受其他人的指导。奥克森谢纳表达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一直持续到自古以来，他说世界只由一粒智慧所统治，它几乎可以说，他所代表的每一位高级政府官员都是如此，但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粒子。

自从德国成为共和国以来，就连这一点也缺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颁布《共和国保卫法》，禁止持有此类观点或他们的表达。

对于奥克森谢纳来说，幸运的是他生活在那个时代，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明智的共和国。

甚至在战争之前，这个本应代表帝国实力的机构——国会——被广泛认为是其最薄弱的部分。懦弱和害怕肩负的责任在那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今天人们听到的最愚蠢的说法之一是，在德国，议会自革命以来，这一制度已被证明是失败的。

这很容易让人认为革命前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实际上议会制度的运作永远只能损害国家利益，而它却发挥了作用因此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什么也看不见，或者不想看见任何东西。

德国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个制度，但这场灾难没有早点发生，这不是国会的功劳，而是那些反对这个机构的影响在和平时期挖掘了德意志民族的坟墓和德意志帝国。

从直接或间接地由我将选择最能代表这个机构的一个，也是最一直以来都是最不负责任的。我所说的邪恶体现在进行内部以及帝国的对外事务。这首先归因于国会的行动也是政治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受本届议会影响的任何事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半途而废的你可能会认为。帝国在联盟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犹豫不决。他们希望维持和平，但这样做却直接引向了战争。

他们的波兰政策也是半途而废。它起到了刺激作用，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积极的结果。它既没有导致德国的胜利，也没有导致波兰的和解，而且它俄罗斯的敌人。

他们试图通过半途而废的措施解决阿尔萨斯-洛林问题。

而不是用铁拳一劳永逸地粉碎法国九头蛇的头颅，并给予阿尔萨斯和洛林享有与德国其他州同等的权利，但他们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

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不这么做，因为他们队伍里有最伟大的国家叛徒，例如中间党的赫尔·韦特莱 (Herr Wetterlé)。

但只要采取折中政策，这个国家或许还能忍受这一切没有成为帝国赖以生存的最后手段，即陆军。

所谓德国国会在这方面犯下的罪行本身就足以引起德意志民族的诅咒将永远降临到它头上。这些议会党团从人民手中夺取并扔掉的武器这是维持其存在所必需的，从而捍卫我们的自由和独立人们。

如果今天佛兰德斯平原上的坟墓被打开，那些满身鲜血的控告者就会出现，数以十万计最优秀的德国青年，由于那些没有良心的议会议员那些没有经过充分训练或者只受过一半训练的罪犯就被送进了死神的怀抱。

这些年轻人和其他数百万被杀害和致残的人都失去了祖国，只是为了让几百个欺骗人民的人能够进行他们的政治阴谋和他们的勒索，甚至继续背诵他们的教条理论。

犹太人利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媒体散布了关于在全世界宣扬“德国军国主义”，并试图用尽一切办法指责德国。

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民主党派却拒绝同意这些措施这对于充分训练我们的国防部队是必要的。

这些人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应该让每个人都清楚，预见到一旦发生战争，整个国家都必须被召集起来，而且由于这些自称是高贵的“人民代表”的卑鄙行径，数百万德国人将不得不面对装备简陋、训练不足的敌人。

但即使撇开这些粗暴、残酷的缺乏良知的后果不谈，议会流氓的表现，很明显，缺乏训练有素的士兵战争的开始很可能导致这场战争的失败；这种可能性在世界大战期间以最可怕的方式得到了证实。

因此，德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失败了因为该组织在和平时期采取了不彻底和有缺陷的政策以及国家防御力量的训练。

陆军训练的新兵数量太少，但同样三心二意海军的表现，使这一国家自保武器或多或少无效。

不幸的是，甚至海军当局本身也沾染了这种半热情。倾向于在比刚下水的股票稍小的股票上建造这艘船英国人的做法缺乏远见和天赋。

一支舰队如果不能达到与可能的敌人相同的数量实力，就应该以单艘舰艇的优势战斗力来弥补这种劣势。

重要的是战斗力，而不是任何传统的素质。

事实上，现代技术发展如此先进，各个领域之间如此均衡文明国家必须认为，一个国家建造船只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战斗力将优于其他建造的同等大小的船只权力。

建造排水量较小、性能优于那些排水量较大的。事实上，德国船只中较小的比例可以只能以牺牲速度和军备为代价来维持。用来证明这一政策合理性的短语是这本身就证明了海军当局缺乏逻辑思维，在和平时期负责这些事务。他们宣称德国枪支肯定优于英国，因此德国为 28 厘米。

枪的效力与英国的 30.5 厘米枪一样。

但这正是他们应该采取建造 30.5 厘米火炮政策的原因；因为它应该他们的目标不是取得战斗力的平等，而是取得战斗力的优势。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陆军装备 42 厘米迫击炮就是多余的，因为德国的 21 厘米迫击炮比法国拥有的任何高角度火炮都要优越得多因此，当时可能只需 30 厘米就能攻占堡垒。

迫击炮。

陆军当局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海军当局不幸没有这样做。如果他们愿意放弃武器装备和速度

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风险原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海军当局即使在平时也放弃了攻击原则，因此必须遵循从战争一开始他们就采取了防御政策，但这种态度也使他们放弃了只有通过采取进攻才能获得最终成功的机会。速度较慢的船只速度慢、武器装备弱的对手将遭受速度更快、武器更强大的对手的重创距离较远，这给后者带来了优势。

很多巡洋舰都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

和平时在海军当局中盛行的这种做法在战争期间得到了证实。

他们被迫改造旧舰的武器装备，并为新舰配备只要有会，我们会改进武器装备。

如果日德兰海战中的德国舰船尺寸相同、装备相同、如果英国舰队以与英国相同的速度航行，那么英国舰队就会在德国 38 厘米炮弹，其命中精度更高，而且更加有效。

日本奉行的是另一种海军政策。原则上，日本会注意每艘新舰艇的战斗力都要优于最终的对手，但由于这一政策，后来有可能使用舰队进行进攻。

虽然军队当局拒绝采取这种根本性的错误的原则，海军——不幸的是，它在议会中拥有更多的代表——屈服于统治那里的精神。

海军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后来被用在一种无系统和优柔寡断的方式。尽管存在这些缺点，海军赢得的不朽荣耀必须完全归功于向军官和船员的出色工作、高效工作和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致敬。

如果它的前任总司令也具有同样的天才，那么所有的牺牲就不会白费了。

这可能是海军司令在和平后来成为致命崩溃的原因，因为议会的考虑已经开始在海军建设中扮演比战斗考虑更为重要的角色。

优柔寡断、软弱无能，以及未能采取合乎逻辑的政策，这是典型的议会制度，污染了海军当局。

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军事当局没有让自己被误导这些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想法。

当时担任总参谋部上校的鲁登道夫领导了一场与国会在处理国家最重大问题时表现出的罪恶的犹豫，大多数案件都投了反对票。

如果这名军官随后发起的战斗没有成功，这必须归咎于议会，部分原因还在于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 (Bethmann-Hollweg) 的可怜和软弱的态度。

然而，那些对德国崩溃负有责任的人现在毫不犹豫地要把责任推到一个人坚定地反对忽视利益的方式国家被管理，但一个谎言或多或少对这些出生的人来说没有区别骗子。任何人想到这个国家为了那些不负责任的人的犯罪疏忽；任何人想到那些死亡或不必要地致残；任何人想到可悲的耻辱和耻辱这一切已经堆积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人民现在正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任何意识到这一切都必须发生，以便为进入议会做好准备的人对于一些不择手段的占位者和“推销员”来说，他们会明白，这样的雇佣者可能会被称为流氓和罪犯，否则这些词就没有意义了。

意义。

与背叛国家信任的叛徒相比，其他任何一种扭曲事实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一位可敬的人。

这种情况的一个特点是，旧德国的所有真正缺点都暴露在只有当这样做会损害国家内部团结时，才会让公众关注。那么确实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被公开地传播到广大群众的耳中，而其他许多事情有时，这些事件会被可耻地掩盖起来，或者干脆否认其存在，尤其是在公开讨论此类问题可能会带来改善。

政府上级部门对于此类宣传的性质和用途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

事情。只有犹太人知道，通过有效和坚持不懈的宣传，天堂本身也可以呈现给人们的，好像是地狱，反之亦然，最悲惨的生活可能是看上去就像是天堂一样。

犹太人知道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德国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政府，却没

有对此有丝毫的怀疑。

在战争期间，人们为这种无知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我在这里提到的无数的缺点在战前影响了德国人的生活积极的一面有很多突出的特点。

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公正的调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大多数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也普遍存在，而且往往比而我们当中却存在着许多别人所没有的真正优势。

德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德国几乎是唯一一个为保持其民族特色作出巨大努力的国家。

经济结构，因此比其他国家更少受到国际金融，尽管在这方面确实也存在许多不良征兆，然而这种优势是危险的，后来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我们忽略国家在经济方面独立的优势，也存在着某些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其他积极方面也非常出色。

这些特点由三个机构体现出来，它们一直是再生的源泉。

在各自的领域他们都是完美和高效的典范。

第一个问题是宪法本身以及它在近代德国的情况。当然，我们必须排除那些作为人类的君主，遭受着这个世界及其子民所遭受的种种缺陷的折磨。

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不那么宽容，那么现在这一代人的情况将是无望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代表人物的个人能力和性格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温和的智力和道德水平特点。

如果我们用德国革命领袖的个人价值和能力来衡量德国革命的“手提箱”，自 1918 年 11 月以来，这场革命向德国人民展示了怎样的人物，那么我们想到后人将如何评价这些人，可能会感到羞愧，当共和国护国法再也无法压制舆论的时候。

后代人肯定会决定我们新德国领导人的智慧和正直与他们的吹嘘和恶习成反比。

必须承认，君主制在精神上对许多公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尤其是对广大群众。这是因为君主并不总是被包围着，让我们也就是说，最高智慧的人不一定总是最正直的人。

不幸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更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而不是说话诚实的人，因此得到了前者无法提供“信息”。这是世界处于危险之中的根源。

正处于一个许多旧条件发生变化的时期，当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到了法院的传统。

普通男人或女人在以下情况下不可能感受到任何特别的热情：世纪末，一位身穿制服骑在马上公主，让士兵们列队从她身边走过，进行阅兵式。

那些上层人士显然不知道这样的游行会给人们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否则这种不幸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那些高尚的人所宣扬的感性的人道主义——并不总是很真诚的——圆圈往往令人厌恶而不是有吸引力。

例如，当十世公主屈尊品尝施食处的食物时，发现像往常一样，这样的举动可能在过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一次，它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因为，即使我们认为当然公主殿下根本不知道，在她品尝的那天，食物是与其他日子不太一样，只要人们知道就足够了。

因此，即使最好的意图也会成为嘲笑或引起愤怒的对象。

君主的节俭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早年崛起早上，他必须整天工作到深夜，尤其是不断表达对他可能营养不良的担忧——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不祥的民众的言论。

没有人想知道君主吃了什么、喝了多少。

没有人嫉妒他能吃上一顿饱饭，或者获得必要的睡眠时间。

当君主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人物给他的家人带来荣耀时，每个人都很高兴和他的国家，履行了君主的职责。所有关于他的传说他帮不上什么忙，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然而，这些事情都只是小事而已。更糟糕的是，传遍全国大部分地区，个人事务得到照顾来自上方，他没必要为它们烦恼。

只要政府确实好，或者至少出于善意，就不会有严重的反对意见可以筹集资金，但当旧政府至少力求最好的政权，被一个质量不一的新政权所取代。

那么，以前没有抵抗的温顺服从和幼稚的轻信必然会是可以想象的最致命的邪恶之一。

然而，与这些和其他缺陷相比，某些品质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首先，君主政体保证了公共事务方向的稳定并保护公共职位免受野心勃勃的政客的投机动荡的影响。

此外，该机构拥有的悠久传统，激发了一种感觉，使它分量和权威。

此外，整个官员队伍，特别是军队，都高于政党义务的水平，另一个积极特征是最高国家的统治权体现在君主身上，作为个人，他可以充当君主比任何匿名者更需要承担责任的象征议会多数。事实上，德国政府的诚实和正直必须主要归因于这一事实。最后，君主制在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德国人民已经弥补了自己的许多缺陷。

在我们这个时代，德国的居住城市仍然是艺术精神的中心，现在却濒临消失，并且变得越来越物质化。

德国王子们对艺术和科学给予了大量极好的、实用的鼓励，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我们当今时代肯定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

在整个社会秩序逐渐瓦解的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是军队。这是德国人著魔了。

因此，我们敌人的所有仇恨都针对我们民族自尊的捍卫者。

保护和我们的自由。支持这一独特机构的最有力证据是它遭到周围无赖们的嘲笑、憎恨和反对，但也令人畏惧。

事实上，国际投机者聚集在凡尔赛，进一步剥削和掠夺国家，特别是针对旧德国军队的敌意，再次证明它应该被视为保护我们人民自由不受侵犯的机构国际证券交易所的力量。

如果军队没有在那里拉响警报并保持警戒，凡尔赛条约的目的代表们本可以更快地被解职。只有一个词可以表达德国人民对这支军队的亏欠——一切！当责任感已消失时，军队仍然在人民中保持着这种品质。

变得非常罕见，而逃避各种责任的习惯却逐渐蔓延。

这种习惯是在议会的邪恶影响下养成的，议会本身就是不负责任。

在胆怯的美德威胁到人们的时候，军队训练人们培养个人勇气成为一种流行病，当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社区被认为几乎等同于意志薄弱的东西。

在那个只有懂得如何保护和促进他们自己的私利，军队是教育德国人的学校不要在国际友爱的虚假意识形态中寻求民族的救赎黑人、德国人、中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等，但他们的力量和团结国民存在。

陆军发展了个人的果断决策能力，而此时，犹豫不决和怀疑主义主宰着人类的行为。在自作聪明的人随处可见的时代在引领时尚的同时，它需要勇气去坚持“有命令总比没有命令好”的原则。

这一原则代表了一种强大而健全的思想风格，其中没有一丝痕迹如果军队没有提供这种持续的来源，那么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就会被抛弃根本实力。

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们目前的政府当局表现出来。他们无法摆脱精神和道德上的冷漠，并决定一些明确的行动路线，除非他们被迫签署一些新的剥削命令德国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同时签署所有另一边的人把文件放在他们面前，然后他们像官方速记员一样准备好签字。

他们的行为在这里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需要做出决定，因为这个决



定是他们被迫做出的。

军队向其成员灌输理想主义精神，培养他们乐于牺牲的精神为了国家和荣誉而奋斗，而贪婪和物质主义则主宰着其他一切生命的枝杈。

军队团结了分裂成不同阶级的人民，在这方面军队只有一个缺点，这是为期一年的自愿服兵役，这是一项特权，授予那些已通过高年级学校。

这是一个缺陷，因为绝对平等的原则因此被违反，而那些拥有这样，他们就被排除在其他同志所属的干部队伍之外。

相反的做法可能会更好。

由于我们的上层阶级对国家机构内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并且越来越脱离人民的生活，军队将会如果它拒绝歧视所谓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队伍中的知识分子。

没有这样做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任何机构这样做吗？至少有一个缺点？在军队中，优点占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它几乎没有什么缺陷，远低于通常因人类弱点而产生的平均水平。

旧帝国军队的最大优点是，在个人大多数人都无足轻重，个人价值高于一切多数值。

通过坚持对个性的信仰，陆军反对典型的犹太和民主数字力量的神化。

陆军训练的是当时最需要的人才，即真正的男人。在男人变得娘娘腔和懈怠，三十五万训练有素的每年都有年轻人从军队退役。

在两年的训练中，他们失去了年轻时的温柔，锻炼出钢铁般的身体。这个被教导了两年服从的年轻人现在已经适合指挥了。这位训练有素的士兵甚至可以通过走路的姿势认出他来。

这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学校，它之所以能借鉴其那些希望德国软弱无力的人，因为他们嫉妒它的伟大，并且自己也被贪婪的精神所占据。

世界其他国家认识到了一个事实，但许多德国人却不愿看到，因为他们对事实视而不见，或出于恶意不愿看到事实。

这一事实是，德国军队是保卫和自由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德意志民族和国民生活最好的保障。还有第三个具有积极价值的制度，必须将其与君主制区分开来考虑和军队。这是旧德国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

德国的行政管理比其他国家的行政管理更有组织、执行得更好。

国家。也许有人反对官员的官僚作风，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甚至更糟。

其他国家并不像德国的这个组织那样团结一致，他们的公务员也没有那么高的廉洁素养。

当然，稍微有点官僚主义、诚实和忠诚要比过于世故要好，这些人是现代人，但性格低劣，而且正如今天常见的那样，无知、低效。

如果今天有人暗示说，战前的德国政府可能就官僚技术而言，这是非常出色的，但从实际业务角度来看，它是无能的，我只能给出以下答复：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拥有例如，有没有比德国国家铁路组织更好、管理更好的商业企业？革命者们摧毁了这个模范组织，直到时机成熟从国家手中夺走并“国有化”，就像美国建国者所说的那样。

共和国赋予了这个词，即让它服从于国际证券交易所资本家是德国革命的幕后操纵者。

公务员制度和整个民政管理机构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受政府变迁的影响，政府的政治心态不会对德国政府官员的态度也受到了影响。

自革命以来，这种情况已完全改变。

效率和能力已被对党的忠诚度的考验所取代；品格和主动性不再被视为公职人员的积极品质。相反，它们告发他。

旧帝国的强大威力和权力建立在君主政体的基础之上，军队和公务员制度，这三个基础奠定了现在的强大力量完全缺乏，即国家权威，因为国家权威不能建立在议会或地方议会中

关于保护国家的法律的喋喋不休，或根据法院的判决来吓唬那些胆敢否认的人国家权力，而只能依靠管理和行政部门的普遍信任。

社区在人民中建立。

这种信心，恰恰是坚定不移的内心信念的结果，即一个国家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是受到无私和诚实善意的启发，法律精神与人们的道德信念完全一致的感觉。

从长远来看，政府体系不是靠恐怖主义来维持的，而是靠人们对那些管理和促进公共利益的人的功绩和诚意表示赞赏。

虽然在战争之前的时期，某些严重的罪恶确实感染和腐蚀了国家内部的力量，必须记住，其他州遭受的损失甚至比德国摆脱了这些不利因素，而其他国家在当时并没有失败和崩溃。的危機來到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记住，战前德国的这些缺陷被巨大的积极因素所抵消特质，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崩溃的真正原因，事实也确实如此。

德国垮台的根本原因和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种族问题被忽视，其在民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重视。

理解，因为国家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然的保护和繁衍物种和种族的努力的结果，即使人类可能不是能够有意识地在心中描绘其行为的深刻动机。

## 第十一章 国家与种族

有些真理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它们。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一些最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因此当有人提醒大家注意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

我们身边有成千上万个哥伦布蛋，但是哥伦布蛋却很罕见。

在大自然的花园中漫步，大多数人都自以为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对大自然在其生命中运用的一个杰出原则视而不见。

工作。

这一原则可以称为内在隔离，它是地球上每一个生物物种的特征。

这个地球。

即使只是表面的一瞥，也足以表明，生命冲动以无数的形式大自然表现出来，它本身就受制于一个基本法则——人们可以称之为大自然的铁律——迫使各种物种在生存时保持在它们自身生命形式的一定限度内。

繁衍和繁衍它们的种类。

每只动物只与自己同种的一个物种交配。山雀只与山雀同居，雀科与雀科，鹳科与鹳科，田鼠与田鼠，家鼠与家鼠，老鼠与家鼠、狼与母狼等等。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偏离该法律。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被迫囚禁的情况下，或者当其他障碍使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不可能进行生殖交配。

大自然极力憎恶这种不正当的性交，而它的抗议最明显地事实证明杂交种要么不育，要么其后代的繁殖力有限。

在大多数情况下，杂交种及其后代都缺乏抗病能力，或者抵御攻击的自然手段。

大自然的这种安排是合乎逻辑的。两个品质不同的品种的杂交，所得产品处于两个父母水平之间的中间位置。

这意味着后代确实会比属于生物学上的比上帝低等的生物，但是不如上等的父母高。

因此，它最终必须在与高等物种的斗争中屈服。这种交配这与大自然对整个生命的选择性改善的意志相矛盾。

这一改进的有利前提是不交配高级和低级个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允许更高阶。

强者必须统治，不能与弱者交配，这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的拥有更高的本性。

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个原则是残忍的，如果他这么认为，那仅仅是因为他的天性比较软弱，心胸比较狭隘，因为如果这样的法则不指导进化过程那么有机生命的更高级发展就根本无法想象了。

这种对维持纯种犬的渴望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整个自然界的现象，不仅导致急剧的物种之间不仅存在外在的区别，而且存在内部的相似性。

每个品种或物种所特有的特征。

狐狸永远是狐狸，鹅永远是鹅，老虎永远是老虎。物种内部唯一可能存在的区别是结构的不同程度。

力量和主动性，即智力、效率、耐力等，是个人标本被赋予。

不可能找到一只对鹅有仁慈和保护性的狐狸，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只猫对老鼠有友好的态度。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物种之间的斗争并非源于相互的感情。

反感，而是来自饥饿和爱。

在这两种情况下，大自然都冷静地旁观，甚至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每天为生存而奋斗生计把一切软弱的、患病的、动摇的事物抛在身后；而雄性占有雌性，赋予最强者繁衍的权利，或者至少是可能性它的种类。

这种斗争是为了促进物种的健康和抵抗力，因此，它是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过程背后的原因。如果这是否则，进步的进程就会停止，甚至会出现倒退。

由于劣势总是比优势多，所以劣势总是会增长得更快，如果他们拥有相同的生存能力和繁衍能力，最终其结果是，品质最好的产品将被迫退居次要地位。

因此，必须采取纠正措施，以提高质量。大自然通过以下方式提供这一点：建立严格的生活条件，弱者必须服从，从而数量受到限制，但即使是幸存下来的部分也不能无差别地繁殖因为在这里，根据力量和健康状况进行新的、严格的选拔。

如果大自然不希望弱者与强者交配，那么她更不希望优等民族应该与劣等民族混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所有的努力，经过数十万年的时间，建立一个进化的更高阶段的存在，可能是变得毫无意义。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规律。

它令人吃惊地清楚地表明，每当雅利安人的血液与劣等种族，结果就是那些捍卫较高等种族的人的垮台文化。

在北美，居民主要是日耳曼人，而这些元素我们与劣等民族的混合程度很低，但我们具有人类的品质和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文明不同。

在后一个例子，移民——主要属于拉丁人种——与原住民，有时确实规模非常大。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有一个清晰且决定性的例子，表明了种族混合所产生的影响。

在北美，日耳曼人保持了其种族血统的纯粹性，没有与任何其他种族，都已经主宰了美洲大陆，并将继续主宰它，只要该元素没有养成掺杂其血液的习惯。

简言之，种族通婚的结果总是如下：（a）优等民族的水平变低。

身体和精神开始退化，从而缓慢但稳步地导致生命汁液干涸。

导致这种发展的行为是违背永恒创造者的意愿的罪孽，因为这是罪孽，这一行为将受到报复。

人类试图建造某种与大自然铁一般的逻辑相矛盾的东西，这给他带来了冲突他本人的存在完全归功于这些原则。

他的行为违背了自然法则，为自己的毁灭铺平了道路。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傲慢的反对，这种反对是犹太人的灵感，是典型的现代和平主义者认为“人类能够战胜自然”。

数以百万计的人死记硬背犹太人的胡言乱语，最终想象出不知何故他们自己就是大自然的征服者。

然而他们唯一的武器只是一个想法，而且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想法，因为如果一个人接受它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对世界的概念。

真正的事实是，人类不仅未能在任何领域战胜自然，而且他最多只能抓住并掀起巨大面纱的一角她将永恒的神秘和秘密传播开来。

他从不发明任何东西；他所能做的就是发现一些东西。他没有掌握自然，但他拥有只能成为那些没有获得他所得到的知识的生物的主人通过深入了解一些自然法则和奥秘。

除此之外，一个想法永远不能受制于那些必要的条件。

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因为思想本身只来自于人类。

没有人，世界上就不会有人类的思想。因此，思想本身总是依赖于人的存在，因而依赖于那些提供他的生存条件。

不仅如此。某些想法甚至只限于某些人。对于那些尤其是那些根植于感觉世界而不是客观科学真理的思想。

换句话说，用一个今天流行的短语来很好地、清楚地表达这一点真相：它们反映的是内心的体验。

所有这些想法都与冷酷的逻辑无关，而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伦理道德观念等情感概念，都与人的本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存在。

这些想法的存在要归功于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保存这些思想的必要条件是某些种族和某些类型的男人。

例如，任何真诚希望和平主义思想在世界上盛行的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德国人征服世界，因为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它很可能最后一位和平主义者会随着最后一位德国人而消失。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幸的是，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人曾经成为这种现象的受害者与我们的想法一样荒谬和不合逻辑。无论外部环境对它有影响。

那么，如果你是认真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必须下定决心发动战争为和平主义铺平道路。这实际上是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计划。

世界的救赎主（至少我们的幻想家是这么相信的），而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

当最优越的人道主义类型男子气概将成功地征服世界，以至于这种类型成为唯一的地球的主宰。这种想法只有在其中变得困难，最终变得不可能。

所以，首先是战斗，然后是和平主义。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意味着人类已经过了发展的顶峰，因此，最终的结果不会是某种道德理想，但却堕落为野蛮并随之产生混乱。

人们可能会嘲笑这种说法，但我们的星球在太空中运行了数百万年，无人居住，将来的某个时候，如果人们忘记了无论他们在哪里达到了更高的存在水平，那都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疯狂幻想家的想法，而是通过承认和严格遵守大自然的铁律。

使一个种族陷入饥饿的因素会刺激另一个种族更加努力地工作。

过去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衰落了，因为最初的创造性种族灭绝了，由于血液受到污染。

造成这种衰落的最深刻原因是人们忽视了原则是一切文化都依赖于人，而不是相反。

换句话说，为了保存某种文化，创造这种文化的男子气概必须保存，但这种保存与不可避免的规律相辅相成，即它是最强大和最优秀的人必将胜利，他们也有权利坚持下去。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战斗。在这个永远充满斗争的世界里，谁不想战斗呢？是生命的法则，没有存在的权利。

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可能很难，但毕竟事情就是这样的。然而更难的是许多人相信他能战胜自然，但实际上却侮辱了自然。痛苦、悲惨、和疾病，是她的回答。

任何无视或蔑视种族法律的人实际上都剥夺了他应得的幸福相信他能达到目的，因为他在优等民族的胜利之路上设置了障碍，因此这样做，他就干扰了所有人类进步的先决条件。

背负着人类情感的负担，他又退回到无助动物的水平。

试图讨论哪个或哪些种族是最初的人类文化的捍卫者，因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真正创始人。

'人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处理这个问题要简单得多。答案如下简单明了。

我们所看到的人类文化的每一种表现，每一件艺术、科学和技术成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乎完全是雅利安创造力的产物。我们当今世界最令人钦佩的，是它的科学和艺术，它的技术发展和发现，少数民族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也许它们的最初开端必须都归于同一种族。文明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这样的人民。

如果他们死了，所有使这片土地变得美丽的东西都将随他们一起进入坟墓。

例如，不管土壤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总是因种族不同而不同。土壤的缺乏可能会刺激一个种族最艰苦的努力和最高的成就；而对于另一个种族来说，土壤的贫瘠可能是造成痛苦，最终导致营养不良，以及其一切后果的根源。

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只有雅利安人才建立了优越的人类类型。

人类；因此他代表了我們理解的“男人”的原型。

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他那闪闪发光的额头上迸发出天才的火花。

时间闪现，总是重新点燃那团火，以知识的形式，照亮揭开神秘的面纱，照亮黑暗的夜晚向人类展示如何崛起和成为主宰地球上所有其他的生物。

如果他被迫消失，大地将陷入深深的黑暗；在短短几年内千年人类文化将会消失，世界将变成一片沙漠。

如果我们把人类分为三类——文化的奠基者、文化的拥护者和文化的毁灭者——唯有雅利安人可被视为代表第一类。

正是他为人类文化中每座伟大建筑奠定了基础并建造了城墙。

只有这些结构的形状和颜色才能归因于个体特征各个国家。

雅利安人为人类所有建筑物提供了伟大的基石和规划。

进展：只有这些计划的执行方式才能归因于每个人的特点个人赛。

例如，在几十年内，整个东亚挪用了一种文化，并称其为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基础是希腊心智和我们所知的日耳曼技术技能。

只有外在形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才显示出亚洲灵感的特征。

有些人认为，日本将欧洲技术融入其自身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

而是欧洲科学技术只是带有日本文明。当今日本实际生活的基础不是本土的日本文化，虽然这是该国的外部特征，但其特点是罢工由于与我们存在根本差异，欧洲观察家的眼光并不如此；但真正的当代日本生活的基础是日本人民的巨大科学技术成就。

欧洲和美国，也就是雅利安民族。

各国只有以这些成就作为自己进步的基础，才能东方的思想在当代世界进步中占有一席之地。

欧美的科学技术成果为在东方，人们为了生存而斗争。

他们为这场斗争提供必要的武器和工具，而这些武器和工具的只是外在形式。

乐器已经逐渐适应日本的生活方式。

如果从今天起，雅利安人对日本的影响停止了，如果我们假设欧洲如果美国崩溃了，那么日本目前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可能仍然持续的时间很短，但几十年后灵感就会枯竭，而日本本土人性格将取得胜利，而现有的文明将变得僵化，并倒退回大约七十年前，雅利安文化的影响将它从沉睡中唤醒。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日本目前的发展一样，雅利安人的影响，所以在远古时代，外部影响和外部文化带来了形成了当时的日本文化。

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古代文明的有力支持变成了化石并石化了。

只有当一个民族失去了最初具有创造性的种族细胞时，这样的过程才会发生。

或者如果在唤醒并维持第一个之后，外部影响应该被撤回该地区的文化发展。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基本要素被证明来自外来民族，吸收和发展这些元素，如果随后该文化变得僵化一旦外界影响消失，这样的比赛就可以称为冠军，但永远不会是文化的创造者。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对不同的民族进行严格的检验，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其中一人最初创造了一种文化，但几乎所有人都只是一种文化的接受者。

在其他地方创造的文化。

这种发展可能被描述为总是以以下方式发生。雅利安部落，通常人数少得可笑，征服了外国民族，并受到新国家为他们提供的生活条件（生育能力、气候条件等）他们也利用劣等民族为他们提供的大量体力劳动，发展了智力和组织能力迄今为止本身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在几千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创造了各种文化，特征完全符合创始人的性格，尽管被修改了适应土壤的特性和被征服人民的特点。

但最终，胜利的民族违背了他们最初遵守的原则，即：他们的种族血统保持未混合，并开始与被征服的人民混合。

这样，他们就结束了自己的独立存在，因为在天堂里犯下的原罪已经总是伴随着对有罪当事人的驱逐。

经过一千年或更长时间，这些前任大师的最后可见痕迹可能会在雅利安人的血统给被征服的种族留下了较浅的肤色，那些雅利安人是这些文化的最初创造者，因为，就像征服者，他不仅是肉体的征服者，也是精神的征服者，他沉浸在血液中主体种族的，因此人类文化和进步的火炬的物质就消失了被点燃了。

就前统治种族的血液在其后代的血液中留下了淡淡的色彩而言，后裔，作为象征和记忆，文化生活的夜晚不再那么昏暗和黑暗，温和的光芒从那些最初火种的承载者的产品中散发出来。

他们的光芒照亮了被征服的种族所恢复的野蛮状态，并且可能经常让肤浅的观察者相信，他看到的是当前种族的形象，而实际上他实际上是在照镜子，镜子里反映的只是过去。也许在历史进程中，这样的民族会再次接触，甚至更常见的是，他们与自己文化的最初创始人有联系，甚至可能不记得遥远的协会。

本能地，旧统治种族留下的血液，将被吸引到这个新的现象，以前只有在强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的事情，现在可以成功地以自愿的方式实现。

新的文化浪潮涌来，并持续下去，直到带来它的人的血液再次与最初被征服的种族混合而受到污染。

那些致力于撰写世界文明史的人的任务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历史，而不是让自己被扼杀在大量外部数据，就像我们目前的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

这是对那些只是某种基因的保管者的种族之间所发生的变化的简短描述。

文化，也提供了那些人的发展、活动和消失的图景。

才是这个地球上文化的真正奠基者，也就是雅利安人自己。

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天才需要特定的场合，有时也需要一个特殊的刺激，使他的天才得以显现，同样，在具有天才的种族的生活中其中需要机会和刺激来展现天才。

在单调而常规的日常生活中，即使是重要的人看起来也和其他人一样并且不会超越其同胞的平均水平，但一旦这些人发现把自己置于一种特殊的境地，使其他人感到不安和不平衡谦卑的人看似普通的品质往往揭示出天才的特质，这常常让那些迄今为止，我们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琐事中认识他的。

这就是先知在自己的国家很少受到尊敬的原因。

战争为观察这一现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危难之时，当其他人绝望，看似无害，男孩们突然出现，成为充满决心的英雄，在死亡面前无所畏惧，表现出如此惊人的冷静反思能力。情况。

如果没有这样的考验，谁也不会想到，英雄的灵魂就潜伏在那个没有胡子的年轻人的身体。一个特殊的冲动，几乎总是需要把一个天才带到进入前台。

命运之锤轻易地击倒了一个人，却突然发现了反作用力钢铁般的意志，在日常生活的普通外壳被打破后，那些隐藏的秘密展现在世人惊讶的眼前。

周围的世界因此变得乖僻，不再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确实具有如此突然展现出的不同品质。

大概每当出现一位杰出的人物时，都会重复这一过程。

例如，一个发明家直到发明成功的那一天才成名。

完成他的发明，相信这位创造性天才没有成为直到那一刻，他都还活着。

从出生那一刻起，天才的火花就活跃在被赋予天赋的人身上拥有真正的创造力。

真正的天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它绝不是教育或训练的结果。正如我所说这不仅适用于

个人，也适用于种族。

那些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表现出创造力的民族，总是本质上具有创造性。这是他们的天性，尽管这个事实可能被人忽视。

肤浅的观察者在这里，外界的认可也仅仅是实际成就的结果。

由于世界其他地方无法认识到天才本身，因此它只能看到可见的天才的表现形式包括发明、发现、建筑、绘画等，但即使这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获得认可。

就像那些被赋予了天才天赋的人，或者至少是具有非常高才能的人一样，高阶的人，无法充分发挥这种天赋，直到他受到特殊因此，在国家生活中，他们的创造力和力量常常必须等到某些条件刺激它们采取行动。

这一真理最明显的例子是，这个种族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人类进步的捍卫者；我指的是雅利安人种。

一旦命运让他们面对特殊情况，他们的力量就会开始发展并逐步以具体形式体现出来。

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创造的特色文化几乎总是受到土壤、气候以及他们征服的人民。

最后一个因素——人民的性格——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文明进程的技术条件越是优越，可以组织和使用体力劳动来代替机械动力。

如果他们不能雇佣他们所征服的劣等种族的成员，雅利安人永远不可能迈出通往他们的后世文化；正如他们没有借助某些合适的动物，驯服，他们就永远不会发明机械动力，后来使他们能够不再依赖这些动物。

摩尔人尽完职责后就可以走了，这句话不幸的是，可以更恰当地应用不那么普遍。

数千年来，马一直是人类忠实的仆人，帮助人类奠定了人类进步的基础；但是现在，机动力量已经使马变得多余。

几年后，马的使用将完全停止；然而，没有它的合作，人类几乎不可能达到他现在的发展阶段。

为了建立优越的文明类型，劣等种族的成员形成了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只有它们才能弥补机械手段的不足，而无需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并不是建立在驯服的动物就像雇佣低等种族的人类一样。

只有在被征服的种族被当作奴隶之后，动物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而不是反之亦然，正如有些人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

起初，被征服的敌人必须拉犁，后来才由牛和马代替了他。除了和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认为这一事实是人类堕落的标志。

这些人没有认识到，人类必须经历这样的进化才能达到这些使徒现在利用文明程度来试图引起世界的关注他们的繁文缛节。

人类的进步可以比作攀登无限阶梯的过程。

不先爬下较低的梯级，就无法到达较高的水平。

因此，雅利安人必须走他的现实感所指引的道路，而不是走他所认为的道路。

这是现代和平主义者的梦想。

然而，现实的道路是艰难的，难以行走，但它是唯一一条最终通向其他人在梦想中设想人类的目标。

事实是，这些梦想家帮助人们远离目标，而不是接近目标。

第一批文明形式出现在雅利安人接触的地方并非偶然征服劣等民族，并强迫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劣等种族的成员成为第一批机械工具，为日益增长的文明。由此，明确地指明了雅利安人应该走的道路。



作为征服者，他征服了劣等民族，并将他们的体力转化为有组织的渠道在他的领导下，强迫他们遵循他的意志和目的。

通过强迫他们采用一种有用但困难的方式来运用他们的权力，他不仅避免了那些被他征服的人的生活，但可能使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容易了。

以前所谓的“自由”状态。

当他无情地维护自己作为主人的地位时，他不仅仍然是主人，而且他还维护和发展文明，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他的天生能力，因此，这对于雅利安人种的保存至关重要。

然而，当他的臣民开始崛起并接近征服者的水平时，升天可能是使用他的语言，障碍区分主人来自仆人崩溃了。

雅利安人忽视了保持自己的种族血统不受混合，从而失去了在他自己创造的天堂。他被淹没在种族混合之中，逐渐迷失了他的文化创造力，直到他最终成长，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身体上，更像他所镇压的土著人，而不是他自己的祖先。

有一段时间，他可以继续依靠仍然存在的文化资本生活；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化石，他逐渐被人遗忘。

这就是文化和帝国衰落并让位于新结构的方式。

血统的污染和由此造成的种族退化，是导致古代文明的衰落，因为国家毁灭从来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失去了纯种血统所特有的抵抗力。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不属于健全种族的事物都如同糠秕。

世界上的每一个历史事件，无非是人类本能的体现。

种族的自我保护，无论福祸。

关于雅利安文化为何具有如此重要性的基本原因，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指出，雅利安人并不是天生就具有更强的自我本能，保存，而是以一种他们自己独有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主观角度考虑，生存意志当然是全面而同样强烈的，只是表达的形式不同。

在最原始的生物中，自我保护的本能并不超出照顾个人的自我。

我们称这种激情为自我中心，这种激情如此盛行，甚至包括时间因素，意思是说，当前的时刻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留给未来。

动物只为自己而活，只在饥饿时寻找食物，只在为保全自己的生命。

只要自我保护的本能仅仅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就没有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基础，甚至不是最原始的形式，也就是说，家庭。

男性与女性组成的共同体，超越了单纯的交配需要自我保护本能的延伸，因为为了生存而战斗的准备一个人的自我也必须延伸到伴侣。

雄性有时会为雌性提供食物，但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双方都会为雌性提供食物。

后代。它们几乎总是准备好互相保护和捍卫，因此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首先，虽然极其简单，但却体现了牺牲精神。

一旦这种精神超越了家庭的狭隘界限，我们就有了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社区，甚至最终形成一个国家。

人类最低等的物种只在很小的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品质，因此通常他们不会超越家庭的基础。随着人们越来越愿意将个人的切身利益置于次要地位，组织更广泛的社区的能力得到发展。愿意为他人牺牲个人工作，必要时甚至牺牲生命，表明这是雅利安人种中发展最高度的形式。

雅利安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智力，而在于他愿意奉献全部精力为社会服务。

在这里，自我保护的本能达到了最高尚的形式，因为雅利安人愿意把自己的自我置于公共利益之下，必要时，他甚至会牺牲自己的为社会奉献自己的生命。

雅利安人的建设性力量和他们建立文化的特殊能力并不仅仅基于他的智力天赋。

如果是这样，他可能只会破坏，而永远没有组织的能力；因为组织活动的本质在于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个人观点和利益，并将其服务于人类群体。

通过为公共福利服务，他得到了回报；例如，他不工作直接为自己而活，但使他的生产性工作成为他所在团体活动的一部分。

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公共福利。

这种态度背后的精神可以用“工作”这个词来表达。

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生产活动不能与社会利益相冲突。

每当人类活动完全是为了自我保护的本能时，不论一般福祉，都将其称为偷窃、高利贷、抢劫、入室盗窃等。

这种心理态度迫使个人利益退居次要地位，而有利于共同福祉，是任何真正人类文明的首要前提。

正是出于这种精神，人类的伟大成就才得以诞生，而最初的成就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但却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他们的后代。正是这种精神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忍受着艰苦而诚实的生活，他们的辛劳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回报，除了贫穷和微薄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有助于巩固基础，社群存在。

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发明家、每一个政府官员等等，只要他们工作而不为自己实现财富或繁荣，就是这种崇高理想的代表，尽管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活动的深刻意义。

关于这种工作，可以说提供食物和人类进步基本手段的基本条件，即使在为保护人类及其文明而做出的工作具有更高的意义。

为了社会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是牺牲的理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护人类所建立的一切，确保它不会被人类或自然所破坏。

在德语中，我们有一个词，它完美地表达了所有工作。这是 *Pflichterfüllung*（履行职责），这意味着为公共利益服务，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这种活动产生的根本精神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反面，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我们指的是个人愿意做出为社区和同胞做出牺牲。

至关重要的是要一再强调，理想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多余的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不可少的东西。

人类文明的先决条件：“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就源于此。

正是由于这种心态，雅利安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世界也正是由于这种心态，雅利安人的思想发展出了“人类”的概念，因为正是出于这种精神，创造力不断增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强健的肌肉力量与一流的智慧，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丰碑。

如果不是唯心主义，智力的一切能力，即使是最聪明的能力，也不过是智力本身只是一种外在现象，没有内在价值，从来不是一种创造力。

然而，由于真正的理想主义本质上是个人利益和生活的服从对社区的利益和生活，因为这种服从反过来又代表了任何组织形式的先决条件，这种理想主义在其最深层本质中都符合符合大自然的最终目的。

只有这种理想主义才能使人们自愿承认，力量和权力有权夺取并使它们成为构成整个宇宙秩序的组成粒子并形成。

最纯粹的理想主义总是在不自觉中与最深刻的知识。这是多么真实，真正的理想主义与幻想中的自我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当我们要求一个未被宠坏的孩子，例如一个健康的男孩给出他的意见。

正是这个男孩，听着“理想主义”和平主义者的胡言乱语，却不理解他们会追随他们，甚至拒绝他们，为了人民的理想，他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

他的本能会无意识地屈服于这样的认识：为了物种的保存，即使个人生命的代价，是根本的需要，他将抗议和平主义者的幻想咆哮者，实际上只不过是懦夫，虽然伪装，自私自利他们自相矛盾人类发展的规律。

人类进化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个人应该充满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他不应该受到那些假装比大自然更了解并厚颜无耻地批评大自然法令的人。

正是在理想主义态度濒临消失的时刻，我们注意到削弱这一力量，而这一力量是建立和维护社区，因此是文明的必要条件。

一旦自私自利的精神开始在一个民族中盛行，那么社会秩序的纽带破裂，人类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后人不会记住那些只追求自己利益的人它会贬低个人的利益，但会歌颂那些放弃自己幸福的英雄。

犹太人与雅利安人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人该种族的自我保护本能已经发展到所谓的“被选中”的程度。

这句话最好的证明是这个种族仍然存在的简单事实。

另一个民族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经历了如此少的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的心智、观点和性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然而，在伟大的革命中，还有谁能起到如此持续的作用呢？即使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灾难，犹太人依然是和以前一样。

这一事实表明，人们为了生存、为了维护自己的种族，有着多么顽强的意志！犹太人的智力经过了数千年的训练。今天犹太人人们认为他特别“聪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历来都是如此。

然而，他的智力并非内在进化的结果，而是被塑造的通过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实际教训。

人类精神若不迈出连续的步骤就无法向上攀登。

每一步向上，都需要以前构建的基础，也就是过去，从这里所用的广义上讲，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普遍的文明才能形成。

所有的思考都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源自个人经验。最大的部分则基于在过去积累的经验之上。文明的一般水平为个人提供了便利，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并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有了如此丰富的初步知识，有了这些设备，他可以在进步的道路上轻松迈出新的步伐。

例如，今天的男孩成长于如此庞大的技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积累的成就，让他认为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一百年前，即使对于当时最伟大的头脑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谜。

然而，这些现在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那些会理解我们在某些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将这一进步向前推进一步更远。

如果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位天才今天从坟墓里复活，他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比当代十五岁的男孩更难理解年龄较大甚至可能只有平均智力水平。

这位从过去回来的天才，需要为自己提供一个我们当代的年轻人接收到的大量初步信息可以说，在它成长于我们现代产品的过程中，它是自动的。

文明。

由于犹太人——出于我马上要谈到的原因——从未有过自己的文明，他的智力工作总是由他人提供基础。

他的智力总是通过运用他所学到的文化成就而得到发展。

发现可以随手拿到他身边的东西。这个过程从未逆转过。

虽然犹太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并没有减弱，而是更加强烈比其他民族更不寻常，尽管人们很容易认为知识分子犹太人的力量至少与其他种族相当，犹太人完全缺乏最一个文化人必备的一个素质，就是理想精神。

对于犹太人来说，自我牺牲精神并不超出简单的本能个别保存。

对他们来说，他们表面上表现出的种族团结感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群居本能，类似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本能。

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本能将个体聚集在一起，相互保护，只有当只要存在共同的危险，使得相互援助是权宜之计或不可避免的。

刚才，同一群狼联合起来，共同攻击受害者一旦饥饿感得到满足，它们就会分解成单个的狼。

马也是如此，它们团结起来抵御任何侵略者，但分开危险已经过去的那一刻。

犹太人也一样，他们的牺牲精神只是表面的。

只有当个人的存在使这一点成为绝对的事情时，它才会表现出来必要性，但一旦共同的敌人被征服，威胁个人的危险犹太人战胜了敌人，夺取了猎物，表面上的和谐就消失了，原来的条件再次获得。

只有当共同的危险威胁到他们或共同的猎物吸引他们时，犹太人才会一致行动。

当这两种动机不再存在时，最残酷的自私自利就会出现，而这些人原本团结一致的动物，将变成一群互相争斗的老鼠其他。

如果世界上只有犹太人，他们就会在污秽和泥潭中打滚，互相剥削，互相残杀，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完全缺乏牺牲精神，这表现在他们懦弱的精神上，会阻止这一点奋斗发展。

因此，将犹太人的互助解释为另一次，当他们必须战斗，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剥削他们的同胞时，某种理想主义的牺牲精神的体现。

在这里，犹太人仅仅听从了他个人自私自利的召唤。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国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组织，以实现保存或增加种族，绝对没有领土界限，因为领土一个国家的划界总是要求形成这个国家的种族具有某种精神上的理想主义。那个国家，特别是对工作理念的正确接受。

一个领土已划定的国家，除非有普遍的对待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果缺乏这种态度，那么工作所需的基础文明也缺乏。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尽管智力上看似高超，但没有文化，当然就没有自己的文化。

犹太人今天享有的文化是其他人劳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在犹太人手中被贬低。

为了正确判断犹太人在整个问题中所处的地位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基本事实从来没有任何犹太人艺术，因此，今天不存在这种东西。

我们必须认识到，特别是在建筑和音乐这两个艺术的皇家领域，犹太人没有做过任何原创性的创造性工作。

当犹太人在艺术领域创作出一些东西时，他只是“借鉴”已经存在的东西，或者只是窃取他人的智力成果。

犹太人本质上缺乏那些创造性种族所特有的品质，而这些创造性种族是文明的奠基者。

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其他人建立的文明——或者更准确地说，败坏它，——这一点表明，他主要培养的是要求最小的艺术。

大量的原创发明，即戏剧艺术，即使在这里，他也不过是一个玩杂耍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猴子模仿者，因为在这个领域他也缺乏创造活力是创作所有真正伟大作品的必备素质。

因此，即使在这里，他也不是一个创造天才，而是一个肤浅的模仿者，尽管他的修饰和技巧无法掩盖他所塑造的形象缺乏内在活力的事实他的作品。

此时，犹太媒体介入，通过高呼“和散那”来提供友好援助。

即使是犹太人中最普通的笨蛋的头，直到世界其余的人被说服认为受到如此多赞扬的人一定是一位艺术家，而实际上，他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低级的模仿者罢了。

犹太人缺乏建立文明所必需的创造力，因为他们没有，也从来没有过，理想主义精神，这是绝对必要的元素在人类的更高发展中。

因此，犹太人的智慧永远不会是建设性的，而总是破坏性的。充其量，它可能在极少数情况下，它能起到刺激作用，但仅限于诗人诗句“力量它总是想作恶，却总是行善”（*Die stets Böse will und stets das Gute* 沙夫特。）。)

人类的进步并不是通过他，而是尽管有他，却依然存在。

由于犹太人从来没有建立在领土界限上的国家，因此从来没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明，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必须被视为游牧民族。

这是一个巨大而又恶作剧的错误。真正的游牧民族确实拥有明确的界限他所居住的土地。他只是不像定居农民那样耕种土地，而是他靠在自己的领地内游荡的牲畜所产的食物为生。这种生存方式的自然原因是土壤不够肥沃，它不能提供稳定的产物，使固定的居所成为可能。

然而，除了这个自然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没有机械文明的到来弥补了该地区天生的贫困。

在某些地区，雅利安人可以凭借技术技能建立固定的定居点这是他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尽管这些领土否则就必须被抛弃，除非雅利安人愿意在他们周围游荡游牧时尚但悠久的定居传统使游牧生活难以忍受对他来说。

我们应该记住，在美国的第一个时期殖民时期，许多雅利安人以捕猎、狩猎等方式谋生，经常带着妇女和孩子成群结队地四处游荡，他们的生存方式非常与普通游牧民族相似。

然而，当他们人数增多并能够积累更多资源时，他们清理土地，驱逐原住民，同时建立定居点，在全国各地迅速增加。

雅利安人最初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成为定居者，但是他从来就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游牧民族，因为游牧民族对于“这种态度成为后来文化发展的基础，当时必要的智力条件已经存在。

游牧民族的普遍态度中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尽管它原始。因此，他的整个性格可能与雅利安人的感情格格不入，但永远不会丑恶。

然而，犹太人的性格中却没有丝毫理想主义的痕迹。犹太人从来没有曾经是个游牧民，但却始终是个寄生虫，依赖他人的物质生活。

如果他偶尔放弃他迄今为止居住的地区，那他并不是自愿的。他确实因为他时不时会被那些厌倦了款待的人赶出去，被这样的客人辱骂。

犹太人的自我扩张是一种寄生现象，因为犹太人总是在寻找“牧场对他的种族来说，这是“新的”。但这与游牧生活本身无关，因为犹太人并不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曾经占领的领土。他如此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现在的处境即便使用更强大的武力，也难以将他赶走。

只有当新领土具备一定的生存条件时，他才会扩张到新的领土；但即便如此，与游牧民不同，他也不会改变他以前的住所。他是，并且仍然是一个寄生虫，一种像有害杆菌一样的吸食者，根据一些有利的地区吸引了他。

他的存在所产生的影响也像吸血鬼一样，因为无论他在哪里建立那些款待他的人迟早都会被流血而死。

因此，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属于其他贫民窟的国家里，并且在组织这些国家之后，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然而这个国家却隐藏在宗教团体的面具，只要外部环境不适合来宣告这个社区的真正本质。

一旦犹太人觉得自己的地位足够稳固，能够不依靠伪装，他揭开面具，突然以许多人以前没有见过的角色出现。

相信或希望看到的，即犹太人的。

犹太人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依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活，导致了叔本华曾经描述过的一种特殊性格的形成，他说犹太人是“谎言大师”。

犹太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迫使他们系统地使用谎言，就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北方气候的居民被迫穿上暖和的衣服。

他只有在成功说服其他国家和国家相信犹太人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而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代表，因此构成了一个“宗教团体”尽管这是一个特殊的性质。

但事实上，这是他的第一个大谎言。他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特定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以便他能够继续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各国之间的寄生虫。

犹太人的智力越高，他欺骗别人的成功率就越高。他的在这方面的成功甚至可能使那些接待他的人相信他们当中的犹太人是真正的法国人，或者英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恰巧属于一个与美国主流宗教不同的宗教派别。

这些国家。

特别是在与国家行政管理有关的圈子里，官员一般而言，犹太人只有最低限度的历史意识因此他们能够实施臭名昭著的欺骗行为相对容易。在这些圈子里，独立思考被认为是对神圣的官方晋升所遵循的规则。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即使在今天的巴伐利亚州政府办公室里，一点也不怀疑犹太人本身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信奉“忏悔”的人，尽管只要看一眼犹太人的报刊就应该即使对于那些只拥有最小程度的智力。

然而，《犹太回声报》并不是一份官方公报，因此在这些政府当权者。

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具有明确种族特征的民族，而不仅仅是某个种族的追随者。

宗教。

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为了在世界上闯出一片天地，开始四处寻觅以此来分散对他们来说可能不便的注意力。

还有什么比借用和利用宗教界的观念？这里的一切也是复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偷来的因为犹太人不能拥有任何宗教机构这是他从自己的意识中发展出来的，因为他缺乏任何一种理想主义，这意味着他根本不相信存在超越地球之外的生命。

在雅利安人的心目中，任何宗教都是无法想象的，除非它体现了这样的信念：死亡之后，其他某种形式仍会继续存在。

事实上，《塔木德》并不是一本制定原则的书，根据这些原则，个人应该为来世做准备。它只是为一个实用和方便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犹太人的宗教教义主要是维护犹太人的血统纯正，并规范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以及犹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往世界上的人，也就是非犹太人。

犹太宗教教义并不关心道德问题。它关心的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非常琐碎的问题。

关于犹太人宗教教义的道德价值，存在着，并且一直存在着，详尽的研究（不是来自犹太人方面，因为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写的一切都已经自然而然地总是带有倾向性的），这表明犹太人的宗教在雅利安人看来，这似乎非常不可思议。

犹太人自己就是这种宗教训练所产生物的最好例子。他的生命只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心态与基督教的真正精神格格不入，就像他的这种品格对于两千年前新信条的伟大创始人来说是陌生的。

基督教的创始人毫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评价；当他发现必要时，他把人类的敌人赶出了神的圣殿，因为那时，他们总是利用宗教作为促进商业利益的手段。

当时基督因他对犹太人的态度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参与政党政治，选举时他们自甘堕落去乞讨争取犹太人的选票。

他们甚至与无神论的犹太政党进行政治阴谋，损害他们的利益自己的基督教国家。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谎言，其目的是让人们相信犹太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宗教，其他的谎言随后也建立在这种宗教的基础上。

其中一个谎言与犹太人的语言有关。对他来说，语言是并不是他表达内心想法的工具，而是一种隐藏内心想法的手段。

讲法语时，他的思想是犹太人的，写德语韵文时，他只给出表达他自己种族的性格。

只要犹太人还没有成功征服其他民族，他就被迫说他们的语言不管他是否喜欢，但一旦世界成为犹太人的奴隶，它就会学习某种通用语言（例如世界语），这样犹太人就可以更容易控制它。

这些人的整个存在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永久的谎言之上的，这一点可以从《锡安长老会纪要》犹太人对此予以了强烈谴责。

《法兰克福报》一边抱怨，一边一再重复说，这些都是伪造的。

仅此一项即可证明其真实性。

许多犹太人无意识地希望做的事情在这里已经明确阐述了。没有必要问这些启示是从哪个犹太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但至关重要的是，它们揭示了几几乎令人恐惧的精确性，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犹太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奋斗。

然而，对真实事件的研究是判断这些事件真实性的最好方法文献。如果研究上个世纪发生的历史发展，通过这本书，我们将会理解为什么犹太媒体不断地否认和谴责它，因为一旦公众参与进来，犹太人的危险就会被消灭。

拥有那本书并且理解它。

为了正确认识犹太人，必须研究他所走过的道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这种现象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的追捧。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由于他的职业生涯历来都是一样的一正如那些牺牲他生命的人们一样，他们依然如故一进行必要的分析，以阶段性地标记他的进步。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用字母来表示这些阶段。

第一批犹太人在罗马入侵期间来到了当时被称为日耳曼的地方，和往常一样，他们都是商人。

在日耳曼部落大迁徙造成的动乱中，犹太人似乎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德国人形成第一个政治社区是中欧和北欧再次团结起来的进程的的开始，这次是永久的犹太化。

从那时起，犹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经历相同或类似的发展。

与雅利安民族接触。

(a) 一旦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建立起来，犹太人就突然“出现在那里”。

他以商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一开始并没有掩饰自己的国籍。

他仍然公开地认为自己是犹太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外表暴露了种族他和他所居住的国家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或者因为他知道的太少的语言。

也可能是其他种族的人拒绝与他混合，所以他不能很好地接受除了外国商人以外的任何姿势。

因为他的狡猾和狡猾，以及客人缺乏经验当他成为犹太人时，公开保留他的犹太人特征对他并没有不利。

这甚至可能对他有利，因为这个外国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b) 他开始缓慢但稳步地参与周围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生产者的身份，不过，只是作为中间人而已。

他的商业智慧，是经过数千年的经验积累而来的谈判作为中间人，使他在这方面比雅利安

人更胜一筹，而雅利安人当时仍然相当聪明而笨拙，诚实无比，所以经过短暂的贸易后似乎注定要成为犹太人的垄断。

犹太人开始借钱，而且照例是高利贷。他第一个引入了支付借款利息的规定。

这项创新所涉及的危险最初并没有被认识到；事实上，这项创新欢迎，因为它提供了暂时的好处。

(c) 在这个阶段，犹太人已经牢固地定居下来；也就是说，他们居住在他在城市和城镇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因此，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

他开始审视商业领域和所有货币交易，视为一项专属于他自己的特权，并无情地利用它。

(d) 此时金融和贸易已完全被他垄断。

最后，他的高利贷利率引起了反对，犹太人越来越无耻地开始全面显现，激起了民众的愤慨，而他的财富炫耀则引起了大众妒忌。

当他把土地财产也算入他的商业商品，并将土地降级为市场商品的水平。

因为他自己从来不耕种土地，而是把它当作可以剥削的对象，所以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但条件是他必须服从最无情的勒索新主人的出现，使公众对犹太人的反感日益加深，并最终演变成公开的敌意。

他的暴政令人难以忍受，人们开始反抗他的统治，并使用对他施加身体暴力。他们开始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个外国人，然后开始发现他身上固有的令人厌恶的特质和特征，直到最后鸿沟犹太人和他们的主人之间的沟通已无法再进行。

在危难之时，民众通常会对犹太人产生愤怒情绪，群众会采取他们私自操纵法律，夺取犹太人的财产，毁掉犹太人，以此来保护自己免遭他们所认为的上帝之灾。

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与犹太人亲密无间，他们看着他的存在在他们当中，有一种公共危险仅次于瘟疫。

(e) 犹太人开始显露其本性。他向各国政府献殷勤，阿谀奉承，用金钱进一步讨好自己，从而定期为自己争取一次再次享受剥削受害者的特权。

尽管公众对这位永远的奸商的愤怒爆发并将他赶了出去，但几年后他再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并继续像以前一样。

任何迫害都不能迫使他放弃剥削他人的行业，无论多少骚扰成功地将他永远地赶了出去。

他总是过一会儿就回来，而且总是重复着老故事。

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通过了禁止犹太人获得土地占有权。

(f) 随着国王和王子的权力越来越大，犹太人也悄悄地接近他们。他乞求那些经济拮据的绅士们，如果他们收到足够的报酬，他们就会很乐意获得。

不管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犹太人都能在几年内收回它，他靠着特权，甚至还能获得复利。他真是个寄生虫他紧紧地依附在那些不幸的受害者身上，无法被移除，所以当王子们他们再次需要帮助，他们用自己的血液从他肿胀的血管中抽取血液手。

这种游戏不断重复。对于那些被称为“德国王子”的人来说，他们扮演的角色和犹太人一样卑鄙。他们是真正的祸害他们的人民。

他们的同辈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政府部长中也可以找到。这是由于德国诸侯认为，德国民族不可能彻底摆脱犹太人的危险。

不幸的是，后来情况并没有改变。王子们终于得到了奖励他们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应受千倍惩罚。

人。他们与撒旦结盟，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处于撒旦的力量。

(g) 王子们允许自己卷入犹太人的劳作，从而为自己做好了准备垮台。他们在人民中的地位被缓慢但稳步地削弱，而不是不仅因为他们一直未能保护其臣民的利益，而且因为他们积极剥削他们。



犹太人准确地计算出王子们垮台的时间，并做了他的最好能加速这一进程。他通过阻碍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难。

对他们的人民的责任，通过最卑鄙的奉承鼓励他们沉迷于这些不良习惯，使他对于他们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他的精明，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金钱问题上的完全不择手段，使他能够获得新的向君主的臣民收取酬金，从他们身上榨取钱财，然后把它们花掉尽快。

每个宫廷都有“宫廷犹太人”，这是这场瘟疫的称呼，他们折磨无辜的受害者，直到他们陷入了绝望，而与此同时，他提供了王子们浪费在自己的享乐上。

毫不奇怪，这些人类的装饰品成为官方荣誉，甚至被纳入世袭贵族的行列，从而不仅为不仅会使该社会制度遭受嘲笑，还会从内部污染它。

当然，犹太人现在可以利用他已经获得的地位，获得更大的进步比以前更快。

最后，他只需要受洗，就可以享有所有的权利和特权这些东西属于他所掠夺的那个国家的子民。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绝妙的举动，他经常利用这一点，让教会为信仰中迎来了新生命而感到自豪，以色列也为此而高兴，看到这个把戏成功完成，它很高兴。

(h) 在这个阶段，犹太人的世界开始发生转变。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就是说，犹太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把假装成别的什么东西看得那么重要，无论如何，他们与其他种族的区别特征并不容易克服。

甚至到了腓特烈大帝时代，也没有人将犹太人视为“外国”人，歌德起来反抗法律禁止婚姻的失败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

歌德当然不是反动派，也不是投机者；通过他，发出了鲜血和理性的声音。

尽管宫廷圈子里发生了一些可耻的事情，但人们认识到本能地认为犹太人是他们自己肉体中的异物，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承认这一事实所决定。

但现在注定要发生改变。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犹太人已经完全掌握了主人的语言，他认为他现在可以较少强调他的犹太人身份，而更多地强调他的“德国血统”。

虽然乍一看这似乎很荒谬，但他还是厚颜无耻地称他本人就是“条顿人”，在这里指的是德国人。

就这样，我们能想象到的最臭名昭著的强加开始了。犹太人没有具有一点点德国性格的痕迹。他只学会了扭曲德语以用于自己的用途的技巧，而且是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没有吸收德国人性格的任何其他特征。因此，他的掌握德语是他能假装是德国人的唯一依据。

然而，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并不是通过语言的联系，而是完全通过血缘的联系来建立联系的。

种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犹太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把他对保护自己的语言如此不重视，同时又努力尽最大努力避免他的血统与其他种族的血统混合。

一个人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和使用一门新语言，但他的旧观念却他的内在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最好的证明是犹太人自己提供的。他可能会说一千种语言，但他的犹太人性将始终保持一致。

他的显著特征与谷物一样商人，两千年前他在奥斯蒂亚讲拉丁语，就像今天他讲拉丁语时一样。

试图用他的德语胡言乱语来销售掺假面粉。他始终是同一个犹太人。

如此简单的事实，德国政府的一般官员却不承认部门或警察部门的官员，也是不言而喻和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将是很难找到像民间那样缺乏本能和智慧的另一类人我们现代德国国家当局雇用的仆人。

在我所讨论的阶段，犹太人突然决定改变自己，原因在于变成德语并不难发现。

他感到王子们的权力正在逐渐瓦解，因此他希望找到一种新的社会他可以站在上面的木板。此外，他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经济支配地位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他认为，除非他充分享有“公民权利”。

他的目标既是保存，也是扩张；因为他爬得越高，他就越有吸引力成为实现古老目标的前景，这是古代向他许诺的，即他现在以狂热的目光期待着世界统治，因为他认为他已经看到了它他的掌握。

因此，他现在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成为一名正式的公民，拥有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就是他从贫民窟解放出来的原因。

(i) 因此，宫廷犹太人逐渐发展成为民主犹太人，但自然地，他仍然与上层人士交往，他甚至试图进一步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圈子。

与此同时，他的种族的其他一些代表也在讨好民众。

如果我们记住犹太人在战争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的罪行，多少个世纪以来，他曾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剥削他们，他曾吸干他们的本质的精髓，当我们进一步回忆起他们是如何逐渐开始恨他的时候并最终把他视为公众的祸害，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犹太人必须多么困难找到了这最后的转变；事实上，他一定竭尽全力才能对那些因他而血流成河的可怜受害者来说，他自称是“人类的朋友”。

因此，犹太人开始公开弥补他所犯下的罪行过去的人们。

他首先以人类“恩人”的身份出现，从而开始了自己的蜕变。

由于他的新慈善政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因此他不能很好地适用于他自己遵循圣经的劝告，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他觉得有义务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群众所遭受的苦难有多么深重这使他感到悲痛，为了帮助他们，他愿意做出何等的个人牺牲。

他以犹太人典型的天生谦逊向世界宣扬自己的美德直到最后世界才真正开始相信他。那些拒绝分享这种信仰的人被认为对他不公平。

因此，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扭曲事实，使人们认为是他自己。

总是被冤枉，而不是被冤枉。实际上有一些特别愚蠢的人他不禁对这个可怜又不幸的犹太人感到怜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宣称准备采取个人行动，牺牲，犹太人永远不会因此而变得贫穷。

他总能顺利地维持收支平衡。

有时，他的仁慈可以比作没有撒在田里的肥料不仅仅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未来的成果。

无论如何，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世界就知道犹太人已经成为一名普通的慈善家。多么独特的转变！在其他人的看来或多或少自然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了惊讶，有时甚至钦佩，因为这在犹太人身上被认为是不寻常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仁慈行为比普通人受到更多的赞誉。

犹太人突然变得自由了，开始热情地谈论必须鼓励人类进步。

他逐渐呈现出一种新时代先驱的形象。但与此同时，他继续破坏最有利于人民的经济制度的基础。

他收购了各种国家企业的股份，从而将自己的影响力推向了使后者成为证券交易所买卖的对象，或更确切地说，它更像是金融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从而毁掉了可以实行个人独资经营。

只有当犹太人进入时，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隔阂感才消失并由此引发了后来的政治阶级斗争。最后，犹太人凭借其在证券交易所占据主导地位。他确保了，即使不是所有权，至少是控制权国家的劳动能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努力消除种族和公民歧视迄今为止一直在各个方面阻碍着他

的进步。

他以自己特有的坚韧不拔，为此目的，他倡导宗教宽容事业，并且共济会组织已经完全落入他的手中，他发现了一个宏伟的武器，帮助他达到目的。

政府圈子以及政治和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都倒台了通过他对共济会网络的操纵，他们成为了他计划的牺牲品，尽管他们自己甚至没有怀疑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人民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刚刚意识到自己权力，并开始用它来争取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迄今为止一直逃脱犹太人的控制。

至少，他的影响还没有深入到民众的更深更广的层面，这是令他不满意。

因此，他的政策的最重要阶段是确保对人民的控制。

犹太人意识到，要想成为公共专制者，就需要“起搏器”，他认为，只要他能插入足够大的资产阶级的部分，但共济会却未能抓住手套制造商和亚麻布织工们在脆弱的网眼中，因此有必要找到一个更粗大、更更有效的手段。

因此，除了共济会之外，还必须获得另一种武器。这就是媒体。犹太人他竭尽全力和毅力才得到它。

通过媒体，他开始逐渐控制整个公共生活。他开始推动它沿着他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的道路前进，因为他现在处于创造和指挥这种力量的地位，这种力量，即人们所熟知的“舆论”今天的情况比几十年前要好得多。

与此同时，犹太人也表现出了渴望知识的神情。

他赞扬进步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那些导致他人毁灭的阶段，因为他判断一切进步和发展都是从这些进步和发展给他人带来的好处的角度出发的。

自己的人民。当它没有给他带来这样的好处时，他就是启蒙的致命敌人，憎恨一切真正的文化。他在学校里获得的所有知识，其他人则被他剥削，仅仅是为了服务他的种族。

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犹太“国籍”。尽管谈论‘启蒙’、‘进步’、‘自由’，‘人性’等等，他首先关心的是维护自己民族的种族完整性。

他偶尔会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赠予一位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但种族血统他的男性后代的血统始终保持纯洁。他毒害了其他人，但却保留了自己的血液，保持其纯洁。

犹太人很少娶基督教女孩为妻，但基督教徒却娶犹太女人为妻。杂种后者联盟的结果总是倾向于犹太人。因此，上层社会的一部分尤其是贵族，则彻底堕落了。

犹太人很清楚这一事实，并系统地使用这种手段来解除知识分子的武装对方种族的领导人。为了掩饰他的伎俩，愚弄他的受害者，他宣称人人平等，无论他们的种族或肤色，傻子们就开始相信他了。

因为他的整个性格还保留着太多与广大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东西，让自己陷入他的圈套，他利用媒体向公众展示了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不真实的，但却很好地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漫画中，犹太人被刻意描绘成一个无害的小民族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它也有其独特之处。

这些漫画把犹太人描绘成本质上善良、正直的人，尽管他们礼仪，这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通常会尝试让他们看起来无关紧要，而不是危险。

在这一发展阶段，犹太人的主要目标是民主的胜利，或者更确切地说，议会制的最高霸权体现了他的民主理念。

这个机构与他的宗旨最为协调，因为这样就消除了个人因素，并且取而代之的是愚蠢的大多数、低效率，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怯懦。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推翻君主制，而这必然会发生迟早。

(j) 巨大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结构。

手工艺逐渐消失，体力劳动者失去了谋生的机会独立自主，堕落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取而代之的是工厂工人，其基本特征是，他们很少处于在晚年能够独立生活。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他被“剥夺了继承权”。

他的晚年生活实在是悲惨至极，根本不能称之为人生。

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迫切需要解决并找到了解决方案。

除了农民和工匠之外，一个新的阶级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官员和雇员，特别是在国家各项服务部门任职的官员和雇员。

他们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剥夺继承权”的阶层，但国家找到了补救办法为这种不健康的情况承担起为被无法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

因此引入了养老金和退休金制度。

私营企业逐渐增多地效仿了这一做法，以至于今天永久性非体力劳动者在晚年可领取养老金，如果他所服务的公司是已达到或超出一定大小限制的。

只有凭借向州政府官员提供的保证，他们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照顾年龄，发展出如此高度无私的奉献精神，这在战前是德国官员的显著特点之一。

因此，一个没有个人财产的阶级被一个聪明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供给体系，并在国家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国家和民族再次面临问题，但这一次更是如此全面。当新兴产业兴起并发展时，数百万人离开了到农村和村庄的大工厂去就业。

这个新阶级被迫生活在比悲惨更糟糕的条件下。

对工匠中迄今流行的工作方法进行或多或少的机械改造而农民不太适应这个新工人阶级的习惯和心态。

农民和工匠以前的工作方式与新型工厂工人的密集劳动。

在旧行业中，时间并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却成为新型产业体系。

大型企业正式接管旧工作时间工业企业造成了致命的后果。迄今为止，在一定的时间相对较短，因为当时现代的集约化生产方法未知。因此，尽管在旧制度下，一天工作十四甚至十五小时并不是无法忍受，现在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忍耐极限，因为在新的系统的每一分钟都被利用到了极致。

这种将旧工作时间荒谬地转移到新工业体系的做法在两个方面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方向。

首先，它损害了工人的健康；其次，它摧毁了他们对最高法律的信仰。

正义。

最后，一方面，工资少得可怜，另一方面，雇主却比以前更有利可图的职位。

在空旷的乡村里，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问题，因为主人和农场工人做同类的工作并一起做。

他们一起吃饭，有时甚至吃同一个盘子。

但这一点也改变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分歧现在似乎已经延伸至生活的各个领域。

犹太化进程在我们人民中被允许影响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事实上，体力劳动不仅几乎得不到任何认可，甚至被认为有辱人格。

这不是德国人的自然态度。这是由于我们的生活被外来因素所影响，而这个外来因素就是犹太人的精神，它的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我们的手工艺曾经受到高度尊重，而所有的体力劳动却遭到某种程度的蔑视。

于是，一个新的、不被尊重的社会阶层诞生了，总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国家是否能够让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群体，或者现在存在的地位差异是否会成为永久的鸿沟将此类与其他类区分开来。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阶级不包括相反，它的队伍里充满了民族中最有活力的元素。

所谓文明所产生的复杂性，还没有发挥其瓦解的作用和堕落的影响。这个新的下层阶级的广

大群众，包括体力劳动者，还没有沦为和平主义病态弱点的牺牲品。他们仍然坚强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会采取残酷的手段。

虽然我们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根本没有注意这个重大问题，而且漠然地让事情自然发展，犹太人意识到，情况为他提供了未来。

一方面，他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组织到了最高程度程度，他讨好他的政策和权力的受害者，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他们与自己斗争的领导者。

“反对自己”在这里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对于这个“谎言大师”知道如何以无辜者的名义出现，并将罪责推给别人。

因为他竟敢在群众中亲自领导，所以群众从来没有一刻怀疑他们正成为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骗局之一的受害者。

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个新阶级从一般经济中崛起的那一刻起犹太人清楚地看到，他要在哪里为自己的进步进程找到必要的起搏器。

起初他利用资产阶级作为攻打封建秩序的攻城槌，现在他利用工人反对资产阶级世界。

正如他在资产阶级，他现在希望通过加入工人阶级为争取他们自身的存在，他将能够获得他想要的掌握权。

当那一刻到来时，工人们唯一要争取的目标就是犹太人。

工人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于他所反对的权力的统治之下。

相信他在战斗。显然他被迫与资本作斗争，因此他更加很容易被带去争夺资本主义利益。

人们不断抗议国际资本，但实际上却是抗议国家这些口号所针对的是经济结构。其目的是要摧毁这种结构，并废墟中胜利地竖起了国际证券交易所的建筑。

犹太人的做法是这样的：他虚伪地向工人叩头假装对他和他的命运感到同情，甚至对他所遭受的痛苦和贫穷感到愤慨。

他必须忍受。

这就是犹太人努力赢得工人阶级信任的方式。他热衷于研究他们的各种艰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并努力激发工人改变生活条件的渴望。

犹太人巧妙地激发了雅利安人对社会正义的内在渴望，这是典型的特征。一旦这种渴望变得鲜活，它就会转化为对那些更幸运的人生境遇。

下一阶段是为消除社会错误，于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被发明出来了。通过把这一学说作为正义的社会权利辩护，犹太人更有效地宣传了它，但同时他激起了善良人民的反对，他们拒绝承认这些要求，因为它们所呈现的形式和伪哲学装饰，似乎从根本上不公正，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在纯粹的社会概念的外衣下隐藏着一些目的，具有撒旦的性质。

这些目标甚至被公开阐述，其清晰程度甚至无比无耻。这个马克思主义教义是人类理性与人类荒谬的不可分割的混合物，但这种结合是安排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只有荒谬的部分才能付诸实践，合理的部分。

通过断然否定个人、国家及其种族的个人价值，宪法，这一学说摧毁了所有文明的根本基础，因为文明依赖于本质上就是这些因素。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正本质，就世界观这个词而言根本就不适用于这些从犯罪分子大脑中产生的幻影。

个性和种族概念的毁灭，消除了阻碍劣等分子，也就是犹太人，主宰社会团体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荒谬性，使得该理论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由于它的伪逻辑，聪明人拒绝支持它，而所有那些不太聪明的人习惯于运用智力，或者对经济只有基本概念的人原则，全心全意投身马克思主义事业。

运动背后的智慧——即使这场运动要生存，也需要智慧——是由犹太人自己提供的，作为他们的“牺牲”。

由此产生了一个完全由手工组成的运动犹太人领导下的工人。从表面上看，这场运动力求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奴役工人，从而消灭非犹太民族。

共济会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宣传，他们的和平主义教义麻痹了民族自我保护的本能，现在扩展到工人和资产阶级利用新闻媒体，几乎到处都在犹太人的手中。

除了上述两种瓦解工具外，还增加了第三种更残酷的工具，即组织暴力。大批马克思主义袭击者旨在完成这项工作先前使用的两种武器已达到消耗战的边缘。

所有这些力量的联合活动都得到了奇妙的管理，而且不会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一直作为更或者说不那么传统的国家权威现在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下崩溃。

除极少数例外，犹太人发现他的作品最自满的推动者高级、甚至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之间的破坏。

对“上级”卑躬屈膝，对下属目无比傲慢。

“低劣”是这一类人的特征，也是令人震惊的愚蠢。

唯一能超越它的是其惊人的自负。

这些品质对于犹太人与我们的当局打交道时非常有用，因此他很欣赏他们。

如果我要粗略地描述一下现在开始的实际斗争，我应该稍微描述一下因此：不满足于经济上征服世界，而是要求它也必须屈服于犹太人通过政治控制，把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分成两部分，与这场斗争中要争取的最终目标相一致在他的指导下。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个独立的运动，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两个分支是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

工会运动必须聚集新兵。它为工人提供援助和保护。

工人为了维持生计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这是由许多工业家的贪婪和心胸狭隘引起的。

除非工人愿意放弃一切生存权利，否则，自然本身的要求，除非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雇主的意志，否则，很多情况下，没有人类的责任感，对人类的需求完全麻木不仁，那么工人必须自己处理问题，因为有组织的社会团体一也就是说，国家并不关注他的需要。

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被自己的物质利益蒙蔽了双眼，反对这种生活工人的殊死斗争，并给他们设置最困难的障碍。

这个资产阶级不仅阻碍一切旨在缩短禁止非人性的长时间工作，禁止童工，为妇女提供安全和保护，改善工人阶级车间和住宅的卫生条件，但同时精明的犹太人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把受压迫者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逐渐成为工会运动的领袖，这对他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并不真心实意地寻求社会错误的补救措施；他只追求一个目标，即聚集和巩固一个追随者团体，他们将在他的指挥下作为武装破坏民族经济独立的经济战争武器。

因为，虽然健全的社会政策必须实现双重目标，即确保体面的生活水平，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和福利，另一方面是维护另一方面，犹太人根本不考虑这两个目标。

毁灭两者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宁愿毁灭而不是保护国家经济体系的独立性。

因此，作为工会运动的领袖，他毫无顾忌地提出这些要求不仅超出了运动宣称的目的，而且无法实现不会破坏国家经济结构。

另一方面，他无意看到人口健康强壮地发展；他会更愿意看到人们堕落成没有思想的群体而这种群体可能会被完全隶属。

因为这是他的最终目标，所以他可以提出最荒谬的主张。

他很清楚，这些要求永远不可能实现，因此，实际上他们可以改变事态，但他们最多只能激起不安情绪在群众中。

这正是他希望这种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的、诚实的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

因此，只要没有开展广泛而深刻的群众启蒙运动，以便他们能够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们痛苦

的原因。

如果政府当局要除掉犹太人及其只要群众仍然像今天这样缺乏信息，只要国家仍然像现在一样对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群众将追随领导人做出的任何决定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做出了最夸张的承诺。

犹太人是这门艺术的大师，他的活动不受任何道德考虑的阻碍当然，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击败了该领域的所有竞争对手，并驱使他们来自行动现场。

根据他本性的残酷和贪婪，他把工会运动变成了成为一个实施暴力的组织。那些人的抵抗和反感他们的洞察力迄今为止使他们没有吞下犹太人的诱饵，已经被恐怖主义。

这种活动的成功是巨大的。实际上，犹太人正在利用工会，它可以成为国家的福祉，也可以成为摧毁国家根基的武器经济结构。

与此同时，政治组织也在进步。它与工会运动，因为后者为群众的政治组织做好了准备，并且甚至强迫他们这么做。

这也是政治组织维持其权力所需的资金来源。

巨大的仪器正在运转。

工会组织是其会员和党鞭政治活动的控制机构参加一切重大的政治示威活动。

最终，它不再为经济利益而斗争，而是把其主要武器——拒绝继续开展政治运动所需的工作（采取总罢工的形式）。

在一家出版了适合最无知的读者水平的读物的报刊上，政治和工会组织有一个工具，可以制定最低发动一场无情的毁灭运动。

本报的宗旨不在于用可能有助于让他们的心灵超越日常生活的肮脏条件，但相反的是，迎合他们最低级的本能。

在那些懒惰和自私自利的群众中，这种猜测的结果是有利可图。

正是这些媒体，首先进行狂热的诽谤运动，努力推翻一切可能被视为民族独立、文化地位和经济自给自足。

它特别针对那些拒绝遵守犹太教规的有品格的人进行攻击。

那些试图控制国家的人，或者那些仅仅因为他们的卓越的智慧。

为了引起犹太人的敌意，没有必要对他表现出任何公开的敌意；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有能力在未来某个时候反对犹太人，或者使用他的能力和性格增强了犹太人认为的国家的权力和地位对自己怀有敌意。

犹太人的本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不失败，他们很容易辨别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和那些不志趣相投的人的真实心态肯定会被列为他的敌人。

由于犹太人不是侵略的对象，而是侵略者，因此他把犹太人视为敌人不仅要打击那些攻击他的人，还要打击那些有可能抵抗他的人。

他用什么手段来打败这种自以为正直的人，这不是光荣的斗争，而是谎言和诽谤。他会不择手段。他的行为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人们真的不会惊讶，如果在我们的人民的想象中，撒旦，作为一切邪恶的化身，具有犹太人的形式和特征。

广大群众对犹太人的内在性格一无所知，缺乏本能以及我们上层阶级所展现出的洞察力，是解释为什么许多人很容易成为犹太人系统性谎言运动的牺牲品。

而上层阶级，由于天生的懦弱，会避开任何犹太人所谎言和诽谤的攻击，老百姓对一切都轻信，无论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或头脑简单。

政府当局总是保持沉默，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迫害犹太人袭击的受害者，以阻止犹太媒体的活动。

在政府官员的愚昧眼光看来，这种行为似乎符合维护国家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的政策。

渐渐地，犹太人手中的马克思主义武器变成了正派人的眼中钉像噩梦一样压在他们头上。人

们开始在这个可怕的敌人面前畏缩，从而成为他的受害者。

(k) 犹太人在国家的统治地位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有把握了，他不仅可以负担得起再次称自己为犹太人，但他甚至自由而公开地承认他的种族和政治问题。

一部分犹太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外来民族，但即使在这里，也有另一部分谬误。

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让世界其他国家相信犹太人将满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犹太人由此采纳欺骗头脑简单的雅利安人的另一种手段。

他们根本没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在其中居住的意图。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诈骗的中央组织和作弊。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能被任何其他国家控制。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为被发现的骗子提供庇护，同时也是培训其他骗子。作为他们信心 and 安全感不断增强的标志，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而无耻地宣称其犹太国籍，而另一部分则虚伪地假装视情况而定，是德语、法语还是英语。

他们在与他人交往时所表现出的直率行为表明了他们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清晰认识不久的将来就会取得胜利。

黑发犹太青年连续几个小时等待，邪恶地盯着并监视着他计划引诱一个毫无戒心的女孩，给她的血液掺假，然后把她从怀里夺走她自己的人民。

犹太人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破坏被征服民族的种族基础。

他系统地毁掉女孩和妇女，力图打破种族之间的最后障碍。

歧视。

犹太人把黑人带入莱茵兰，最终目的是贬低他们所憎恨的白种人，从而降低其文化和政治水平，犹太人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

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种族纯粹和种族意识，它就永远不会被犹太人征服。

在这个世界上，犹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民族的主人，除非他们是混血民族。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有计划地努力降低一个民族的种族素质，通过永久的污染该民族的各个个体的血液。

在政治领域，他现在开始用独裁的思想取代民主的思想。

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组织起来的群众中，他找到了一种武器，使他能够抛弃民主，用独裁统治征服和统治各国。

暴力的帮助。

他系统地开展工作，以便通过两种方法实现这场革命，即经济和政治。

在国际势力的帮助下，他在那些已经事实证明，他们对于他来说太过坚固，能够抵御来自内部的攻击。

他试图迫使他们参战，然后，如果这是他的计划所必需的，他将展开当部队正在前线作战时，却仍举着反抗的旗帜。

在经济方面，他通过系统性的破坏手段来破坏国家社会企业，直到它们变得过于昂贵，以至于它们被从国家手中夺走，受到犹太金融的控制。

在政治上，他致力于让国家放弃其生存，因为他破坏了民族抵抗和防御的基础，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辱骂过去和历史，拖延一切真正伟大的事情都落入了下水道。

在文化方面，他的活动包括毒害艺术、文学和戏剧，持有自然情感被蔑视，颠覆了一切崇高、美丽、有价值 and 善良，最终把人民拖入他自己低劣的心态水平。

他嘲笑宗教。道德和正派被描述为过时的偏见，因此，为了破坏民主的最后基础，进行了系统性的攻击。

如果一个民族要在这个世界上为生存而奋斗，那么民族的存在就必须休息。



(1) 现在开始了伟大的和最后的革命。犹太人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他抛弃了所有的伪装。从民主的犹太人、人民的犹太人中，出现了渴望鲜血，人民的暴君。

在几年的时间里，他试图消灭所有代表民族知识分子，这样就剥夺了人民的天然知识领袖他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他们在长期专制统治下沦为奴隶。俄罗斯就是最可怕的例子。

奴隶制。

在那个国家，犹太人在一次野蛮的狂热运动中杀害或饿死了三千万人并采取了非人的酷刑。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一群犹太文人和金融强盗统治一个很棒的人。

最终的后果不仅仅是人民在统治下失去一切自由犹太人，但最终这些寄生虫自己消失了。受害者的死亡随之而来或早或晚都会被吸血鬼所取代。

如果我们回顾导致德国人民垮台的所有原因，我们会发现最深刻的决定性原因在于缺乏对种族问题的洞察力和尤其是未能认识到犹太人的威胁。本来很容易忍受1918年8月战场上遭受的失败。与军队相比，这些失败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国家所取得的胜利。

我们的垮台不是这些失败的结果；我们被那股力量推翻了，通过几十年的系统运作来摧毁那些政治本能和道德毅力，只有这些才能使一个民族为生存而奋斗，从而保障生存的权利。旧帝国忽视了维护我们民族生活的种族基础的问题，废除了人民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唯一权利。

把人民变成杂种或允许人民变成杂种的国家，都是罪孽违背永恒天意，从而被更强大的对手推翻这不能被视为一种错误，相反，它是一种正义的恢复。

如果一个民族拒绝捍卫和维护自然赋予它的品质和根植于种族血液的民族，那么这样的民族就没有权利抱怨失去它在地球上的存在。

地球上的一切都可以变得更好。

每一次失败都可能成为未来胜利的基础。

每场失败的战争都可能成为以后复兴的原因。

任何形式的苦难都能给人类的能量带来新的动力，而压迫这些力量可以发展，带来民族灵魂的重生——只要种族血统始终保持纯净。

种族纯粹性的丧失将永远摧毁内心的幸福。

它永远贬低人类，其身体和道德后果永远无法消除出去。

如果研究这个独特的问题，并将其与生活中的其他问题进行比较，我们很容易认识到与此相比它们的重要性是多么小。

它们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但种族纯洁性的维持或丧失的问题只要人类存在，血液就会持续存在。

战前时期出现的所有衰落症状都可以追溯到种族问题。

无论我们是在处理一般法律问题，还是经济生活中的严重错误问题，指向文化衰落或政治退化的现象，无论是教育制度的缺陷或媒体对成年人口的不良影响在所有情况下，这些现象都是由于缺乏对种族利益的考虑而造成的。

自己所属的国家，或者未能认识到允许一个外来种族在民族体内共存。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改革尝试、所有社会救济机构、所有政治斗争、所有经济进步和知识储备的明显增加，注定要未产生任何重大成果。

民族，以及使其得以存在的组织，即国家，并不是内在的力量和稳定性在发展，但相反，却明显失去了活力。

第二帝国的虚假辉煌无法掩盖其内在的弱点，每一次试图重新激活它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最主要的、最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

认为试图操纵的各政党的追随者德国人民，甚至所有领导人的状况本身就很糟糕，或者意味着错了。他们的行动注定要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我们普遍疾病的症状，他们试图治疗症状，而忽略了疾病的真正原因。

如果一个人系统地研究一下旧帝国的发展路线，他就会不由自主地经过仔细的政治分析，看到内部堕落的过程已经开始，甚至当时，统一德国刚刚建立，德意志民族正处于繁荣昌盛时期。

尽管表面上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尽管经济财富。在国会选举中，马克思主义者选票的增加表明内部崩溃和政治崩溃正在迅速逼近。

所谓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胜利都是徒劳的，不仅因为他们不能阻止数量增长的是马克思主义选票数量的不断增长，即使资产阶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但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感染了衰变。

尽管完全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世界已经从内部感染了致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有时公开抵制，这可以归因于雄心勃勃的政治领袖，而不是任何原则上的对手之间的反对，决心战斗到底。

在这几年里，只有一个主角在坚持不懈地战斗。这就是犹太人。随着民族自保意志的减弱，大卫之星稳步上升。

因此，它不是一个充满进攻决心、冲上战场的国家 1914 年 8 月，它只是民族自尊心的最后一丝本能的体现。

面对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瘫痪，威胁着我们的人民。即使在国家命运悬而未决的那些日子里，内部敌人不被承认，因此，一切抵抗外部敌人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

徒劳的。

上天并没有将奖赏赐予胜利之剑，而是遵循了永恒的法则报应正义。对这一切的深刻认识是这些原则的源泉，激励我们新运动的趋势。我们坚信，只有认识到这些趋势，真理，我们才能阻止德国的民族衰落，为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能够重新建立起一个不再是我们人民所陌生的机器的国家，为经济需要和利益而设立的，而是由人民的灵魂创造的有机体他们自己。

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国家。

## 第十二章：第一阶段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德国工党

在本书的结尾，我将描述我们运动进展的第一阶段，以及简要介绍一下那段时间我们遇到的问题。

我这样做，无意阐述我们作为我们目标所设定的理想。

运动，因为这些理想意义重大，以至于对它们的阐述将需要一整卷。

因此，我将在本书的第二卷中详细探讨构成我们运动的纲领，我将尝试描绘出我们所说的‘国家’一词。

我说的“我们”，是指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本质上是相同的渴望，尽管在个别情况下，他们无法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描述他们眼前浮现的景象。

所有伟大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主角站出来代表数百万人。

伟大改革的最终目标，往往是人们深切渴望的几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人，直到最后其中一个人站出来，成为宣布群众的意愿，成为他现在设定的旧愿望的捍卫者以新理想的形式胜利实现。

事实证明，数百万人民渴望彻底改变我们的现状他们中间存在的深深的不满情绪这种感觉有千百种表现形式，有些人表现为灰心丧气、绝望；其他人则以怨恨、愤怒和愤慨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些人对这种深刻的不满情绪持冷漠态度，而另一些人则采取暴力愤怒的表现。

这种感觉的另一个迹象可以从那些弃权者的态度中看出。

投票选举，而另一方面，大量人站在狂热的左翼极端分子。

我们的年轻运动首先要呼吁的是后者。它不是一个组织为满足和满意的人，而是为了聚集所有那些遭受深切的焦虑，找不到安宁，那些不快乐和不满的人。这并不是其本意不是浮于民族生活的表面，而是要将其根植于人民之中。

从纯政治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分裂开来。其中一部分，是两者中较小的一部分，由知识分子阶层组成该国所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都被排除在外。

表面上看，这些知识分子阶层似乎具有民族意识，但这个词意味着他们除了对捍卫他们所谓的国家利益，而这又似乎与王朝政权的利益一致。

这个阶级试图通过借助智力武器，在残酷的手段面前，这些武器不够充分，也不够肤浅对手所采取的所有策略，就其性质而言，都注定会失败。

一击猛烈，这个迄今统治的阶级就被打倒了；它颤抖着，恐惧，并接受无情的胜利者施加给它的一切羞辱。

与这个阶级相对立的是广大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组织起来或多或少带有激进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运动。

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知识分子抵抗，方法是蛮力。

他们没有任何民族主义倾向，而且故意否定了促进国家利益的想法。

相反，他们促进了外国压迫的利益。

从数量上看，这个阶级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更重要的是，包括了民族的所有要素，没有他们的合作，民族复兴就不可能实现这不仅是实际不可能，更是难以想象的。

即使在 1918 年，也有一件事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那就是德国在我们重新确立与外界相关的国家实力之前，国家不可能世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武器并不是首要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它是如此；需要的是意志力。

德国人民曾经拥有足够的军备，但还不够捍卫其自由，因为它缺乏源自民族本能的能量自我保护以及坚持自我的意志。

只要缺乏精神，再好的武器也只是死的、毫无价值的材料，这使得那些愿意并决心使用这种武器的人。德国被她没有自卫能力，不是因为她没有武器，而是因为她没有意愿继续保住自己的武器。

进一步保护她的人民。

今天，尤其是我们的左翼政客，不断坚持认为他们的胆小怕事，卑鄙的、但实际上是背信弃义的外交政策必然导致解除德国。

对于所有这类言论，答案应该是：“不，事实恰恰相反。你的行为交出武器是你们反民族和犯罪的政策所要求的，即放弃国家利益。现在你试图让人们相信你的悲惨抱怨是根本原因是你没有武器。就像你行为中的其他一切一样，这是这是谎言，是对真实事实的歪曲。”右翼政客也应受到同样的谴责。他们悲惨地 1918 年上台的犹太暴徒能够剥夺这个国家的武器。

保守派政客援引裁军的说法既无理又无权。

这是迫使他们采取谨慎（也就是懦弱）政策的原因。

事实是，裁军是他们胆怯的结果。

因此，恢复德国权力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制造而是我们如何才能培育一种让人民拥有武器的精神。

一旦这种精神在一个民族中盛行，它就会找到一千条道路，每一条道路都通向获得武器。懦夫在受到攻击时不会开一枪，尽管他可能手持十把手枪；对他来说，它们的价值还不如一个男人手中的黑刺李。

勇气。

重建我们国家政治权力的问题首先是恢复民族自我保护的本能，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每一个准备步骤外交政策以及外国对一个国家的军事价值的每一个衡量都是经验证明，其依据并非是该国可能拥有的军备总量，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或者被认为具有的抵抗道德能力。

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成为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拥有大量武器，但显然存在着对民族的热情自我保护和英勇的勇气，将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因为联盟没有建立武器之间，而是人与人之间。

因此，只要英国民族可以指望它表现出政府的残酷和顽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使它能够坚持到胜利，任何它参加的斗争，不无论这样的斗争持续多久，无论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尽管实际的军事与其他国家相比，现有的设备可能完全不够用。

一旦人们认识到德国的复兴是重新唤醒人民意志的问题，政治上的自我保护，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仅仅赢得那些那些已经具有民族意识的分子，但那些故意反民族的群众必须是皈依并信仰民族理想。

旨在重建拥有完全主权的德国国家的年轻运动将因此必须把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作为共产党计划的一个特殊目标。

活动。

我们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一般来说是如此可悲地懒惰，他们的民族精神显得如此软弱。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不会对强有力的国家外交或内政政策。

尽管狭隘的德国资产阶级在解放的时刻已经到来，就像俾斯麦时代那样，我们将永远不必害怕任何由于他们公认的、众所周知的懦弱，他们积极抵抗。

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则完全不同，他们具有国际主义思想。

由于他们天性原始粗暴，他们倾向于接受暴力的观念，但同时他们的犹太领袖也更加残暴、无情。

他们将粉碎德国复兴的任何企图，就像他们通过打击摧毁德国军队一样从后面攻击它。

最重要的是，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将利用他们在这个议会制国家中的人数优势，而不是不仅会阻碍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还会阻止德国恢复其威望从而确立了她作为盟友的吸引力。

因为，我们自己并不是唯一意识到我们中间有一千五百万马克思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中央的追随者；还有外国也认识到我们必须承受的这种内在负担，并在计算时考虑到它评估与我们建立可能联盟的价值。

没有人愿意与一个人口活跃程度处于最不消极地反对任何坚决的外交政策。

情况更加恶化的是，那些政党的领导人背叛国家的人准备反对任何复兴的企图，只是因为他们想保住现在的职位。

根据人类历史规律，德国人不可能恢复他们以前所担任的位置，而不报复那些既是起因又是诱因的人导致我们国家毁灭的崩溃。

在后人的审判台前，1918年11月将不会被视为一场简单的叛乱，而是作为叛国罪。

因此，不可能想象重建德国的主权和政治独立，而没有同时在国家内部重建统一战线。

从实际方法和手段的角度来看，解放德国摆脱外国的奴役，只要人民群众不愿意支持这样的自由的理想。

从纯军事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军官，会同意学生大队不能对外敌发动战争；但是除了民族的智慧之外，民族的体力也是必需的。

此外，必须记住的是，如果国防仅由所谓的知识分子圈子组成。

加入志愿军团并牺牲在战场上的德国年轻知识分子 1914 年秋天的佛兰德斯之行后来被人们深深怀念。

他们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在战争过程中表现良好。

如果全国的工人阶级不这样做，那么不仅斗争本身就无法进行加入冲锋队，但如果没有团结一致，就无法进行必要的技术准备意志和国家内部的共同阵线。

我们的国家必须在千人目光之下解除武装凡尔赛和约任命的官员，不得为收回它的自由和人类独立，直到该国境内雇用的间谍大军全部被只剩下那些天生卑鄙无耻的人，他们为了俗话说的三十块银子。

我们可以对付这样的人，但数以百万计反对民族复兴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至少，只要他们反对的理由仍然存在，这个障碍就仍然是无法克服的。

国际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战胜，它的教义也没有被从他们的心灵中驱逐出去。

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可以审视恢复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独立，无论我们从无论从技术重整军备的角度，还是从实际斗争本身的角度，先决条件始终保持不变。

这个前提条件是必须首先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这个原则我们的民族独立。

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对外自由，国内改革的每一步最多也只能是增强我们的生产力，造福那些视我们为殖民地的国家被利用。

任何所谓的经济复苏所产生的剩余，都只能落入我们的手中国际监督员，以及任何社会改

善最多只能增加我们的产出，这些人的优势。

德意志民族不可能取得任何文化进步，因为这种进步太过依赖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和尊严。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以下途径才能找到德国未来问题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思想的支持，这必须是被认为是一项运动所要完成的最高和最重要的任务，它不努力满足当下的需要，但认为自己有义务根据未来结果它决定做或不做的一切。

早在 1919 年，我们就确信，要使群众具有民族意识，就必须构成了新运动的首要目标。从策略角度来看，这这一决定带来了一定数量的义务。

（1）为了争取群众支持，任何社会牺牲都是值得的。

民族复兴。

如今给予员工的任何经济优惠与如果这些让步有助于让群众回归，那么整个国家都会受益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民族。

除了卑鄙和短视，不幸的是，这些特征太在我们的雇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可能会阻止人们认识到，从长远来看，没有除非内部 *völkisch* 我们民族的团结得以恢复。

如果德国工会坚定不移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战争期间；——如果他们甚至在战争期间使用打击武器来迫使工业家（他们贪图更高的股息）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会采取了行动；如果他们同时像善良的德国人一样，坚定地捍卫国家，就像他们自己的主张；以及如果他们也同样无私地为国家奉献了他们应得的——那么战争永远不会丢失。

所有经济让步，甚至是最大的经济让步，都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与这样的胜利的的巨大意义相比！因此，对于一个将德国工人重新带回德国人民的运动来说，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牺牲在当然，前提是这些案件不会危及到独立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

（2）按照民族路线对群众进行教育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即通过提高社会条件，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才能创造出经济条件，每个人都可以共享国家的文化生活。

（3）要使广大群众具有民族意识，绝不是半途而废就能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软弱地坚持所谓的问题的客观方面——但仅仅通过对于必须达到的目标进行无情而狂热的片面坚持。

这意味着，一个民族不能成为我们接受的“民族”。

今天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有很多保留——但“民族”在激烈而极端的感觉。毒药只能用解毒剂来治疗，只有懒惰的资产阶级头脑才能思考通过妥协可以实现天国。

一个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不是由教授和外交官。由于这些群众对抽象概念知之甚少，他们的反应更多地是在情感领域，这决定了他们的积极或消极态度是。

他们只对力量的表现敏感，这种力量肯定来自积极或消极的一面，但他们永远不会受到任何三心二意、动摇的态度的影响。

一极与另一极之间。

他们态度的情感基础为他们异常的稳定提供了原因。

成功地对抗信仰总是比对抗知识更加困难。

爱比尊重更不容易改变。仇恨比厌恶更持久。

这个世界所见证的巨大革命，都是由科学带来的。

启示，感动群众，但总是用一种热情激励他们，而且常常一种歇斯底里的感觉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谁想赢得群众的支持，就必须找到打开群众心门的钥匙。

不是客观，那是软弱，而是决心和力量。

（4）只有领导运动的人下定决心，不屈不挠，才能赢得群众的灵魂。

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进行积极的斗争，而且还决心摧毁与他们作对的敌人。

当他们看到对手发起毫不妥协的攻击时，人民总是采取这证明正义站在侵略者一边。

但如果侵略者只做到一半，没有通过驾驶他的对手完全脱离行动现场，人民将把这视为侵略者不确定他自己的事业是否正义，他的半途而废的政策甚至可能是一种承认他的事业是不公正的。

群众只是自然本身的一部分。他们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无法相互理解。

被宣布为敌人的人之间的握手。

他们的愿望是看到强者获胜，弱者被消灭，或无条件地屈服于强者的意志。

要成功地使群众具有民族意识，只有通过积极的斗争赢得人民的灵魂，那些在人民中传播国际毒药的人滅絕。

（5）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当下的问题，只是某些明确的原因，而在所有这些原因中，只有一个具有深刻的因果意义。

这就是维护民族纯正血统的问题。

人体的强盛或衰亡，取决于气血。

那些不了解其种族血统的重要性或忽视保护其种族血统的国家，就像那些试图训练哈巴狗做灰狗工作的人，却不理解无论是灵缇犬的速度还是贵宾犬的模仿能力都不是天生的任何形式的训练都无法将这两种能力灌输到每个人的心中。

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保持其种族血统的纯洁性，那么它就破坏了整个民族灵魂的统一性。

民族的各个方面。

民族性格的瓦解是国家分裂过程的必然结果。

血液的变化，以及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变化，都只是改变种族本质的变化的结果。如果我们要解放德国人民我们必须首先从所有这些非典型缺陷和特征中去除造成这些特征的外来原因和失败。除非种族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犹太人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德国民族将永远无法复兴。

问题，都将被考虑和处理。

种族问题不仅是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也是了解各种人类文化。

（6）把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现在在国际阵营）我们并不意味着放弃各行业利益的原则和职业必须得到保障。

不同劳动部门和行业、职业之间的利益分歧并不是这与不同阶级之间的划分不同，而是我们经济中固有的自然特征。

生活。

职业分组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并不冲突，因为它意味着在所有影响国家生活的问题上维护国家团结。

将现在已形成社会阶级后，上层阶级的地位不能降低，而下层阶级的地位不能降低。

必须提高课程质量。

完成这个过程的阶级从来不是上层阶级，而是下层阶级。

正在为权利平等而战。

今天的资产阶级并不是通过封建阶级制定的措施纳入国家的。

贵族，但只有通过自己的能量和来自自己队伍的领导者才能实现。

德国工人无法从目前的地位上提高，通过人们交谈的亲切会议融入德国民间社区人民的兄弟情谊，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改善工人的生活，直到他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能够被弥合。

以此为目标运动必须努力主要从工人阶级。它必须包括知识分子阶级的成员，但前提是这些成员正确理解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场运动所追求的理想这个转化和重聚的过程，不是十年二十年就能完成的；正如此类运动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将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阻碍我们当代工人阶级融入民族民间社会的最大障碍是社区并不完全在于他为同事的利益

而奋斗，而是受到国际领导人及其反民族、不爱国态度的影响他已接受了。

如果他们受到在一切与国家政治和民族有关的事情上忠于国家的原则的启发，社会福利，工会将使数百万工人成为社会最有价值的成员民族共同体，而不顾他们自己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个体斗争。

一场真诚地努力使德国工人回归其民族社会的运动，把他从国际主义的愚蠢中拯救出来，必须对某些在工业界中盛行的观念。

其中一种观点是，根据民间社区的概念，雇员有义务将所有经济权利移交给雇主，并且工人将如果他们试图捍卫自己的正当和重要的权利，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与民间社会发生冲突。兴趣。

那些试图传播这种观念的人是故意撒谎。民间社区强加不仅一方有义务，另一方也有义务。一个工人的行为肯定违背了民间团体的精神，如果他的行为完全是自己主动提出并提出过分的要求，不考虑公众的福利或国家经济结构的维持。

但如果一个工业家采取不人道的方法，他也会违背民间社区的精神剥削和滥用国家的劳动能力，通过榨取工人的血汗，积累百万。

他无权称自己为“国民”，也无权谈论民间社区，因为他只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者播下社会不满的种子，挑起未来的冲突，必将损害国家利益。

年轻运动要吸收成员的资源首先是工人阶级。必须把这些阶级从国际狂热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必须消除他们的社会困境。必须使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于目前的水平，是可悲的，并转化为民间社会坚定而宝贵的因素，受到民族观念、民族情感。

如果在那些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能找到这样的人真心热爱自己的人民，热切期待德国的未来，同时深刻认识争取群众灵魂斗争的重要性，这样的人将会受到运动队伍的热烈欢迎。

它们可以为即将开展的工作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但这一运动永远不可能从没有思想的资产阶级选民群体中招募成员。如果它这样做，运动将背负着一大群人的负担，他们的整个心态只会帮助瘫痪争取广大群众的运动。

从理论上讲，说广大群众应该受到一种综合的影响，这种说法可能很好。

在一个运动的框架内领导上层和下层社会阶层；但是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虽然有可能采取心理对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影响，能够调动一些积极性，甚至唤醒一些通过公开示威来达成他们之间的谅解，不可能消除这些这些特征，或者说缺点，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两组文化水平和态度的差异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仍然很大，以至于会成为运动的障碍。

示威游行所激起的最初热情很快就平息了。

最后，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改造民族主义阵营本身，而是要赢得那些在观点上持反民族主义观点的人。正是这种观点最终决定了整个运动的策略。

（7）这种片面的但因而是明确的态度必须在宣传中表现出来。

运动的；另一方面，这种清晰度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使宣传本身是有效的。

如果宣传要为运动服务，那么它必须只针对一方；因为如果它应该改变其诉求方向，否则一方阵营将无法理解，并可能遭到拒绝另一方则认为这些观点明显且无趣，因为两大阵营的思想背景所探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甚至事物呈现的方式和特定细节表达的语气强调的对立面不能对属于对立的两个阶层产生同样的影响社会结构的极端。

如果宣传应该避免使用原始形式的这样的表达，是无法引起群众共鸣的。

相反，如果它的言行符合群众的粗暴情绪，它会因其粗俗、庸俗而为知识界所厌恶。

在一百个自称演说家的人中，只有不到十个能够今天，我向街道清洁工、机械师、挖土工人



等听众进行了有效的演讲，明天向大学教授和学生。

在一千名公众演讲者中，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够在同一个大厅里向机械师和教授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方式陈述能够被每个群体充分理解，同时，他有效地影响到他们被一种共同的热情所带动的程度。它必须总是请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最美丽的想法，体现在崇高的理论中，也可能只有能力一般的人才能将其带给公众。

这里重要的不是创造伟大理想的天才之人的远见，而是而是他的使徒们告诉广大群众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

社会民主党和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特别有资格吸引伟大的因为他们所诉求的公众是一致的所以他们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

他们的观点和论点越有限、越狭隘，群众就越容易理解和接受。

吸收它们，因为这些思想和论点很适合低智力水平。

这些考虑促使新运动采取了以下明确而简单的政策路线。

宣传必须与它所传达的信息和表达形式保持一致。

群众的智慧，其价值只能通过其所取得的实际成功来衡量。

在群众聚集的公共集会上，最好的演讲者不是接近一个主题的方式最接近那些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可能恰好是但演讲者最懂得如何赢得群众的心。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场，对一个地址挑毛病，因为他认为它是智力水平太低，尽管他自己也见证了它对较低层次的影响必须赢得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只能表明他完全没有能力正确地判断形势，从而证明他在新的运动中毫无用处。

只有那些非常了解运动使命和目标的知识分子才能对运动有所帮助他们已经学会了仅凭所获得的成功来判断宣传方法，并且永远不会被这些方法给他们个人留下的印象所影响。

宣传不是为了给那些已经有民族主义其目的是赢得那些迄今为止对国家怀有敌意的人的支持，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与我们同血同种。

总的来说，我在《战争宣传》成为决定我们进行何种宣传的指导规则和原则。

在我们的活动中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我们实施这些措施的方法。

已经取得的成功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8）任何政治改革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不可能通过试图去教育民众或者影响当权者，而只能通过把政治权力掌握在手中。

这不仅是任何世界的主角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责任——破碎的理想，以确保对能够使他们实现这一想法的手段的控制。

在这个世界上，成功是我们判断这项事业是否正确的标准或错误，而在这里我说的‘成功’，并不是指仅仅1918年获得权力，但这种获得权力的有益结果。

因此，他认为，如果像许多头脑空空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政变就不会成功现在，德国革命者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夺取了国家控制权，但前提是与旧政权相比，国家的命运已经改善当革命的目标和意图付诸实践时。

这当然不适用于德国革命，因为这场政变是1918年秋，这里被一伙土匪所劫持。

但如果获得政治权力是实现激发改革运动的理想，那么任何旨在改革的运动都必须从一开始就其活动的第一天，被其领导者视为群众运动，而不是文学运动茶俱乐部或聚在一起玩九柱戏的非利士人协会。

（9）新运动的性质和内部组织决定了它是反议会主义的。

也就是说，它从总体上和从自身结构上都拒绝了这样的原则：决策要根据多数人的投票做出，而领导者只是他人意志和意见的执行者。

这一运动确立了这样的原则：无论在最小的问题上，还是在最大的问题上，这个人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并承担一切责任。

在运动中，这一原则的实际后果如下：地方议会主席小组由其上级小组的组长任命。然后他是该小组的负责任的领导。

所有委员会都服从他的权威，而不是他服从他们的权威。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只有投票的委员会，但只有工作的委员会。

这项工作由负责的领导分配，他就是小组的主席。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上级组织——地区、城市巡回区和行政区划。

地区）。

在每种情况下，总统都是由上级任命的，并被赋予全权权力和执行权力。整个党的领导人只有在全体党员大会上选举产生，但他该运动的唯一领导者。

所有委员会都对他负责，但他不对委员会负责。他的决定是他要承担全部责任。

该运动的成员有权通过新的选举要求他作出解释，或者如果他违反了运动的原则，或者没有履行其职责，就把他免职充分的兴趣。

然后，他被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取代，后者被赋予同样的权力，并有义务负有同样的责任。

运动的最高职责之一是使这一原则不仅在自己的范围内有效不仅如此，整个国家也一样。

成为领导者的人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无限的权力，但他也必须承担最后、最沉重的责任。

一个没有勇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不适合当领导者。

只有具有英雄气质的人，才有能力担当这样的任务。

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文化不是由大众创立的。

它们完全是个人天才和个人效率的成果。

培育这些并给予它们应有的地位，是重新获得我们国家的威望和力量。

由于这一原则，运动必然是反议会的：如果它参与在议会机构中，它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摧毁这个机构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废除一个我们必须视为其中之一机构。

人类衰落的最严重症状。

（10）该运动坚决拒绝对以下问题采取任何立场：在其政治工作范围之外，或者似乎对其没有根本的重要性。

它的目的不是实现宗教改革，而是实现我们政治的重组。

人们。

它把两个宗教派别视为我们存在的同样宝贵的支柱因此它向所有那些破坏其基础的政党发动战争。

我们人民的宗教和道德稳定的基础是利用它为党服务兴趣。

最后，该运动的目的不是重建任何一种国家形式，也不是试图摧毁而是致力于使那些基本原则得以盛行，没有这些原则，就没有共和国，也没有君主制可以存在任意长的时间。

该运动并不认为其使命是建立君主制或维护共和国，而是建立日耳曼国家。

这个国家的外部形态问题，也就是它的最终形态问题，并不是根本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时机来解决的问题。

一旦一个民族理解并认识到影响其内部生存的重大问题，形式问题绝不会导致内部冲突。

（11）运动内部组织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权宜之计。

最好的组织不是将一个大型运动领导层和个人追随者之间的中介机构，但而是利用尽可能最小的中介设备来发挥功能。

因为这样一个组织的任务就是传递某种思想，这种思想起源于一个人向许多人传达这个想法，并监督这个想法的实现方式付诸实践。

因此，从任何角度来看，组织都只是一种必要之恶。它充其量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最坏的情况是其本身就是目的。

由于世界上产生的机械思维生物比理想主义者认为，发展组织形式总是比发展组织实质更

容易，也就是说比如说，它所服务的理想。

任何理想的进程都力求实现实际目标，特别是那些理想这些改革措施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个创造性的想法在某人的脑海中形成，然后他觉得自己被要求把这种思想传播给世界。他向别人宣扬他的信仰，从而逐渐获得了一定的关注者数量。

这种在同时代人中直接、个人地传播自己思想的方式，是这是自然的、最好的，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和获得大量追随者，它逐渐变得不可能成为该运动的最初教义的创始人亲自向他的众多追随者进行宣传，同时指导运动的进程。

随着粉丝群体的增加，直接头目与各个追随者之间的沟通变得不可能。

这种交流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装置进行，该装置被引入运动的框架。因此，理想的交流条件就消失了，组织必须作为必要之恶而被引入。

一些小型附属团体应运而生，例如在政治运动中，地方团体是组织后来发展出来的生殖细胞。

但这种分裂是不应该被引入运动的，除非宗教权威创始人和他所创立学校的成员均被毫无保留地接受。

否则，运动将面临因教义分歧而分裂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过分强调拥有一个地理中心的重要性，因为该运动的主要中心。

只有存在这样一个座位或中心，才能在周围施展魔法，比如麦加或罗马是编织的，能够提供一种运动，其源头在于运动的内部统一，以及承认一个领袖代表这种统一。

当组织的第一个生殖细胞形成时，必须始终注意不仅要强调思想起源地的重要性，但要赋予它一种崇高的意义。

运动发源地的创造性、道德性和实践意义它所支配的，必须以同样的程度强调，在原始细胞的运动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必须在结构中重新组合成更大的单位。

组织。

当个人粉丝数量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直接与粉丝进行个人接触时，因为领导这场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组建第一批地方团体。

随着这些团体的增多，有必要建立更高级的干部队伍，让地方团体组织起来。政治组织中此类干部的例子是地区（Gau）的干部和区（Bezirk）。

虽然维持原有的中央集权对最低层群体的权威可能相当容易，但相对于组织上级单位来说这样做要困难得多，因为现在发达。

但我们必须成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运动团结的必要条件。

才能得到保障，才能实现其理想。

最后，当这些较大的中介组织必须合并成新的、更高的单位，越来越难以保持原有席位的绝对优势。

运动及其思想流派。

因此，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引入组织的机械形式：精神权威和组织核心思想被证明是牢固的已确立的。

在政治结构中，这种权力往往只能通过行使力量。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制定了以下原则：运动的内部结构：（a）一开始，一切活动都应集中在一个慕尼黑。应该培养一批绝对可靠的追随者，并建立一所学校成立，后来有助于传播该运动的理想。

以后必须通过取得许多明显的成功来建立必要的权威。

这个特定的地方。

为了确保该运动及其领导人的名声和声誉，不仅要在这个城镇里树立一个引人注目的榜样打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是不可战胜的，但同时也表明反教义也是可能的。

(b) 地方团体不应在中央权力高于一切之前成立。

慕尼黑确实已经确立并得到承认。

(c) 地区、区域和省级团体不仅应在需要时成立，已经变得明显，但在中央权力的至高无上得到令人满意的保证。

此外，下属单位的设立应取决于人员是否可以找到有资格担任其领导的人。

这里有两种选择：(a) 该运动应该拥有必要的资金来吸引和培训聪明人才，有能力成为领导者。

这样获得的人员就可以根据战术情况系统地使用以及对效率的必要性要求。

这个解决方案比较简单，也比较快捷，但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因为这群领导人只有领取薪水才能为运动工作。

(b) 由于缺乏资金，该运动无法雇用有薪官员，因此必须从依靠自愿帮助者开始。

当然这个解决方案更慢并且更困难。

这意味着运动的领导人必须允许大片地区保持不进行选举，除非在这些地区，有一位有能力并愿意担任议员的人站出来为组织和指挥运动而设立的中央机关服务机构有关地区。

可能在广大地区找不到这样的领袖，但同时其他地区则会出现两三个甚至更多的人，他们的能力几乎处于同一水平。

这种情况带来的困难非常大，只有通过的时间。

建立任何组织分支机构的必要条件始终是可以找到能够履行领导职责的人。

正如军队及其各种组织单位如果没有军官就毫无用处一样，任何如果没有合适的领导者，政治组织就毫无价值。如果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具有领导天赋的人不能被组织和领导一个地方团体运动最好不要建立这样的团体，以免面临失败的风险团体成立后。

领导者的必备素质不仅在于意志力，还在于效率。

意志力和精力必须被认为比天才的智慧更重要。

最有价值的品质组合是天赋、决心和毅力的结合。

(12) 一个运动的未来取决于它所表现出的虔诚，甚至不宽容。

成员们为他们的事业而奋斗。

他们必须坚信，他们的事业才是正义的，他们必须坚持到底，直到成功，与同一领域的其他类似组织相比。

认为运动的力量必须增强才能联合起来，这是非常错误的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

这种组合带来的任何扩张当然都意味着外部从表面上看，观察者可能认为这种发展也是力量的增加；但在现实情况是，该运动因此接纳了外部因素，这将削弱其宪法活力。

虽然可以说一个运动在性质上与另一个运动相同，但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身份存在。

如果它确实存在，那么实际上就不会有两个运动，而只有一个。无论差异可能很大，即使它只是在于一组领导者与其他领导者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存在。

将不同生物体配对是违反一切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因为自然规律是，强者必须战胜弱者，并通过这种征服所必需的斗争，增强胜利者的体质活力和有效实力。

通过合并大致相同的政治组织，可以带来某些直接的好处可能会获得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样获得的好处必然会成为内部这些弱点稍后就会显现出来。

一个运动只有内部力量得到不受阻碍的发展才能变得伟大。

得到保障并坚定不移地增强，直到战胜所有对手。

可以肯定地说，运动的力量和生存权只能通过只要它始终坚持斗争是进步的必要条件这一原则，它已经超越了自己力量的最大极限，此时完全胜利就在眼前它的掌握。

因此，一场运动不应该只追求眼前和暂时的成功，但它必须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坚持不懈的精神，进行一场长期的斗争，这将确保其长期的内在成长。

所有这些运动的扩张都归功于所谓的类似生物的组合，这意味着它们的外部力量来自于妥协，就像在温室里强制生长的植物。

它们生长迅速，但缺乏使自然植物长成的内在力量。

能够抵御百年风雨的树木。

每一个体现创造性理想的强大组织的伟大之处在于宗教虔诚和不宽容，这是它与其他所有宗教不同的特点，因为它有对自身事业的信心。

如果一个理想本身是正确的，并且配备了我提到的战斗武器，那么它就能向如果这个地球有强大的力量，那么它就是不可战胜的，迫害只会增强它的内部力量。

基督教的伟大并非源于试图与那些古代世界的哲学观点与自己的学说有些相似，但不懈而狂热地宣扬和捍卫其自身的教义。

一个运动通过与其他运动联合而取得的明显进步将是一个学说及其组织的力量不断增强，很容易达到并超越它。

如果它保持独立并独自为自己的事业而战，它就能获得成功。

（13）该运动应该教育其追随者，斗争不能被认为是必要之恶，但其本身却是一种可取之事。

因此，他们不必害怕对手对他们表现出的敌意，而应该他们必须把它作为自己生存权利的必要条件。

他们绝不能试图避免被我们人民和我们的敌人所憎恨。

世界观，但必须欢迎这种仇恨。

谎言和诽谤是敌人用来表达仇恨的方法之一。

谁没有受到犹太媒体的反对、诽谤和中伤，谁就不是一个坚定的德国人，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最好的标准是，他的信念的真诚性，他的性格和意志的力量可以他的名字在我们人民的死敌当中所引起的敌意是可衡量的。

必须一再提醒运动的追随者，乃至整个国家事实上，犹太人总是通过报纸来传播谎言。如果他在某些情况下说真话，只是为了掩盖更大的欺骗，这使得表面的真相变成了蓄意的谎言。犹太人是撒谎的高手。谎言和欺骗是他们用来欺骗的武器。

战斗。犹太人发表的每一个诽谤和谎言都是我们身上的光荣伤痕同志们。他们最痛恨的人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他们最痛恨的人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最好的朋友。

如果我们有一个同志早上打开一份犹太报纸，没有发现自己被诽谤那么，他就浪费了前一天的时间，因为如果他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就会被迫害、诽谤、嘲笑、辱骂。

那些有效地打击我们人民的这个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人，同时也是雅利安民族和所有文化，只能期望引起：这个种族的反对和成为其诽谤攻击的对象。

当这些真理成为我们成员血肉的一部分时，运动将会不可动摇，所向披靡。

（14）运动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培养对个人人格的尊重。

永远不要忘记，一切人类价值都基于个人价值，每一个思想和成就是一个人创造力的成果。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对一切伟大事物的钦佩，不仅仅是对一个创造性的个性，但所有感受到这种钦佩的人都会因此而团结在一个契约之下。

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个人，特别是当个人本身所体现的不是不是机械的要素，而是文化创造能力的要素。

没有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老师完成他未完成的巨作；同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伟大的诗人或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或伟大的将军，因为他们的活动属于艺术创造能力的领域，这种能力可以永远无法机械地获得，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神圣的天赋。

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最伟大的成就、最伟大的文化作品和伟大政治家的不朽创造，都与一个名字密不可分，这个名字代表着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都有相应的符号。

不向这些伟大的精神致敬，就意味着忽视了这一巨大的资源，在所有伟人的记忆中都蕴藏着力量。犹太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伟人之所以伟大，只因为他们致力于毁灭人类及其文明，非常关心他们是否被当作偶像来崇拜。

犹太人试图贬低各国对其本国伟人所给予的尊重。他将这种尊重视为“个人崇拜”。

一旦一个民族丧失勇气，不再接受来自对于犹太人来说，它放弃了自身内在力量的最重要源泉。

这种内在力量不可能来自迎合大众的政策，而只能来自对天才之人，其令人振奋和高尚的影响，对我们的任何一位演讲者来说都是如此。

想想看，只有六七个互不相识的可怜虫聚在一起创立了一个运动应该能够成功完成大型群众性政党未能完成的任务，即重建德意志帝国，拥有比以前更强大的权力和荣耀。

如果我们受到攻击甚至嘲笑，我们应该很高兴，但最令人沮丧的是事实上，根本没人关注我们。这种对我们完全不感兴趣的态度让我当时精神压力很大。

当我进入这些人的圈子时，还没有党派或运动的问题。

我已经描述了我第一次接触时留下的印象那个小组织。

后来，我有了时间和机会，去研究这个所谓的派对的不可能形式。

这张照片确实令人沮丧和气馁。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派对，完全没有意义。

该委员会由全体党员组成。不知怎的，它似乎就是我们要反对的东西——小型议会。

投票制度被采用。当国会议员们哭到无法再至少在重要问题上，他们喊得声音很嘶哑，但在这里，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关于如何回复他们收到的信件，他们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

很高兴收到。

不用说，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在慕尼黑，没有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甚至没有名字的政党，除了我们自己的少数成员和他们的小圈子熟人之外。

每周三，都会在一家咖啡馆举行所谓的委员会会议，并进行辩论每周安排一个晚上。

一开始，所有“运动”成员也是委员会成员；因此两次会议总是由同样的人出席。

必须采取的第一步是扩大这个小圈子的狭窄范围，并获得新的成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让这一运动为人所知。

我们选择了以下方法。我们尝试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后来，每年两星期。

有些邀请函是打字的，有些是手写的。前几次会议我们在街上分发它们，并亲自送到某些房屋。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熟人中游说，并试图说服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我们的会议。结果令人遗憾。

我还记得我曾经亲自送出过 80 份这样的请柬，我们当时在晚上人群才会到来。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徒劳等待，“主席”终于不得不召开“会议”。

在场的只有七个人，还是以前熟悉的七个人。

然后我们改变了方法。我们在慕尼黑的一家公司打印了邀请函，并进行了多图签名。

文具店。结果，又有几个人参加了我们的下一次会议。

人数逐渐增加，从十一个人增加到十三人、十七人、二十三人，最后三十四。我们在自己的圈子里筹集了一些钱，每个可怜的人都捐了一点这样，我们就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能够在

《Münchener Beobachter》，当时是一份独立报纸。

这次我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我们选择了慕尼黑 Hofbräuhaus Keller（我们以慕尼黑 Hofbräuhaus-Festsaal 酒吧（不要与该酒吧混淆）作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这是一间很小的礼堂，只能容纳一百三十多人。

然而，在我看来，大厅似乎非常巨大，我们都在颤抖，生怕这座巨大的建筑会议当晚将有

部分空间空置。

七点钟，一百一十一人出席，会议开幕。

慕尼黑教授发表了校长演讲，我随后发言。

那是我第一次以公众演说家的身份出现。整个事情看起来非常大胆哈勒先生当时是党的主席。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但我有一种先验的信念，尽管我可能有很多优点，但我确实没有公开演讲的天赋。

甚至后来他还是没能改变他的观点。事情发生了变化。二十我这次的演讲时间被分配了几分钟，这可以看作是我们第一次公开会议。

我讲了三十分钟，而我内心深处一直有的感受，却无法表达出来经过检验，结果被证明是真的；我可以发表一次精彩的演讲。

三十分钟后，很明显，小厅里所有人都已经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他们所激起的热情首先表现在我向在场的人发出呼吁，为我们带来了三百马克的捐款。那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我们当时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以至于我们无法负担得起派对的费用印刷了节目单，甚至是传单。现在我们至少拥有了一笔资金的核心，我们可以从中能够满足最紧急和必要的开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首次大型会议的成功也很重要。我已经开始向委员会引入一些年轻、新鲜的成员。

我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认识了许多好同志现在我可以说服他加入我们的党了。

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纪律严明的年轻人，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坚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意志有办法。

在与新团队合作了几周后，我意识到需要这些新鲜血液哈勒先生当时是党的主席，他的职业是记者，因此，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作为党的领导人，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他无法向人群讲话。

虽然他工作认真，但缺乏必要的动力，可能因为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演讲天赋。

当时担任慕尼黑地方团体主席的德莱克斯勒先生是一个朴实的工人。他也作为演讲者来说并不重要。

此外，他不是军人。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也从未服过兵役，因此，生性软弱、缺乏自信，错过了唯一一所可以改变他性格的学校。

把软弱的天性培养成真正的男人。

因此，这两个人都不具备使他们能够热情坚定不移地相信运动最终会取得胜利，并顽固地必要时，还可以使用武力，残酷地扫除阻碍新理想实现的一切障碍。

这样的任务只能由那些在军事中接受过身体和精神训练的人来完成美德使人变得像灰狗一样敏捷，像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一样坚强钢。

那时我还是个士兵。身体和精神上，我已经服役六年了，所以一开始，这个圈子肯定把我看作一个陌生人。

和我的军中战友一样，我忘记了“那是不可能的”或“那是不可能的”，或者“我们不应该冒这样的风险，这太危险了。”整个行动本身就很危险。当时，在德国，公开邀请人们参加全国性敢于直接向群众发出号召的会议。参加这种会议的人通常会被打碎头颅驱散。这当然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品质能够这样做。最大的所谓资产阶级群众大会习惯于解散，与会者会像被狗吓到的兔子一样四处逃散，现场出现了十几名共产党员。

红军过去很少注意那些只顾空谈的资产阶级组织。

他们比成员们更清楚这种协会的内在琐碎之处因此觉得没必要害怕他们。

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更加决心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一劳永逸地消灭任何在他们看来危险的运动。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总是采用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恐怖主义和暴力。

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工作就是欺骗和误导公众，自然最令人讨厌的是一场宣称旨在赢得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专门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服务的群众犹太人和证券交易所政党。

光是“德国工党”这个名称就让他们恼火。很容易预见到，一开始我们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时机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独裁者的反对，他们仍然陶醉于1918年的胜利。

当时，我们运动的小圈子里的人对这种冲突的前景。

他们想尽可能避免公开露面，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可能会遭到袭击和殴打。

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看到我们的第一次公开会议被打断，担心运动可能会因此永远毁灭了。我很难捍卫自己的观点，即不应该回避冲突，但我们应该公开面对它，我们应该用那些唯一的武器武装自己防止暴力破解。

恐怖主义不能被思想武器所战胜，只有通过反恐才能战胜。

我们第一次公开会议的成果加强了我的立场。成员们感到鼓舞，安排举行第二次规模更大的会议。

1919年10月的某个时候，第二次大型会议在 Eberlbräukeller 举行。主题我们的演讲主题是“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凡尔赛”。一共有四位演讲者。

我讲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的成功甚至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更加引人注目。

参加人数已增至一百三十多人。试图扰乱会议进程立即被我的同志们挫败。那些想要捣乱的人被扔了从楼梯上下来，头上伤痕累累。两周后，又在同一大厅举行了另一次会议。

现在参加人数已增至一百七十多人，这意味着房间里坐满了人。我又讲了一次，再次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比上次会议更积极。

然后我提议找一个更大的大厅。我们四处看了一会儿之后，在城镇的另一端，也就是德意志帝国的达豪尔大街 (Dachauer Strasse) 发现了一家。

在这个新的集合地点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出席人数比上一次会议少。

大约有一百四十人出席。委员会成员开始那些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相信，出席率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举行会议的间隔太短。

在热烈的讨论中，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一个拥有七百人的城市千名居民不仅应该每两周能够参加一次会议，而且应该每两周能够参加十次会议每周。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一次挫折而气馁，我们选择的策略是正确的，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努力，我们迟早会取得成功继续前进。

1919-20年的整个冬天，我们一直在努力增强信心，继续推动运动走向成功，并加强这种信心，直到它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它可以移山。

我们在同一大厅的下一会面证实了我的论点是正确的。我们的听众增加到超过二百部，宣传效果和经济效益都非常出色。

我立即敦促举行进一步的会议。会议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召开了，在场的有二百七十多人。两周后，我们第七次邀请我们的粉丝和他们的朋友参加我们的会议。同一个大厅几乎容不下这么多人。他们总共有更多超过四百。

在这个阶段，年轻的运动发展了其内部形式。有时我们或多或少我们小圈子里的讨论非常热烈。

各方——当时和现在一样——都反对这个想法。

称这个年轻的运动为一个政党。

我一直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实践无能和狭隘的表现。

批评家的心态。

那些无法区分外在表现和内在力量，但试着通过动作来判断冠冕堂皇的名字，为此目的，他们洗劫了我们的词汇祖先，结果却不幸。



当时很难让人们理解，每一个运动都是一个政党，只要它没有实现它的想法，从而达到它的目的。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都是一个政党它选择呼叫自己。

任何人试图将一个原创的想法付诸实践，而这个想法的实现将有利于他的同胞必须首先寻找愿意为他的目标而战的门徒。

看法。

即使这些目标仅仅是为了摧毁现有的政党制度，从而制止瓦解的过程，那么所有那些作为这种进程的倡导者和使徒站出来的人理想只要没有达到最终目标，本身就是一场派对。

这些过时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他们的实践成功与他们的智慧成反比，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这个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政党，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如果有什么是非民族主义的，那就是这种对古日耳曼语表达方式的混淆，特别是，它既不适合现在，也没有勾勒出一幅明确的图景。

这种借用过去已逝词语的习惯，往往会误导人们认为其词汇的外在特征是一个运动的重要特征。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但现在却很普遍。当时，以及后来，我不得不反复警告追随者们提防这些从未取得过成就的流浪民族学者任何积极或实用的事情，除了培养他们自己过分的自负。

新运动必须警惕那些只听自己建议的人的涌入声明说他们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一直在为同样的理想而奋斗。

现在，如果有人为实现他所谓的理想而奋斗了四十年，如果这些所谓的努力不仅没有取得积极成果，甚至未能阻止对方，那么四十年徒劳无功的故事就足以证明这样的主角太无能了。

这种人特别危险，因为他们不想参加运动作为普通成员。他们谈论的是领导职位，鉴于他们过去的工作和以及他们未来打算从事的活动，是他们唯一适合担任的职位，但对一个青年运动如果落入这样的人之手，将面临危险。

一个掌管一家大公司四十年的商人，却把一家大公司彻底毁了管理不善，不是人们推荐的新公司创始人。

坚定不移，同样坚定不移的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玛土撒拉，四十年来，他一直在传教一个伟大的理想，直到它失去所有的意义和活力，成为一个年轻运动的合适的领导者。

此外，只有极小一部分人加入新运动的目的是无私地实现其目的并帮助传播其原则。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所以来，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运动的支持下，他们宣扬自己的旧观念，给新听众带来不幸。

无论如何，似乎没有人能够弄清楚这些想法到底是什么。

他们大肆宣扬遥远时代的古代日耳曼英雄、石斧、战斧长矛和盾牌，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却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可悲的懦夫。

因为他们正是挥舞着日耳曼锡剑的人，这些锡剑是用仔细地按照古代的样式，穿上带衬垫的熊皮，并装上牛角在他们的胡子脸上，宣称所有当代冲突都必须由只靠思想，一看到共产主义的棍棒就逃跑。后人将很少为这些英勇的角斗士书写一部新的史诗。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对他们的可怜表演深感鄙视。

表演。对于国家大众来说，他们只是嘲笑的对象；但犹太人却发现，他自己尊重这些民族喜剧演员，并把他们比作真正的战斗者建立德意志国家。

然而，这样的人却对自己极为骄傲。尽管他们完全无能，这是既定的事实，他们假装比其他人更了解一切；以至于，他们给所有真诚和诚实的爱国者带来了真正的麻烦，不仅过去的英雄事迹值得尊敬，但他们也感到有责任留下自己的榜样为下一代提供灵感而努力。

在这些人中，有些人的行为可以用他们天生的愚蠢来解释，无能；但也有一些人有明确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通常很难区分这两个类别。

我经常得到的印象，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宗教改革者，他们的信条是基于古老的日耳曼习俗他们是这些力量的传教士和保护者他们不希望看到德国发生民族复兴。

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倾向于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关注战斗的必要性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犹太人。

更甚的是，这种说教会诱导人们耗尽精力，而不是去争取共同的事业，但他们内部的宗教争论却是荒唐且具有破坏性的。

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使得这场运动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体现为权威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抵消这种致命因素的活动，而这正是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民族亚哈随鲁人强烈反对任何其成员是在一个领导和一个纪律下紧密团结。

我提到的那些人憎恨这样的运动，因为它能够阻止他们的恶作剧。

当我们为新运动中我们将 *völkisch*（民族主义）这个词排除在外。

“民族主义”这一术语背后的概念不能作为一场运动的基础，因为它太在应用上具有不确定性和普遍性。

因此，如果有人称自己为民族主义者，这不能被视为党员身份的标志。

由于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无法定义的，因此它引发了各种解释，因此人们可以更轻松地将其用作一种个人推荐。

每当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受到如此多的解释，被允许进入政治运动，它倾向于破坏纪律严明的团结。

战斗部队。

如果允许每个成员自己定义什么，那么这种团结就不可能维持他所相信的以及他愿意做的事。

看到如今那些带着民族符号插在纽扣孔里，同时意识到有多少人他们对于这个符号的意义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巴伐利亚州著名的教授，著名的只用武器战斗的战士并吹嘘自己围攻了柏林（当然是用心灵武器），认为“*völkisch*”这个词与“君主制”同义。

但这位博学的权威迄今未能解释我们过去的德国君主如何能够与我们今天通常理解的 *völkisch* 一词的含义一致。

如果让他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恐怕他会不知所措，因为这将非常确实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比大多数德国君主制国家更不具有民族色彩。

州。

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消失；或者如果他们是民族的，那么他们的衰落世界必须被视为民族世界观是错误的证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概念，但如此纷繁的观点是不能采纳的。

作为激进政治运动的基础。

我不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他们完全缺乏世俗智慧，尤其是无法理解民族的灵魂，这在二十世纪的民族施洗约翰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左翼政党的嘲讽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这些人的足够关注堆积在他们身上。他们任由他们喋喋不休，嘲笑他们。

我不太看重那些没有让自己被讨厌的人的友谊他们的敌人。

因此，我们认为与这样的人交朋友不仅毫无价值，甚至对我们很危险。

我们的年轻运动。

这就是我们最初称自己为党的主要原因。我们希望通过给予我们可能会吓跑一大群民族梦想

家，这也是我们将我们的党命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的原因。

第一个学期，党，把所有那些活在过去的梦想家和所有喜欢浮夸的人都赶走了。

命名法，以及那些到处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人。

党的全名把所有那些以精神之剑为武器的英雄和所有那些躲在所谓的“智慧”后面发牢骚的懦夫，好像这是一种盾牌。

可以预料的是，后者会在我们的运动已经开始了；但当然，这只是一场钢笔和墨水的攻击因为鹅毛笔是唯一的这些民族英雄所使用的武器。

我们曾宣布我们的原则之一，即“以暴制暴，以暴制暴”。

防御。”当然，这一原则扰乱了文坛骑士们的冷静。他们责备我们他们不仅痛恨我们粗暴地崇拜棍棒，而且因为，他们当中，我们这边没有任何智力力量。

这些骗子根本没有想到，德摩斯梯尼这样的人，竟然可以轻易地被逼得哑口无言。

五十个白痴聚集在一起，向他大喊大叫，用拳头打他。

支持者。

笔墨骗子的天生胆怯，使他不敢暴露于这样的危险，因为他总是在“平静而安静”中工作从来不敢大声喧哗或者公开露面。

直到今天，我仍必须以最强烈的言辞警告我们年轻运动的成员们警惕落入那些自称在“和平与安静”中工作之人的陷阱的危险，因为他们不仅是一群胆小怕事的人，而且永远都是无知的无所事事的人。一个男人意识到某些事情正在发生，知道某种危险正在威胁，同时看到可以采取某种补救措施来对付它，有义务不去“和平与安静”，而是公开地为消灭邪恶和接受邪恶而斗争。

他自己的补救措施。

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就是在玩忽职守，表明他性格软弱，而且他由于胆怯、懒惰或无能而未能采取行动。

大多数在“平静”中工作的人，通常都假装知道上帝知道的事情。

他们中有一个有能力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就，但他们却继续试图用他们的滑稽动作。

虽然他们很懒惰，但他们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平静、安静的工作让他们非常忙碌。

简而言之，他们是纯粹的骗子，政治投机者，他们为其他人正在做的诚实工作。

当你发现这些民族飞蛾之一谈论“和平与安静”的价值时，你可能会确保你正在和一个根本不做任何生产性工作，却从别人那里偷走他们诚实劳动的成果。

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这些愚昧无知的懒汉们总是试图诋毁别人的作品，以一种优势，从而落入我们人民的死敌手中。

即使是最简单的追随者，只要他有勇气站在啤酒馆的桌子上，敌人聚集，勇敢而公开地保卫自己的阵地，实现千比这些鬼鬼祟祟的伪君子多上几倍。

他会至少一两个人相信这个运动。

我们可以通过实际结果来检验他的工作和检验其有效性，但那些胆小鬼骗子们夸耀自己的工作是在“平静”中完成的，并在匿名，只是真正意义上的低价值无人机，对我们国家重建的目的。

1920年初，我提出了举行我们第一次群众大会的想法。关于这个建议我们中间也曾有过意见分歧。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认为，举行此类会议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其结果可能是有害的。

左翼媒体开始关注我们，我们很幸运能够逐渐激起他们的愤怒。我们开始出现在其他会议上，并提出问题或反驳演讲者，结果自然是，我们立刻被大声喝倒采，但我们仍然因此获得了某物。

人们开始知道我们的存在，他们越了解我们，他们的厌恶和敌意。

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来自红色阵营的一大批“朋友”将会参加我们的第一次群众大会。我完全意识到我们的会面很有可能被打断，但我们必须面对战斗，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几个月后。

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责任以盲目的精神捍卫这项运动，使它永垂不朽。

信念和坚定的决心。

我非常了解红色阵营所有人的心态，我很清楚如果我们全力反对他们，我们不仅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我们甚至可能为我们赢得新的追随者。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准备好提供这样的反抗。

哈勒先生当时是我们党的主席。他与我对于何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意见不一致。

这是我们第一次群众集会的时间。因此，作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辞去运动领导职务。

安东·德莱克斯勒先生接替了他的位置。我则亲自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并毫不妥协地执行了它。我们决定于 1920 年 2 月 24 日举行第一次人民大会。

这一运动的赞助是此前未知的。

我亲自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它们没花很长时间。整个我们组织的机制使得我们能够快速做出决策。

在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必须能够安排群众集会，让我们的对当前问题的态度已经明确。

这些会议的召开是通过海报和传单宣布的，其内容符合我在处理宣传问题时已经确定的原则。

一般的。

它们以吸引人群的形式制作。它们集中在几个点上并且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文本简洁而明确，使用了一种绝对教条的表达形式。我们我们坚持不懈地分发这些海报和传单，然后耐心等待效果他们将会生产。

我们选择红色作为主色调，因为它对眼睛有刺激的效果，而且经过计算引起对手的注意并且激怒他们。

因此，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他们都必须注意我们，并且不会忘记我们。

此后，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央党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巴伐利亚和其他地方）通过巴伐利亚人的艰苦努力清楚地揭示出来人民党在这里无所不能，可以抵消我们的标语牌所产生的影响对‘红色’群众。

如果警方找不到其他理由禁止我们展示标语牌，那么他们可能会声称我们扰乱了街道交通。因此所谓的德国民族人民党通过全面禁止那些标语牌来平息他们的“红色”盟友的焦虑，这些标语牌宣布这一消息将使数十万被误导的工人回归被国际煽动者煽动起来，在自己的人民怀抱中反对自己的国家。

这些标语牌见证了当时年轻的运动所经历的艰苦奋斗已订婚的。

子孙后代将会在这些标语中找到我们决心和正义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它们也将证明所谓的国家官员如何任意采取行动来扼杀一场令他们不悦的运动，因为它让广大群众人民具有民族意识并使他们回归自己的种族。

这些标语也将有助于驳斥当时有一个国家政府的理论。

巴伐利亚，并且它们将提供文件证明，如果巴伐利亚仍然是民族的——在 1919、1920、1921、1922 和 1923 年期间，这并不是由于民族而是因为民族精神逐渐深入人心，政府被迫顺应民意。

政府当局本身尽其所能阻碍这一进程恢复并使之变得不可能，但在这方面必须提到两位官员未解决的例外情况。

恩斯特·波纳当时是警察局长。弗里克博士是他的忠实顾问，也是他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是高

级官员中唯一有勇气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们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在那些担任要职的人中，恩斯特·波纳是唯一一个不向黑帮献媚的人，但他认为他的责任是对国家负责，并愿意冒险和牺牲一切，甚至牺牲个人生计，来帮助他所深爱的德国人民的复兴。

因此，他是贪婪的政府官员眼中的眼中钉。

国家利益或民族复兴的需要激励或指导了他们的行为。

他们只是顺从政府（作为雇主）的意愿，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他们所负责的国家福祉。

最重要的是，Pöhner 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与我们大多数人所谓的国家权威的捍卫者，不惧怕招致叛国者的敌意和国家，而是将其视为荣誉的标志。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仇恨，以及他们散布的关于是在国家苦难中唯一的快乐源泉。波纳是一个绝对的诚实、经典的简单和德国人的直率，对他们来说“更好“死不如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他存在的本质。

我认为，他和他的同事弗里克博士是当时唯一在巴伐利亚有权被视为积极参与创建国家巴伐利亚。

在举行我们的第一次大型群众大会之前，不仅需要进行我们的宣传材料准备好，而且也要打印出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本书的第二卷中，我将详细介绍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制定计划。

我在这里只想说，这个节目的安排不仅仅是为了阐明年轻的运动，同时也希望让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它。

那些所谓的知识界人士对此进行了嘲笑和批判，但我们的纲领的效果证明我们当时所持有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那些年里，我看到几十个新运动兴起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一个运动幸存下来，那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

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尽管他们可能与我们作战，并试图瘫痪我们的运动，尽管吹毛求疵的党内部长可能会禁止我们言论自由，但他们无法阻止我们理想的胜利。

当现行的国家行政体制，甚至政党的名称代表它将被遗忘，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基础将提供未来国家建立的基础。

我们在 1920 年 1 月之前举行的会议使我们能够筹集资金，有必要印刷我们的第一批小册子、海报和节目。

我将以我们的第一次大型群众集会来结束本书的第一部分，因为那次会议标志着党摆脱了小团体的束缚，首次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明确的影响，这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可能坐不满大厅，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空荡荡的长椅。我自己也坚信，只要人们今天来，这对于年轻的运动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此它带着一种紧张的感觉我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夜晚的到来。

会议宣布将于晚上 7 点 30 分开始。

开放时间当我走进慕尼黑广场的皇家啤酒屋的节日大厅时，我的心几乎欢呼雀跃。

大厅——当时我觉得它很大——挤满了人。

有数千人出席，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我们一直希望来的到达。

超过一半的观众看上去是共产党员或独立人士。

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第一次伟大示威注定会突然结束。

但他们错了。第一个发言者讲完后，我站起来发言。几分钟后，我遭到了猛烈的干扰，大厅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我的一些忠实战友和其他一些追随者与扰乱者搏斗，渐渐地，一切恢复了秩序。我又可以继

续讲话了。

半小时后，掌声开始淹没了干扰和嘘声。然后我转向关于我们的计划的问题，我第一次对此进行了阐述。

随后，干扰逐渐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掌声。

当我终于向群众逐条阐述这二十五点主张时聚集在那里，并要求他们对每一点做出自己的判断，一个接一个接受度日益提高。

当我到达最后一个点时，我看到满满一厅的人团结在一起，他们有一个新的信念，一个新的信念和新的决心。

大约四个小时过去了，大厅里的人开始散去。随着人群涌向出口处，人们摩肩接踵，推来推去，我知道一场运动已经开始正在德国人民中间进行着的、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事件。

火焰已经点燃，炽热的火力铸就了宝剑，它将恢复还德国齐格菲自由，让德意志民族重新焕发活力。

除了我当时预见到的复活之外，我还感觉到复仇女神现在正在准备纠正 1918 年 11 月 9 日的错误。

大厅空无一人。运动正在前进。

## 第二卷 国家社会主义

### 第一章：世界观与政党

1920年2月24日，新运动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群众大会。

在慕尼黑的 Hofbräuhaus-Festsaal 酒吧，25 篇论文构成了我们新党的纲领向近两千名听众阐述，每论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样，我们就向公众公布了最初的原则和行动路线，必须进行新的斗争，以消灭大量混乱的陈旧思想和这些观点有着模糊且往往有害的倾向。

在胆小怕事的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注定要阻碍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前进，并使命运的战车停下来就在它看起来即将达到目标的时候。

显然，这一新运动能够获得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如此巨大的斗争中，只有从一开始就取得成功，才能具备必要的先决条件唤醒信徒心中的神圣信念。

这并不是在政治领域引入一个新的竞选口号，而是一个全新的必须建立具有根本意义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试着回忆一下所谓的政党纲领通常是经过炮制和润色的，或者不时进行改造。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这些程序性的怪物，我们必须仔细调查激励普通资产阶级“纲领委员会”的动机。

当他们引入新事物时，他们总是受到同一种关注点的影响进入他们的程序或修改其中已经包含的内容，即下一个结果选举。

当这些议会制政府的艺术家们第一次怀疑到他们热爱的公众可能已经准备好摆脱旧政党的束缚他们开始将车轴漆成新的颜色。

在这种场合，聚会上的占星师和星座读者，即所谓的“精明和经验丰富的人，走上前来。他们大多是议会老手，政治教育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还记得以前群众失去耐心的迹象，现在他们感觉到类似情况的即将来临。

他们按照老办法，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在自己所爱的人中间走访公众，倾听人们所说的话。他们仔细消化报纸文章，并逐渐开始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什么、厌恶什么、盼望什么。

仔细研究工人社区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类员工，并分析他们的权衡并考虑秘密愿望。

甚至危险反对派的恶意口号现在也突然被视为值得考虑到，令最初创造和传播这些词汇的人惊讶的是，在老一辈政党的官方词汇中，这是天真而理所当然的。

因此，委员会开会修改旧计划并制定新计划，因为这些人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信念就像战争期间士兵更换破旧的衬衫一样。

在新方案中，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农民可以放心，他们的利益农业将得到保障，工业家的产品将得到保护，消费者可以放心，他的利益将在市场价格方面受到保护。

教师的工资提高，公务员的养老金提高。孤儿寡母将获得国家的慷慨援助。

贸易将得到促进。关税将降低，甚至税收也将降低，尽管这些不能完全取消。

废除，即将被废除。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公众被遗忘，或者政府提出的某个要求民众的声音还没有传到党的耳朵里。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推进的内容被匆忙添加，直到最后被感觉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包括他们的妻子在内的全体非利士人，他们的焦虑就会得到缓解，并会再次感到满意。因此，内心里充满了对上帝善良的信仰，以及对人类不可理喻的愚蠢的信仰。

选民们，所谓的‘重建帝国’的斗争现在可以开始了。

当选举日结束，议员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公开会议后，未来五年，他们可以不再承担让民众遵守规定的工作，而是致力于更高尚、更令人愉快的任务，然后项目委员会就会解散。

争取公共事务的进步重组的斗争再次成为谋生计，对于议员来说，仅仅意味着领取薪水。

每天早上，尊敬的议员都会前往众议院，尽管他可能不会进入会议厅本身，他至少可以到达大厅，那里有会员登记册出席会议。

他为选民提供的艰苦服务包括登记他的名字，并收到返还一小笔赔偿金，作为他不懈辛勤劳动应得的奖励。

四年过去后，或者如果出现任何危机，议会似乎面临危险解散后，这些先生们突然燃起了采取行动的愿望。

就像蛴螬无法避免长成金龟子一样，这些议会蠕虫离开了伟大的木偶剧院，以新的翅膀在深受喜爱的观众面前翩翩起舞。

他们再次向选民发表讲话，讲述他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强调对手的恶意固执。

他们并不总是能得到感激的掌声，因为有时愚蠢的群众会粗鲁地并当着他们的面发表不友好的言论。

当公众忘恩负义的精神达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挽救情况。党的威望必须再次得到提升。纲领必须修订后，委员会再次成立，骗局又重新开始。

一旦我们理解了公众的愚蠢程度，我们就不会对这种策略感到惊讶证明是成功的。在媒体的引导下，又一次被新的诱人外表所蒙蔽。

纲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选民群体都会忠实地回到党的怀抱，重新选举他们的老骗子。

这位“人民公仆”和工党候选人现在又变回了议员的形象他们在公共生活之树上长出叶子变得肥胖圆润，又过了四年才重新化作闪闪发光的蝴蝶。

几乎没有什么比在清醒的现实中观看这一过程更令人沮丧，而且被迫观察这种屡屡发生的欺诈行为。

在这样的精神训练场上，资产阶级力量是不可能培养必须有力量来与马克思主义的有组织力量进行斗争。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么做。

尽管白种人议会“医学”存在局限性或智力低下，他们无法认真想象，他们可以利用西方民主作为武器来对抗反对一种意识形态，其支持者认为民主及其所有分支仅仅是瘫痪对手让自己可以自由地实施自己的方法行动。目前，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团体正在用尽他们的聪明才智来创造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与民主原则密不可分。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危机来临时，这些先生们都会打个响指按多数票决定的原则，正如西方民主所理解的原则。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议员们认为，赖希的胜利是由绝大多数人的极度短视所保证的，而马克思主义者，背后有一群游手好闲者、逃兵、政治追求者和犹太信徒。



文人墨客，干脆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对民主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只有那些轻信的人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巫师们可能认为，残酷的那些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害虫为己任的人的决心，他们是其中的携带者，现在或将来可能会被神奇的公式所控制西方议会制。

马克思主义将与民主并肩前进，直到间接地确保其犯罪目的，甚至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国家知识分子的支持去消灭。

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天开始相信，这个巫婆的在我们的议会民主制度中，可能会形成一个多数派，如果仅仅出于理性凭借其数量优势，有能力制定立法，从而对马克思主义，那么整个议会骗局就会终结。

红色国际的领导人不去呼吁民主良知，而是立即向无产阶级群众发出愤怒的战斗口号，随后的战斗将这次运动不是在议会的沉稳氛围中进行，而是在工厂和街道上进行。

那么民主就会立即被消灭，代表人民在议会中的使徒们的智力能力未能完成，现在将成功地通过撬棍和大锤的就像 1918 年秋天一样，无产阶级群众也感到愤怒。

他们一下子就让资产阶级世界看到，认为犹太人西方民主可以有效地阻止征服世界的冲动。正如我所说，只有非常轻信的人才会想到要约束自己遵守当他必须面对一个玩家时，这些规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借口，或者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当它们不再对他有用时，他就会抛弃它们。

目的。所有自称奉行所谓资产阶级原则的政党都把政治生活视为现实是争夺议会席位。一旦他们的原则和信念不再重要，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进一步利用这些沙子，把它们扔到海里就像沙子压舱物一样，程序的构建方式使得它们能够以类似的方式处理。

但这样的做法，也会相应地削弱当事方的实力。

他们缺乏吸引广大群众的巨大磁力，因为群众总是对所提出思想的绝对信仰所产生的强大力量作出回应，并怀着不屈不挠的热情去为之奋斗和捍卫它们。

当一方拥有其所有武器时无论世界观有多么邪恶，它都攻击既定的秩序，攻击其他只有当抵抗以新的信仰的形式出现时，一方才能够抵抗。在我们的情况下，这是用软弱懦弱的防御口号取代了勇敢而无情的攻击。

我们目前的运动受到了指责，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内阁部长们的指责（例如巴伐利亚中央党的代表）走向革命。

我们对那些政治侏儒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纠正这一而你，由于你的犯罪愚蠢，未能实现这一点。通过你的议会舞弊行为你们帮助把国家拖入毁灭，但我们通过我们的侵略政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我们将以不屈不挠的奉献精神捍卫世界观。因此，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才能再次登上自由的殿堂。”因此，在运动成立的最初阶段，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我们的战斗人员为建立新的崇高的政治信仰而奋斗的团体不应该堕落成为一个促进议员利益的社会。

第一个预防措施是制定一个计划，该计划本身将倾向于培养某种道德上的伟大，这将吓跑所有那些心胸狭窄、软弱无能的人。

构成了我们当前政党政治家的主体。

最终导致德国垮台的那些致命缺陷最清楚地证明了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制定明确的纲领性目标，定义明确。

因为我们认识到了上述缺陷，所以我们意识到，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必须建立起来，它本身就成为我们新的生活观念的一部分。

在本书的第一卷中，我已经处理过“民族主义”这个术语，当时我说这个术语没有足够精确的含义来提供一个紧密合并的核心可以形成一个战斗社区。各种各样的人，带着各种不同的意见，目前，他们正在以民族主义（völkisch）为座右铭进行着自己的游戏。

在我讨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的宗旨和目标之前，我“völkisch”这个概念的含义，并在此解释它与我们党的运动的关系。

“民族”一词并没有表达任何明确指定的想法。它可以有多种解释在实际应用中，它就像‘宗教’这个词一样具有普遍性。

很难给后一个词赋予任何精确的含义，无论是作为理论概念还是作为实际生活中的指导原则。

“宗教”一词只有与一个独特的、将概念付诸实践的明确形式。

说一个人“虔诚地信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措辞，但一般来说，告诉我们的很少或根本没有。

可能有少数人对这种模糊的描述，甚至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词传达了或多或少明确的画面这样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但由于大多数人不是哲学家或圣人，这种模糊的宗教观念将意味着对于个人来说，他仅仅意味着他有理由按照自己的倾向去思考和行动。

它不会导致实际的信仰，因为只有当它离开了一般形而上学思想的范围并被塑造为明确的信仰。

这种信念本身当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手段，根本就不可能到达终点。

然而，这个目的不仅仅是理想，因为从本质上讲，它非常实用。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一般来说，最高理想总是某种深刻的生存需要，正如美的高贵本质在于其实用价值。

信仰帮助人类超越了动物的生存水平，真正做出了贡献巩固和保障他的生存。

剥夺当今人类普遍持有的、已经通过教育得到巩固，成为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废除宗教教义，而不以任何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和信仰的基础来代替它。

人类生存将受到严重动摇。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服务于更高的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在其反过来，为他作为人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圆完全的。

当然，“宗教”一词暗含着某些基本理想和信仰。其中我们可以把这些视为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它在未来永恒的存在，相信更高级生命的存在，等等。

但所有这些想法，无论个人多么坚信，都可以进行批判性分析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或拒绝，直到情感概念或渴望被转变为一支受明确教义信仰支配的积极力量。

这种信仰构成了激进的特征，为承认基本宗教理想。如果没有明确界定的信仰，宗教情感不仅对人类生存的目的，但甚至可能导致普遍的混乱，因为其倾向模糊而又多样。

我所说的“宗教”一词也适用于民族主义。这个词也蕴含了一些基本思想。

虽然这些思想确实非常重要，但它们的形式却如此模糊和不确定，以至于它们不能被认为比单纯的意见更有价值，直到它们成为构成政党结构中的要素。

世界观中提出的理想和由此产生的要求不能通过仅靠情感和内心的渴望并不能赢得自由，正如自由不能通过普遍的向往而获得一样。

只有当对独立的理想主义渴望被组织起来，才能为自己的唯有以军事力量来实现理想，人民的迫切愿望才能变成现实。

任何世界观，尽管千百倍正确，对人类极为有益，但只要它的原则还没有成为现实，它就不会对塑造一个民族的生活有任何实际帮助一个激进运动的集结点，而这个运动在它结束之前，仍将只是一个政党。

活动导致了其理想的胜利，其党的学说形成了新的根本新民族共同体的原则。

如果要用一般性的抽象概念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那么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清楚地了解这一问题的性质、特征和范围概念，因为只有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运动，能够汲取必

要的战斗来自于其原则和信念的极其同质性。

政治纲领必须建立在普遍思想和普遍世界观的基础上必须获得明确的政治信仰的印记。

因为这种信仰必须指向在实践世界中必须实现的目标，现实，它不仅服务于普遍理想本身，而且还要考虑到为实现理想，必须采用现有的手段。在这里，实践智慧政治家必须帮助实现理想，即抽象的、正确的理想，即由政治纲领的作者。

这样，一个永恒的理想，作为人类的指路明灯，具有永恒的意义，就必须适应人类弱点的需要，以便其实际效果不会在一开始就受到挫败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缺点。

真理的阐释者必须与那些具有实践知识的人携手并进。

人民的心灵，以便从永恒的真理和理想的领域中，人性的能力可以被选择并被赋予实际形式。

采取抽象和一般的概念，这些概念源自基于坚实的世界观真理的基础，并从中塑造一个战斗社区，其成员具有相同的政治信仰（一个定义明确、组织严密、思想一致、意志一致的共同体）是最重要的任务，成功实现这一想法的可能性取决于此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在数百万人中，有些人或多或少清楚地感受到这些思想的真理，甚至可能对这些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就必须有一个人出现。

这个人一定具有从大众的模糊观念中提出新观点的天赋，这些原则将如花岗岩般明确和坚定，他必须能够为这些原则而奋斗为唯一真理，直到共同信仰和共同意志的坚固磐石浮现在思想漂泊的浑水。

这种行动的一般理由在于其必要性以及个人意志的行动因他的成功而得到证明。

如果我们尝试去探究 *völkisch*（民族主义）这个词的内涵，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结论。

当今世界的政治观念是，国家虽然拥有创造力，它可以建立文明，与种族作为基础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

## 第二章 国家

国家被认为是经济需要的产物，或者充其量是这是政治权力欲望的自然结果。

这种观念及其所有逻辑后果不仅忽视了原始种族但它也导致了个人重要性的降低。

如果否认种族在文化创造能力上存在差异，那么同样的错误的观念必然会影响我们对个人价值的评价。

所有种族都相似的假设导致了国家和个人平等的假设因此，国际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对在他那个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普遍的生活观念，即作为政治职业的明确职业信仰。

如果它不是已经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传染病而存在，那么马克思主义教学根本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卡尔·马克思与受到同样影响的数百万人的区别在于在一个已经逐渐腐烂的世界里他运用了预言天才能够探测到基本的毒药，以便提取和浓缩它们，炼金术士的技艺，在溶液中迅速摧毁独立的地球上的万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种族而做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普遍的今日的世界观。

仅凭这个理由，认为我们所谓的资产阶级世界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任何有效的斗争，因为这个资产阶级世界充斥着所有这些毒药，它的世界观总体上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之处仅在于在程度上，以及持有者的性格上。

资产阶级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相信有一小撮人存在的可能性，那就是比如说，资产阶级能够统治世界，而马克思主义本身系统地致力于把世界交到犹太人的手中。

与此相反，民族世界观认为，原始的种族元素是对人类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原则上，国家仅被视为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种族特征。

民族主义原则并不承认一个种族与另一个种族平等，而是承认他们是不同的，将人类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

基于这种认识，它感到自己受到约束，符合主宰宇宙，假定更好和更强的事物将获得胜利而劣等和因此，它认同自然的基本贵族原则，并相信这一法则甚至对最后一个生物个体也适用。

它从大众中挑选出个别价值观，从而发挥组织原则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起着瓦解的溶剂的作用。

民族主义信仰认为，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理想，因为理想是必要条件人类生存本身。

但另一方面，它否认一种道德理想有权占上风，如果它危及存在一个捍卫更高道德理想的种族，因为在一个由杂种和黑人都代表着人类美德和高贵的理想，以及对理想化未来的所有希望人类将永远迷失。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文化和文明与雅利安人。如果他被消灭或灭绝，那么新的野蛮的黑暗笼罩时代将笼罩地球。

通过消灭人类文化的守护者来破坏人类文化的存在，将是一种可恶的行为在那些信奉民族世界观的人眼中，这被视为犯罪。

任何人胆敢举手反对上帝最高的形象，就是对慷慨的造物主犯罪这一奇迹并导致了被逐出天堂。

因此，民族世界观与自然最神圣的意志是深刻一致的，因为它恢复了力量的自由发挥，通过相互教育，将产生更高级的类型，直到最后，人类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将拥有地球，并能自由地在各个领域工作这些不仅位于地球之内，而且位于地球之外。

我们都觉得，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只有通过人类的优等民族，统治着所有其他民族，并且拥有全世界的手段和资源。

显然，对民族世界观一词所隐含的这种普遍定义很容易就有上千种不同的解释。

事实上，我们新成立的政党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某种程度上可以诉诸这个概念；但它独立存在的事实，尽管许多其他的，足以证明它的无限多样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观念在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央组织指导下，反对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在坚实的阵线面前，在意识形态上并不令人印象深刻敌人赠送的。

用如此弱的武器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只有当国际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受到有组织的指导，但同样受到民族世界观的挑战。

组织良好、指挥得当的一方将与另一方平等地作战，胜利属于永恒真理一方。

世界观的组织 and 动员只能建立在其明确的定义。

教条在宗教信仰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政党在原则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政党中得到实现。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像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一样的工具，为国际主义，可以用来为这个理想而战。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党追击。

在政党运动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明确表述是先决条件因为民族世界观的胜利被一个公认的事实所惊人地证明，即使是那些反对民族主义思想与政党思想相结合的人，原则。

正是那些不知疲倦地一再坚持认为民族世界观能够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个人的专有财产，因为它处于潜伏状态或“生活”在无数只是通过自己的陈述来证实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种想法在千百万人的心不足以阻止反对思想的胜利，无可否认，这些都是按照公认的政党政治路线所倡导的。

如果不是这样，德国人民早就应该取得压倒性胜利，而不是发现自己正处于深渊的边缘。

这一国际意识形态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得到了一个激进组织的支持派对。

对立意识形态迄今失败的原因是它缺乏统一战线来为它的事业而奋斗。

它不是通过允许自由解释其一般原则的权利，而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因此，世界观能够维持一种集中的政治组织形式奋斗和胜利。

因此，我认为我的特殊职责是从大量但未经表述的材料中提取普遍的世界观，其中包含基本思想，并赋予它们或多或少教条的形式。

由于其含义明确，这些思想非常适合于团结一致的目的。

那些愿意接受这些原则的人，应当结成共同阵线。

换言之，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从人民世界观的一般概念。

基于这些原则，它建立了一种考虑到时代、特征、可用的人力资源及其所有缺陷。

通过这一政治理论，有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带入一个系统的组织是这一理想的最终胜利所必需的主要准备工作。

章：国家早在 1920-1921 年，某些属于衰落资产阶级的圈子就指责我们的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对现代国家采取消极态度。

因此，各个政党的随军人员，代表着各种政治观点的混合体，并假定有权利用所有可用手段来镇压这个年轻运动的主角，该运动宣扬一种新的政治福音。

我们的对手故意忽视资产阶级本身不代表统一的事实关于国家真正意味着什么的意见，资产阶级没有也不能给出任何此机构的统一定义。

那些有责任解释我们谈论国家时的含义的人在国家担任主席大学，通常是宪法系，并认为他们的最高职责是找到对这一特定国家形式幸存的解释和理由为他们提供每日的食粮。

这种国家形式越荒谬，其含义就越模糊、虚假和难以理解。

为解释其存在的目的而提出的定义。

例如，皇家和帝国大学的教授可以写什么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宪法代表了历史上最残暴的二十世纪？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当代教授宪法的义务不在于服务于真理事业，而在于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我们人类所拥有的那个可怕的机制的存在。

现在打电话给国家。

当问题国家正在讨论中，如果教授们采取将自己隐藏在被描述为“伦理的”和“道德的”抽象价值观、责任和目的。一般来说总的来说，这些不同的理论家可以分为三类：1. 那些认为国家是在政府权威之下，人们或多或少自愿结成的联合体。

这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的人崇拜我们现在的权威合法化原则。

在他们眼中，人民的意志在整个事件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对他们来说，国家存在就有充分理由认为国家神圣不可侵犯。

为了支持人类大脑的这种异常，人们必须拥有一种犬科动物对所谓国家权威的崇拜。

在这些人的头脑中，手段很快就能轻易取代目的。国家不女权不再是为了服务于男性而存在，而男性则是为了敬畏权威而存在国家权力，赋予国家公职人员，甚至最低级的官员。

为了防止这种平静而狂喜的崇拜变成可能成为任何令人不安的事情，国家的权力仅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

因此，它不再是手段或目的。国家必须确保秩序得到维护反过来，法律和秩序也必须使得国家的存在成为可能。

所有生命都必须在这两极之间移动。在巴伐利亚，狡猾的政客们坚持这种观点巴伐利亚中心党，全称是“巴伐利亚人民党”。

在奥地利，黑黄派正统派也持类似态度。

不幸的是，在德国，所谓的保守分子也常常持有同样的观点。

2. 第二组在数量上稍微少一些。

其中包括那些认为国家的存在取决于某些条件的人。他们坚持不仅应该有统一的政府体制，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有统一的语言，即使只是出于管理的技术原因。

国家权威不再是国家存在的唯一、专属目的，而是也必须促进其臣民的福祉。

“自由”的观念，大多是基于对这个词含义的误解，进入这一群体心中存在的国家概念。

政府形式不再仅仅因为存在就被视为不可侵犯。它必须服从实际效率的检验。

鉴于现代的迫切需要，其悠久的历史已不再能保护它免受批评。此外，在他们认为，国家首要的责任是保障个人的经济福祉公民。

因此，它是从实践的角度和基于以下想法的一般原则来判断的：的经济回报。

这种国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普通民众资产阶级，特别是我们的自由民主派。

3. 第三组在数量上是最小的。他们认为国家是实现目标（概念上通常比较模糊）由一个团结的民族通过权力政策决定说同一种语言。

他们想要一种共同的语言，不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国家因此而得到为其权力在境外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因为他们认为—— 尽管这样做会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 这种

通用语言将促进完成一定的国有化进程。

在上个世纪，那些亲眼目睹过这些事情的人会感到悲哀，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些我刚才提到了“德国化”这个词被轻率地玩弄，尽管通常是出于好意。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词曾经引起过这样的想法错误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甚至在泛德圈子里，人们也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奥地利德国人很可能成功地将奥地利斯拉夫人德国化，只要政府已准备好合作。

这些人不明白，德国化政策只能在领土，而非人类。

这一术语通常被理解为强制采用德语，但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够成为德国人只需要学习德语，愿意在余生中一直说德语他们的生活，甚至投票支持某些德国政党。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永远无法清楚地看到，这种德国化过程实际上去德国化，因为即使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所有突出的、可见的差异可以通过使用共同语言来弥补并最终消除，这将导致走向一个混杂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化，而是毁灭德国元素。在历史进程中，一个征服民族凭借武力取得胜利的情况屡见不鲜。

强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说他们的语言，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一千年来他们的语言被另一个民族使用，因此征服者最终成为被征服者。

构成一个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种族的，不是语言，而是血缘。因此只有当德国化过程能够改变人民的血统时，谈论德国化才有道理。

遭受到这样的对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有通过血液混合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但在这种情况下，优质种族将会被贬低。这种混合的最终结果是，正是这些品质摧毁了使征服民族能够战胜劣等民族的根源。

尤其是文化创造能力，当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混合时，就会消失。

劣等的，尽管由此产生的杂种种族都说曾经更加优秀。

在某个时候，不同的心态之间会发生冲突，一个国家处于不断退化状态的中国将在最后一刻重振其文化创造力并再次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文化杰作。

然而，只有属于优等种族的个体或杂交种才能产生这些第一次穿越，其中优越的血统一直占主导地位，并试图证明自己，但从来没有由这些杂交品种的最后后代培育而成。

这些总是处于文化倒退的状态。我们必须认为这是幸运的，因为按照约瑟夫二世的计划，奥地利的德国化并没有成功。

可能的结果就是奥地利国家将会生存下来，但同时当时使用共同语言可能会降低德国人的种族品质。

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某种群体本能可能已经形成，但群体本身却质量下降。有可能建立一个宪政国家，但一个具有文化创造力的民族将会被世界遗忘。

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这种混合过程最好不要发生，尽管并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的理由而被放弃的，而只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德国人民现在几乎就不会被视为一种文化因素了。

然而，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德国，这些所谓的民族圈子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受到类似错误观念的影响。

对波兰实行的非常有利的政策，使得波兰东部地区被德国化。

不幸的是，各省的政策制定几乎总是基于同样错误的推理。

人们再次相信，波兰人民可以通过被迫使用德语。结果将是致命的，因为对于外星人来说，通过表达他们的德语中的外来思想会贬低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高贵自己的自卑感。

想想看，由于进入美国的犹太人的德语方言使他们被归类为德国人，因为美国人对德国的事情一无所知。在这里没有人会梦想接受这些来自东方的蹩脚移民一般都说德语的事实作为

证据在德国化的过程中，哪些东西被有益地德国化了？历史是我们的祖先用剑征服的土地也是德国耕耘者的殖民地土壤。

因为他们在进行殖民统治时把外国血液带入了我们的民族体内，它们促成了我们种族特征的可悲瓦解，这一过程导致了我们的超个人主义，尽管不幸的是，后者的特点是，至今仍经常受到赞扬。

第三组中也有人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家本身视为目的。

因此，他们认为保护它是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所有这些观点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并非建立在承认创造文化价值的能力这一深刻真理的基础上本质上是基于种族因素。

根据这一事实，国家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和改善种族，人类文明一切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犹太人卡尔·马克思能够利用和利用这些关于自然的错误概念和思想和国家宗旨。

通过从国家概念中消除国家对在没有找到任何其他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公式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学说为拒绝国家本身的理论铺平了道路。

因此，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斗争注定要失败。

资产阶级已经牺牲了唯一能够为他们的想法提供坚实的基础。

狡猾的对手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结构的缺陷，并开始进攻他们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武器放到了他的手中。

因此，任何基于民族主义的新运动世界观首先必须对世界观的性质和国家的宗旨。

根本原则是，国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国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形式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原因这样的发展，只有具有文化创造力的民族才能做到。

地球上可能有数百个优秀的国家，但是如果雅利安人是创造者和文明的守护者，应该消失所有符合精神需求的文化当今的优越国家也将消失。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国家人类创造的并不排除人类可能成为灭绝，如果优越的智力和适应能力丧失，因为种族拥有这些能力和力量的人已经消失了。

例如，如果今天地球表面发生地震，并且新的喜马拉雅山从海浪中浮现出来，单单这一场灾难就可能毁灭人类文明。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继续存在。一切秩序都会被打破，文化产品的一切痕迹都会消失。

经过数千年演变而来的一切将会消失。

什么也不会留下，只剩下一片巨大的死亡和毁灭的战场，淹没在洪水中水和泥浆。然而，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幸存下来，如果这些人属于一个特定的种族，拥有建立文明的天生力量，当骚乱过去之后，地球将再次见证人类精神的创造力，尽管这段时间可能会持续一千年。

只有消灭最后一个拥有文化创造力天赋的种族，事实上只有当该种族的所有个体也消失时地球才会真正变成沙漠。

另一方面，现代历史提供了例子，表明种族起源的国家如果这个种族的代表缺乏创造天赋就不能保护他们免遭灾难，毁灭。

正如许多史前动物不得不让位给其他动物并且不留痕迹一样同样，如果一个人失去了那种使他能够去寻找能够保全他自己生存的必需武器。

国家本身并不能带来文化进步的某种特定进步。国家只能保护带来这种进步的种族。

国家本身可能存在数百年而不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文化能力以及由这些能力所塑造的人们的一般生活，可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国家没有阻止种族混合正在发生。

例如，现在的国家也许会以机械的形式继续存在，但种族通婚渗透到国家机构中，带来了一种文化颓废，这种颓废已经表现出各种有害症状。

因此，人类优等类型存在的必要前提不是国家，而是只有种族才能够产生更高级的类型。



这种能力始终存在，尽管它会处于休眠状态，除非外部环境将其唤醒行动。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种族，具有文化创造力，拥有当外部环境对当时不利时，这种能力就会以潜在的形式出现因此，它们不允许能力有效地表达自己。

因此，说前基督教时代的德国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是极其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但他们所居住的北部地区气候十分恶劣，生活条件阻碍了他们创造能力的自由发展。

如果他们来到气候更宜人的南方，没有任何先前的文化，如果他们已经获得了必要的人类材料——也就是说，劣等种族的人——来为他们服务工具在完成必要的劳动时，它们所蕴藏的文化能力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就像希腊人那样辉煌地出现。

但是，文化事物中的这种原始创造力并不仅仅归功于他们的北方气候。

拉普兰人和爱斯基摩人不会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如果他们移栽到南方。

这种奇妙的创造能力是雅利安人所拥有的一种特殊天赋，无论它是否处于或变得活跃，根据不利的条件和环境阻止主动表达这种能力或有利情况允许它。

从这些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家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它的目的和目的是维护和促进一个身体健全的人类社会以及精神上的亲缘关系。

最重要的是，它必须维护种族的存在，从而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为了这个种族中所有潜在力量的自由发展。

这些能力的很大一部分总是必须首先被运用来维护种族的物质存在，只有剩下的部分才能自由地在智力进步。

但事实上，一个总是另一个的基本前提。

那些不履行这一使命的国家没有存在的理由。它们怪物。

他们确实存在的事实并不比一支队伍成功袭击更合理海盗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海盗行为的正当化。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为新的世界观而奋斗，决不能站在著名的“事实基础”，如果这些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新伟大思想的倡导者，将成为谬论的奴隶，当今占主导地位。

我们必须明确区分容器和其内容物。

国家只不过是容器，而种族才是它所包含的内容。

容器只有在保存和保护其内容物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否则毫无价值。

因此，民族国家的最高目的是守护和保护这些种族元素他们通过文化领域的工作，创造了这种美和尊严，属于更高级的人类。

作为雅利安人，我们只能把国家看作是一个民族的活体，一个不仅仅是维护一个民族的存在，而且其功能是引导这个民族凭借其知识和文化的进步发展，达到最高自由的地位院系。他们今天想要强加给我们这个国家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怪物，人类深刻教唆的产物，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知道，我们坚持这些观点，就是在当今世界，我们被打上革命者的烙印。

尽管如此，我们的观点和行为不会由赞同或反对来决定。

我们同时代的人，而只是按照我们所承认的真理的责任去行事。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这样做，后人将有更清晰的认识，不仅理解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同时也会认可它是正确的工作，并赞扬它因此。

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以我们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一个国家。

从个别国家的特定角度来看，价值是相对的，但它将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是绝对的。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优秀程度永远不能以其文化或外界对其权力的重视程度，

而是其优秀程度必须根据其宪法为相应种族服务的程度来判断。

如果一个国家不仅充分满足了人民的切身需要，而且它所代表的种族，但如果它的存在本身就确保了同一种族的保存，那么不管这部宪法在文化框架内具有什么样的普遍文化意义世界。

因为国家的任务不是创造人的能力，而只是确保人的能力自由发挥。

运用已经存在的能力。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尽管文化水平很高，但它注定要毁灭那个文化的代表，通过打破他们的种族复合性。因为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破坏那些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文化的存在并非国家所创造，而是人类固有的创造力，其存在因团结在生命有机体中而得到保证国家。

我要再次强调，国家本身不是实质，而是形式。

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并不是我们判断其价值的标准。

该人居住的州。

显然，一个在文化领域拥有高度创造力的民族更有价值比黑人部落更强大，但前者的宪法组织，如果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可能比黑人更糟糕。

即使是最好的国家和国家机构也无法培养出他们所缺乏的人才他们从未拥有过这种能力，但一个糟糕的国家可能会逐渐摧毁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曾经存在。

它可以通过允许或支持镇压那些种族歧视的拥护者来做到这一点文化。

因此，一个国家的价值只能通过问它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成功地实现促进特定种族的福祉，而不是通过其在整个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它的相对价值可以很容易和准确地估计，但很难判断它的绝对价值价值，因为后者不仅受国家制约，还受文化素质和属于有关国家的人民的水平。

因此，当我们谈到国家的崇高使命时，我们不能忘记属于人民，国家的任务是利用其组织权力实现提供必要条件，使这个民族能够自由地发展其创造才能。

同样，如果我们问德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宪法，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它注定要拥抱哪些人以及它必须服务于哪些目的。

不幸的是，德国的民族生活并非建立在一个统一的种族核心之上。

原始元素的结合还不足以让我们说一个新的种族已经出现了。

相反，特别是自三十年革命以来，侵入民族身体的毒药战争不仅摧毁了我们血脉的统一体质，而且也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灵魂。

我们祖国的开放边界，与德国以外的外国势力的联系，边境地区的领土，尤其是大量外国血统的涌入帝国内部的文化，阻碍了各种元素的完全同化，因为流入一直在持续稳定地进行。

在这个熔炉中，没有出现新的种族。异质元素继续并存。

结果是，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当羊群通常聚集在一起时，德军四处逃散。

不同地区的基本种族要素不仅不同，而且也有各种这些不同地区内的元素。

除了北欧类型，我们发现了东欧类型，除了东方类型，还有狄那里克类型，西方风格与西方风格混合，而且其中还存在各种杂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通过它，德国人缺乏那种由血统和拯救而产生的强烈的群体本能国家在危险和关键时刻免于毁灭，因为在这种场合，微小的差异消失，一群团结的牛群面对敌人。

我们对超个人主义一词的理解，是由于我们的原始种族元素一直并存，但从未合并。

在和平时期，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但总的来说，它阻止了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如果德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拥有团结的群体本能，其他民族受益匪浅，那么德意志帝国很可能成为今日地球。

世界历史将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没有人能够知道许多愚昧的和平主义者希望通过请愿、哀嚎

和哭泣来实现的目标，可能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即这种和平不是建立在挥舞橄榄枝和含泪散播悲惨情绪的基础上的和平主义的老妇人的和平，而是由一个拥有掌握世界并管理世界以服务于更高层次文明的力量。

我们的人民不是一个基于血缘团结的民族实体，这是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

它为许多德国小君主提供了居住的首都；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被褫夺了统治权。

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缺乏内部团结，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不幸也许会变成未来的福气。

虽然一方面我们的种族元素没有融合在一起可能是一个缺点，但一方面，没有一个同质的国家机构能够发展，另一方面，幸运的是，由于至少我们最好的血液的一部分因此保持了纯正，其种族品质没有被贬低。一个完整的我们所有种族元素的同化肯定会带来一个同质的民族有机体，但正如在每一个种族混合的情况下所证明的那样，它的能力会降低创造一个文明的可能性比其最好的原始元素更大。

没有全面同化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即使到现在我们民族中有大量德裔北欧人，他们的血液没有与其他种族的血液混合。

为了未来，我们必须将此视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在那个对所有种族法律都一无所知的黑暗时期，当时每个人都被认为与其他所有事物同等重要，因此无法清楚地认识到差异各种基本种族特征之间。

今天我们知道，构成民族的所有各种元素的完全同化可能会导致我们获得更大份额的外部权力。

另一方面，人类的最高目标也无法实现，因为唯一一种人类，显然是命运选择了他们来实现这种完美，否则他们就会迷失在这种种族融合必然会导致种族的普遍混合。

然而，在我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命运之神阻止了这一切，现在必须根据我们的新知识重新考虑和利用。

那些说德国人民在这个地球上要完成使命的人必须知道，这除非建立一个以维护并促进我们种族和整个人类中那些更为高尚的元素，这些元素至今仍然存在未受影响。

因此，国家第一次被赋予了崇高的内在目的。与荒谬的国家应该做的只是充当公共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以便每个人都可以和平地欺骗其他人，它确实被赋予了非常高的使命来保护并鼓励仁慈的造物主赋予这个国家最崇高的人性。

地球。

从一个自称是目的本身的死亡机制中，将诞生一个生命有机体，它具有只服务于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属于更高层次的理念。

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国家，应包括全体德国人，其任务不仅是聚集和培养而是要缓慢而稳步地带领他们取得统治地位，世界。

因此，停滞时期被努力时期所取代。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他领域，俗话说，休息就是生锈，胜利永远是进攻者获胜。

我们努力达到的最终目标越高，当时人们对此的理解就越少。

广大人民群众越是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成功就越是辉煌。

这是历史的教训，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构想结局，并以坚定不移的毅力进行斗争。

如今，许多指导国家事务的官员可能会发现，为维护现有秩序比争取建立新秩序更为重要。他们会更愿意将国家视为机制，其目的是自我保护，并说“他们的生命属于国家”，好像任何从民族内部生活发展而来的东西，在逻辑上都可以服务于任何东西，除了国家。

国家生活，好像人类还有比服务同胞更美好的任务似的。

当然，正如我所说，更容易的是，把国家权威视为仅仅是形式上的组织机制，而不是人民本能的主权体现。

在这个地球上自我保护。

对这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国家（和国家权威）本身只不过是一个目标，而对我们来说，它是伟大而永恒的生存斗争中的一个有效武器，一个每个人都必须屈服，这并非因为这只是一种形式机制，而是因为这是主要的表达我们的共同生存意愿。

因此，在争取完全符合生命本源意义的新理念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个已经衰败的社会秩序中，我们只能找到少数同志身体上，但精神上。

从这些圈子里，只有少数杰出的人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只有那些少数老人他们的心依然年轻，他们的勇气依然强大，但那些认为维持现状是他们的职责。

与我们作对的是无数懒惰、冷漠的人，而不是邪恶，以及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维持现状的人。在我们伟大斗争看似毫无希望的情况下，隐藏着我们任务的艰巨性和可能性成功的标志。一声战斗的呐喊，从一开始就会吓跑所有的小气鬼，或者至少阻止他们，将成为所有真正具有战斗勇气的人的集结信号。

此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出现一个充满活力和活跃的男性群体从一个民族中诞生，为了一个目标而团结起来，最终超越了惰性的民众。

人民，这一小部分人将成为整体的主人。

世界历史是由少数人创造的，如果这些少数人有意愿，大多数人的精力和主动性。

对很多人来说，看似障碍的东西实际上是初步的胜利的条件。正因为我们的任务如此艰巨，正因为我们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克服，很可能只有最优秀的主角才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种选择是我们成功的保证。大自然通常会采取某些措施来纠正种族杂交产生的效应。

她不太喜欢杂种狗。早期的杂交产物必须遭受损失痛苦不已，特别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参与教育的父母应具有的较高品质但他们也缺乏坚定的意志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因为缺乏血液品质和谐。

在所有关键时刻，一个拥有纯种血统的人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也就是说，连贯一致的决定，混血儿会变得困惑，并采取半途而废。

因此我们看到混血儿不仅在相对上比纯血统的人低劣，但也注定会更快地灭绝。

在无数情况下，纯种狗坚守阵地，而杂种狗却失败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自然采取的矫正措施：她限制了生育的可能性，从而阻碍杂交品种的繁殖力并导致它们灭绝。

例如，如果一个种族的个体成员与另一个种族的成员混合血统，优等民族，第一个结果就是种族水平的降低，而且，这种混合婚姻的影响力会比周围那些维持婚姻的人要弱。

血液纯净。

在没有来自优等民族的新鲜血液进入杂种的种族潮流的地方，而这些杂种继续在它们之间杂交，后者要么会灭绝，因为它们已经抵抗力不足，这是大自然的明智安排，或者在许多几千年后，它们会形成一个新的混血种族，其中的原始元素将变得如此经过这一千年的跨越，原始元素的痕迹将不再存在可辨认。

这样，就会进化出一个具有一定抵抗能力的群居型新民族；但其知识价值和文化意义却远不如参与原始杂交的优等种族。

但即使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杂种产品也会在相互的生存斗争中屈服与一个血统保持纯正的高等人种群体融合。

这个杂种种族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群体团结将无法应对斗争，因为它缺乏弹性和建设性的能力来战胜在精神和文化上更优越的同质血统的种族。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原则，认为这是有根据的。每一个种族混合都会导致迟早必然导致杂种产品的衰落，只要一部分优参与杂交的种族保持完整，并保留了某种种族同质性。

对杂种的威胁只有在上级的最后一批成员被混血后才会停止纯正血统的人种。

这一原理是缓慢但持续再生的源头，通过这一原理，所有已经被入侵的种族身体会逐渐被

消灭，只要还有纯粹的基本血统种族元素，并且不再发生杂交。

对于那些种族本能很强的人来说，这种过程可能会自动发生。

剩下的人。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算出那些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而强制，已经被排除在严格的种族界限的正常繁衍方式之外。

一旦这种强迫停止，人类中仍保持完整的那部分人就会倾向于通婚与同类混杂，从而阻碍进一步混合。

然后杂种狗就会很自然地退居幕后，除非它们的数量增加到能够抵挡住那些保存了他们的种族的纯洁性。

当人类丧失了自然本能，忽视了自然赋予他们的义务时，那么大自然就没有希望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直到认识到他们自身的义务已经取代了他们已失去的本能。

那么弥补所失去的东西的任务就必须由大自然来完成。但是一个严重的危险是，那些曾经在这方面变得盲目的人将继续提供更多的援助更多地打破种族障碍，并最终失去其中最美好的事物的最后残余。

剩下的只是均匀的浆状物质，这似乎是我们精致的乌托邦主义者，但那一团浆糊的东西很快就會把世界上所有的理想都驱逐出去。当然是一大群从而得以形成。

人们可以培育出一群动物，但从这种混合中，人类创造了并建立文明将不会产生。人类的使命可能被认为是结束。

那些不希望地球陷入这种境地的人必须意识到，这是一项日耳曼各城邦尤其要确保混血化进程得以停止。

我们当代的弱者一代自然会谴责这样的政策，并抱怨和抱怨它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

但只有一项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项权利同时也是一项最神圣的职责，即保护种族纯洁性，以便人类最优秀的类型能够得到保存，从而使人类本身实现更崇高的发展。

一个民族国家首先应该把婚姻提升到种族隔离的水平之上。

掺假。国家应该将其神圣化，作为繁殖人造生物的机构。

上帝本身的肖像，而不是人与猿混合的怪物。

以人性的名义提出的抗议并不适合这一代人的口中这使得最堕落的堕落者得以繁衍后代，从而给自己的产品和同时代的人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而另一方面，避孕药是允许的，在每家药店甚至街头小贩那里都有卖，这样婴儿不应该由我们最健康的人所生。

在我们这个国家，其职责是维护法律和秩序，我们的国家资产阶级认为，让梅毒患者和那些患有肺结核或遗传性疾病的人，以及残疾人和低能儿。

但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在数百万最优秀的人才中，如何切实防止生育这不是邪恶，它也不违背这个虚伪阶级的道德准则，而是符合他们的短视。

视力和精神萎靡，否则他们就得绞尽脑汁寻找答案如何为尚未出生的生命创造喂养和维持条件的问题他们将是我们的健康代表，反过来，他们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后代必须承担这一任务。

当代人是多么缺乏理想，多么卑鄙系统！没有努力去完善这个品种的未来，但事情只是允许滑动。

事实上，各教会都宽恕这种违背上帝形象的罪，尽管他们继续强调这一形象的尊严，是十分符合他们现在活动的。

他们谈论灵，却让作为灵的化身的人堕落到无产阶级水平。然后，当他们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影响力是多么小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张大嘴巴。

基督教信仰在他们的国家，这些乌合之众是多么的堕落和不虔诚，身体退化，因此道德也会退化。为了平衡这种状况，他们试图使霍屯督人、祖鲁人和卡菲尔人皈依伊斯兰教，并赐予他们教会。

感谢上帝，我们的欧洲人民却成为道德的牺牲品堕落，虔诚的传教士前往中非，建立传教站黑人。

最后，健康健全的、虽然原始落后的人们将被改造，以我们的“高级文明”，变成了一群懒惰且残暴的杂种。

如果我们两个基督教派别停止用他们的布道来打扰黑人，而黑人不想要也不理解。

如果他们不去管这项工作，而是尝试去教导欧洲人，那就更好了。

亲切而严肃地说，如果一对不健康的夫妻对一些可怜的孤儿表现出慈爱，成为他的父母，而不是赐予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生命，这将给所有人带来痛苦和不幸。

在这一领域，民族国家必须修复由于问题目前被有关各方忽视。

民族国家的任务是使种族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

必须确保种族血统的纯度得以保存。

它必须宣扬这一真理：儿童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它必须确保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育孩子；只有一种耻辱，即，对于患病或有遗传缺陷的父母来说，生育孩子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这样做是一种荣誉问题。

但另一方面，不给健康的孩子提供对国家来说。

在这件事情上，国家必须宣称自己是千禧年的未来的受托人，而面对这一未来，个人的私欲毫无意义，在法律的裁决面前都必须让步。

状态。

为了切实履行这一义务，国家必须利用现代医疗发现。它必须宣布所有患有某些可识别的遗传性疾病或携带者，必须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此类人就失去生育能力了。

另一方面，必须为正常生育能力的妇女提供保障，这样她就不会因体制下的经济和金融条件而限制生育这使得生儿育女对于父母来说成为一种诅咒。

国家必须废除懦弱甚至犯罪的对待大家庭的社会福利问题的漠不关心，将会成为这个民族引以为豪的最大福祉的最高保护者。

它的注意力和关心必须集中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成人身上。

身体或精神不健康、不适应环境的人，不应让自己的痛苦延续下去他们孩子的尸体。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要完成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在未来的时代，这项工作将比我们胜利的战争更伟大、更有意义现在的资产阶级时代。

国家必须通过教育，让个人知道疾病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不幸事故是值得同情的，但让这种痛苦变得更糟是一种罪行和耻辱仅仅因为自私自利而将疾病和缺陷传染给无辜的生物。

国家还必须教育人民，这是真正高尚品德的表现，也是值得钦佩的人道主义行为，如果一个人无辜地患有遗传性疾病不想有自己的孩子，而是把自己的爱和感情给予某个不认识的孩子，通过其健康，承诺成为健康社区的健康成员。

在完成这样的教育任务时，国家通过以下活动将其实际职能融入道德领域。它必须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而不考虑是否它的行为将被理解或误解、被指责或被赞扬。

如果在不超过六百年的时间里，所有身体或精神都衰退，有缺陷的人被绝育，人类不仅会从巨大的不幸，而且还恢复到了我们目前难以想象的健康状态。

如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鼓励国民健康人口的生育能力，有条不紊地，我们应该至少有一个种族的开端，从中所有这些细菌将消除导致我们道德和身体堕落的因素，如果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方式来发展民族最宝贵的核心从种族角度来看，从而增加其生育力，整个民族随后将享受纯种繁殖带来的福祉。

为了实现这一点，国家首先不应该把新获得的领土的殖民化交给制定政策不能随意，而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去执行。

专门的主管委员会应当向个人颁发证书，允许他们从事殖民工作，这些证书应该保证个人的种族纯洁性问题。

这样，就可以逐渐建立边境殖民地，其居民将拥有最纯正的人种血统，从而拥有该人种的最佳品质。

这样的殖民地将是整个国家的宝贵资产。它们的发展将成为给每个公民带来欢乐、信心和自豪，因为它们包含着最终会促进民族乃至人类自身的伟大发展。

以种族观念为基础建立国家的世界观最终必须成功实现更高贵的时代，男人不再只关注生育和养育血统狗、马和猫，而是会努力改善人类本身的品种，那将是一个阶级自我克制和放弃的时代，而其他阶级将欣然奉献礼物并作出牺牲。

这种心态是有可能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因为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接受独身主义原则，不受任何法律或组织强制或承诺。

除了教会戒律之外的任何事物。

为什么不能诱导人们做出这样的牺牲，如果不是这样的戒律，他们只是被告知，他们应该结束种族腐败的原罪，这是不断地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此外，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有义务将自己创造的生命献给全能的造物主，就像他自己创造的一样。

自己的形象。

当然，我们当代的可怜的非利士人军队不会理解这些事情。他们将嘲笑他们，或者耸耸肩膀，呻吟着找借口，“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惜无法实现。”我们回答说：“你们确实做不到，因为你们的世界无法实现这种想法。你们只知道一种忧虑，那就是你个人的存在。你只有一个上帝，那就是你的钱。

“我们不是向你们求助，而是向那些太穷而无法认为他们的个人存在是世上最高的福祉。他们不相信金钱，而是信奉其他神，并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些神。

“首先，我们要向德国青年大军致意。他们正以伟大的他们将与懒惰和冷漠造成的邪恶作斗争。

他们的父亲。

要么德国青年有朝一日会建立一个以种族观念为基础的新国家，要么他们会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崩溃和消亡的最后见证者。如果一代人存在缺陷，它认识到甚至承认，但仍然对自己很满意，就像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一样，诉诸于无能为力的廉价借口，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这样的一代人注定会遭遇灾难。

我们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再也不能否认存在。它不得不承认有很多肮脏和错误的事情；但它无法下定决心对抗邪恶，这意味着要动员六十或七千万人民一起来抵抗这种威胁。

资产阶级则恰恰相反。当在其他地方做出这样的努力时，他们只会纵容在愚蠢的评论中，并试图从安全距离来表明这样的企业在理论上不可能而且注定会失败。

任何论点都是愚蠢的，可以用来捍卫他们自己的吹毛求疵的观点和他们的道德态度。例如，如果整个大陆都对酒精中毒发动战争，以便解放整个民族都摆脱了这种毁灭性的罪恶，我们欧洲资产阶级的唯一反应就是目瞪口呆，摇摇头，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冷笑来嘲笑这一运动——这种心态在如此荒谬的社会中尤其有效。

但如果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历史悠久的、不可侵犯的常规受到攻击，并且攻击产生了一些效果，那么正如已经说过的，至少效果必须是即使必须援引资产阶级道德原则来反对一场运动，这是为了压制巨大的道德邪恶。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当代资产阶级世界已经不适合为了……而完成任何这样的崇高任务。

人类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的品质低劣，同时又邪恶，而不是因为它一心想作恶，却因

为普遍存在的懒惰及其后果。

所以那些自称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团体不过是协会旨在促进某些专业团体和阶层的利益：其最高目标是尽其所能地捍卫自己的私利。

显然，这样一个由资产阶级政客组成的行会，可以被认为适合做任何事情而不是斗争，尤其是当对手不是谨慎的店主，而是无产阶级群众被逼到了极点，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如果我们认为国家的首要职责是服务和促进人民的普遍福利，那么保存和鼓励最优秀的种族元素的发展，其逻辑结果是这项任务不能仅限于有关种族婴儿成员出生的措施和民族，但国家也必须采取教育手段，使每个公民成为是该种族进一步繁衍的宝贵因素。

正如一般而言，种族素质是任何特定个体的智力效率的先决条件一样，人力资源，即个人的训练，首先必须针对培养健康的身体，因为一般规则是，拥有强健的心灵只有拥有强健的身体。

天才有时身体并不健壮，身材也不健壮，甚至体弱多病。

宪法，并不能证明我所阐述的原则是错误的。

这些情况只是例外，就像其他地方一样，证明了规则。但是，当大部分一个国家是由身体退化的人组成的，很少有伟人能从如此悲惨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杂色的，而且无论如何，他的活动永远不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堕落的暴徒要么根本无法理解他，要么他们的意志力如此他们太虚弱了，无法跟上这只翱翔的雄鹰。

一个立足于种族原则并意识到这一真理意义的国家将首先所有的学校都不应仅仅以传授知识为基础，而应以体能训练和健康体魄的发展。

智力的培养只占第二位，在这里，性格又占了上风。

首先要发展的就是意志力和决策能力。

教育制度应该培养一种乐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正式科学教学必须被视为最后的重要内容。

因此，以种族观念为基础的国家必须从以下原则开始：一个人受过正规科学教育的人相对较少，但身体健康强壮，坚定而诚实的性格，随时准备做出决定，意志坚强，比一个博学多识、文质彬彬的弱者更能成为国家社会的有用成员。

一个由身体衰弱、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的博学之人组成的国家和平主义者，甚至无法确保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

在决定人类命运的艰苦斗争中，很少有人能够因为他缺乏学习而屈服。那些试图忽视这些后果的人失败了但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实施它们。

身心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退化的身体并不会更美丽因为它蕴藏着光芒四射的精神。

如果我们把最高智力训练给予那些身体畸形、残疾，缺乏果断，意志薄弱，胆小怕事。

希腊人对美的理想之所以永恒，是因为它完美地结合了壮丽的外表具有高尚心灵和精神的美。

毛奇说，从长远来看，财富只青睐有效率的人，这当然也适用于身体与精神的关系。

健全的心智通常寓于健全的身体之中。

因此，在民族国家，体育锻炼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也不是这一责任首先落在父母身上，其次才是公共利益问题。

这对于保护由国家代表和保护的人民是必要的。

就纯粹的正规教育而言，国家现在甚至干涉个人的自我权利。

决心，并坚持社区的权利，让儿童接受义务训练体系，而不考虑家长的意见。

新的民族国家终有一天会以类似的方式，在更高的程度上使自己的权威占上风，个人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的无知和不理解国家。

它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它的教育工作，使年轻人的身体从婴儿时期开始接受系统的训



练，以便磨练和锻炼，以适应在以后的几年里对他们进行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确保不产生新一代的书呆子。

教育和卫生工作必须从年轻的母亲开始。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成功消灭了败血症分娩并将产褥热的发生率降低到相对较少的水平。

应该能够为护士和母亲提供全面的指导课程，并制定一个从婴儿期开始训练孩子的系统，可以作为其未来发展。

民族国家应当为学校提供更多的时间用于体育锻炼。

让年轻人的大脑负担过重是荒谬的，经验表明，他们只保留一小部分，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必需的，只保留次要的部分，因为年轻人无法从所有知识中筛选出正确的学习方式挤进它里面。

如今，即使在高中课程中，每周也只有短短两个小时留给体操；更糟糕的是，是否参加由学生自己决定。

这表明，这一教育分支与纯粹的知识分子教育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指导。每一天都不应该让年轻的学生没有一个早上和晚上各进行一小时的体育锻炼，以及各种运动和应该包括体操。

有一种运动是应该特别鼓励的，尽管很多人认为民族主义者认为拳击是残酷而粗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多少假这种观念在“有文化”阶层中盛行。

事实上，年轻人学习击剑，然后花时间进行决斗，被认为是很自然，也很可敬。但拳击——太野蛮了！为什么？没有其他运动能与之媲美在发展战斗精神方面，没有谁要求这种快速决策的权力，也没有谁给予机身具有优良钢材的灵活性。

两个年轻人用拳头解决分歧并不比用尖锐的钢片。

一个受到攻击并用拳头自卫的人肯定不会表现出缺乏男子气概的行为而不是逃跑并大喊寻求警察帮助的人。

但最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必须学会忍受艰难的打击。这个原则可能看起来很残酷对于我们当代的冠军来说，他们只用智力的武器战斗，但这不是民族国家的目的是培养一批审美和平主义者和身体退化者。

这个国家不认为人类的理想可以在光荣的腓力斯人或处女老处女，但作为男人美德的大胆典范，以及能够给男人带来走向世界。

一般而言，体育运动的功能不仅在于使个人变得强壮、机警和勇敢，同时也锻炼身体，使其能够忍受不利的环境。

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上层阶级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绅士行为艺术训练相反，如果他们学会了拳击，就绝不可能被欺负者欺负，逃兵和其他流氓无赖，无法完成德国革命。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革命不是由于其创始人的勇敢、精力充沛和大胆的活动，而是由于当时统治德国的人的懦弱和优柔寡断令人遗憾，对此负责。

我们受过教育的领导人只接受了“智力”培训，因此发现自己当对手使用撬棍而不是智力武器时，他们就毫无防御能力。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我们优越的教育体系没有把男人培养成真正的男人，而只能是公务员、工程师、技术员、化学家、文学家、法学家，最后，教授，以免知识主义消亡。我们在纯知识领域的领导者一直是很出色，但在实际问题采取果断行动时，我们的领导人却表现不佳批评。

当然，教育不能把一个胆小的人变成一个勇敢的人，但一个天生具有一定勇气的人却无法培养这种品质如果他的教育有缺陷，使他从一开始就在身体方面不如别人力量和威力。

陆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表明，对自己身体能力的了解会培养出男人的勇气和战斗精

神。军队中没有杰出的英雄，但有普通的勇气。

战前德国士兵接受的优秀教育，使整个巨大的有机体都对自己的优越性抱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就像我们的对手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德国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展现出的所有不朽的无畏勇气和勇敢事例，1914年夏末和秋季，他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是系统地开展培训。

在上一次战争前的漫长和平岁月里，那些几乎身体虚弱的男性使他们能够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迹，因此他们建立了自信，不会让他们失望即使在最可怕的战斗中。我们的德国人民现在处于崩溃状态，无法抵御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打击，而世界其他国家需要权力这就是自信的结果。

但这种自信必须从小就灌输给我们的孩子。

整个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致力于培养儿童的信念毫无疑问他是任何人的对手。

个人必须恢复自己的体力和力量，才能相信他所属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以前，德国军队取得胜利的秘诀就是每个人的信心。

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品质，而所有领导者也都具有这种品质。

恢复德国人民的民族力量，是坚信他们能够重新获得自由，但这种信念只能是数百万人同样的感受的最终产物个人。

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抱有幻想。我们的人民崩溃得势不可挡，那些结束如此多苦难的努力必定是超人。

相信我们的人民能够再次强大起来，仅仅依靠我们现有的资产阶级进行有序和服从的训练。如果我们要打破目前的秩序，这还不够，目前的秩序现在允许承认我们的失败，把我们被奴役的锁链打碎，扔到对手。

只有凭借充沛的民族能量和对自由的热情，我们才能恢复已丢失。

此外，年轻人的穿衣方式也应该与这一目的相协调。

可悲的是，我们的年轻人沦为时尚狂热的牺牲品，这种狂热扭曲了这句老话的意思就是，人靠衣装。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衣服应该在教育培训中占有一席之地。男孩夏天穿着宽松的长裤和裹着脖子的衣服的人走动会很不方便他的衣服让他感觉不到任何进行剧烈体育锻炼的倾向。野心，坦率地说，甚至虚荣心也必须诉诸于行动。我指的并不是这样的虚荣心：导致人们想要穿漂亮的衣服，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而是虚荣心这让人们想要拥有良好的体格每个人都可以尝试这样做。

这对以后的岁月也有价值。年轻女孩必须了解她的伴侣。如果一个女人的美貌身体并没有因为我们愚蠢的穿衣方式而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我们不可能让成千上万的女孩被犹太杂种引入歧途，令人厌恶的歪歪扭扭的走路姿势。

体格优美的人应该交配，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这样他们为国家带来新的美丽。

由于我们目前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训练，因此，唯一的机构至少在和平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现在教育中体育锻炼的不足我们所缺乏的，所以我所建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显得更加必要。

我们旧军事训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对个人的教育上，而且也影响了两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年轻人相比非士兵，女孩更喜欢士兵。

民族国家不应该将对体育锻炼的控制限制在学校的正式课时，而应该必须要求，在男孩离开学校后，趁着他青春期的身体还在发育的时候，继续这种训练，因为在这种适当的身体发育的基础上，以后生活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认为国家监督年轻公民教育的权利突然这一经历在他们离开学校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只有服役后才能重新开始。

这项权利是一种义务，因此必须持续下去。目前国家没有关注培养健康男性本身，却犯罪地忽视了其责任。它让我们的当代青年，在街头和妓院里堕落，而不是抓住控制并继续对这些年轻人进行身体训练，直到他们长大成为健康的年轻男女。

目前而言，国家选择何种形式开展此项培训还无关紧要。

关键是应该发展它，而且应该以最合适的方式发展它。

受到调查。

民族国家必须考虑青少年在学校毕业后的体育锻炼对他的智力训练来说，这既是公共责任也是他的智力训练，而且这种训练必须通过公共机构。

一般来说，它可以为以后在军队服役做准备，然后它将不再陆军的任务是向年轻新兵传授最基本的训练规则。

事实上，陆军将不再需要处理目前意义上的新兵问题，而是而要把身体素质已经完全恢复的年轻人改造成士兵发达。

在民族国家，军队不再有义务教男孩们如何走路和直立，但它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终和最高的学校。

在军队中，年轻的新兵将学习携带武器的艺术，同时他将为以后生活中的其他职责做好准备。

军事教育的最高目标必须始终是实现旧军队是其最高价值，即通过军事训练，男孩必须转变成成为一个男人，他不仅要学会服从，还要掌握使他能够他必须学会保持沉默，不仅在受到公正的斥责时，而且在当他受到不公正的斥责时。

此外，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基于团队精神，激励他和他的同志们，他必须确信他属于一个无敌。

完成军事训练后，士兵将获得两份证书。一份这将是作为国家公民的文凭，一份法律文件，使他能够参加在公共事务中。

第二份是他的身体健康证明，保证他适合结婚。

民族国家必须指导女孩的教育，就像指导男孩的教育一样，并且根据相同的基本原则。

这里再次强调，必须特别重视体育锻炼，然后才是精神和心理训练的重要性应被考虑。

在对女孩的教育中，要始终牢记的最终目标是，她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母亲。

其次，民族国家必须致力于全面的人格培养。

当然，个人性格的本质特征在接受任何教育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地方。

一个本质上自私自利的人永远会从根本上来说，理想主义者永远从根本上来说是个理想主义者。

然而，除了那些已经拥有明确性格特征的人之外，还有数百万性格不确定、模糊的人。

天生的罪犯永远都是罪犯，但许多只表现出某种有犯罪行为倾向的人如果经过正确的训练可能会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另一方面，如果教育体制很糟糕。

在战争期间，人们常常哀叹我们的人民竟如此缺乏沉默。这一缺陷使得即使是非常重要的机密也很难被敌人知晓。

但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战前的德国教育体系是如何教授德国人要谨慎吗？在学生时代，小告密者比他的同伴更受青睐，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的吗？谁保持沉默？难道那时和现在一样，抱怨别人不是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吗？'坦率'，而沉默的谨慎却被视为固执？我们是否曾经尝试教育年轻人，谨慎是一种宝贵的、男子气概的美德？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教育当局眼里都是小事。

但这些琐事却花费了我们国家数百万的法律费用，因为百分之九十的诽谤和类似指控的程序仅仅因缺乏自由裁量权而产生。

毫无责任感的言论口口相传，我们的经济福利不断受到损害因为重要的生产方法被不小心

泄露了。

我们国防的秘密准备工作之所以成为空想，是因为我们人民从来没有学会了保持沉默。他们会重复他们听到的一切。在战争时期，这种多话的习惯甚至可能导致战斗失败，因此可能对失败的活动的结果。

在这里，就像在其他事情中一样，我们可以放心，成年人不能做他们没有学会的事情青少年。老师不应该试图通过鼓励邪恶的行为来发现男孩们的野性行为讲述故事。

年轻人之间形成一种国家，以一定的团结精神面对成年人。也就是说相当自然。十岁男孩之间的纽带更加牢固，也更加自然而不是与成年人的关系。

一个男孩告发他的同志，就犯了叛国罪，并且表现出一种性格倾向，即说话直白，就像一个犯有叛国罪的人说的一样。

这样的男孩不应该被归类为“好”、“可靠”等等，而应该被归类为性格中的不良特征。教师利用这些特征可能会很方便。

不值得的倾向，以帮助他自己的工作，但通过这种态度，一个道德习惯播撒在年轻人的心中，有朝一日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年轻告密者变成恶棍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刻意培养优秀和高尚的品格我们今天的学校几乎是负面的。

今后，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更加重视这方面。忠诚，自我牺牲和谨慎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具备的美德，教导和在学校中发展这些比现在包括的许多其他事情更重要在课程中。

让孩子放弃抱怨、发牢骚、受到伤害时嚎叫等习惯，也属于他们训练的这一部分。

如果教育系统未能在孩子小的时候教会他们忍受痛苦和伤害，我们不会感到惊讶，如果在以后的年龄，当男孩长大成人，并且例如，在战壕里，邮政服务的作用只是把满满的信件寄回家牢骚和抱怨。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在小学期间，脑子里塞满了一点知识较少，而如果他们能更好地学习如何做自己的主人，在 1915 年至 1918 年间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在教育体系中，民族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性格发展与身体训练相结合。

我们的理性机体目前所表现出的许多其他缺陷是可以改善的，即使不能通过正确的教育，可以彻底消除。

高度重视意志力的培养，年轻人应该接受过做出坚定决策和承担责任的培训。

在我们旧军队的训练中，流行的原则是，任何命令都比没有命令好秩序。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的年轻人身上应该采取这样的形式：任何答案都比没有好回答。因为害怕出错而害怕回答，应该被认为是更丢脸的事而不是给你错误的答案。在这个简单而原始的基础上，我们的年轻人应该被训练采取行动的勇气。

人们常常哀叹，1918 年 11 月和 12 月，所有当局都失去了理智从君主到最后的师长，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自己负责地做出决定。

这一可怕的事实对我们的教育体系提出了严重指控，因为在灾难发生那一刻，大规模揭露的只是小规模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之中无处不在。

正是由于缺乏意志力，而不是缺乏武器，我们才无法提供任何今天抵抗十分严重。

这种缺陷在我们人民中随处可见，并且阻碍了采取果断行动，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承担风险，仿佛任何伟大的行动都可以不涉及任何风险地采取。

风险。

毫无戒心的是，一位德国将军找到了解决这种可悲的缺乏行动意愿的办法他说：“只有当我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成功率时，我才会采取行动。”在这“百分之五十一的可能性”中，我们找到了德国崩溃的关键。

要求命运保证他的成功，故意否认英雄行为的意义，因为这种意义在于，在明确地了解情

况之后，如果问题充满着致命的危险，那么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导致成功。

一位身患癌症的病人，他知道如果不接受治疗，他肯定会死。

手术前不需要保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治愈率，并且如果行动只保证百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一个有勇气的人愿意冒这个险，不愿意冒这个险的人就没有权利抱怨。

总而言之，懦弱的缺乏意志力和无法下定决心是主要原因这是我们的年轻人所接受的根本不正确的训练的结果。

灾难性的影响在后来的生活中变得明显，并在缺乏平民勇气的情况下达到顶峰这是我们的主要政治家所展现的。

如今，逃避各种责任的懦弱源于同样的来源。这又一次是我们对年轻人的教育出了问题。

这一缺陷渗透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在以下机构中达到顶峰：实行议会制的政府。

不幸的是，即使在学校里，人们也更看重“忏悔和彻底悔改”，对于那些小罪人来说，忏悔的发誓比简单而坦率的忏悔更为重要。但后者如今，在许多教师眼中，似乎都散发着一一种完全不可救药和堕落的精神，尽管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很多男孩都被告知绞刑架正在等待着他们，因为他展现出的某些品质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可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正如民族国家有一天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培养意志力和能力上一样，年轻人做出的决定，也必须从小就在年轻一代的心中培养起来。

从童年开始就愿意承担责任，并有勇气坦诚相待声明。

如果它认识到这一必要性的全部意义，最终——经过一个世纪的教育工作——它将会成功建立一个不再受制于过去对我们目前的失败做出了如此灾难性的贡献。

正式传授知识是我们教育体系的主要工作，目的是——一天，将由民族国家接管，只需进行少量修改。这些修改必须分为三个分支。

首先，年轻人的大脑不应该被那些九成以上的5%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因此又被遗忘了。

目前，小学和中心学校的课程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混合。

许多学科需要学习的内容已经变得非常庞大，以至于只有非常一小部分事后才能被记住，事实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利用大量的知识。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希望专攻某一领域的人来说，所学的东西是不够的枝，以赚取每日的面包。

以受过文理中学或高中教育的普通公务员为例，问问他，到了三四十岁，他还保留了多少当时的知识？带着那么多痛苦挤进他的身体。

塞进他脑子里的东西，他能记住多少呢？他肯定会回答：“嗯，我当时努力学习的唯一目的并不是获得大量的知识这是我以后可以借鉴的；但它有助于培养理解力、记忆力和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增强大脑的思考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然而，让一个年轻的大脑沉浸在知识的洪流中是相当危险的。

它很难掌握这些印象，也无法辨别或欣赏其真正的价值。

被遗忘和忽视的往往是这些知识的本质部分，而不是次要部分。

牺牲。

因此，这种冗长指令的主要目的就落空了，因为这个目的不可能让大脑能够学习，只需给它提供大量不同的科目即可而是为个人提供他将来需要的知识储备。

以后的生活，并可以利用这些来造福社会。

然而，如果由于一个人能够记住童年时塞进脑袋里的过多科目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什么都记不住，或者至少记不住其中的重要部分。

没有理由要求数百万人在学校期间学习两三种语言年，只有极小一部分人有机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使用这些语言因此，大多数人将彻底忘记这些语言。

举个例子，在十万名学习法语的学生中，可能没有2000人将在以后的生活中利用这一成就，

而 90 八千人永远没有机会将他们年轻时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他们在一个主题上花费了数千小时，但后来却变得毫无价值或重要性对他们来说。

认为这些科目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的说法是无效的。如果所有科目都这些人能够在来世运用这些知识。但事实上，九万八千人被无谓地折磨，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是为了那两千人。

语言会有什么用处。

就我所选择的这种语言而言，不能说学习这种语言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或提高他们的智力，比如学习拉丁语，例如，可以说是这样做的。

因此，最好只教年轻学生一般的大纲，或者更好的是，这种语言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辨别出特征或者让他们熟悉该语言的语法、发音、句法、风格等这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它可以提供更清晰的整体视角更容易记住，也比现在尝试的更实用。

把他们永远无法掌握的整个语言的详细知识塞进他们的脑袋里，他们很快就会忘记。

如果采用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危险：所教的内容，只有一些片段会留在记忆中，因为孩子们必须学习什么是有价值的，这样，在有用和无用之间做出选择就变得事先做好。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对语言基础知识的了解和理解足以满足他们的余生，而那些真正需要这种语言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有一个基础来构建，如果他们选择做出更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

通过采用这样的课程，可以获得必要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以及在已经接受过的各个教育领域进行更深入的培训提及。

一项特别重要的改革是应该对现行的方法进行改革教授历史。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德国人一样学习这么多的历史，几乎没有其他民族会如此糟糕地利用其历史知识。

如果政治是历史的形成，那么我们教授历史的方式就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已经进行了我们的政治活动。

但是，哀叹我们的政治行为的可悲结果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我们现在决心为我们的人民提供更好的政治教育。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我们目前的历史教学效果都是令人遗憾的。

通常，记忆中只留下几个日期、出生年份和名字，而对完全缺乏历史发展的主要和明确路线。真正重要的基本特征并没有被教授。它留给了或多或少聪明的人个人的智慧，在大量的日期和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

你可以对这个令人不快的言论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但请仔细阅读我们的议员在一次会议上就与比如说外交政策。

请记住，这些先生们是，或者自称是，德国民族的精英，而且至少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坐在我们中学的长凳上，其中许多人并通过了我们的大学。

那时你就会意识到这些人的历史教育是多么的不完善。如果这些先生们从未学习过历史，但对公共事务有着敏锐的直觉，事情会变得更好，国家也会因此受益匪浅。

我们的历史教学内容必须缩减。历史教学的主要价值在于使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得到理解。我们的历史教学越仅限于这项任务，我们越是希望它随后能够有利于个人，并通过个人，传达给整个社会，因为历史不能被研究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指导未来，并教导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民？这才是真正的目的，而历史教学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但在这里，在我们当代的教育中，手段已经超越了目的。目标被完全遗忘了。

不要反驳说，深入研究历史需要了解所有这些日期因为否则我们就无法确定伟大的发展路线。

这项任务落到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肩上，但普通人不是历史教授。

历史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给他提供那么多的历史知识这对于使他能够对政治事务形成独立的看法是必要的他自己的国家。

想要成为历史学教授的人以后可以全身心投入到所有的细节中。

当然，他必须关注哪怕是最小的细节。

当然，我们目前的历史教学还不足以涵盖所有这些内容，它的范围太广了，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这太有限了，不适合希望成为历史专家的学生。

最后，民族国家的职责是安排编写世界历史，其中种族问题将占据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民族国家必须重建我们的普遍教育体系，以便它只会拥抱重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它还必须为各学科提供更高级的教学那些想专攻这些领域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说熟悉各种基本知识就足够了科目作为所谓全面教育的基础。

他应该详尽而详细地研究他打算在他的余生。所有科目的一般教学应是强制性的，专业化应留给个人选择。

这样，学校课程就会缩短，从而减少几个上课时间。

所获得的能量可以用于锻炼身体和培养意志力，做出实际判断、决定等。

当今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心学校教育，很少考虑职业必须遵循的来世原则，是由那些注定要同样的人生使命在三种不同的学校接受教育。

决定性重要的是通识教育，而不是专业教学。当专业我们需要的是知识，而这在今天的中心学校的课程中是无法教授的。

因此，民族国家终有一天必须废除这种半途而废的措施。

民族国家必须进行的课程改革的第二项内容是我们的科学教育表现出一种越来越重视现实和实用，例如应用数学、物理、化学等当然，在工业技术和化学主导的时代，它们是必要的，至少从外表来看，它们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但以这些科目的知识为基础对国家进行普及教育，排除所有其他的。

相反，通识教育应该以文化为基础。它应该更多地建立在古典研究，其目的只是为以后的专业教学提供基础在各种实用科学中。

否则，我们就应该牺牲那些对国家保卫更为重要的力量比任何技术知识都要好。

在历史系，古代史的研究不应被忽略。罗马历史，以及总的路线是，并且将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不仅对我们这个时代，而且对未来，并且希腊文化的理想应该连同其所有的奇妙之美一起为我们保留下来。

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应该阻止我们认识社区种族在更高的层面上将他们团结在一起。

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是围绕着伟大目标展开的。一个文明正在战斗存在的意义。它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产物，希腊语和德语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今天后者越来越有可能变得卑微，为玛门服务。为了平衡这种趋势，应该保留一般文化，至少保留其理想形式。

需要反复强调的原则是，工业和技术进步、贸易和商业，只有在一个受理想激励的民间社区提供必要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繁荣基础。

这种状况不是由物质主义的利己主义精神造成的，而是由自我否定的精神和为他人服务而奉献自己的快乐。

当今的教育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向年轻人灌输人们知道哪面墙可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找到方向。

这一原则可以用以下术语来表达：“年轻人总有一天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不是人类社会的一员。”这句话指的是他能够通过诚实的方式谋生。

他只是偶然获得了良好公民义务的肤浅训练，基础非常薄弱。国家本身只是一个容器，因此很难训练人们把这个容器视为他们必须为之服务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必须感到有责任。

船只很容易成为经纪人。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人们没有明确的概念国家一词的含义。因此，除了通常刻板的“爱国主义”训练。

在旧德国，这主要表现为一种奉承（这种奉承往往相当愚蠢，而且通常很无聊）的小君主人数太多，因此有必要省略所有提及德国产生的真正伟人。

结果是广大群众对德国历史的了解非常不足。在这里，而且，伟大的发展路线也消失了。显然，这种方法不可能激发真正的民族热情。我们的教育事实证明，该系统无法从我们的众多历史人物中选出德国人民可以自豪地将其中一些人物视为自己民族的英雄。

这样，整个民族就有可能因为对这一共同点的共同认识而团结起来。

遗产。

德国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出现在当代人面前。

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他们身上，以唤醒共同的民族精神。

从所教授的各种科目来看，负责我们培训的人似乎无法选择最能增进国家荣誉的东西，并将其提升到共同目标之上以便通过这些辉煌的榜样激发民族自豪感。

在当时，这样的课程会被视为沙文主义，当时并不具有令人愉快的气息。

王朝爱国主义的吹毛求疵比炽热的火焰更容易被接受和容忍最高的民族自豪感。前者总是可以被强迫服役，而后者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一股主导力量。

君主爱国主义在退伍军人协会中终结，而热情的民族爱国主义或许会开辟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目标很难确定。这种民族热情就像一匹纯种马，不会容忍任何类型的骑手骑在马鞍上。

难怪大多数人都选择逃避这种危险。似乎没有人认为有一天，一场战争可能会考验这种爱国主义的勇气，炮火轰击和一波波毒气袭击。

但当爱国热情真正到来时，我们却遭到了可怕的报复。

非常热衷于为他们的帝国和皇家君主而死，而另一方面，“民族”一词并不被大多数士兵所承认。

自从德国发生革命以来，君主制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教授历史的目的仅仅是增加客观知识的存量。

现在的国家不需要爱国热情，但它永远不会得到它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王朝爱国主义未能在当时产生最高抵抗力量，而当时的原则如果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就更不可能激起共和热情。

毫无疑问，德国人民不会在战场上站上四年又一年。

为“为了共和国”的战斗口号而奋斗了一年半，其中最不重要的是那些创造了这个宏伟的机构。

事实上，这个共和国之所以能够不受干扰地存在，是因为它已经做好准备向所有人保证愿意向外国人进贡和赔款，并签署任何形式的领土放弃。

世界上其他人都对此表示赞同，就像弱者总是更受那些想要让他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但事实上，敌人喜欢这种形式的是对政府最严厉的谴责。

他们热爱德意志共和国并容忍它的存在，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工具了。

发现可以帮助他们奴役我们的人民。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这位宽宏大量的机构得以生存。

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放弃任何真正的国民教育体系，并且可以在属于帝国旗帜组织的英雄们高呼欢呼，但实际上这些英雄们如果要求英雄们用鲜血捍卫这面旗帜，他们就会像兔子一样逃走。

民族国家必须为生存而战。它既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生存，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确保生存。签署道威斯计划等文件，但为了生存和保卫它，它需要的正是这些我们的现行制度认为它可以免除这些东西。



它的形式和内在的民族性越有价值，嫉妒和反对就越大它的对手。最好的防御不是它所拥有的武器，而是它的公民。

保护它的不是堡垒，而是男男女女们充满热情的活墙热爱国家和具有炽热爱国精神的民族主义者。

因此，关于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考虑的第三点是民族国家必须认识到，科学也可以成为一种手段弘扬民族自豪感。

不仅世界历史，而且整个文明史，都必须在这项原则的伟大之处。发明家不仅要表现出作为发明家的伟大，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一员。

对伟大成就的沉思所引起的钦佩必须转化为为自己种族中的一个人被选中来完成这一任务而感到自豪和满足。

但在德国历史上众多的伟人中，最伟大的人必须被选出来，呈现给我们的年轻一代，成为支持民族精神。

从这一原则的角度看，主题应该有系统地组织起来，并且教学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导向：男孩或女孩在离开学校后，不会成为一个半和平主义者，一个民主党人或者类似的人士，但却是一个全心全意的德国人。

为了使这种民族感情从一开始就是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应该在年轻人的大脑还未成熟时就牢牢记住以下基本而不可动摇的原则。

可塑性：爱国的人只有通过愿意为国家福祉作出牺牲。

不存在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民族情感，根本不存在只包容特定阶级的民族主义。

欢呼并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赋予一个人自称是国民的权利，如果在欢呼声背后没有真心关心维护国家福祉。

只有当一个阶级不再令你感到羞耻时，你才会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

一个国家的一半陷入痛苦之中，被苦难和痛苦所折磨，甚至堕落或堕落的民族，呈现出如此不吸引人的形象，以至于没有人能为自己的归属而感到自豪它。

只有当一个国家所有成员在身体和道德上都健康时，归属感的喜悦这种情感可以不断增长并高涨到我们称之为“民族自豪感”的那种最高尚的感情。

但只有了解自己国家伟大之处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最高形式的自豪感。

民族主义精神和社会正义感必须融为一体青年。然后有一天，一个由公民组成的国家将会出现，他们将团结在一起通过共同的爱和共同的自豪感，我们将永远坚不可摧。

对沙文主义的恐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状，也是这个时代的无能为力的标志。

由于我们的时代不仅缺乏旺盛精力的一切，而且甚至找不到这样一种表现令人不快，命运永远不会选择它来完成任何伟大的事迹。因为地球上发生的最伟大的变化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们不是被热烈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激情所激发，而只是被资产阶级的美德所激发。和平与秩序。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正面临一场大革命。

唯一的问题是，其结果是否有利于人类的雅利安部分，或者永恒的犹太人是否会从中受益。通过以正确的方式教育年轻一代，民族国家必须确保一代人将崛起，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终极战斗中发挥作用。

世界的命运。

率先走这条路的国家将获得胜利。整个教育和民族国家要建立的培训必须把灌输工作视为其首要任务进入青年人的心中，赋予他们种族本能和种族理解主意。

任何男孩或女孩在离开学校之前，都必须对种族平等的意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纯洁性和保持我们种族血统纯正的重要性。

这样，我们种族存续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被确立了，我们人民未来的文化进步将得

到保证，因为所有的身体和精神训练都将除非它有利于一个愿意并决心继续存在下去的实体，否则它是徒劳的，保持其自身的特色品质。

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发生一些我们德国人已经感到遗憾的事情，或许迄今为止已经认识到了这场悲剧的严重程度。

甚至在未来，我们也注定只是粪肥文明，而不是当代资产阶级思想中平庸的意义上的文明。它认为一种失落的我们人民的同胞只是一个迷失的公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承认悲哀的是，我们的种族血统注定会消失。

通过不断地与其他种族混合，我们可能会把他们从以前的较低水平提升到文明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我们自己却永远从我们曾经达到的高度下降。

达到。

最后，从种族角度来看，这种训练也必须在军队服役中达到顶峰。

服兵役是德国普通公民接受教育培训的最后阶段。

接受。虽然民族国家非常重视身体和精神训练，但它还必须考虑同样重要的任务：选拔人才为国家服务。

这一重要项目目前被轻描淡写地忽略了。

一般来说，父母暂时处于较高地位的孩子，反过来，被认为值得接受高等教育。

在这里，天赋起着次要的作用，但天赋只能相对地被衡量。虽然一般来说文化水平可能不如城里的孩子，但农民的孩子可能比农民的儿子更有才华。

世代居高位的家族。

但城市儿童的优越文化本身与儿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无关。

才能，因为这种文化根植于更为丰富的印象，这些印象产生于更加多样化的教育和这个孩子所生活的环境。

如果农民父母的聪明儿子从小在类似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他的智力成就则截然不同。

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一个领域，一个人出生的环境意味着低于他的天赋。这就是艺术的领域。

在这里，一个人不能只是“学习”，而必须具有天赋，这些天赋以后可能会经历或多或少幸福的发展（指对已有事物的明智发展），金钱和父母的财产都不算什么。

这充分证明了天才并不一定与较高的社会阶层或财富。最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来自贫穷的家庭，许多来自贫穷国家的男孩最终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艺术家。

这并不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敏锐，但这一真理没有被认识和付诸行动有利于我们整个智力生活。

有人认为，这一原则虽然在艺术领域无疑是有效的，但并没有对于所谓的应用科学也具有同样的有效性。

的确，人可以通过训练获得一定程度的机械灵活性，就像贵宾犬可以被一个聪明的主人传授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但这样的训练并不能让动物使用他的才能实施这些诡计。

这对于人也同样适用。无论天赋如何，我们都可以教会人去通过某些科学练习，但在这种情况下，结果相当自动和就像动物一样，是机械的。

甚至可以通过强化课程来强迫智力平庸的人通过智力训练，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将保持无菌。

结果可能是一个人成为一本行走的知识词典，但却会失败。

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在每一个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已拍摄。

这样的人需要为每一项新的、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任务接受专门的训练，并且永远无法为人类的普遍进步作出丝毫的贡献。

仅仅灌输给人们知识最多只能使他们有资格担任政府职务在我们目前的政权下。

毫无疑问，在组成一个民族的全体个人中，有天赋的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找到。

知识的价值也会随着知识的枯竭而增加，这也是很自然的。

学习的动力来源于学习者与生俱来的天赋。

这一领域的创造性工作只有通过知识和才能的结合才能完成。

一个例子就足以表明我们当今的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多大的错误。

为了教育德国庸俗人，我们的插图报纸不时刊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第一次有黑人成为一名律师，一名教师，一名牧师，甚至是一名歌剧演唱家或其他类似的职业。

当资产阶级傻瓜惊讶地注视着这段文字时，它告诉他我们的现代教育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更狡猾的犹太人却认为这一事实是一个新的证据，他可以利用它来传播他想要感染的理论。

公共，即人人平等。

昏暗的资产阶级头脑根本不知道，发表的事实对他来说是一种罪过违背理性本身，用这种方法训练一个类人猿生物是一种犯罪精神错乱的行为。

出生，直到可以假装他已经变成了一名律师；而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属于最文明人种的人必须继续处于与他们不相称的地位。

他们的文化水平。

资产阶级的思想没有意识到，允许成千上万的天才人物仍然在无产阶级的沼泽中挣扎苦难而霍屯督人和祖鲁人则被训练去担任知识分子职业的职业。

因为这里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训练技术的产物，就像表演狗的情况一样。如果如果在聪明的种族中投入同样的关心和努力，那么每个人都会在这些事情上变得比以前更有能力。这种情况会变得如果有一天，情况不再是例外，而是天赋和才能不被看作是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想想看，年复一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没有才华横溢的人被认为值得接受高等教育，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拥有高超天赋的人无需接受任何形式的高等教育。

国家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尤其是北美制造的汽车近年来增长迅速，原因之一是，社会底层的有天赋的人被该国的高等教育比例比欧洲高得多。

大脑中储存的知识不足以做出发现。什么这里只有天赋所启发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现在时间并不看重这些礼物的价值。只有好的学习成绩才有价值。

这是民族国家需要完成的另一项教育工作。它不会是它的确保对已经存在的某个社会阶层具有主导影响力，但它的职责是吸引全国最有能力的人才，并提拔他们到合适的岗位和荣誉。国家的责任不仅仅是为普通儿童提供一定程度的教育，小学，但它也有义务让人才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向各种类型的人才敞开大学之门，无论他们来自哪个社会阶层它可能会出现。

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一支有才华的公共从学识贫乏的班级中选出领袖人物。

国家应该提供这种保障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在德国，它太过封闭和僵化，以至于它缺乏与外部世界的活生生的联系。

其下的类。

由此产生了两个恶果。首先，知识分子阶层既不理解，也不同情广大群众。它已经与群众断绝了一切联系，以至于它无法理解他们的心理。

脱离了人民。其次，知识分子阶层缺乏必要的意志——力量，因为这种能力在与世隔绝的有教养的圈子里总是比在原始人民群众。

上帝知道，我们德国人从来不缺乏丰富的科学文化，但我们总是相当缺乏意志力和决策能力。

例如，我们的政治家越是“知识分子”，就越是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在实际成就上。我们对世界大战的政治准备和技术装备确实存在缺陷这并不是因为管理国家的人才受教育程度太低，而是因为指导我们公共事务的人受教育过度，知识和智慧充斥其中，但却没有任何健全的本能，也没有活力或任何勇敢的精神。

我们国家的悲剧在于，在一个犹豫不决的总理的领导下，我们不得不为生存而战。哲学家。如果我们没有贝特曼·霍尔维格，而是有一位更健壮的哲学家，如果我们有一位伟大的人民作为我们的领袖，普通掷弹兵的英雄鲜血就不会白流。

我们的领导人所用的夸张的智力材料被证明是最好的进行十一月革命的恶棍的盟友。这些知识分子以吝啬的方式维护着国家财富，而不是将其征用来他们创造了其他人获得成功条件。

天主教会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示范。神职人员独身主义迫使教会其牧师招募不是从教会内部，而是逐步从人民群众中。

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独身主义在这种关系中的重要性。这就是正是这一古老制度具有了无穷的活力。

通过不断地从下层人民中招募教会要员，教会不仅能够与大众保持本能的联系，人口同时也要确保自己始终能够利用只存在于下层阶级。因此，这个巨大的有机体令人惊讶地年轻，它的思维灵活性和钢铁般的决心。

民族国家的任务是组织和管理其教育体系，以便现有的知识分子阶层将不断从下层获得新鲜血液的供应。

国家必须从国民中仔细筛选出那些具有天赋的人才，并确保他们为社会服务，无论是州本身还是各州部门，都不是为一个国家的成员提供收入的。

特殊阶层，只是要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然而，只有国家专门培训人员担任这些职务，这才有可能。

个人必须具备必要的基本能力和意志力。该原则并不仅适用于公务员，也适用于所有将要参加人民的智力和道德领导力，无论他们从事哪个领域。

一个民族的伟大，部分取决于它必须成功地培养出最优秀的他们在公共服务领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并且把他们安置在可以尽最大努力为社区谋福利的办公室。

如果两个实力相当、素质相当的国家发生冲突，那么获胜的国家将是那个国家。胜利的这个国家，已经把智力和道德领导力托付给了最优秀的人才，并且这个国家将会衰落，其政府只代表特权群体的共同粮食供应，或者无论其成员的天赋如何，阶级都是平等的。

当然，在今天的世界里，这样的改革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立即提出反对意见，说对一个备受宠爱的儿子来说，这样的要求太高了。

例如，公务员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工作，因为其他人其父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似乎更有能力担任公务员职务。

只要人们仍然以今天的观点看待体力劳动，这一论点就可能有效。

因此，民族国家必须采取尊重体力劳动的态度这与现在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果有必要，它必须组织一个持久的教学体系，旨在废除当今愚蠢的习惯是看不起体力劳动，认为它是一种可耻的职业。

一个人的价值不应取决于他从事的工作，而应取决于他做事的方式。

这样做，并且对社区有用。

在这样一个时代，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可怕，因为在当今时代，最没脑子的专栏作家报纸工作人员比最专业的机械师更受尊重，仅仅是因为前者推动一支笔。

但正如我所说，这种错误的评价并不符合事物的真正本质。

人工引进，还曾有一段时间根本不存在。

当前这种不自然的状况，是那些普遍存在的病态现象之一，它源于我们的物质时代。

从根本上说，每一种工作都有双重价值：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理想的。物质价值取决于工作在社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接或间接受益于该工作的人口越多，将是它的物质价值。

这种评价体现在个人因其劳动所获得的物质报酬上。

与这种纯粹物质价值相反的是理想价值。

在这里，所完成的工作不是根据其物质重要性来评判的，而是根据其回答了一个必需的问题。

当然，一项发明的物质效用可能大于一项发明所提供的服务的物质效用。

普通工人；但同样肯定的是，社区需要每一个小小的日常服务和更优质的服务一样多。

从材料角度来看，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工作进行评价根据他们对社会的效用，区别表现在报酬尺度；但在理想或抽象的层面上，所有的工人在彼此平等的那一刻就变得平等了。

努力在自己的领域做到最好，无论该领域是什么。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根据这一点来评估，而不是根据所获报酬的数量。

在一个合理治理的国家，必须注意为每个人提供适合其需要的工作。

与他的能力相符。

换言之，人们将根据其天赋所指示的职位接受培训；但是这些天赋或能力是天生的，不能通过任何训练获得，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不是努力的回报。

因此，人们普遍受到同胞尊重的方式不应该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类型，因为这或多或少已经分配给个人。

鉴于个人受雇从事的工作类型取决于其自身情况以及他因此从社区接受的训练。他必须根据他完成社会赋予他的工作的方式进行评判，个人所做的并不是其存在的目的，而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他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使自己变得更好，将自己提升到更高的人格水平；但是他只能在社区中并通过社区做到这一点，他分享社区的文化生活，并且这个社区必须始终存在于国家的基础之上。

他必须为保护这些基础做出贡献。大自然决定了这种贡献。个人有责任热情而诚实地回报社会，社区给予他的。

做到这点的人值得最高的尊敬和尊重。物质报酬可以给予他的劳动对社会有相应的效用；但理想的报酬必须是每一个用自然赋予的任何力量为国家服务的人都有权享有尊重这些能力都是他在国家教育体系中接受的训练所培养出来的。

社区。那么，成为一名诚实的工匠就不再是可耻的，而是一个源泉作为一名无能的政府官员，浪费上帝的光阴，偷窃每日的面包，是一种耻辱来自诚实的公众。

那么，很自然地，职位不应该给予那些它们的本质无法填补这些空缺。

此外，个人效率将成为平等参与权利的唯一标准一般民事事务中的法律基础。

当今时代正在走向自己的毁灭。它引入了普选权，并喋喋不休地谈论平等的权利，但却找不到这种平等的基础。

它把物质工资视为人的价值的体现，从而摧毁了最高尚的平等，因为平等不能也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工作但仅仅取决于每个人完成分配给他的特定工作的方式。

只有这样，出生的偶然性才能被排除在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之外，从而个人才能成为其自身社会价值的创造者。

在当今时代，整个群体的价值评估只取决于一个人他们各自收到的薪水，这一切是无法理解的，但那不是我们不应该再支持这些想法的原因。

相反，在一个内在患病和腐朽的时代，任何想治愈它的人必须首先有勇气探究疾病的真正根源。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肩负起这一责任，它必须超越小资产阶级，团结和协调社区内所有那些因素它们适合成为新世界观的主角。

当然，有人会反对说，一般来说，很难区分材料和理想的工作价值观，而体力劳动的较低声望是由于事实上，从事这种工作只能得到较低的工资。

有人会说，较低的工资反过来又是体力劳动者获得更高收入机会较少的原因。

参与民族的文化，这样人类文化的理想方面对他来说就不那么开放了尽管这可能与他的日常活动无关。

或许可以补充的是，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是合理的，因为他的体力低下工资，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水平自然要低，而这反过来又是一个体力劳动通常被低估是有道理的。

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看到，在未来不应该有薪酬水平如此之大的差异。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在这样的条件：工作质量会更差。如果更精细，这将是颓废的最悲哀症状智力劳动只有通过更高报酬的刺激才能获得。

如果这种观点一直统治着世界，人类就永远不会实现其伟大的科学和文化遗产，最伟大的发明，最伟大的发现，最具有深远革命意义的科学成果和人类文化最宏伟的丰碑，并非因贪得无厌而给予世间。

相反，它们被给予世界的事实往往意味着放弃财富能买来的世俗快乐。

也许金钱已经成为今天主宰生活的唯一力量，但总有一天人类将再次向更崇高的神灵鞠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很多东西都归功于对金钱和财产的渴望，但所有这些之中，几乎没有什么会因为缺少了它们而导致世界变得更加贫穷。

我们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期盼有一天个人能够得到他人生目标所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将坚持这样的原则：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物质享受。

这一原则将体现在合理限制工资和薪金规模上，这将使每个人，包括最卑微的工人，只要他们尽职尽责，都要过着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过着光荣而体面的生活。

请不要说这只是一个空想，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容忍它实践本身是不可能实现的。

甚至我们也不会简单地相信，将会有有一个时代不再有缺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免除为消除缺陷而斗争的义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克服缺点，向理想努力奋斗。

无论如何，我们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总是会给我们的愿望。但这正是人类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去实现最终目标的原因。不失败必须迫使他放弃自己的意图，就像我们不能拒绝正义的支配一样因为法律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就像我们不能轻视医疗一样科学，因为尽管如此，疾病总是存在的。

人应该注意不要对理想的力量估计过低。如果有些人对现状感到沮丧，如果他们碰巧也当过兵，我会提醒他们，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力量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理想动机。人们牺牲生命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日常面包的关注，而是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伟大的信念，以及为实现维护国家荣誉。

只有在德国人民放弃这些理想，接受物质承诺之后革命后，他们才把武器换成了背包，然后——而不是进入人间天堂——他们有没有想过进入普遍蔑视和普遍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用对理想主义的信仰来对抗唯物主义共和国的算计。

帝国。

### 第三章 公民和国民状态

现在被错误地称为国家的机构通常把人分为两类——公民和外国人。

公民是所有拥有充分公民权利的人，无论是由于出生还是由于法律规定。

归化。外国人是指那些在其他国家享有同等权利的人。

在这两类之间，存在着某些类似于流星现象的生物。

他们没有任何州的公民身份，因此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公民权利。

如今，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出生在某个州境内，便可获得公民权利。

他所属的种族或国籍并不重要。

一个曾经生活在德国保护国的黑人的孩子，现在承担起他的在德国居住就自动成为世人眼中的“德国公民”。

同样，任何犹太人、波兰人、非洲人或亚洲人的孩子都可能自动成为德国人公民。

除了通过出生在特定国家而获得的国籍之外，国，还存在另一种国籍，可以以后取得。

这个过程需要满足各种初步要求。例如，一个条件是，如果有可能，申请人不能是窃贼或者皮条客。

他的政治态度必须不会引起不安；换句话说，他必须是一个政治上无害的傻瓜。

要求他不得成为他希望成为公民的国家的负担。在此在我们这个现实的时代，最后一个条件自然仅仅意味着他不能成为经济负担。

如果候选人的财务状况表明他可能是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将有助于他更快地获得公民权利。

种族问题根本不重要。

获得公民权利的整个过程与被接纳的过程没有太大区别例如，汽车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一个人提出申请；申请被审查；受到制裁，有一天，这名男子收到一张卡片，通知他已成为

公民。

信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提供。迄今为止一直是祖鲁人或卡菲尔人的申请人告知，“通过这些礼物，你已经成为德国公民了。”总统可以施展这个魔法。上帝自己做不到的是一些公务员的泰奥弗拉斯托斯·帕拉塞尔苏斯做到了这一点。一笔一划，一个蒙古人奴隶立刻就变成了真正的“德国人”。

不仅没有人询问新公民属于什么种族，甚至连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没有受到调查。

他的肉体可能因梅毒而腐烂；但他仍然会受到现今国家的欢迎，因为只要他不太可能成为经济负担或政治威胁。

就这样，年复一年，那些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生物吸收了有毒物质，他们几乎永远都无法克服。

公民与外国人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可以进入所有公共场所。

他可能必须服兵役，作为回报，他被允许被动或主动地参与公共选举。

这些是他的主要权利，因为就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而言，外国人享有与公民享有相同程度的保护，有时甚至更多。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现在德意志共和国的情况。我完全明白，没有人愿意听到这些事情，但很难找到比我们的更不合逻辑或更疯狂的事情有关国家公民身份的当代法律。

目前有一个国家正在至少做出微弱的尝试来遵循更合理的在这方面，原则是这样的。然而，在我们模范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不是在美国，我们正在努力至少部分地符合常识的规定。拒绝允许健康状况不佳的移民入境，以及排除某些种族成为公民的权利，他们开始引入与我们希望建立民族国家所依据的原则类似的原则。

民族国家将把人民划分为三类：公民、国家臣民、和外星人。

原则是，出生在国家范围内的人只赋予其主体地位。它不附带担任国家职务或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例如主动或被动参与选举。

另一项原则是，必须证明每个国家臣民的种族和国籍。

臣民可以随时自由地终止其臣民身份并成为其所属国家的公民。

他因其国籍而属于该国家。

外国人与国家臣民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是该国公民。

另一个国家。

具有德国国籍的男孩，如果是德国公民，必须完成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接受学校教育。

因此，他接受了系统的训练，这将使他具有种族意识，并使他意识到他是民间社区的一员。

然后，他必须满足国家规定的有关体育锻炼的所有要求他离开了学校，并最终参军。

军队的训练是普遍性的。它必须对每一个德国人进行，并且使其能够满足军事服役的身体和精神要求。

公民权将赋予每一个健康和品格符合以下条件的年轻人：服完兵役后，被认定为优秀。

这项授予公民尊严的行为将是一个庄严的仪式，而文凭赋予公民权将被年轻人保留为最珍贵的见证在他的一生中。

它赋予他行使公民的一切权利，并享受与之相关的一切特权，国家必须明确区分那些作为国家成员的人和基础和支持其存在和伟大，以及那些居住在该州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在哪里谋生。

在获得公民证书时，新公民必须庄严宣誓忠诚于民族和国家。

这份文凭必须成为团结全国各阶层的纽带。它必须成为这个帝国的公民，哪怕只是一名清洁工，也比成为外国国王。

公民享有外国人所没有的特权。他是帝国的主人，但这崇高的荣誉伴随的是责任。

那些没有个人荣誉或品格的人，那些普通罪犯，那些叛徒，祖国，可以随时被剥夺公民权。



这样他们就恢复到仅仅是国家的臣民。

德国女孩是国家的臣民，但结婚后就成为公民。同时那些独立谋生的妇女有权获得公民身份，如果她们德国科目。

#### 第四章 人格与理想民族国家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主要职责是教育和促进那些构成国家构成要素的人，仅仅促进那些种族元素，教育他们，并最终训练他们进行实际生活。国家必须并调整其自身组织以满足这一任务的需要。

用一个人所属的种族来评价他的价值，同时又用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人人平等的原则，而没有决心追求我们自己的原则的逻辑结论。

如果我们承认血统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种族是人类的基本所有生命的基础元素，我们必须将逻辑后果应用到个体上这一原则。

总的来说，我必须根据不同的种族，对不同国家的价值做出不同的评估。

我必须区分一下，在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时，他们从他的自己的种族。

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的原则，也适用于一个民族的个体成员。

民族共同体，正如没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平等的，因为构成属于同一血液的元素在上千个细微的细节上存在差异，尽管它们都是本质上具有相同的质量。

认识到这个事实的第一个后果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有点粗鲁，试图帮助和促进民间社区中那些具有种族观点赋予其特殊价值，并鼓励它们增加和繁衍。

这项任务相对简单，因为它可以被识别并几乎机械地执行。

从大多数人中挑选出真正拥有最高的智力和精神特征，并把它们分配到那个领域这种影响不仅与他们杰出的才能相对应，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将在其中对国家有利。

根据能力和效率进行选择不能以机械的方式进行。这是一项工作这只能通过日常生活本身的永久奋斗来实现。

这种世界观否定了群众统治的民主原则，目的是把这个世界交给最优秀的人，也就是交给

人类最优秀的品质的人，也必须适用这一点对民间社区内的个人也实行同样的贵族公设。必须确保将领导职位和最具影响力的职位赋予最优秀的人才。

因此，它不是基于多数人的想法，而是基于个人的想法。

任何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与其他国家只能机械地，通过更好地构建其经济生活——由于贫困与富裕之间实现了更好的平衡，或者由于扩大到更广泛的决定经济进程的权力，或者更公平的工资制度，或者消除大量的工资水平的差异——只了解我们运动的表面特征当我们谈论我们的世界观时，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

上述这些特征并不能保证我们长久生存，当然也不会伟大的保证。

一个满足于外部改革的国家，不会有丝毫机会世界各国在普遍的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

一项运动如果将其使命限制在这样的调整上，无论它多么正确和公平，都会影响没有对现有秩序进行深远或深刻的改革。

这些措施的全部效果将仅限于外部。它们不会为国家提供只有拥有道德武器，它才能有效地克服这是我们今天所遭受的。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也许值得再次回顾一下真正的起源以及人类文化进化的原因。

人类明显超越动物世界的第一步是导致人类第一次发明。

这项发明本身源于人类用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的诡计和计谋。

与其他生物的生存斗争，并常常为他提供他唯一的手段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取得这场斗争的成功。

那些最初的非常粗糙的发明并没有揭示个人个性，因为后来的观察者，也就是现代的观察者，只承认他们是集体现象。

在动物中可以观察到的某些技巧和巧妙的策略引起了观察者的注意作为既定事实随处可见人类不再能够发现或解释其根本原因，因此他满足于称此类现象为本能。

在我们的情况下，这个术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每个相信更高进化的人生物体必须承认，生命欲望和生存斗争的每一个表现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在时间上的开始，并且只有一个主体一定第一次表现出来。

后来，这种做法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并传遍了更广泛的地区，直到最后进入了人类每个成员的潜意识，在那里它表现为'本能。'就人类而言，这一点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相信。人类的第一个熟练的战术是与其他动物的斗争无疑起源于拥有特殊能力的个体能力。

毫无疑问，个性是所有决定和成就的唯一因素后来理所当然地被全人类接管了。

这一点的一个确切例子可以在那些基本的军事原则中找到，这些原则现在成为一切战争战略的基础。

最初，它们源自一个人的大脑，经过许多年，也许即使几千年来，它们也理所当然地被广泛接受，并因此获得了普遍有效性。

人类通过第二次发现补充了他的第一次发现。除其他外，他学会了如何统治其他生物，并让它们在生存斗争中为他服务，就这样开始了人类真正的发明活动，这一点现已显而易见。

这些物质发明，始于使用石头作为武器，导致了动物的驯化和用人工方法生产火，直至许多奇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越清楚地揭示出个人作为发明者，我们就越接近我们这个时代，发明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具有革命性。

我们周围看到的所有物质发明都是由创造力和个人的能力，所有这些发明都帮助人类不断超越自己。

动物世界，并以一种绝对明确的方式将自己与这个世界区分开来。

因此，它们从根本上促进了人类的持续进步。

最原始的技巧曾经帮助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当他在荒野中狩猎时原始森林，今天正在以奇妙的科学发明的形式为他完成，帮助他进行当前的生命斗争并锻造未来斗争的武器。

最终，人类的一切思想和发明都帮助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奋斗，即使一项发明、一项发现或者一项深奥的科学理论的所谓实用性，乍一看可能并不明显。

一切都有助于使人类越来越高于其他所有生物的水平。

围绕他，从而加强和巩固他的地位，让他发展得更多，作为地球上的统治者，它在各个方面都更加因此，一切发明都是个人创造力的结果，而所有这些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人类的恩人。

通过他们的工作，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获得了这有助于他们的生存斗争。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物质文明的起源是创造性思维，作为相互补充并继续其前辈所开展的工作的个体，就这些发明和发现的实际应用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对于所有各种生产方法反过来也是发明，因此依赖于个人的创造能力。

即使是纯粹的理论工作，也无法用明确的标准来衡量，而且是所有后续的技术发现，都完全是个人大脑的产物。

人类整体不会发明创造，大多数人也不会组织和思考，只有少数人个人。

因此，人类社会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组织良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创造力，并利用他们的工作造福社区。

一项发明最有价值的因素，无论是在物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抽象思想的世界，是发明家本人的个性。

一个有组织的民间社区的首要职责是让发明者处于在那里他可以为大家带来最大的利益。

事实上，该组织的目的就是将该原则付诸实践。只有这样，它能否摆脱机械化的魔咒，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它本身就体现了将有才智的人置于大众之上，并使大众服从前者。

因此，组织不仅无权阻止有才智的人超越相反，它必须利用其组织力量，使人民能够并促进他们的尽可能地进步。

它必须从这样的原则出发：人类的福祉从来 not 来自群众，而是来自个人的创造性大脑，因此他们才是人类真正的恩人。

确保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发挥决定性影响力，并促进他们的工作。这种共同利益肯定不会通过让大众统治而得到满足，因为这不是它不具备思考能力，也不高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它是有天赋的。

只有那些具有天生气质和领导天赋的人才适合统治。

我已经说过，这些有头脑的人主要是通过艰苦奋斗选拔出来的。

存在本身。

在这场斗争中，许多人崩溃了，从而表明他们不是命运召唤他们去担任最高职位，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归类为在选民之中。

在思想和艺术创作领域，甚至在经济领域，同样的过程即使在今天，选择仍然在发生，尽管——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它的运作身患重伤。

同样的选择原则也适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和武装力量。

以国家有组织的军事防御为代表。

人格的观念，个人对下属的权威，以及个人对上级的责任在每一方面都占主导地位只有在政治生活中，这个非常自然的原则才被完全忽视。

虽然整个人类文明完全是个人创造活动的结果，但“多数决定一切”的原则在整个国家社会中，尤其是在其行政管理中，由此毒害逐渐渗透到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造成了真正的分解。

犹太教在民族团体不同地方的破坏性活动可以归因于从根本上说，犹太人一直试图破坏人格的重要性。

以国家为东道主，以群众的统治取代个人的统治。

因此，雅利安人性的建设性原则被人类的破坏性原则所取代。

犹太人。他们是腐烂的酵素。

从广义上讲，他们也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犹太人努力消除主流人格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并用数字的力量来取代它。

群众。

在政治上，议会制政府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致命影响无处不在，从最小的教区议会到最高的政府在帝国内部的各个圈子。

在经济领域，我们有工会运动，它并不服务于工人的真正利益。

雇员，而是国际犹太人的破坏性目标。在同样的程度上，原则人格被排除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之外，以及国家的影响和活动。

取而代之的是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应该为人民服务 and 造福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将逐渐衰退。

工会委员会不关心员工的利益，而是试图影响生产过程，也起到同样的破坏作用。

它们损害了整个生产，从而损害了个人从事工业，因为从长远来看，仅仅满足大众的需求是不可能用冠冕堂皇的理论词句。

这些只能通过提供满足日常生活个人需求的商品来满足，并且建立起这样的信念：通过其成员的富有成效的合作，民间社区服务于个人的利益。

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其群众理论的基础上证明自己有能力接管和对于发展现有的经济体系来说，这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是对是错的问题，不能用任何试验来决定。

这表明它可以为未来管理今天已经存在的东西。它只需要问它是否具有创造力，能够按照自己的原则建立一个文明，将会是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对应物。

即使马克思主义有千倍的能力接管我们现有的经济制度，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维持它的运行，一项成就并不能证明什么。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根据其自身的原则，永远无法创造出任何可以取代现存事物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证明了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它不仅不能创造一个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己的文化或经济体系；但它甚至无法发展，根据它有自己的原则、它所拥有的文明和经济体系。它必须做出妥协，回归个性原则，也不能在其自身组织中放弃这一原则。

民族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着根本区别，因为前者认识到种族的重要性，因此也认识到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并做出了这些其结构的支柱。

这些是这种世界观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如果它不理解这一基本原则的根本重要性，那么它就应该满足自己从外部修补现在的国家，并采用多数原则，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与马克思主义竞争。因此它不会称其自己为世界观的权利。

如果这场运动的社会纲领在于消灭个性，并取而代之的是群众，那么国家社会主义就会被马克思主义的毒药所腐蚀，正如我们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

民族国家必须确保其公民的福祉，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个人都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生产效率。所有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从而确保个人在一般输出。

因此，民族国家必须毫不留情地从政府领导层中清除国家实行议会制，即通过多数决制来决定权力投票权掌握在群众手中。必须以个人责任取而代之。

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最好的宪法和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这使得最优秀的大脑能够达到在社会上具有主导地位 and 影响力。

正如在经济学领域，杰出人才不是从上层选拔出来的，而是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脱颖而出就像有一个永不停歇的教育过程一样从最小的商店到最大的事业，就像生活本身提供必要

的测试，所以在政治领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现”政治人才。

注意。

非凡的天才排除了对普通人要求的考虑。在组织，国家必须建立在人格原则之上，从最小的并晋升为国家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没有任何决定是通过多数票做出的，而是由负责人，“理事会”一词也再次恢复其原来的含义。

每一个肩负重任的人身边都会有顾问，但决定权在于仅此一个人。

使前普鲁士军队成为令人钦佩的德意志民族的工具必须成为我们国家宪法的基础，也就是说，每位领导者必须对下属拥有充分的权力，并且他必须对下属负责那些在他之上的人。

即使到那时，我们也离不开那些我们目前称之为议会的组织，但他们将是真正的委员会，因为他们必须提供建议。责任可以必须由一个人承担，只有这个人才有权和权力命令。

议会本身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议会才能为领导人提供机会，他们将随后被委以特别重要的职位，并逐渐获得权力。

以下是该组织将要展示的图片的轮廓。来自市政行政管理由帝国政府负责，民族国家将不会有任何机构代表们通过多数票做出决定。

目前，它只有咨询机构来协助选定的领导人，他将分发其中包括他们要履行的各种职责。

在某些领域，如果有必要，他们可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例如每个公司的领导者或总裁在更大范围内所拥有的责任。

原则上，民族国家必须禁止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征求意见的习俗（例如经济学）来自完全不称职的牧师，因为他们缺乏特殊的此类事务的培训和实践经验。

因此，国家必须将其代表机构划分为政治议院和代表各个行业和专业商会。

为了确保这两个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将设立一个选定的机构或参议院永远是他们。众议院和参议院不会进行投票。他们将成为工作而不是投票机。

各成员将拥有咨询投票权，但不具备决定权对此，决定权完全属于总统，他必须完全负责就正在讨论的事项。

这种绝对权威与绝对责任会逐渐导致一批精选的领导者出现——这是在现今不负责任的议会制时代这是不可能的。

从而使国家的政治建设与这些法律相协调，这个国家已经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享有盛誉。

关于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事实上，议会民主制原则，即通过议会制定决策，多数票并不总是统治世界。

相反，我们发现它只在历史的短时期内盛行，而且这些时期一直国家和政府衰落的时期。

然而，我们决不能相信，这种彻底的改变能够通过纯粹的理论性质，自上而下运作。我所描述的变化不可能不仅限于改变一个国家的宪法，而必须包括各个领域立法和整个公民生活。这样的革命只能通过一场本身就组织起来的运动来实现这些原则的脉络，从而在其自身有机体中孕育出未来国家的萌芽。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好完全熟悉今天就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在自己的组织内，它不仅能够为未来的国家提供指导，而且迄今为止已经完成了其自己的宪法，以便由国家自行支配。

## 第五章 世界观与组织

我试图勾勒出的民族国家轮廓，到那时还无法成为现实。

因为我们知道它存在所必需的条件这一简单事实。

仅仅知道这样一个国家会呈现出什么样子是不够的。其基础的问题是更为重要。

目前存在的政党，从国家获取利润，不能有望彻底改变政权，或自行改变态度倡议。

这变得更加不可能，因为现在那些掌管事务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发展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导致全犹太预言的实现，即犹太人有一天会吞噬其他国家并成为地球的主宰者。

与数百万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比，他们正跌跌撞撞地走向自己的毁灭，主要是由于胆怯、懒惰和愚蠢，犹太人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道路，并保持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自己的未来目标。

他领导的任何政党，除了他的利益之外，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战，而他的利益当然也与雅利安民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理想国家变成现实，我们必须独立于现在控制公共生活的力量，并寻求新的力量，这些新的力量随时准备有能力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

必须进行斗争，因为首要任务不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理念，而是要消灭现存的犹太国家。

正如历史进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主要的困难不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事，而是为了它的建立扫清基础。

偏见和利己主义联合起来，形成反对新思想的共同阵线，尽一切办法阻止它的胜利，因为它对他们来说是不愉快的，或者威胁到他们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新思想的主角不幸地尽管渴望建设性的工作，被迫首先进行一场破坏性的战斗，以废除现存的事。

其原则是全新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学说重要性必须采用尖锐的批评作为武器，尽管这可能证明令个别追随者不快。

如果支持者认为，所谓的伪民族主义运动一再强调，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采用负面批评的方式，但只会从事建设性的工作。

这不过是幼稚的闲聊，是这个组织追随者们所说的一切废话的典型。

民族主义狂热。这再次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印象。

思想。

马克思主义也有其追求的目标，它被新运动所吸引和接受，通过展示某些新事物的必要性。相反，很容易发生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会并存，世界观一旦转变为政党，它就无法超越政党的水平此后，世界观便变得不宽容，无法允许另一种事物与它并存。

它专横地要求承认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并坚持要求完全的按照它的观点，对公共生活的各个部门进行改革。它绝不能让先前的状态将随之而继续存在。

宗教也是如此。基督教并不满足于建立自己的祭坛。它首先要摧毁异教祭坛。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不宽容，一个绝对的信仰能够成长，而不宽容是这种信仰成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在这些现象中，我们发现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必须承认，犹太人的思想，这种狂热和不宽容是犹太人心态的典型症状。

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可能会对此感到遗憾，并带着这样的感觉注意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这让人感到不安——但事实上，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

这不是那些希望把我们德国民族从现状中解放出来的人的事。

现在，他们脑子里充满了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如果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那该有多好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必须努力寻找方法和手段来废除实际存在的东西。

一种由狂热的不宽容精神所激发的生活哲学，只有通过以同样热情的精神推进的、以同样坚定的意志和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想法，纯粹而绝对真诚。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遗憾，基督教的出现是人类第一次这种精神恐怖被引入到更加自由的古代世界，但这一事实不容否认从那时起，世界就一直被这种胁迫所渗透和主宰，只有以暴力才能制止暴力，只有以恐怖主义才能制止恐怖主义。

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建设性的工作创建新的政权。

政党容易做出妥协，但世界观从来不会这样做。

一个政党甚至会考虑对手，但世界观却宣称自己的绝对正确。

政党在一开始几乎总是有确保独占和专制权力的意图为他们自己统治。

它们总是表现出一种成为世界观的轻微倾向，但它们的有限性纲领本身就足以剥夺它们世界观所要求的英雄精神。

和解精神激发了他们的意志，吸引了那些心胸狭窄、胆小怕事的人不适合参加任何十字军东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大多被困在自己的游行初期就出现了可悲的琐事。

他们放弃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战，通过所谓的“积极合作”，它们试图尽快地把自己挤进现存低谷的某个微小的地方制度，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坚持下去。

他们的全部努力都到此为止，如果他们被挤下普通的马槽，竞争对手的行为更加粗暴，那么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再次强行闯入，用武力或者在所有其他有类似欲望的人中要花招，以重回前线划船，最后——甚至以牺牲他们最神圣的信念为代价——重新享受那是他们最喜爱的、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他们是政治的豺狼。

一种世界观永远不会主动地为另一种世界观让步。

因此，它绝不会同意以它所谴责的任何方式进行合作。

相反，它感到有义务用尽一切手段来对抗旧秩序以及属于该秩序的整个思想世界，并为它的毁灭做好准备。

这些纯粹破坏性的战术，其危险性很容易被敌人察觉，因此他们形成统一战线，共同防御并采取建设性策略，必须积极进取，才能将新思想世界推向成功——这两个阶段斗争需要一群坚定的战士。任何新的世界观都将在只有当其时代和人民中最勇敢、最活跃的元素在其标准下报名参加并牢固地团结在一个强大的战斗组织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绝对有必要从一般的意识形态中挑选出某种很多想法会吸引这些人，而且一旦这些想法被表达出来，精确而明确的形式，将成为新人类协会的信仰条款。

虽然普通政党的纲领只不过是实现在下次大选中取得有利结果，世界观纲领代表着向现存秩序、现状宣战，简言之，向建立了世界观。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为这种新理论而奋斗的人都需要有充分的掌握运动领导者的最终思想和计划。

每个人只要对基本思想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并且彻底吸收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这样他就会相信将这一运动及其教义推向成功的必要性。

单个士兵不会了解高级战略计划的秘密，但他会接受训练服从严格的纪律，坚信其事业的正义性和内在力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此。

同样，运动的追随者也必须了解其深远的影响目标，并意识到它受到强大意志的激励，并且前途光明。

假设军队中的每个士兵都是将军，如果仅从训练和能力来看，那支军队不会成为一支有效的作战工具。

同样，如果一场政治运动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我们也需要士兵。没有他们就没有纪律可以成立。

从本质上来说，一个组织只有在高智力的领导者和大量对这一事业充满感情的男性。

为了维持一个由二百人组成的连队的纪律，从长远来看，拥有同等的智慧和能力会比维持纪律性在一个由一百九十名天赋较差的人和十名有较高天赋的人组成的公司中教育。

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从中获益。他们把我们广大的那些刚刚服完兵役、学会遵守纪律的人，使这些群众服从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纪律，而这个组织同样比年轻人在军事生涯中接受的纪律更严格训练。

社会民主党组织由一支分为军官和士兵的军队组成。德国完成兵役的工人成为该军队的列兵，犹太知识分子是其官员。

德国工会的工作人员可以比作它的士官。事实上，我们的中产阶级总是沮丧地认为，只有所谓的未受过教育的人阶级加入马克思主义者是这个党获得成功的基础。

因为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它们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只是一支软弱无能的一群没有纪律的个人——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是由智力低下的一群人组成的人类材料是一支由党派战士组成的军队，他们盲目地服从他们的犹太主人，就像他们一样以前服从他们的德国军官。

德国中产阶级从来不担心心理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这些问题更优秀，认为没有必要去深刻地思考这一事实的意义以及其中隐含的危险。

事实上，他们认为，一个完全从因此，知识界必须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并且有更好的机会成功，甚至比一个由政党组成的政党更有可能执掌国家政府。

无知的大众。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政党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其成员的智慧 and 独立精神，而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的知识领袖。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领导本身。当两支部队排列成殊死搏斗，胜利不会落到每个士兵都精通战术的那一方。

战略规则，而是倾向于拥有最好的领导者，同时也拥有最好的纪律最严明、最服从命令、训练有素的部队。



这是我们在研究可能性时必须始终牢记的一个基本事实将世界观转化为现实。

如果我们同意，为了将世界观付诸实践，它必须融入战斗运动，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这种运动的纲领必须考虑到其可支配的人力材料。正如最终目标和基本原则必须绝对明确和易于理解，因此宣传纲领必须精心设计，必须受到其对人们心灵的心理吸引力的敏锐感觉的启发。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最崇高的理想也将永远停留在幻想的境界中。

如果民族国家这个目前还模糊的理想有一天能够得到明确和为了获得确定的成功，它必须从模糊而庞大的思想中提出某些确定的这些原则的本质和内容旨在吸引广大的追随者。

换句话说，有这样一群人，才能保证这些原则会被争取。

这群人就是德国工人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新运动的纲领被浓缩为几个基本原则，总共二十五个。

它们的目的首先是让普通人大致了解该运动的目标。

可以说，它们是一种信仰的表达，一方面是为了赢得信徒，另一方面是为了运动，另一方面，它们旨在将这些信徒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盟约，都已订阅。

在这方面，我们决不能忽视以下事实：我们所谓的运动就其最终目的而言是绝对正确的，但就其方式而言制定该计划时必须考虑某些心理因素帐户。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观点：某些原则应该表达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任何尝试不同的表达方式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本应固定、不可动摇的东西因此成为讨论。

一旦从教条肯定的范围内移除一个点，讨论就不会只会导致一种新的、更好的配方，这种配方将具有更大的一致性，但可能很容易导致无休止的争论和普遍的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始终认真考虑是否要采用一种新的、更最好有适当的表述，尽管这可能会在运动内部引起争议，或者是否保留旧的公式更好，尽管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它代表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固体的、内部同质的有机体。

每次测试都表明，第二种选择更可取，因为在这些变化中，只处理外部形式，这种修正总是看起来是可取的和可能的，但决定因素是人们通常思考肤浅，因此最大的危险是这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纲领表述，人们将看到一个基本目标运动。这样，为理想服务的意志和战斗力就被削弱了，应该导向外部世界的能量被浪费在了纲领性的运动内部的讨论。

对于一个在主要特征上确实正确的学说来说，保留其表述方式危险性较小。

这可能已经不够了，而不是试图改进它，从而允许一个运动的基本原则，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如花岗岩般坚固，成为普遍讨论的主题，可能会带来不幸的后果。

只要运动仍在为胜利而战，就尤其要避免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怀疑和不确定性存在，就有可能激发人们对教义真理的盲目信仰受到其外部配方不断改变的鼓舞？教义的本质绝不应在其外在公式中寻找，而应在其内在意思，这是无法改变的。

人们只希望，为了这种内在意义，一场运动可以排除一切为了保持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趋向于瓦解和不确定性这对于其胜利是必要的。

天主教会在这方面又一次给我们上了一课。尽管有时，而且经常相当它的教条体系与精确科学和科学发现，它并不愿意牺牲其教义的任何一个音节。

它正确地认识到，如果引入更多或较少的教义调整来应对暂时的科学发现，而这些发现实际上总是动摇，而是从它坚守其固定和既定的事实中获得力量。

只有教条才能赋予整个体系信仰的特征。

这就是它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原因。我们可以预言，作为一颗恒星在转瞬即逝的现象中，它将继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将成为人们越是盲目地执着于它，周围现象的变化节奏就越快。

因此，无论谁真心诚意地希望民族世界观取得胜利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一场斗争运动才能确保这一胜利，而且运动必须建立在坚不可摧、界限分明的花岗岩坚固性之上程序。

在它的公式方面，它绝不能向时代精神让步，而必须保持已经一劳永逸地决定为正确的形式——无论如何，直到胜利为其努力锦上添花。

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任何试图就这一或纲领中这一点可能会瓦解人民阵线的团结和战斗力。

运动，根据其追随者可以参与这种内部争议。

今天提出的一些“改进”明天可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以便第二天用更好的东西代替它。

一旦障碍被打破，道路就被打开了，我们只知道开始，但我们不知道它会通向哪片无边无际的大海。

这一重要原则必须在实践中得到国家社会主义党成员的承认从一开始就运动。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在其二十五点纲领中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

运动的现有和未来成员绝不能感到自己被要求对这些假设进行批判性修订，而是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它们付诸实践站着练习。

否则，下一代也会同样有权利把精力花在这样的党内纯粹的形式工作，而不是为运动赢得新的追随者，从而增强其威力。

对于我们大多数的追随者来说，运动的本质并不在于字面意思我们的论点就像我们赋予它们的意义一样。

新运动因这些考虑而得名，后来制定了其纲领与他们相一致。

这是我们宣传的基础。为了将民族理想推向胜利，一个人民党必须建立一个不仅由知识分子领袖组成，而且由实践者组成的政党劳动者。

任何试图在没有激进组织帮助的情况下实施这些理论的尝试都将是今天它注定会失败，正如它过去失败过一样，将来也必然会失败。

因此，运动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将自己视为这些思想的拥护者和代表。

正如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基于民族主义思想一样，民族主义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的。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它就必须毫无保留地坚持这一事实，而且在这里它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格强调，任何试图代表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之外，民族主义思想是徒劳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欺诈。

如果有人指责我们的运动“垄断”了民族主义思想，答案只有一个。我们不仅垄断了民族主义思想，而且，对于所有实际的意图和目的，我们创造了它，因为迄今为止以这个名字存在的事物并不在最不能影响我们人民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些想法都缺乏政治和连贯的表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过是一些或多或少正确的孤立和不连贯的观点。

这些往往是公开互相矛盾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任何它们之间的内部凝聚力。

即使存在这种内部凝聚力，它也太弱了，无法形成任何运动。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才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

现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协会和团体都自诩为民族主义。这是国家社会主义所作工作的结果。

没有这项工作，所有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根本就不会想到采用 *völkisch* 这个词。

这句话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与这样的想法无关。

直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的工作才使这个想法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意思是它出现在各类人的嘴里。

最重要的是，我们党通过宣传的成功，展示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力量——其他人为了争取信徒，不得不效仿我们的例子。

至少用言语来说。

正如他们以前利用一切手段来达到他们微不足道的选举目的一样，今天他们利用民族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外在的、空洞的短语，其目的是抵消国家社会主义党给其他党派成员留下的印象的力量派对。

只有保持其存在的愿望和对我们的运动可能获胜的担忧，因为它是基于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世界观，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运动的性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危险，只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才使用这样的词语他们八年前否定了，七年前嘲笑了，六年前被打上了愚蠢的标签，打击了五年前被憎恨，四年前被憎恨，三年前被嘲笑，最后，两年前被吞并和融入到他们现在的政治词汇中，作为他们斗争的口号。

因此，现在也必须继续呼吁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政党对德国民族需要什么一无所知。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使用 *völkisch* 这个词的方式很肤浅。

同样危险的是那些到处宣扬民族理想的人这些奇妙的计划大多只基于一个固定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本身可能对。但因为它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对于形成一个伟大的同质的战斗协会，绝不能作为其组织的基础。

那些编造出一部分由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一部分由别人的想法组成的计划的人他们在某处读到的从别人那里偷来的物品往往比民族主义思想的直言不讳的敌人。

他们充其量是无用的理论家，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恶作剧的煽动者。他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掩饰自己在知识上的虚荣心、努力的徒劳无功和能力的缺乏：留着飘逸的胡须，做出古日耳曼风格的手势。

因此，面对所有这些徒劳的尝试，值得我们回顾一下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战斗。

## 第六章：我们的第一阶段斗争的意义口语

1920年2月24日，我们在 Hofbräuhaus 的 Festsaal 举行了第一次盛大的聚会，当我们开始准备下次会议时，这种热情还没有消退。

到那时为止，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是否应该每天举行一次小型会议。

每个月，或者最多每两周，在慕尼黑这样的城市；但现在我们决定应该举行一次每周举行群众会议。

不用说，我们每次都会焦虑地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人民会他们会听吗？我个人坚信，如果他们来了，他们就会留下来听。

在那段时期里，慕尼黑皇家啤酒屋的大厅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神秘意义。

每周都会有一次会议，几乎总是在那个大厅里举行，而且每次大厅都挤满了人比以前更加引人注目，我们的公众也更加关注。

从当时无人关心的“战争责任”这个主题开始，关于和平条约的讨论，我们处理了几乎所有有助于激发听众的思想并使他们对我们的想法感兴趣。

我们提请关注和和平条约。新运动那些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一次又一次预言的预言几乎在每一个细节。

今天谈论和写作这些事情很容易，但在当时，批评凡尔赛宫举行了一次公众群众集会，参加者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

是由煽动者煽动起来的，相当于对共和国的攻击，也是即使不是君主主义的，也是反动的倾向。

一旦有人对《凡尔赛条约》提出批评，人们就会立即”他的回答几乎成了老套路，“那么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又怎么样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然后人群开始窃窃私语，窃

窃私语逐渐增强为咆哮，直到演讲者不得不放弃说服他们的尝试。我们觉得我们我们对这样的公众彻底绝望了。他们既没有不想被告知也不想承认凡尔赛条约是一桩丑闻和耻辱，而且这意味着对我们人民的一次拦路抢劫行为。

马克思主义者的破坏活动和敌人的恶毒宣传夺走了这些人有他们的道理。

我们也没有权利抱怨，因为德国方面负有巨大的罪责。

德国资产阶级已经停止了这场可怕的分裂运动，反对了它，并且通过对这一事实给出更好、更彻底的解释，开辟一条认识真理的道路。

比马克思主义者给出的情况更糟糕的是，根本没有。

那时我从未见过那些如今成为人民伟大使徒的人。也许他们曾对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的茶话会上，但他们本应该在那里，在那里狼在工作，他们从来不敢露面，除非他们找到机会大叫与狼一起演唱会。

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清楚地看到，对于最初组成我们运动的一小群人来说，战争罪责问题必须澄清，而且必须根据历史真相予以澄清。

我们运动未来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它应该带来知识和平条约的意义在群众心中的体现。在群众看来，和平条约标志着民主的成功。

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相反的立场，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民是和平条约的敌人，所以后来，当这个卑鄙的欺诈行为的丑恶行径应该被揭露，人们会回想起我们当时的态度并给予我们信任。

即使在那时，我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如果舆论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偏差，根本问题，必须反对它，无论受欢迎程度、仇恨程度或苦涩程度如何的战斗。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不应该成为舆论不能服务于群众，而要主宰群众。

在每个运动中，特别是在其挣扎阶段，自然存在着诱惑遵循对手的策略并使用相同的战斗口号，当对手的策略已经成功地引导人们得出疯狂的结论，或者对现实采取错误的态度。

正在讨论的问题。

这种诱惑在动机被发现时尤其强烈，尽管这些动机完全是虚幻的，这些似乎都指向年轻运动所追求的相同目标。

人类的懦夫将更容易接受那些让它看起来像从自身角度来看，参与犯罪政策的正当理由对手正在跟随。

我曾多次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其中最大的精力必须用来防止我们的运动之船被卷入一股普遍的潮流中。

是人工启动的，而且确实是通过航行启动的。

最后一次是，我们那该死的新闻界，德意志民族的存在都归功于它。

不重要，成功地使南蒂罗尔问题凸显出来，这必然会这对德国人民的利益是致命的。

他们没有考虑自己在为几个所谓的“国民”人物、政党和联盟，加入到普遍的呼声中，仅仅是为了害怕被激起的舆论。

犹太人，并愚蠢地捐款帮助反对我们德国人应该反对的制度，特别是在这些日子里，被视为这个纷乱世界中的一线光明。

当国际犹太人正在缓慢但坚定地扼杀我们时，我们所谓的爱国者却大声反对一个人和他的制度有勇气从犹太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共济会，至少在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地方，并发动民族抵抗力量反对国际世界毒药。

但软弱的人却倾向于顺着风向扬帆起航，在舆论的风暴前投降——因为这是真正的投降。

即使人们有撒谎的习惯，道德低下，甚至不承认自己撒谎，事实是，犹太人所激起的只是懦弱和对公众情绪的恐惧诱使某些人加入到喧嚣之中。

提出的所有其他理由都只是无足轻重罪犯的可怜借口，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行。

然后必须用铁腕把舵，扭转运动，以便将它从可能使其陷入困境的航线中拯救出来。

当然，试图改变路线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举动，因为公众舆论被用尽一切手段煽动起来，而且其趋势只有一个方向。

这样的决定几乎总是会给那些敢于做出这种决定的人带来灾难。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少人因为某种行为而被石头砸死，而后人有理由感谢让他们跪下。

但一场运动必须依靠后世，而不是一时的喝彩。

在这种时候，某些人必须忍受数小时的痛苦，但他们不应该忘记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一场旨在重塑世界的运动必须服务于关注未来，而非逝去的时刻。

在这方面，可以断言，历史上最伟大、最持久的成功是大部分是那些一开始最不被理解的，因为它们直接反对舆论和当时的观点和愿望。

当我们第一次公开亮相时我们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外表。可以坦白地说，我们没有讨好公众，而是猛烈攻击我们人民的愚蠢行为。

在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总是出现在一群人面前他们所相信的与我所说的相反，他们所想要的与我所相信的相反。

然后我不得不花几个小时去说服两三千人，让他们相信这些观点他们迄今所持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观点的基础被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

最后，说服他们以我们自己的信念为依据，我们的世界观。

我当时学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从敌人手中夺取他在答复中使用的武器。

我很快就注意到，我们的对手，特别是那些领导反对我们，得到了一系列的论据，从中他们提出了反对的观点，但他们不断重复的主张。

这种程序模式的统一性表明了系统的、统一的培训，因此我们能够认识到敌人的宣传者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我很自豪，今天我发现了一种不仅可以进行这种宣传的手段无效，而是用作者自己的游戏打败他们。

两年后，我精通了这门艺术。每次演讲时，我都务必要明确事先设想一下，在讨论，以便在我自己的演讲过程中能够处理和驳斥这些问题。

为此，有必要列举所有可能的反对意见，并表明其不一致之处；更容易赢得一个诚实的听众，通过从他的记忆中删除这些论点对此印象深刻，因此，我预料到了他的答复。

他所学到的东西没有被他提及就被驳斥了，这让他更加留意我所说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第一次讲授《凡尔赛和约》之后，我在团里当政治指导员的时候，给部队发了标题和主题，从此以后谈论“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和凡尔赛条约”。我确实因为，在第一次演讲后的讨论中，我很快就确定了事实上人们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一无所知，党的有力宣传取得了成功将该条约描述为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之一。

由于这种谎言被反复地重复给群众数百万德国人民认为《凡尔赛条约》是对我们犯下的罪行的公正惩罚。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犯下罪行。

因此他们认为所有反对凡尔赛条约的人都是不公正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道德上厌恶这样的做法。

这也是为什么无耻而又邪恶的词语“赔款”在德国很常见。这种虚伪的谎言似乎数百万愤怒的同胞认为这是更高正义的功劳。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事实就是这样。

最好的证明就是我发起的反对凡尔赛条约的宣传，我解释了布列斯特和约。我逐一比较了这两个条约，并指出，事实上，一个条约这项条约极其人道，与另一项条约的非人道的野蛮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效果非常显著。我曾经在两千人的集会上讲过这个话题，人，我经常看到三千六百双充满敌意的眼睛盯着我，但三个小时后，我面前是一群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人。

一个弥天大谎从成千上万人的心中被连根拔起，而一个真相被植入到其原位。

两场讲座分别是《论世界大战的原因》和《1841 年和平条约》。

我当时认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和凡尔赛条约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重复了几十遍，每次都赋予它们新的语调，直到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运动招募了第一批成员。

此外，这些聚会也让我逐渐成为群众集会，让我练习在举行大型集会的大厅里表达情感和表达手势。

数千人。

除了已经提到的小圆圈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丝毫的努力任何政党都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向人民解释事情。

当时没有一个政党活跃，而今天人们却说，好像是他们促成了公众舆论的变化。如果一位自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领袖宣布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只限于大部分他自己已经确信这一点，而他所做的最多的就是确认他们的信念。

意。

但那不是当时所需要的。需要的是通过宣传和解释那些根据教育和信念属于敌方阵营的人。我们还采用了一页通告来帮助实现这一点宣传。当我还是一名士兵时，我曾写过一份通告，其中我对比了布列斯特条约——立托夫斯克与凡尔赛。

那份通告印发了很多。后来我把它用在党内，也并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第一次开会时，桌子上摆满了传单、纸张，以及各种小册子，但我们主要依靠口头表达。事实上，这是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革命的唯一手段，这一事实从一般的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在

第一卷中，我已经说过，所有改变了现状的重大事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是通过书面文字而是通过口头语言来传达的。

关于这一点，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我们精明的资产阶级人士强烈反对我的论点，但这种态度的理由却令人困惑怀疑论者。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抗议我的态度，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力量或能力通过口头语言影响群众，因为他们总是完全依赖作家的帮助，并没有亲自登上舞台作为演说家。

达到唤起民众的目的。

这种习惯必然导致当今资产阶级的典型状况，即失去了激励群众、影响群众的心理本能。

演说家会不断得到听众的指导。这有助于他纠正他讲话的倾向，因为他总能从听众的表情判断他们关注并理解他，以及他的言语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作家根本不了解他的读者。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向他面前的特定人群致辞，但必须以一般的方式写方式。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必定在心理技巧和灵活性方面失败了。因此，总的来说可以说，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写得比一个出色的作家讲得好，除非后者不断练习公开演讲。我们还必须记住，群众本身在心理上惰性。它坚持旧习惯，不自然地倾向于阅读不符合与其预先设定的信念相悖，或者不包含它希望在那里找到的东西。因此，具有特定倾向的写作大多只被那些同情的人阅读只有传单或标语牌，由于简短，才有可能引起人们一时的兴趣在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中。

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形式的图片都有更好的前景。这里需要更少的智力对于观众来说，只需要注视，或者最多读一下简短的说明或标题，就可以了。

很多人更愿意接受图片展示，而不是阅读长篇文字描述。

图像表达能更快地传达信息给人们（几乎可以说，如果他们被迫去理解一个想法，那将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阅读它。

然而，最重要的考虑是，人们永远不知道一块书面材料可能会消失，但其主题的呈现形式必须保持不变。

一般来说，当治疗方式与患者的心理水平相适应时，效果会更好。

读者并且适合他的天性。

因此，一本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书，从一开始就必须努力通过与书籍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思想水平获得效果旨在供较高知识阶层阅读。

只有通过这种适应能力，书面文字的力量才能接近直接演讲。演说家可能处理与一本书相同的主题，但如果他有天才的作为伟大而受欢迎的演说家，他几乎从来不会重复同样的论点或同样的材料。

连续两次使用相同形式。

他永远追随人民群众的脚步，从他内心的鲜活情感出发，听众需要的恰当的话语就会被建议给他，然后这话语就会直接传到听众们的心。

如果他犯了哪怕是很小的错误，他面前都有活生生的纠正。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能读懂听众脸上的表情，首先看他们是否明白他所说的其次，看看他们是否接受了他的整个论点；第三，看看他已经成功地使他们相信他所说的话是正义的。

如果他首先发现听众不理解他的话，他就会做出如下解释：基本而清晰，以便每个人都能掌握，甚至最后一个人。

其次，如果他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跟随他，他就会让一个想法跟随另一个想法小心而缓慢地讲下去，直到最迟钝的听众也不再落后。

第三，一旦他感觉到他们似乎不相信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向他们提出问题后，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论点，总是给出新的插图和他本人也会表达他们的不言而喻的反对意见。他会重复这些反对意见，剖析它们，驳斥它们，直到最后一组反对派用它的行为和表情向他表明，它已经屈服于他的案的揭露。

这常常是一个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例子，这些偏见大多是无意识的，建立在情感而非理性的基础上。

克服这种本能的厌恶、情感的仇恨的障碍要困难一千倍。

和偏见，而不是建立在有缺陷或错误的知识上的正确意见。

错误观念和无知也许可以通过教育来消除，但情绪上的抵抗永远无法消除。

可以。只有向这些隐藏的力量发出呼吁才会有效，而这种呼吁，可以几乎没有任何作家写过。

唯有演说家才有可能成功。

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是，虽然我们有资产阶级报刊，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写得很好、制作精良，并且发行量达到数百万册，那么它不可能防止广大人民群众成为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敌人。

知识界年复一年地发表大量论文和书籍。

对数百万社会底层人民的思想影响犹如水从鸭背上流过一样。

这就证明，以下两件事必有一是真的：要么资产阶级报刊上提供的内容毫无价值，或者不可能通过书面形式打动广大群众的心。

独自一人。

当然，当书面材料很少透露心理洞察力时，后者基本上是正确的。

和迄今为止一样。

在这里反对是没有用的，因为柏林某些具有德国民族主义倾向的大型报纸已经试图这样做这一说法被马克思主义者行使其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著作，尤其是他们的主要著作由卡尔·马克思。

很少有人会如此肤浅地试图支持一个基于错误观点的论点假设。马克思主义对广大群众产生惊人影响的原因并不是正式的阐述犹太思想体系的印刷作品，但大量的口头宣传在群众中已经流传多年。

在十万德国工人中，只有不到一百人知道马克思的这本书。

在知识界，尤其是犹太人，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比对真正的追随者的研究要多得多。

来自下层阶级的运动。

这部作品不是为大众写的，而是专门为犹太征服世界的机器。

发动机用完全不同的燃料加热，即压力机。资产阶级的区别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报刊与资产阶级报刊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由鼓动者写的，而后者是由宣传者写的。

我想通过专业作家来进行鼓动。

一些地方“小报”的社会民主党编辑，几乎总是直接来自开会到他的报纸的编辑部，对他的工作了如指掌，但资产阶级想要吸引广大群众的作家，如果他们的恶臭没有到达他微妙的鼻孔，因此他自然无力通过自己的作品触及它们。

让数百万工人支持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作家，而是成千上万不知疲倦的宣传工作者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宣传工作煽动者，从热心的煽动者到无足轻重的工会官员，再到值得信赖的员工和捣乱者。

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会议，这些演说家站在在烟雾缭绕的酒吧里，他们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群众的头脑中，从而获得了他们对自己所要处理的人类材料有着令人钦佩的心理知识因此他们能够选择最好的武器来攻击舆论堡垒。

除此之外，还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中十万人参加了这场战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那些心胸狭窄的人骄傲地相信，尽管他只是一条可怜的小虫，但他同时也是伟大有一天，可恶的资产阶级世界将在这条恶龙毁灭性的气息面前被吞噬烈火中，无产阶级专政将迎来最后的胜利。

这种宣传对人们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喜欢阅读社会民主媒体并为其教学做好思想准备。

反过来说，报刊是口头表达的载体，而不是书面表达的载体。而在资产阶级阵营的教授、各种博学的作家、理论家和作家，都试图说起来，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真正的演说家经常会进行写作的尝试。

这尤其适用于犹太人，因为他们善于辩证法和狡猾地歪曲事实是，即使作为一名作家，他更像是一位雄辩的煽动者，而不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作家。

因此，资产阶级报刊（撇开它受犹太人支配的事实不谈，而且，因此，没有启蒙广大群众的兴趣）是无法发挥丝毫作用的。

对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产生影响。很难根除情绪化的偏见、心理偏向、感觉等，并让别人处于自己的位置。

成功取决于无法衡量的条件和影响。

只有具有最敏锐洞察力的演说家才能估计这一切。即使是演讲的日期对演讲的有效性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一位演说家针对同一主题发表的同一场演讲，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或晚上十点晚上。

当我第一次从事公开演讲时，我安排会议在上午进行，然后我特别记得我们在慕尼黑金德尔凯勒举行的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对德国少数民族的压迫。

那是慕尼黑当时最大的礼堂，风险似乎很大。为了赶上会议适合我们运动的所有成员和其他可能参加的人，我定于周日上午十点。

结果令人沮丧，但很有启发性。大厅挤满了人。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但总体气氛却很冷淡。没有人热身，而我本人，作为这次活动的演讲者，对此感到非常不高兴。



我认为我无法与听众建立起丝毫的联系。

我不认为我的发言比其他场合更糟糕，但效果似乎绝对是负面的。我离开了心情很压抑地离开了礼堂，但也感觉获得了新的体验。后来我尝试了同一种实验，但结果总是相同的。

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去剧院看一场日场演出，然后观看同一部戏剧的晚间演出，你会惊讶于印象的差异创建。

一个敏感的人，能够分析自己的反应，很容易承认，日场演出所创造的印象绝不是意味着和晚上的表演一样生动。

电影制作也是如此。

后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人可能会说，也许在下午，演员不像晚上那样努力，但肯定不能说电影院是下午和晚上九点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一天中的时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就像房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样在我身上。

有些房间让人感觉冷漠，原因很难解释。有些房间这会阻碍任何一种氛围的形成。此外，某些记忆和传统以图画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可能会对产生的印象。

因此，在拜罗伊特演出《帕西法尔》所产生的效果，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上演同样的歌剧。

侯爵老城“节日高地”上的房屋的神秘魅力任何其他地方的外部环境都无法与之媲美或想象。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都在处理影响人类意志自由的问题，尤其是在有人反对演讲者的意愿的会议上，必须引导他们接受新的思维方式。

早晨和白天，人类意志的划船者似乎反抗得最强烈反对任何试图将他人的意志或意见强加于它的企图。另一方面，晚上它很容易屈服于更强大的意志的支配，因为实际上在这样的集会中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存在着较量。

具有使徒般令人信服的性格的人，其卓越的演说技巧将会成功更好地引导那些在自然过程中被削弱他们的抵抗力量，而不是改变那些完全拥有意志和智力。

天主教教堂里神秘而虚假的昏暗，燃烧的蜡烛，焚香，香炉等也可用作此用途。

在演说家与他必须说服的对手之间的斗争中，前者逐渐意识到他的宣传武器的心理适应性作家很少具备。

一般而言，作家作品的效果更有助于保存、强化和深化已经形成的观点基础。

所有真正伟大的历史革命都不是由文字产生的；它们最多是由伴随它。

认为法国大革命能够通过以下方式实现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因为一支由煽动家领导的煽动者大军，哲学理论就无法煽动已经激起的民众激情，直到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终于爆发，震撼了整个欧洲。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即布尔什维克运动，也是如此。

俄国革命不是列宁著作的成果，而是演说活动的成果无数大大小小的煽动者，煽动仇恨。

俄罗斯文盲群众并没有被赶到共产主义革命热情不是通过阅读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而来的，而是通过对天堂的承诺而来的成千上万的鼓动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而向人民宣传。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而且永远如此。

我们的固执的知识分子，远离现实世界，认为作家的智力必然高于演说家。

这一观点曾被一篇发表在某全国性报纸上的批评文章有效地阐述我已经提到过，人们常常因为阅读一位公认的伟大演说家的演讲已印刷出版。

这让我想起了战争期间我得到的另一篇文章。它讨论了当时担任军需部长的劳合·乔治的演讲稿，并仔细研究了这些演讲稿。

方式置于批评的显微镜下。

作者精辟地指出，这些演讲显示出低劣的智力和学识而且，它们都是平庸而普通的作品。我碰巧拿到了这些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演讲，不得不笑着说事实上，一个普通的德国鹅毛笔作家根本不理解这些心理影响大众的艺术杰作。

这个人批评这些演讲完全是根据他自己傲慢的而英国伟大煽动家的一个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影响他的听众，以及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全国各地的下层阶级，英国。

从这个角度看，那位英国政治家的演讲最精彩成就，正是因为他们表现出对广大人民心态的惊人了解人民群众。因此，其影响是巨大的。

把它们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徒劳无益的口吃作比较。从表面上看，后者的演讲无疑更加有智慧，但实际上却证明了这个人的无能他不理解他的人民。

然而，对于德国作家的愚蠢的普通大脑来说，他当然积累了大量学识渊博，似乎很自然地要评判英国政治家的演讲——目的是影响群众——通过他们给他自己留下的印象学习使心灵僵化，把它们与那些才华横溢却徒劳无功的德国政治家，这当然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

劳合·乔治的天才不仅与 Bethmann-Hollweg 的言论，证明了他为自己的演讲找到了形式和表达方式这使他的人民对他敞开了心扉，并使得人民绝对地执行他的意志。

这些演讲的原始性、他的表达方式的独创性、他选择的清晰而简单举例，就足以证明英国发言人高超的政治能力。

永远不能根据政治家的讲话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来判断他的讲话大学教授的思想，而是看它对公众产生的影响，这是唯一演说家的天才的标准。

我们的运动几年前从无到有，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今天被我们民族的所有内部和外部敌人单独挑出来迫害，必须归功于对这些原则的不断认识 and 实际运用。

无论运动的文学多么重要，目前它仍然为上级和下级领导提供统一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的学习过程，而非为了转化敌对的群众。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坚定而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深入了解我们的或者通过购买和阅读我们的小册子或甚至我们的一本书。

即使是一份报纸，如果没有党派观点的烙印，也很少有人阅读。此外，阅读报纸的帮助不大，因为一份报纸的单一号所给出的总体情况是如此混乱，留下的印象如此零碎，以至于它实际上并不影响偶尔的读者。

当一个人必须精打细算时，不能认为他只是为了客观地了解情况后，他将成为反对他观点的报纸的常客或订户。

观点。几乎一万人中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做。

只有当他加入某个运动后，他才会定期阅读该运动的党刊，更特别的目的是让他自己了解运动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与“口头”传单完全不同。特别是如果它是免费分发的，它将被接受一个人或另一个人，更愿意如果它的显示标题指的是一个问题，此刻每个人都在谈论。

也许有人在或多或少仔细地读过这样的传单后，会对新的观点、新的精神状态、甚至新的运动持开放态度。

但这最多只能起到一点冲动的作用，并不能建立坚定的信念，因为传单只能引起兴趣和注意力，并且只有在读者随后会获得更明确、更详尽的信息，唯一的途径是通过群众集会。群众集会也是必要的，因为在参加群众集会时，即将加入新的运动，感到孤独，很容易害怕单独行动，获得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伟大的社区，它对大多数人都有着加强和鼓舞的作用人们。

同一个人，将作为连队或营队的一员，在战友的簇拥下，行军比起独自行军，他更能轻松地面对攻击。在人群中，他觉得自己处于某种尽管现实中存在着千万种反对这种感觉的理由。大规模的群众游行不仅能加强个人的意志，而且能吸引他更加贴近运动并有助于创造团队

精神。

在他的工作地点或他的事业中作为新学说的第一位代表出现的人工厂必然会面临困难，需要来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伟大团体的成员，只有群众示威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个社区的伟大都归功于他。

如果他离开商店或庞大的工厂时，感到自己确实非常渺小，他就会进入一个第一次集会，看到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持有同样的意见；- 如果，当他还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时，他被来自他周围有三四千人的兴奋和热情；- 如果明显的成功和成千上万的共识证实了新教学，并第一次在他心中产生对自己所持观点的真实性的怀疑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屈服于我们所谓的群体暗示的魅力之中。

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成千上万人的意志、渴望，甚至力量。

带着怀疑和犹豫参加这样的会议，离开时内心就会变得坚强；他已经成为一个社群的成员。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也永远不应该允许自己受那些资产阶级傻瓜的影响，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但又愚蠢地赌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连同他们自己的生存以及他们自己阶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们非常聪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但是有一个人他们没有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拯救德国人民免于落入马克思主义。

他们惨败了，他们目前对自己实力的高度评价只是自负而已，因为他们的骄傲与愚蠢是同一棵树上的果实。

如果这些人试图贬低当今口头语言的重要性，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感谢上帝——他们自己的所有演讲是多么徒劳无功。

## 第七章 同红色势力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年以及一九二一年，我参加了一些资产阶级会议。

我对这些的感觉，就像我对我身体里强制注射蓖麻油的感觉一样。

童年时光。

必须服用，因为它对人有好处，但味道确实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把德国人民绑在绳索上，强迫他们参加这些资产阶级的“会议”，以保持把他们关在门后，直到会议结束，不允许任何人逃跑，然后这一程序可能在几百年后才会证明是成功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生活没有价值。

事实上，我不再希望自己是德国人了。

但感谢上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理智和未受污染的群众避开这些‘资产阶级群众集会’就像魔鬼避开圣水一样。

我认识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先知，我对自己所看到的并不感到惊讶。

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太重视口头语言。

当时，我参加了民主党、德国民族主义者、德国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德国中央党）巴伐利亚州）。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观众几乎全部都是党员。

整个事件更像是一场无聊的纸牌聚会，而不是一群刚刚过世的人的聚会通过一场伟大的革命。

演讲者竭尽全力维持这种平静的氛围。

他们以知识分子报纸文章或博学论文，避免一切强迫性表达。

时不时会开一些无聊的教授式的玩笑，坐在演讲者桌子旁的人们不禁笑了起来——不是大声笑，也不是极具感染力，但又不失涵养。

哦，那些坐在演讲桌旁的人！我曾经参加过慕尼黑瓦格纳音乐厅的一次会议。

是为庆祝莱比锡战役周年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演讲发表于或者更确切地说，由某所大学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朗读。

委员会成员坐在主席台上：一个单片眼镜在右边，另一个单片眼镜在左边，中间是一位没有单片眼镜的绅士。

他们三个都穿着一丝不苟的晨礼服，我感觉他们在法庭上，就在死刑即将宣判时，或在洗礼仪式上或者一些比较隆重的宗教仪式。

这篇所谓的演讲，如果以印刷形式呈现，可能读起来还不错，但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四十五分钟后，观众陷入了一种催眠状态，只有当某个男人或女人离开大厅时，或者当女服务员发出的喧闹声时，或者当观众打哈欠的现象增多。

我站在三名工人后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要么是出于好奇，要么是因为他们是由他们的政党派往那里的。

他们时不时地互相瞟一眼，露出难以掩饰的笑容，用肘部轻推对方，两人手肘一碰，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大厅。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打算中断诉讼程序，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这么做。终于，会议有结束的迹象了。教授的声音已经与此同时，声音变得越来越小，终于结束了演讲，没有单片眼镜向与会的“德国姐妹兄弟们”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他代表听众和他本人对他们精彩的演讲表示感谢。

刚刚听完X教授的演讲，并强调教授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商场。

如果对讲座进行一般性讨论，那就等于是亵渎，而他我觉得他代表了在场所有人的意见，认为不应该进行这样的讨论握住。

因此，他要求全体大会代表起立，一起唱爱国歌曲，维尔·宾登·埃尼格·沃尔克·冯·布鲁登。最后，在国歌《德国高于一切》的歌声中，会议圆满结束。

我发现，当唱到第二节时，声音变少了，只有当副歌到达后它们会膨胀得更大声。

当我们唱到第三节时，我怀疑在场的许多人都不太确认了歌词的熟悉程度。但当这样一首歌被唱出来时，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受到德国民族主义者集会的全心全意和热情支持？会议结束后，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走到外面，一个人去喝啤酒，另一个人去喝咖啡馆，其他人则只是想呼吸新鲜空气。

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难道这就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方式吗？数十万普鲁士人和德国人为之奋斗的斗争？不，一千个不！这种事情可能会得到政府的青睐，因为它只是一个“和平”会议。

负责法律和秩序的部长无需担心热情会突然公共礼仪的更好，并诱导这些人涌出房间，而不是分散到酒吧和咖啡馆，四人并排穿过城镇，唱着《德国高歌》在埃伦 (Ehren) 并给需要睡眠的警察部队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有理由对这种类型的公民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会议绝不是“和平”的事务。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激烈对立，这些会议并没有这首歌不是机械地演绎一首沉闷的爱国歌曲，而是以激情的爆发民心所向。

从一开始就必须在我们的会议中引入严格的纪律，并建立主席的绝对权威。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散布一些资产阶级的软话；我们要说的是在我们的会议上激起反对者！

他们常常成群结队，其中有几个煽动者已经做好准备，根据他们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要立刻把我们干掉一样。

那些红旗的支持者，他们曾多少次以力量出现，指示一劳永逸地粉碎一切，并结束我们的会议。

很多时候，一切都悬而未决，只有主席的坚定决心而我们门卫的粗暴对待也挫败了我们对手的“意图”。他们有每一个生气的原因。

我们选择红色作为海报的颜色足以吸引他们参加我们的会议。

普通资产阶级看到我们也选择了象征性的红色，感到非常震惊。

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意义不明确的事。

在德国民族主义者圈子里有人悄悄传言说，我们也不过是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者，或许甚至是经过适当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好的是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实际区别对这些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马克思主义的指控最终被证实，因为我们在会议上发现故意用“同胞”一词代替“女士们先生们”，并向每个人致意其他人则称其为‘党员同志’。

我们常常嘲笑这些愚蠢、懦弱的资产阶级，嘲笑他们试图弄清楚我们的起源、我们的意图和我们的目标。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红色作为海报颜色，目的是激怒左派，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引诱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哪怕只是为了打断他们——所以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与人们交谈。

在那些年里，跟随我们不断变化的策略确实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困惑和无助的对手。

首先，他们呼吁追随者们不要理会我们，不要参加我们的会议。一般来说他们的呼吁得到了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追随者逐渐找到了我们并接受了我们的教导。

然后，领导人变得紧张和不安。他们坚信，这样的发展不应永远忽视，必须使用武力来结束这种现象。

然后我们号召“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集体参加我们的会议，用无产阶级的紧握之手打击“君主主义和反动骚乱。”在会议开始前整整四十五分钟，我们的会议突然挤满了工作人员。

会议议程按计划开始。这些集会就像一个随时准备爆炸的火药桶。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而导火索就在手边。

但事情总是会有不同的结果。人们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然后离开，也许没有准备好加入我们，但要保持反思的心情，并愿意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正确性教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三个小时的演讲逐渐让支持者和反对者变得团结在一个充满热情的群体中。

所有要求解散会议的信号均失败了。

结果是反对派领导人变得更加恐惧，并再次寻求帮助那些以前不赞成这些策略的人，带着一些正确的态度，一直认为原则上应该禁止工人参加我们的会议。

此后，他们不再来了，或者只来了少数人，但不久之后，整个游戏又开始了。远离我们的命令被忽略了，同志们进来了人数稳步增加，直到最后激进策略的倡导者获得胜利。

我们本该解散的。然而，经过两三次甚至多次会面后，我们意识到打破这些聚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每次会议都会产生决定性的随着红色战斗力量的削弱，另一声口号又被提起，“无产阶级和同志们，避免参加国家社会主义煽动者的会议。”在红色报刊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不断交替的策略。他们曾经试图让我们闭嘴，但发现这种尝试毫无用处。之后他们转向相反的策略。每天“提及”我们只是为了在工人阶级的眼睛。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先生们一定觉得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但是，相反，我们的优势在于人们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空间致力于一个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话题。

人们变得好奇起来。突然，策略发生了变化，有一段时间我们被当作真正的反人类罪犯。一篇文章接着一篇文章，阐述我们的犯罪意图，并提供新的证据提出来支持所说的内容。那些从头到尾都是捏造的丑闻故事，都是为了帮助毒害公众的思想，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攻击也被证明是无效的，事实上它们是它们向我们提供物质援助，因为他们引起了公众对我们的关注。

那时我的观点是，他们嘲笑我们或辱骂我们，都无关紧要。

无论他们把我们描绘成傻瓜还是罪犯，重要的是他们注意到了我们，在工人阶级的眼中，我们被视为唯一能够一场战斗。

我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向犹太媒体这帮乌合之众展示我们的真实面目，我们真正瞄准的是。他们之所以没有打断我们的会议，原因之一无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对派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懦弱。

每当关键时刻，他们就把脏活留给小人物，自己则在外面等候。

大厅里等待分手的结果。

我们几乎总是清楚对手的意图，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允许我们党的几位同事继续留在红色组织，理由是权宜之计，但也因为红色幕后操纵者，对我们来说最幸运的是，患有一定程度的不幸的是，这种话在德国人中仍然非常普遍。

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在俗话说，鸡蛋已经下好了。因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如此深远的预防措施“红军”采取的措施那些被叫去打扰我们会议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被赶出去。

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亲自承担起保护会议的安全工作。

不能依赖当局的保护，相反，经验表明正是这种干预增加了令人不安的因素。警察干预的唯一真正结果干预的结果是会议将被解散，而这正是我们的对手通缉。一般来说，这导致警方采取了一种程序方法，至少可以说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官员渎职罪就是一个例子。

当他们收到威胁说要中断某次会议的信息时，逮捕了可能的扰乱者后，他们立即禁止无辜者举行会议，这项措施对普通警察来说是一种智慧的顶峰。

警方称此举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因此，正派人士的政治工作和活动总是可能受到任何阻碍拥有足够手段的亡命之徒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国家当局向这些暴徒屈服，并要求其他人不应该激怒他们。

当国家社会主义者希望在某些地方举行会议时，工会宣布他们的成员会反抗，那么被逮捕和监禁的就不是敲诈勒索者。

相反，我们的聚会被警方禁止。事实上，法律的强权让无数次以书面形式向我们提出此类通知，真是无礼至极。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必须确保任何扰乱会议的企图都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这方面要考虑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有依赖警察的会议保护必然会使其倡导者在公众眼中丧失信誉。

只有在强大警察力量的保护下才能举行的会议没有人，因为为了赢得下层民众的支持，必须有明显的自己一方的力量。

就像勇敢的男人比懦夫更容易赢得女人的芳心一样，一场无畏的运动比一场软弱的运动更能赢得民心其生存依赖于警察的支持。

正是由于后一个原因，我们年轻的党必须承担起维护自身的生存，保卫自己并挫败对手的恐怖主义策略。

为保护我们的会议而采取的措施如下：第一，大力明智地主持会议。

第二，组织一队人来维持秩序。在那些日子里，只有我们，没有其他人在我们的会议上，领导人掌控着局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强调这一点。

我们的对手充分认识到，任何挑衅都是将他们赶出议会的信号。

无论情况如何，我们都会立即赶到大厅。在会议上，特别是在慕尼黑以外的会议上，我们在那些几天之内，五百到八百名反对者就变成了十五、十六名纳粹分子；然而，我们决不容忍干涉我们的对手非常清楚，我们宁死也不投降。

不止一次，少数党员英勇抵抗了一群愤怒而暴力的暴徒。

红军。如果没有对手们知道，他们当中有三到四倍的人会首先被打碎头骨，他们并不愿意冒这个险。

我们尽力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开会方法，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有着极为严格的纪律，因此，打破他们的会议绝不可能起源于资产阶级地区。

因此，红军越是集中精力于这些战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不仅成为过去但在帝国的某些大地区，他们甚至宣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会议无异于激怒无产阶级。

尤其是当幕后操纵者怀疑会议可能引起人们关注自己的罪孽，从而暴露自己的背叛和欺诈。因此，这次会晤一经宣布，红色媒体中便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咆哮。

他们原则上藐视法律，几乎总是首先诉诸并以命令和威胁的语言要求当局停止这种“挑衅”为了“法律和秩序的利益”，必须立即制止“无产阶级”的暴行。

他们所选择的语言取决于他们所交往的官方笨蛋的重要性正在交易，因此成功是有保证的。如果碰巧这位官员是真正的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傀儡——而且他没有遵从这个无礼的要求，那么众所周知的停止“挑衅”的呼吁发出“无产阶级”的指示，并指示参加某日某会议全力以赴，以“制止资产阶级的可耻阴谋用无产阶级的拳头。”必须看到，这些资产阶级会议是以多么可怜和恐惧的方式进行的。

难以置信。这些威胁往往足以让他们取消这样的会议一次。

恐惧感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这次会面，而不是八点开始，很少在九点一刻或九点之前开门。主席于是尽其所能，向“反对派”，以证明他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很高兴（明显的谎言）欢迎那些还没有同情他们的人的存在，因为只有通过相互讨论（他特此表示同意）能否让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理解。

除此之外，主席还向他们保证，这次会议绝对无意干涉任何人所宣称的信仰。远非如此。每个人都有权利形成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他应该允许其他人也这样做。

因此，他请求允许发言人不受干扰地发表演讲——无论如何，演讲不会很长——因此，这次会议不应该给世界带来这是德国兄弟间激烈争斗的又一次可耻事件。

等等。

左翼兄弟们对这种言论几乎没有同情心，演讲者几乎没有当他被大声呵斥时，他开始了演讲。有时人们会觉得这些演讲者感谢命运断然打断了他们殉道式的言论。

这些资产阶级斗牛士在一片喧闹声中离开了竞技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逃脱被被扔下楼梯，头骨破裂，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因此，我们在国家社会主义会议上的组织方式相当奇怪。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相信他们经常玩的小游戏成功的例子当然可以在我们身上重演。

“今天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干掉。”他们每次进城时都会这样大声喊叫。

会议大厅，却在他们来得及重复之前，就以闪电般的速度被扔了出去！首先，我们开会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并不渴望允许发言，我们并没有立即给予每个人持有无休止的讨论。

我们简短地让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是会议的主人，我们可以，因此，请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任何敢于打断的人都会毫不客气地被扔出去。

我们明确表示，我们拒绝对任何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承担责任。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如果我们

觉得合适，就会进行讨论。某某党员现在说话。

这种言论本身就足以让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震惊。

第二，我们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组织有序的队伍，可以维持我们的会议。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党保护他们的会议，并让一群更为保密的人作为引座员，他们认为自己凭借年龄就有资格获得权威和尊重，但作为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暴民不尊重年龄或权威，资产阶级的保护措施会议实际上不存在。

当我们的政治会议刚开始时，我特别强调要组织一个合适的防御原则上，这支队伍全部由年轻人组成。

他们中有些是和我一起服过役的退伍军人。其他的是年轻的党员从一开始就被训练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的唯一途径是恐怖主义，只有勇敢而坚定的人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

最后，他们知道，我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奋斗，值得我们倾尽最后一滴血。

血。

这些年轻人被训练认识到，当武力取代常识来解决问题时遇到问题时，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进攻，而我们门卫小队的声誉应该把我们标记为政治战斗力量而不是辩论团体。

战争年代的孩子对这个命令的反应非常热烈，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对这种卑鄙的懦夫手段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慨受雇于资产阶级。

因此，每个人都清楚，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归功于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手段。

当时镇压革命的人力当然不缺，但不幸的是，完全缺乏一个有组织能力的大脑。

当我向我的年轻人解释至关重要的与他们的任务相关的职能。我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保证，世上所有的智慧都是无用的。

除非得到武力的支持和保护；和平女神只能走进与战神为伍；以和平的名义采取的每一项重大措施都必须以武力手段加以保护和促进。

这样，他们就能够更现实地看待服兵役这一概念，而不是僵硬的官僚意识在为一个已死国家的已死权威服务——但在活着的认识到每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为祖国牺牲生命给定位置。

向这些年轻人致敬，因为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像一群在我们的会议上，他们不管人数多少，都去对付扰乱者，对伤痛和流血漠不关心，受到为神圣开辟道路的伟大想法的启发我们运动的使命。

早在 1920 年夏天，就组织了一群男子担任门卫，目的是我们会议的秩序逐渐有了定型。

到 1921 年春，这支部队被分成 100 人的小队，依次被细分成更小的组。这样做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与此同时我们的会议次数稳步增加。

我们仍然经常在慕尼黑皇家啤酒屋聚会，但更频繁地在更大的会议厅里聚会整个城市。1920 年秋冬——我们在 Burgerbrau 和慕尼黑金德尔凯勒已经占据了巨大的规模，同样的事情总是发生，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会议总是人满为患，因此警察在诉讼开始前很久就被迫关闭并锁上门。

组织大厅警卫维持会议秩序解决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直到那时，该运动还没有党徽，也没有党旗。

缺乏这些代币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劣势，而且必然会被证明是无法容忍的将来。缺点主要是党员没有外在的标志会员身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绝对无法想象他们未来应该保留一些象征运动的标志，并可以设置与国际的立场相反。

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象征的心理意义不止一次地变得清晰起来对我来说这显然是可行的并且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可行的。

战后，我在柏林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路斯特花园前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皇宫。一片红旗、红臂章和红花的海洋本身就足以给人这种感觉大约十二万人的大型集会力



量。

我现在能够感受到并理解普通人是多么容易屈服于催眠如此宏大的戏剧表演的魔力。

从政治上讲，资产阶级既不拥有也不拥护任何因此，世界观没有自己的旗帜。它的政党是由“爱国者”组成的，他们采用了德国的色彩。

如果这些颜色是明确的世界观的象征，那么人们就可以理解统治者国家认为这面旗帜表达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因为通过他们的他们的努力使他们的世界观的象征成为了帝国的象征。

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在没有德国帮助的情况下团结起来。

资产阶级，国旗本身诞生于战争，因此仅仅是一个国家象征不具备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使命意义。

只有在德意志奥地利的德语区的一部分，才有类似资产阶级政党旗帜。在这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 1848 年的颜色（黑色、红色和金色）作为他们的党旗，然后他们创造了一个象征，虽然没有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它具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具有革命性从国家政治角度来看。

当时这面旗帜最激烈的反对者（今天也不应该忘记）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神职人员。

正是他们，尤其是那些贬低和玷污这些颜色的人，就像他们在 1918 年拖拽下水道里的黑色、白色和红色。当然，德国政党的黑色、红色和金色在旧奥地利的颜色是 1848 年的颜色；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可能被视为有点空想，但这是一个以诚实的德国人为代表的时代，尽管犹太人隐藏在幕后，充当幕后操纵者。

这是叛国行为，是可耻地交换德国人民和德国领土的行为首先，这些颜色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央党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今天，它们把它们视为最珍贵的财产，并找到了自己的联想。

保护这面他们曾粗暴玷污的国旗。

因此，事实上，直到 1920 年，还没有一面旗帜能够代表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

因为即使德国资产阶级中较好的政治分子不愿意接受 1918 年后，他们突然发现黑色、红色和金色是他们的标志，然而，他们却无法用自己的未来计划来应对这一问题。最后，他们心中有一个重建旧帝国的想法。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旧帝国的黑色、白色和红色得以传承。

它们的复活将成为我们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旗帜。

显然，这个政权的象征，是在可耻地被马克思主义者推翻的。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值得成为一面用来粉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了反过来。

无论任何一位可敬的德国人多么热爱和崇敬这些古老的色彩，它们都如果他曾在他们麾下战斗过，并且见证过那么多生命的牺牲，那么他就能保持青春活力。

永远不会成为未来斗争的象征。

在我们的运动中，我一直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对德国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幸运的事国家失去了旧国旗。我的这种态度与资产阶级政客。

共和国在其旗帜下做什么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让我们深深地感谢命运如此慷慨地保护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战旗，避免它沦为耻辱今天的帝国已经出卖了自己和人民，绝不能允许它采取光荣而英勇的黑色、白色和红色。只要十一月的暴行持续下去，暴行可以继续带有其自身的外部标志，而不会窃取光荣的过去的标志。我们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应该唤醒他们的良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谁想让这个国家采用黑色、白色和红色的颜色就是窃取过去。

旧国旗只适合旧帝国，感谢上帝，共和国选择了颜色最适合其本身。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悬挂旧国旗将不象征我们的特殊目标，因为我们不想让旧帝国复活这个国家由于自己的错误而被毁灭了，但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今天按照这种思路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运动，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上展示新国家的象征。关于新国旗的问题，即它应采取的形式和外观，给了我们很多食物。

那些日子里的思考。

各方都提出了建议，虽然这些建议是善意的，但并不合适。新国旗不仅要成为表达我们自己的斗争的象征，而且另一方面，它有必要应能证明大型海报的有效性。

所有那些必须考虑公众口味的人都会承认并欣赏伟大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的重要性。在成千上万的案例中，一个真正引人注目的标志可能是第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拒绝了各方面关于用白旗表明我们的运动与旧国家或更确切地说与那些那些衰败的政党，其唯一政治目标是恢复过去的状况除此之外，白色不是一种能够吸引和集中公众注意力的颜色。它是一种颜色只适合禁酒协会，而不适合代表改革的运动革命时期。黑色也被推荐——当然很适合这个时代，但没有体现出什么意义表达我们运动背后的意愿。此外，黑色无法吸引注意力。

白色和蓝色被丢弃了，尽管它们作为单个德国联邦州——不幸的是，这个州通过其政治态度特殊主义的狭隘思想并没有赢得好名声。

此外，这些颜色也很难引起人们对我们运动的注意。

同样适用于黑色和白色。黑色、红色和金色不在考虑范围内；出于前面提到的原因，黑色、白色和红色确实如此——至少不是迄今为止使用的形式。

但这三种颜色的效果远远优于其他颜色，而且它们肯定是最惊人的和谐组合。

我自己一直主张保留旧颜色，不仅仅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士兵认为它们我最神圣的财产，但因为它们的美学效果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象征着我的个人情感。

因此，我不得不放弃所有提出的无数建议和设计新运动的标志中，有许多都加入了纳粹标志，旧的颜色。

作为领导者，我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设计，因为有可能别人会提出一个与我的设计一样好，甚至更好的设计。

事实上，一位来自施塔恩贝格的牙科医生提交了一个与我的非常相似的优秀设计，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他在白色的底上画了一个带有弯曲肢体的纳粹标志。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我决定采用最终的形式——一面红色旗帜，上面有一个白色圆盘，上面刻有中心有一个黑色的纳粹标志。经过多次尝试，我找到了正确的比例。

国旗的尺寸和白色中央圆盘的尺寸，以及纳粹党徽的尺寸。这种设计是终于被采纳了。

同时，我们立即为我们的班组订购了相应的臂章，会议上，红色材质的臂章上有一个白色圆盘，上面有黑色纳粹标志。

党徽的设计也与此相同，即红底白圆盘，上面刻有中间有一个纳粹十字记号。慕尼黑金匠 Herr Fuss 提供了第一个实用且永久的为此进行设计。

新旗帜于 1920 年夏天首次公开亮相。

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运动，既新颖又年轻。以前没有人见过这面旗帜其当时的效果，就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一般。

当我们看到一位女党员负责制作国旗的部门最终把它交给了我们。

几个月后，我们在慕尼黑拥有了六面这样的旗帜。我们的力量不断增强卫兵是使这个符号流行起来的主要因素，因为它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符号这个词。

通过融入我们每个人都喜爱的那些颜色，这些颜色曾经因为对德意志民族来说，它见证了我们过去的崇敬，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运动的目标。

我们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体现在我们的国旗上。

红色代表运动背后的社会思想，白色代表民族思想，纳粹党徽象征着我们肩负的使命——为雅利安人类的胜利而斗争，与此同时，创造性工作理想的胜利本身就是、并且永远是反对闪米特人。

两年后，当我们的守卫小队早已成长为风暴小队时，似乎有必要赋予这个年轻的世界观的防御组织一个特殊的象征胜利，即一个标准。

我也设计了这一点，并委托一位老党员，Herr Gahr 来执行，他是金匠。从那时起，这个标准就成为了国家社会主义斗争。

人们对我们的聚会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在 1920 年，这迫使我们有时举行每周两次会议。人群聚集在我们的海报周围，镇上的大型会议厅总是座无虚席，数十名成千上万被马克思主义教义误导的人，找到了回归正途。

民族社会协助开展争取帝国解放的斗争工作。

慕尼黑的公众开始认识我们，人们开始谈论我们。

“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已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财产，对他们来说，它意味着明确的政党纲领。我们的支持者圈子，甚至会员圈子都在不断扩大，因此在 1920 年至 1921 年间，我们在慕尼黑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

当时慕尼黑除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外，没有其他政党，当然也没有民族主义政党能够举行像我们这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慕尼黑-金德尔凯勒剧场能容纳 5,000 人，曾多次人满为患，直到那时只剩下另外一座礼堂，那就是 Circus Krone，我们还没冒险去租用。

1921 年 1 月底，德国再次陷入焦虑之中。巴黎根据该协议，德国承诺支付高达十亿黄金的巨额款项马克，将由《伦敦条约》确认。

随后，慕尼黑合作社协会正式成立，所谓民族主义团体的代表认为，召开一次公开抗议会议是明智之举。

当我看到大量时间被浪费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时，我变得紧张和焦躁。

最初有人提议在国王广场举行一次会议；经过重新考虑，这个提议被否决了因为有人担心红色分子可能会破坏这一进程。

另一个建议是在统帅堂前举行示威，但这也没有成功。

最后，有人提议在慕尼黑金德尔凯勒举行一次联合会议。与此同时，日复一日过去了；各方完全忽视了这一可怕的事件，合作社无法决定举行示威的具体日期。

2 月 1 日星期二，我提出了紧急要求，要求做出最终决定。我被告知应该星期三给了。那天我要求清楚地告知会议是否举行以及何时举行发生。

答复再次含糊其辞，声称“打算”安排一次那天的示威游行。我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决定组织一次亲自抗议。

星期三中午，我用十分钟口述了海报的文字，同时聘请了第二天，也就是 2 月 3 日，Circus Krone 将会演出。

在当时，这是一项艰巨的冒险，不仅因为无法填补那片广阔的大厅，还存在会议被打断的风险。

从数量上看，我们的大厅守卫小队不足以守住这个巨大的大厅。我也不确定如果会议中断了该怎么办，因为我想象到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在巨大的马戏团建筑中，而不是在普通的会议厅中。

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事实恰恰相反。在那座巨大的建筑里，一群执意要破坏会议的人可以比拥挤的大厅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失败会让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如果一次会议打破我们的威望将受到严重损害，我们的对手将受到鼓励重蹈覆辙他们的成功。

这将导致我们在进一步会议和数月艰难时期的工作受到破坏。

要克服这一困难，就必须斗争。

我们只有一天可以寄出账单，那就是星期四。

不幸的是，那天早上下雨了，有理由担心很多人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冒着雨雪赶去开会尤其是届时很可能会发生暴力和流血事件。

事实上，那个星期四早上，我突然感到恐惧，担心大厅可能永远都坐不满达到额定容量，这会让合作协会觉得我可笑。

因此，我立即口述了各种传单，并将它们印刷出来，分发给下午。当然，里面还包含参加会议的邀请。

我租的两辆卡车尽可能地披上了红色，每辆卡车上都悬挂着我们的新国旗当时，它由我们党的十五到二十名成员负责管理。

命令成员们彻底走访街道、散发传单并进行为当晚举行的群众大会做宣传。这是卡车第一次开到穿过街道，手持旗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公众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红色的汽车，以及在偏远地区，人们握紧拳头，愤怒地反对这个新“挑衅无产阶级”的证据。

难道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有资格举行会议并驾驶机动卡车吗？到晚上七点，马戏团的观众席还不够满。

每隔十分钟就会响一次电话，变得不安起来。

通常到七点或一刻钟的时候，我们的会议厅就已经坐满了一半，有时甚至但我很快就发现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我完全忘记了考虑到这个新会议场所的巨大规模。

皇家啤酒屋里有 1000 人，场面相当壮观，但马戏团里也有同样多的人建筑被其浩瀚所吞没，几乎无法被察觉。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更多令人鼓舞的报告，七点一刻，我得知大厅里四分之三的人都坐满了，还有大批人群在付款处排队。然后我离开去会议。

我八点零二分到达马戏团大楼。外面还有一群人，他们很镇定。

一部分是好奇的人，其中也有很多反对者，他们宁愿在外面等待发展。

当我走进大厅时，我感受到了与一年前第一次在慕尼黑皇家啤酒屋的节日大厅；但直到我强行穿过坚实的当我站在人墙前，登上平台时，我感受到了我们取得的全面成功。

大厅就在我面前，像一个巨大的贝壳，里面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体育场内人头攒动。已经售出了五千六百多张门票，为失业者、穷学生和我们自己的维持秩序的队伍，一群大约有六千五百人参加。

我的主题是“未来或衰落”，我满怀喜悦地坚信未来是我正在向人群发表演讲。

我开始讲了大约两个半小时。讲了半个小时后，我感觉会议将取得巨大成功。会议立即与数千名与会者建立了联系。

个人。

第一个小时后，演讲已经自发爆发出掌声，但第二个小时后，掌声渐渐平息，恢复了庄严的沉寂后来我又在同一个大厅里多次体验到这种感觉，我将永远记住在所有在场的人的见证下。

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当最后一句话说完，会议才唱国歌来宣泄自己的感情。我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一直看着这一幕分钟后，大厅里的人慢慢地散去，直到那时我才离开讲台，心情愉快，然后回家。

第一次会议的照片是在慕尼黑的克罗内马戏团拍摄的。这些照片更有说服力比言语更能证明这次会议的成功。资产阶级报纸转载了照片，并报道这次会议仅仅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一一在他们的他们以惯常的谦虚方式省略了对其发起人的任何提及。

这样，我们第一次远远超出了普通党派的界限。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被忽视，为了消除所有怀

疑，这次会议仅仅是一次孤立的成功，我立即并于下一周在 Circus Krone 安排了另一场演出，结果相同。

宽敞的大厅再次挤满了人，以至于我决定举行第三次会议接下来的一周，在同一个大厅里这座巨大的建筑第三次挤满了人。

人们。

在 1921 年初取得这些初步成功之后，我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在慕尼黑的活动。我不仅每周举行一次会议，但通常每周举行两次会议，夏季和秋季也经常举行会议。

每周举行多达三次会议。

我们定期在马戏厅见面，我们很高兴看到每次见面都带来了对我们而言是同样的成功标准。结果是支持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党员。

当然，我们成功的消息并没有让我们的对手安然入睡。起初他们的战术在使用恐怖手段和保持沉默之间摇摆不定。但他们被迫意识到恐怖主义和沉默都无法阻碍我们运动的进步，他们诉诸于最高恐怖主义行为，旨在彻底终止我们关于举行会议。

作为采取这一行动的借口，他们利用了对其中一个州议会议员埃哈德·奥尔。据称有人朝这边开了几枪一天晚上，一名男子被枪击中，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并没有被击中，但有人试图向他开枪。

社会民主党领袖不仅具有非凡的镇定和英雄的勇气挫败了这次企图谋杀他的卑鄙行动，同时也击退了那些疯狂的刺客。

他们行动迅速，逃窜至很远，警方随后甚至没有发现任何他们的踪迹。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利用这一神秘事件来激起公众对运动的反感，同时又重复了关于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将确保无产阶级介入时间，阻止我们像绿色的月桂树一样繁茂。几天后，真正的攻击来了。它最终决定中断我们原定于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 Hofbräuhaus 啤酒屋，我本人也将在那里发表演讲。

1921 年 11 月 4 日晚上六七点钟，我收到了第一个明确的会议肯定会被解散，而为了执行这一行动，我们的对手决定派遣大批在某些“红色”工厂工作的工人参加会议。

工厂。

由于一次不幸的事故，我们没能早点收到这个消息。那天，我们放弃位于慕尼黑 Sterneckergasse 的旧营业办公室并迁至其他处所；或相反，我们放弃了旧办公室，而新的办公场所尚未投入使用。

旧办公室的电话已被切断，新办公室的电话还未安装。

因此，我们多次试图通过电话通知我们分手的消息，但当晚的计划失败了。

因此，我们的警卫没有出席那次会议。

只有一个班，不是通常的一百人，而是只有大约四十六岁时，我们发出警报的机器还不够完善，我们无法能够在小时内召集足够数量的警卫来处理局势。

还必须补充的是，此前我们已经多次收到警告，但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有句老话说，预测的革命很少发生。

迄今为止，在我们的案例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当天没有采取足够预防措施的另一原因应对对手破坏我们会议的残酷决心。

最后，我们认为慕尼黑的皇家啤酒屋并不适合我们的对手。我们更害怕在更大的大厅里发生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马戏团里克罗恩，但在这一点上，那天晚上我们得到了非常有用的教训。

后来，我们对整个问题进行了科学研究，得出了一些既有趣又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对后来确定组织至关重要，并且我们的冲锋队的战术。

那天晚上 7:45，当我到达 Hofbräuhaus 的入口大厅时，我意识到那里毫无疑问红军的意图。大厅挤满了人，因此警察封锁了入口。我们的对手我们很早就到了，在大厅里，而我们的追随者大部分都在外面。

冲锋队一小队保镖在入口处等着我。我打开了通往校长办公室的门。

大厅关闭，然后叫四十五、四十六名保镖上前。

我向他们明确表示，也许那天晚上他们将第一次展示他们的对运动坚定不移和牢不可破的忠诚，我们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大厅，除非他被抬出去时已经死亡。

我补充说，我会留在大厅里，我不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抛弃我，如果我发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胆怯，我就会亲自扯下他的臂章和他的徽章。

我要求他们，如果有人试图破坏会议，他们必须记住，最好的防守永远是进攻。

他们回答了我三声“嗨”，声音比平时更加沙哑，也更加热情。

然后我穿过大厅，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们的对手他们坐在一起，试图用目光刺穿我。无数双眼睛里闪烁着仇恨和愤怒集中在我身上，而其他人则以嘲笑的面孔向我喊叫和威胁说他们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照顾好自己”并表示他们将“一劳永逸地堵住我们的嘴”，以及其他同样品格高雅。

他们知道自己人数占优势，所以采取了行动因此。但我们还是能够开始会议，我开始讲话。

在大厅里在 Hofbräuhaus 我总是靠着一侧的墙站着，我的平台就是一张啤酒桌。

因此我总是坐在观众中间。

也许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我从未察觉过的氛围别处。

在我面前，尤其是在我的左边，只有对手，坐着或站着。他们大部分是来自马菲工厂、库斯特曼工厂和伊萨里亚工厂的健壮青年和男子。

作品等他们沿着大厅左边的墙壁挤到我的桌子旁边，开始收集啤酒杯，也就是说，他们一杯接一杯地点啤酒，然后把空杯子放在在桌子底下。

这样，他们就成功地收集了整组弹药，而且没有人会如果会议能够平静地结束，我会比我更惊讶。

尽管有那么多的干扰，我还是讲了一个半小时，我开始感觉我能够掌控一切局面。

甚至连骚乱者中的头目似乎也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逐渐变得更加不安，经常离开大厅，然后回来以明显紧张的方式与他们的部下说话。

我在回答别人的打扰时犯了一个小小的心理错误，这个错误让我话一出口，我自己就意识到了，这是爆发的信号。

突然传来几声愤怒的叫喊，然后一个男人跳到椅子上大喊‘自由！’听到这个信号，自由的捍卫者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一会儿，大厅里就挤满了尖叫的人群。

无数啤酒杯像炮弹一样在他们头顶上飞来飞去。在一片喧闹声中，人们听到椅子被撞倒的声音腿、杯子碰撞的声音、喊叫声、叫喊声和尖叫声。

那是一场疯狂的喧嚣，我真想在资产阶级会议上看到这样的场面。我站在那里，看到我的士兵们每个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乐趣才刚刚开始，我的“冲锋队”（从那天起他们被这样称呼）就发起了进攻。他们像狼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向敌人扑去，成群结队八到十岁，并开始稳步将他们赶出大厅。

五分钟后，我几乎看不到一个不流血的人。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我勇敢的莫里斯和赫斯，他是我的私人今天的秘书，还有许多其他人，尽管受了重伤但还是再次发起了攻击只要他们能够站立。

混乱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那时我们的对手已经七八百人被我的手下赶出大厅或扔出去，他们不足五十。

只是，在左边的角落里，一大群人仍然站在外面，与我们的士兵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随后，大厅入口处响起两声枪响，随即爆发出疯狂的枪战四面八方。这情景让人回想起战争，心里几乎欢喜。当时还无法确定开枪的人是谁，但无论如何，我可以看到我的士兵们更加愤怒地重新发起攻击，直到最后最后的扰乱者被制服并被扔出了大厅。事情开始后大约过了二十五分钟。大厅里就像被炸弹炸了一样那里。我的许多战友正在包扎，其他人被带走，但我们仍然会议主席赫尔曼·埃塞尔宣布，“会议将继续。发言人将继续发言。”于是我继续我的演讲。当我们自己宣布会议结束时，一位兴奋的警察冲了进来，挥舞着他的并宣布“会议解散。”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法律拖延的例子。这是典型的警察。他们越是微不足道，就越是试图显得重要。那个晚上给了我们很多教训，我们的对手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得到的教训。直到 1923 年秋天，慕尼黑邮报才再次用紧握的拳头威胁我们无产阶级。

## 第八章 强者恒强

没有盟友在上一章中，我提到了德国爱国社会。这里我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合作社时，我们通常指的是一群社团，目的是促进他们的工作，建立相互关系以便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任命一个拥有不同权力的共同管理委员会，以采取一致行动。这一事实表明，这些社团、协会和政党，其目标和进程行动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且有人断言这始终是正确的。当普通公民听说这些社会通过建立合作协会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可以立足团结一致，消除了一切分歧根源。由此产生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这种联盟将极大地增强力量小团体在孤立无援时是弱小的但现在却突然变得强的。但这种看法总体上是错误的。这将是有趣的，并且在我看来，对于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很重要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协会、工会等当所有人都宣称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时，这个联盟就成立了。期望一个目标由一个协会来争取本身就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它如果没有多个协会为了同一

目标而斗争的话，这样做会更明智。

最初无疑只有一个协会拥有这一固定目标。

有些人在某个地方陈述了一个明确的事实，呼吁解决一个明确的问题，阐明了他们的目标并创立了一项旨在实现该目标的运动。

这就是一个协会或政党的成立方式，其纲领可能是废除现存的邪恶或未来某种秩序的积极建立。

一旦这样的运动开始存在，它就可能实际地要求某些优先权。

现在，事情的自然发展将是，所有那些希望为同一目标而奋斗的人我们应该认同这个运动从而增强它的力量，或许这样更能达到共同的目的。

尤其是那些智力超群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到，通过加入运动，他们正是建立在共同目标上取得实际成功所必需的条件斗争。

因此，这是合理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诚实的——正如我稍后将要说明的，这种诚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一个运动应该成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目标。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必须归因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几乎可以描述为前者是悲剧性的；后者是卑鄙的，因为它源于人性的弱点。

但归根结底，我认为这两个原因都能够加强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精力，通过人类活动的加强，使得所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

悲剧性的原因是，为什么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项明确的任务不能留给一个人去完成联想本身的意义如下：一般来说，每一个大规模的行动都是表达了数百万人心中早已存在的渴望，一种渴望它或许在默默中得到滋养。

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一直渴望解决一个因为他们一直处于难以忍受的状态，没有希望实现普遍的渴望。

那些不再能够通过英雄事迹摆脱这种悲惨命运的国家可能会被视为无效。

但另一方面，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权的保障，而不是有一天，通过命运的幸福法令，一个人出现了，他能够把他的人民从巨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或者消除一些痛苦的苦难，或安抚因不安全感而饱受折磨的民族灵魂，从而满足了人民群众长期以来的普遍渴望。

所谓时代重大问题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成千上万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许多人觉得自己有责任完成这项任务；甚至可能是命运女神亲自提出了许多选择，以便通过自由发挥在所有事件中，最强大、最有能力的人最终将成为胜利者，并被赋予解决问题的任务。因此，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可能对形式感到不满他们的宗教生活在其中表达并渴望改革。

因此，通过这种灵魂的冲动，可能会出现几十个人，他们相信凭借他们的理解和知识，他们能够解决当时的宗教困难，因此把自己表现为一种新教义的先知或者至少是公开反对公认的教条。

在这里，自然法则也一定会发挥作用，因为最强大的力量注定要完成伟大的使命，但通常其他人都很难意识到，只有一个人被要求完成这项任务。

相反，他们都认为自己有平等的权利参与解决所讨论的困难，并且他们也同样适合这项任务。

他们的当代世界通常无法决定他们中谁拥有最高的礼物，因此值得普遍支持。

因此，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实际上往往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人建立了不同的动作来达到相同的目的。

至少运动的创始人宣称结局是一样的，或者可以看作是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人们怀有模糊的欲望，只有一般的意见，没有任何确切的概念他们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或者这些理想和愿望是否可能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



渴望得到满足。

悲剧在于，许多人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每个人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并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走自己的路，不顾别人。

这些运动、党派、宗教团体等完全独立地产生于时代的普遍要求，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件悲剧，因为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分散在不同方向的力量会远远达不到目的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就会更快、更顺利。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大自然本身按照其不可抗拒的逻辑规则做出决定。她让这些不同的群体相互竞争，争夺胜利之手，最后，引导这一运动走向选择了最清晰、最短和最可靠的道路的最终目标。

如果现有力量没有自由地被给予，世界如何能决定哪条道路是对的或错的？游戏，如果最终决定权不掌握在那些深信自己绝对正确，并留给既定成功的绝对检验，这始终是最终的确认行动过程的正义性。

因此，如果不同的团体通过不同的途径努力实现同一目标，那么他们就会因为他们知道其他地方也在做类似的努力，所以更加批判地审视自己的程序方法，尽可能简化程序，并尽最大努力，争取达到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

通过这种竞争，每个主角的能力都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完美主义和人类的进步往往归功于前辈的经验教训。

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因此，在最初分散个人的努力时，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责备，乍一看似乎充满了悲剧性后果我们可能会认识到最终选取最佳方法。

历史表明，正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那样，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问题可能已经达到了，其主要倡导者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与霍亨索伦王朝，从一开始就应该联合起来。

这些人认为，双方应该决定走哪条路，或者走那条路。

但那时，所选择的道路必然是当时的竞争对手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奥地利的目标永远不会包括建立德意志帝国。

最终，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于数百万德国人民的他们内心对此深感悲痛，认为这是我们兄弟相残的最后也是最可怕的表现。

事实是，德意志帝国皇冠的柯尼格拉茨战场，而不是像后来普遍声称的那样，在在巴黎以外进行。

因此，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并不是任何共同意志的结果这与常见的思路一致，但它更像是一种故意的，有时是无意识的，争夺霸权的斗争，最终普鲁士取得了胜利。

任何人，只要没有被党派政治蒙蔽双眼而无法认清事实，就必须承认人类的所谓智慧永远不会做出与人类相同的明智决定。

生命本身的智慧，即力量的自由发挥，最终得以实现。

因为在两百年前的德国领土上，谁会真正相信霍亨索伦普鲁士，而不是哈布斯堡，将成为普鲁士的核心、创始人和导师。

新帝国？另一方面，今天谁会否认命运比人类智慧。现在谁能想象一个德意志帝国建立在一个衰弱和衰败王朝？尽管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斗争，事件的自然进程最终还是给了优越者强制其占据适合的位置。

这一点将永远如此，并将一如既往地成为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因此，它不是一个如果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手段来达到同一目标，那就太遗憾了。

这样，最强大、最敏捷的人就会被认可并成为胜利者。

还有第二个原因，即在国家生活中，经常会发生几场运动，表现出相同的特征，通过不同的途径努力达到看似相同的目标。

第二个原因根本不是悲剧，而只是值得蔑视。

它源自令人悲伤的嫉妒、妒忌、野心和掠夺本能。不幸的是，这些人类的某些缺陷往往集中出现在单个个体身上。

一旦一个人深刻理解他的人民的苦难，并且准确诊断出邪恶，采取措施治愈它；他一旦确定目标，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然后那些微不足道、吹毛求疵的人就会全神贯注，热切地关注这位已进入公众视野的人的所作所为。

就像麻雀，表面上漠不关心，实际上却敏锐地观察着他们比较幸运的同伴拿着一小块面包以便他们可以从他手中抢走它，如果他应该暂时放松控制，人类也是如此。

只需要一个人开辟一条新路，然后一群懦夫就会竖起耳朵，开始希望在路的尽头能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收获。

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收获回报的地方时，他们就急忙去寻找另一条可以更快达到目标的路线。

一旦一个新的运动建立起来，并制定了明确的纲领，这种人站出来宣称他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愿意加入这样的运动，因此承认其优先权。

这反而意味着他们打算窃取该计划并成立新政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厚颜无耻地向不加思考的公众保证，他们早就打算采取同样的路线对方现在采取的行动，并经常成功地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而不是引起他们应得的普遍谴责。

因为窃取他人的口号并宣称为自己口号，是一种极其无耻的行为，窃取另一个人的计划，然后成立一个单独的团体，好像这一切都是由本团体的新创始人。

这种行为的无耻性尤其明显，当那些首先通过他们的新基础造成分散和破坏的人，就是那些（作为经验表明）最强调的是宣扬团结和统一的必要性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赶上对手的前进时。

所谓的“民族解体”就应归咎于这种行为。

当然，在 1918 年至 1919 年间，成立了许多新的团体、政党等，民族主义是当时的自然现象，建国者们并不负责任的。

到 1920 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已经慢慢从所有这些政党中结晶而来，并已成为最高权力。

没有什么比以下事实更能证明某些创始人的诚实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决定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牺牲他们显然不太成功的通过无条件地加入更强大的运动并解散自己的运动，使这些运动向更强大的运动靠拢。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Julius Streicher) 尤其如此，他当时是纽伦堡德国社会党。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的成立也怀有类似的目标，但独立于其他。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施特赖歇尔当时在纽伦堡当老师，他是德国社会主义党。他对自己运动的使命和未来有着神圣的信念。

然而，当他意识到国民党的强大力量和更加稳定的发展时，社会党，他放弃了在德国社会党的工作，并呼吁他的追随者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保持一致，后者在相互竞争，并在其队伍中为共同的事业而斗争。决定是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这表现出了他深刻的荣誉感。

当运动的第一阶段结束时，军队不再分散，因为他们的真诚意图使当时的人们也同样光荣、坦率、公正结论。

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解体”完全归因于我刚才提到了两个原因。

雄心勃勃的人，起初没有自己的想法，更没有“要实现的目标”的概念。

追求，感到自己正是在国家成功的时刻“被召唤”。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已无可争议。

突然出现的节目仅仅是我们节目的记录版。

他们宣扬着从我们这里窃取来的思想。他们阐明了我们为之而奋斗的目标。

已经斗争了好几年，并且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已经长期跟随。

他们用尽各种手段试图让公众相信，尽管人们发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建立这些新政党是必要的，但提出的动机越高尚，措辞不真诚。

事实上，只有一个主要动机，即创始人的个人野心，他们希望扮演一个角色，他们自己的侏儒才能除了草之外什么也贡献不出来厚颜无耻地窃取他人的想法，这种行为在日常生活被视为视为偷窃。

那时还没有其他人提出任何思想或概念，可以与这些政治盗窃癖患者并没有立即抓住机会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目的。

做这一切的人，后来也含着眼泪，深深地对“民族主义解体”表示痛惜，并不断强调“统一的必要性”。

他们这样做，心里暗自希望，希望自己能够打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会厌倦了听到这些大声的指责，最终会放弃支持窃贼，不仅窃取了后者已经窃取的思想，而且窃取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运动以实现这些想法。

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时，由于发起人的心态不佳，新企业之前承诺的良好结果并没有显现出来，因此变得更加他们谦虚谨慎，如果能在所谓的“合作协会”。

在那个时期，所有无法独立生存的企业都加入了合作社。

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八个瘸子手挽手就等于一个角斗士。

如果在所有这些残疾人中，有一个四肢健全，他就必须用尽全力维持其他人的生命，因此从长远来看，他自己也变得残废了。

我们应该把加入这些合作社的问题看作是一个策略问题，但在做出决定时，我们绝不能忘记一个基本原则，即通过合作社的成立，本身就很弱的社会永远无法形成而一个强大的社会或政党失去力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且并不罕见。

加入弱国联盟。

相信弱势群体的联合会产生力量，这是错误的。

因为经验表明，无论以何种形式、在任何条件下，多数人都代表愚蠢而懦弱的分子因此，多个社团或政党一旦受到一个委员会的控制，由政党选举的几个人组成的管理层，是软弱的受害者，怯懦。

通过这样的联盟，力量的自由发挥被瘫痪，选择最佳力量的斗争被削弱。

被废除，从而更健康、更强大的元素的必然和最终的胜利是受阻。

这种联盟不利于自然发展，因为它们大多阻碍而不是促进问题的解决这是斗争的目标。

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从纯粹的策略角度考虑，一个运动的领导人展望未来将与其他运动结成联盟，以解决特殊问题并且还可以与他们共同行动，但这只能持续短暂而有限的时期。

如果该运动不想放弃其解放使命，因为如果它应该不可分割地与这样的组合联系在一起，它就会失去能力和允许其自身力量自由发挥作用以遵循自然发展的权利，以战胜对手，达到自己的目标。

永远不要忘记，世界上没有一件真正伟大的事情是通过联盟，但这样的成就始终归功于个人的胜利。

通过联盟取得的成功，由于其来源的性质，源自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未来解体的萌芽，以及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的可能性实现。

人类思想中发生的伟大革命改变了如果没有人民发起的艰苦斗争，这个世界将是不可想象和不可能的。

这些行动绝不可能是联盟的杰作。

最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永远不会通过合作的妥协态度而建立而仅仅依靠一个运动的铁一般的决心，这个运动一直在奋斗，战胜了所有其他的人。

## 第九章：冲锋队的性质和组织

旧国家的力量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君主政体、公民政治服务和军队。

1918 年革命废除了政府形式，解散了军队，放弃了公务员制度导致政党政治腐败。

这样，所谓国家权威的根本支撑就被摧毁了。这种权威几乎总是依赖于三个要素，它们是一切权威的根本基础。

民众的支持是建立权威的首要因素，但权威仅仅依靠这个基础仍然相当脆弱、不确定和摇摆不定。

因此，任何人如果发现自己的权力仅仅建立在民众的支持之上必须采取措施，通过获得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把权力，即使用武力的能力，视为第二个一切权威都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这种基础更加稳定和安全，但并不总是如此。

比第一个更强。

如果民众的支持和权力能够团结起来并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当局就可能而这一演变则建立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传统的权威。

最后，如果民意、权力和传统结合在一起，那么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权威可能被视为无敌的。在德国，革命废除了这最后的基础。甚至连传统的权威。随着旧帝国的崩溃，君主制政府的废除，所有古老的伟大标志和帝国象征都被摧毁，传统被打破了一击。

其结果是，国家权威根本动摇了。

国家权威的第二支柱，即权力，也不复存在。

为了进行革命，必须解散这个迄今为止吸收了国家有组织的力量和权力，即军队。事实上，一些军队本身的部分力量必须被用作革命的战斗力量。

前线的军队没有受到同样程度的破坏，但是他们渐渐地把他们曾经英勇战斗的光荣战场抛在身后四年半以来，他们一直受到腐蚀性酸液的侵袭，这种酸液正在摧毁他们的纪律。

当他们到达复员中心时，他们陷入了混乱的状态这在士兵时代被称为‘自愿服从’理事会。当然，不可能在这么多人中建立任何权威。

叛变士兵将军事服役视为每天八小时的工作。

因此，第二个要素，即保证权威稳定的要素，也被废除了革命只具备原始要素，即民众支持，以此来建立其权威，但这个基础极其不牢固。

革命一举摧毁了旧的国家大厦，但这只是因为国家社会结构的正常平衡已被战争破坏。

每一个国家团体都由三个主要阶级组成。一个极端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人，认为“最佳”一词指的是那些具有高度公民美德的人，并且因其勇气和愿意牺牲私人利益而闻名。

另一个极端是人类最恶劣的渣滓，他们身上盛行着邪恶和自私自利。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第三阶级，由广大的中间阶层组成，它既不包含光辉的英雄主义，也不包含庸俗的恶习。

那些标志着一个国家崛起的时代，其特征和可能性仅仅在于它们发生在属于最好的极端的那个部分的独家领导下人口。

正常和稳定发展时期，或稳定条件时期，其存在和外表现明显的特点是中间阶层的影响力占主导地位。

在这个阶段，两个极端的阶级互相平衡，换句话说，它们互相抵消。

其他。国家崩溃的时候，是由最坏的因素主导影响决定的元素。

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广大群众，也就是我所说的中间派，只有当两个极端派别交锋时，他们才会站出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相互冲突中，如果其中一个极端部分取得胜利，中间部分就会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它的统治。

如果最好的占主导地位，广大群众就会追随它。如果最坏的极端取得胜利，那么中间派至少不会反对，因为构成中间派的群众阶层从不打自己的仗。在战争破坏了这三个部分之间的内部平衡，可以说（尽管我尊重中间部分的牺牲）以至于它几乎走向了最好的极端被血染成白色，因为在这些战争中失去的无可替代的、英勇的德国人的生命总数四年半的时间真是太了不起了。

想想成千上万个需要志愿者上前线的例子，巡逻志愿者、调度志愿者、安装电话志愿者，桥梁建设志愿者、潜艇志愿者、空军志愿者，冲锋营志愿者等等。

四年半的时间里，成千上万次，我们总是在呼唤志愿者志愿者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总是一样的。

无论是没有胡须的年轻人还是完全成熟的男人，都对自己的国家怀有热烈的爱；凭借自己的勇敢精神或崇高的责任感——总是这样的人响应志愿者的号召。

这样的案例有几万，甚至几十万，所以这种人力材料变得越来越稀缺。

那些没有被杀死的人要么在战场上致残，要么由于战争而逐渐消失幸存者的数量持续减少。

首先，我们要记住，1914年的军队都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因为我们无能的议员缺乏良知，没有收到法规他们没有接受和平时期的训练，结果成了手无寸铁的炮灰，任由敌人摆布。

在佛兰德斯战场上阵亡或永久致残的四十万人他们的损失远不止人数上的损失。随着他们的死亡，天平在最好的一端显得太轻，因此迅速向上倾斜，粗俗、无耻、懦弱的分子，简言之，就是我们社会中最坏的极端分子。

人口，在平衡中占据比以前更重要的地位。

此外，四年半以来，我们最好的人类材料被稀疏到战场上异常的程度，而最糟糕的极端则超越了自我的艺术保存。

对于每一位做出巨大牺牲、登上瓦尔哈拉殿堂的英雄志愿者来说，是一个逃避死亡的人，他借口自己正在做更重要的事情，或者在国内的国家重要性较低。

因此，战争结束时的情况如下：国家的中产阶级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付出了血的代价。

人口的一端，是由最优秀的元素组成的，具有模范的英雄主义，几乎为一个人牺牲了自己。另一个极端，是由人口中最坏的因素组成的，保留了通过利用荒谬的法律，以及当局未能执行军事法典的某些条款。

我们国家精心保护的败类策划了这场革命，而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由最佳元素组成的极端部分不再存在反对它。它不再存在了。

因此，德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只依赖于一部分人口。这种该隐的行为并不是由德国人民自己犯下的，而是由一个不知名的逃兵、流氓等乌合之众前线的那名男子欣喜地迎来了这场血腥战争的结束。他很高兴能够回家，再次和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但他没有道德上与革命没有联系。他不喜欢革命，也不喜欢那些挑起革命的人。

组织了它。

在前线四年半的艰苦奋斗中，他渐渐忘记了党家里的鬣狗和它们之间的争吵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

革命真正受到德国人民的欢迎的只有一小部分人，即阶级和他们的同伙们选择背包作为所有荣誉市民的标志在这个新的国家。

他们并不是因为革命本身而喜欢革命，而许多人至今仍然错误地认为，他们喜欢革命是为了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后果。

然而，很难确定民众对这些运动的支持程度。

马克思主义的海盗，然而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权威，除非准备在短暂的混乱之后被一股复仇力量突然推翻那些仍然保留在人口最极端的最后元素。

当时负责革命的人最担心的危险是，他们自己制造的混乱，地面会突然塌陷他们可能会被铁手突然抓住，并被送到另一个环境，这种现象在各国历史上的这些关键时刻常常体现出来。

共和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因此，它几乎在建国后立即被迫在其摇摆不定的人气支柱之外，再建立起另一根支柱。其发起人发现必须再次组织权力，以便为其获得更坚实的基础权威。

当那些在 1918 年十二月革命、一月革命和 1919 年 2 月，他们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颤抖，他们环顾四周，寻找那些准备以军事力量来支持其受欢迎程度所导致的不安全地位让公众能够负担得起。

“反军国主义”共和国需要士兵。然而，由于国家权威的基础，即它的受欢迎程度，仅仅建立在流氓、小偷、强盗、逃兵、逃避兵等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邪恶的极端国家，指望它能提供这样的人是徒劳的愿意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孕育革命思想并进行革命的那一部分人既不是无法也不愿意派人来保护它，因为那个部门根本不想组织一个共和制国家，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本能。

他们的口号不是德意志共和国的组织和建设，而是掠夺它。

因此，遭到上千名民众的围攻，公众代表发出求助的呼吁焦虑，并没有在这个阶层的人中

找到任何回应，反而激起了一种感觉痛苦和否定。

他们认为这一举措违背了信仰和信任，阻碍了建立权威。

不再基于民众支持，也基于武力，他们看到了斗争的开始反对这些分子认为革命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一群小偷和强盗，简而言之，最坏的乌合之众，对社会进行掠夺和绝对统治。

逃出监狱，丢掉锁链。

人民代表可以尽情呼喊，但却得不到任何帮助那群乌合之众只会喊着“叛徒！”揭示了人民的态度，而这个政权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人气，正是建立在人民的支持之上。

当时，大批德国年轻人第一次准备穿上军装再次像他们所相信的那样，为“法律和秩序”服务，扛起步枪，穿上戴上钢盔，保卫祖国的破坏者。

志愿军团被召集起来，尽管他们憎恨革命，但他们还是开始保卫和牢固地建立它。他们以完美的诚意这样做。

革命的真正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是国际犹太人，正确评估了形势。

德国人民还没有成熟到被卷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血腥沼泽，因为俄罗斯人民已被吸引。

这是因为德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体力劳动者，也因为，正如西欧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总体来说，社会上大多数阶层都有一定数量的文化人，而这个但俄罗斯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那个国家，知识分子阶层大部分不是俄罗斯国籍，或者至少他们不具备斯拉夫人的种族特征。

当时俄国存在的薄弱的上层知识分子阶层随时可能被消灭，因为没有中间层把它和大部分人民。那里绝大多数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极其低下。

在俄罗斯，煽动者一旦成功煽动广大民众，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与没有接触的上层知识分子相比，群众，或者以任何方式与他们永久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的命运就被决定了革命得到保证。

于是，这位文盲俄罗斯人就成了犹太独裁者的奴隶，而犹太独裁者则他们精明地将他们的独裁统治称为“人民独裁统治”。

就德国而言，还必须考虑一个额外的因素。

在这里，革命要想进行，只有军队能够逐步肢解。

革命和军队解体的真正始作俑者不是士兵曾在前线战斗过，但或多或少避开光明的下等人要么驻扎在在本土驻军中或在商业世界中担任“不可或缺”的职务家。

这支流氓得到了一万名逃兵的增援，他们没有冒什么特别的风险，可以背弃战斗前线。真正的懦夫最害怕的就是死亡，但是在前线，他每天都要面对千姿百态的死亡。

总是有一种可行的方法，而且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人变得软弱或动摇，甚至彻头彻尾的懦夫，坚定地面对自己的职责，那就是让逃兵明白他的逃跑将会给他带来他所逃避的真正后果。

在前线，一个人可以死，但逃兵必须死。只有这种对每一个人的严厉威胁试图抛弃国旗会产生恐吓效果，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质量。这就是军事刑法的意义和目的。

相信为一个国家生存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可以如果仅仅基于自愿的忠诚，并由认识到这样的斗争是必要的。

自愿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决定最优秀之人行为的动机，但不是普通类型的人。

因此，需要有专门的法律，例如，反偷窃法，适合原则上诚实的人，但适合软弱和不稳定的人。

此类法律旨在通过威慑作用阻止作恶者，从而防止出现以下情况诚实的人会被认为是愚蠢的，最终会让人相信诚实的人是愚蠢的。

与其两手空空地袖手旁观，不如参与抢劫，被抢劫了。

错误地认为，根据人类的估算，这场斗争可能持续几年后，就有可能放弃那些数百年甚至

数千年的时间已经证明，它能够有效地使脆弱和不稳定人们在困难时期和精神压力极大的时候面对并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于志愿战争英雄来说，军队中当然没有必要判处死刑代码，但对于那些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他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懦弱的自私自利者来说，这是必要的。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社区。

要想阻止这些软弱无能的人屈服于懦弱，唯一的办法就是适用最严厉的刑罚。

当人们每天都要与死亡抗争，并在泥潭中呆上数周之久时，常常食物供应非常差，对自己没有信心，开始动摇的人是无法被以监禁甚至苦役相威胁，坚持自己的岗位。

只有通过无情地执行死刑才能实现这一点，因为经验表明，在这种时候，弱者认为监狱比战场好一千倍。在监狱里，他的宝贵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

战争期间废除死刑，也就是说，军事刑法从实际目的来看，被搁置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大批逃兵涌入后方车站或返回家乡，尤其是在 1918 年，我们突然面临的庞大的犯罪组织开始形成，之后 1918 年 11 月 7 日，引发了革命。

这一切和前线无关。前线的士兵们自然渴望和平，但正是这个事实对革命来说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危险，因为当停战后，德国士兵开始逼近家乡，革命者们忐忑不安，一遍又一遍地问“前线的部队会做什么？那些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会代表它？”在那几周里，革命被迫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如果不冒被几个德国师迅速摧毁的风险，它就必须节制。

因为当时，如果一个师的师长下定决心要召集他的士兵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指挥官，参加了一次猛攻，摧毁了红旗，把“委员会”逼到墙角，或者，如果有任何抵抗，就用有了迫击炮和手榴弹，这个师就可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六十个师的军队少于四周。

犹太幕后操纵者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前景，为了防止为了应对这一特殊的危险，他们认为有必要赋予革命一定的温和性。

他们不敢让它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但当时的情况使他们不得不产生一种“法律和秩序”的假象——因此做出许多重要的让步，呼吁旧公务员制度和旧军队领导人。

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他们是需要的，而且只有当他们完成任务后，才能他们被毫无顾忌地解雇，共和国被彻底从老仆人的手中夺走并落入革命者的魔掌。

他们认为这是愚弄老将军和公务员的唯一手段，也是通过看似无害和温和的性质预先消除任何可能的反对新政权。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阴谋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然而，革命并不是由国家中和平有序分子发起的，而是暴徒、小偷和强盗，以及革命的发展方式不符合具有后者元素的意图。

然而，从战术角度来看，不可能向他们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并使该课程可接受。

随着社会民主党逐渐掌权，它越来越失去了粗暴的革命党。当然，社会民主党人内心深处想要一场革命，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其他目的。

但最终的结果只是一项革命纲领和一群不再有能力并将其付诸实施。

一个拥有数百万党员的政党不可能进行革命。

在这样的运动中，不再有活动的高潮，而只是广大群众中间层，也就是惰性。

犹太人认识到了这一切，即使在战争期间，也带来了社会的著名分裂。

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顺应其群众的惯性，紧随其后的是，像铅块一样挂在国防脖子上的积极激进分子从中提取元素并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攻击力量。

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是革命的冲锋队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目标是创造既成事实，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群众已经为这一事件做好了准备，因此可以采取自己的立场很久以前。

马克思主义者对没有气节的资产阶级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并用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

没人关心这件事，因为他们深知，在他们犬类的奴性中，代表着一个古老而疲惫不堪的一



代将无法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

当革命成功，革命的策划者们相信旧国家的支柱已经被击溃，从前线返回的军队开始出现在险恶的光芒中狮身人面像，因此有必要减缓革命的自然进程。

社会民主党主力占领了被占领的阵地，独立和斯巴达克斯的突击营被转移了方向。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毫不费力。

发动革命的积极进攻部队不仅感到不满，而且感到他们被出卖了，他们渴望继续战斗，但他们不受制约敲诈勒索甚至得到了革命幕后操纵者的认可，因为革命本身已经这项任务刚刚完成，它就似乎分裂成了两个阵营。

一方阵营中是法律和秩序的元素，另一方阵营中是血腥和恐怖主义的元素。

我们的资产阶级热烈拥护法律和秩序？这些可怜的政治组织曾经一度发现可以采取行动，因为尽管承认这一点，他们已经获得了第一个立足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与他们所憎恨但又惧怕的势力结盟。

德国政治资产阶级获得了能够与为了打击布尔什维主义而诅咒马克思主义领袖。

因此，早在 1918 年 12 月和 1919 年 1 月，情况就是如此：少数策划了这场革命的都是最坏的分子，而在这个少数派的背后，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即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革命本身具有温和的外表，这引起了狂热的极端分子。他们开始诉诸手榴弹和机关枪，占领公共建筑，从而威胁到摧毁革命的温和潮流。

为了防止恐怖主义进一步发展，代表们达成了停战协议新政权和旧秩序的追随者，目的是进行共同的斗争打击极端分子。

结果是共和国的敌人不再反对共和国，并帮助征服那些同样是共和国的敌人，尽管原因完全不同，但进一步的后果是，旧国家的追随者反对新的情况现在已经完全避免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一事实。

只有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拥有十分之九的人民没有参加革命，而十分之七的人拒绝革命，十分之六的人厌恶革命，允许剩余十分之一的人口将革命强加于其上。

斯巴达克斯阵营中的街垒英雄逐渐消失，民族主义爱国者也逐渐消失另一边是理想主义者。随着这两派逐渐减少，中间派的群众阶层取得了胜利，而且他们永远都会胜利。

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会面，共和国开始了巩固起来。然而，起初这并没有阻止资产阶级政党继续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选举中，他们一直在宣扬他们的君主主义思想，并努力唤起逝去的过去的精神来鼓励和再次赢得他们自己软弱的热心的追随者。

这不是一种诚实的做法。他们内心早已与君主制决裂；但新政权的邪恶已经开始扩大其腐败行为，并在阵营中显现出来。

资产阶级政党。

现在，普通资产阶级政客在共和党腐败的泥潭中比在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严厉紧缩政策，仍然留在他的记忆中。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旧军队被摧毁之后，革命领导人被迫通过创造新的权力因素来加强国家权威。

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有争取一个与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截然相反的世界观。

仅从这些因素就有可能慢慢地建立一支新军队，其数量受到和平条约的精神必须经过转变才能成为新政权。如果撇开旧政权的真正缺陷不谈，旧政权无疑构成了一个促成因素，我们问自己，革命行动如何能够成功，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是由于我们的责任感和服从。

其次，也由于那些本应维护状态。

此外，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的责任感和服从感的僵化过程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完全是非国家性的，纯粹是国家教育，这导致了混淆了“手段”和“目的”这两个概念。

责任意识、责任履行和服从，本身并不是目的，国家本身就是目的，但它们都应该被用作促进和确保存在一个由身体上和精神上相似的人们组成的社区。

当一个国家明显崩溃，当所有外在迹象都表明它即将由于少数恶棍的行为，成为无情压迫的受害者，服从这些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只是教条的形式主义，而且是纯粹的蠢事。

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服从和“完成指定的任务”可能会挽救国家免于崩溃。

按照我们目前的资产阶级国家观念，一个师里的将军从他的上级下达不开枪的命令，履行了他的职责，因此不开枪的行为是正确的，因为，在资产阶级思想里，盲目的服从比一个民族的生命更宝贵。

但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服从弱上级的意识并不是在这样的时刻，承担个人责任是至关重要的。

举国上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个观念不再是我们人民的活力所在，或者而是与我们的政府合作，并导致某种仅仅是形式上的教条主义者。

至于第二点，可以说，各方怯懦态度的真正原因是支持前一种状态的原因是，我们人民中最活跃、最正直的部分战争期间被杀。

此外，资产阶级政党，可以被认为是唯一能够站在旧国家的立场上，他们坚信，他们应该只用知识分子的方式和手段，因为只有国家才允许使用武力。这种观点是一种软弱和颓废逐渐形成的标志，也是毫无意义的当时，战场上有一位政治对手，早已放弃了这一并公开宣称他打算用武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尽可能。

当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资产阶级民主世界时，作为这种民主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出的用思想武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号召是愚蠢的，后来必须为此做出可怕的补偿。马克思主义一直宣称武器的选择必须从权宜之计和成功证明了选择这种武器的正确性。

这个想法在1918年11月7日至11日期间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关心议会或民主，而是给了死亡——通过放出大批罪犯进行枪击和制造混乱来对两者都进行打击。因此，长篇大论的资产阶级组织立刻就失去了防御能力。

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政党改变了公司的名称，突然英雄领袖们从黑暗的地下室或通风的仓库里走出来，已经寻求庇护。

但就像所有过时制度的代表一样，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错误或者学到了什么新东西。

他们的政治纲领植根于过去，尽管他们自己已经成为接受新政权。

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确保在新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他们继续使用言语作为他们唯一的武器。

因此，革命后资产阶级政党也向暴民投降，惨不忍睹。

时尚。

当《共和国保护法》出台时，大多数人最初并不赞成但它面临着二十万马克思主义者上街示威的局面，资产阶级“政客”们惊恐万分，投票支持了这项违背他们利益的法律。

审判，因为他们害怕否则他们可能会被愤怒的离开国会大厦时，群众聚集在一起——不幸的是，这在法律颁布时并没有发生。

已通过。

就这样，新国家按照自己的路线发展，仿佛根本没有任何民族反对。

当时唯一有力量和勇气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被其煽动起来的群众首先是自由兵团，随后是自卫组织。

国防部、市民警卫队，最后是退伍军人协会。原因如下这些机构的存在并没有显著改变德国历史的进程。正如所谓的民族政党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力量来处理面对

暴徒，国防联盟同样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没有政治理想，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归功于政治决心和无情力量。

民族主义德国之所以无法参与塑造发展，是因为缺乏强力与受启发的政治目标之间的坚定合作。

无论“民族”政党的愿望是什么，他们都没有力量至少在街头为这些愿望而战。

权力掌握在防卫联盟手中。他们是街道和国家的主人，但他们缺乏政治理想和目标，无法动员他们的力量德意志民族的利益。

在这两种情况下，狡猾的犹太人都能凭借其精明的说服力，使这种不幸成为事态将永久持续下去，或者至少会使之更加恶化。

犹太人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媒体，向外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国防联盟具有“非政治性质”就像他在政治上总是足够精明一样赞扬斗争的‘纯知识分子’性质，并要求必须永远保持这种性质在那架飞机上。

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傻瓜重复了这种愚蠢的行为，却丝毫没有想到这样做，从实际目的上讲他们就是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解救了自己的性命。

毫无防备地落入犹太人的手中。

这也有一个自然的解释。缺乏一个能够重塑现状的伟大理想一直意味着战斗力的限制。

坚信使用最残酷武器的权利总是与坚信新的革命秩序必将胜利降临到地球上。

不为如此崇高的目标和理想而斗争的运动永远不会诉诸极端手段。一个新的伟大理想的出现是法国成功的秘诀革命。

俄国革命的胜利归功于一个理想，也正是这个理想才使得法西斯主义得以存在给整个国家带来彻底改革的祝福。

资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力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且实现这一成就的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政党。

其政治目的是恢复过去。

这也是国防联盟的目标，因为他们关心政治目标。旧战争军团的精神和 Kyffhäuser 传统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从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有助于削弱民族主义者最锐利的武器德国当时拥有并统治着这些人民，并允许他们堕落到共和国奴隶的水平。

事实上，这些联盟这样做是出于好意，而且确实采取了行动诚意，却丝毫没有改变他们所采取的做法的愚蠢性。

在巩固的国防军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力量支持以行使其权力。

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它废除了防御联盟，因为它认为这些联盟很危险，宣布它们现在不再需要了。一些特别大胆的领导人被认为那些因怀疑而受到审判并被关进监狱，但即便如此，命运还是给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随着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的成立，第一个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这一运动的目标不是机械地恢复而是要建立一个有机的民族国家来取代当今荒谬的国家机器。

从一开始，新运动就坚持这样的原则：它的思想必须得到传播但在必要时，将使用武力来支持其宣传。

由于坚信新学说至关重要，新运动自然相信，当它是一个实现运动宗旨的问题。

我强调过，在某些情况下，一场旨在赢得人民心的运动人民必须准备好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抵御其恐怖主义企图对手。

在世界历史上，正式的国家权力总是无法打破恐怖统治的灵感来自世界观。只有通过一种新的、不同的世界观，其代表人物也同样大胆而坚定。

承认这一事实对于保护但事实依然如此。

只有宪法与法律完全一致，国家统治者才能保障法律和秩序主流的世界观，因此扰乱因素

仅仅呈现出孤立罪犯，而不是被视为与国家意识形态。

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可能会采取几个世纪以来最暴力的措施来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到它；但最终所有这些措施都将证明是徒劳的，国家将不得不屈服。德国国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攻击。在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中七十年来，国家没能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胜利。

尽管服刑和监禁的刑罚总计达数千年，尽管在无数情况下采取了最残酷的措施反对威胁其安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拥护者，最终国家几乎被迫完全投降。

普通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会否认这一切，但徒劳无功。

1918年11月9日无条件向马克思主义投降的国家不会突然明天再次崛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征服者——远非如此！坐在各个部委办公室凳子上的资产阶级傻瓜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不违背工人的意愿进行统治，他们用“工人”这个词来指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将德国工人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他们不仅犯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歪曲。

但他们却试图掩盖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组织。

鉴于现国家完全服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感到更加有义务，不仅要为理想的胜利铺平道路，呼吁公众的理性和理解，同时也要承担起责任组织自己的防御，以对抗国际恐怖主义，而国际恐怖主义正陶醉于其自己的胜利。

我已经描述了我们的年轻运动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如何引导我们逐渐在我们的会议上组织一个辩护体系。

这逐渐形成了一支专门为维护并趋向于发展成为拥有组织有序的干部的服务机构。

这种新组织可能在外观上类似于防御联盟，但实际上并没有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的依据。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德国国防联盟本身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他们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卫而成立的协会，他们的训练和组织或多或少地有效，以至于它们成为法律力量的非法补充或辅助。

国家。

他们的自由兵团性质仅仅来自于他们的组织方式和所处的情况。

国家当时发现自己，但他们当然不能声称自己是自由军团，理由是它们是自愿和私人成立的协会，目的是为自己而战独立的政治信念。

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和一些协会是这样的坚决反对共和国，因为在我们能够谈论更高层次的政治信念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仅仅确信现有制度存在缺陷。

更高意义上的政治信仰意味着一个人有清晰的观念和深刻的对新政权形式的理解，并认为这一政权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他将此视为自己毕生工作的目标。

当时在国民议会下成立的维护秩序的组织。

社会主义运动，与所有其他国防协会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是因为我们的编队不是为了保卫国家革命所创造的东西，而是专门用来支持我们的斗争为建立一个新的德国。

起初，这个机构只是维持我们会议秩序的警卫。它的首要任务是仅限于让我们能够举行会议，否则我们的对手将变得完全不可行。

当时，这些人接受的训练是盲目服从命令进行攻击，但当时在愚蠢的德国爱国圈子里假装尊崇接力棒为最高理想，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的冠军被击中头部，最高理想也会化为乌有一个俱乐部，因为历史上伟人去世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最微不足道的奴隶的打击下。

我们的保镖并不认为暴力本身就是目的，但他们保护了反对敌对势力以暴力手段进行胁迫的理想目标和宗旨。

他们还认为，没有义务为一个不保证国家的防御，但相反，他们必须保卫国家免受那些威胁要毁灭国家和民族的人。

在慕尼黑皇家啤酒屋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吵之后，在场的许多卫兵以英勇的行为赢得了永恒的名声。

他们用以袭击敌人，因此这些卫兵被称为“暴风小队”。

正如其名称本身所示，他们只是运动的一个分支。他们组成了一个它的组成部分，以及新闻界、宣传界、科学机构或政府的其他部门，派对。

我们认识到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多么必要，这不仅是从我们在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议，也是我们寻求逐步推动运动慕尼黑以外的地区，并扩展到德国其他地区。一旦我们开始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危险，马克思主义者不失时机地试图事先消灭一切准备召开国家社会主义会议。当他们没有成功时，他们试图破坏会议本身。不言而喻的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组织，无论等级如何，都盲目地支持他们的代表也采取了这种性质。

资产阶级政党在被这些言论压得哑口无言的时候，还能说什么呢？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地方不敢让他们的演讲者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如此，每当我们遇到任何挫折时，我们都会感到孩子般难以理解的喜悦在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政党很高兴地认为，他们他们自己无法反抗，被迫投降，无法被打败我们。

那些表现出在公众面前以“民族主义者”自居，这令人震惊地缺乏原则，然而在我们国家共产党领导的争论中，厚颜无耻地扮演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凶的角色。

社会主义者，与后者有过什么关系？对于那些为了在犹太报刊上获得一点卑鄙的赞扬而贬低甚至迫害那些英勇奋战、不顾一切的人。

风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谢自己几年来没有被“红色”暴徒撕成碎片之前还挂在灯柱上吗？有一天，这些可悲的现象迫使已故但令人难忘的波纳省长（他的坚定的诚实迫使他憎恨所有的扭曲者，并且像一个正直的人一样憎恨他们讨厌）说，“我一生都希望先成为一名德国人，然后成为一名官员，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被认为是像妓女一样，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出卖给任何人的生物之一可以暂时扮演领主和主人的角色。”令人极为悲哀的是，数以万计的忠诚的政府公务员逐渐失去了不仅受这些人的势力所控制，而且也慢慢地被他们无原则的德。

此外，这种人对正直的官员怀有强烈的仇恨，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工作，同时借助虚伪的谎言把自己伪装成“民族主义者”。

我们不能指望从那种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支持，而且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才会给予支持。只有建立自己的防御，我们的运动才能获得安全，并吸引那么多公众的关注和普遍的尊重都给予那些在需要时能够为自己辩护的人攻击。

我们决定，作为风暴支队内部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不仅要有完美的身体素质训练，而且男人应该如此教导他们成为坚定不移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捍卫者，最后，他们应该接受教育，遵守最严格的纪律。

这个机构与国防无关资产阶级类型的组织或者任何秘密组织。

即使在那时，我严格禁止突击队进入按照国防联盟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党如下：如下：从纯粹实际的角度来说，不可能通过私人协会，除非国家对其作出巨大贡献。否则，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现在，完全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建立任何具有军事价值的组织目的是实现所谓‘自愿纪律’的原则。

在这里，执行命令的主要支撑，即施加惩罚的权力，是缺乏。在秋季，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春季，仍然有可能组建所谓的自由军团，而不是只是因为当时大多数挺身而出的人都曾受过旧式学校的教育军队，也是因为军队所赋予的义务限制了个人绝对服从，至少在一定时期内。

如今的志愿防卫组织完全缺乏这种精神。防卫组织规模越大，联盟越壮大，纪律就越弱，对

个人的要求就越低成员。

因此，整个组织将越来越具有旧的非政治性质退伍军人协会尝试对大量自愿参加军事训练的士兵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如果没有绝对的指挥权支持，是不可能的。

总是有少数男人会自愿地自发地服从那种被认为是自然而必要的纪律，军队。

此外，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适当的军事训练体系。

国防联盟所拥有的资源少得可笑。

这种机构的主要任务必须是传授最好、最可靠的指示。战争结束已经八年了，在此期间，我们的德国年轻人，在以前必须服兵役的年龄，已经获得了任何系统的训练。

国防联盟的目标不能是征召所有已经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训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当最后一个成员将离开联盟。

即使是 1918 年最年轻的士兵，二十年后也不适合在前线服役，而我们事态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担忧。

因此，国防联盟必须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老退役军人的职责。

协会，但这不可能是一个自称不是退伍军人协会，而是一个国防联盟。

根据这一名称，它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留老兵的传统，并让他们共同宣传国防理念，并能够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意味着建立一支适合并训练有素的军事防御队伍。

然而，为了满足这一条件，这些人员必须接受军事迄今为止尚未接受过任何培训。

这对于国防联盟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士兵每周对士兵进行一两个小时的培训是无法实现的。

鉴于现代战争对每个人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今，两年的军事服役仅仅足以将一名新兵培养成一名受过训练的士兵。

在战争前线，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年轻新兵所遭受的可怕后果由于缺乏彻底的军事训练。

志愿者队伍在严密的纪律下接受了十五至二十周的训练，表现出无限的自我牺牲热情，但结果却不比炮灰好在前面。

只有当年轻的新兵被分配到经验丰富的老兵队伍中时，经过四到六个月的训练，他们就成为团里有用的成员。在作为“老戏骨”，他们逐渐适应了自己的任务。

鉴于这一切，任何试图通过一个每周进行一到两个小时的所谓培训，没有任何明确的权力来执行命令并且没有足够的手段。

也许可以为老兵提供这种“进修课程”，但新兵不能这样才能培养成有用的士兵。

这种做法如何产生毫无价值的结果，也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惊人的证明：事实上，尽管这些所谓的志愿防卫联盟，凭借巨大的努力，克服许多困难，训练或试图训练几千名自愿的士兵（其余的是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用于国防；国家通过其和平民主教育，扭曲了数百万年轻人的自然本能，毒害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逐渐把他们变成一群羊，会耐心地遵循任何任意的命令。

面对这一切，国防联盟为灌输他们的思想渗透到德国青年的心中！更重要的是以下的考虑它总是让我采取立场反对一切以志愿者协会为基础进行所谓军事训练的企图。

假设尽管存在上述所有困难，防务联盟仍然成功每年训练一定数量的德国人成为高效的士兵，在心理方面外表、身体素质和熟练的武器操作；结果必然无效在一个整体倾向认为这样的防御组织不可取的国家，甚至是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样的组织完全违背了秘密目标政治领袖是这个国家的腐败者。

无论如何，在那些已经证明他们不重视国家的军事力量，并且除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否则不会诉诸这种权力地球。

这就是今天的情况。想在军事上训练一万名士兵，这难道不荒谬吗？使用武器，并秘密进行训练，而几年前，可耻地牺牲了八百五十万训练有素的士兵，不仅没有不再需要他们的服

务，而是为了感谢他们的忠诚服务，公开侮辱？我们是否应该为一个玷污和唾弃我们最光荣的士兵、撕裂从他们的胸前摘下勋章和徽章，践踏他们的国旗，嘲笑他们的成就？现政权是否已朝着恢复旧军队的荣誉和使那些破坏和侮辱它的人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吗？一点儿也不。

相反，我刚才提到的人可能被看作是登上最高政府权力宝座的人。

今天的立场，然而在莱比锡却有人说：“正义就是力量。”然而，在我们今天的共和国，权力掌握在那些开创了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是对人民最卑鄙的叛国行为。

国家是德国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肯定没有理由说可能这些人应该通过组建一支新的年轻军队来增强实力。这违背了所有合理的原因。

1918年革命后，这个国家重视加强其从军事角度看，其立场已清楚地体现在其态度上对当时存在的大型自卫组织。

只要它们能保护这些可怜的生物，它们就不会不受欢迎他通过革命掌权。

威胁这些生物的危险似乎正在减少，这要归功于逐渐人民的堕落，国防联盟的存在代表着一种民族政治加强因素，它们变得多余，人们尽一切努力解除它们的武装，尽可能地压制他们。

历史上很少有王子感恩的例子，只有一位爱国者属于新兴资产阶级梦想着获得革命煽动者的感激，刺客，他们通过掠夺公众和背叛国家来中饱私囊。

在审视组建这些防御联盟是否明智时，我禁不住要问而不是问：“我要为谁训练这些年轻人？他们将被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把他们叫出来？”这些问题的答案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遵循规则。

如果现在的国家有一天需要这种训练有素的部队，那绝不会是其目的不是捍卫国家利益，而是保护国内民族压迫者反对爆发普遍愤怒的危险一个被欺骗、被背叛、利益被出卖的民族的一部分。

因此，决定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暴风小队党不应该具有军事组织的性质。

它必须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职责与军事防御协会的职责完全不同。此外，风暴支队不属于秘密组织的性质。

秘密组织只是为了非法目的而建立的，这种组织的目的组织本身就受到其性质的限制。

考虑到德国人民的健谈习惯，建立任何庞大的组织，同时对其保密或掩盖其目的。

任何此类尝试都注定会徒劳无功。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官员拥有一批告密者和其他这些人为了三十块银子，就准备像犹大一样背叛上帝，他们为了拥有而发明他们所不知道的一切秘密。

需要揭露一些事情，但不能指望自己的追随者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是必要的。

只有小团体才能成为真正的秘密组织，而且只有经过多年的选择性消除，但这些团体的规模非常小，这将使他们失去对国家的一切价值社会主义运动。

我们当时和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两百个胆大包天的阴谋家，而是几百个数以千计的世界观的忠实拥护者。

这项工作不能通过秘密集会来完成，而应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众示威来完成在公共场合。

匕首、手枪和毒药瓶无法为运动的进展扫清道路；这只有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才能实现。

我们必须教育马克思主义者，将来，国家社会主义将主宰街道，就像它终有一天会成为国家的主人。

秘密社团还有另一个危险，那就是其成员往往完全误解了眼前任务的伟大，并倾向于相信命运只需一人被暗杀，就能在一夜之间让整个国家安定下来。

这种信念也许可以在一个国家遭受某个压迫者的暴政，他同时也是一个天才，他的非凡个性是他可怕的压迫得以持续和可怕的唯一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突然从人民队伍中涌现出一个人，准备牺牲自己并将他致命的钢铁刺入那个憎恨之人的心脏。

要想对这样的行为感到恐惧，就必须具备小流氓的共和心态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但席勒，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自由诗人和捍卫者，人类历史上有过的最伟大的英雄事迹，就是他的《威廉·泰尔》。

1919 年至 1920 年期间，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秘密组织的成员在伟大历史事例的影响，并被国家巨大的不幸所克服，可能会试图对祖国的毁灭者进行报复，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能结束人民的苦难。

所有这些尝试都是愚蠢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并不是由于一个杰出人物的卓越天才，而是无能和懦弱的资产阶级的逃避。

对我们资产阶级最严厉的批评，就是说它参加了革命，尽管革命没有产生一个卓越的价值。毕竟，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向罗伯斯庇尔、丹东或马拉；但在谢德曼面前四肢着地，这太丢脸了，肥胖的埃尔茨贝格尔先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先生，以及无数其他政治上的侏儒革命。

没有一个有才华的人能让人看出革命天才。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不幸，因为他们只是革命的斯巴达克斯害虫批发和零售。

除掉其中一只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唯一的结果是另一对血缘关系同样肥胖和口渴的吸盘鱼已经准备好接替他的位置。在那些年里，我们不得不坚决反对这种态度，这种态度的起源和理由是真正伟大的历史现象，但这丝毫不适合我们现今的侏儒时代。

当涉及到‘惩治’所谓的叛国者时，情况也是如此。

枪杀一个背叛了枪支位置的可怜人是荒谬和不合逻辑的而政府中的最高职位则被一群用金钱交换的乌合之众占据。

整个帝国，他们的良心都为两百万人的死亡而感到痛心，这些人是战争中造成数百万人伤残的罪魁祸首，但他们继续不受干扰地从共和政权中“做出好事”，而不允许他们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扰乱其良心。

在一个政府大赦叛徒的国家里，废除小叛徒是荒谬的。

大规模地避免一切惩罚。因为可能有一天，一个诚实的理想主义者，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除掉了一个可怜的告密者，这个告密者泄露了秘密武器库被要求在国家的主要叛徒面前对他的行为负责。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些小小的叛徒是否会在是另一个小叛徒的团伙，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团伙？在前一种情况下，结果值得怀疑，而且几乎肯定会在以后揭露事实存在。

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不值得尊敬的流氓被赶走了，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活可能会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处于危险之中。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小偷不应该被绞死，而大偷却可以逍遥法外自由的。

有一天，一个国家法庭将不得不审判和判处数万名组织者，他们对十一月的犯罪背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负有责任。

这样的例子将给那些卑鄙的叛徒们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他向敌人透露了隐藏武器的地点。

基于这些考虑，我坚决禁止一切参与秘密社团的行为，并且我注意不要让冲锋队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那些年里，我阻止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以下实验：都是由年轻的德国人进行的，他们大多受到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但他们却成为自己行为的牺牲品，无法改善他们的祖国。那么，如果“冲锋队”既不是军事防御组织，也不是秘密社团，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它的训练不能由军队组织立场，而是从对党的目的最实际的角度来看。



由于成员必须进行彻底的体能训练，因此注意力不能集中主要集中在军事训练上，而是体育实践上。

我一直认为拳击和柔术比步枪射击训练更重要，如果不够，肯定不好。

如果德国有六百万年轻人，他们完全受过体育运动训练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怀有热烈的热爱，并准备在战斗中占据主动，那么民族主义国家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从这个组织中组建一支军队如果有必要，可以延长两年，但前提是这些干部已经存在。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干部只由国防军提供，而不是由一个既不是这样的也不是那样的防御联盟。

身体健康必须培养个人对自己优越性的信念，并给予他这种信念信心始终仅仅建立在对自己实力的认识之上。

它还必须发展运动敏捷性，以便在军队中用作防御武器运动的。

其次，为了防止暴风小队获得秘密角色，制服不仅要让每个人都能立即认出，而且其成员人数必须作为行动方针的指示，这对运动并且为大众所熟知。

冲锋队成员不得秘密聚会，必须公开游行从而以一种方式结束关于一个秘密组织的传说。

以防止他们在小阴谋中寻找精神能量的出口。

我们从一开始就向他们灌输运动背后的伟大理念并彻底教育他们如何捍卫这一思想，使他们的视野变得扩大了，个人不再认为他的使命是“除掉”某个流氓，不论大小，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国家。

这样，反对现政府的斗争就被置于比小规模斗争更高的层次上。

复仇和小阴谋。

它被提升到为世界观而进行的精神斗争的水平，为了毁灭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方面。

第三，突击队的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制服和装备，必须采用与旧陆军不同的型号。

他们必须经过特殊训练才能适应突击小队所承担的任务。

这些都是我在 1920 年和 1921 年所坚持的理念。我努力将它们逐渐灌输到年轻的组织成员，结果到 1922 年仲夏，我们有一个相当每个阵型由一百人组成。

到那年深秋，这些部队获得了独特的制服。一共有三套这些事件对风暴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分离。

第一次是 1946 年举行的反对《共和国保卫法》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1922 年夏末，慕尼黑国王广场。

慕尼黑爱国者协会宣布将举行一场大型群众示威活动，抗议《共和国保护法》的出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参加其中。

我党在六支慕尼黑突击队带领下，列队进入广场其次是党的政治部门。

有两支乐队和我们一起游行，携带着大约十五面旗帜。

当纳粹党人到达大广场时，那里已经坐满了一半，但没有挂上任何横幅。

显示。

我们的到来激发了无限的热情。我本人有幸成为演讲者之一，对大约六万名观众发表了讲话。这次演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因为它首次被证明尽管面临红军的威胁，民族主义者仍可以在慕尼黑街头游行。

保卫红色共和国组织的成员试图阻止游行他们的恐怖活动，但他们被风暴公司驱散几分钟内就撤离并打发走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随后表现出这是它第一次决心在未来行使街头游行的权利，从而剥夺国际叛徒和国家敌人对这一特权的垄断。

那一天发生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对于风暴产生的看法不管是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组织。

这一原则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继续推进 Storm 的建立支队部队因此在几周内慕尼黑部队

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

第二件事是 1922 年 10 月的科堡远征。一些所谓的民族主义社团决定在科堡举办德国拉力赛。

他们邀请我参加，并暗示我带一些追随者一起参加。

我上午十一点收到的邀请函来得正是时候。

不到一小时，我们参加德国拉力赛的安排就完成了。我选了八百名冲锋队士兵随我一起去。这些士兵被分成大约十四个连队，由专列从慕尼黑到科堡，科堡已成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其他部队也接到了相应的命令与此同时，在各个地方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风暴支队的其他地区。

这是德国第一次开通我们的专列。在所有新冲锋队各部队也加入了我们，我们的列车引起了轰动。

很多人从未见过我们的横幅，这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我们到达科堡车站时，一位德国拉力赛组委会代表团。

他们宣布，根据当地工会的命令——也就是说，独立报和共产党——已经‘安排’好，我们不可以带着旗帜进城乐队开始演奏（我们一共有 42 位音乐家），我们不应列队行进。

我立即拒绝了这些不体面的条件，并且毫不犹豫地先生们声明，安排了这次“集会”，我对他们与这样的人谈判的想法感到非常惊讶并与他们达成协议。

然后我宣布，突击队将立即连队进城队形排列，旗帜飘扬，乐队演奏——我们立即开始这样做。

当我们走进车站广场时，我们看到了数千名发出嘶嘶声和叫喊声的人群。

他们向我们喊道：“刺客！”“土匪！”“强盗！”“罪犯！”这些是这些模范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创始人们向我们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年轻的突击小队纪律严明。各连列队在车站前的广场上，起初，他们没有理会暴徒对他们的辱骂。

警察很着急。他们没有引导我们到郊区分配给我们的住处。

科堡，这座城市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但对于镇中心的 Hofbräuhaus-Keller 来说却很陌生。

当我们行进时，我们左右两边的喧闹声随行人群稳步增加。

最后一支队伍刚进入皇家啤酒屋的庭院，一大群暴徒就冲上去追他们，疯狂地大喊大叫。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警察锁上了大门。看到情况不妙，我打电话冲锋队立正对他们说了几句话，然后要求警察打开立即大门。

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他们同意了。

我们现在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我们的营地。

我们必须在那里抵抗人群。

由于他们一路上的喊叫声未能扰乱我们队伍的平静，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博爱的捍卫者现在开始扔石头。

这让我们的耐心耗尽。十分钟内，打击接踵而至，就像一场毁灭性的一阵冰雹。十五分钟后，街上已经看不到红军的踪影。

入夜后，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暴风支队的巡逻人员发现国家那些单独遭到袭击、处境危险的社会主义者。

于是我们很快就打败了对手。第二天早上，红色恐怖在科堡多年来一直遭受的困扰确实已经解决。

以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谎言，他们试图通过散发传单来煽动“国际无产阶级同志们”上街游行，再次出现在公共街道上。

他们完全歪曲事实，宣称我们的“刺客团伙”已经开始了“针对科堡和平工人的灭绝战

争。’当天下午一点半，将举行一场“大型民众示威游行”。

预计全区数千名工人将出席此次会议。

我决心最终粉碎这个红色恐怖，所以我召集了风暴小队来中午的时候。

他们的人数现在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人。我决定和这些人一起向科堡进军穿过城堡，穿过即将举行红色示威的大广场。

我想看看他们是否会再次袭击我们。当我们进入广场时，我们发现，据宣传，到会人数达数千人，但实际到会人数只有几百人。

当我们走近时，它们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有些甚至逃跑了。只有在某些时候沿途有一些红军的尸体，他们是从城外赶来的，还没有到达认识我们，试图挑起争端，但他们很快就被打跑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镇上的人们长期以来如此彻底地被吓倒的人，慢慢醒悟过来，恢复了勇气。

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晚上，在我们返回的路上，爆发出自发的欢呼声沿途的几个地点。

在车站，铁路官员突然通知我们，我们的火车不会发车。

于是我告诉一些头目，如果真是这样，我就逮捕所有红党我们可以向英雄伸出援手，我们可以自己驾驶火车，但我们会在火车头上、煤水车上和每一节车厢里，带走几十个国际团结。我并没有忘记让这些绅士们知道，如果我们必须驾驶火车，旅程将会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冒险，我们都有可能摔断脖子。

然而，如果知道我们不应该独自走向永恒，而是平等地并与红色绅士保持友好关系。

随后火车准时出发，第二天早上我们安全抵达慕尼黑。

因此，自 1914 年以来，在科堡，所有公民的平等首次在人们的眼中得到重新确立。

法律，因为即使某个高级官员的花花公子今天敢于断言，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至少在那些日子里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公民们来捍卫自己，对抗现任国家的代表。

起初，我们无法完全估计那一天的后果的重要性。

胜利的冲锋队对自己的信心大大增强，而且他们的对其领导人的睿智充满信心。

我们的同时代人开始对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很可能注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愚蠢的行为终于结束了。只有民主党人哀叹我们没有宽容地允许我们的头骨被打破，在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敢于回应残酷的攻击用拳脚相向，而不是用和平主义的口号。

资产阶级报刊总体上一如既往地采取了一种既悲痛又悲哀的态度。

只有少数像样的报纸表示满意，至少在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街头恶霸得到了有效打击。

在科堡，至少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工人，他们应该被视为被误导了，从纳粹的拳头打击中他们认识到，他们也是为了理想而斗争的工人，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只会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战，他很喜欢。

冲锋队本身从科堡远征中受益最多。

它的人数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 1923 年 1 月的党代表大会上，有 6,000 名参加升旗仪式，首批连队首次亮相他们穿着新制服，享受光荣的时刻。

我们在科堡的经验证明，为冲锋队，不仅是为了加强团队精神，也是为了避免混乱和在战斗中认不出对手的危险。到那时为止，他们只是以臂章为特征，但现在又添加了束腰外衣和众所周知的帽子。

在科堡获得的经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我们现在决心打破红色恐怖多年来一直阻碍持不同观点的人举行会议。

我们决心恢复自由集会的权利。从那时起，我们在这些地方，巴伐利亚的红色城堡逐渐被攻占在国家社会主义宣传之前。

冲锋队越来越擅长他们的任务。渐渐地，他们放置了越来越多的和漫无目的的防御运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并确立了自己作为积极的激进组织，为建立新的德意志国家而斗争。这种逻辑发展一直持续到 1923 年 3 月。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转移了注意力该运动从迄今为止所遵循的路线中引入了某些基本形式。

第三件事是 1923 年头几个月法国占领了鲁尔区。

这一结果对于冲锋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开自由地写作或言论目前还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我只会谈论这个问题在公开讨论中已经处理过的部分并因此被广为人知。占领鲁尔区并没有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有理由希望德国最终会放弃其懦弱的屈服政策，从而给国防联盟赋予了明确的任务。

冲锋队现在有几千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们也会都参加过这次国服。

1923 年春夏，它转变为一个战斗军事组织。

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将后来的发展归功于这次重组 1923 年期间，这些对我们的运动产生了影响。

在其他地方，我将大致讨论 1923 年发生的事件。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当时对冲锋队的改造，损害了运动，自条件（即采取积极抵抗法国的政策）以来导致这一变化的愿望从未实现。

1923 年底发生的事件，乍一看可能很可怕，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几乎是必要的；因为考虑到德意志帝国政府将冲锋队改组为军事力量毫无意义，因此，一项可能对运动有害的转变立刻停止了。

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着手进行当我们偏离正确路线时，我们需要进行重建。

1925 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重新成立，必须组织和按照我制定的原则再次训练它的冲锋小队。

它必须恢复其原来的正确观点，必须再次考虑其最基本的功能建立风暴支队作为防御和力量的工具运动为确立其世界观而进行的斗争，它必须再次将其视为其最重要的作为精神斗争中的防御和强化工具，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运动的理想。

决不能让冲锋队沦落到国防联盟或秘密组织。必须采取措施使其成为一支百人力量数千人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从而成为真正民族理想的捍卫者。

## 第十章：联邦主义的面具

1919 年冬天，尤其是在 1920 年春夏，年轻的党感到必须对战争期间已经变得严重的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

在这本书的

第一卷中，我简要地记录了一些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并预示着德国的解体。

在描述这些事实时，我提到了针对英国和法国都致力于重新填补北方和南方之间的裂痕。以及德国南部。

1915 年春，出现了一系列传单中的第一份，其目的是唤起认为普鲁士应对这场战争负全部责任。

到 1916 年，这种宣传手段在同样狡猾的水手身上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因为它有毒。

这种宣传诉诸于人类最基本的本能，试图激起南德人反对北德人，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果。

当时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尤其是那些隶属于巴伐利亚师总部，应该受到应有的谴责，因为他们盲目地忽视了自己的职责，没有采取必要的明确措施来反击这种宣传但什么也没做。

相反，它似乎并没有在某些方面完全不受欢迎，而且他们可能目光短浅到认为这样的宣传不仅会终结这场运动走向德国统一，甚至可能自动加强联邦州。

在历史进程中，如此恶劣的忽视很少会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

人们希望这种宣传能削弱普鲁士，但这也影响了整个德国。它加速了德国的崩溃，不仅摧毁了整个德国，而且主要是联邦州。

革命首先爆发在这座充满对普鲁士人为仇恨的城市最为暴力，并且，像其他地方一样，它采取了对执政议会的反抗形式。这将是一场错误地认为敌人的宣传是制造反普鲁士情绪的唯一原因并且人们没有理由不听从这种宣传。

在战争期间，我们国家经济的管理方式令人难以置信，绝对疯狂的中央集权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整个帝国领土被在其控制和利用之下，为反普鲁士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理由。感觉。

普通公民认为，为收集和分配战争物资而成立的公司时间供应，所有这些公司的总部都设在柏林，因为柏林和柏林本身是一样的。

与普鲁士相同。

普通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被称为“强盗团伙”的组织战争连队并不在柏林或普鲁士手中，甚至根本不在德国人手中。

人们只认识到了这一制度的严重违规行为和持续侵犯憎恨帝国首都的制度，并将他们的愤怒指向柏林和普鲁士，尤其是因为在某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这种态度，但甚至并默默地表示满意。

犹太人非常精明，不会不明白臭名昭著的他以战争公司的名义组织了这场运动，目的是掠夺德国一个国家，最终必然会引起反对。

只要这种反对不是针对他自己，他就没有理由害怕。因此他决定，防止爆发对他的仇恨的最好方法是愤怒和绝望的群众将他们的愤怒指向其他人，从而允许它自行烧毁。

让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尽情争吵，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尽情争吵吧！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越大，犹太人的安全就越大。

因此，公众的注意力完全从国际蛆虫身上转移开了。

国家；事实上它似乎已被遗忘了。

然后，当出现危险时，头脑清醒的人，其中许多人甚至在巴伐利亚呼吁反思和克制，从而平息了对普鲁士的愤怒，因此这场激烈的斗争即将结束，柏林的犹太人所要做的就是上演一场新的挑衅并等待结果。

所有从南北冲突中获利的人都立即对这一事件表示欢迎，喜悦，并再次煽动愤怒的火焰，直到它变成熊熊烈火。这是一个精明而熟练的犹太人的策略，使德国人民的不同分支发生争吵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就从他身上转移开了，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们越完整。

然后革命爆发了。直到 1918 年，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那年 11 月，平均德国公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下阶层和工人，没有正确地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却没有意识到必然的后果是什么，特别是对于巴伐利亚来说，德国各个民族之间发生了内讧。

那些自称“民族”的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后果发生在革命爆发的那一天，当时的政变成功之后，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巴伐利亚站出来，成为“巴伐利亚”的利益。

国际犹太人库尔特·艾斯纳开始让巴伐利亚与普鲁士对抗。这个东方人是他是世界上最不适合捍卫巴伐利亚利益的人，因为他在从事律师职业时作为一名报社记者，他曾游走德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巴伐利亚是他最不感兴趣的地方。

故意使巴伐利亚的革命起义具有对其他地区进行进攻的性质库尔特·艾斯纳作为德国总理，他的行为绝不是为了巴伐利亚人的利益，而是仅仅是犹太人的授权代表。

他利用巴伐利亚现有的本能和反感来促进肢解德国。一旦被肢解，德国将很容易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牺牲品。

他所采用的策略在他死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嘲笑德国各邦及其君主，现在却突然作为一个“独立党”，它呼吁那些最强烈的情感和本能其根源在于在位君主的家中和各个州。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与派往解放巴伐利亚，被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描述为主要是巴伐利亚工人斗争’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产生与其他德国地区。它并没有让群众恢复理智，反而导致对普鲁士的怨恨和愤怒。

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艺术，在描绘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时，“普鲁士军国主义”对“反军国主义”和“反普鲁士”人民的胜利巴伐利亚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在慕尼黑举行的巴伐利亚州立法议会选举中，库尔特艾斯纳的追随者还不到一万，共产党的追随者也不足三千。

巴伐利亚共和国垮台时，两党加起来可以算出近一百数千人投了赞成票。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自己的斗争，反对煽动一个分支的愚蠢行为。

德国人民反对另一方。我相信我一生中从未做过比这更不受欢迎的事我当时所承担的任务比我反对反普鲁士运动时承担的任务要大得多。

在慕尼黑苏维埃政权统治期间，举行了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仇恨德国的愤怒，尤其是对普鲁士的愤怒，被激怒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北德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其中一次会议。

这些会议常常以“离开普鲁士”的狂呼而告终。

打倒普鲁士”、“对普鲁士的战争”等等。

一位巴伐利亚的杰出捍卫者在国会公开表达了这种感觉主权，他说：“我们宁愿作为巴伐利亚人死去，也不愿作为普鲁士人腐烂。”只有那些参加了当时举行的一些会议的人才能意识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就我个人而言，当我第一次在只有少数朋友的包围下大声说话时在慕尼黑 Lowenbrau-Keller 举行的会议上，有人对这种愚蠢的行为表示反对。

当时我的战友们站在我身边。很容易想象当我们被人用吼叫和受到愤怒人群的威胁，这群人已经无法控制，而我们一直在保卫我们的国家，大部分都是躲在营房里的逃兵和逃避兵在后方或在家中。

确实，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利的。我的一小群同志们觉得第一次绝对地与我团结在一起并且愿意与我一起誓死捍卫。

这些冲突在 1919 年不断重演，似乎变得更加 1921 年初不久，暴力事件频发。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会议是在慕尼黑太阳街的瓦格纳大厅举行的。

在此期间，我的团队已经发展壮大，必须抵御来自最暴力的人物。

不止一次，我的几十个粉丝被袭击者粗暴地对待、扔在地上、踩踏，最后被赶出大厅里死气

沉沉。

我最初独自一人，仅得到了战友们支持，现在，年轻的运动继续进行这一活动，我几乎可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今天我很自豪地说，我们几乎完全依靠我们的追随者巴伐利亚——负责缓慢但坚定地结束愚蠢和叛逆的联盟。我说‘愚蠢和叛国’因为，尽管我确信那些参加游行的群众是出于好意但却很愚蠢，我不能对于组织者和他们的教唆者。

当时我把他们视为法国雇佣的叛徒，现在依然如此。有一次，对于多尔滕来说，历史早已作出了判决。

当时的情况特别危险，因为他们非常精明他们有能力掩饰自己的真实倾向，主要坚持他们的联邦意图和声称这是他们行动的唯一动机。

当然，很明显，反对普鲁士的骚乱与联邦主义无关。

当然，“联邦活动”并不是用来描述解散和肢解另一个联邦国家，对于一个诚实的联邦主义者来说（对他们来说，引用俾斯麦用来定义他的帝国观念的公式）不能同时表达想要割断由俾斯麦创建或至少完成的普鲁士国家的部分领土，他也不能公开支持这种分裂主义企图。

如果某个普鲁士保守党宣布赞成将弗兰肯从巴伐利亚分离，或公开要求或采取措施推行这种分裂主义政策。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对那些没有看透这一点的真正的联邦主义者表示同情。

臭名昭著的骗局，因为他们是其主要受害者。

通过以这种方式扭曲联邦主义思想，它的拥护者们为联邦主义思想埋下了祸根。

通过贬低、辱骂和玷污了这种政治结构的本质要素，即普鲁士，从而使这种作为联邦成员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所谓的联邦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是针对普鲁士人民中最后可以被视为与十一月民主有关。

因为这些所谓的联邦主义者的辱骂和攻击并不是针对魏玛宪法——其中大多数是南德人或犹太人——但反对那些代表了旧保守的普鲁士，是魏玛宪法的对立面。

指挥这场运动的人小心翼翼地不触碰犹太人，这一事实不应被忽视。

感到惊奇，也许就揭示了整个谜题的答案。

革命前，犹太人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他自己和他战争的注意力。

通过煽动群众，特别是巴伐利亚人，反对普鲁士，他同样也感到革命后，他不得不寻找某种方法来掩饰他的新掠夺运动，其范围扩大了十倍。

他再次成功了，这次他挑起了所谓的“民族”德国各派之间互相对抗——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对抗普鲁士人，也同样保守。

他再次表现出极其狡猾的手段，因为他掌握着德国的命运，其挑衅行为如此粗鲁无礼，导致受害者再次被激怒，再次——从不针对犹太人，而始终针对自己的德国同胞。

巴伐利亚人没有看到拥有四百万勤劳高效劳动人民的柏林，而只看到了懒惰和颓废的柏林萦绕在西区最糟糕的地方，然而反感却不是针对柏林西区，而是针对“普鲁士”城市。我经常被驱使去绝望。

犹太人表现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的能力，并将其引导到目前可以在其他地方观察到。

1918年，没有一种有组织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一提到犹太人这个词，我们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么被惊呆了，否则就会遭遇激烈的对抗。

我们当时为向公众指出其真正的敌人所做的努力似乎注定会失败失败，但后来事情开始好转，尽管速度非常缓慢。

守卫与监狱联盟（Schutz und Trutzbund）组织不完善，但至少它再次提出犹太人问题的伟大功绩。

1918-1919年冬天，一种反犹太主义开始慢慢扎根。后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以新的视角审视犹太人问题。

如果把问题抛到上层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之外，成功地把它转化为一场伟大的人民运动的重要动机，但我们成功地将这个问题摆在了德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想法，团结他们进行一场斗争，犹太人做出了反应。

他又使出老招数。他以惊人的速度在国内播下了不和的种子。

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并在那里引起了分裂。

教皇至上主义问题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争吵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唯一可能其他事务，并阻止对犹太人的集中攻击。拖拽我们人民的人卷入这场争论永远无法弥补他们当时对国家犯下的罪行。

无论如何，犹太人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正在互相争斗，心满意足，而雅利安人性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却在嘲笑他的袖子。

就像曾经有一场斗争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好几年一样联邦制和统一之间，在这种相互摩擦中消耗着能量，而犹太人贩卖民族自由，把我们的国家出卖给国际高级统治者财政——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再次成功了，这一次是通过挑起德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

宗教派别，而两者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被侵蚀和被国际化和世界主义的犹太人注入的毒药摧毁。

看看我们的人民每天因受到污染而遭受的伤害犹太人的血。请记住，这种有毒的污染可以从一个国家团体的诞生，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进一步思考一下种族退化的过程是多么的卑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摧毁我们德国人民的根本雅利安品质，从而破坏我们的文化创造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在逐渐衰落，至少在我们的城市里，沉沦到意大利南部如今的水平。

这种有害的血液掺假，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不接受犹太人今天仍在系统地实践这种说法。这些黑皮肤的寄生虫在我们的国家机构内腐蚀我们无辜的金发女孩，从而破坏一些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无法被取代。

这两个基督教派漠然看着亵渎和毁坏一座上帝赐予这个世界一种高贵而独特的生物。

对于世界的未来而言，天主教和基督教哪个胜利并不重要。

新教信仰，但雅利安人类的生存或灭亡确实很重要。

然而，这两个基督教派别并不是在对抗雅利安人性的毁灭者，而是都在试图毁灭对方。

这是神圣的职责，特别是那些采取爱国态度的人，要确保在他们不只是在口头上敬奉上帝而是真正履行上帝的旨意，不要让他们的杰作被禁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创造人类时赋予人类特定的特征和特定的院系。

凡破坏他所造之物的人，都是在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旨意作斗争。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当然，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教派里努力，并应该把它视为自己的首要和最庄严的职责是阻止任何人通过言语或行为，超越自己宗教团体的界限，并与其他宗教团体发生争执面值。

鉴于德国存在的宗教分裂，攻击宗教的基本特征一个教派的分裂必然导致两个基督教派之间的灭绝战争教派。

我们的地位与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无可比拟。在这三个国家例如，人们可以为反对教权主义的一方进行宣传，或者极端教皇主义，而不会因此招致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人。

然而在德国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新教徒也会参加这样的运动，因此，在其他地方，只有天主教徒组织起来反对教士他们自己的主教干涉政治事务，在我们看来，这就



像新教对天主教的攻击。

一个教派的信徒可以容忍的事情，即使这看起来不公平如果他们提出的这个观点来自另一个教派的激进领袖事实确实如此，即使是那些愿意为消除这种现象而斗争的人，宗教派别内部的不满情绪会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斗争，并转向他们的活动对外来者而言，一旦有人劝告或要求消除这种不满情绪，那些不持有相同信仰的人。

他们认为，外人干涉与本国有关的事情是没有道理、不可接受和不正确的。

不关心他们。这种尝试是不可原谅的，即使他们受到一种感觉的启发，民族社会的最高利益，因为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宗教情绪仍然其根源比一切政治和国家利益的感情都要深。

这一点不能通过激起一个教派与另一个教派的激烈冲突来改变。

只有通过相互宽容的精神，国家才能确保未来，它的伟大也将逐渐成为宗教领域的和解因素。

对于那些今天试图卷入民族主义的人，我毫不犹豫地说是宗教纷争运动，他们是我国最坏的敌人，比任何国际敌人都要坏。

共产主义思想家。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设定了让这些共产党员皈依的任务，但任何人都脱离自己运动的队伍，并倾向于使运动偏离其目标的人使命，他的行为方式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他作为犹太人的利益，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无关紧要，因为这符合今天的犹太人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能量应该被浪费在宗教上冲突，因为它开始对犹太人造成危险。

我特意使用了关于“浪费”运动能量的短语，因为没有只有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想象这场运动今天能够解决一个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们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无功而返。

无论如何，事实胜于雄辩。那些突然 1924 年发现，民族主义运动的最高使命是打击教皇至上主义，虽然他们没有成功摧毁它，但他们却成功分裂了民族主义运动。

我必须警惕民族主义运动中一些不成熟的人，认为它可以完成俾斯麦号都未能完成的事情。领导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人的首要职责之一永远是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企图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服务于这种冲突。

任何以此为目的进行宣传的人都必须立即被开除出队伍。

事实上，直到 1923 年秋天，我们才成功地使我们的运动远离这样的争论。最虔诚的新教徒可以与最虔诚的他是我们的天主教徒，确信他的宗教信仰会受到尊重。

双方共同发起的反对雅利安文明破坏者的激烈斗争，教导了他们相互尊重和尊重；而且，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运动必须与中央党发生激烈冲突的原因不是宗教，而是民族、种族、政治和经济问题。

我们当时取得的成功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并且它反对今天那些我认为他们更了解。

近年来，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民族主义圈子，在他们的宗教冲突，甚至在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报纸宣扬某个宗教派别的事业，根据其适合他们——以便通过重复言论来指责一方，现在又指责另一方这些行为往往愚蠢至极，反而会使火势愈演愈烈。

对于像德国人这样的民族来说，他们的历史曾多次表明他们有能力为幻影已经精疲力尽，每一个这样的口号都是致命的危险。

这些口号常常转移了我们人民对实际问题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生存。

当我们在宗教战争中耗尽精力时，其他各国都在争夺世界的份额，而民族主义运动正在与无论教皇至上主义者的危险是否大于犹太人的危险，反之亦然，犹太人正在毁灭我们生存的种族基础，并因此消灭我们的人民。

对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捍卫者，我代表国家社会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祈祷运动，因此德国人民说，‘主啊，请保佑我们远离这样的朋友，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对付我们的敌人。’联邦

与统一之争如此狡猾 1919-1920 年，犹太人宣扬纳粹主义，此后，纳粹强制推行纳粹主义，否定争论，对与之相关的本质问题采取明确的态度。

德国应该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些术语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在我看来，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它是对整个问题的理解，也因为它的答案可能有助于澄清混乱，从而起到安抚作用。

什么是联邦？联邦是指主权国家的联盟，自愿地，凭借主权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体单位，把自己的主权权利尽可能地让渡给该单位，以维持联盟的存在可能并且会保证这一点。当今任何一个联邦国家都没有完全将这一理论公式付诸实践，最不重要的是美国联邦，因为美国联邦不可能拥有关于其原始主权的对大多数州来说。

其中许多国家直到联邦综合体建立很久之后才被纳入其中。

组成美国联邦的州大多属于大领地或小领地的性质，由于技术管理目的而受到限制，其边界在许多情况下已被固定在测绘办公室。

最初，这些国家没有也不能拥有自己的主权，因为它们没有联合起来组成了联盟，但恰恰相反，联盟创造了许多这样的所谓的国家。

因此，主权权利往往非常全面，这些权利被留给，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授予各个领土，不仅与联邦的整体性质相对应，而且也与其面积十分辽阔，几乎相当于一个大陆的大小。

因此，在谈论美利坚合众国时，我们不能认为它们是主权国家，但作为享有某些权利的国家，或者应该说是权力的国家，这些权利或权力已经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并保证的。我们的定义也不足以表达德国的情况，尽管在德国，各个国家在帝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而帝国的成立从他们那里。

然而，德国并不是由各个国家自愿、平等的合作形成的，而是因为普鲁士国家逐渐取得了对其他国家的霸权地位。

仅凭领土面积的差异就无法将德国各州与美国联盟。

当时德国各小邦的领土面积与更大，而且更明显的是，最大的，表明了它们的不平等成就表明他们在建立帝国和塑造联邦帝国。

就大多数个别州的情况而言，不能断言它们曾经享有过真正的主权，除非我们选择将“主权国家”一词仅仅视为一种官方指定。

事实上，不仅过去的发展，而且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也消灭了许多这些所谓的“主权国家”，从而以最明确的方式证明了这些国家是多么脆弱结构是。

我无法在这里讨论这些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历史问题，但我必须提请大家注意，他们的边界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祖先部落边界。它们纯粹是政治现象，对于大部分都出现在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们代表了祖国耗竭和分裂过程的因果。

旧帝国的宪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这一切，因为各州在联邦委员会中并没有获得平等的代表权，但与它们各自的领域、它们的实际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帝国的形成。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断言个别国家的主权为建立帝国而放弃的土地是自愿割让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只是在更强大的普鲁士所施加的压力。

俾斯麦所遵循的原则是，不把他能从德国拿走的东西交给德国。

而只向各州索取对国家绝对必要的赖希。温和而明智的政策！一方面，俾斯麦非常尊重习俗和传统；另一方面他的政策为新帝国赢得了自成立以来的极大爱和愿意合作。

然而，如果把俾斯麦的决定归咎于他对自身信念的任何信念，那将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部分原因是，帝国已经获得了足以永久存在的主权。

这远非俾斯麦的想法。

相反，他希望把目前难以完成的事情留到未来来解决。

此刻，可能还没有得到各州的同意。他相信时间的平衡作用，以及进化过程的压力，在他看来，这比试图打破个人的抵抗更有效目前各州均已提供。

通过采取这一政策，他展示了他精通政治才能。事实上，帝国的主权不断增强，代价是各个国家的主权。

时间的流逝已经实现了俾斯麦的期望。德国的崩溃和君主制政府的废除必然加速这一发展。德国联邦州并非建立在民族学的基础上，而是而出于政治条件，一旦君主制消失，它们就注定会失去其重要性。

政府形式和与之相关的王朝都被废除了。因为这对精神各个国家都有其政治起源和发展。因此，许多小国失去了其内部存在的理由，放弃了生存，并出于纯粹实际的原因被诱导与邻居融合，否则他们自愿加入更强大的国家。

这证明了一个惊人的方式低异常脆弱的是实际主权这些小各州都享受着，而这也证明了它们是多么不受其公民尊重。

虽然君主政体及其代表的废除已经改变了联邦性质对德国来说，一个沉重的打击，从联邦的角度来看，更具破坏性的是接受“和平”条约所产生的义务。

联邦各州失去对其领土的所有主权控制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

财政，德国因战争失败而承担财政义务的那一刻而这些是无法通过与个人签订的单独协议来解决的州。

导致德国接管邮政和铁路的后续措施是这是自从和平条约开始奴役我们的人民的必然结果。帝国被迫独占越来越多的资源，以便履行因敲诈勒索增加而产生的义务。

帝国的权力以这种方式扩展到联邦各州，虽然这个过程通常愚蠢得可笑，但其本身却合乎逻辑且自然。

这一切的责任必须归咎于那些在关键时刻失败的人和政党。

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努力取得战争的胜利。

罪魁祸首是那些满足自身私利的政党，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在战争期间，拒绝向帝国提供其必须以十倍于帝国的规模征用的战争失败时的衡量。历史的报应！上天很少像这次一样，在犯罪发生后如此迅速地报应。那些几年前，这些政党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巴伐利亚——在帝国军队面前——现在只能被动地旁观，而形势的压力迫使德意志帝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决定废除各个国家的存在。

他们是自身违约行为的受害者。

向选民抱怨是极其虚伪的行为（因为只有向选民抱怨，我们当代政党在宣传中谈到了各州在被剥夺了某些主权利力，而与此同时，这些政党竞相推行有利于履行凡尔赛条约义务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帝国内部结构的深刻改变。

俾斯麦的帝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部世界的义务的束缚。

俾斯麦的帝国从来没有承担过如此沉重和毫无成效的义务，就像根据道威斯计划对德国实施的制裁。

即使在国内，俾斯麦帝国的权威也仅限于与少数绝对基本事项。因此，帝国可以免除财政控制联邦各州并依靠他们的贡献生活。

毋庸置疑，一方面，维护其某些主权权利，另一方面，联邦各州向德国缴纳的财政贡税相对较少促使他们欢迎它的存在。但现在这样说的不真实和不公平的，因为某些宣传家们认为，联邦各州之所以对德国抱有敌意，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财政服从于它。这不是真实的情况。缺乏对政治的同情帝国所体现的理念并不是由于个人主权的丧失州。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政权以令人遗憾的方式充当德国人民的代表。

尽管举行了各种庆祝国旗和宪法的庆祝活动，但现今的德国未能激发任何一部分人民的积极性，保护法共和也许能防止对共和制度的暴行，但它无法赢得一个人的忠诚单身德国人。

共和国在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本国公民侵害时表现出的过度谨慎通过法律和监禁的判决，构成了最毁灭性和最屈辱的对所有共和制度本身的批评。

另一个原因是，像今天某些政党那样说，帝国的衰落是由于它侵犯了个别国家拥有的某些主权权利迄今享受。

假设帝国没有将其权力扩展到各个州，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如果一般义务保持不变，这些国家会更青睐这一做法尽管它们现在很重。

相反，如果各州今天必须缴纳大会要求的数额，为了履行将德国沦为奴隶的命令的规定，对德国的敌意将会无比强烈。

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很难从联邦各州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征收所得税，但在征收过程中必须采用强制手段。

共和国接受了和平条约，但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意愿打破这些条约，就必须考虑和平条约赋予它的义务。

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完全在于那些不断向耐心的选民们必须维护联邦各州的自治权，同时同时他们主张并要求德国应该推行一项必然导致所谓的最后的‘主权’权利也被压制。

我说‘必然’，是因为现今的帝国没有其他可能的手段来承担疯狂的国内外政策对其提出了指控。

裂痕越来越深，德国每增加一笔新债务，通过德国利益在外国面前的代表方式是犯罪行为需要在国内施加新的、更强大的压力。这又需要进步的废除各州的所有主权，以防止反对的萌芽变得活跃，甚至产生。

当今帝国的政策与以往帝国政策的主要区别在于：旧帝国给予国内人民自由，并对外展现出强大的而共和国则对外国人表现出软弱，压迫本国人民。

国内公民。

在这两种情况下，一种态度决定了另一种态度。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国家不需要做出由于公民的热爱和忠诚，内陆地区出台了许多法律。

国际奴役国家只有通过强迫其公民为其提供服务才能生存要求，现政权谈论‘自由公民’是无礼的。

它们只存在于已经不复存在的德国。现在的共和国是奴隶的殖民地和外国人的呼唤。它最多有臣民，但没有公民。

因此，它没有国徽，只有商标，由官方法令和立法措施。

这一象征，即德国民主的盖斯勒帽，将永远与我们格格不入。

人们。

共和国没有传统意识，也没有对过去伟大事业的尊重，把过去陷入泥潭，但有一天它会惊讶地发现，它的虔诚是多么肤浅主题有自己的徽章。

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已具有了间奏曲的特征。

这个国家必然会越来越多地限制各个州的主权，不仅仅是为了一方面，出于财务方面的一般原因，另一方面，出于原则原因，通过执行财务政策敲诈勒索。为了榨干人民最后一点物质，它还被迫剥夺剥夺他们最后的权利，以免普遍的不满情绪有一天会爆发为公开的叛乱。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将扭转这一公式，并采取以下基本原则：一个强大的民族帝国，在其外交政策中代表和保护其公民可以最大程度地自由地统治国内，而不必担心国家的安全。

另一方面，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个人的自由以及组成州的自由，但不包括由此产生的削弱帝国的理想；这样做是合理的，如果在这些具体的行动中，公民个人承认的提高国家威望的手段整体而言。事实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趋势都是趋向统一，在这方面德国也不例外。

即使在今天，谈论个别国家的主权也是荒谬的，因为这已经由于许多州的面积都小得可笑

因此这变得不可能。

在商业领域，以及在行政领域，各州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下降。

现代通讯手段和机械进步距离和空间逐渐缩小。曾经是一个国家的地方，今天只是一个省，一个现代国家所覆盖的领土，曾经具有与一个大陆同等重要的意义。

与德国这样的国家管理有关的纯技术困难并不是比勃兰登堡等省政府的官员人数多一百多万人二十年前。

如今，从慕尼黑到柏林的距离比从一百年前从慕尼黑到施塔恩贝格。

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今天德国的整个领土比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某些德国联邦州。

对这些事实的后果视而不见，就是活在过去。总是有这样的事情，总是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会阻碍，但他们无法阻止历史。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不能对逻辑视而不见这些事实的后果。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让自己被空洞的我们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言论。

我说“空话”，是因为这些政党并不真正相信有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对目前的事态。

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权力下放的要求只不过是党派行为，其背后缺乏严肃的决心。

每当这些政党需要从空谈转向实际行动时，他们失败了。每当帝国“抢劫”巴伐利亚州时，尽管“主权权利”，但除了毫无意义的、令人厌恶的抗议之外，它没有遇到任何真正的抵抗。事实上，当有人严肃地反对实行这种制度所表现出的疯狂时，中央集权，他被那些政党谴责为对现政府不忠。

他们诽谤、谴责和迫害他，直到他被关进监狱或被非法被剥夺公开言论的权利。

这些事实应该能够让我们的追随者认识到这些所谓的联邦主义圈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使用联邦主义学说就像他们使用宗教仅仅是他们促进自己基本党派利益的一种手段。

一定的统一性，特别是在运输领域，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

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有责任全力反对这种发展。

现代国家，特别是当所提议的措施仅仅是为了筛查和从而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外交政策。

正因为现今的帝国已经实行了铁路、邮政和电报服务、财政等，不是从国家政治的崇高立场出发，而是为了掌握执行无限制履行政策的手段和保障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来阻挠它的承诺，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阻止这样的政策。

我们必须反对现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因为这对于我们人民的存在，因为这个系统被采用仅仅是为了方便支付数十亿，并根据我们的战后外交政策向外国人转让质押。

政策。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反对任何此类试图。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集权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国内事务中，它有助于强化一个在所有表现形式上都带来最大不幸的政府体系关于德意志民族。

现今的犹太民主帝国已经成为德国人民真正的祸害，试图否定所有尚未充满时代精神，并试图通过减少他们来执行这一政策完全无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不仅试图建立各州基于宪法力量的反对，而宪法力量承诺成功，而是要使他们反对集权的斗争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更高层次的广义上的德国国家利益。

因此，尽管巴伐利亚人民党从其狭隘和特殊主义的角度出发，立场，为维护巴伐利亚州的“特殊权利”而斗争，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为更高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态度，与人民的利益相矛盾。

十一月民主。

反对这种集权过程的第三个理由来自于这样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所谓的“帝国化”根本不能实现统一，更不能实现简化。

在许多情况下，它被采用只是为了摆脱主权控制的一种手段个别国家设立某些机构，并将

其交到革命党手中。

在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次公然的偏袒像民主共和国。这种对集权的狂热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政党的所为，曾承诺将为人才的晋升开辟道路，旨在填补每个邮局和办公室都有自己的游击队。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犹太人尤其在帝国接管的经济机构以及国家行政机构中的职位，因此这两个地方都成了犹太人的专属领地。

出于战术原因，这最后一项考虑迫使我们密切关注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前进，并步步与之斗争。

但这样做时，我们的立场必须始终是崇高的国家政策，而不是吹毛求疵的特殊主义。

最后这一点是必要的，以免我们的追随者中出现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不承认帝国有权将高于组成州的。

关于这一权利，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有丝毫怀疑。因为对我们来说，国家是只不过是一个容器和它的内容（即国家、人民）才是本质因素，显然，一切其他利益都必须服从国家最高利益。尤其是，我们不能承认任何其他国家在民族与代表民族的帝国的界限。

一些联邦州通过维持国外和他们之间的“代表”必须而且将会停止。

在此之前，我们不会惊讶于某些国家对政治帝国的统一并采取相应行动。

这些“代表”的荒谬性就更大，因为他们做坏事，不屈服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德国人在国外的利益不能得到德国外交部长的保护，赖希，他们又怎么能受到某个小联邦州部长的保护呢？在现存世界秩序框架内是否显得荒谬？真正的事实是，这些小联邦州被视为与任何试图分裂德国的企图，无论是从德国内部还是外部策划的帝国的这种尝试总是能取悦某个外国。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决不能允许一些高贵但堕落的家庭获得其成员之一一位半垂死的接班人出国担任部长一职，希望他能在新的岗位上茁壮成长。

即使在旧帝国时代，我们的驻外外交代表也非常可怜，进一步的此类实验是非常不可取的。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各个州的文化政策都将纳入我们的文化政策领域。

路德维希一世是巴伐利亚成为重要中心的功臣，但他并不是一个固执的人。

具有反德倾向的特殊主义者，但同样致力于大德意志的理想正如他对待艺术一样。

他首先考虑的是利用国家权力来发展巴伐利亚的文化地位而不是政治权力，而且通过这样做，他取得了比如果他这样做更好、更持久的结果。

遵守任何其他行为准则。

到那时为止，慕尼黑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省会城市，但他把它变成了德国艺术之都，他使它成为一个知识中心，至今仍弗兰肯与巴伐利亚，尽管弗兰肯人的性情截然不同。

如果慕尼黑保持原样，萨克森州发生的事情就会重演位于巴伐利亚，不同之处在于，莱比锡的巴伐利亚对应城市纽伦堡不再是巴伐利亚城市，而是弗兰肯城市。

慕尼黑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打倒普鲁士”的呼声。是什么让这座城市成为重要的是国王希望把它作为一件艺术杰作呈现给德国人民，必须被看到才能被欣赏，而且它既被看到又被欣赏。这给未来。

未来各个国家的重要性将不再在于其政治或宪法权力。

我把它视为重要的日耳曼民族学和文化政治中心，但即使在这里，时间将完成它的平衡工作。现代旅行设施将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排列在一起部落界限将会逐渐消失，甚至文化图景也开始逐渐假设一个更加统一的模式。

陆军必须绝对避免受到各州的影响。即将到来的全国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重蹈过去的覆辙，给军队强加一项不在其范围内并且永远不应被分配给它。

德国军队并不是一所保存地方特色的学校，而是一个在一所学校里，所有德国人都将学会

理解和适应彼此的生活方式。

任何在国家生活中造成分裂影响的事物都应该成为统一的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军队必须把德国男孩培养到自己家乡狭小视野之外，让他意识到他是国家的一部分。

青年人必须学会了解祖国的疆界，而不是自己地区的疆界。

因为有一天他必须捍卫后者。

因此，让德国青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军事训练是荒谬的。

在此期间，他应该学习了解德国。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德国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学徒期间旅行，因此扩大他们的视野。

鉴于此，把年轻的巴伐利亚新兵留在慕尼黑，把弗兰肯新兵留在纽伦堡、卡尔斯鲁厄的巴登新兵、斯图加特的符腾堡等等？向巴伐利亚人展示莱茵河和北海，向当地人展示汉堡是阿尔卑斯山，而来自东普鲁士的小伙子是德国中部的山脉？各地区应保持各自的特点，但军营则不然。我们可能会反对任何实现统一的尝试，但陆军却不会。相反，即使我们反对任何这种倾向，我们也一定会欢迎它在这个特定的除此之外，考虑到目前帝国军队的规模，这样做是荒谬的维持联邦分裂。

此外，我们认为，帝国军队所取得的统一性，即使将来我们重建国家军队，我们也必须保留这支军队。

最后，一个新的胜利的理想应该打破一切阻碍其活动的锁链。

宣传其理念。

国家社会主义必须主张将其原则强加于整个德国民族的权利，而不需要考虑到迄今为止联邦国家的范围。

我们必须向德国人民灌输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原则。因为教会并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不受政治边界的约束或限制，因此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仅限于构成我们祖国的任何一个联邦州。

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并非服务于个别联邦的政治利益各州，而是统治整个德意志民族。

它必须决定全体人民的生活，并且重新塑造这种生活。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要求超越已划定的界限的权利由我们所否认的政治发展所致。

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胜利得越彻底，自由就越大它可以将其授予国家内部的个人。

## 第十一章 宣传与组织

从很多角度来看，1921 年对我和国家来说都特别重要。

社会主义运动。

当我加入德国工党时，我立即负责宣传工作，我相信这一点分支目前是最重要的。

首要的并不是绞尽脑汁去解决与组织有关的问题以便向尽可能多的人传播思想。

宣传应该先于组织，为后者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从来不赞成仓促和迂腐的组织方法，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结果仅仅是一个死机器，很少形成一个活着的组织。

组织是一种从有机生命、有机进化中衍生而来的东西。当同一套观念已经在一定数量的人的头脑中扎根，他们倾向于自己在这些人中实现一定程度的秩序，这种内在的发展是不可估量的价值。

当然，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使人们总是犹豫不决，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不愿意接受更高级思想的控制。

一旦一个组织以自上而下的机械方式运作，就总是存在着一些已被任命担任某一职务但尚未证明其勇气并可能效率低下，出于嫉妒的动机，试图阻止更有能力的人采取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

这类事情造成的损害可能是致命的后果，尤其是在新运动中。

因此，建议首先宣传和公开阐述运动成立。这种宣传工作应持续一段时间，并应由一个中心指挥。

当这些思想逐渐赢得许多人的支持时，这些人类材料应该被仔细筛选出具有领导能力的人并把这种能力测试。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却天生就是领导者。

同时，认为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就是一种证明也是完全错误的。

领导能力。而事实却往往相反。

伟大的理论家很少是伟大的组织者，因为理论家和创始人的伟大系统共存于能够发现和制定那些抽象上正确的法则，而组织者首先必须是一名心理学家。

他必须接受人们本来的面目，因此他必须了解他们，不能有太高傲或对人性的估计太低了。他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卑鄙和他们的各种特点，以便形成某种生物体，具有巨大而坚定的力量，适合倡导理想并为其成功实现铺平道路。

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这种情况就更加少见了。一个鼓动者更有可能向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证明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对于许多与他打交道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只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然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个能够向伟大人物阐述思想的鼓动者一定永远是一个群众心理学家，即使他只是一个煽动家。

因此，他将永远是一个比沉思理论家更有能力的领导者，而沉思理论家远离喧嚣的人群，沉思自己的思想。

成为领导者意味着能够感动群众。提出想法的天赋与与领导能力无关的一切。

讨论哪一个更重要是毫无意义的——设想理想和人类目标，或者能够实现它们。在这里，就像在这本书中经常看到的那样，世界上，如果没有另一个，那么一个就会完全毫无意义。

如果领导者不能推动群众接受它们，相反，拥有一个天才和热情的人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知识理论家没有确定人类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那么他还能成为领导者吗？但当理论家、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能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我们就有了这是世界上最罕见的现象，因为正



是这种团结造就了伟人。

我已经讲过，我入党初期，是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

我必须成功地逐渐聚集起一小群人，他们被灌输了新的学说，从而提供了后来形成第一批要素的人类材料组织的目标。因此，宣传者的目标几乎总是远远超出了组织者。

如果一场运动企图推翻某种秩序，建立新的秩序，那么其领导者必须明确理解并尊重以下原则。

每一个获得人类素材的运动都必须首先将这些素材分成两类，即信徒与会员。

宣传者的任务是获得追随者，组织机构的任务是征集成员。

运动的追随者是同情并接受其目标的人，而成员则是为他们而战的人。

追随者是那些通过宣传而皈依该运动教义的人。

成员是受组织机构委托，协助赢得新信徒反过来会成为新成员。

因为成为信徒只需要被动地接受理想，而成为会员则意味着拥护和捍卫它的党，每 10 名追随者中，永远不会超过 2 名成员。

加入仅基于理解，而成员资格则建立在坚持的勇气上坚持已经理解和接受的事物，并将其宣扬给他人。

大多数人懒惰又胆怯，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一种教义，而且只少数派将承担起成员的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准备捍卫自己的意。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者必须不懈地为宣传赢得新的追随者。

运动，而组织机构必须确保只有这些运动中最好的元素追随者即可成为会员。

宣传者不必担心他所赢得的个体皈依者的个人价值转向运动。他不需要探究他们的能力、智力或性格。

然而，从这些皈依者中，组织机构必须选出那些最有能力积极帮助运动取得胜利。

宣传者的目的是引导全体人民接受他的教导。组织机构仅包括那些在心理上不会阻碍该运动教义的进一步传播。

宣传者将他的理论灌输到整个国家的头脑中，为这一教义胜利的时刻已经临近，而组织机构则通过那些已经证明有必要的追随者的持续、有机和战斗凝聚力能力和意志力，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宣传越有效，已经影响了整个人民，而且组织越是排他、越是严格、越是僵化，其意识形态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信徒的数量永远不会太多，而成员很容易变得太大而不是太小。

当整个民族通过宣传而接受某种思想时，组织机构就能在少数支持者的帮助下实现其目标。

因此，宣传和组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固定关系，信徒和会员的数量。

如果宣传得当，组织机构可以很小，但人数越多，信徒越多，成员数量就越少。

相反，如果宣传不好，组织机构就必须很大，如果宣传机构很小，如果该运动仍然真诚地希望取得成功。

宣传者的首要任务是赢得那些随后将加入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的首要职责是选拔和培训能够胜任进行宣传。

宣传者的第二个任务是破坏现有秩序，并使之饱和和新的教学，而组织机构的第二个任务必须是争取权力，所以使这一理论最终获得胜利。

意识形态革命总是最成功的，如果新的意识形态已经传授给整个人口，或者如果有必要，随后强加给它，而另一方面运动本身，即组织，应该只包括最低限度的人员来人是该州的神经中枢。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每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这一运动的理想必须首先通过宣传活动来传播。

宣传者必须不遗余力地使人们清楚地理解新思想，说服人们其他人采纳这些观点，并努力

动摇他们对迄今为止所持信念的信心握住。

为了使这种宣传具有坚定性，它必须以组织为基础。

该组织的成员来自那些被宣传俘获的追随者如果大力推进宣传工作，这种趋势就会更加明显，如果背后的组织本身充满活力和强大，那么就会更加有效。因此，组织机构的最高任务是确保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和或分歧运动成员之间的分歧不会导致分裂，从而阻碍运动内部的工作。

移动。

此外，组织机构的职责是确保运动的战斗精神不会衰弱或消亡，而是不断地得到恢复和加强。

没有必要增加成员数量无限期地；相反，鉴于只有一小部分人类拥有能量和勇气，一个无限地增加其自身组织的运动，总有一天必然会从而变得虚弱。

组织，即会员人数，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逐渐失去其战斗力，不再有能力支持和转向宣传并具备实现理想的必要热情和决心。

一个学说越伟大、越具有革命性，它所激发的精神就越活跃。

成员团体，因为该学说的革命性质本身就意味着危险它的拥护者，这足以吓跑那些胆小怕事、心胸狭窄的非利士人。

他们内心可能相信这个教义，但他们害怕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成为该运动的成员。

然而，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一个受真正革命理想启发的组织将只吸引那些被其宣传所征服的最活跃的会员。

正是在自然选择过程的保证下，成员的这种活动使我们为继续积极、有力地开展宣传工作创造了先决条件，也为为实现运动所依据的理想而进行的胜利斗争。

威胁一场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其成员数量的异常增加成员，由于其太快取得成功。

只要一场运动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弱小而根本的人民自负的性格会避开它；但这些人会试图在那一刻被接受为成员该党看起来很可能取得或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运动一开始是成功的，但在达到实现他们的目的，并出于一种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的内心弱点，放弃斗争并最终从赛场上消失。

由于早期取得的成功，许多不受欢迎、不值得尊敬、特别胆怯的人个人成为运动的成员，最终成为多数，并推翻那些充满战斗精神的人，利用这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它拖到他们只顾自己微不足道的水平，对实现最初的想法毫无帮助。

最初的热情消退了，斗争精神也衰退了，正如资产阶级世界习惯于评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定的道理）酒已经和水混合了，然后，当然，不可能成就大事。

因此，一场运动必须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一旦成功，其成员名单就会关闭，而其成员资格的任何进一步增加组织工作应在采取最谨慎的预防措施后进行，并且对申请会员资格的人进行严格的筛选。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运动核心的完整性、新鲜性和健全性。

必须注意的是，运动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最初的核心，这意味着这个核心必须指导旨在确保普遍承认该运动，并作为决定采取什么措施的中央权力机构为切实实现其理想而采取的措施。

该组织不应该只任命那些组成该运动最初核心的人在那些已经被争取到的地区，所有重要的职位，但应该确保整个管理机构都是由这样的要素构成的。

这应该一直持续到党的准则和教义成为我们行动的基础和新国家的实质。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逐步把控制权移交给该国宪法。

陈述运动的精神创造了什么。

但这通常是由于相互竞争而发生的，因为在这里，这并不是一个人类的问题智力比力量的

发挥更重要，而力量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可以预见的，但并非永久受控制。所有伟大的运动，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宗教运动，其成功都归功于对并采用这些原则，如果没有这些法律，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成功。

观察到。

作为党的宣传主管，我不仅注意为运动在随后的阶段中，我也采用了最激进的宣传方式。以确保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才能进入该组织。

因为我的宣传越激进、越煽动，就越吓跑那些软弱的动摇的人物，从而阻止他们进入我们组织的第一个核心。

也许他们仍然是追随者，但他们没有宣传这一事实，相反，他们坚持对这个问题保持谨慎的沉默。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向我保证，尽管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我们党员。他们说这个运动太激进了以成员身份参加会让他们面临严厉的谴责甚至危险，因此如果一个诚实、爱好和平的公民选择留在幕后，没有人会对此感到不快，因为至少目前是这样，尽管我们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我们的事业。

这一切都是好的。如果那些内心不赞成革命的人，当时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运动，今天我们可以把自己视为虔诚的兄弟会，而不是一个充满战斗精神的年轻运动。

我当时为我们的宣传所赋予的生动活泼的形式，强化了我们的保证了我们运动的激进倾向结果是，除了少数例外，只有持有激进观点的人倾向于成为其成员。

由于我们的宣传效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数十万公民不仅在内心深处相信我们是正确的，而且祝愿我们胜利，尽管他们个人太胆小，不敢为这场胜利做出牺牲，甚至不敢为之奋斗。到 1921 年中期，仅仅获得追随者就足够了，并且对运动很有价值，但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有机会我们的组织与宣传所取得的明显成功保持一致。

这是一群爱国幻想家在当时的党主席的支持下做出的尝试当时，接管了党的管理，导致了这个小阴谋的失败，而且，作为根据全体会员大会一致通过的动议，整个管理层党的重任就落到我头上了。

同时通过了一项新法规，赋予该运动主席绝对的责任制，废除委员会决议制，代之以制度自那时起，劳动分工就一直运行良好。

从 1921 年 8 月 1 日起，我负责党的内部改组，并得到了众多优秀男士的支持。

我将在本著作的后记中分别提到他们和他们的工作。在我的努力中利用宣传成果为组织谋利，从而稳定因此，我必须彻底废除一些既定做法，并制定一些规定，其余各方均不拥有或承认。

在 1919 年至 1920 年间，该运动由在成员，按照章程规定任职。

该委员会由一名财务主管、一名助理财务主管、一名秘书和一名助理组成。

秘书，主席和副主席。此外，还有成员代表、宣传主任和各种陪审员。滑稽的是委员会所体现的正是运动本身想要反对的原则。

全力斗争，即议会制原则。

很明显，从最小的地方团体到地区和区域团体，州团体最后是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所采用的原则也包含了同样的在这个制度下，我们都在遭受着苦难，并且还在继续遭受着苦难。必须立即改变这种状况，如果内部的这种不良基础组织不应危害运动并阻碍其崇高使命的实现不可能的。

委员会会议，宣读会议记录并通过决议根据多数人的投票，呈现出一个微型议会的景象。

这里不存在个人责任，同样的荒谬和悖论盛行如同国家的伟大代表机构一样。

委员会收到了一些提名，任命他们为秘书、财务主管、组织、宣传人员，还有天知道还有什么。

委员会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并进行了表决。因此，宣传主管就一个与财政，而后者则

对一个只涉及组织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投票，因为例如，组织者就与秘书部门相关的主题进行投票，等等。

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专门的人来负责宣传，如果财务主管、秘书、会员代表等，必须对与之有关的问题作出判断吗？对于一个有常识的人来说，这种事情似乎难以理解的是，在一个大型制造企业中，董事会或要求其他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技术专家作出决定与他们自己的工作无关的问题。

我拒绝容忍这种愚蠢的行为，不久之后，我就不再出现在委员会。我除了处理我自己的宣传部门之外什么也没做，而且我不允许其他人来窥探我的活动。相反，我没有干涉其他的。当新章程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主席时，我拥有了必要的权力，也拥有对所有这些胡言乱语不屑一顾的相应权利。

取代委员会多数票决定，绝对责任原则被引入。

主席负责整个运动的管理。他分配工作在他下属的委员会成员中完成工作，并由他选择其他成员完成特殊工作个人。

这些先生们必须对分配给他的任务承担全部责任。他是下属只有主席，其职责是监督总体合作，选择人员并就如何实现合作给出总体指导。

这一绝对责任原则已逐渐成为运动，至少就党的管理而言是如此。

在小型地方团体中，也许在区域和地区团体中，还需要很长时间原则要完全实施还需要时间，因为胆小和低效的人自然反对它。

对他们来说，对某一行为承担绝对责任的想法带来了一个不愉快的前景如果在面临艰难决定时，他们有家人的支持，他们会感到更安心、更安全。

所谓委员会中的多数。

但我认为，绝对有必要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我们对这种对责任的恐惧绝不妥协，尽管这需要一段时间可以在领导中获得这种责任和能力的概念，这将使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只有那些拥有必要的天赋并被选中从事这项工作的人。

无论如何，一场要与议会制度的荒谬性作斗争的运动必须只有这样，它才具有进行斗争的必要力量。

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在多数原则盛行的时代，一场运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以领导作为其基本原则（因此领导者承担责任），终有一天会成功废除并战胜现有条件。

这个想法使得我们运动内部重组成为必要。这一重组的逻辑发展改组使运动的经济部分有了明显的区别。

以及一般的政治管理。个人责任的原则扩展到了所有党的行政部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再生作用，因为它们把这些部门从政治影响并允许它们仅依据经济原则运作。

1919年秋天，我入党的时候，党员只有六人。党内既没有办公室、官员、表格、印章或任何印刷品。委员会首次举行了他们在 Herrengasse 的一家餐厅里坐下，然后又在 Gasteig 的一家咖啡馆里坐下。

这种情况是无法容忍的，所以我立即采取行动。我去了几个慕尼黑的餐馆和酒店，并计划在其中租一间房间，供派对。

在古老的 Sterneckerbräu im Tal，有一个小型的拱顶房间，以前曾用作神圣罗马帝国的巴伐利亚顾问们聚会时把这里当作酒吧间。

它阴暗而阴郁，因此很适合古代的用途，但不太适合新的它现在注定要服务于这个目的。它唯一的一扇窗户面向的那条小街是如此的狭窄的房间，即使在最明亮的夏日，仍然昏暗而阴沉。

这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办公室。由于租金每月只有五十马克（当时是一笔巨款），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期待太多，我们不敢抱怨，即使当木制在我们入住前几天，护墙板就被拆除

了。这块镶板是专门为钦差大臣设立的。这个地方看起来更像一座坟墓，而不是办公室。但它标志着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逐渐安装了电灯，后来又安装了电话。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借来的椅子，打开书架，然后，橱柜。房东的两个餐具柜用来存放我们的传单、标语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仅仅通过举行会议来指导运动的进程是行不通的。

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议。

除非我们有一位领薪官员，但当时我们很难安排任何这样的事情。

该运动的成员仍然很少，很难在他们中间找到合适的人选。

工作，对自己来说很少的东西感到满足，同时准备迎接该运动对他的时间和精力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们找到了一位同意成为我们第一位业务经理的士兵。他的名字是舒斯勒，是我战时的一位老战友。起初他每天都来我们的新办公室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后来他又从五点到八点来，随后整个下午；最后，这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他从早上开始在办公室工作直到深夜。

他是一个勤劳、正直、非常诚实的人，他非常勤奋，而且运动的忠实支持者。他带来了一台自己的阿德勒小型打字机——第一台为党服务的打字机。后来，党买下了它，并支付了分期付款。

我们需要一个小保险箱来保护我们的文件和会员名册不受伤害，持有当时不存在的资金。相反，我们的财务状况非常我感到绝望，以至于经常不得不动用自己的个人储蓄。

十八个月后，我们的营业场所变得太小了，所以我们搬到了一个新的位于 **Cornelius Strasse**。

我们的办公室还是在餐厅里，但现在我们不再是一个房间，而是三个小房间，一间有柜台的大房间。当时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留在这些场所一直营业到 1923 年 11 月。

1920 年 12 月，我们收购了《人民观察家报》。这份报纸，正如其名称一样意味着拥护民族主义事业，现在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喉舌德国工党。

起初，它每周出版两次；但在 1923 年初，它成为一份日报，年底同年八月，它开始以现在众所周知的形式出现。

作为一个新闻界的新手，我学到了很多教训，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与犹太人手中的大量文件相比，当时几乎没有捍卫民族主义事业的重要报纸。

这种状况本应给我们带来思考。正如我经常看到的那样经验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谓的民族报纸的商业方面的管理方式。

这些行为过于强调政治观点应该被考虑进去考虑优先于效率——这是一种相当错误的态度因为政治观点不应该而不能光彩夺目，而应体现在高效的工作中。

为国家做出有价值贡献的人，从而表达了他的政治而另一个人只是谈论他的观点，却不做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对国家来说，这种态度对任何真正的政治观点都是有害的，他的态度也对他的特定政党。

正如其名称所示，《人民观察家报》是一份所谓的“人民报纸”。它有所有好的品质，但更重要的是所有民族制度所固有的错误和弱点。

虽然阅读材料很精彩，但商业方面以非常低效的方式进行。这里的潜在思想是，一份民族主义报纸应该由持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人捐款资助，但这一事实却被忽视了它必须与其他公司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期望爱国人士的捐款，以弥补管理上的错误和低效承诺。我小心地及时改变了这些条件，因为我认识到这样做所固有的危险幸运之神站在我这一边，让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从那时起，他一直为运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作为报纸的业务经

理，而且作为党的业务经理。

1914 年，战争期间，我结识了马克斯·阿曼，他当时是我的上级现担任该党的总务经理。在四年的战争中，我有机会观察到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勤奋和严谨我未来的合作者的责任心。

1921 年夏天，我向我的老团申请有一天我偶然遇到了一位同志，并请他担任移动。

当时，运动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我有理由对此感到不满我们的几位官员，我和其中一位官员有过非常痛苦的经历。

当时阿曼的职位很好，前景也不错。犹豫了很久之后，他同意了我的请求。

但前提是，他不会受制于无能的委员会，并且会只对一个主人负责。

这是党的第一位商业经理的无价功劳，他的商业知识渊博，他给各种商业活动带来了秩序和正直。

党所关切的问题。

自那时以来，这些作品一直是典范，没有其他作品能与之媲美或超越。

运动的分支。但正如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伟大的能力会招致嫉妒和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必须忍受。

自 1922 年起，我们在商业发展方面遵循了明确的指导原则运动及其组织的相关事宜。

已经存在一个中央档案系统，其中存储了所有成员的姓名和个人数据党的财政状况已趋于稳健。

经常性支出必须由经常性收入支付，只能使用特别收入用于特殊支出。

因此，尽管当时困难重重，但运动仍然几乎没有债务，除了少数小额活期账户外。

资金确实稳步增加。

一切管理都像私人企业一样。受雇人员的职位由他们的效率，并且无法以任何方式掩盖他们对党的忠诚。

一个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通过他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所付出的准备、勤奋和效率来证明他的忠诚。

履行分配给他的任何职责，完成分配给他的任何工作在国家社会中。

一个不履行自己职责的人，不能夸耀他的忠诚，因为他确实违反。

党的新任业务经理坚决抵制各种影响，坚定地维护认为，在党的管理部门中，没有为追随者和党员提供闲职。

那些不想工作的运动者。

一场积极反对政府引入公务员队伍的腐败的运动各政党必须在自己的行政部门中杜绝这种恶习。

碰巧的是，一些曾经是该报信徒的人被聘为该报的工作人员巴伐利亚人民党，但他们的工作表明他们非常有资格担任工作。

这次实验的结果总体上非常令人满意。这是因为诚实坦率地承认个人效率，运动赢得了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更深刻地影响员工。

后来这些人成为了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并且一直如此，不仅在口头上如此，而且他们为服务所作的坚定、诚实和认真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新运动。

虽然一名资历优良的党员比另一名具有同等资历的党员更受青睐，但不属于党，没有人能仅仅因为他是党员而获得职位。

党员。

我们的新任业务经理坚定不移地运用这些原则，并逐步尽管面临各种反对，我们还是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结果对运动非常有利。

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在通货膨胀的困难时期数以千计的企业倒闭，数以千计的报纸不得不停刊，不仅保持运动商业部门的运转并为其活动提供资金，同时也使人民观察

家报稳步发展。当时它跻身于报纸。

1921 年更为重要，因为作为党的主席，我慢慢地但成功地制止了众多成员的批评和干涉。

委员会负责处理党的各项业务事宜。

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笨蛋不断地插手，假装他们更了解情况，而实际上他们只留下了混乱在他们身后。

然后这些聪明人大多相当谦虚地退休，去寻找另一个领域来发展他们的监督和激励活动。

有些人似乎有一种挑剔一切事情的癖好，可以说，他们总是一种永远孕育着宏伟计划、理念、项目和方法的状态。

当然，他们的伟大目标和理想始终是组建一个委员会，监督能力，能够窥探到其他的。

许多委员会成员没有意识到，这是冒犯，违背了委员会的精神。

如果未经授权的人不断干扰真正有能力的人的工作，那么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人。

在那些年里，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保护那些对他们工作出色或被委以重任给予支持，使他们保证他们能够自由地开展日常工作。

使这些委员会变得无害的最好方法是，这些委员会要么什么也不做，要么不切实际的决定就是给他们一些真正的工作去做。然后有趣的是看到成员们会默默地消失，很快就无处可寻。这让我想起了同样的伟大机构——德国国会大厦。

如果让其成员去做一些实际工作而不是空谈，他们很快就会消失，尤其是如果每个成员都对自己所分配的工作负有个人责任。

我一直要求，就像在私人生活中一样，在运动中，我们不应该放弃寻找直到找到最优秀、最诚实、最有能力的人来担任根据具体情况，在运动的每个商业机构中担任官方经理或领导者。一旦就任，他应该被赋予绝对的权力和充分的行动自由，尊重下属，同时承担起对下属的全部责任他的上级。

没有人被置于对下属有权威的地位，除非他自己更胜任他们所承担的工作。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把我的观点越来越被付诸实践，以至于今天，至少在高层权威人士看来，就运动而言，它们被接受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种态度的明显成功在 1923 年 11 月 9 日得到了体现。

四年前，当我加入该运动时，它甚至连一个橡皮图章都没有。

1923 年 11 月 9 日，党被解散，党的财产被没收。这包括所有贵重物品和报纸，价值超过十七万金标记。

## 第十二章：贸易问题

工会由于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感到有必要对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我们努力寻找最快捷、最简便的方法，让运动深入人民的内心。

广大群众，我们总是面临这样的反对意见：工人永远不能完全属于我们，而他在纯粹职业和经济领域的利益则由政治组织是由那些原则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所管理的。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反对意见。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工人从事某种行业或如果他不属于工会，那么就不可能有呼吁。

这样一来，他的职业利益不仅得到了保护，而且他在工厂或企业中的地位也得到了保护，从长远来看，如果他不是工会会员，那么这个职位就无法维持。

大多数工人都加入了工会。一般来说，工会已经进行了成功地建立明确的工资标准而斗争，并得出结论保证工人稳定收入的协议。

毫无疑问，所有工人都从这场运动的结果中受益，特别是对诚实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拿走通过工会所进行的斗争，同时又不参加斗争。

和一般的资产阶级雇主讨论这个问题很困难。他没有不理解（或者不希望理解）该问题的物质方面或道德方面。

最后，他自己所谓的经济利益在原则上是与各种一个团结依赖他的工人的组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让这些资产阶级雇主公正地看待形势。

因此，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在这里，有必要向公正的局外人呼吁，他们不会只顾看见树木而看不见森林。

只要他们有一点善意，他们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状况对于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生存至关重要。

在本书的

第一卷中，我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一制度的性质、目的和工会的必要性。我在那里采取了这样的观点，即，除非工会采取措施，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徒劳的）或在我们的教育中引入一种新的理想，这将改变雇主对工人的态度，工人除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主张自己作为合同一方享有平等权利。

国家生存的经济领域。

我进一步指出，这将符合民族共同体的理想，如果由此实现社会不公正现象可以得到纠正否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损害结构。

此外，我还表示，工人始终认为有必要采取这种保护措施只要雇主中有一些男性没有社会责任感，甚至最基本的人权，而我最后说，如果这种自卫如果有必要，其形式应该是由工人自己组成的协会以工会为基础。

这是我的基本想法，在 1922 年也一直没有改变，但一个清晰而精确的公式仍然存在。

有待发现。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得出一些可以付诸实践的结论。

必须回答以下问题：（1）工会有必要吗？（2）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本身是否应该以工会主义为基础开展工作，或者是否其成员是否以某种形式参加工会活动？（3）国家社会主义工会应采取什么形式？我们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会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4）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怎样才能建立工会？我认为我已经充分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确信我们不可能没有工会。相反，工会是国家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机构。

它们不仅在社会政策领域很重要，而且在国家政治领域，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巨大困难通过



公正的方式得到满足时，工会运动，同时也教育他们，整个国家的毅力工会在生存斗争中的作用将得到极大的加强。最重要的是，工会这对于未来经济议会的基石必不可少，该议会将由议院组成代表各种职业和职业。

第二个问题也很容易回答。如果工会运动很重要，那么它显然，国家社会主义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而且还在实践中。但如何做呢？这更难决定。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旨在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必须始终牢记这一原则：该国未来的每一个机构都必须不断发展来自运动本身。

相信只要获得最高政治权力，我们就能突然从无到有，在不需要一定储备的情况下，实现明确的重组。

这些人都是事先接受过训练的，尤其是接受过运动精神方面的训练。

这里也适用这样的原则：精神永远比外在形式更重要它使之活跃起来，因为这种形式可以机械地、快速地创建。

例如，领导原则可能被强加给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独裁的方式。但是，这一原则只有通过逐步的从一个非常小的原子核开始发展的过程，以及通过消除的过程，生活的严酷现实不断地迫使我们，经过许多年之后，我们从中选出能够把原则付诸实践的领导者。

认为一个国家的宪法方案可以从一个投资组合，并由上级命令‘引入’。

人们可以尝试这种事情，但结果总是无法持久，而且可能甚至失败。

这让人想起魏玛宪法的起源，以及强加于德国的企图人民有一部新宪法和一面新国旗，而这两者都与历史的变迁没有任何内在联系。

我们国家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警惕所有这样的实验。它只能从一种一个早已存在的组织。

这个组织本身必须是国家社会主义生活的本质，以便最终能够建立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经济商会的生殖细胞必须建立在各种职业代表机构，尤其是工会。如果这种后续职业代表大会和中央经济议会是国家社会主义机构，这些重要的生殖细胞一定是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

运动的机构必须移交给国家；但国家不能要求突然而神奇地存在，相应的组织，除非这些组织继续存在完全没有生命迹象。

从最高角度来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认识到开展自己的工会活动的必要性。

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对雇主和雇员本着共同的合作精神，国家共同体的框架不能靠理论指导、呼吁和劝诫，而只能通过日常生活的斗争来实现。

在这场斗争中，运动必须教育几个大的经济集团，并带来以更广阔的视野让他们更加亲近彼此。

如果没有这些准备工作，那么希望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能够得以实现。

只有运动为之奋斗的伟大世界观才能逐渐形成新时代终有一天会证明这种普遍态度是内在的、根本上正确的，不只是外表的表现。

因此，运动不仅必须对工会主义思想采取积极态度，还必须更进一步，它必须通过实践活动，为其广大成员和追随者提供接受未来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所需的教育。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已经说过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各种工人阶级的代表机关。

职业和使命。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任何“阶级”，从政治角度来看，只承认公民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也承担与之相应的平等义务。

除此之外，它不承认任何国家臣民具有任何政治权利。

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工会的任务不是团结起来从而逐渐将这些人转变为一个阶级，并在与国家社会内部其他类似组织的团体发生冲突时使用它们。

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工会本身。这是这一刻，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战斗武器。

工会本来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把它变成了为自己的阶级斗争所用的工具。

他们创造了国际犹太人用来摧毁自由和独立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破坏其民族贸易和工业从而奴役自由国家，为超越所有国家范围的犹太世界金融服务。

边界。

与此相反，国家社会主义工会必须组织特定的团体，这些团体参与国家的经济生活。

因此，它们将加强国家经济体系的安全，通过消除所有这些异常现象最终都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国家，损害国家社会的活力，损害国家的福祉，并且毫无疑问，这会给经济生活本身带来邪恶和破坏。

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会的手中，罢工并不是扰乱和打乱国家生产，而是为了增加国家生产并使之顺利运行，打击一切滥用职权的行为，因为这些滥用职权具有非社会性质，妨碍了商业，从而妨碍整个国家的生存。

个人效率总是与个人的总体社会和法律地位直接相关。

个人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并因此坚信国家必然要回报每个公民的利益。

国家社会主义雇员必须认识到，他自己的物质福利与国家的经济繁荣息息相关。

国家社会主义雇主必须认识到，其雇员的福利和满意度是其自身经济繁荣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和雇主同时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整个国家社会的管理者。

他们在活动上享有的很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是经验表明，个人的生产力如果他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那么他的幸福感就会比被上级强迫的幸福感更强。

此外，通过这种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发挥自然选择的过程，培养最能干、最有能力、最勤奋的人。

因此，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会来说，罢工是一种可以而且必须的手段，只要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就可以诉诸于此，但当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理所当然地会废除两大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由雇主和雇员组成。因为这场斗争的结果总是减少国家生产力并损害国家社会。

代替这场斗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将承担起照顾和维护各有关方面的权利。

经济商会的职责是保持国家经济体系平稳运行工作状态并消除任何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缺陷或错误。

今天只有通过千百万人的斗争才能解决的问题，到那时，各行业代表协会以及中央经济议会。

因此，雇主和雇员将不再陷入相互冲突工资和工作时间，总是损害双方的利益。

他们将在更高权威机构面前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其唯一目的是维护国家和国家的福祉。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必须坚持一个不变的原则：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

国家社会主义工会的任务是教育和准备其成员遵守这些理想，即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全每个人按照自然赋予他的能力和力量，这些都是由国家社会开发和培训的。

我们的第四個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工会来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到目前为止最难回答。

一般来说，在新领土上建立一些东西比在旧领土上建立一些东西更容易，已经设立了机构。在没有同类企业的地区开设新企业很容易，但如果同类企业已经存在，情况就更困难了，

最困难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一家这样的企业能够繁荣发展。

在后一种情况下，新企业的发起人不仅要面对引入自己的业务的问题，以及如何摧毁该地区已经存在的其他业务，以便新企业能够繁荣发展。

让国家社会主义工会与其他工会并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前者必须充分感受到其任务的意识形态性质，由此产生的义务是不容忍其他类似或敌对的机构。

它还必须坚持认为，只有它是必要的，排除所有其他的。它最终可能毫无结果安排，不与同类倾向妥协，而必须坚持自己的绝对和独有的生存权。

有两种方法可能导致这种发展：（1）我们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会，然后逐渐与马克思主义国际进行斗争工会。

（2）我们本来可以加入马克思主义工会，试图给工会注入新的精神，并将它们转化为服务于新理想的工具。对于出于以下原因，选择第一种方法是不明智的。我们的财务状况当时我们仍十分关心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的资源也十分匮乏。

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断蔓延，使情况更加困难，因为当时工会无法为其会员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工人没有理由向工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工会也濒临崩溃，因为赫尔 Curio 的鲁尔政策启发了他们，数百万资金一下子涌入他们的金库。这所谓的'国家的'帝国总理应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工会的“救世主”。

我们不能指望类似的金融设施，而且没有人愿意加入一个新的工会由于资金薄弱，无法向他提供哪怕是一点点物质益处。

另一方面，我必须警惕创建这种新组织的危险，因为只会为能力不强的人提供“轻松的工作”。

当时，人事问题非常重要。我手下没有一个人我本可以请他来执行这项重要任务。

当时谁能成功推翻马克思主义工会，为国家社会主义法团思想的胜利，它将取代这种毁灭性的武器阶级斗争，可以被认为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半身像被安放在雷根斯堡的瓦尔哈拉殿堂，以供后人瞻仰。

但据我所知，没有人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荣誉。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被国际工会由平庸之辈领导这一事实误导意义。这个事实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当这些工会成立时目前尚无类似的东西。

今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与一个已经存在的怪物组织作斗争很长时间了，并且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的思考。

进攻者必须比防守者更加聪明，才能推翻后者。

马克思主义工会堡垒今天可能由平庸的领导人统治，但它不能被夺走除非通过对方优秀领导者的无畏精力和天才，否则无法通过攻击获得胜利。如果找不到这样的领导者，与命运讨价还价是徒劳的，试图让命运领导者缺乏必要的品质，因此，在领导者的领导下，很难取得成功。在这里，我们必须应用人生格言：最好是暂时不做某件事，而不是半途而废或做某事由于缺乏适当的手段，情况非常糟糕。

对此，我们必须加上另外一种考虑，这种考虑根本不是煽动性的。那时我曾经有过，而且今天仍然坚信，当一个人从事伟大的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把经济问题混为一谈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场斗争还处于早期阶段。

这尤其适用于我们德国人民，因为对他们来说，经济斗争将立即把精力从政治斗争中转移开。

一旦人们相信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积蓄买一栋小房子，他们就会他们将不得不自己去完成增加储蓄的任务，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反对那些以某种方式企图在某一天夺取被储藏起来的硬币。

他们不是代表自己所持有的观点和信念参与政治冲突，已经接受了，他们现在将“全力以赴”地实现他们的“和解”想法，并且在最终他们会陷入两难境地。

今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斗争的开始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它必须首先塑造和发展它的理想。

它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去争取让其伟大理想被接受，但这除非运动的全体力量都投入到专门用于这场斗争。

今天，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一个民族的战斗力量人们过于关注纯粹的经济问题。1918年11月发生的革命不是由工会发起的，而是由是尽管他们反对，德国资产阶级还是进行了政治斗争。

因为它相信，通过建设性的工作，国家的未来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经济领域。

我们必须从这种现象中汲取教训，因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同样的情况。我们运动的综合力量越集中于政治斗争中，我们越能满怀信心地指望在整个战线上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过早地忙于工会问题、定居问题等，那么从整体上看，这会损害我们的事业。

因为，尽管这些问题可能很重要，但除非我们掌握政治权力，并能利用这些权力来实现这些阴谋。直到那一天这些问题只会对运动产生瘫痪作用，如果它也把这些问题很快他们就只会成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阻碍。

工会主义的考量将很容易地决定政治走向。

运动，而不是运动的世界观决定工会的路线都应采纳。

运动和国家可以从国家社会主义工会主义者那里获得好处组织，只有当后者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彻底启发，才能落后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危险，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会把自己仅仅视为马克思主义工会的竞争对手，这比没有工会更糟糕。

它必须向马克思主义工会宣战，不仅作为一个组织，而且首先作为一个理想的。

它必须宣布自己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它必须宣布它本身就是德国人民各种职业和专业利益的捍卫者。

从所有这些角度考虑，当时不建议，现在也不建议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会，除非出现某个人显然是被命运召唤来解决这个特殊问题。

因此，只剩下两条路可走——要么建议我们党员退出他们加入的工会，或者暂时留在其中并尽可能地扰乱它们。

总的来说，我建议后者。这没什么不好，尤其是在1922-1923年，由于通货膨胀，工会从少数属于我们尚处于年轻阶段的运动的成员的损失微不足道，但对工会非常可观，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是他们最根深蒂固的批评家，因此从内部产生了一种分裂影响。

我完全反对所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不成功。我认为剥夺工人部分微薄的收入是犯罪行为。

代表一个组织赚取收入，而根据我内心的信念，这个组织不能承诺任何为其成员带来真正的好处。

如果一个新的政党消失，这很少会令人感到遗憾，但几乎总是令人感到遗憾。

祝贺，没有人有权抱怨，因为每个人对政治的贡献但他可能不会因此得到任何回报。

向工会缴纳会费的人有权期望工会向他做出的承诺得到回报；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种工会的发起人就是骗子，或者至少不负责任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我们在1922年采取的行动方针就是根据这些原则采取的。其他他们认为自己更了解情况并成立了工会。

他们责备我们目光短浅，看不到未来，但没过多久这些组织消失了，结果和我们的情况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欺骗他人。

### 第十三章 德国的政策联盟

德国外交事务处理不稳定，是由于缺乏建立切实有效的联盟的合理指导原则。

这种状况不仅在革命后继续存在，而且变得更加糟糕。如果战前我们政治观念的混乱状态可以看作是主要原因我们有缺陷的外交政策，在战后时期，这必须归因于缺乏诚实的意图。很自然地，那些最终通过革命者们对采取联盟政策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政策最终会导致恢复德国的自由国家。

朝这个方向发展不符合十一月犯罪；它将中断甚至终止德语的国际化国民经济和德国劳动力。最重要的是，它将结束政治影响其根源在于旨在解放德国的外交政策，从长远来看，这对于现在掌握帝国权力的人来说是致命的。

一个国家的复兴如果没有经过一个过程，就无法想象。

国有化。相反，外交政治领域中每一次重大的成功，都必须引起国内反应良好。

经验证明，每一次争取自由的斗争都会增强民族情绪和民族自我意识。

信心，从而对反民族因素和倾向产生更加敏锐的认识。

在和平时期可以容忍甚至不被注意的情况和人不仅会在民族热情被激发时，会成为厌恶的对象，但甚至会激起积极反对，而这往往会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会回想起战争爆发时普遍存在的间谍恐慌，当时人类的激情突然表现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导致最残酷的迫害，往往没有正当理由，尽管每个人都知道间谍的危险是在长期和平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普遍。然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类似的公众的关注程度。

因此，那些浮出水面的国家寄生虫的微妙本能 1918 年 11 月发生的事件使他们立刻感到恢复我们人民自由的运动，在明智的外交政策和随之而来的民族情感的觉醒——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犯罪的终结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自 1918 年以来，政府主管部门未能关于外交政策，该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努力系统地违背德国民族的利益，因为乍一看似乎经过仔细研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进步，沿着最初公开遵循的思路 1918 年十一月革命的责任人。

毫无疑问，应该区分以下两类人：（1）负责管理我们事务的人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应该负责的人；（2）我们议会的平均运行（3）我们大多数人，他们胆怯的顺从与他们缺乏智力。

第一类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二个人也与他们保持一致，要么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要么因为他们还没有勇于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反对他们知道并认为是有害的。

第三类人只是屈服，因为他们太愚蠢，无法理解。而纳粹德国工党只是一个小团体，而且几乎不为人知，外交政策问题可能在许多成员眼中，它只是次要的。

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运动一直宣布，并且必须宣布，国家在外交关系上的自由原则不是上天或任何世俗力量赐予我们的礼物，而只能是这是我们内在力量发展的成果。

只有彻底铲除导致我们崩溃的原因，并消灭所有我们能否从这种崩溃中获益，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国外。

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年轻的运动的早期阶段为了发展，我们宁愿集中精力解决国内改革问题，而不是国外改革问题。

政策。

但当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社会不断扩大，最终超出了最初的框架，这个年轻的组织认识到了一个大协会的重要性，我们当时觉得有责任我们对外交政策发展中的问题有明确的立场。有必要制定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不仅要符合我们世界观的基本思想，但实际上是它的结果。

正因为我们的人民在涉及我们对外关系的问题上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青年运动有必要教育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指导我们外交政治态度的指导原则。这是实践的前提执行我们未来外交政策中采取的任何措施，以夺回人民的自由和重新确立帝国的真正主权。

在学习这门课程时，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的基本指导原则问题是，外交政策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唯一要追求的目的是我们人民的福祉。

外交政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从以下角度来考虑：这样或那样的解决办法，现在或将来对我们的人民是有利的，还是会损害他们的兴趣？这是处理任何问题都必须考虑的唯一问题。政党政治，宗教考虑、人道主义理想——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所有关注都必须妥协，让步于此。

战前，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确保为我们的人民及其子女提供维持生活的物质必需品准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获得必要支持的手段有利的联盟。

今天要完成的任务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战前一个照顾德国人民生存的问题借助强大和独立的国家，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重新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国家。

重新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是必须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以便我们以后能够实施一项外交政策为我国人民未来的生存、福祉和生活提供保障。

换言之，德国今天在外交政策中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为为她明天恢复自由做好准备。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基本原则，即一个国家能否重新获得独立并不完全取决于领土正直。

只要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残余仍然存在，无论它有多小，就足够了，只要它拥有必要的独立性，不仅成为共同精神的载体全体人民，同时也为国家自由的军事斗争铺平道路。如果一个民族一亿人的人民容忍共同奴隶制的枷锁，以防止领土被分裂和分割，这比这样的国家更糟糕这样一个民族被肢解了，只有一个部分仍然保持着完整的独立。

当然，这里的条件是，这个片段是出于对庄严责任的认知而创作的它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宣扬其精神和文化的统一，而且要为最终解放和重新统一的军事冲突做好必要的准备遭受压迫的碎片。

我们还必须牢记，收复以前属于国家，无论是从民族学还是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首先必须是一个赢得恢复祖国的政治权力和独立。

在这种情况下，失地的特殊利益必须被毫不妥协地视为面对一个主要任务，即夺回人民的自由，这件事是次要的。

祖国。

解放被压迫或被孤立起来的人口，或帝国的各省，不能因为被压迫者的意愿或失去亲人的抗议而实现而只能通过曾经统一的那些部分国家使用武力母国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其主权。因此，收复失地的首要条件是大力推行福利和实力的增强，在战后仍然完整的那部分国家分区。它必须与一种珍贵的、不可摧毁的决心相结合，以奉献新鲜的从而发展出力量，在必要时为解放和团结整个民族而奋斗。

成熟。

也就是说，分离领土的利益必须服从于一个单一的目的，即为原州的剩余部分赢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力量和反对敌对胜利者的意志所必需的力量。

被压迫的领土不会回到它们共同祖国的怀抱，因为激烈的抗议，但只能靠剑的力量。

打造这把剑必须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国内政策的目标政府，而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保护锻造过程并获得盟国。

在本书的第一卷中，我讨论了战前我们的联盟政策的不足。

有四种可能的方法可以保证我们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人民。在这些方法中，第四种，也是最不利的，被选中了：而不是声音欧洲领土扩张政策，我们的统治者开始实行殖民和贸易政策扩张。

他们的政策是更加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武装冲突将会被避免。

他们试图同时坐在两个凳子上的结果可能是可以预见的，他们跌倒了他们之间，世界大战只是德国必须为之付出的最后代价。

外交政策的失败。

当时应该采取的方针是第三种，也就是我所指出的，通过获取新的领土来增强德国作为大陆强国的实力欧洲。

与此同时，通过随后获得殖民地，进一步扩张，可能会从而已经被纳入可能性范围。

当然，除非与英国结盟，或者由为了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军备而做出如此不正常的努力四五十年后，一切文化事业都必须完全被背景。

这本来是合理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重要性几乎总是取决于政治自由和独立。

政治自由是文化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保障政治自由的问题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一个民族。

为了实现密集的文化变革，必须在一般文化领域做出牺牲。

国家军事力量的加强将会在以后带来丰厚的回报。

事实上，可以断言，为维护国家独立而做出的如此集中的努力是通常随后会缓解一定的紧张局势，或突然出现平衡迄今为止被忽视的民族文化精神。

因此，希腊在经历了大英帝国的苦难之后，在伟大的伯里克利时代走向了繁荣。

波斯战争，罗马共和国将精力转向培育更高级的文明当它从布匿战争的压力和麻烦中解放出来时。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议会中大多数懦弱、愚蠢的人能够决定采取如此坚决的政策，使所有其他方面绝对服从国家利益的唯一任务就是为未来的武装冲突做准备，这将导致建立国家安全。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为了准备迎接这样的战争牺牲了一切，但我们荒谬的议会民主制度的创始人们，带着犹太教的标志，却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战前，我们为了征服新领土而进行的军事准备欧洲只是非常平庸，因此很难放弃真正有用的支持盟国。

那些指导我们外交事务的人根本不会考虑系统地准备他们拒绝了所有在欧洲获取领土的计划，并且通过选择一种政策为了殖民和贸易扩张，他们牺牲了当时可能与英国结盟。

与此同时，他们忽视了寻求俄罗斯的支持，这本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最后，他们跌跌撞撞地卷入了世界大战，被所有人抛弃，只有倒霉的哈布斯堡王朝。

我们当前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它不遵循任何可辨别的甚至是可理解的行动线。

而在战前，我提到的第四条道路是错误的，半心半意地追求它，因为革命甚至连当时最敏锐的观察家都无法检测任何追求明确路线的尝试。

甚至比战前更加不存在系统性计划，除非系统性地企图摧毁民族复兴的最后可能性。

如果我们客观地审视一下当今欧洲的情况，通过分析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下

列事实。

过去三百年来，我们大陆的历史完全由英国努力维护欧洲的力量平衡，从而确保必要的保护在追求英国世界政策的伟大目标的同时，她也远离了自己的后方。

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以来，英国外交的传统倾向一直是系统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任何一个大国取得优势在其他欧洲大国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有必要，可以通过武装干预。与此相似的唯一德国传统是普鲁士军队。在整个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为达到自己的目的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选择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或要面对的任务；但使用它们的意愿和决心始终相同。

在历史进程中，英国的处境越困难，英国就越帝国政府认为有必要维持政治瘫痪状态由于相互竞争，欧洲各国纷纷采取军事行动。

当北美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后，英国更有必要尽一切努力建立和维持其在欧洲侧翼的防御。根据这一政策，英国在击败了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荷兰集中所有力量对抗日益强大的法国，直到她拿破仑·波拿巴的垮台，从而摧毁了法国的军事霸权，她的最危险的对手。

英国政治家对德国态度的转变非常缓慢，因为只要德意志民族缺乏国家统一，而且由于英国的舆论潮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某些出于政治目的的路线只能缓慢地被引导到新的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的冷静思考被转化为情感价值观，不仅效果更显著，而且更加持久。当政治家实现了他的一个目标后，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目标；但只有经过缓慢的宣传群众的情绪才能逐渐形成实现其领导人所选择的新目标的工具。

然而，早在 1870/71 年，英国就已决定采取新的立场。在某些偶尔，由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强，导致该政策出现轻微波动。

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政治力量也对世界商业市场产生了影响。不幸的是，德国没有利用这些，因此，英国外交的最初倾向得到了加强。

英国视德国为一个重要的强国在商业和政治上，部分由于其巨大的工业发展，两国之间的威胁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两国已经对峙同一领域中的另一个人。

所谓的商业企业和平征服世界，在那些人眼中当时掌管我们公共事务的，代表着人类智慧的最高峰，正是这一事件导致英国政治家采取抵抗政策。

这种抵抗采取了大规模有组织的侵略形式，完全符合这种政治家风度并非旨在维护可疑的世界和平，而是目的在于巩固英国的世界霸权。

为了执行这一政策，英国与所有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结盟重要性，这符合她一贯的谨慎估计自己权力的对手，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暂时的弱点。

这种行为不能被称为肆无忌惮，因为这样一个全面的组织战争目的不能从英雄的角度来判断，而应该从权宜的角度来判断。

外交政策的目标不是看到一个民族英勇地灭亡，而是看到它生存。因此，每一条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都是合理的，而走这条路失败则必须被视为视为刑事玩忽职守。

德国革命爆发后，英国对德国世界霸权的恐惧被归咎于从那时起，英国就不再想把德国从地图上抹去。

欧洲。

相反，1918 年 11 月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崩溃，让英国外交面临着最初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

四年半以来，大英帝国一直在为打破大陆强国。随后突然崩溃，显然使这一强国脱离了欧洲事务的前景。

德国甚至连最原始的自我保护本能都缺乏，以至于欧洲平衡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被破坏了。德国被消灭了，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第一政治强国。



战争期间，为了鼓励英国民众“坚持到底”的愿望激发了英国人民的所有原始本能和激情。最终必将阻碍英国政治家做出决策。

随着德国的殖民、经济和商业遭到破坏，英国的战争目标是实现。任何超出这些目标的行为都会阻碍英国利益的实现。

只有英国的敌人才能从德国作为大陆重要力量的消失中获益欧洲的权力。

然而，从 1918 年 11 月到 1919 年夏天，英国都无法改变她的外交态度，因为在漫长的战争中，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呼吁民众的感情。

鉴于本国人民普遍的情绪，英国无法改变其外交政策。

导致这一结果无法实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实力权力现已实现。

法国已经把事态的发展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把自己的法律强加于在那几个月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中，唯一能够改变事情的发展方向是德国本身，但德国因内战而四分五裂，并通过她所谓的政治家宣布她准备接受任何和强加给她的每一项命令。

现在，在民族的历史上，当一个民族丧失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不再是一个可能积极结盟，它会沦为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其领土注定会恶化变成殖民地。

为了防止法国变得过于强大的力量就是参与她扩张的欲望。

事实上，英国并没有实现其战争目标。它不仅未能阻止大陆的权力占主导地位，从而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但她帮助正是这种情况，而且程度严重。1914 年，德国被认为是军事强国州，夹在两个国家之间，其中一个国家与她持平，而另一个国家则在军力。

然后是英国的海上霸权。法国和俄罗斯独自阻碍和反对德国的过度扩张。

从军事角度来看，德国的不利地理位置可能是被视为防止德国实力过度增长的另一个安全系数。

如果与英国发生冲突，德国的海岸线又短又窄，从军事角度来看是不利的，而她的陆地边界又太过广阔，受到攻击。

法国的地位今天不同了。她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在军事上没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欧洲大陆。她的南部边境实际上不会受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攻击，她是由于我国处于弱势地位，我们无法抵御德国的攻击。

她的海岸线很长，正对着大英帝国的要害。她不仅可以法国飞机和远程炮火袭击了重要的工业、商业和行政部门，英国的中心，但潜艇可能会威胁英国的商业路线。

以法国漫长的大西洋海岸以及欧洲和北美为基地的潜艇战役地中海非洲海岸的入侵，将给英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战争阻止德国权力发展的政治结果是法国的创立大陆上的霸权。军事上的结果是法国作为第一大陆强国的巩固，以及美国在海上的平等地位。经济上的结果是割让了英国的大片利益她的前盟友和同伙。正如英国的传统政策使巴尔干化欧洲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向往的和必要的，而法国的目标是使德国巴尔干化。

英国一直以来的愿望，并且将继续的愿望，是阻止任何一个大陆强国在欧洲获得世界重要地位。因此，英国希望保持欧洲的力量平衡，因为这似乎是英国称霸世界的先决条件。

法国一直以来的愿望，并且将继续的愿望，是阻止德国成为因此，法国希望维持一个由德意志小国组成的体系，其各方力量将相互平衡，并且不再存在中央政府。

这与法国对莱茵河左岸的占领相结合，将提供建立和保证法国在欧洲霸权的必要条件。

法国外交的最终目标必然会永远与最终目标相悖英国政治家的倾向。

以这些考虑为出发点，任何调查可能的联盟的人德国今天能够形成的，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唯一的出路就是与英国和解。

尽管英国战争政策的后果对德国来说是灾难性的，但我们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就目前情况而言，英国的切身利益已不再要求毁灭德国。

相反，英国的政策必须逐年趋向于遏制法国对霸权的渴望是无止境的。

现在，联盟政策不能通过铭记过去的怨恨来推行，但可以借鉴过去的经验，取得丰硕成果。经验应该告诉我们，为邪恶目的而结成的联盟本质上是脆弱的。

各国的命运只有通过共同的成功、共同的收获和征服，简言之，就是缔约双方权力的共同延伸。

我们的人民对外交政治问题的缺乏洞察力，在每日新闻都在谈论某位外国政客的“亲德态度”，这种假定的亲德态度被视为这些人将拥护这是一项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政策。

这种说法荒谬至极，而且考虑到当他谈论政治时，他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庸人。

没有一位英国、美国或意大利政治家可以被描述为“亲德”。

每一个英国政治家首先是一个英国人，每一个美国政治家首先是一个美国人，没有一位意大利政治家愿意采取不亲意大利的政策。

因此，任何希望在亲德基础上与外国结盟的人其他国家政治家的这种感觉要么是傻瓜，要么是骗子。

把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条件从来不是相互尊重或相互同情，而是缔约方获得利益的前景。

尽管英国政治家总是会追随亲英派，而不是亲德派，当然，这项亲英政策中涉及的某些特定利益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原因，与德国的利益相吻合。

当然，这种情况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而这种情况可能有一天会完全逆转。但政治家的艺术在于在关键时刻找到执行他自己的重要政策，那些盟友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类似的做法。

目前这些原则的实际应用必须取决于对以下问题：哪些国家对彻底废除死刑这一事实并不十分关心？在德国的中欧，法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达到了绝对霸权？哪些州考虑到其自身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存在，并考虑到迄今为止在开展外交活动时所遵循的传统政策，将这样的发展视为对自己未来的威胁？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法国现在是、并且永远是我们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德国。

无论曾经统治过法国的政府，还是将要统治法国的政府，无论是波旁王朝还是雅各宾王朝拿破仑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士共和派或红色布尔什维克，他们的外交政策将始终致力于占领莱茵河边境并巩固法国的通过分裂和肢解德国来巩固在这条河上的地位。

英国不希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而法国也不希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

存在吗——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今天我们不是为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而战，而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生存而战。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团结和我们子孙后代的衣食之需。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两个国家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欧洲，即英国和意大利。

英国绝不希望看到一个军事力量不受制约的法国欧洲可能有一天会采取某种政策，以某种方式必然会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英国也不会乐意看到法国拥有西欧有如此巨大的煤铁矿，也许有一天她能够在世界贸易中扮演可能危害英国利益的角色。

此外，英国永远不会希望法国在政治上处于由于欧洲其他地区的分裂，欧洲大陆似乎如此确信自己暴动只能大规模地恢复法国的世界政策，但甚至发现自己被迫这样做。

敌人每晚投下的炸弹数量可能比齐柏林飞艇多一千倍过去确实如此。法国的军事优势对英国人来说影响很大。

意大利是另一个不能、也肯定不会欢迎任何进一步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意大利的未来将取决于与地中海。意大利参战的原因并不是想为增强法国的实力，而是给予其痛恨的亚得里亚海对手致命的打击。

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将会阻碍意大利的未来，意大利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

各国将以任何方式消除竞争。

认真和公正的考虑证明，正是这两个大国，英国和意大利，自然利益不仅不违背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民族，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相同。

当我们考虑联盟的可能性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忽视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与我们自己有关；另外两个因素与相关国家有关。

我们有可能与今天的德国结成联盟吗？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获得援助而结成联盟，为实现自己的进攻目标，与一个国家结盟，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多年来，呈现出一种可悲的无能和和平主义懦弱的景象？一个大多数被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教义蒙蔽了双眼的国家，背叛了本国人民的利益并以一种向天堂哀求复仇的方式对待国家？就目前情况而言，任何大国都希望与一个国家建立有用的关系，并希望与之抗争为促进其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如果该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有勇气动一根手指来捍卫它的存在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联盟不仅仅是一个保证缓慢发展的条约，它能否按照旧的、灾难性的三国同盟的路线分解，生死攸关一个国家，其最典型的活动迹象在于对外部的卑躬屈膝关系以及国内对民族精神的可耻压制这样的大国能与一个没有任何伟大之处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吗？因为它的整个政策不值得？或者，可以与那些被他们的人民所鄙视的人所掌握的政府结盟吗？自己的同胞，因此在国外不受尊重？绝不！一个有自尊心的大国，它希望从联盟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是贪婪的佣金议员们不会、也不能与我们现在的德国结盟。

我们目前无法建立联盟，这是导致抢劫我们的敌人的团结。

因为除了我们国家的强烈抗议之外，德国没有采取任何方式为自己辩护。

议会选举；因为没有理由让世界其他国家参与其中我们的辩护；因为上帝不遵循给予一个国家自由的原则尽管我们的“爱国者”们向他发出了无数的哀嚎，协会；即使那些对我们的灭绝没有直接利益的国家也不能这样做除了参加法国的掠夺活动之外——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他们的参与，至少可以防止法国成为唯一一个通过参与而得到扩张的国家。

其次，我们不能低估改变大多数人观点的难度。

前敌对国家的人民，他们受到了某种方式的影响宣传。

当一个外国多年来一直被公众视为“匈奴”大军时，“强盗”、“汪达尔人”等等，它不能突然被呈现为不同的东西，昨天的敌人不能被推荐成为明天的盟友。

然而，第三个因素值得更多关注，因为它对于在欧洲建立未来的联盟。

从政治角度来看，德国不应该破坏得更多，但这样的发展非常符合犹太人的利益，他们操纵国际货币市场。

官方的，或者说传统的英国政治才能和犹太人对货币市场的控制影响力在任何地方都如此明显表现为对英国外交政策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与英国的利益和福祉相反，犹太金融不仅要求绝对对德国来说，经济上不仅遭到毁灭，政治上更是遭到彻底的奴役。

我们德国经济体系的国际化，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对犹太国际金融的控制，只有在一个政治上已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

但国际和犹太证券交易资本的马克思主义战斗力量最终不能在没有任何外界友好帮助的情况下摧毁德意志民族国家。

为此，法国军队将不得不进攻德国，直到德国内心屈服，屈服于国际贪财的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冲锋队。

因此，目前犹太人是彻底摧毁德国。

每当我们读到德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受到攻击的消息时，犹太人总是煽动者。

无论是平时时期还是战争期间，犹太马克思主义证券交易所都有系统地煽动对德国的仇恨直到一个又一个国家放弃中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服务，甚至不惜违背本国人

民的真正利益。

犹太人的推理方式非常清楚。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说，消灭民族主义和德国民族知识分子，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犹太国际金融束缚下的德国劳工，只是这场运动的序曲扩大犹太人的权力，并最终使世界屈服于其统治。

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德国是这一强大斗争。如果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沦为这些国家的压迫者的牺牲品，他们贪图鲜血和黄金，整个地球都将成为那九头蛇怪物的猎物。

如果德国成功摆脱对世界各国构成巨大威胁的这一控制就会被淘汰。

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卑鄙手段，不仅为了生存其他国家中旧的反德情绪，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会加剧这种情绪。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活动只是部分符合毒药正在这些国家间传播。

作为一般原则，犹太人在各个国家开展运动时，使用论据最能迎合各国人民的心态，也最有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我们的国家在种族问题上已经四分五裂，犹太人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很容易利用或多或少具有“世界主义”和和平主义思想，简言之，具有国际倾向，是这种破坏的结果。在法国，犹太人利用众所周知的、准确估计的沙文主义精神。在英国，他们利用商业和世界政治观。简而言之，他们总是致力于研究每个民族独特的心态的本质特征。

当他们以此方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取得决定性影响时，他们可以放弃以前的策略所必需的伪装，现在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们的破坏活动现在进展得更快了，把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变成了他们将在废墟上建立永恒的、主权的犹太帝国。

在英国，同样在意大利，本土政治家的优秀品质与犹太金融家的政策常常变得十分明显。

只有在法国，今天才存在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程度的深刻和谐在证券交易所的目标、控制它的犹太人的目标和沙文主义的目标之间国策。

这种目标一致对德国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国现在是、并将继续是她最危险的敌人。

法兰西民族正日益受到黑人血液的污染，成为一种威胁白种人在欧洲的存在，因为它与犹太人争取世界统治。

黑人血液流入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莱茵河所造成的污染是为了符合我们世仇的残暴和变态的复仇欲望人们。

这正合那些冷静、精于算计的犹太人的目的，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开始一个进程在欧洲大陆中心进行混血化，并通过感染白种人劣等种族的鲜血，摧毁了其独立生存的基础。

法国今天在欧洲的活动，受到法国复仇欲望的驱使，有计划地由犹太人指挥的，是对白种人生存的犯罪攻击，有一天会激起一代人对法国人民的复仇精神，他们将认识到种族污染是人类的原罪。

就德国而言，法国所代表的危险使得它有义务将所有情绪下降到下级层面，并向受到同样威胁的人伸出援手那些不愿意忍受或容忍法国霸权欲望的人。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将只有两个大国可能德国缔结同盟。这些强国是英国和意大利。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 1960 年以来德国外交政策的执行方式，鉴于我们的政府不断且难以理解的失败，我们必须进行革命，要么灰心丧气，要么怒不可遏，对这样的政权发起反抗。他们的行为方式不能归咎于缺乏理解，因为每个人似乎十一月党的领导人认为，有思想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独眼巨人般的智慧。

他们向法国献媚，并乞求她的恩惠。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们与令人感动的单纯，他们固执己见，一次又一次地向法国跪下，在伟大的民族面前卑躬屈膝，并认为他们认识到每一个连续的狡猾诡计法国刽子手所执行的绞刑是情绪转变的第一个迹象。

我们真正的政治操纵者从来不会相信这种荒谬的轻信。建立友谊的想法对他们来说，与法国结盟只是阻止德国采取联盟的切实政策。

他们对法国的目标以及法国幕后操纵者的目标不抱任何幻想。

诱导他们采取这样的态度，并表现得好像他们真诚地相信命运德国可能会这样改变，这是冷静的计算，否则我们的人民可能会主动掌握主动权并选择另一条道路。

当然，即使在我们自己的运动框架内，我们也很难提出英国作为我们未来的潜在盟友。

我们的犹太媒体一直善于集中仇恨英国，尤其是我们善良的德国傻瓜栖息在犹太人为愚弄他们而排列的树枝上。

他们大谈德国海上霸权的复兴，抗议德国抢夺我们的殖民地。因此，他们提供了材料，而那些有心计的犹太人则把这些材料传给了他的族人。

英国，在那里用于实际宣传的目的。

现在，就连我们那些喜欢涉足政治、容易上当的资产阶级也应该认识到今天我们不必争夺‘海权’之类的权利。

甚至在战前，将德国的全国精力用于此目的都是荒谬的而没有首先巩固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如今，这种愿望已经达到了荒谬的顶峰，在法律领域可以说是犯罪。

政治。

犹太幕后操纵者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今，这些往往只是次要的，但却能让人绝望。

他们煽动人民游行示威，与此同时法国却在撕毁我们的一点点地分裂国家，系统地摧毁我们国家的基础独立。

在这方面，我想到了一个特别的争论点，犹太人近年来使用极其熟练的一个国家，即南蒂罗尔。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要让那个无耻的流氓们承担责任，他们利用我们大部分人的无知和短视，模拟一场全国性的这种愤慨与我们议会骗子的真实性格完全不符，就像尊重私有财产就像尊重寒鸦一样。

我想在这里说，我是当时南蒂罗尔的命运决定——也就是说，从 1914 年 8 月到 1918 年 11 月——取代了最能有效保卫国家的方法就是军队。

我在那些年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仅为了拯救南蒂罗尔免于沦陷，而且还为了保卫德国其他各省份，将其交给祖国。议会强盗、整个政党政客团伙，没有参加那场战斗。相反，当我们继续相信战争的胜利将使德国民族能够继续这些叛徒在南蒂罗尔和其他边境省份发动了针对如此胜利的结果，直到战斗中的齐格弗里德因背部被匕首刺伤而屈服。

维也纳衣着考究的议员们发表的煽动性和虚伪的演讲市政厅广场 (Rathaus Platz) 或慕尼黑统帅厅 (Feldherrnhalle) 前面的建筑物无法为德国拯救南蒂罗尔。

只有在前线作战的部队能做到这一点。

那些破坏这条战线的人背叛了南蒂罗尔，以及所有其他省份。

德国。

任何人如果认为南蒂罗尔问题今天可以通过抗议、宣言来解决以及各种协会组织的游行，要么是骗人的，要么只是德国庸俗而已。

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依赖向全能的上帝庄严祈祷或对国际联盟虔诚信仰，但只有通过武力。

因此，唯一的问题是：谁愿意拿起武器来收复失去的领土？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会有勇气足以参加夺回南蒂罗尔的运动，担任议会主席由议会的鼓吹者、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和各市议员组成的冲锋队国务卿。

我多么高兴看到弹片在参加‘热情’抗议示威！我认为，如果一只狐狸闯入家禽场，它的

出现不会引起如此的混乱。

正如我们在如此大规模的“抗议者”集会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四处逃窜，寻求掩护。

最卑鄙的是，这些言论者自己并不相信能取得任何成果就这样。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的整个表演是多么无害和无效是。

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现在谈论恢复南蒂罗尔比过去更容易在过去的日子里为它的保存而战。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扮演着自己最适合的角色。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些人整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喊。

今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的正统派圈子如何炫耀自己的致力于南蒂罗尔的恢复。七年前，他们威严而辉煌的王朝通过伪证和叛国行为，帮助胜利的世界联盟有可能夺取南蒂罗尔。

当时这些圈子支持他们王朝采取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并没有打扰他们对于南蒂罗尔或其他省份的命运一点也不关心。

当然，今天为这片领土而战要容易得多，因为目前的斗争是在用‘心灵武器’无论如何，参加“抗议会议”并大声宣泄自己的不满是比较容易的。

心中充满义愤，或用报纸上的字迹弄脏你的手指文章中提到，这比例如在占领鲁尔期间炸毁一座桥梁要好得多。

某些圈子把南蒂罗尔问题作为德意关系的支点的原因中美关系这几年的良好发展态势有目共睹。

犹太人和哈布斯堡正统派非常希望阻止德国推行一项政策这一联盟有朝一日或许会导致自由的德意志祖国的复兴。

他们今天扮演这个角色并不是出于对南蒂罗尔的热爱——因为他们的政策最终会对该省的利益有害而无益——但由于担心达成协议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

这些人天生就有撒谎和诽谤的倾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冷静而厚颜无耻地试图扭曲事实，使人们认为我们已经‘背叛’了南蒂罗尔。

必须向这些先生们澄清一件事，那就是南蒂罗尔首先被出卖了每一个身体健康、四肢健全、没有在前线的德国人1914-1918年，他履行了对祖国的义务。其次，南蒂罗尔遭到了所有人的背叛在那些年里，他们没有帮助加强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抵抗，使国家能够继续战争，并且战斗到底。

第三，南蒂罗尔被所有参加十一月革命的人背叛了，要么直接通过合作，要么间接地通过懦弱的容忍，从而摧毁了唯一的这种武器本可以拯救南蒂罗尔。

第四，南蒂罗尔被那些政党及其追随者背叛了，他们把自己的签署了可耻的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勇敢的先生们，你们只是用言语提出抗议。

今天我冷静地认识到失去的领土是无法夺回的用议会演说家的巧舌如簧来反击，但只能用磨刀霍霍的剑；在其他言语，通过一场血腥的战斗。

因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现在木已成舟，不可能再夺回南方。

蒂罗尔经历了一场战争。事实上，我绝对会反对这样的举动，因为我确信不可能激发德国人民的民族热情要将这样的战争进行到底，就必须做好必要的准备。

相反，我认为，如果我们必须再次让德国人流血，那么这样做就是犯罪因此，为了解放二十万德国人，当距离解放德国人仅剩七十多万人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正在遭受外国的压迫，而德意志民族的生命线却成为大批非洲黑人的游乐场。

如果德国民族要结束这种威胁着将其从世界地图上抹去的状态，欧洲决不能陷入战前的错误，使全世界成为自己的敌人。

它必须确定谁是最危险的敌人，以便集中所有力量打败他，如果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必须做出牺牲在其他地方，子孙后代不会因此谴责我们。

胜利越辉煌，他们就越能体会到骰子的必要性以及导致我们做出这一痛苦决定的深深焦虑。我们必须始终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即作为赢回失去的各省，必须首先恢复祖国的政治独立和力量。

一个强大的政府在外交领域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是独立是可能的，并通过明智的联盟政策来确保独立，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警惕，不要被我们的咆哮所拖累效仿犹太人的资产阶级爱国者。

如果我们的运动不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而是仅满足于口头抗议。

正是尼伯龙根与哈布斯堡王朝腐朽的躯体结盟这一奇思妙想，导致了德国的毁灭。

在处理当今外交政治领域出现的可能性时表现出奇妙的感伤将成为未来无数年阻止我们复兴的最佳手段。

在这里，我必须简要回答可能就这三个问题提出的反对意见我已经放了。

1、能否与当今德国结盟，因为德国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

2. 敌国能够改变对德国的态度吗？3. 犹太人的影响力难道不比对事实的认识更强吗？这种影响力挫败一切善意并使所有计划徒劳无功？我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我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

当然没有人会与现在的德国结盟。

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会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不提供一点点信心的理由。

我强烈反对许多同胞试图解释和以公众情绪低落为由为政府的行为辩解。

过去六年来，我们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品格缺失确实令人深感令人痛心。他们对待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漠不关心是极其令人沮丧，他们的懦弱常常令人厌恶，但人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我们正在与一群几年前为世界树立了令人钦佩的榜样的人打交道。

最高的人类品质。

从 1914 年 8 月初到各国之间激烈斗争结束为止，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证明男子汉的勇气、坚韧和忍耐力了。

今天人们是如此的沮丧和失落。

没有人敢断言，我们今天所处的屈辱地位符合我们真正的性格。

国家。我们今天所要忍受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只是因为可怕的灵魂 1918 年 11 月 9 日犯下的叛国罪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诗人说“邪恶必然会继续滋生邪恶”，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

但时至今日，我们民族的优良品质并没有消失，只是处于休眠状态在民族良知的深处，有时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我们看到了德国终有一天会记住这些品质，将其视为复兴的最初征兆。

成千上万的德国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响应号召，像 1914 年那样，自由而坚定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在他们挚爱的祖国的祭坛上。

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恢复工作，全心全意、热情高涨，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影响了他们。铁匠又回到了铁砧前，农夫又开着犁耕田，科学家都在他的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尽职尽责，像以前一样热情和奉献。

我们遭受敌人的压迫，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接受，笑着耸耸肩，但却遭到了苦涩和愤怒的反驳。

毫无疑问，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种变化还没有形成有意识的意图和恢复政治国家权力和独立，但责任应归咎于那些不太关心响应上天的召唤，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一直在统治着我们的 1918 年以来，这种制度一直被错误地认为是导致国家走向毁灭的原因。

如果有人想评判我们今天的国家，他必须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它吗？”国家对我们政府通过的决议给予的支持太少了吗？阴暗的性质）是我们国家缺乏活力的标志，还是管理这一宝贵信托的方法彻底失败了吗？我们的政府做了什么来重新唤醒这个国家的自豪自我主张精神，勇敢的反抗和正义的仇恨？1919年，当和平条约强加于德意志民族时，这些都是希望的理由这种不受限制的压迫手段将有助于加强对自由的呼声。

德国。

和平条约提出的要求对人民来说就像鞭子一样，结果往往是作为未来复兴的信号。

《凡尔赛条约》怎么会被利用呢！在一个心甘情愿的政府手中，这种进行无限敲诈勒索和用这种令人羞辱的方式，来激起民族情绪！一个精心策划的宣传系统怎么会利用这项条约的残酷性来把人们的冷漠情绪转变为愤慨情绪，并将其转化为愤慨转化为无畏反抗的精神！该条约的每一项条款都应铭刻在德国人的心中直到六千万男女的灵魂中，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羞耻感和仇恨共同的信念像一股火流一样燃烧起来，在它的热度中锻造出了一个不屈不挠的决心并高呼‘我们必须拥有武器！’这类条约可以用于这样的目的。其无限制的压迫和其无耻的诉求是激发民族低迷精神、恢复它的活力。

然后，从儿童故事书到国家最新报纸的各种读物，每家剧院和电影院、每根张贴标语的柱子以及应该利用囤积物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直到胆怯的呼喊今天我们的爱国团体向天堂发出的‘主啊，拯救我们’这句话被转化了，甚至在最小的孩子的心中，也热切地祈祷，“全能的上帝，保佑我们的手臂，时候到了。你要公义，因为你一向是公义的。现在就判断我们是否值得获得自由。主啊，保佑我们的斗争。”所有的机会都被忽视了，什么也没做。如果我们的人民没有他们应该或可能成为这样的人，而世界其他人只把我们视为他们的仆人或者听话的狗，被鞭打后会舔主人的手。

当然，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可能性因我们自己的人民，但更多的是我们的政府。他们的腐败影响是导致事实上，现在，在经历了八年难以形容的压迫之后，对自由的渴望已经微弱了。在我们国家能够采取联盟政策之前，它必须恢复其其他国家中的威望国家，它必须有一个权威的政府，而不是为外国服务的苦力。

国家和其人民的监督者，而是国家意志的传达者。

如果我们的人民有一个将此视为使命的政府，一个勇敢的外交政策不到六年，帝国政府所追求的向往自由的人民的支持。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将前敌国转变为友好盟友十分困难。

反对意见可以回答如下：普遍的反德精神病在只要没有德国人民自我保护的民族本能的复兴。

这种本能的出现将使德意志帝国再次成为一个能够在欧洲政治棋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其他国家视为值得伙伴。只有当政府和人民证明他们适合签订联盟将一些与我们利益一致的大国开始建立一种制度目的在于改变本国民众的舆论。

当然，要取得这样的成果，需要数年坚持不懈和精心指导的工作。

正因为改变一个国家的舆论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在从事这样的事业之前要冷静思考。

这意味着，除非你绝对相信它是值得的，而且它将带来丰硕的结果。

一个人绝不能试图通过基于以下事实的行动来改变一个民族的观点和感受：或多或少才华横溢的外交部长的徒劳劝诱，但前提是有一个切实的保证，新的定位确实有用。否则，有关国家的舆论将陷入彻底混乱的状态。

最可靠的保证是确保随后能够达成与某个国家的联盟不是靠某个成员的喋喋不休就能实现的政府的政策，但其明确的、切实的政策显然是稳定的。

整个政府和公众舆论也都持有同样的看法。

政府给予的措施将增强人们对这项政策的普遍信心通过准备和支持性宣传手段，提供其活



动的具体证据，民意倾向在政府政策中的体现程度。

因此，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只有在公众舆论和政府都一致热情高涨，公开宣称决心进行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

必须先牢固确立这一状况，然后才能试图改变公众其他国家的舆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倾向于采取和一位似乎能够为保护那些利益——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建立联盟。

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件事是必要的。鉴于实现彻底的改变一个国家的公众舆论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很多人一开始不会理解这意味着——犯下可能被用作武器掌握在那些反对这种改变的人手中。

我们必须承认，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理解内心政府所考虑的目的，因为不可能解释政府的最终目的为推行某项政策而采取的初步措施。

政府必须依靠群众的盲目信任，或者更统治阶层智力发达，但由于许多人缺乏这种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由于政治因素不允许公开解释为何要采取这样的做法知识界一定数量的领袖总是会反对新的趋势由于它们并不容易理解，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从实验的角度来理解。

这样就引起过于焦虑的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我们有义务不让任何武器落入那些将会干扰与其他国家达成相互理解的工作。

尤其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虚伪和不切实际的言论时，情况更是如此。

我们的爱国协会和在咖啡馆里发表政治观点的小资产阶级。

建立新海军、恢复殖民地等呼吁只是毫无根据的空谈。

任何实际执行计划，任何冷静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能否认并且认真对待。

与此同时，英国利用这些拥护者的愚蠢长篇大论，抗议政策实际上正中我们死敌的下怀，不能被视为对德国有利。

这些人浪费精力进行无谓的抗议，反对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这损害了我们的利益，那些沉溺于其中的人忘记了根本原则这是一切成功的先决条件，即如果一件事值得做，那么它就值得做得很好。

因为他们不断抱怨五个或十个州，他们无法集中所有的力量我们民族的意志和我们的体力将对我们最凶猛的敌人的心脏发起一击，他们牺牲了建立联盟的可能性，而联盟可以增强我们的实力决战的冲突。

国家社会主义也有使命要完成。它必须教导我们的人民不要固守自己的把注意力放在小事上，而不是大事上，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次要的，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战斗的目标是我们人民的存在，我们必须打击的唯一敌人是剥夺了我们的存在。

也许我们必须吞下许多苦果，但这绝不是拒绝听取理性，拒绝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愚蠢无用的抗议，而不是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来对抗我们最致命的敌人。

此外，德国人民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去抱怨其他国家如果他们自己没有追究这些罪犯的责任世界就会对他们采取行动出卖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如果我们对英国和意大利进行长期辱骂和抗议，那我们就没有诚意然后让那些受敌人雇佣、夺取武器从我们手中夺走，摧毁了我们抵抗的支柱，并把瘫痪的人出卖了赖希以三十块银子的价格买下了这枚戒指。

我们的敌人正在以他们唯一可以预料的方式行动，我们应该学习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教训。任何不能达到这种观点的人都必须反思，否则我们除了听天由命之外别无选择，因为联盟政策将是永远不可能。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与英国结盟，因为她夺走了我们的我们的殖民地，或者意大利，因为她已经占领了南蒂罗尔，或者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那么除了与法国结盟，欧洲没有其他联盟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夺走了我们阿尔萨斯和洛林。

毫无疑问，最后一种选择是否有利于德国人民；唯一值得怀疑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只是一个傻子或者精明的流氓。

就领导人而言，我认为后一种假设是正确的。

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是敌人的国家的公众情绪发生了变化，而他们的真正未来我们的利益将会发生重合，这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我们国家的内部实力和我们确保自身生存的明确决心使得显然我们应该证明我们是宝贵的盟友。

此外，至关重要，无能甚至犯罪行为不应成为理由可能会被那些反对我们项目的人用来进行宣传与我们以前的敌人之一建立联盟。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最难的。那些代表人民的人，那些可能与我们结盟的国家的真正利益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违背犹太人意愿的做法，犹太人是民族和独立国家的不死敌人？例如，英国传统政治家的动力能否打破犹太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或者他们不能吗？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答案取决于很多因素。

因素太多，无法做出最终判断。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至少目前，一个政权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如此绝对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国际犹太人的力量不可能组织一个真正有效地阻挠被认为是政治必要的措施。

法西斯意大利对犹太人的三大主要武器进行的斗争，即使是对犹太人的潜意识的程度（虽然我自己不相信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证明毒药超越一切国家界限的权力的毒牙正在显现，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方式。

禁止共济会和秘密组织、压制国际新闻界和彻底废除马克思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不断巩固国家的概念——所有这些都将使意大利政府在未来几年内能够推进越来越多地关注意大利人民的利益，而没有注意到犹太世界九头蛇。

英国的情况就不那么有利了。在这个“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犹太人即使在今天，他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公众，几乎不受阻碍地实施他的意志。

观点。

然而，在英国，那些负责保卫国家利益和犹太世界独裁的主角。

这两种趋势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对立首次变得显而易见战后，英国政治家对日本问题采取了一种态度，而媒体却持不同看法。

停战后，美国和日本之间旧的相互仇恨立即消失开始重新出现。

当然，欧洲大国不可能对这一新的战争威胁无动于衷。

英国，尽管有亲属关系，但对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曾经的殖民地，一位伟大母亲的女儿，似乎即将成为世界的新女主人。

完全可以理解，今天的英国应该重新审视其旧有的联盟，英国政治家们应该焦虑地展望未来，有一天，人们将不再喊着“不列颠尼亚统治世界波浪”，而是“海洋属于美国”。

这个巨大的北美州，拥有丰富的原始土地资源，比被包围的德意志帝国更加无懈可击。

如果有一天国家命运必须决定，英国就完了，如果她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因此她热切地向黄色人种伸出了手，进入了从种族角度来看，这种联盟也许是不可原谅的；但从政治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在面临美洲大陆正在发生巨大的发展。

因此，尽管英国和美国在欧洲战场并肩作战，英国政府无法决定断绝与亚洲伙伴的联盟，但整个犹太媒体反对与日本结盟的想法。

我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直到 1918 年，犹太媒体支持英国政府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政策，然后突然转向并开始走自己的路。

消灭德国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而主要是犹太人的利益今天，摧毁日本对英国的政治利益的贡献，要小于摧毁日本对英国的政治利益的贡献。

服务于那些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的深远意图，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犹太世界帝国。

当英国竭尽全力保持其世界地位时，犹太人正在制定计划征服。他已经把现在的欧洲国家视为他手中的顺从工具，无论是通过所谓的西方民主的力量间接地，还是通过直接的形式通

过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统治。

但他的圈套不仅针对旧世界，新世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犹太人控制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金融力量。

犹太人年复一年地加强了自己在一个拥有一亿两千万人口的国家的劳动力控制力灵魂，但一小部分仍然保持相当独立，因此给犹。

犹太人在操纵舆论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并以此打造了一种武器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犹太人的伟大领袖们坚信，实现《圣经》中的承诺的日子已经临近。

旧约将会实现，犹太人将统治地球上的其他国家。

在这么多被剥夺了国籍、沦为犹太人殖民地的国家中，有一个独立国家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导致整个结构的毁灭，原因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除非它涵盖整个地球。

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其国家实力和国家伟大，那么帝国就像其他形式的暴政一样，犹太总督也会屈服于民族观念的力量。

由于他千百年来适应周围环境的经验，犹太人非常清楚，他可以通过种族灭绝的进程来破坏欧洲国家的存在。

但他很难对日本这样的亚洲民族国家做同样的事情。

今天他可以模仿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的行事方式，但他没有办法接近黄种亚洲人。

因此，他试图利用其他民族国家作为他的工具，这样他就可以在掌握最高控制权之前摆脱危险对手最后一个现存民族国家的统治，并将这种控制转变为压迫人民的暴政。

無法防護。

当他创立千禧年犹太教时，他不希望日本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未来的帝国，因此他想在建立自己的帝国之前摧毁前者专政。

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忙于在其他国家中煽动对日本的反感，就像他曾经煽动人们反对德国。因此，即使英国政治家仍在努力将其政策建立在与日本结盟，英国犹太媒体大肆宣扬对未来盟友发动战争，在“民主！”和“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在准备一条毁灭之路。

因此，在今天的英国，犹太人变得难以对付，因此反对犹太世界的斗争威胁也必然会从那里开始。

在这一领域，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它必须打开提高我们人民对外国的认识，并不断提醒他们真正的敌人当今威胁着世界。

而不是鼓吹对雅利安人的仇恨，我们可能几乎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与他分离，但与他有血缘关系和主要共同文明的特征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激起对恶毒的普遍愤慨人类的敌人和我们一切苦难的真正根源。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确保至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死敌是承认这一点，与他的斗争可能是更幸福时代的灯塔，并向其他人展示民族，也是苦苦挣扎的雅利安人类的救赎之路。

此外，愿理性成为我们的向导，愿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愿行动的神圣职责赋予我们毅力，愿我们的信仰证明我们的最高層護。

## 第十四章：东方偏见或东方政策

有两个考虑促使我做出特别的分析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

首先，这可能是德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次，这个问题同时也是检验年轻的纳粹运动的政治能力，以便清晰思考并采取正确的行动方针。

我必须承认，第二种考虑常常让我感到十分焦虑。

我们运动的成员不是从那些习惯性地对公众漠不关心的圈子里招募的但大多数都是来自持有或多或少极端观点的人。

既然如此，他们对外交政治的理解自然会一开始就很吃力。

由于他们以前所属的圈子对他们抱有偏见，而且了解不够，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这不仅对那些来自左翼的人来说是如此。相反，无论他们多么有害可能就是他们以前在这些问题上所接受的那种教导，在很多方面在某些情况下，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健全而自然的本能所抵消。

保留。

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用更好的教学来代替早期的影响，以便将自我保护本能和其他健全的本能转化为宝贵的资产。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以前在这方面的教育同样缺乏意义和逻辑，但如果他另外把他最后一丝自然本能都牺牲在了客观思考的祭坛上。

尤其难以说服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圈子的代表们采取以现实和合乎逻辑的态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同外国的关系。

他们的头脑被偏见和荒谬的思想所压倒，仿佛这并非他们已经丧失或放弃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对付这些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必须打一场艰苦的战斗，而且这场斗争之所以更加艰难，是因为，虽然他们常常完全无能，但他们如此自负，以至于没有丝毫他们甚至会瞧不起那些意见更为合理的人。

这些傲慢的势利小人假装比别人更懂事，完全无法冷静地冷静分析问题，权衡利弊，这是必要的在外交政治领域做出任何决定或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由于这些特殊圈子目前开始在最灾难性的方式，不保护我们人民的真正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幻想意识形态，我感到有责任向我的追随者清楚地阐述最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俄罗斯的关系。

我将尽可能彻底地处理这个问题，以便让大家能够理解，并本书的限制允许。

首先，我作以下一般性评论。

如果我们所说的外交政策是指任何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建立这种关系必须依赖于某些确凿的事实。

此外，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就基本原则制定以下原则：民族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的特点。

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地球上的由本州作为一个实体组织的比赛，通过建立一个健康的、一方面，人口规模与增长之间保持持久的、自然的比例，一方面是其领土面积和资源。

唯一可以被称为“健康”的比例是土壤资源足以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

任何达不到这一点的情况，都是不健康的，因为它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

这种不均衡迟早会导致衰落，甚至毁灭。

人民。只有地球上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独立人民的存在。

为容纳全国人口所必需的领土范围不应根据目前的需要，甚至根据其相对于人口数量。

在本书

第一卷的“二战前德国的联盟政策”标题下，战争”，我已经解释过，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不仅作为国家粮食供应的直接来源，而且从军事角度来看。

一旦一个民族由于其领土面积足够大而能够自给自足，下一个考虑的是如何采取必要措施来保卫自己的领土。

国家安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这又取决于从军事角度来看其地理位置。

因此，德意志民族只有成为世界强国才能确保自己的未来。近两千年来，我们捍卫国家利益（我们应该这样描述我们的或多或少成功的对外政治活动是世界历史的一件事。

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点，自从德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了伟大的国际斗争以来，他们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并且它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人们所知成为世界大战等历史记录。

当德国加入这场斗争时，人们认为它已经成为世界强国。

我说“假定”，是因为实际上她不是这样的人。如果在 1914 年，有一个不同的德国人口与领土面积的比例，德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强国，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战争将以对她有利的方式结束。

我的任务和意图并不是讨论如果某些条件成立会发生什么。

已经实现，但我觉得我绝对有责任真实地描述当前的情况并指出其引起警惕的弱点，以便至少让那些属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人知道必须采取什么步骤。

德国现在不是世界强国。尽管我们目前的军事弱点可能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权被称为世界强国。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人口规模与收入比例不平衡，那么领土面积是否像现在的德意志帝国一样令人极度不满？在这个时代，世界逐渐被各国瓜分，其中许多国家几乎覆盖整个大陆，不能说一个国家是世界强国，因为政治祖国的领土面积仅仅只有五十万平方千米公里。

单纯从领土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的面积在与所谓的世界强国相比。

引用英国的例子来反驳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英国，即母国，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大都市，覆盖了地球表面近四分之一的面积。在大国中，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下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些都是巨大的领土，其中一些其面积是现今德意志帝国的十倍以上。

法国也必须被列入这些国家之列。这不仅是因为她不断增加通过从庞大帝国的人口中招募有色人种士兵来增强军队的力量，但是也因为从种族角度来看，她正在迅速变成黑人，以至于我们实际上可以说在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非洲国家。

法国现在的殖民政策与德国过去的殖民政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法国沿着我们今天所走的路线发展，如果这种发展继续下去，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法国血统的一切痕迹最终都将在欧洲的形成中消失。

非洲混血国家。

这将代表一个强大而紧凑的殖民领土，从莱茵河延伸到刚果，居住着一个劣等民族，他们通过缓慢而稳定的进化过程发展起来在这一方面，法国的殖民政策与旧德国的殖民政策有所不同。

前德国殖民政策是半途而废的，就像在当时它的目的不是获取新的领土供德国国民定居，也不是它是否曾试图（尽管这可能是犯罪行为）加强帝国的权力通过招募黑人士兵。

德属东非的阿斯卡里部队代表了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小步，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为了保卫殖民地本身。

将黑人士兵运送到欧洲战场的想法——完全不考虑实际因素——在世界大战期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从未被考虑作为一项建议来实施在有利条件下，法国人却相反，始终将此视为其殖民活动的根本动机和理由。

因此，我们发现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强大的国家，它们不仅优于德国在人口数量上比美国强但其领土面积也是其政治权力的主要支撑。

从面积和规模来看，德意志帝国的地位从来没有与其他重要州相比，其人口状况非常不利它的历史始于两千年前，今天又重新开始。

在那个时代，我们是一群年轻人，我们冲击了腐朽的巨型国家的世界，最后的罗马就是我们，我们为它的毁灭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伟大的和强大的国家，而我们自己的帝国在其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渐下降。我们必须始终用清醒和冷静的头脑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必须研究德意志帝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德意志帝国进行比较。

那时，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惊愕地意识到，我一开始说的话是对的，即：德国不再是世界强国，无论其军事实力是强还是弱看法。

我们的地位与世界其他国家无可比拟，这要归咎于我们政府推行的注定失败的外交政策，归咎于我们的外交政策未能坚持不懈地追求明确的目标，也未能事实上，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健全的冲动和自我保护的本能。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要被后人铭记为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代表我们的国家，它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实际地位的严重性，勇敢而顽强地与迄今为止导致德国人民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错误的做法。

不尊重“传统”，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运动必须找到有勇气组织我们的民族力量，引导他们走上超越“生活空间”的界限如今，这些土地已经属于他们了，他们可以占领新的领土。

因此，运动将拯救德国人民免于灭亡或沦为奴隶的危险为任何其他人服务。

我们的运动必须寻求消除目前人口与我们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被视为我们生存的根源或政治基础力量。

它还应该努力消除过去的历史与无能为力的现状之间的对比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地。

在努力做到这一点时，它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最高形式的我们肩负着相应的崇高责任，也应当履行这一责任。

只有我们激发德国人民的种族意识，他们才会关心不仅要注意狗、马和猫的繁殖，也要注意自身血统的纯正。

当我说德国迄今奉行的外交政策毫无目的、毫无成效时，这项政策的实际失败将证实我的说法。

我们的人民是思想落后，还是缺乏勇气，他们的努力最终的结果不可能比我们今天所见证的更糟糕。我们决不能允许自己被战前几十年的发展所误导，因为我们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单独衡量，而是与其他国家相比。

现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其他国家的实力不仅更加稳步增长比德国更大，但从长远来看

它被证明是更大的，因此，尽管她表面上繁荣之后，德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逐渐落后。简而言之，尺寸差异的增大对我们极为不利。

甚至在人口规模上，我们也落后了，并且不断落后。自从我们的人民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他们为保卫自己的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强大，他们的失败只能归咎于错误的这次牺牲就是用来祭祀的。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我们的人民所经历的一连串政治变迁，一千多年来，无数的斗争、战争和调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结果，我们必须承认，从血液中只出现了三种现象，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某种确定的持久成果。

外交政策，或者实际上根本不是一项政策。

首先是奥斯特马克的殖民化，这主要是巴伐利亚人的工作第二，征服和定居易北河以东的领土；第三，组织勃兰登堡-普鲁士国，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杰作，后来成为一个新帝国的典范和核心。对未来具有启发意义的一课！我们的外交政策最初取得的两次重大成功是最持久的。

那么我们的人民在当今世界上将不会发挥任何作用。

这些成就是第一次，不幸的是也是唯一一次，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我们必须使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我国的面积达到令人满意的平衡，认为我们的德国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正确评价这两个问题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杰出的成就，对后世具有重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他们也对许多其他事情进行了颂扬，赞扬了在追击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一个奇妙的目标，无数冒险的战役和战争，而不是意识到后者对于我们国家发展的主线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的政治活动所取得的第三项伟大成就是建立普鲁士国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定国家概念的发展。

我们必须把民族自我保护本能的组织归功于同一来源，德国军队实现了自卫，这是一项符合现代世界的成就。

个人自卫观念转变为国家义务防御源于普鲁士国家以及它所引入的新的国家概念。

无论怎样估计这一过程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德意志民族由于种族分裂而成为被夸大的通过普鲁士军队的纪律训练，个人主义得到了部分恢复，其能力用于组织。

其他国家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群居本能，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民族社会通过军事训练这种人工手段。

因此，废除义务国民兵役制度——这可能与对其他几十个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对我们来说却产生了致命的后果。

让十代德国人得不到军事训练的矫正和教育作用，遭受种族和意识形态分裂的恶果，我们的人类将失去在这个地球上独立生存的最后遗迹。

德国知识分子只能通过以下媒介为文明做出贡献：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个人及其起源仍不得而知，而充当文明的肥料，直到我们体内最后一丝北欧-雅利安血统变得腐败或者灭绝。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我们的人民在千禧年期间取得的真正政治成功我们的对手比我们自己更能欣赏和理解这些斗争。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对这一夺走我们人民数百万美元财富的英雄行为感到兴奋不已。

他们最好的种族血统，但最终却毫无成果。

我们的人民在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真正政治成就与他们的悠久历史和为之流血牺牲的徒劳目标至关重要在制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政策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决不能允许自己加入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欢呼声中。

当代资产阶级圈子。

如果我们以任何方式看待战前的事态发展，那将是致命的约束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

我们不能承认任何可能起源于任何历史阶段的义务。

十九世纪。

与代表那个时期的人的政策相反，我们必须坚持前面提到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原则，即必须领土面积应与我国人口数量相一致。

从过去我们只能学到一个教训，那就是我们政治行为必须是双重的，即（1）获取领土作为我们政治行为的目标。

外交政策和（2）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作为我们国内政治活动的目标。我将简要讨论一下我们的领土目标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伦理道德。

和道德原则。

这一点在这里尤其必要，因为在我们所谓的民族主义圈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巧舌如簧的空谈家，他们试图说服德国人民，让他们相信，他们外交政策应该纠正 1918 年的错误，同时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向全世界保证德国人民的兄弟精神和同情人们。

关于这一点，我想先作如下的初步声明。要求 1914 年边界应该恢复是一个明显的政治荒谬，充满了这样的后果使得该主张本身看起来像是犯罪行为。

1914 年德国的疆界完全不合逻辑，因为它们不是真正完整的，包括了德国人民的所有成员，也不是考虑到军事防御的地理需要，这是合理的。

它们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计划的结果，而是临时的边界它们是在一场尚未结束的政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它们是部分是环境偶然影响的结果。

在我们的历史，并要求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应该是重建当时存在的条件。

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要求，完全是我们资产阶级同胞的典型要求，他们事情，对未来不做任何政治上有益的思考。

他们只活在过去，甚至只活在最近的过去，因为即使他们回顾过去，也不会超越他们自己的时代。

惯性定律将他们束缚在现有的秩序中，导致他们反对一切试图改变这一点。然而，他们的反对从来不承担任何形式的积极防御，而是只是消极的固执。

因此，我们必须认为，这些人的政治视野不应该 1914 年以后。他们宣称，他们的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要让恢复的时间，它们只会帮助弥合已经显现出来的裂痕我们的敌人已经结成联盟来对付我们。

只有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大火发生八年后，许多盟军交战国的愿望和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胜利者的联盟仍然或多或少地稳固。

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因德国的崩溃而受益。他们都担心我们的大国之间对彼此的嫉妒和互相怀有敌意。

他们认为，要实施对帝国财产的全面没收将成为防止我们复兴的最可靠保证。

内疚和对我们人民力量的恐惧构成了坚固的粘合剂，直到现在，联盟的成员们仍然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没有被欺骗我们。

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把恢复 1914 年的边界定为德国政治纲领，敌对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否则可能会倾向于退出联盟，坚持联盟，因为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盟友的支持，成为孤立的攻击对象。

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受到了这种战斗口号的威胁和威胁，而那种战斗口号本身就是荒谬的原因如下：首先，因为没有可用的手段将其从俱乐部会议的昏暗氛围中解放出来，并将其转变为真实的东西。

其次，因为即使能够实施，结果也是徒劳的，所以不会为了这一目的，值得我们再一次冒着人民的鲜血的危险。



毫无疑问，只有通过流血，我们才能实现恢复 1914 年边界。

一个人必须有像孩子一样简单的心智，才会相信修改凡尔赛条约是可以的。

通过间接手段和恳求胜利者的宽恕而获得——除了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塔列朗，但我们中间没有塔列朗。

我们百分之五十的政客都是狡猾的逃避者，他们没有品格，对我们的剩下的百分之五十是善意的、无害的、温顺的无能之人。

此外，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王子或他们的为国家边界讨价还价的妓女，但不可阻挡的世界主义犹太人为统治国家而战。剑是一个国家能够抵挡这种扼杀。只有当爱国热情高涨、集中力量组织起来时，才能抵御对各国进行国际奴役。

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导致流血，而且永远会导致流血。如果我们一旦确信德国的未来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那么，除了政治审慎的考虑之外，我们有责任设立一个值得付出努力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1914 年的边界对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毫无意义。它们没有起到它们不仅不能在过去保护我们，也不能为我们未来的防御提供任何保障。

这些边界无助于德国人民实现内部统一，也无助于保障其粮食供应。

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些边界在战略上并不理想，甚至不能令人满意。

最后，它们不能改善我们目前相对于其他世界大国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与现实世界强国的关系。

它们不会缩小我们与英国之间的差距，也不会帮助我们与美国的大小。不仅如此，它们也不会大大降低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试图恢复 1914 年的边界，即使事实证明成功的话，将导致我们民族的血液进一步流失，以至于没有一个有男子气概的人留下来的人将负责执行革命，并采取必要行动，以确保民族的未来生存。

相反，在这种表面成功的陶醉影响下，进一步的目标将会尤其因为所谓的“国家荣誉”似乎得到了维护，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新的港口将会开放，以促进我们的商业发展。

面对这一切，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定地坚持我们为的外交政策，即德国人民必须得到应有的生存空间也只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人民的流血牺牲才是正当的在上帝和德国子孙后代的眼中。

上帝——因为我们被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每天的面包而奋斗，作为受造物，没有任何捐赠，谁必须能够赢得并保持他们作为地球领主的地位，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德国人——在后代德国人的眼中，因为德国人的血不应该被除非是为了保证一千名尚未出生的人的生命，否则就不会倾尽所有。

我们的德国农民有一天能够养育出坚强的儿子的土地将证明今天农民子弟的生命牺牲，尽管对此负责的政治家们牺牲可能会受到同时代人的迫害，但后人将免除他们的罪责犯下流血罪，牺牲了国家。在此，我必须强烈抗议那些民族主义作家假装这种领土扩张是“违反人权是“神圣的”，并因此在其文学作品中对其进行攻击。

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什么力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引起的混乱正合我们的敌人对我们国家玩的游戏，符合他们的意愿。

通过这种态度的概念，这样的涂鸦者以犯罪的方式帮助削弱并摧毁我们人民捍卫自己切身利益的意志，这是唯一有效的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一平方码的领土根据更高意志和更高权利的法令。

德国的边界是偶然形成的，只是暂时的边界，是各个时期政治斗争的结果。

划分其他国家居住领土的边界也是如此。

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地球的自然地理是固定不变的。

实际上，它只是代表了连续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表面间隔，因为某些大自然的强大力量的作用，明天就可能遭到破坏和改造通过更强大的力量。

同样，在民族的生活中，其“生存空间”的范围也容易发生变化。国家边界是人类设立的，也可以被人类改变。

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领土面积，并不是其他国家应该拥有的理由。

永远承认其对该领土的权利。

拥有这样的领土，最多只能证明征服者的强大和敌人的软弱。

那些服从他的人，只有这种力量才是正确的。

如果德国人民被困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并因此面临绝望的未来，这不是命运的法则，拒绝接受这种情况，绝不是意味着违反命运法则。

正如没有哪个最高权力将比德意志民族更多的领土分配给其他国家一样，不公正地分配领土并不构成对这样一个国家的犯罪。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不是上天赐予我们祖先的，而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征服。

因此，现在和将来，我们的人民不会获得领土和生活资料，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给予其恩惠但必须凭借胜利之剑的力量才能赢得恩惠。

今天我们都确信有必要规范我们对法国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止步于此，那么我们在这里取得的成功将是无效的。

它只有在为扩大对我们在欧洲人民的生存来说必不可少的领土，对于殖民占领来说无法解决该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获得足够多的土地，供我们的人民定居。

扩大祖国的领土，从而不仅使新定居的人口保持紧密联系与母国保持联系，但将保证整个领土享有这些其总体规模带来的优势。

民族运动不应该扮演以太国家的代言人，而应该成为其否则它就是多余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没有权利叫嚣反对过去，因为这将重复过去的行为。

旧德国政策的弊端在于考虑到王朝的因素，德国的新政策不能采用感性的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圈子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著名的“受压迫的小民族”组建一支警察卫队，但我们必须是德意志民族的军人。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走得更远。当一个伟大的一个国家似乎注定要灭亡，除非它的领土得到扩张，尤其是当这里所说的民族并不是一小撮黑人，而是所有拥有为现代世界带来文化。

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不复存在，但为了成为作为世界强国，她需要一定的领土，以便今天能够赋予她必要性并确保其公民的生存。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意脱离了战前德国的外交政策。

我们现在正从六百年前我们的祖先离开的地方开始。

我们正在停止德国人向南欧和西欧的无休止的迁移，并且将目光投向我们东边的土地。

我们正在彻底放弃战前的殖民和商业政策，并且开始实施未来的领土扩张政策，但当我们谈到新的领土时今天的欧洲，我们必须主要考虑俄罗斯及其统治下的边境国家。命运本身似乎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命运在把俄罗斯交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时，夺走了俄罗斯曾经创建过俄罗斯国家、并且是俄罗斯社会保障的知识分子阶层。

它的存在。

俄罗斯国家本身并不是斯拉夫人建立宪法的结果，而是一个日耳曼元素在政治建设中发挥的出色作用的典范。

低劣的种族。

世界上许多强大的帝国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劣等民族在日耳曼人的组织者和统治者的领导下，成为了强大的国家，只要最初创建该州的种族核心仍然存在，该州就会继续存在。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依靠日耳曼统治阶级的核心生活，但今天这个核心实际上已被消灭。犹太人已取而代之。

正如俄罗斯人不可能独自摆脱犹太人的束缚一样，犹太人不可能长期维持这个强大的国家。他自己绝不是一个组织元素，而是一个腐烂的发酵物。这东方庞大帝国的解体已经到来，犹太人在俄罗斯的统治也将结束。

这也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

我们被命运选中，见证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将给我们带来最惊人的确认了民族主义的种族理论。

我们的任务，以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就是在我们的人民中培养政治心态，使他们能够认识到，他们必须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未来无法在与人民一起战斗的胜利战役的光荣热情中找到满足亚历山大大帝的热情。

犹太人对这种政策表示强烈反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犹太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对他自己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让所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明白，这种新的定位是正确的，但是，不幸的是，事实恰恰相反。

不仅在德国民族党成员中，而且在纯粹的民族主义圈子里，这项东欧政策遭到了强烈反对与此相关的是反对派，就像所有此类情况一样，都会引用伟人的权威。

俾斯麦精神被唤起，以捍卫一项愚蠢而不可能的政策，并且对德国人民危害程度最高。

据称俾斯麦非常重视与俄罗斯维持良好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但他们完全忘记补充说，他同样强调了例如与意大利的良好关系。

事实上，同一位冯·俾斯麦先生也曾与意大利结盟，以便能够轻松与奥地利算账。

为什么这一政策今天没有继续下去呢？答案是，今天的意大利不是当时的意大利。

那么，尊敬的先生们，请允许我提醒你们，今天的俄罗斯不再是俄罗斯那个时候。

俾斯麦从来没有想过制定一个从战术角度来看观点，是永远适用的。他太能掌控时间了，不能把自己束缚在那个方式。

因此，问题不应该是俾斯麦当时做了什么，而是他会做什么——一天。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他的政治智慧永远不会让他与一个注定要消失的国家。

此外，俾斯麦对他那个时代的殖民和商业政策持混合态度感觉，因为起初，他的主要关注点是找到最可靠的方法来巩固和内部加强了他亲自创建的国家体系。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他欢迎俄罗斯在后方提供保护的唯一原因，这给了让他可以自由地在西方活动，但当时对德国有利的是现在将是有害的。

早在 1920-21 年，年轻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慢慢地，开始在政治世界中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各个圈子里被称为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当时，目的是与其他地区的解放运动建立明确的关系国家。

这与广为宣传的“联盟”被压迫的民族。’有关人士大多是一些巴尔干国家的代表，也埃及和印度。他们总是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爱说话的绅士，摆出一副架子，但却没有真正的支持。

然而，不少德国人，尤其是民族主义阵营的人，却被欺骗了这些自大的东方人，他们相信印度或埃及学生有一次他们与印度或埃及的“代表”面对面会面。

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正在与那些没有支持的人打交道，而且无权缔结

任何形式的协议，因此任何协议的实际结果与这些人的接触为零，除非有人选择将这样度过的时间视为无谓的损失。

我总是对这些企图保持警惕，不仅仅是因为我有比这更好的事情要做，浪费数周时间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讨论”上，而且因为我相信，即使一个人与这些国家的授权代表打交道，整个事件必然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甚至有害的。

即使在和平时期，德国的联盟政策也非常可悲，因为它没有积极进取的目标，最终导致一个古老国家的防御联盟，正如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已经是退役球员了。

无论是与奥地利的联盟，还是与土耳其的联盟，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国家联合起来，目的是主动的侵略，几个老旧而衰弱的州联合起来，用这种古老的小玩意儿试图面对积极的世界联盟。

德国为这一错误的外交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还不足以阻止我们的顽固幻想家不会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因为试图实现通过“被压迫民族联盟”裁减全能战胜国的武装，并不是不仅荒谬，而且灾难性。

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样一来，德国人民的注意力又被转移到他们为了虚幻而毫无结果的希望和幻想而放弃了真正的可能性。

当今的德国人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与此同时，许多被这种方式误导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

每当出现一些奇妙的希望时，这些人就会立即去追求它。不不管是被压迫民族联盟、国际联盟，还是其他什么奇特的组织，一项发明，总有成千上万的聪明灵魂相信它。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曾怀着一种幼稚而难以理解的希望，希望英国在印度的垮台迫在眉睫，在 1920 年至 1921 年间受到民族主义圈子的珍视。

一些亚洲江湖骗子，甚至可能是真诚的“印度自由斗士”，当时在欧洲无所事事，并成功地激励了原本相当理性的人们认为以印度为中心的大英帝国即将崩溃的固有观念那里。

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厢情愿，也没有停下来想想他们的希望是多么荒谬因为他们预期大英帝国的终结和英国权力的终结其对印度统治的崩溃，他们自己也承认印度是至关重要的对英国来说很重要。

很可能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人类才知道的秘密。

德国民族主义圈子的先知，也是那些掌控着英国历史。认为印度对英国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英国本身，这是幼稚的。

帝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这是未能从世界大战中汲取教训的证明，也是彻底误解和无法认识到盎格鲁-撒克逊决心的质量，如果有的话想象英国会放走印度，而不首先拿出最后一丝力量努力坚持下去。

此外，它还表明，德国对英国管理其帝国的方式以及将其精神渗透到帝国的方式持不同看法。

英国永远不会失去印度，除非印度的行政机构因种族问题而腐败。

感染（目前在印度完全不可能），或者除非她被一些强大敌人的剑。印度的起义永远不会带来这种结果。

我们德国人有足够的经验知道战胜英国有多么困难，而且从这一切来看，作为一个日耳曼人，我更愿意看到印度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统治之下。

国家。

建立在埃及传奇起义上的希望，就像空想。‘圣战’也许会给我们德国笨蛋们带来一种令人愉悦的幻觉，即其他人现在已经准备好为他们流血牺牲。

事实上，这种懦弱的猜测几乎总是这种希望的根源，但事实上在英国人的猛烈炮火下，“圣战”很快将以血腥结束。

机枪和一阵英国炮弹。

一个弱者的联盟无法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决心在必要时摆脱最后一滴血，以维持其存在。

我，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根据种族标准来评估人类的价值，必须承认所谓“被压迫民族”的低劣，拒绝把我的命运与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我们必须对俄罗斯采取同样的态度。

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日耳曼统治阶级，除了其统治阶级的秘密图谋之外，新的统治者，在争取德国自由的斗争中没有合适的盟友。

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俄德联军对西方发动战争欧洲，甚至可能是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

这场斗争将不得不在德国领土而非俄罗斯领土上进行，而且没有德国能够从俄罗斯获得哪怕是最轻微的有效支持。

目前的德意志帝国规模太小，不足以发动对外战争，因此将不可能保卫我们的边境免受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国家的侵略。

在集中兵力之前，德国的工业区将不得不被放弃防御敌人的攻击，必须补充的是，德国和俄罗斯之间还有波兰国家，完全掌握在法国人的手中。

如果德国和俄罗斯联合对西欧发动战争，俄罗斯将不得不在第一位俄罗斯士兵被派往德国前线之前推翻波兰，但这并不是士兵的问题比技术装备的问题更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世界大战期间的困境将会重演，但是会以更加可怕的方式。

当时，德国的工业必须被耗尽来帮助我们光荣的盟友，在技术方面德国几乎独自承担了这场战争。

在这场新的假想战争中，俄罗斯作为技术因素将毫无意义。我们应该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世界的普遍机械化，在下一场战争中，它将具有压倒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个重要的领域，德国不仅可耻地落后了，而且，由于她必须加强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目前还没有一家能够生产出运行良好的汽车。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样的斗争将呈现出纯粹屠杀的性质。

德国必须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多的血；因为，一如既往，它我们将承受战斗的冲击，其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灾难。

即使发生奇迹，这场战争没有以德国，最终的结果将是德意志民族被血洗，并被包围即使她将成为强大的军事国家，她的实际处境也不会有任何改善。

在这里，没有必要反对，在与俄罗斯结盟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考虑立即战争，或者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有为战争做好充分准备的手段。

这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不以发动战争为目的的联盟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值。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发动战争。

虽然在结盟的那一刻，战争的前景还很遥远，但形势正在向战争发展这一想法是结成联盟的根本原因。

认为其他国家会对这种目的产生误解是根本不可能的。

联盟。俄德联盟要么只是一张纸（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或者协议条款将生效，并且以便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得到预先警告。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英国和法国会等待十年才让俄德联盟有时间完成技术准备。

事实并非如此，风暴会立即席卷德国。与因此，俄罗斯将成为一场新战争的信号，其结果将是德国。

除这些考虑外，还必须补充以下内容：（1）当今俄罗斯的当权者无意建立光荣的联盟或如果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就会坚持下去。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俄罗斯的现任统治者是满身血迹的罪犯，我们人类的渣滓在悲剧时刻的环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占领了伟大的国家，并出于嗜血的欲望，杀害并消灭了数百万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近十年来，他们一直用野蛮的暴政进行统治，从未被人知道过。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统治者属于一个充满最野蛮残忍的民族有能力巧妙地撒谎，而且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自己被要求将其血腥的专制统治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在俄罗斯拥有绝对统治权的国际犹太人并不将德国视为盟友，但也将其视为与俄罗斯面临同样命运的国家。

人们不会与一个唯一目的是毁灭其合作伙伴的伙伴结成联盟。

最重要的是，人们不会与那些不遵守条约的人结盟，因为他们不是真理和荣誉的捍卫者，而是谎言和欺骗的主角，偷窃、掠夺和抢劫。

认为自己可以与寄生虫签订条约的人就像一棵树相信自己可以与以它为食的槲寄生做一笔交易。

(2) 俄罗斯曾遭受的威胁，现在仍永远笼罩在德国的上空。

只有资产阶级的傻瓜才会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已经被克服了。

肤浅的思维方式，他没有想到我们在这里正在处理一个现象出于一种血腥的冲动，即犹太人渴望成为世界霸主的欲望。

世界。

这种渴望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世界的冲动一样自然，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选择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之奋斗。

武器，犹太人也一样。

犹太人遵循自己的方法，潜入各国的中心，然后进而从内部破坏国家结构。

他使用的武器是谎言和诽谤、有毒的感染和瓦解，加强斗争，直到他成功消灭他所憎恨的对手伴随着大量流血事件。

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犹太人在二十世纪，他致力于确保统治世界。在其他时代，他也致力于同样的目标。

目标，但手段虽然基本相似，但各有不同。

犹太人的野心是他们天性的一部分。正如其他民族不会自愿抑制增加数量或力量的本能，除非受到外界强迫环境或衰老，所以犹太人永远不会自愿地压抑他永恒的冲动和放弃争取世界独裁的斗争。

只有外部力量才能阻止他，否则他统治世界的本能将和他的种族一起消亡。

如果一个国家因为衰老而变得无能或灭亡，那是因为他们未能保存自己的种族纯洁性。

犹太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好地保持了自己血统的纯正。因此犹太人继续他命运的旅程，直到他遇到另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经过一场殊死的斗争，他谁会冲进天堂，谁就会再次被击回到路西法的领域。

如今，德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下一个目标。需要全新的传教思想的全部力量再次唤醒我们的民族，将其从国际毒蛇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阻止我们的血液从内部腐化的过程。

我们民族的力量，这样解放了，可以用来保卫我们的民族，这样，防止最近的灾难在最遥远的未来再次发生。

如果这是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那么与一个统治者为我们的未来的死敌。

如果我们自己也接受这种毒害，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人民摆脱这种毒害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又怎么能教育德国工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臭名昭著的反人类罪行呢？与这场地狱般的堕胎结盟并且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谴责那些同情如果我们国家的统治者选择了某种世界观的代表，那么我们国家就有某种世界观作为他们的盟友？反对世界犹太布尔什维克化的斗争要求我们表明我们对苏维埃俄罗斯的立场。我们

不能通过别西卜驱逐魔鬼。

如果今天甚至民族主义者圈子也渴望与俄罗斯结盟，那就让我们停下来环顾四周在德国本土，以便他们能够了解他们的支持来自哪里。

这些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人是否认为，一项受到推荐和赞扬的政策马克思主义国际报刊能给德国人民带来利益吗？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犹太人提供的武器进行战斗？对旧德意志帝国的政策，可以提出一种指责，即联盟的缺点是，它通过不断的摇摆不定和它的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世界和平的软弱，但有一个指责是不能指责的其不利之处在于未能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

我坦率地承认，在战争之前，我认为如果德国放弃她毫无意义的殖民政策和海军政策，并与英国结盟反对俄罗斯。这样，德国就会放弃其软弱的世界政策，转而采取坚定的欧洲政策。目的是获取欧洲大陆的新领土。

我不会忘记泛斯拉夫俄罗斯对德国不断发出的傲慢威胁。我不会忘记忘记那些持续不断的动员演习吧，其唯一目的就是激怒德国。

我无法忘记战前俄国舆论的基调，它充满了仇恨——煽动起来反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帝国，我也不能忘记俄罗斯的大型媒体对法国总是比对我们更有利。

然而，尽管如此，战前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

我们可能会赢得俄罗斯的支持并反对英国。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虽然在战争之前，我们可能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骄傲并与俄罗斯并肩作战，但今天这已不再可能了。

从那时起，世界时钟的指针向前移动，指向命运的开始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决定我们的人民。当今世界各大国正在进行的巩固进程是最后一次警告我们，让我们审视自己，把我们的人民从幻想的境界带回到事实的领域，并指出了未来的唯一道路，这将带领旧帝国进入一个新时代繁荣。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为了完成眼前这一伟大而重要的任务而放弃抛开一切幻想，以理性作为唯一指导，1918年的灾难可能变成一场无限的祝福我们国家的未来。

由于崩溃，我们的国家可能会成功地采取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外交政策，并通过新的世界观得到加强，德国民族最终可能稳定其外交政策。

它最终可能会获得英国所拥有的东西，甚至俄罗斯所拥有的东西，以及让法国再次再次做出类似的决定，最终证明对她有利，即政治遗嘱。

德意志民族政治遗嘱的基本原则决定了它的外交政策是：绝不允许欧洲出现两个大陆强国。看看在德国边境建立第二个军事力量的每一个企图，无论是以一个能够成为军事强国的国家的形式出现，这相当于攻击德国。

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防止犯罪，包括：诉诸武力，建立这样的国家，并在其建立之后将其粉碎。

确保我们国家的力量不建立在殖民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欧洲的本土。

永远不要认为帝国是安全的，除非它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有能力给予每一个给我们种族的后裔留下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永远不要忘记，世界上最神圣的权利是人类对其土地的权利，希望为自己耕种，所有牺牲中最神圣的就是为此而流的血。

在结束这些发言之前，我不希望不再次提到目前我们在欧洲已经建立了联盟。

在上一章讨论德国的联盟政策问题时，我提到英国和意大利是唯一值得我们努力建立紧密的联盟，并且这样的联盟将是有利的。

我想在这里简要谈一下这种联盟的军事重要性。

这一联盟的军事后果将与与俄罗斯结盟。

最重要的是，与英国和意大利的和解绝不会涉及战争危险。

唯一可能反对这种联盟的国家是法国，因为它几乎不会这样做。因此，这样的联盟将为德国提供一个机会，悄悄地在这样的联盟的框架内，必须进行那些准备目的是与法国清算。

这种联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缔结并不会自动导致德国愿意接受入侵的威胁，但联盟本身将被瓦解，也就是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不幸的协约将会解散，从而使我们的宿敌法国成为侵犯的受害者。

尽管这种成功最初只会产生道德上的影响，但它足以让德国拥有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行动自由，因为新的英德意联盟将拥有政治主动权，而不再是法国。

进一步的结果是，德国将一下子摆脱其战略地位不利。

一方面，她的侧翼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另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材料供应将是这一新举措的一个有益结果国家联盟。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新联盟将包括以下国家：技术生产潜力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补充的。德国第一次有了不会像吸血鬼一样吸食其血液的盟友但可以而且会为完成我们的技术设备做出慷慨的贡献。

我们不能忘记最后一个事实，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有土耳其或现在的俄罗斯。

地球上最强大的世界强国和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将成为欧洲的斗争与腐败腐朽的列强截然不同。

德国在上次战争中是同盟国。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建立这样的联盟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但协约的形成有些困难吗？爱德华七世国王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是传统利益的冲突，我们必须也将会如果我们确信这种发展的必要性，并做好明智的准备，我们就能成功克服自己的感情，把政策贯彻到底。

只有当我们在痛苦和困境的驱使下采取行动，放弃犹豫不决时，这才有可能。

坚持近几十年来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一条追求明确的目标。

我们外交政策的未来目标不应该是偏向西方或东方，而应该是东方政策的目的是获取必要的领土，以便德国人民可以生存下去。

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我们需要一支力量，而法国，我们国家的死敌，现在她把我们紧紧抓住，无情地夺走我们的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努力阻止法国在欧洲。作为我们今天的天然盟友，我们拥有欧洲大陆上每一个与我们一样感到法国对欧洲霸权的渴望令人难以忍受。

任何接近这些大国的尝试对我们来说都不应该显得太困难，任何牺牲都不应该被认为太伟大，如果最终结果是让我们能够推翻我们最死敌。

一旦大伤痊愈，小伤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痊愈。

烧灼并闭合。

当然，我们人民的内部敌人会愤怒地咆哮，但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让我们不要被误导而停止倡导我们最深刻的信念告诉我们有必要的事情。

我们必须抵制被犹太人的狡猾所误导的舆论潮流。

利用我们德国人缺乏洞察力。

波浪可能经常在我们周围肆虐咆哮；但顺流而下的人吸引的较少比打击它的人更受关注。

今天我们不过是河里的一块石头。几年后，命运也许会把我们举起来，成为一道堤坝，一般的水流都会被中断，只会在新的河床中向前流动。

因此，我们的运动有必要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眼中得到承认代表着明确的政治纲领。

无论上天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命运，我们都必须通过外在的、可见的符号。

只要我们自己认识到决定我们外交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这种知识将赋予我们忍耐的力量，这是我们在反对派媒体的猛烈攻击，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恐惧，并受到诱惑的袭击



在这里或那里做出让步，‘入乡随俗’，以避免整个全世界都在与我们作对。

## 第十五章：自卫权利

1918年11月，我们放下武器后，采取了一项政策，就人类而言，可以预见，必将逐渐导致我们彻底屈服。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表明，那些放下武器而不迫不得已，宁愿忍受最大的屈辱，勒索，而不是试图再次诉诸武力来改变命运。

这可以从纯粹的人性角度来解释。一个精明的征服者总是会执行他的对征服的要求尽可能只分阶段进行。

那么他就可以合理地肯定，一个失去了所有性格力量的民族（这是任何自愿屈服于对手威胁的国家都不会发现这一点这些压迫行为，如果其中一种行为是单独实施的，则有足够的理由采取再次武装。

被征服的民族越是经常遭受勒索，最终的反对新的、看似孤立但却不断发生的敲诈勒索行为，尤其是如果人们已经在默默地、忍耐地承受着更多、更大的不幸。

迦太基的陷落是一个可怕的例子，它表明一个民族正在慢慢地走向毁灭，而他们他们都应受到指责。

克劳塞维茨在《三认识论》中出色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并给出了明确的形式，他说：“懦弱的屈服所带来的耻辱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毒药一旦进入一个民族的血液，就会传给后代。它将破坏和使后世之人的力量陷入瘫痪。’但他补充说，相反，“即使是在血腥而光荣的战争之后失去自由，斗争是民族复兴的保证是长出新树的重要核心。

日生出健全的根基。’当然，一个失去了所有荣誉感和所有性格力量的民族不会感受到这种理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但任何一个把它铭记在心的国家都不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只有那些忘记它或不愿承认它将会崩溃。因此，那些对懦弱的不能指望臣民突然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按照常识和人类经验决定的。

相反，他们会拒绝这样的学说，直到人们习惯于直到国家中更好的元素脱颖而出，从奴隶制的枷锁中夺取权力臭名昭著的腐败者的手中。

在第一种情况下，掌权者会对事态感到满意，因为征服者经常委托他们担任奴隶主，而他们，作为完全没有性格的人，然后对自己同胞行使权力时比最残忍的外国人更残忍受敌人指派执行这项任务。

1918年后在德国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获得宽大处理的希望是多么渺茫。

胜利者通过自愿投降的方式对政治产生了最灾难性的影响广大群众的态度和行为。

我明确地说“广大群众”，因为我无法说服自己，人民领袖所做的或未做的事都可以归咎于类似的灾难性幻想。

自从战争以来，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犹太人手中，今天我们承认这一点，不可能假设对事态的认识不足是我们不幸。

相反，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人民是被故意毁灭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表面上的疯狂政府的外交政策被揭示为一种精明的计算逻辑，并付诸实施为了宣传犹太人为世界主宰而斗争的思想。

因此，似乎可以理解的是，1806年以后的七年里，给已经崩溃的普鲁士注入新的活力和战斗热情，必须——时间不仅被浪费，而且还导致国家活力的不断消耗。

1918年11月七年后，《洛迦诺公约》签署。因此，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上面指出的那样。

签署了可耻的停战协定后，我们的人民没有鼓起足够的勇气并有精力对不断重复采取的压迫措施进行突然抵抗敌人非常精明，不会一次性提出太多要求。

他总是把他的征收限制在他和我们德国人看来政府，可以暂时服从，从而避免公众爆发骚乱的风险感觉。

但是，单一的强制措施被接受和容忍的次数越多，它就越没有道理现在看来，仅仅因为一次羞辱或企图羞辱，就做了本来不应该做的事。

以前在许多其他情况下都这样做过，即提供抵抗。这就是“滴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毒药”。一旦这种性格的缺乏表现出来，结果就是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像一种邪恶的遗产一样影响着所有未来的决定。

它可能会成为国家脖子上的一块重担，无法摆脱，但却迫使它继续处于奴役之中。

因此，在德国，强制解除武装、镇压、经济掠夺和旨在使我们在政治上无力自卫的措施接踵而至另一个。

这一切的结果是，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让很多人把道威斯计划视为祝福并祝洛迦诺公约取得成功。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在如此多的苦难中，唯一的祝福就是也就是说，虽然人可能会被愚弄，但天是无法被贿赂的，因为天不会赐福。

自那时以来，痛苦和焦虑一直伴随着我们的人民，痛苦是唯一一直忠于我们的盟友。

在这方面，命运也没有例外。它给了我们应得的惩罚。

因为我们不懂得珍惜荣誉，所以它通过对面包的匮乏教会我们珍惜自由。

如今，这个国家已经学会了为面包而哭泣，也许有一天它会学会为自由而祈祷。

尽管我们国家在1918年之后的几年里崩溃得痛苦而明显，但任何人敢于预言什么，都会受到极其严厉的迫害事后必然会发生。

尤其是在“压制”警告声音的问题上，因为不愉快而不受欢迎。

我们的人民所服从的政府是无可救药的他们是自负的，他们对待那些制造他们发出令人不安的警告，导致自己不受欢迎。

然后我们看到，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伟大的议会笨蛋，其实是普通的马鞍匠和手套匠（不仅仅是以职业为业，因为这意味着非常少）突然被提升到政治家的地位，并向卑微的凡人布道。

座。

这样的一位“政治家”在展示了他的六个月的才华暴露了他的本质，即一个空谈家，并成为公众的蔑视。

尽管他已经给出了最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完全无能，但这并不重要。

相反，这个共和国的议会政治家为国家提供的服务越不真实，他们越是残酷地迫害那些期望他们有所成就或敢于指出他们的失败并预测未来类似的失败。

如果有人最终成功确定了其中一个议员们向铁一般的事实屈服，以至于这位“政治家”无法否认他的整个政策及其结果，他会为自己的不成功找出无数的借口，但绝不会承认他自己是造成这一恶果的主要原因。

最迟到 1922-23 年冬天，人们就应该普遍认识到，即使在和平缔结后，法国仍然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其最初的战争目标。难以想象，四年半以来，法国竟然一直在牺牲在她的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斗争中，她的民族鲜血供应不足以便随后通过赔偿的方式获得所遭受损失的补偿。

即使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单独来看，也无法解释法国进行了这场战争，如果阿尔萨斯-洛林还没有被视为真正庞大的法国外交政策为未来制定的计划。

该计划的目的是将德国分裂成许多小国。

为此，沙文主义的法国发动了战争，而她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出卖自己的人民，对国际犹太人来说，雇佣兵。

如果法国的战争目标能够通过世界大战实现，正如最初希望的那样巴黎，这场斗争是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世界大战的血腥战斗没有发生在索姆河，佛兰德斯、阿图瓦、华沙郊外、新诺沃哥罗德、科诺和里加，但在德国，鲁尔区、缅因州、易北河畔、汉诺威郊外、莱比锡、纽伦堡等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德国可能已经毁灭了。

我们年轻的联邦国家是否能经受住四年半的艰苦奋斗，这一点令人怀疑。

半年，因为它是由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中央集权的法国承担的，整个国家想象力集中在巴黎。如果这场民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发生在我们祖国的边界之外，不仅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老军队的不朽贡献，但这也是非常幸运的为了德国的未来。

我坚信（这种信念常常让我感到恐惧），如果事情发生了变化当然，德意志帝国将不复存在，只有“德意志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在战争中流的血没有被流下的泪水完全是徒劳的。

事情发生了变化。1918 年 11 月，德国确实因雷击而崩溃突然，但当灾难发生在国内时，陆军仍然在敌国。

当时法国最关心的不是德国的分裂，而是如何尽快将德军撤出法国和比利时。为了战争结束后，法国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德军并将其推回德国境内（如果可能）。

如果不这样做，法国人就无法集中精力实现他们自己的独特和最初的战争目标。

然而，法国在这方面受到阻碍，因为就英国而言，战争只有当德国作为殖民和商业强国的地位被摧毁，并被削弱时，德国才真正赢得了胜利升至二流国家的地位。

彻底消灭德国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她希望未来能在欧洲找到一个法国的对手。

因此，法国被迫以和平手段继续进行战争所铺平的道路。

方式；而克列孟梭则表示，对他来说，和平只是战争的延续，因此获得了额外的意义。

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试图瓦解帝国的框架未完待续。一方面，通过不断发送新的照会，要求裁军，另一方面，一方面，通过征收经济税，另一方面，这可以通过裁军进程中，巴黎希望德国的框架能够逐渐变得不稳定。

德国人越是丧失民族荣誉感，经济压力和持续的经济困境可能是造成政治破坏的有效因素。这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政策实行了十年二十年，必须相信，从长远来看，逐渐摧毁并最终瓦解最坚固的国家身体。

这样，法国的战争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到 1922 年至 1923 年冬天，法国人的意图早已显

而易见。

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的方法。希望法国决心可能会被德国国家机构的强硬态度所削弱，或者，它可能至少有可能做有一天必定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挑起一些特别残酷的镇压行为，把德国国家之船的舵手绕过去撞击敌人。

这自然会涉及一场生死搏斗。在这场搏斗中生存下来的机会取决于法国能否事先被孤立，以便在第二次冲突中，德国不必与整个世界作战，而是为了保卫德国，对抗不断扰乱世界和平的法国。

我坚持这一点，并且我深信第二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终有一天会发生。

我永远不会相信法国会主动改变对我们的意图，因为这些意图这其实只是法国人自我保护本能的体现。

如果我是一个法国人，如果我把法国的伟大视为神圣，如同把德国的伟大视为神圣，那么我他们不可能、也不会采取与克列孟梭不同的行动。

法兰西民族正在慢慢消亡，这与其说是因为人口减少，不如说是因为种族中最优秀的元素逐渐消失，可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德国被肢解，世界才会恢复秩序。

法国的政策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可能会走上千条弯路，但破坏德国始终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最深切的愿望和法国人的最终意图。

现在，如果认为如果一方的意志只是被动的，并专注于其为了自我保护，它可以永远抵抗另一个同样强大的意志，但是处于活动状态。

只要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恒冲突仅仅以德国防御法国的进攻，它永远不会结束，尽管德国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接连失去一个立足点。

如果我们研究这些变化，德语的分界线已经从十二世纪至今，在德语使用的边境地区，我们可以很难指望从迄今为止如此的态度和发展中获得未来的成功对我们有害。

只有当德国人充分认识到这一切时，他们才会不再允许民族生存意志在被动防守中逐渐减弱，但将团结起来与法国进行最后一场决定性的比赛和决赛为实现德国最高目标而奋斗。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结束迄今为止持续不断的法德冲突。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毫无成效。当然，这里假定德国认为镇压法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使我们的人民最终能够在另一个领域扩张方向。

今天，欧洲有八千万德国人，我们的外交政策将被视为只有当仅仅一百年后，就有两亿五千万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德国人，并不像苦力那样挤在一起，在工厂里工作。

不是听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命令，而是作为土地的耕种者和工人，他们的劳动将是相互的保证它们的存在。

1922年12月，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局势变得尤为危险法国正在考虑采取新的、全面的镇压措施，并需要承诺。

政治压力必须先于经济剥削，法国人认为，只有让猛烈攻击德国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他们才能让我们的“顽劣”的人们屈服于其苛刻的枷锁。

通过占领鲁尔区，法国希望不仅德国最终被摧毁，但我们却陷入如此严重的经济困境，以至于我们应该被迫不管愿意与否都承担最重的义务。

这是一个让德国屈服并被打垮的问题。德国先是屈服，然后又被打垮完全下降。

通过占领鲁尔区，命运再次向德国人民伸出了手，给了他们站起来的机会，因为最初看似沉重的不幸被发现，仔细研究一下，这是一个让德国遭受苦难的极有希望的机会结束。

至于外交政策，法国占领鲁尔区的行动实际上疏远了英国。

第一次，事实上，它不仅疏远了英国外交界，他们已经得出结论，以冷静客观的心态评价和维护英法联盟，但也疏远了大部分英国公众。

英国商界尤其难以掩饰对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额外措施的不满加强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实力。

法国不仅从军事角度在欧洲占据了这样的地位德国自己此前并没有控制过，但它因此获得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实际角度来看，她将政治竞争力与几乎等同于垄断的经济优势。欧洲最重要的铁矿和煤矿现在都掌握在一个国家的手中，这个国家与德国相比，迄今为止中国一直积极、坚决地捍卫其切身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向世界证明了其军事效率。法国占领鲁尔煤田实际上抵消了英国在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者不再是勤奋刻苦的英国政治家，而是福煦元帅和他代表的是法国。

意大利对法国的态度也一直不太好，自从战争结束时，现在变得十分敌对。

重大而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昨天的盟友可能变成明天。事实上，事态发生了另一种发展，盟军并没有突然加入进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德国与苏联之间爆发冲突，是因为德国没有恩维尔帕夏，只是一位库诺，担任帝国总理。

尽管如此，法国入侵鲁尔区还是打开了未来的可能性，不仅在德国外交政策领域，而且在其内部政治。

我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受到虚假新闻的持续影响，曾将法国视为进步和自由的捍卫者，但幻想突然间被消除了。

就像 1914 年一样，国际团结的梦想突然从我们的心中消失了德国工人阶级又回到了永远斗争的世界，在那里生物以其他生物为食，弱者的死亡意味着强者的生命，所以 1923 年春天。

当法国人将他们的威胁付诸实施，并起初犹豫不决、小心翼翼地侵入鲁尔煤田对于德国来说，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

如果那时我们的人民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心态，而且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德国鲁尔之于法国就像莫斯科之于拿破仑。

事实上，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容忍这一新举措，除此之外，不采取任何行动，也不让德国人民关注那个闷热的地区和燃烧的熔炉，从而决心结束这种持续的羞辱并面对当下的恐怖，而不是屈服于无尽的恐怖。

当时担任德国总理的库诺，因发现了一种第三条道路，我们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更应该受到赞扬。

他并与合作。

我将首先尽可能简短地讨论第二种选择。通过占领鲁尔区，法国公然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她的行动使她与几个保证国，尤其是英国和意大利。

她不再指望那些州会支持她自私的强盗行为。她只能指望这场冒险一开始就圆满结束她自己无助的努力。

对于德国国民政府来说，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尊重规定的。

当然，一开始我们不可能用积极的武装抵抗来对抗法国，但是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没有武力论据的谈判支持他们将会是徒劳和荒谬的。

采取‘我们拒绝参加任何谈判’的态度是荒谬的，除非有一个积极抵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最终同意谈判则更加荒谬但同时又没有组织起支援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不可能阻止德国占领鲁尔区。

采取军事措施。

只有疯子才会推荐这样的做法，但尽管法国的行动持续了一段时间，在行动实施期间，措施本可以应该不顾凡尔赛条约而进行，法国她自己违反了一一收集军事力量，作为支持稍后再联系谈判人员。

因为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个被法国占领的地区的命运将有一天会在某个会议桌上或其他

会议上做出决定。

每个人都必须非常清楚，即使是最好的谈判者，也很难取得成功，因为只要他们站立的地面和坐的椅子不在武装人员的保护自己的人民。

一个弱小的侏儒无法与运动员争论，而一个背后没有武装防御的谈判者必须当布伦努斯把他的剑扔进敌人的天平时，他总是默许，除非他可以用同样强大的剑来维持平衡。

自 1918 年以来，谈判总是在这样的喜剧中上演，这让人感到痛心。

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每一项专横命令。

当我们被邀请时，我们在全世界的眼中呈现出一副可怜的景象，仿佛在嘲笑，参加会议，只是为了听取已经做出的决定和计划这项法案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制定并通过，尽管我们被允许讨论它，从一开始，就必须被视为不可改变。

确实，我们的谈判人员几乎没有一次表现出超过平庸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完全正确地证明了劳合·乔治的讽刺言论是正确的。

提到前德国内阁部长西蒙先生，他说德国人无法选择有智慧的人作为他们的领导者和代表。但面对敌人夺取政权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德国的防御能力令人遗憾地薄弱，即使是天才也无能为力。

然而，在 1923 年春天，任何考虑过抓住法国入侵鲁尔区以重建德国的军事力量首先必须恢复国家的道德武器，增强国家的意志力，并消灭那些摧毁了国家实力的这一最宝贵要素。正如 1918 年，我们未能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毒蛇踩在脚下，付出了血的代价。

1914 年和 1915 年的一切，现在都因 1923 年春天而遭受报应，我们没有抓住当时提供给我们的机会，最终制止这种恶作剧马克思主义叛徒和杀人犯。

只要战斗还没有结束，任何对法国进行真正抵抗的想法都是纯粹愚蠢的对抗五年前粉碎了德国抵抗力量的那些部队他们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力，将军队调往战场。

只有资产阶级的头脑才会得出这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很可能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1918 年那些无原则的头目，他们冷酷地利用我们两百万死者的尸体是他们进入各个政府的垫脚石 1923 年，他们突然表示愿意向国家表示敬意。

良心。

期望这些叛徒突然出现，成为德国自由的捍卫者。

他们无意这样做。正如鬣狗不会抛弃腐尸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放弃背叛国家。提出这样愚蠢的论点是无关紧要的，即某某许多工人为德国献出了生命。这是事实，但后来他们不再国际上心胸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 1914 年德国工人阶级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战争就会结束三周之内。德国可能在第一名士兵踏出第一步之前就崩溃了边境。

德国人民继续战争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妄想还没有渗透得很深，但随着战争的拖延，德国士兵和工人再次逐渐倒下在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迷惑下，他们的国家也同样受到迷惑。失去了他们的服务。如果在战争开始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十二或十五数千名犹太人被强迫接受毒气，就像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行业的数十万优秀德国工人，召唤必须在战场上面对它，那么前线的数百万牺牲就不会徒劳无功。

相反，如果及时消灭了其中一万两千名罪犯，那么一百万名正直的男子的生命，他们将来可能会为德国服务，已得救。

但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家风度”，毫不犹豫地移交，数百万人在战场上被屠杀，而我们却看到十到十二个人成千上万的叛徒、奸商、高利贷者和骗子，作为国家最宝贵、最神圣的资产，并公开宣布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

确实很难说这些资产阶级圈子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精神虚弱、道德软弱和懦弱，或者流氓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注定要它会沉沦，但不幸的是，它会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

1923年的情况与1918年相似。无论决定采取何种形式的抵抗采取行动的首要前提是清除体内的马克思主义毒素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求并找到那些决心对马克思主义发动歼灭战并给予那些力量可以自由行动。

他们有义务在“法律和秩序”的崇拜面前不屈服。

外部敌人正在给祖国带来死亡——打击，而叛国罪就潜伏在国内的每个街角。

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应该欢迎混乱和动乱，如果这种动乱提供了一个最终与马克思主义者和解的机会，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的敌人。

人们。

既然这个机会已经被忽视了，那么再想抵抗，无论以何种形式，都是愚蠢的。

抵抗可能会发生。

当然，要以真正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规模来与马克思主义者清算，普遍重要性不可能按照某些秘密会议或根据一些内阁部长疲惫不堪的大脑所制定的计划。

它必须符合地球上生命的永恒法则，这些法则是，并且将是依然是那些为了生存而不断斗争的人。

必须记住，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坚强和健康的国家已经从血腥内战的折磨，以及在那里人为维持的和平条件常常导致国家腐烂到极点。

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用温和的手段改变，而应该用铁腕手段用来无情地粉碎那些毒蛇，这些毒蛇在国家的身体上滋生。只有在这之后做好积极抵抗的准备才会有意义。

那时我常常大声说出来，试图向所谓的国家圈子解释清楚，当时的利害关系有多大？重复1914年和随后的错误几年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与1918年同样的灾难。

我经常恳求他们让命运自由，让我们的运动能够与马克思主义者达成和解，但我的布道却无人听闻。

他们所有人，包括国防部队首领，都以为自己更了解情况，直到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被迫接受历史上最卑鄙的投降。

我当时深信德国资产阶级的使命已经结束并且无法履行任何进一步的职能。

那时我也认识到，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出于一种精神。

竞争，而并不真心希望摧毁它。

他们早就接受了这个观点：他们的国家注定要毁灭，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在葬礼宴会上找到好座位。正是为了这个，他们才继续'斗争'。那时（我坦然承认）我对阿尔卑斯山那边的伟人怀有深深的敬佩之情，他对人民的热爱激励他不与意大利内部的敌人讨价还价，而是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力图消灭他们。

墨索里尼之所以能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因为他决定不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通过摧毁国际主义来拯救他的国家脱离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德国伪政治家们看起来是多么可怜的侏儒啊跟他比！看到这些无足轻重之人如此自负、厚颜无耻地批评一个人，真是令人作呕比他们伟大一千倍的人，想到这发生在一个五十年前，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是俾斯麦！1923年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善待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鲁尔区任何积极抵抗尝试的命运。

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存在这样一个致命的敌人的情况下，想与法国作战是纯粹愚蠢的。

然后可以做的就是进行一场假战斗，以满足德国民族元素的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平息“公众的愤怒”，或者麻醉它，这就是确实有意。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们就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力量首要的，不在于它的武器，而在于它的意志，在开始征服外部之前，战胜敌人，就必须消灭国内的敌人，否则，得不到胜利，就会酿成灾难。

在战斗的第一天就取得了成果。

一次失败的阴影就足以摧毁一个尚未解放的民族的抵抗战胜内部敌人，并给予对手最终的胜利。

1923 年春天，这一切或许已经预见到了。无需追问当时是否可以指望对法国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德国在对于法国入侵鲁尔来说，这只不过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的毁灭，成功会站在我们这边。

一旦从现在和未来存在的致命敌人中解放出来，德国将拥有这种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再次抑制的。

当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被摧毁的那一天，束缚它的锁链将被永远打碎，因为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从来没有被敌人的力量所征服，而只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失败和我们阵营中的敌人。

由于当时的德国政府无法决定采取如此英勇的举措，唯一的剩下的选择就是采取第一种方案，也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让事情顺其自然。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上天却给德国送来了一位伟人，那就是库诺先生。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天生的政治家，但他是一种受托做零工的政治办公室职员。除此之外，他更像是一个商人。德国的不幸是，这种政治化商人以商业的眼光看待政治并采取行动。

“法国占领了鲁尔。鲁尔有什么？煤。那么法国占领了鲁尔为了煤炭！”库诺先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罢工，以阻止法国获取煤炭？然后（至少库诺先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会在某个晴朗的日子离开鲁尔，因为占领已经最终没有被证明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机。这大概就是杰出的国家政治家说道。

在斯图加特和其他地方，他向“他的人民”发表讲话，他的人民对此钦佩不已。

当然，他们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来罢工，因为罢工必然是一种行动由工人承担。

因此，必须让工人（对库诺这样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来说，工人是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与其他德国人建立统一战线。

看到这些腐朽的资产阶级政党政客的面容，真是奇妙。

当这位伟大的天才向他们说出启示的话语时，他们喜笑颜开。这是民族主义者和天才。

他们终于发现了他们长期寻求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和他们可以自己被跨越。因此，伪民族主义者可以扮演条顿人采取民族主义姿态，同时伸出友谊的信任之手对国家国际主义叛徒。叛徒们欣然握住了这只手，因为正如库诺先生需要马克思主义领袖一样他的“统一战线”中，马克思主义领袖们需要库诺先生的钱。因此，双方因该交易而获益。

库诺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战线，由民族主义喋喋不休的人和反民族的骗子组成，并且现在，在国家支付给他们的钱的帮助下，国际骗子能够继续他们的光荣使命，那就是摧毁国家经济体系，这一次是在国家开支。

想到用总罢工来拯救一个国家，真是天才之举。

由国家支付。这是一项最能被人们热情遵守的命令。

对懒汉漠不关心。

每个人都知道祈祷不会解放一个国家，但历史尚未证明一个国家是否可以通过‘放下工具’来释放。

如果不是当时推动有偿总罢工，并以此作为他的“联合库诺先生要求每个德国人多工作两个小时，然后是三天之内，“统一战线”就会结束。

国家不是通过拒绝努力来获得自由，而是通过做出牺牲来获得自由。

无论如何，所谓的消极抵抗是无法持续很久的。除了一个完全不知道战争可以想象一支占领军可能会被如此荒谬的言论吓倒并驱逐手段，但这可能是国家必须付出代价的唯一的数十亿，并严重导致了国家货币贬值。



当然，法国人能够安心地在鲁尔区安居下来。

当他们看到有人对他们采取如此荒谬的措施时。

我们亲自向他们展示了让顽固的平民意识到理由是，如果其行为意味着对占领军官员构成严重危险置于权威地位。

九年前，我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消灭了比利时法郎骑兵团并让平民清楚地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当这些团体的活动对德国军队构成了严重威胁。

同样，如果鲁尔区的消极抵抗真的对法国人构成威胁，那么占领只需要八天就能完成这整件幼稚的废话最终走向可怕的结局。

根本问题永远是，如果消极抵抗达到一定程度，我们该怎么办这确实激怒了我们的对手，他们开始用武力镇压，流血事件？我们还要抵抗吗？如果要，那么，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接受严厉而血腥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面临同样的情况，我们本应该面对，我们是否进行了积极抵抗，换句话说，我们就必须战斗。

因此，所谓的消极抵抗只有在决心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有必要，可以公开战斗或者通过游击战来继续这种抵抗。

一般而言，这样的奋斗永远不会进行，除非人们坚信成功是可能的。

被敌人围困的堡垒，实际上在那时就投降了被迫放弃一切救援希望的时刻，特别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防守方被生命的希望而非可能的死亡所吸引。

让被敌人完全包围的城堡的守军一旦失去所有希望守军的士气立刻被摧毁。

因此，如果考虑到它必然会导致的后果，如果它证明鲁尔区成功的消极抵抗没有实际意义除非建立了积极的阵线组织起来予以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如果鲁尔区的所有威斯特伐利亚人都能确信祖国已经动员了八十到一百个师的军队来支援他们，法国人会发现自己踩踏荆棘。

当然，可以找到更多勇敢的人，为成功的企业，而不是明显徒劳的企业。

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件，促使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采取坚决立场反对所谓的民族战斗口号。

在那几个月里，我受到了那些爱国者们的攻击，他们的爱国主义既愚蠢又这些人因为在突然能够表明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不会因此招致任何危险。

我认为，这种卑鄙的统一战线是可以想象的最荒谬的现象之一，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工会几乎用大量资金填满他们的金库后，库诺的贡献，现在是从惰性转变为消极抵抗的时候了防御转向主动攻击，“红色”鬣狗突然冲出国家羊圈，展现出它们的真面目。

库诺先生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生意中。德国因一次经历而富裕起来，因一次经历而贫穷起来。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希望。

到那年仲夏为止，有几名军官，他们当然不是最勇敢和光荣的他们之中，没有人真正相信事情的进程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羞辱。

他们都希望——即使不是公开的，至少也是秘密的——必要的措施能够使得这次傲慢的法国入侵成为德国历史的转折点。

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人指望帝国军队的干预。

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对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对训练了无数的年轻人。

但当这场可耻的崩溃真正发生时，在数百万德国资金被浪费了，成千上万的德国年轻人愚蠢地相信了这些承诺帝国统治者所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已经牺牲，政府在最公众对这种对我们不幸国家的背叛的愤慨达到了顶点。

数以百万计的人现在完全相信，只有整个现行制度被彻底摧毁了。

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一方面，有人公然、无耻地对国家犯下了叛

国罪。

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个国家正陷入缓慢的饥饿之中。由于国家践踏了一切信仰和忠诚的准则，嘲弄了公民的权利，使得数百万最忠诚的儿子们的牺牲毫无意义，也剥夺了其他数百万人最后的便士，它再也不能期待任何事了，除了从它的臣民那里得到仇恨。

对于那些毁掉人民和国家的人的仇恨，必然会通过以某种形式。

在这方面，我在这里引用我在大审判中发表的演讲的结束语这件事发生在 1924 年春天。

“让这个国家的法官谴责我们当时的行为；历史，一个国家的女神，更高的真理和更美好的正义，她会微笑着撕毁他们的判决书，并宣告我们无罪。”但历史也将把那些被赋予权力的人传唤到自己的法庭上，践踏法律和正义，使我们的人民遭受苦难和毁灭，并且在他们最危急的时刻，国家遭受的不幸，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自我，而不是考虑社区的生活。

我不会在这里讲述 1923 年 11 月 8 日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看不出这会对未来，也因为揭开刚刚愈合的旧伤口不会有任何好处。

此外，谈论那些也许在内心深处他们同样热爱自己的人民，只是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或者没有承认这是正确的选择。

面对降临到我们祖国并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巨大不幸，我必须避免冒犯甚至分裂那些将来必须团结起来的人伟大的统一战线将由真正的、忠诚的德国人组成，它将不得不承受我们人民的敌人所展现的共同阵线。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那些当时把我们当作敌人的人会崇拜那些男人为了人民，他们踏上了痛苦的死亡之路。

我将这本书的第一卷献给我们的十八位阵亡英雄。

在这里，在第二卷的结尾，让我再次在我们的支持者和拥护者面前理想，唤起人们对那些英雄的记忆，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为了我们大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必须时刻提醒那些软弱和动摇的人他们的责任感——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忠诚地履行职责，甚至做出最大的牺牲。

我认为，这个人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之一，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的在他的哲学中并最终在行动中努力唤醒他的和我们的民族。

这个人就是迪特里希·埃卡特 (DIETRICH ECKART)。

结语 1923 年 11 月 9 日，即成立第四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被解散，并在整个帝国领土上被禁止。今天，即 1926 年 11 月，我们再次获得了自由，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内心更加坚定。

对这场运动及其个别领导人的所有迫害、所有诽谤和中伤，都是无法伤害它。它的思想的正确性，它的意志的纯洁性，它的支持者的自立精神，牺牲，使它从所有压制中发出比以往更强烈的声音。

如果在当今议会腐败的世界中，议会越来越意识到其斗争的最深刻本质，认为自己是种族价值的最纯粹体现，性格并据此行事，它几乎可以肯定有一天斗争胜利。

正如德国如果得到领导和组织，就必然会在地球上赢得应有的地位一样按照同样的原则。

在这个种族毒害的时代，一个国家致力于照顾其最优秀的种族元素终有一天必定会成为地球的主宰者。

希望我们运动的追随者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牺牲的大小诱使他们对可能的结果进行焦虑的比较。

目录作者序言

第一卷 清算●

第一章：我的家●

第二章：在维也纳的学习和苦难●

第三章：维也纳的日子——总体反思●

第四章：慕尼黑●

第五章：世界大战●

第六章：战争宣传

第七章：1918年革命●

第八章 我的政治活动的开始●

第九章：德国工党●

第十章：第二帝国的崩溃●

第十一章：国家和种族●

第十二章：民族团结进步的第一阶段德国社会主义工党●

第二卷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章：世界观与政党

第二章：国家

第三章：公民和国家臣民●

第四章：个性与民族国家理想●

第五章：世界观和组织

第六章 我们斗争的第一阶段——口语

第七章：与红色势力的斗争●

第八章：没有盟友，强者更强大●

第九章：冲锋队的性质和组织●

第十章：联邦主义的面具●

第十一章 宣传和组织●

第十二章：工会问题●

第十三章：德国的同盟政策●

第十四章：东方偏见或东方政策●

第十五章：自卫权利● 尾声